

裘錫圭學術文集

語言文字與古文獻卷

復旦大學出版社

裘錫圭學術文集

第四卷

語言文字與古文獻卷

復旦大學出版社

目 錄

納西象形文字	1
人民群眾是漢字的創造者和改革者	3
從馬王堆一號漢墓“遣冊”談關於古隸的一些問題	7
漢字形成問題的初步探索	25
談談古文字資料對古漢語研究的重要性	40
漢字的性質	49
《辭源》《辭海》注音商榷	59
《辭源》修訂本在注反切方面的一些問題	76
文字職務的分化	86
談談漢字整理工作中可以參考的某些歷史經驗	96
研究漢字切忌為感情所支配	101
漢字的起源和演變	103
四十年來文字學研究的回顧	149
釋詞兩則	162
一、釋“拉雜”	162
二、釋“涉獵”	164
談談《同源字典》	169
再談古文字中的“去”字	188
從純文字學角度看簡化字	190
在紀念《漢字簡化方案》公佈 35 周年座談會上的發言	194
讀古書要注意字的古義	196
秦漢時代的字體	205
大學生應該注意培養正確使用漢語漢字的能力	230
一句至少被誤解了一千七百多年的常用的話——“予取予求”	235

究竟是不是文字

——談談我國新石器時代使用的符號…………… 237

讀《魏晉南北朝詞語例釋》…………… 239

不要以不誤爲誤

——語文瑣議之一…………… 243

積極慎重地進行現代漢語規範化建設…………… 249

貝、錢、幣

——雜談古代貨幣制度對語言文字的影響…………… 253

研究古代文化應該有訓詁常識…………… 255

二十世紀的漢語文字學(與沈培合著)…………… 259

從方塊漢字能否廢除說到外來詞的譯法…………… 296

談談“異形詞”這個術語…………… 298

用出土文字資料檢驗清儒在語文學方面的一些具體見解…………… 304

談談進行古代語文的學習和研究的一些經驗教訓

——基礎要扎實些,考慮要全面些…………… 310

關於《規範字表》的一些想法…………… 319

《論衡》札記…………… 320

附:關於《校釋》、《集解》二書的錯誤…………… 340

考古發現的秦漢文字資料對於校讀古籍的重要性…………… 347

談談地下材料在先秦秦漢古籍整理工作中的作用…………… 378

讀書札記九則…………… 389

一、“祭禽”解…………… 389

二、說“食”…………… 390

三、說“索我於枯魚之肆”…………… 391

四、說“宦皇帝”…………… 392

五、說“遇負杖入保者息”…………… 393

六、說“河海不擇細流”…………… 394

七、“登立爲帝,執道尚之”解…………… 395

八、《洛誥》“其作周匹休……”新解…………… 396

九、《戰國策》“觸讐說趙太后”章中的錯字…………… 398

斗卮和題湊	400
閱讀古籍要重視考古資料	404
談談清末學者利用金文校勘《尚書》的一個重要發現	412
說“揜函”	
——兼釋甲骨文“櫓”字	418
《墨經》“𠂔”“謂”“廉”“令”四條校釋	423
《史記·殷本紀》注譯	430
四十年來發現的簡帛古籍對傳世古籍整理工作的重要性(提要)	447
古文獻中讀爲“設”的“執”及其與“執”互訛之例	451
“地君之御”與“制地君”	461
簡帛古籍的用字方法是校讀傳世先秦秦漢古籍的重要根據	464
“東夏”解	469
讀書札記四則	475
一、“耆其股肱”之“耆”當訓“强”	475
二、《王兵》與《管子》互校一例	475
三、“秉時養人”之“秉”爲“並”之音近訛字	479
四、《韓非子》“行事”當與秦漢人所言“行事”同義	480
再談古文獻以“執”表“設”	484
附：讀書札記一則(郭永秉)	494
再談古書中與重文有關的誤文	496

納西象形文字

納西族是居住在我國雲南省西北部等地的一個兄弟民族。它曾經使用過兩種自造的文字。一種是較後起的表音文字,有的學者音譯它的名稱為“哥巴字”。一種是歷史較久的、以形意符號為基礎的文字,^①納西人稱它作“木記號石記號”,這就是一般學者所說的“納西象形文字”。

“納西象形文字”並不是整個社會通用的文字。它只為少數“東巴”(巫師)所掌握,主要使用在記錄經典等宗教性的用途上。

這種文字的構造原則和古漢字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以下主要根據麗江納西族記錄經典的文字,舉例加以說明:

1. 符號字。如𠂔(“好”,以吉祥的符號表“好”意)×(“十”)+(“百”)等。
2. 象形字。如^{◉◉}(“星”)𠂔(“雞”)𠂔(“齒”)𠂔(“屋”)等。
3. 象事字。如^人(“播種”)𠂔(“抱”)𠂔(“飛”)等。
4. 表意字。如^花(“美”,以花朵表“美”意)^{行星}(“行星”,^〇上加^行表行動意)等。

5. 假借字。納西文字中同音或音近假借的現象極多。例如^{女陰}本讀 meɬ,是“女陰”的象形字,經典中常常借表讀 meɬ 的一個助詞。^蒿本讀 puɬ,義為“蒿”,^蛙本讀 paɬ,義為“蛙”,這兩個字連在一起,可以借表“puɬ paɬ”一詞,義為“化育”。

6. 形聲字。形聲字數量很少,但可以分兩類。一類是在本字上加注聲符而成的。例如^{山崖}字義為“山崖”,^{山崖}是山崖的象形,因為“雞”和“山崖”是同音詞,所以在“山崖”的象形字中加畫一個雞頭以注明讀音。一類是由形符和聲符合成的。例如“小官”一詞通常借同音詞“蕨菜”的象形字^蕨來表示,但有時又加上一個端坐人形而寫做^{蕨人},就變成一個形符加聲符的形聲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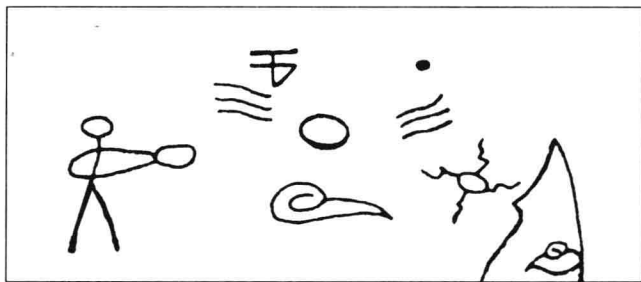
① 這種文字創始的時代還不能完全確定,不過至遲也應在明代以前。可參看《麼些象形文字字典》序。解放前漢人稱“納西”為“麼些”,“麼些象形文字”就是“納西象形文字”。

納西文字的字形還不很固定,例如寫“鷄”字,可以把整個鷄畫出來,也可以只畫一個鷄頭。沒有本字的詞所用的假借字也不是很固定的。

此外,還存在一個字用作兩個以上聲音不同的詞的形意符號的現象。例如⊕字讀 biɬ 當“太陽”講,讀 ɲil 當“白天”講,讀 soɬ 當“早”講。

雖然“納西象形文字”已經大量地、固定地和語言中的詞結合起來,並且表音的成分也已經相當發展;但是,它仍然是一種很不成熟的文字。在使用這種文字的時候,通常並不完整地記錄語言。例如在下面所引的那段經典文字裏,“右邊”“左邊”等意思不是用文字,而是由風和蛋的相對位置表示出來的。至於“吹”“蕩漾”“撞”等意思就更需要讀者自己從“畫面”上去體會出來了。就是在把語言記錄得比較完整的例子裏,也往往很難完全把字一個個地分析開來。文字的形體常常根據上下文而改變。例如“九”字通常作 𠂔,但在說到“九對蛋”的時候,便畫九個蛋而作 𠂔。這一變體也可以看作“九”和“蛋”的合文。有時一個字只要稍微添加一些東西,就能代表很複雜的意思。例如 𣏟 是“樹”字,在樹下加上一只腳寫成 𣏟,就可以讀作“樹生腳會走路”。

附:“納西象形文字”簡介



這是從麗江納西族經典“人類的來歷”中摘出來的一段“文字”。●是“黑”字，𠂔是“白”的借音字。𣏟是“湖”字。根據納西經師的釋讀譯出的漢文如下：

“把這蛋拋在湖裏頭,左邊吹白風,右邊吹黑風,風蕩漾着湖水,湖水蕩漾着蛋,蛋撞在山崖上,便生出一個光華燦爛的東西來。”(引自傅懋勳《麗江麼些象形文“古事記”研究》29頁)

原載《文字改革》1962年8期(署名土),又載《古代文史研究新探》(作為《漢字形成問題的初步探索》的附文),今據後者收入。

人民群眾是漢字的創造者和改革者

在我國歷史上，反動統治階級宣揚“倉頡作書”（書指文字）的神話，說漢字是由一個叫倉頡的“聖人”造出來的。他們還把文字看作自己的專利品，把人民群眾所寫的字斥為“俗字”“破體”，誣蔑人民群眾是漢字的破壞者。歷史事實證明，正是人民群眾創造並改進了漢字。反動統治階級的謊言和誣蔑必須徹底加以肅清。

倉頡造字說的荒謬是顯而易見的。世界上獨立形成的文字通常萌芽於原始社會，經過長時期的發展，到階級社會初期才形成完整的文字體系。它們是人民群眾集體智慧的產物，決不是個別人所能創造出來的。漢字也是獨立形成的文字，它的創造者是人民群眾，而不是個別的人。古代有些比較進步的思想家已經多多少少看到了這一點。例如戰國末年的荀子就認為倉頡只是衆多的“好書者”中間的一個（見《荀子·解蔽》）。到了近代，懷疑倉頡造字說的人就更多了。

地下發現的實物資料，也宣告了倉頡造字說的破產。解放後，在西安半坡村發掘的仰韶文化遺址裏，發現過一些刻有記號的陶器殘片，那些記號跟商、周古文字裏的數字和某些簡單文字非常相似。此外在山東出土的龍山文化陶罐上也發現了和青銅器刻銘是一脈相承的象形文字。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都是我國原始社會時期的新石器文化。上述資料證明我國原始社會的勞動人民從西到東都在陸續創造文字，漢字決不是某一個“聖人”所製造出來的。魯迅在《門外文談》裏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點圖，有的在門戶上畫一些畫，心心相印，口口相傳，文字就多起來，史官一採集，更可以敷衍記事了。”這是符合文字產生的實際情況的。

但是，“文字在人民間萌芽，後來却一定為特權者所收攬”（《門外文談》）。進入階級社會以後，文字成為特權者進行統治的重要工具，勞動人民被剝奪了學文化的權利。他們為了掩蓋文字起源於民間的真相，極力宣揚“倉頡作書”的神話。他們先把倉頡說成黃帝的史官，後來又把他說成是遠古的“帝王”，甚至稱之為“倉聖”。他們為了使倉頡與衆不同，還宣揚“倉頡四目”的奇談怪論。這一切無非是為了一個目的，就是想通過文字創造的神秘化，來提高文字的尊嚴性，從而使把持

文字的特權者也顯得更為尊嚴。舊社會裏提倡“敬惜字紙”，向人民灌輸文字神聖的觀念，也是同樣的用意。所以我們必須批判倉頡造字說，恢復人民群眾創造文字的歷史真面目。

人民群眾不但是漢字的創造者，而且是漢字的改革者。以漢字的衛道士面目出現的反動統治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即所謂士大夫，則是阻礙漢字發展的保守派。

對漢字的保守思想可以追溯到儒家的鼻祖——孔子。孔子主張“正名”，認為事物名稱的涵義不應該有變化（實際上是要求事物都保持奴隸制全盛時代的老樣子）。從這樣的立場出發，對文字也必須採取保守態度。《論語·衛靈公》記載，孔子曾說：“吾猶及史之闕（缺）文也，……今亡（無）矣夫。”據漢代經學家解釋，起先人們有不知該怎麼寫的字就空在那裏，“問諸故老”。到孔子的時候，所謂“是非無正，人用其私”，寫字不按“老規矩”。所以孔子有這樣的感慨（見《漢書·藝文志》等）。歷代“正統派”的士大夫大都繼承了孔子對漢字的保守思想。他們認為文字是聖賢傳下來的，是不能輕易變動的。實際上是以此來維護文字的尊嚴性，並且阻礙人民群眾掌握文字和改革文字。

人民群眾對待漢字的態度跟士大夫是截然不同的。對他們來說，文字只不過是書寫工具，他們所關心的是怎樣使漢字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讓它變得更便於使用。所以，只有人民群眾才能成為改革漢字的主力。

在漢字發展史上，篆書演變為隸書是最重大的一次改革，而隸書就是由人民群眾手頭的篆書草體發展而成的一種字體。“隸書”這個名稱就顯示了它是來自下層的。隸書就是徒隸之書的意思。當時的統治階級看不起這種字體，所以把它叫隸書。古書裏說秦始皇命程邈作隸書，把隸書看作個別人創造的字體，這是錯誤的。不過，秦始皇確實曾經命人對新興的隸書進行過統一整理工作，把它作為小篆的輔助字體加以推行。這是對漢字發展有重大意義的措施。

隸書比小篆好寫得多，到了漢代很快就取代小篆而成為主要字體。士大夫也開始使用這種他們本來極端看不起的徒隸之書了。在士大夫手裏，隸書逐漸形成一種有一定的“波勢”“挑法”的規整書體，後人叫做八分書。這種書體美觀倒是相當美觀，可是寫起來卻又很費事了。在東漢中後期，當士大夫相競用工整的八分書勒石刻碑的時候，民間日常應用的隸書在草書的影響下，已經在向一種更簡易的新書體演變。到魏晉時代，這種新書體，即楷書（指我們現在理解的楷書，不是隸書的楷法），就基本形成了。在篆書演變為隸書、楷書的過程裏，人民群眾起了主要的作用。

隸、楷擺脫了古文字象形原則的束縛，把漢字改造成由一些平直的筆劃所組成的符號，大大提高了書寫速度。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但是，“正統派”的士大夫雖然身受隸、楷之賜，却不承認由篆變隸是一個進步。相反地，他們還要給隸書加上種種罪名，什麼“變古”、“鄙俗”、“舛[chuǎn]駁”，等等，指責隸書破壞了聖賢造字的意思。宋、元以後，一些“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難起來”的士大夫，還玩弄“以篆入隸”的把戲，按照篆文的結構來寫楷書，把一些很普通的字寫成一般人認不得的怪字。有的人直接用小篆寫書。清代的江聲就是一個典型。他不但用小篆寫《尚書》，寫畢沅的《釋名疏證》，甚至用小篆開藥方！秦始皇推行隸書本來是一件好事，“正統派”的士大夫却把這也算作他的一條罪狀。例如受宋太宗之命校定《說文解字》的徐鉉，在《上〈說文〉表》裏說：“及暴秦苛政，散隸聿興，便於末俗，人競師法，古文既絕，訛僞日滋。”其實“便於末俗，人競師法”不正是隸書比篆書進步的明證嗎？

方塊漢字發展到楷書以後，字體基本上固定下來。此後，方塊漢字本身的改革主要表現在簡體字的出現上。人民群眾迫切需要簡體字，反動統治階級則力圖保持漢字的舊面貌，反對簡體字，雙方的鬥爭是相當激烈的。

在舊社會裏，創造和使用簡體字的，主要是小手工業者、小商小販、刻字工人、民間藝人和店員、學徒這些人。他們大都是受壓迫的下層人民。在古代遺留下來的民間文書和宋元以來的小說、戲曲等通俗讀物的刻本裏，可以看到不少簡體字。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一直沿用到現代，並為我們的《漢字簡化方案》所吸收。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革命時期簡體字往往特別流行。太平天國就用了許多簡體字。有人統計，先後出現在太平天國公文經籍裏的簡體字有一百多個；同音代替，如以“付”代“副”等，也屢見不鮮。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時期，簡體字在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軍民中非常流行。隨着全國解放，老解放區的簡體字流行到全國各地，被稱為“解放字”。我們現在所用的“擁護”“幹部”等字就是解放字。可見革命人民是十分歡迎簡體字的。

士大夫絕大部分是反對簡體字的。他們所排斥的“俗字”“破體”，主要就是楷書形成後出現的簡體字。除了封建政權以行政力量來排斥“俗字”“破體”以外，士大夫們還寫了很多正字法著作來跟“俗字”“破體”作鬥爭。早期正字法著作的態度一般還比較平實一些。例如唐代前期顏元孫的《干祿字書》認為俗體在“籍帳、文案、券契、藥方”中可以使用，並未完全加以排斥。隨着封建社會越來越腐朽，士大夫在正字法方面的主張也越來越保守。宋以後的正字法著作中，指斥俗字“不知

所从,無以下筆”、“過爲鄙淺”(見宋徐鉉《上〈說文〉表》)、“承襲鄙俚……斷不可從”(見清四庫全書館《辨正通俗文字》)一類的話,就多起來了。明清時代,科舉制度對字體的要求越來越嚴格,更助長了保守的“正體”的氣焰。清代最流行的一本正字法著作,龍啓瑞的《字學舉隅》,就是爲應試的士子而作的。一直到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年代,反對漢字改革的勢力仍然非常強大。1935年,國民黨反動分子戴季陶爲了反對簡體字,就扮演了“爲漢字請命”下跪的醜劇。國民黨反動派對當時共產黨所領導的拉丁化運動,更是用極其殘酷的手段進行強烈的反對。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勞動人民當家作了主人,漢字的歷史也揭開了新的一頁。在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指引下,我們大力進行了文字改革工作。漢字的簡化和整理工作取得一定成績;人民群眾創造的大量簡體字,從受排斥歧視的“俗字”“破體”變成了正體。推廣普通話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的工作都有了進展。我們正在爲實現毛主席指示的“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目標而努力!但是改革和反改革的鬥爭並沒有止息。妄圖在政治上搞資本主義復辟的階級敵人,在文化上也必然要搞復辟。1957年,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曾經對文字改革工作大肆攻擊。他們反對漢字走拼音化道路,胡說《漢語拼音方案》(草案)是少數人關起門來搞的;還誣蔑漢字簡化“搞糟了”,要國務院撤回《漢字簡化方案》。劉少奇一夥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也誣蔑《漢語拼音方案》採用拉丁字母是“奴才思想”,攻擊簡化漢字“將來是要吃大虧的”。這些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反動派,都已經在歷史的巨輪下被碾得粉碎。他們對文字改革工作的瘋狂叫囂,絲毫也沒有影響億萬人民改革漢字的決心。經過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鍛煉的中國人民,在毛主席和黨中央的領導下,堅決貫徹黨的十大精神,在批林整風運動的推動下,一定能夠積極而又穩步地把文字改革工作做得更好。

編按:

此文是在“批林批孔”的極左思潮支配下寫的。本文關於漢字形成問題的看法是錯誤的,作者後來的看法見本書所收的《漢字的起源和演變》及《文字學概要》的相關章節。本文關於正體俗體的意見也是片面的。

原載《光明日報》1973年10月25日4版,今據以收入。

從馬王堆一號漢墓“遣冊”

談關於古隸的一些問題

一、“遣冊”字體的特點

馬王堆一號漢墓所出的由三百十二枚竹簡組成的“遣冊”，對於研究漢字字體發展的歷史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以前發現過不少西漢時代的文字資料，但是西漢前期（指漢初至景帝時期）的隸書却很罕見。六十多年來，在我國西北部相當於漢代河西四郡和西域的地區，發現了大批漢簡。這是研究漢代隸書的極好資料。但是它們的時代再早也早不過武帝經營河西的年代。就目前所看到的西北漢簡來說，有明確紀年的時代最早的一簡，是敦煌附近發現的天漢三年簡。^① 天漢三年已經是武帝在位的第四十三年了。1961年，長沙砂子塘西漢前期墓出過一些寫有隸書的木封泥盒，但字跡不夠清晰，數量也少，對研究字體幫助不大。^② 西漢的石刻很稀少。時代較早的較重要的刻石——趙廿二年群臣上齏刻石和魯北陞刻石，都是小篆。有明確年代的最早的隸書刻石，是地節二年楊量買山記和五鳳二年刻石，都已經到了宣帝時代。^③ 西漢的漆器銘文，如果不算字數很少的零碎資料，也沒有早於武帝

① 《流沙墜簡》（以下簡稱“流”）卷二廩給類6。關於漢簡年代可參閱王明《簡與帛》（《考古通訊》1955年2期56頁）。居延漢簡中的所謂太初三年簡，乃是太初三年以後所書而追述到太初三年的往事，陳夢家《漢簡考述》已經指出（《考古學報》1963年1期85頁）。《新獲之敦煌漢簡》著錄的酒泉玉門都尉一簡，似為敦煌置郡以前物，可能為西北漢簡中年代最早之簡（夏鼐《考古學論文集》76頁），可惜簡文未記年份。

② 《長沙砂子塘西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63年2期。封泥匣照片不清，摹本似亦不很精確。

③ 關於西漢石刻，看徐森玉《西漢石刻文字初探》，《文物》1964年5期。

時代的東西。^④西漢的印文和瓦當文字，基本上是小篆。已發現的西漢前期的陶文，絕大多數是打在陶器上的印文，主要也是小篆。西漢銅鏡銘文中時代較早的，如“見日之光”等銘，也都是小篆。西漢前期的銅器銘文倒是篆隸並用的，而且隸書還比小篆用得普遍。但是，由於西漢前期沒有年號，這些銘文的時代不是很明確，並且資料也比較零碎，所以一般都不大注意。總之，在馬王堆一號漢墓發現以前，我們對於西漢前期的隸書是極其缺乏知識的。

馬王堆一號漢墓的絕對年代尚無定論，但是其時代早於武帝，則是一般所公認的。墓中所出的“遣冊”、竹筭和陶罐上的簽牌以及漆器上書寫的文字，都是隸書；並且字跡也大都很清楚。這就使我們對西漢前期的隸書第一次有了比較清楚的認識。

一般把隸書分成古隸和八分兩個階段。八分指的是結體方整、筆畫有明顯的波勢和挑法的隸書，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漢隸。八分形成以前的隸書就是古隸。馬王堆一號漢墓的隸書顯然屬於古隸。

下邊主要根據“遣冊”，談談馬王堆一號漢墓隸書字體上的特點。



圖一 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竹筭簽牌

(一) 這批隸書的結體顯得很不方整。從筆法上看，“遣冊”的文字沒有八分的那種波勢和挑法(圖版 I、II)。竹筭簽牌上的文字，有的已經初步有了波勢和挑法(見圖一·1、2)，但基本上仍與“遣冊”的作風相同。

(二) 字形有相當一部分跟篆文還很接近。例如犬(圖版 I·1)、元(圖版 I·2)、衣(圖版 I·3)、方(圖版 I·4)，以及見於偏旁的尢(圖版 I·4 沈字偏旁)、爪(圖版 I·5“菜”字偏旁)等字，跟篆文幾乎沒有多大區別。又如文(圖版 I·6)、高(圖版 I·5)、享(圖版 I·9“郭”字偏旁)、六(圖版 I·7)、木(圖版

④ 1968 年在中山靖王墓中發現漆盤及耳杯，上有銘文，記卅七年(《滿城漢墓發掘紀要》，《考古》1972 年 1 期 14 頁)。中山靖王卅七年相當於武帝元狩五年。梅原末治《支那漢代紀年銘漆器圖說》著錄的最早一器為昭帝始元二年耳杯。

I·6、12)、牛(圖版I·8、9)、生(圖版I·12)、熏(圖版I·13)等字上端的寫法,也都還保持篆文的特點。

(三)一方面存在着很多接近篆文的寫法,另一方面又已經出現了不少草書式的寫法。

在“遣冊”裏,偏旁“止”絕大多數寫作,例如定(圖版I·10)、足(圖版I·9)、筵(圖版I·14)等字。“辵”字所从的“止”進一步簡化為,例如逢字(圖版I·16)。草書的“止”旁有、等寫法,^⑤與此相似。

偏旁“皿”中間偏右的豎劃往往與底劃連成一筆,例如蓋、盛、溫(以上皆見圖版I·11)等字。草書“皿”旁多作,顯然是由此進一步簡化而成的。

偏旁“工”的中豎或者與下面的橫劃連為一筆,例如左(圖版I·9)、脛(圖版I·7)、脛(圖版I·15)等字;或者與上下橫劃併連為一筆,例如空(圖版I·17)。草書“左”字作或,“工”旁寫法與此相似。

“綺”字所从的“可”有時寫作 (圖版I·3)。草書“可”字作或,與此相似。

“扶”字所从的“夫”寫作 (圖版I·18),如果再寫得草一點,就成為草書的了。

(四)文字形體很不統一,同一個字或偏旁往往有不同的寫法。例如“大”字就有兩種寫法(圖版I·13; II·19)。“童”、“種”所从的“童”多作 (圖版II·20),但偶爾也作 (圖版II·21)。“木”字及“木”旁多作、,但有時也作 (圖版II·19“枚”字偏旁)、 (圖版I·5“菜”字偏旁)。“口”旁主要有兩種寫法(圖版II·22“合”字偏旁; II·23“器”字偏旁);如遇“口”上偏旁中間有豎劃,還經常把“口”旁的左豎劃跟它合併為一筆,例如周(圖版II·24)、苦(圖版II·25)等字。“皿”旁往往用草體,但用正體的也相當多(圖版II·26“蓋”、“盛”二字偏旁)。“疏”字所从的“疋”(古代疋足二形多不別),有的作,有

⑤ 本文所引草書,凡不注明出處者,皆據葉夢得本章草急就章(即松江石刻本),《吉石庵叢書》三集有影印本。

⑥ 《流》卷二烽燧類2背。背係草書。

⑦ 此“左”字據宋克書急就章(文物出版社影印本),松江本“左”字下劃與上不連。

⑧ 《流》卷三·21。係草書簡。

⑨ 此字為松江本“何”字偏旁,宋克本“可”字寫法同(“可”字在松江本闕文中)。

的作 (圖版Ⅱ·28)；“𦰩”字所从的“足”，“遣冊”作 (圖版Ⅱ·29)，竹筭簽牌作 (圖一·3)；“止”旁或作草體，或作正體。“遣冊”竹頭作 (圖版Ⅰ·6、8等)，竹筭簽牌竹頭則有 (圖一·2、5)、 (圖一·3、4)兩種寫法。“遣冊”艸頭作 (圖版Ⅰ·5、17；Ⅱ·39等)，竹筭簽牌艸頭則作 (圖一·5)。在較晚的隸書裏，竹頭艸頭往往相混。從簽牌竹頭可以寫作 來看，艸頭在當時很可能也已經有這種寫法了。

文字形體不統一的現象，在隸書裏始終存在。但是，像馬王堆一號漢墓的隸書那樣，在同時書寫的一批文字裏，就存在這樣多不統一的寫法的現象，在後來的隸書裏是很難看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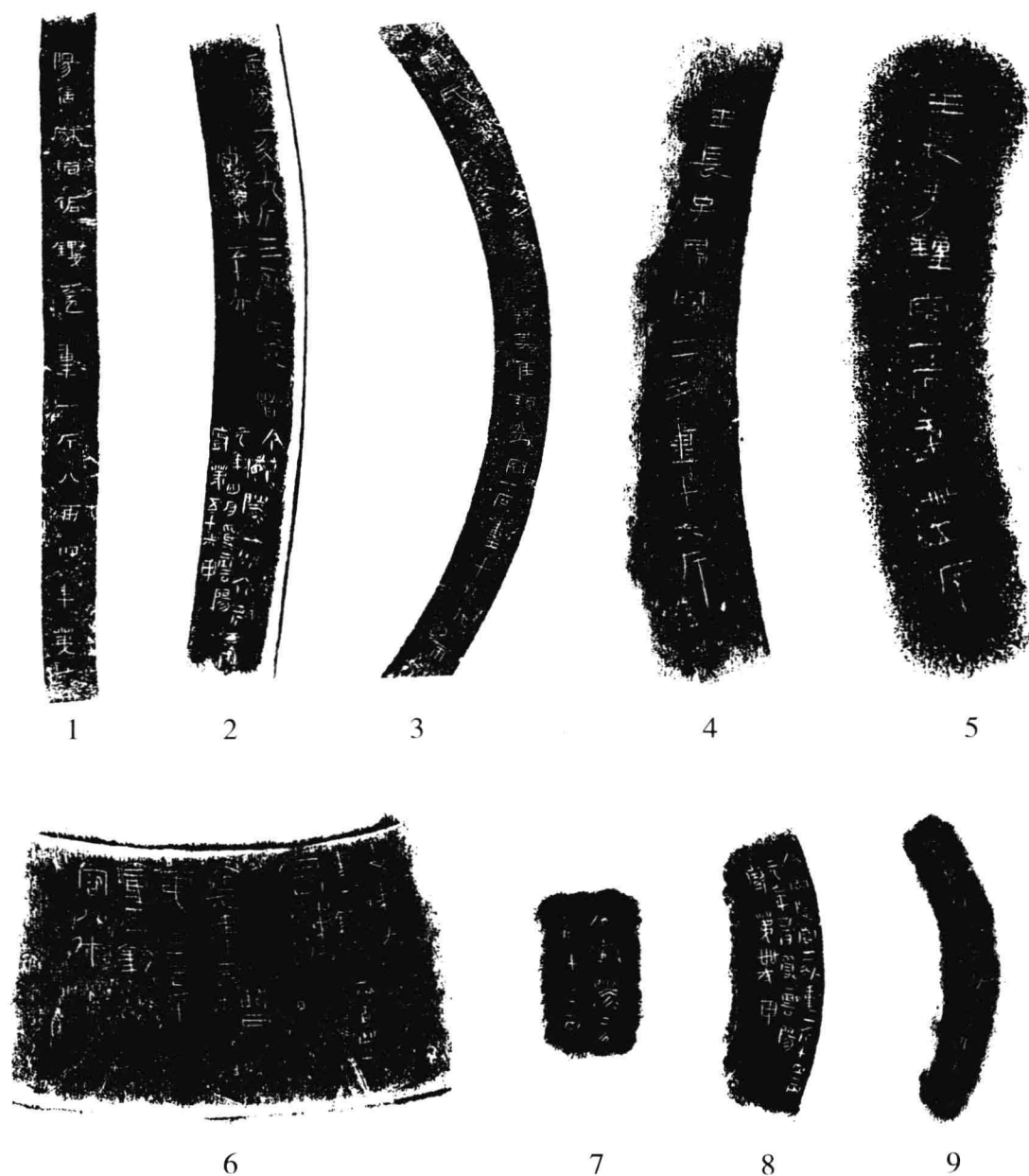
以上所說的四點，都反映出這種隸書的不成熟和不穩定。它顯然正處在相當劇烈的變化過程中。馬衡在考釋居延簡中的元帝永光二年文書時，評論簡文字體說：“蓋西漢文字變化，故一篇之中兼有篆、隸、草也。”^⑩其實永元二年文書已經是相當成熟的隸書，不過馬氏的話用來評論馬王堆“遣冊”的隸書，那倒是很確切的。

馬王堆“遣冊”所代表的古隸，在當時應該是很通行的一種字體。

在已著錄的漢代銅器銘文裏，就可以看到不少跟“遣冊”很相似的隸書。例如陽信家鉅鏤(圖二·1)、魏其侯盆(圖二·3)、王長子鼎(圖二·4)、王長子鍾(圖二·5)、昆陽乘輿鼎(見《考古》1963年2期67頁圖)等銘，以及雲陽鼎(圖二·2)和安陵鼎蓋(圖二·7—9)上以“今安陵”開頭的那幾段銘文，字體的作風就顯然跟“遣冊”很相似。

在文字的具體寫法上，它們之間也有不少相似之處。雲陽鼎和安陵鼎蓋的“第”字艸頭與“遣冊”艸頭相同，“元”字的寫法也與“遣冊”接近。陽信家鉅鏤的“蓋”字“皿”旁，與“遣冊”“皿”旁草體相似。鉅鏤“信”字和“遣冊”“信”字的“言”旁(圖版Ⅱ·30)，都保存着“言”字所从的“辛”旁的中劃。王長子鍾“鐘”字所从的“童”，與“遣冊”“種”、“種”二字所从的“童”相似。昆陽乘輿鼎“佐”字所从的“左”，“工”旁寫法與“遣冊”相似。昆陽乘輿鼎和王長子鼎的“六”字，都與“遣冊”相似。陽信家鉅鏤、魏其侯銅盆、昆陽乘輿鼎、王長子鼎、王長子鍾以及安陵鼎蓋的“重”字，全都保留篆文“重”字从“東”的遺意，也是與“遣冊”“童”旁的寫法一致的(篆文“童”也从“東”)。

^⑩ 《居延漢簡考釋兩種》，《考古通訊》1957年1期108頁。該文書見《居甲》2553。



圖二 銅器銘文拓本(取自容庚《漢金文錄》)

1. 陽信家鉅鏤(《漢》4·8 上)
2. 雲陽鼎(《漢》1·7 上)
3. 魏其侯盆(《漢》4·5 上)
4. 王長子鼎(《漢》1·18 上)
5. 王長子鍾(《漢》2·16 上)
6. 右槽鍾(《漢》2·5 下)
- 7-9. 安陵鼎蓋(《漢》1·7 下)

除以上諸器外,如右槽鍾(圖二·6)、女陰侯鼎、^⑪美陽鼎、^⑫廣陽鼎蓋、^⑬犛車宮鼎、^⑭陽周倉鼎^⑮等器的銘文,也都與“遣冊”比較接近。

從字體上看,上述這些銅器都應該是西漢前期的東西。這些銅器有不少是紀年的,但都沒有年號。如雲陽鼎和安陵鼎蓋記元年,昆陽乘輿鼎記三年,陽信家鉅鏤記四年,女陰侯鼎記六年,右槽鍾有二銘,一記十五年,一記今元年。這正符合西漢前期沒有年號的特點。^⑯

有的銅器還能考出比較確切的年代。例如陽信侯劉揭封於文帝元年,傳子中意,於景帝六年有罪免。^⑰可知陽信家鉅鏤的時代不會早於文帝四年,也不會晚於景帝四年。西漢一代,一次紀元超過十二年的只有文帝。可知右槽鍾的十五年必為文帝十五年,鍾上另一銘的今元年可能是文帝後元年。馬王堆一號漢墓的時代大概也不出文景兩代。

1972年,在山東臨沂銀雀山的一座漢墓裏發現了大批竹簡,內容為《孫子兵法》等古書。據發掘者估計,墓葬年代最晚不會晚於武帝初年。這批重要的漢簡目前正在整理中。根據初步觀察所得的印象,大部分簡文的字體也與馬王堆一號漢

⑪ 《漢金文錄》(在《秦漢金文錄》中,以下簡稱“漢”)1·9下。

⑫ 同⑪,1·22上。

⑬ 同⑪,1·19下。

⑭ 同⑪,1·21下。

⑮ 同⑪,1·28下。

⑯ 陳直《古器物文字叢考》認為昆陽乘輿鼎是武帝末期物。他說:“三年之上不記年號,應屬於武帝末期之紀年。桂宮行鐙題二年少府造,與此體例正同。《三輔黃圖》記桂宮武帝太初四年秋造,從前對漢器不記年號者,皆指為武帝未有紀年(引者按:宜作“年號”)以前之物,據此可以知其不然。”(《考古》1963年2期81頁)今按,昆陽乘輿鼎從字體上看為西漢有年號以前之物無疑,最晚不能晚於武帝初期。(武帝前期在當時亦無年號,建元至元鼎年號皆後來追加。觀《史記·封禪書》自明,前人多已言之。《漢金文錄》、《小校經閣金文拓本》等書所著錄漢器中記元朔、元狩、元鼎年號諸器,皆為偽作,字體卑弱,與武帝時真器迥然有別。又所謂建元弩機,建元乃建光之誤釋。《漢》2·5上之中私府鍾記“四元七年正月甲寅”疑四元即相當於元狩,器為元鼎元年未改元[指無年號之改元]時作,元鼎元年正月癸卯朔,甲寅為十二日。《封禪書》以元狩為三元,未數元朔,似誤。)陳文所舉桂宮行鐙之二年,應為武帝後元二年。武帝後期已立年號,但最後二年無年號,後元之稱為後來所加。居延簡中,後元二年亦止稱二年(看陳夢家《漢簡年曆表敘》,《考古學報》1965年2期108頁)。此係武帝最後兩年之特殊情況,並不能說明武帝後期銘文有不用年號之習慣。

⑰ 據《史記·惠景間侯者年表》、《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漢表又有陽信侯呂青,陽信當從《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作新陽。哀帝時鄭業亦封陽信侯(《外戚恩澤表》作陽新),與陽信家鉅鏤之時代顯然不合。

墓“遣冊”極為相似。同年還在雲夢縣城關鎮大墳頭的一座漢初木椁墓裏，發現了記載殉葬品的木牘，字體也與馬王堆“遣冊”相似。^⑮ 希望以後有更多的有關資料出土，使我們對西漢前期的古隸能有進一步的認識。

下面想根據“遣冊”提供的綫索，談談隸書的形成和古隸與草書的關係。

二、從古隸和秦篆的關係看隸書的形成

我們在第一節裏指出，馬王堆“遣冊”的古隸有相當一部分跟篆文很接近。那是指篆文的正規寫法說的。現在我們要討論古隸跟篆文裏的簡率寫法的關係。

在統一前的秦國銅器（主要是兵器）、陶器和漆器銘文，統一後的秦代銅器（主要也是兵器）銘文、權量詔文，以及所謂“周秦印”的印文裏，可以看到不少不同於正規篆文的簡率寫法。其中很多是跟隸書，尤其是跟馬王堆“遣冊”一類的古隸相近的。下面我們準備把上述秦篆資料跟馬王堆“遣冊”等隸書進行對比。由於過去講字體的著作對於秦國的陶文、漆器銘文和“周秦印”不大注意，對於秦權量詔文字體的性質又有不同的意見；因此我們在引用這些資料以前，需要作些說明。

1. 秦國陶文

在西安一帶出土的古陶上，常見“咸□（地名）里□（人名）”或“咸□□（地名）□（人名）”一類印文。解放後在西安半坡一個戰國晚期墓裏發現過一個有“咸□里□”印文的陶罐。^⑯ 1960年前後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在咸陽故城遺址進行調查和試掘時，發現了不少這一類的陶文，調查者也認為是戰國遺物。^⑰ 所以這類陶文大體上可以看作戰國晚期的秦國文字。

2. “周秦印”

在古印裏可以看到具有下列特點的一種印文：字體基本上屬小篆一類，但顯然比一般漢印上的小篆為古。格式絕大多數是邊上有框的陰文印，印文之間也大都帶有陰文闌格。以往的金石家多把這種古印稱為周秦印。例如陳介祺的《十鐘山房印舉》，就在古印和漢印之間專設“周秦”一類來容納這類印文。（《新探》編按：在古印中分出“周秦印”，是陳氏的創見。）大概這種古印中字體較古的，是戰國時代

^⑮ 《湖北雲夢西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3年9期34、35頁。

^⑯ 《西安半坡的戰國墓葬》，《考古學報》1957年3期80、81、86、87頁。

^⑰ 《秦都咸陽故城遺址的調查和試掘》，《考古》1962年6期283、284、286、289頁。

的秦印；字體較晚的既有秦印，也有秦漢之際和漢初的東西。解放後，在西安半坡的一個戰國墓裏，發現過一枚這一類型的“志從”印。^② 在四川巴縣冬筭壩的狹長形土坑墓（船棺葬）裏，發現過這一類型的“中仁”、“萬歲”、“富貴”等印。墓葬時代大部分似亦不晚於秦代。^③ 看來，周秦印的主要成分應該是戰國時代的秦印和統一後的秦代印。我們下面引用這類印文時，儘量選擇字體較古的例子。

3. 廿九年漆樽銘^④

漆樽解放前長沙出土，銘文全文是：“廿九年太后□□吏丞向，右工市（師）爲，工大人臺。”（《新探》編按：李學勤同志就原器觀察，指出“太后”與“丞”之間爲“詹事”二字，見《文博》1986年5期21頁。）以前很多人根據出土地點和器物形制，把這件東西看作楚器。其實從銘文字體看，顯然不是楚國文字，而是秦國文字。從銘文格式和所反映的官制看，也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公認爲秦器的相邦義戈銘文說：“十三年，相邦義之造，咸陽工市田，工大人耆，工積。”^⑤ 把它跟漆樽銘對照一下，就可以明白後者也是秦國的東西。漆樽銘文的“太后”應該是昭襄王的母親宣太后，廿九年是昭襄王二十九年。宣太后是楚人，入秦以後，跟楚國總還有一定的聯繫。在楚地發現她的漆器是毫不足怪的。《史記·秦本紀》記：“（昭襄王）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鄧。……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爲南郡。”至是，楚國原來的中心地區已爲秦所佔有。說不定廿九年漆樽就是在秦所佔領的楚地製作的。

4. 秦權量詔文

《顏氏家訓·書證》說：“開皇二年五月，長安民掘得秦時鐵稱權，旁有銅塗（當是銅詔版），鐫銘二所。……其書兼爲古隸。”後來，就有很多講字體的人，認爲秦權量上刻得比較草率的詔文就是秦代的古隸。有的甚至認爲所有秦權量上的詔文都是古隸。我們不同意這些意見。

秦王朝對統一度量衡極爲重視，權量上的詔文是打算傳之萬世的。二世皇帝怕後代子孫不知道二十六年詔出自始皇，還特地在旁邊加刻一道詔書加以說明。

① 同①9, 85頁。

② 《四川巴縣冬筭壩戰國和漢墓清理簡報》，《考古通訊》1958年1期13、14、18頁。該文定此類墓葬爲戰國末期。印文圖版又見《考古通訊》1955年6期49頁。

③ 蔣玄伯《長沙》第一卷圖版玖。（《新探》編按：據李學勤同志說，此器形制介於樽、卮之間，有三足似樽，器較小並有把似卮，今姑名爲樽。舊名爲盃，非是。）

④ 《錄遺》584【《集成》17·11394】。

這樣的正式法令當時必然要求用小篆來寫，決不會允許用剛出現的“施之於徒隸”的隸書來寫。在刻得比較草率的詔文裏，的確有一些很接近隸書的字。但是早在隸書尚未形成的戰國時代，秦篆裏就已經出現了接近隸書的寫法（詳下）。所以我們不能因此就把刻得草率的詔文看作隸書。事實上，詔文大部分字還是篆文的結構。最明顯的例子是“灋（法）”字。在戰國時代的秦篆裏，把“水”旁簡化成三點的隸書式寫法已經出現（詳下）。但是在已發現的秦權量詔文裏，“灋”字的“水”旁却都用篆文的寫法，沒有一個寫成三點的。雲夢大墳頭漢初墓出土的古隸木牘，把“滂”（《新探》編按：應作滂）字寫作𣶒。這說明早期古隸的“水”字旁有時仍然沿用小篆的寫法。但是這仍不足以證明草率的權量詔文就是秦隸（這是就這種詔文的整體來說的。至於其中的有些字，我們也承認它們已經跟隸書沒有什麼區別）。因為在權量詔文裏，“灋”字的水旁作“𣶒”而不作“氵”，是普遍的現象。總之，刻得草率的權量詔文基本上還應該看作草率的小篆，而不能就看作隸書。

下面，我們把上述資料裏所見的與隸書接近的寫法摘舉出來，與馬王堆“遣冊”等進行對比。

篆文正規寫法	秦篆中接近隸書的寫法	馬王堆遣冊	其它漢代隸書
𣶒（偏旁水）	𣶒（漆）三年上郡戈，《錄遺》583⑤【《集成》17·11369】 𣶒（洛）始皇廿五年上郡戈（反面），《朝鮮古文化綜覽》卷一圖版12【《集成》17·11406】 𣶒（漆）始皇廿七年上郡戈，故宮拓本【《集成》17·11374】 𣶒（蒲）“咸蒲里奇”陶尊，《關中》第一集⑥ 𣶒（治）“日敬毋治（怠）”印，《舉》3·2上⑦	 (圖版Ⅱ·21)	
𡗗（大）	𡗗 商鞅鏃，《雙劍謠吉金圖錄》下·50【《集成》18·11911】 𡗗 廿九年漆樽 𡗗 廿六年詔廿斤權，《秦》13上⑧	 (圖版Ⅰ·13)	

⑤ 李學勤《戰國時代的秦國銅器》謂此戈之三年當為莊襄王或始皇之三年。見《文物參考資料》1957年8期。以下所引秦兵器紀年皆據此文定。

⑥ 《關中秦漢陶錄》，考古研究所藏陳直稿本，以下簡稱“關中”。又《關中秦漢陶錄補編》，以下簡稱“關中補”。

⑦ 《十鐘山房印舉》，以下簡稱“舉”。

⑧ 《秦金文錄》，以下簡稱“秦”。

續 表

篆文正 規寫法	秦篆中接近隸書的寫法	馬王堆遺冊	其它漢代隸書
言 (言)	𠂔 始皇四年呂不韋戈“讐”字偏旁,《湖南省文物圖錄》60【《集成》17·11308】 𠂔 “謝粉”印“謝”字偏旁,《尊存》三3·47 ^{②⑨}	𠂔 (“信”字偏旁, 圖版Ⅱ·30)	
者 (者)	𠂔 昭襄王卅年上郡戈“道”字偏旁,故宮拓本 ^{③⑩} 【《集成》17·11370】 𠂔 始皇廿七年上郡戈“道”字偏旁 𠂔 廿六年詔權之九,《秦》5 上 𠂔 元年詔版之十二,《秦》39 上	𠂔 (“緒”字偏旁, 圖版Ⅱ·31)	𠂔 《居甲》89
女 (女)	𠂔 口三年高奴權“奴”字偏旁,《文物》1964 年 9 期 ^{③⑪} 【《集成》16·10384】 𠂔 元年詔版之二“始”字偏旁,《秦》36 下	𠂔 (圖版Ⅱ·32)	
昔 (昔)	𠂔 始皇廿七年上郡戈“趙”字偏旁 𠂔 “帶錯”印“錯”字偏旁,《舉》3·47 上	𠂔 (圖版Ⅱ·33) 𠂔 (圖版Ⅱ·34)	𠂔 《居甲》798 “籍”字偏旁 𠂔 《流》2 雜事 43 “籍”字偏旁
龍 (龍)	𠂔 元年詔版之十二“襲”字偏旁 ^{③⑫} 𠂔 “龍飲”印,《尊存》三3·48	𠂔 (“襲”字偏旁, 圖版Ⅱ·35)	𠂔 《居甲》162 “襲”字偏旁
首 (首)	𠂔 廿六年詔權之九 𠂔 廿六年詔廿四斤權,《秦》12 下	𠂔 (圖版Ⅰ·10)	𠂔 校官碑
皆 (皆)	𠂔 廿六年詔權之九	𠂔 (圖版Ⅱ·36)	

②⑨ 《尊古齋印存》,以下簡稱“尊存”。

③⑩ 雲陽鼎“餐者”一銘的“者”字與此戈“者”旁略同(見本文圖二·2)。該鼎銘文係前後三次分刻,此二字時代最早,或尚在秦代。

③⑪ 此權上有“口三年”鑄銘,又有二十六年及元年二詔刻銘。所引“奴”字見於鑄銘,時代在秦統一前。此字“女”旁接近隸書,郭沫若同志在《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一文中已指出,見《考古》1972 年 3 期 12 頁。

③⑫ 此字《秦》不清,參看《秦金石刻辭》上·17 上。

續 表

篆文正 規寫法	秦篆中接近隸書的寫法	馬王堆遣冊	其它漢代隸書
𠂔 (母)	𠂔 元年詔版之三,《秦》37 上	𠂔 (“姆”字偏旁, 圖版 I · 2)	𠂔 《居甲》2155
𠂔 (乘)	𠂔 “公乘”印,《舉》3 · 50 上 𠂔 “王乘”印,《舉》3 · 43 下	𠂔 (圖版 II · 37)	
𠂔 (癸)	𠂔 “王癸”印,《舉》3 · 54 上 𠂔 “秦癸”印“癸”字偏旁,《舉》3 · 52 上	𠂔 (“葵”字偏旁 圖版 II · 38)	
𠂔 (年)	𠂔 公主家鬲,《漢》4 · 6 下 ^③		𠂔 昆陽乘輿鼎
𠂔 (樂)	𠂔 公主家鬲“樂”字偏旁		𠂔 昆陽乘輿鼎
𠂔 (羊)	𠂔 十三年相邦義戈“義”字偏旁,《錄遺》584 ^④ 【《集成》17 · 11394】 𠂔 “謝粉”印“粉”字偏旁		𠂔 《居甲》1876
𠂔 (原)	𠂔 “咸少原嬰”殘陶器,《關中補》		𠂔 《居甲》91 𠂔 華山廟碑
𠂔 (明)	𠂔 廿六年詔權之九		𠂔 《居甲》715
𠂔 (於)	𠂔 兩詔權之四,《秦》21 下		𠂔 《居甲》336 𠂔 北海相景君銘
𠂔 (立)	𠂔 廿六年詔橢量之三,《秦》25 下 𠂔 廿六年詔權之九		𠂔 《流》1 醫方 2 𠂔 北海相景君銘
𠂔 (爭)	𠂔 “趙綏”印“綏”字偏旁,《舉》3 · 46 上【編 按:施謝捷指出,所謂“綏”字實當釋“緩”, 其右旁本作 𠂔,原摹有誤】		𠂔 《居甲》115 𠂔 韓敕造孔廟禮器碑

③ 公主家鬲一般認為漢器。但器上的十六年一銘,格式與一般漢器銘文不同,字體也很古,不能晚於秦始皇十六年,應為秦統一前物。本表“年”、“樂”二字皆引自十六年一銘。

④ ⑤所引李文定為惠文王時器。

在對照表裏,“年”、“樂”二字下所引的隸書是與“遣冊”時代接近的古隸。“羊”以下六字只找到了較晚的隸書作對比。不過,這些字形也應該是先由古隸從秦篆繼承下來,然後較晚的隸書又繼承了古隸的。“遣冊”“羊”字不作而作 (圖版Ⅱ·34),這是古隸有異體的反映。“原”以下諸字“遣冊”未見。但“遣冊”有“錄”字(圖版Ⅱ·36),右旁與秦陶文“原”字所从之“泉”相似。

我們認為,秦篆中的簡率寫法跟漢代古隸的密切關係說明了一個重要問題:隸書是在戰國時代秦國文字的簡率寫法的基礎上形成的。

就各種日常使用的字體來說,一種新字體總是孕育於舊字體內部的。並且孕育期不會很短。如果新字體包含過多的新成分,那它是不大可能得到社會上一般人的承認的。隸書和小篆都形成於秦始皇時代,隸書應該是從戰國時代的秦國文字中逐漸發展出來的。如果認為先有小篆,然後才從小篆發展出隸書,隸書的孕育期就未免太短了。

在戰國時代,文字異形的現象非常嚴重。六國文字與秦國文字的面貌有顯著差別,秦篆本身也不統一。早在秦孝公時代的銅器上,我們就看到既有像商鞅量銘文那樣的很規整的文字,^③同時又有像商鞅鏃銘文那樣的很草率的文字。往後,文字的使用越來越頻繁,文字的演變也隨着越來越劇烈。在秦篆不斷簡化的過程中出現了大量異體,並且有很多是破壞篆文結構的簡率寫法;用方折的筆法“解散”篆文圓轉筆道的風氣,也逐漸流行了開來。正是由於存在着這些情況,秦朝統一全國後,不但需要廢除六國文字“不與秦文合”的異體,並且還需要對秦國本身的文字進行一次整理。這次整理所規定的字體就是小篆。此外,適應文字實際使用的需要,在那些破壞篆文結構的簡率寫法的基礎上,還形成了一種比較簡便的輔助字體。這就是隸書。

小篆跟戰國時代的正規秦篆沒有什麼本質區別。《說文解字·敘》說小篆是李斯等人“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而成的。所謂“或頗省改”,大概主要是對秦篆已有的異體進行整理,把那些比較簡單而又不破壞篆文特點的寫法規定為正體。整理者也可能根據類推的原則,對某些文字進行簡化,但是這種情況大概不會多。小篆對那些破壞篆文特點的簡率寫法是排斥的。相傳為李斯所書的嶧山、琅邪臺、泰山等秦刻石,全都是標準的篆文;在戰國時代秦篆裏已經出現的那些簡率寫法,幾乎一點看不到痕跡。但是難寫的篆文實在不合時代的需要,李斯等人的規範化

^③ 《秦》30下。

並沒有起多大作用，大量草率的權量詔文就說明了這一點。

隸書與小篆相反，全面地繼承了戰國時代秦篆裏破壞篆文特點的那些新因素。

我們在前面舉出的秦篆中接近隸書的那些簡率寫法，有很多在戰國時代的資料裏就已經出現，它們顯然是隸書形成的基礎。有的僅見於秦統一後的資料裏。秦代時間很短，這些寫法大多數也應該是從戰國時代的秦篆裏繼承下來的。今天我們看到的秦篆資料數量很少，而且只限於銅、漆、陶器及印章，寫在簡帛上的文字還沒有被發現。因此，前面舉出的秦篆中接近古隸的簡率寫法，跟當時實際存在的相比，無疑只是極小的一部分。

用方折的筆法“解散”篆文的圓轉筆道，對隸書的形成也有巨大意義。有一些字僅僅由於這一點，就有了濃厚的隸書意味。例如昭襄王廿一年相邦冉戈的𠂔(廿)字、𠂔(币)字，^{③⑥}就是這樣。這種方折的筆法在廿九年漆樽銘以及很多權量詔文中，都表現得很明顯。

所謂程邈“作”隸書，其實情況大概就是把秦國文字中接近隸書的那些新因素集中起來，加以系統化，使之初步形成一種獨立的字體。在整理過程中很可能會根據類推的原則對某些文字作些改造，不過數量大概也不會很多。

從秦篆跟漢代古隸的密切關係來看，^{③⑦}秦代古隸的面貌大概跟漢代古隸相當接近。當然，在秦隸裏接近篆文的成分無疑會更多些。

戰國時代六國文字的簡率化傾向，比起秦國文字來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郭沫若同志已經指出，楚國帛書等文字“體式簡略，形態扁平，接近於後世的隸書”。^{③⑧}六國文字有些簡體的寫法也跟隸書很接近。例如六國文字的“大”字往往寫作𠂔，^{③⑨}在偏旁裏也寫作𠂔，^{④①}而馬王堆“遣冊”裏的“大”字也有類似的兩種寫法。可見由古文字向隸書發展，是當時各國文字發展的普遍傾向。

秦始皇統一全國以後，除了以小篆為標準字體來統一六國文字以外，還命程邈“作隸書”，對來自秦國民間的簡易書體進行了統一整理工作，正式承認它是小篆

③⑥ 《三代》20·23下【《集成》17·11342】。

③⑦ 除去前面對照表所舉之例以外，秦篆裏某些很特殊的寫法，在“遣冊”裏也可以找到相似的例子。例如元年詔版“稱”字所从的“爪”有時寫作𠂔 𠂔（元年詔版之三、之八，《秦》37上、38上），“遣冊”的“爪”旁有時也寫作𠂔（圖版Ⅱ·41“稻”字偏旁）𠂔（圖版Ⅱ·42“菜”字偏旁）。這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二者關係密切的反映。

③⑧ 同③①所引郭文8頁。

③⑨ 《金文編》550頁【見1985年版695頁】。楚簡“大”字亦多如此。

④① 齊陶文常見之𠂔字，亦作𠂔，見《古陶》5·3。

的輔助字體。由於隸書比小篆好寫得多,到了漢代很快就代替小篆而成為主要的字體。也可以說,秦始皇實際上是以隸書統一了全國文字。此後,漢字的字體雖然還有自隸書到楷書的演變,文字的結構基本上就沒有大變化了。所以秦始皇統一文字的工作在我國文字發展的歷史上是有重大意義的。

三、古隸和草書的關係

馬王堆“遣冊”的古隸裏,已經出現了不少跟草書很接近的寫法。這是很值得注意的。古隸和草書究竟是什麼關係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對草書形成的時代有一個比較明確的認識。

《說文解字·敘》說“漢興有草書”,沒有具體指出草書形成的時代。漢末的蔡邕和趙壹都認為草書作於秦代。^{④①}如果這種說法可信,“遣冊”裏的草書成分就可能是受草書影響而產生的。但是從漢簡所反映的情況來看,草書似乎不可能形成得這樣早。

從居延等地所出的有明確時代的漢簡來看,武帝昭帝時代的漢簡上只有草率的隸書和個別接近草書的字。宣帝簡中,如 271·17 的神爵二年簡、^{④②}283·7 的甘露三年簡,元帝簡中,如 562·3A 的永光元年簡,都已有濃厚的草書意味。(《新探》編按:以上三簡依次見於《甲乙編》乙編圖版貳零肆、貳壹零、貳捌貳。)成帝簡中,如《居甲》1526A 的陽朔元年簡(圖三)和 170·5A 的元延二年簡(《新探》編按:見乙編圖版壹貳叁),則已是相當純粹的草書。由此看來,草書正式形成為一種字體,大概在西漢中期偏後。張懷瓘《書斷》上“章草”條引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羸書之,漢俗簡墮,漸以行之。”^{④③}把章草跟史游作《急就章》聯繫在一起是沒有道理的,但是史游的時代倒很可能跟草書形成的時期相去不遠。

既然草書形成於古隸之後,古隸裏的草書成分就應該是自然發生的。作為一種字體的草書則是以這種草書成分為基礎而逐漸形成的。

在第一節裏,已經指出了“遣冊”的草書式寫法跟後來的草書的關係。就是從

④① 蔡邕說,張懷瓘《書斷》上“草書”條自梁武帝草書狀轉引(《法書要錄》卷七)。趙壹說見其所著《非草書》(《法書要錄》卷一)。

④② 簡前之號為發掘號。

④③ 見《法書要錄》卷七。

“遣冊”的某些正規寫法，也可以看出古隸和草書的密切關係。孫星衍在《急就章考異》裏曾提出“草從篆生”的說法，他舉的一個較重要的實例是“鹿頭从卅”。^④章草“鹿”字作𦍋，上端的卅確比一般隸書的“鹿頭”更像鹿角。但是這種寫法在一般小篆裏又何嘗找得到？“遣冊”鹿字作𦍋（圖版Ⅱ·39），這才是章草“鹿”字所從出的字形。“遣冊”“鳥”字作𦍋（圖版Ⅱ·40），章草的“𦍋”也很像是從它演化出來的。看來，“草從篆生”的說法應該改為“草從古隸生”。

古隸在使用過程中產生了孕育着草書的新因素，這跟秦篆在使用過程中產生了孕育着隸書的新因素是同類的現象。戰國時代的秦篆發展出小篆和隸書兩種字體，古隸也發展出八分和草書兩種字體。不過，小篆雖是戰國時代秦篆的正統繼承者，它的地位却很快被旁支的隸書所取代了。作為古隸正統繼承者的八分則沒有喪失它的地位。草書由於太“草”，雖然曾經風行一時（主要在東漢時代），並且對八分的演變為楷書也起了很大影響，但是始終不能成為主要的字體。

最後，還應該指出，雖然古隸草書成分的主要繼承者是章草，但是後來的隸書也受到這些成分的一定影響。

我們在第一節裏舉出的見於“遣冊”的一些草書式寫法，在後來的隸書裏大都有後繼者。在西北漢簡裏，偏旁“止”往往用草體，例如“武”作𠂔^⑤𠂔^⑥，“足”作𠂔^⑦等等。至於“辵”字所从的“止”，在後來的隸書裏已經把𠂔當作正規的寫法了。漢簡的“皿”旁有時寫作𠂔^⑧，“左”字所从的“工”有時寫作𠂔^⑨，有時甚至就用一點來代替。^⑩這些寫法比“遣冊”的草體更加簡單。衡方碑和北海相景君銘碑陰“鴻”字所从的“工”寫作𠂔，也是用的草書筆法。不過，從全面看，這類現象在後來的隸書裏不能算很普遍，尤其是在比較正規的八分書裏更為少見。並且，它們在吸收這類草書式寫法的



圖三 居延出土陽朔元年簡

④ 孫書見《岱南閣叢書》，《叢書集成初編》已收入。

⑤ 《居甲》72。

⑥ 《流》卷二烽燧類1。

⑦ “踵”字偏旁，《流》卷二烽燧類6。

⑧ “盡”字偏旁，《居甲》1458、2048等。

⑨ 《居甲》2218、2280等。

⑩ “佐”字偏旁，《流》卷二簿書類13、《居甲》100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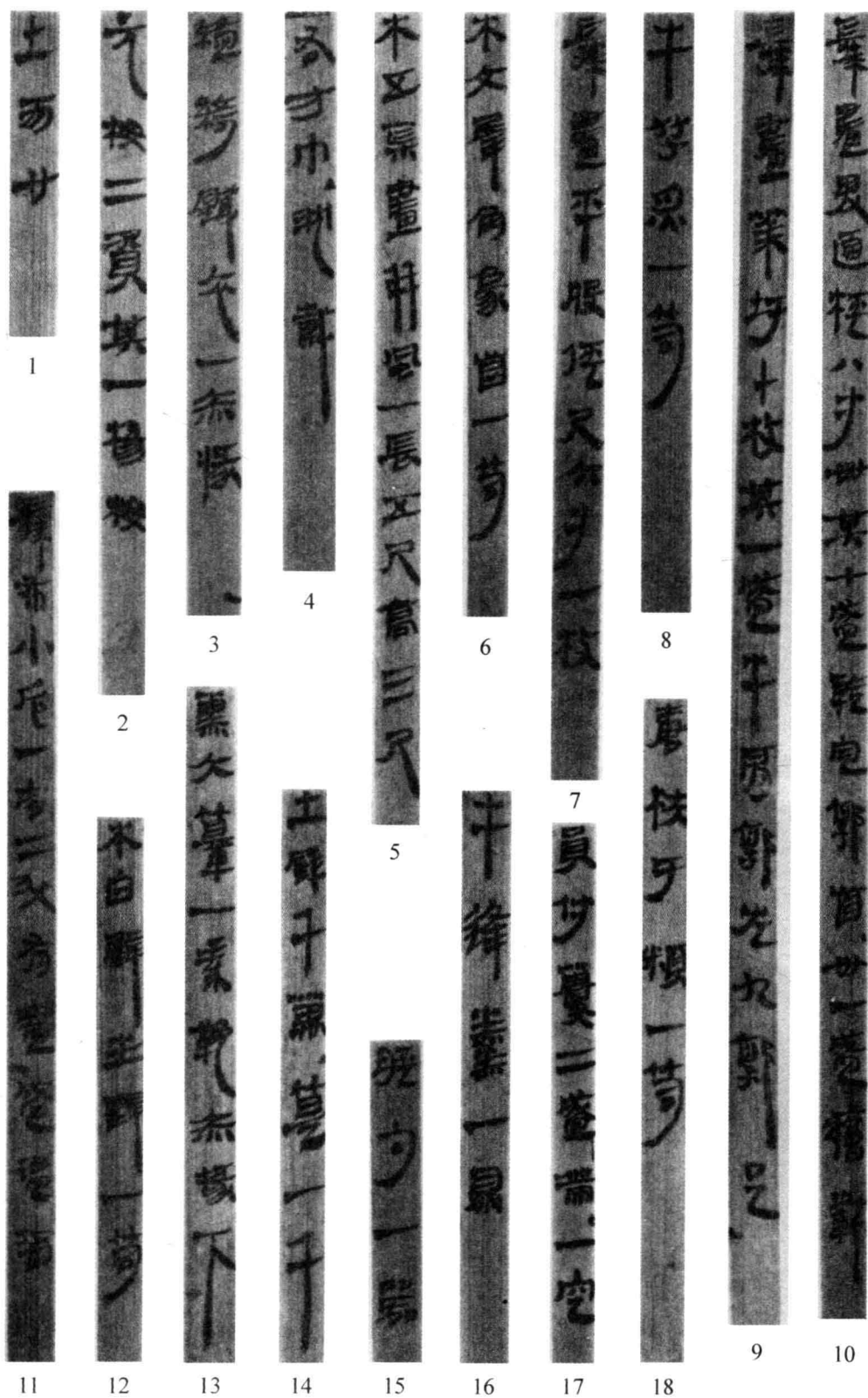
時候,往往加以隸化。例如上舉的  之類,雖然筆畫很簡單,却已經沒有“遺冊”草體的那種草書味道了。八分的挑法很可能是在古隸裏的草書筆法改作隸書筆法時萌芽的。^⑤

《新探》編校追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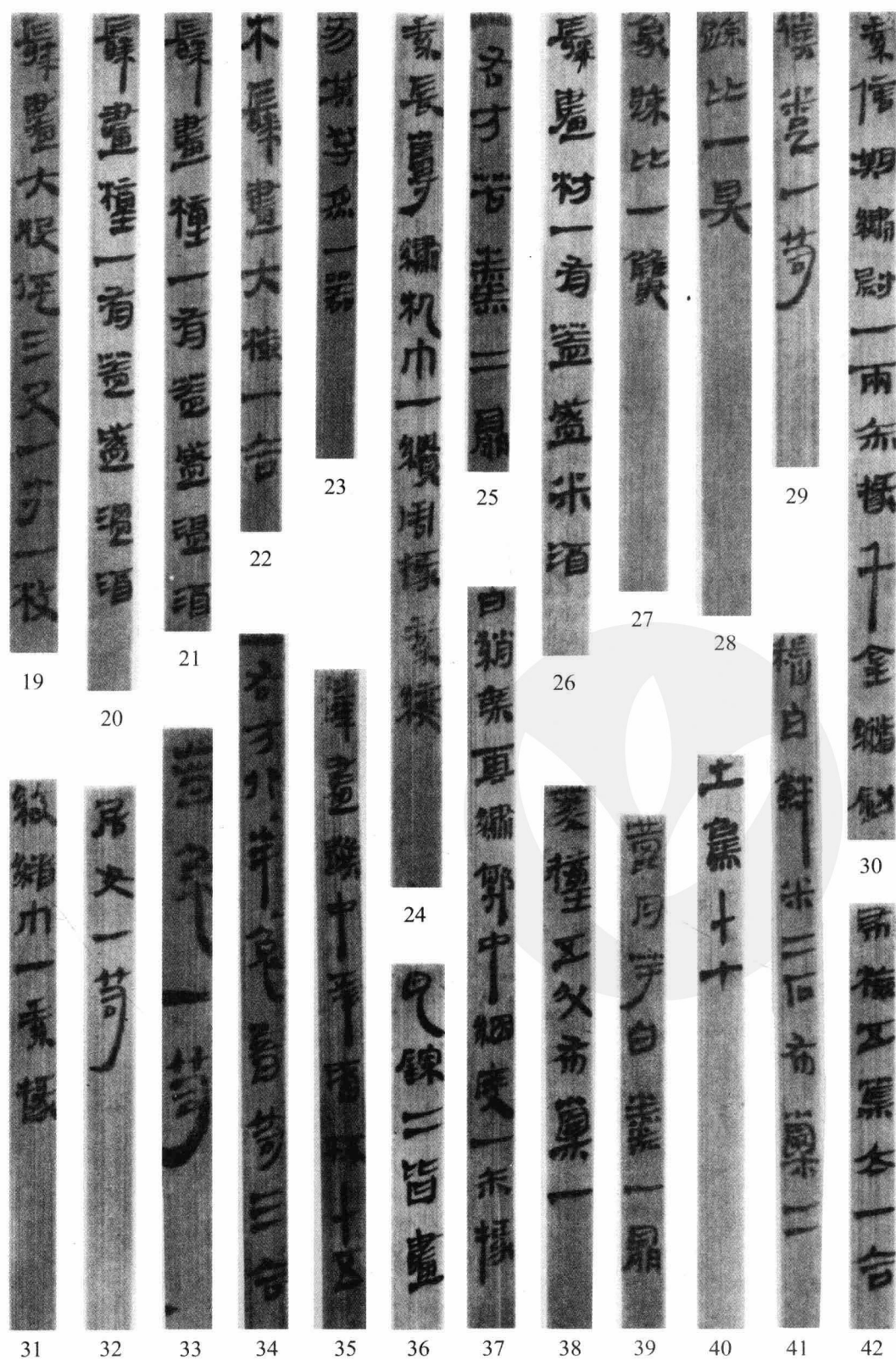
雲夢秦簡出土後,隸書形成時代已可推至戰國晚期,參看拙作《文字學概要》67—72 頁(商務印書館,1988)。

原載《考古》1974 年 1 期,又載《古代文史研究新探》,今據後者收入。

^⑤ 看魏建功《草書在文字學上之新認識》,《輔仁學誌》十四卷 1、2 期合刊。



圖版 I



圖版 II

漢字形成問題的初步探索

一

在討論漢字形成問題以前，必須把與文字形成有關的幾個概念簡單解釋一下。

文字是記錄語言的一種符號。“文字”這個詞可以用來指一個個的字，也可以用來指記錄某種語言的文字符號的整個體系（以下簡稱“文字體系”）。研究文字形成是以文字體系為對象的。

世界上獨立形成的古老文字體系，如古埃及的聖書字、古美索不達米亞的楔形文字、中美洲的馬亞文和我國的漢字，都是以圖畫式的表意符號，即所謂象形符號，以及少數表意的記號為基礎而發展起來的。當某個圖形或記號被比較固定地用作語言裏某個詞的符號的時候，它就初步具有了文字的性質。但是要做到使語言裏的每一個成分都有記錄它的符號，是需要一個很長的過程的。在這個過程裏，那些已經出現的詞的符號，還不能完整地把語言記錄下來，因此也就不能完全排擠掉非文字的圖畫式表意手法，往往跟圖形混在一起使用。為了跟後來成熟的文字相區別，我們把它們稱為原始文字。原始文字出現以後，經過很長的時間，通過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改進，才發展成為能夠完整地記錄語言的文字體系。

二

考古工作者發現的跟漢字形成有關的較古資料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原始社會晚期的仰韶、馬家窑、龍山和良渚等文化的記號，一種是原始社會晚期的大汶口文化的象形符號。我們先來討論第一種資料。

在陝西中部長安靈臺、郃陽莘野村、西安半坡和臨潼姜寨等地的仰韶文化遺址

裏,都曾經發現過刻在陶器上的記號。^① 它們幾乎全都刻在同一種陶器的同一個部位——半坡早期類型直口鉢飾有寬帶紋或倒三角紋的外口緣上。這充分說明它們並不是任意的刻劃,而是具有一定意義的記號。下面是半坡發現的記號的一些例子:^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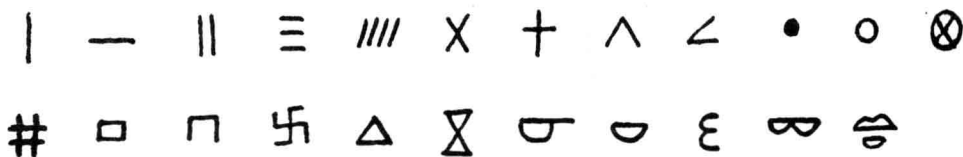


半坡早期距今大約六千年左右。

馬家窑文化主要分佈在甘肅和青海東部等地,時代晚於仰韶文化。在馬家窑文化半山類型和馬廠類型的陶壺、陶罐上,有時可以看到用顏料描畫的記號。1934年出版的《半山及馬廠隨葬陶器》一書收集了一些這樣的記號。例如:^③



近年在青海樂都的柳灣發現了大規模的原始社會晚期的墓地。這一墓地的馬廠類型墓葬出土的陶壺,有不少是畫有記號的,下面所舉的是一部分例子:^④



龍山文化的記號似乎發現得不多。在山東章丘龍山鎮城子崖的龍山文化層裏,曾經發現兩片刻有「」形記號和一片刻有「」形記號的陶片。^⑤ 在青島趙村的龍山文化遺址裏曾經發現一片有「X」形記號的陶片。^⑥

良渚文化分佈在江浙一帶,約略與龍山文化同時。解放前在杭州市良渚發現的一些陶片上刻有下列記號:^⑦

① 《西安半坡》196—198 頁。《文物》1975 年 8 期 82 頁。

② 《西安半坡》197 頁,又圖版 169—171。

③ 見該書 178—179 頁。

④ 《考古》1974 年 6 期 376 頁。馬家窑文化的記號有時也刻劃在陶器(《考古》1974 年 5 期 307—308 頁)或小骨版(《甘肅考古記》第 3 圖)上。

⑤ 《城子崖》54 頁,又圖版 16。

⑥ 《考古》1965 年 9 期 481 頁。河南龍山文化遺址也發現過記號,見《考古》1978 年 1 期 36 頁等。

⑦ 《良渚》25 頁。《杭縣良渚鎮之石器與黑陶》15 頁。



解放後上海馬橋遺址良渚文化層出土的某些陶器器底上，也刻有“X、XX、X”等記號。^⑧

有些地區邊遠或時代較晚的原始文化也使用記號，這裏就不涉及了。

從總體上看，上面所舉的這類記號，跟以象形符號為主要基礎的古漢字顯然不是一個系統的東西。但是它們對漢字的形成仍然是有影響的。為了說明這種影響，需要從這類記號的用途談起。

人們最先需要用記號記錄下來的，大概莫過於容易遺忘的數目了。上面舉出的那些記號裏應該包含着一些記數的記號。我國雲南的納西族曾經使用過的一種原始文字，即所謂納西象形文字（以下簡稱“納西文”），以“x”代表“十”，以“+”代表“百”。^⑨ 不太久以前，也是住在雲南的哈尼族，在訂立買賣契約的時候，還在用“米、+、一、○”等記號分別代表一百元、五十元、十元和一元。^⑩（《新探》編按：據汪寧生《從原始記事到文字發明》，哈尼族以“米”代表一元，“+”代表十元，“x”代表五十元，“米”代表百元，見《考古學報》1981年1期12頁。）這些用來記數的文字和記號，都跟古代原始社會晚期的記號十分相似。

很多研究者已經指出，有些原始社會晚期的記號跟古漢字裏的數字十分相似。例如：常見的記號“x、+、+”跟古漢字“五、六、七”三個字的最古寫法相同。^⑪ 半坡的“+”很像古漢字的“八”。“+、一、+、+、+、+、+”等記號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等字的相似，也是很明顯的。既然記數是原始社會晚期的記號的一種職能，古漢字從“一”到“八”這幾個數字的寫法跟這種記號相合，就不會是一種偶然現象。這些數字應該是漢字從這種記號裏吸取過來的。

半坡遺址發現的記號，有的是在好多件陶鉢上重複出現的，而且刻有相同記號

⑧ 《考古學報》1978年1期115、116、118、119頁。崧澤等地早於良渚文化的崧澤期文化層中也發現過記號，見《考古學報》1962年2期7頁圖6等。

⑨ 關於納西文，請看《麼些象形文字字典》、傅懋勳《麗江麼些象形文“古事記”研究》及拙文《納西象形文字簡介》（《文字改革》1962年8期封裏）。本文所用納西文材料大都引自傅書，以下不再一一加注。“麼些”即“納西”的舊譯名。

⑩ 《民族團結》1962年8期10頁。

⑪ 關於古漢字“五、六、七”三字的寫法，看于省吾《雙劍謄殷契駢枝三編·釋一至十之記數字》。“五”的另一種寫法“𠂇”，也見於上引馬家窑文化和良渚文化的記號。

的陶鉢碎片往往發現於同一窖穴或同一地區。發掘者根據這種現象認為它們“可能是代表器物所有者或器物製造者的專門記號”。^⑫ 郭沫若同志也認為它們是“花押或族徽之類”的東西。^⑬ 柳灣馬廠墓地發現的記號,有的也是多次出現的。由於同墓出土的器物上的記號往往有好多種,這種記號屬於器物所有者的可能性比較小。發掘者推測它們“很可能就是製陶專門化以後氏族製陶作坊或家庭製陶的一種特殊標記”。^⑭ 《半山及馬廠隨葬陶器》的作者也曾提出過有的記號可能是陶工的標記的說法。^⑮ 看來我國原始社會晚期的記號,除去記數以外,還可以用作族或個人的標記。

在商周時代的陶器上,我們仍然能夠看到不少跟原始社會晚期的記號極為相似的刻文。例如在偃師二里頭和鄭州的商代前期遺址裏發現的大口尊,就往往在口沿內刻着這類記號。^⑯ 它們大概也是器主或製器者的標記。

在上古,往往用家族或氏族的名稱稱呼個人,也就是說,人名往往就是族名。所以陶器上的記號大概多數是族的標記。見於商周文字的某些族名和族徽,跟這種記號顯然有密切的關係。在商周時代的青銅器上,常常用比當時一般文字更古老的字體,銘記器物主人的族名或族徽(這跟現代的某些姓氏和地名還保持較古讀音是同類的現象)。我們稱這種文字為族名金文。郭沫若同志指出,有一些族名金文跟原始社會晚期的記號極為相似,例如:^⑰



它們應該就來自這種記號。族名金文裏還有一種用幾個數字組成的記號式族徽,例如:



⑫ 《西安半坡》198 頁。

⑬ 《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考古學報》1972 年 1 期 1 頁。

⑭ 同注④。

⑮ 見該書 177 頁。

⑯ 《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65 年 5 期 222 頁。《鄭州二里岡》17 頁,又圖叁壹。《鄭州南關外商代遺址的發掘》,《考古學報》1973 年 1 期 83—84 頁。這些大口尊上的刻文可能并非全部都是記號,例如南關外的“ ”就有可能是“目”字。

⑰ 同注⑬。

郭沫若同志認為它們跟原始社會晚期的記號也是一個系統的東西。^⑮

用記號來記數和用來作某種標記，這兩種職能並不是互相排斥的。一個記號完全有可能既用來記數，又用作族或個人的標記。很可能有的記號還有其他表意作用。舉例說，雲南的傈僳族曾經用“×”這個記號表示會面或碰頭的意思，^⑯在古代原始社會晚期，×形記號也有可能曾經被用來表示類似的意思。

在漢字裏，除去上面講過的數字和族名以外，還有少數文字可能來自原始社會晚期的記號，例如一部分天干字就有這種可能。表次序的十個天干，在上古屬於最常用字，無疑有極其悠久的歷史。十干中“甲、乙、丁、癸”四個字的最古寫法作“、、、”。這些字形的意義很難解釋，而在上面舉過的原始社會晚期的記號裏則可以找到形狀相同或極其相似的例子。這幾個字非常可能是漢字從這種記號裏吸取過來的。

這裏應該說明一下，我們說漢字吸取了一些記號，並不等於承認這些記號本來就是文字。上舉的原始社會晚期的記號顯然不可能構成完整的文字體系，同時也不像是原始文字。族或個人的標記大概接近於郭沫若同志所說的“花押”的性質（商周時代的記號式族名金文可能仍有不少是花押性質的族徽）。就是記數的記號，也不見得是跟語言裏的數字嚴格相對應的。例如某氏族以“×”代表五這個數目，但是在具體應用時很可能有時以它代表五個人，有時以它代表五頭牛，有時又以它代表五個陶罐，並不是嚴格把它當作“五”這個詞的符號來使用的。前面舉過的哈尼族用“、”等記號代表一百元、五十元……的例子就可以說明這一點。漢字吸取某些記號的過程，就是把它們改造為文字的過程（有些記號式的族徽則可能是未經改造地繼承下來的）。總之，某些記號為漢字所吸取，並不能證明它們本來就是文字。

來自記號的漢字，主要是數字等極常用的一些字。因此漢字吸取改造這些記號的過程一定發生得很早。在漢字的原始文字階段的早期，這種過程應該就已經開始了。

⑮ 見注⑬所引文5頁。這類由數字組成的記號可能產生得比較晚，它們也見於商周時代的卜骨（《在甲骨金文中所見的一種已經遺失的中國古代文字》，《考古學報》1957年2期）以及某些骨角器，如安陽侯家莊1001號商代大墓出土的“骨柶”和長安灋西西周遺址出土的圓棒式骨角鏃（《灋西發掘報告》23,91頁）。（《新探》編按：據張政烺先生研究，這種由數字組成的符號是八卦符號，見張先生的《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等文。）

⑯ 《文物》1962年1期12頁。

三

上一節討論的那種記號,雖然對漢字的形成有影響,却顯然不是漢字形成的主要基礎,大汶口文化象形符號跟古漢字的關係就不一樣了。

大汶口文化是解放後新發現的一種原始社會晚期的文化,主要分佈於山東省,時代早於山東的龍山文化,很可能就是它的前身。在屬於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莒縣陵陽河遺址發現了四個象形符號:^①



在同時期的諸城前寨遺址發現了一個殘缺的象形符號(見右圖),^②這顯然是陵陽河最後一例的殘文。這五個象形符號全都刻在同型的大口陶缸上,並且除前寨一例情況不明外,其餘四例都刻在陶缸外壁靠近口沿的部位,跟半坡記號都刻在直口鉢外口緣上的情況類似。它們都刻得比較大,位置也很顯眼,看來應該是器物主人的標記。這些象形符號跟上節所說的那種記號,作風顯然不同。它們應該不是花押性質的標記,而是表示器物主人的族氏的。^③(《新探》編按:現在看來,這一點尚難肯定。)



把大汶口文化象形符號跟古漢字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出二者的關係是很密切的。

目前所能看到的最古的成批漢字資料,是商代後期的甲骨文和金文。其中,前面講過的族名金文的字體又比當時一般的金文和甲骨文更為古老。這從下面的對照表可以清楚地看出來(表中個別字取自偏旁。《新探》編按:表中族名金文“虎”字誤用西周金文,應改用《金文編》1985年版1077頁第2行“尊文”的“虎”旁):

① 《大汶口》117—118頁。參看《文物》1974年1期75頁。

② 同注①。

③ 除去上舉象形符號外,在大汶口墓地發現的一個背壺上有朱繪的  形圖象(《大汶口》72—73頁)。在滕縣崗上村大汶口文化墓葬出土的某些陶器的底部,劃有比較簡單的符號(《考古》1963年7期353、355頁)。由於材料比較零碎,是否與上舉象形符號具有同樣性質,還不能斷定。



族名金文也許可以代表商代前期甚至更早的漢字的字體。

解放後曾發現一些商代前期文字的零碎資料。鄭州白家莊出土的一個商代前期銅壘的頸部鑄有三個蛙類動物的圖形，唐蘭同志認為就是“黽”字，並推測為器主的族氏。^{②③} 歷史博物館所藏的一件傳世的商代前期銅鬲的口沿上有一個字，有人釋作“戊”，有人釋作“亘”或“回”，^{②④}其實可能是“耳”字，大概也是器主的族氏。近年在河北藁城臺西的商代遺址裏發現了一些時代早於殷墟甲骨文的陶文，有“止”、“刀”、“目”等字，也是“器物所有者的族氏或人名”。^{②⑤} 其字體與族名金文

②③ 《文物》1973 年 7 期 6 頁。

②④ 《文物》1961 年 1 期 42 頁、《考古》1964 年 9 期 461 頁。

②⑤ 《文物》1974 年 8 期 52 頁。

接近,例如“止”字在這種陶文裏就寫作。^{②⑥} 江西清江吳城商代遺址也發現了可能屬於商代前期的陶文。^{②⑦} 不過這些陶文似乎具有跟中原地區文字不同的地方特色,有不少字還不能確認,尚待進一步研究。此外,解放初曾在鄭州二里崗發現兩件商代字骨。一件只有一個“止”字,據說出土於商代前期地層。一件字數較多,但地層不明。^{②⑧} 除了吳城陶文和二里崗字骨以外,已發現的商代前期文字都跟商代後期的族名金文具有相同的特點,即字形跟圖畫比較接近,而且看來都是當族名用的。這兩個特點也正好是大汶口文化象形符號的特點。

如果再把大汶口文化象形符號跟古漢字的字形具體地比較一下,對於二者的密切關係就能看得更加清楚了。



在上舉的大汶口文化象形符號裏,陵陽河第一例象鉞形,跟上圖所示的商代族名金文所從的“戊”相似。^{②⑨} 第二例象斤形,跟族名金文“𣎵”(析)字所從的相似。^{③⑩} 它的柄部末端作小球形,跟上引族名金文所從的“戊”以及族名金文裏有些“戈”字的柄部同形。第三例象日在雲氣上或地上,于省吾同志釋“旦”。^{③⑪} 金文“旦”字作,如果把填實的下部改爲勾廓,跟陵陽河的“旦”就相當接近了。這是一個象事之形的符號。第四例在“旦”下加“山”,“山”有五峰。族名金文“山”字也有畫作五峰的。^{③⑫} “旦”和“𡵓”應該是同一族名的繁簡兩體。加“山”,大概是因爲“旦”又是地名。在上古,地名和族名幾乎是二位一體的。甲骨文的地名字往往加“山”旁,例如地名“𡵓”也寫作“𡵓”,^{③⑬}地名“𡵓”也寫作“𡵓”,^{③⑭}跟“旦”或作“𡵓”是同類的現象。

由此看來,大汶口文化象形符號跟古漢字相似的程度是非常高的。它們之間似乎存在着一脈相承的關係。

大汶口文化象形符號應該已經不是非文字的圖形,而是原始文字了。在漢字

②⑥ 同注②50 頁。

②⑦ 看《文物》1975 年 7 期所載《江西清江吳城商代遺址發掘簡報》及《關於江西吳城文化遺址與文字的初步探索》。

②⑧ 《鄭州二里崗》38 頁,又圖叁拾。

②⑨ 《金文編》804 頁【見 1985 年版 1029 頁】。

③⑩ 《頌齋金文續錄》2 板父乙鼎。《金文編》釋爲“枚”,不確。

③⑪ 《文物》1973 年 2 期 32 頁。

③⑫ 《金文編》520 頁【見 1985 年版 655 頁】。

③⑬ 地名“𡵓”見《粹》934【《合》32903】等片,“𡵓”見《續》3·46·6【《合》5766】等片。

③⑭ 《甲骨文編》760、844 頁。

形成的過程中，圖形怎樣演變為代表詞的原始表意字，其具體途徑我們是不清楚的。大汶口文化用作族名的象形符號，在這方面給了我們重要的啟發。即使是很原始的人，在看到一把石斤的圖形的時候，也完全有可能說出“斤”這個詞來。這並不等於“斤”字就已經產生，因為人們並沒有經常把斤的圖形當作語言裏“斤”這個詞的符號來使用。用作族名的象形符號就不一樣了。一個以“斤”為名的族，用一把斤的圖形來表示自己的族名。在熟悉這個族的人們中間，這個圖形就通過族名這個環節跟語言裏“斤”這個詞牢固地聯繫在一起了。所以，一個圖形只要經常被用來表示族名，就會成為代表一定的詞的符號，也就是說，就會具有作為一個文字的基本條件。我們把大汶口文化用作族名的象形符號稱為原始文字，而不直接稱為文字，是由於在當時還不可能存在完整的文字體系。

從以上的分析來看，用象形符號表示族名，很可能是原始表意字產生的一個重要途徑。在商代文字裏寫法特別古老的族名金文大量存在的事實，對我們的這種推測是有力的支持。

在已發現的大汶口文化的原始文字裏，族名“旦”已經有了加“山”的繁體，並且在陵陽河和前寨這兩個距離並不算近的遺址裏都發現了“𡵓”字。看來這種文字已經不是最初期的原始文字了。我們期待考古工作者發掘出更早的原始文字來。（《新探》編按：關於大汶口文化象形符號的性質，作者的看法已有變化，請參閱拙著《漢字的起源和演變》，見陰法魯、許樹安主編《中國古代文化史（一）》第四章，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從各方面推測，陵陽河等大汶口晚期遺址的年代可能在公元前第三千年中期。就漢字形成的歷史來說，在大汶口文化原始文字和商代文字之間還存在一些重要的缺失環節。並且，已發現的大汶口文化原始文字只是用作族名的一些單字，因此我們對當時的原始文字的全貌還是不清楚的。就是在已發現的商代前期文字裏，也還找不到明確的記錄連貫的語言的資料。這些情況都給研究漢字形成問題造成了困難。

在下一節，我們將在二、三兩節討論的基礎上，根據文字發展的一般規律和甲骨文的有關資料，並參照納西文的一些情況，對漢字形成的過程作一些初步的推測。

四

世界上獨立形成的古老文字體系都是意音文字,即兼用表意、表音兩種方法的文字。各種意音文字體系都包含三種不同性質的文字:表意字、借表意字充當的表音字以及兼用表意表音兩種方法的文字。我國傳統文字學把第二種稱為假借字,第三種稱為形聲字(在漢字裏形聲字也可以用作假借字)。

各種古文字的表意字,絕大多數是象形字(包括象事之形的字),少數是記號字。根據第三節所說的情況來看,我國古代表意字的產生可能跟象形符號的用作族名有很密切的關係。大約在公元前第三千年中期,在某些文化比較發達的地區,原始的象形字大概就已經相當流行了。在氏族林立的古代,在一個地區內流傳着上百個甚至幾百個用作族名的象形字,是完全可能的。這必然會有力地推動原始文字進一步發展。漢字裏也包含一些記號字。我們在第二節裏已經指出,在原始漢字的早期階段,記號字大概就已經開始產生了。

表意字是古代意音文字的基礎。但是,如果僅僅依靠表意字來記錄語言,必然會碰到很多不易克服的困難,因為語言裏難以給它們造表意字的詞實在太多了。為了克服這種困難,人們很早就想出了借字表音的辦法,借用某些表意字來表示跟它們聲音相同或相近的詞。這樣就出現了表音的假借字。第一節舉過的各種古文字都包含大量假借字,就是還處在原始文字階段的納西文也不例外。

古漢字裏的假借字是數不勝數的。例如借用“箕”的象形字“𠂔”表示語氣詞“其”,借用象鳥形的“隹”表示語氣詞“唯”,借用象鋸形的“𠂔”表示第一人稱代詞“我”等等。古漢字的假借字有很多是常用字,假借字開始出現的時間一定也很早。

假借方法的廣泛應用,使一個字可以代表幾個同音或音近的詞的現象大量產生。為了避免混淆,人們把某些表意字或表意符號當作表示字義類別的標誌,即傳統文字學所謂“形旁”,加在這種容易引起歧義的假借字上來區別它們的不同用法。另一方面,為了幫助閱讀者識別某些表意字,有時又需要在表意字上加注表示它的讀音的假借字,即傳統文字學所謂“聲旁”。由於這兩種情況,就產生了既有表意成分又有表音成分的形聲字。

在前面舉過的各種古文字和納西文裏,都有不少通過加注形旁或聲旁而形成的形聲字。古漢字早期的形聲字,絕大部分也應該是通過加注形旁或聲旁而形成

的(直接用形旁和聲旁構成的形聲字一般出現得比較晚)。在甲骨文裏可以找到不少這樣的例子。例如翌日的“翌”本來是假借“翼”的象形字“𠂔”來表示的。後來爲了明確字義曾在假借爲“翌”的“翼”字上加注形旁“日”,造成形聲字“𠂔”。又如“鳳”字本來寫作“𠂔”,象有高冠長羽的鳳鳥,後來加注表示“鳳”字讀音的聲旁“凡”,成爲形聲字“𠂔”。從納西文已經有形聲字這一點來看,漢字在形成完整的文字體系以前,大概也已經在使用形聲字了。

漢字裏還有一種爲了明確文字的本義或引申義而加注形旁的現象。例如:在甲骨文裏,開啓的“啓”寫作“𠂔”(𠂔),象用手開門戶。由於詞義引申,“𠂔”又有天晴的意思。後來就在當天晴講的“𠂔”字上加注“日”旁造成“𠂔”(啓)字。此外,甲骨文裏常常在指稱女子的族名字上加“女”旁,例如指井族女子的“井”字寫作“𠂔”,指竹族女子的“竹”字寫作“𠂔”,還常常在地名字上加“水”旁或“山”旁,加“水”旁的如地名“𠂔”也寫作“𠂔”,地名“𠂔”也寫作“𠂔”,加“山”旁的例子在第三節講大汶口文化的“𠂔”字的時候已經舉過了。這些人、地名的加旁字和“啓”一類字也未嘗不可以看作形聲字,如“啓”是從“日”“𠂔”聲,“𠂔”是從“女”“井”聲。但是它們跟前面舉過的“𠂔”一類形聲字不一樣,並不一定需要假借字作爲產生的前提,因此不見得一定全都出現在假借方法應用之後。考慮到這一點,我們似乎也不能僅僅根據大汶口文化晚期的“𠂔”字,就斷定當時的原始文字已經發展到使用假借字和形聲字的階段。不過這種可能性也不能排除。根據考古和史學工作者的研究,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生產已經相當發達,階級分化也已經比較明顯。原始文字在當時已經發展到使用假借字和形聲字的可能性並不是不存在的。

納西文是已經使用假借字、形聲字,但還經常夾用非文字的圖畫式表意手法的一種原始文字。(《新探》編按:參看注⑨所引拙文。此文從麗江麼些象形文《古事記》中引用了一段把假借字、形聲字跟圖畫式表意手法混在一起使用的納西文。)漢字在形成完整的文字體系以前,大概也有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是處在類似的階段的。

漢字究竟是在什麼時代脫離了原始文字階段,基本上形成能够完整地記錄語言的文字體系的呢?從大量發現的甲骨卜辭和一些篇幅較長的銅器銘文來看,商代後期的漢字已經是完整的文字體系了。在商代後期,不少象形字已經變得很不象形,寫刻文字的技巧也已經極爲純熟,看來漢字脫離原始文字階段大概已經有一段時間了。但是另一方面,在商代後期文字裏也仍然可以找到一些比較原始的

跡象。

首先,在甲骨文裏,有些象形字往往隨語言環境而改變字形,有時字形改變以後一個字可以讀成兩個字。

甲骨卜辭裏常常提到商王對祖先舉行進獻食品的“𩇛”祭。“𩇛”在典籍裏多作“登”。《禮記·月令》:“農乃登麥”,“農乃登黍”,鄭玄注:“登,進也。”卜辭“𩇛”字象兩手捧着豆形器進獻食品,有時還加上“示”旁寫作“禋”,表示向祖先的神主進獻。如果登祭所用的食品是鬯(一種香酒),“𩇛”字就可以改寫為“𩇛”,兩手所捧的“豆”為“鬯”所代換。卜辭裏既有“禋鬯”、^⑤“𩇛新鬯”,^⑥也有“𩇛鬯”、^⑦“𩇛新[鬯]”,^⑧看來“𩇛”僅僅是“𩇛”字的一個異體。但是在漢字發展的較早階段,情況恐怕並不如此簡單。納西文在這方面可以給我們一些啓發。在納西文裏,字形隨語言環境變化的現象很常見。例如納西文的“九”字通常作 ,在麗江納西族的經典《古事記》裏,當說到“九對蛋”的時候,就把“九”字的小點改作蛋形,寫作 ,既表示了“九”的意思,同時又表示了“蛋”的意思。又如納西文的“吼”字通常寫作 ,象牛出聲氣,如果把牛頭換作馬頭,就可以用來代表“馬吼”兩個詞。在漢字發展的較早階段,“𩇛”大概也是用來代表“𩇛鬯”這兩個詞的。到商代後期,這種比較原始的用字習慣基本上已經被拋棄,但是“𩇛”字則作為“𩇛”字的異體而保存了下來。有一條卜辭說:“其𩇛禋,王受又(祐)?”^⑨“禋”字後面沒有再加“鬯”字,大概仍然當作“禋鬯”兩個字用,應是原始的用字方法的殘餘。

類似的例子在甲骨文裏可以找到不少。例如象埋牲於坎的“𩇛”字,^⑩當所埋犧牲是牛羊的時候寫作“𩇛”,^⑪當所埋犧牲是犬豕的時候就寫作“𩇛”。^⑫有一條卜辭說:“□申卜,今日□𩇛?”^⑬這個“𩇛”字也很可能應該讀為“由犬”。又如象畜牛羊於欄的“牢”字,在指大牢的時候通常寫作“牢”,在指小牢的時候通常寫作

^⑤ 《綴一》457【《合》27180】、《人文》1810【《合》27406】。

^⑥ 《京津》4230【《合》30977】、《綴一》396【《合》30974】、《續》1·40·5【《合》30973】(後二例用“禋”字)。

^⑦ 《安明》1691【《合》30980】。

^⑧ 《佚》410【《合》27216】。

^⑨ 《粹》544【《合》30524】。

^⑩ 見《甲骨文編》21頁,羅振玉釋“𩇛”(埋)。

^⑪ 《前》1·32·6、《粹》38【《合》14609】等。

^⑫ 《前》7·3·3【《合》16197】、《續》2·18·8【《合》14313】。

^⑬ 《後》下4·4【《合》21257】。

“宰”。因為古代以牛為大牢，羊為小牢。在甲骨卜辭裏，“宰”上往往加“小”字，但是也有不少不加“小”字的“宰”。後一種“宰”字很可能像現代曾經使用過的合文式單位字“涅”（海里）、“哩”（英里）那樣，是既可以讀為“牢”，也可以讀為“小牢”的。其它的例子這裏就不列舉了。^{④④}

上面指出的這種現象顯然是甲骨文跟原始文字還比較接近的反映。

其次，原始文字記錄語句的時候，經常有一些必不可少的詞語被省略掉，文字的排列也往往很混亂，並不一定跟語言裏各個詞的次序相對應。納西文經典裏就極其普遍地存在這種現象。在這方面，甲骨文也多少保留了一些原始的痕跡。

有一條卜辭說：“甲申卜，禦婦鼠妣己二𧢲。”^{④⑤}卜問用“二𧢲”作為犧牲祭祀妣己以祓除婦鼠的災殃是否可行。“𧢲”顯然是“牝”、“牡”二字的合文。對於“二𧢲”可以有兩種理解，一種是“二牝二牡”，一種是“二牛，一牝一牡”。無論是哪一種情況，在這句話裏都有必不可少的字沒有寫出來。也可能寫卜辭的人是直接以“二𧢲”來代替“一牝一牡”的。那就跟文字與語言相對應的原則離得更遠了。此外，不管怎樣解釋，在這句話裏，“牝”、“牡”這兩個詞都不是直接相連的，但是寫卜辭的人卻把它們合寫成一個“𧢲”字。從這個角度來看，“二𧢲”也是文字排列不合語序的一個例子。

前面引用過的“其𠄎禘”這條卜辭也很可能是文字排列不合語序的例子。其中第二字在卜辭裏一般用作地名或人名，“其𠄎禘”大概應該讀為“其禘𠄎𠄎”。𠄎𠄎就是𠄎這個地方所產或這個人所進貢的鬯。按照這種讀法，“禘”字所代表的兩個詞在語句裏也是不相連的，並且“禘”的位置反在“𠄎”字之前。（《新探》編按：此文也許有讀為“其𠄎𠄎禘”的可能。）

在甲骨文裏，卜辭行款比較紊亂的現象也相當常見。在少數商代後期的銅器上，還可以看到銘文排列得很亂的現象，例如在一個大“亞”字裏雜亂地填塞着一些族名、祖先名和其他文字，^{④⑥}或是把有的字填寫在別的字空隙裏。^{④⑦}這些現象大概也跟原始文字排列方式的影響有關。

從上述這些跡象看來，商代後期距離漢字基本形成完整文字體系的時代似乎

④④ 參看《考古》1972年5期45頁。

④⑤ 《前》1·33·7【《合》19987】。關於“禦”字用法，參看上注所引文44—45頁。

④⑥ 如亞癩觚（《三代》14·30上【《集成》12·7288】）、亞若受鼎（同上3·10下【《集成》4·2400】、3·11上【《集成》4·2402】）、亞若受尊（同上11·26【《集成》11·5937、11·5938】）等。

④⑦ 如盠卣（《三代》13·22下【《集成》10·5265】）等。

也不會很遠。

《尚書·多士》記載西周初年周公對商朝遺民的訓話說：“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周公特別強調殷的先人有典册記載“殷革夏命”之事，也許我國就是從夏商之際才開始有比較完備的記事典册的。漢字基本上形成完整的文字體系，很可能也就在夏商之際。當然，完整的文字體系基本形成以後，原始文字是不會馬上就絕跡的。在一段時間裏，原始文字和完整的文字體系可能會在不同的地域或不同的用途上同時並存。這跟比較進步的原始文字，甚至完整的文字體系產生以後，原始的記號還在繼續應用，是一樣的道理。漢字的原始文字的形式也可能不止一種，在夾用圖畫手法的原始文字以外，還可能存在不夾用圖畫手法但只表示語言裏一部分詞語的原始文字。

根據我們前面的討論，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原始漢字有可能已經發展到使用假借字和形聲字的階段。從大汶口文化晚期到夏商之際，可能有近千年時間（約從公元前三千年中期到公元前十七世紀左右）。在這一段漫長的時間裏，原始漢字無疑是在不斷改進之中的，例如：假借字、形聲字的比重不斷提高，^{④⑧}表意字字形逐漸簡化並趨於比較固定，圖畫式的表意手法逐漸摒除，記錄語言的完整程度越來越高，文字的排列越來越整齊等等。尤其是在夏代，我國大概已經正式進入階級社會，統治階級為了有效地進行統治，必然迫切需要比較完善的文字，因此原始文字改進的速度一定會大大加快。夏王朝有完整的世系流傳下來這件事，就是原始文字有了巨大改進的反映。這種改進為漢字在夏商之際基本形成完整的文字體系打下了基礎。

原始文字在原始社會裏開始出現的時候，顯然是廣大的勞動人民所創造的（《新探》編按：究竟是否如此，還有待研究）。但是，“文字在人民間萌芽，後來却一定為特權者所收攬”。進入階級社會以後，在漢字由比較進步的原始文字發展成完整的文字體系的過程裏，起主要作用的大概就是為統治者服務的巫、史了。納西文在過去是由納西族的“東巴”（巫師）掌握的。目前所能看到的最古的成批漢字資料——商代後期的甲骨卜辭，也顯然出自當時的巫、史之手。倉頡造字的神話當然不足信，但是相傳倉頡是黃帝的史官，把史官跟“造字”聯繫在一起，還是有一定道理的。

^{④⑧} 如果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原始文字還沒有發展到使用假借字和形聲字的階段，這一條就應該改成：“假借字和形聲字開始出現並不斷增多”。

最後,把我們對於漢字形成問題的意見作一個簡單概括。漢字大概是以我國原始社會晚期出現的象形符號為基礎,並吸收改造了原始社會晚期流行的一些記號而發展起來的。在漢字形成完整的文字體系以前,大概經歷過一個既使用表意字、假借字、形聲字,又仍然夾用圖畫式表意手法的原始文字階段。漢字基本上形成完整的文字體系的時代,可能是夏商之際。

附記:

本文寫作過程中得到朱德熙先生和嚴文明同志的幫助,謹誌謝忱。

原載《中國語文》1978年3期,又載《古代文史研究新探》,今據後者收入。

談談古文字資料對古漢語研究的重要性^{*}

長期以來，國內古漢語研究工作所憑藉的資料多偏重於自古流傳下來的文獻，地下發現的古文字資料多多少少有些被忽視。古文字資料作為語言研究的對象，確實存在一些缺點，例如：資料往往比較零碎，有相當多的文字現在還不認識，有些資料裏經常出現重複的話（如甲骨文裏有很多求雨、求年的卜辭，金文裏有很多求福的套語）。但是另一方面，古文字資料顯然有比傳世古書優越的地方：一、不少古書的年代問題聚訟紛紜，因此它們所記錄的語言的時代也成了問題。地下發現的古文字資料，年代絕大部分比較明確。除去傳抄的古書以外，它們記錄的通常就是當時的語言。就拿傳抄的古書來說，由於抄寫的時代較早，年代問題也不像很多傳世的古書那樣嚴重。有的古書正是由於地下古抄本的發現，初步解決了年代問題。例如過去很多人認為《尉繚子》是漢以後的偽作，現在由於在銀雀山漢墓裏發現了西漢前期的抄本，基本上可以肯定為戰國時代作品。二、古書屢經傳抄刊刻，錯誤很多，有的經過改寫刪節，幾乎面目全非。地下發現的古文字資料，除去傳抄的古書以外，很少有這種問題。就是傳抄的古書，通常也要比傳世的本子近真。三、古書裏保存下來的商代、西周和春秋時代的作品很貧乏。尤其是商代作品，不但數量極少，而且顯然經過後人比較大的修改，不能代表商代語言的真面貌。古文字資料裏有數量很多的商代後期的甲骨文和西周、春秋時代的金文，正可以補古書的不足。四、流傳下來的古書絕大多數是自古以來一直受到封建士大夫重視的典籍。地下發現的古文字資料，品種比較雜，往往有在古書中很難看到的內容，如近年在雲夢秦墓裏發現的秦律和在馬王堆西漢前期墓裏發現的房中術作品等。它們有時能提供一些古書裏比較少見的語言資料。例如《說文》說：“貲，小罰以財自贖

* 本文所說的古文字資料包括近年來發現的秦和西漢前期用古隸書寫的資料在內。古漢語主要指先秦漢語。

也”，“嫖，保任也”，這兩個詞在古書裏都很少見，在秦律裏則是常用詞。^①此外，由於漢字裏表意的字形和形聲字的形旁表示字義，形聲字的聲旁表示字音，因此古文字字形本身，對於研究古漢語的詞義和語音也具有重要價值。字形是不斷變化的。如果根據古書裏較晚的字形來研究詞義和語音，往往會造成錯誤。由於上面指出的種種原因，古文字資料對古漢語研究有很大的重要性。

隨着古文字學的發展，從本世紀 20 年代末開始，就出現了一些比較系統地利用古文字資料來研究古漢語的著作。^②但是總的來看，我國語言學界對古文字資料是不夠重視的。大量古漢語研究者所使用的資料，基本上局限在流傳的古書的範圍裏；即使使用古文字資料，也往往是不完備的第二手材料。解放以後，這方面的情况有所改進，但是並沒有根本的變化。^③

在這篇短文裏，我們準備在語音、語法、構詞法和詞義等方面分別舉出一些實例，來強調一下古文字資料對古漢語研究的重要性。由於作者的語言學修養很不够，所舉的例子恐怕不能很好地揭示出這種重要性，而且很可能還有錯誤，希望同志們指正。

首先談談語音方面的問題。

講古音離不開諧聲，講諧聲一般都以《說文》為根據。但是從地下發現的古文字資料來看，《說文》小篆的字形以及《說文》對字形的分析有不少是有問題的。例如：《說文》說“帥”从“自”聲（據段說），金文作，“自”是的訛變之形。《說文》說“𠂔”从“由”聲，甲骨文作，象矢形而突出扁平的鏃部，應是金鏃箭的“鏃”的初文，根本不从“由”。《說文》說“并”从“开”聲，甲骨文作，象二人相並，根本不从“开”（《說文》“并”下又說“一曰从持二爲并”，比从“开”聲之說近真）。我們在研究古音的時候，最好把這類靠不住的諧聲例子剔除出去。^④

① 看《雲夢秦簡釋文（二）》，《文物》1976 年 7 期 5—10 頁。“嫖”在簡文中作“結”、“姑”。

② 這類著作裏，較早的有何定生《漢以前的文法研究》（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3 集 31、32、33 期）、《尚書的文法及其年代》（同上 5 集 49、50、51 期），容庚《周金文中所見的代名詞釋例》（《燕京學報》6 期）等文。

③ 解放三十年來，比較系統地利用古文字資料研究古漢語的著作，主要有以下幾種：管燮初《殷虛甲骨刻辭的語法研究》、《甲骨文金文中“唯”字用法的分析》（《中國語文》1962 年 6 期），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第三章《文法》，黃景欣《秦漢以前古漢語中的否定詞“弗”“不”研究》（《語言研究》3 期）。

④ 王力先生在《古韻脂微質物月五部的分野》一文裏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文載北大中文系《語言學論叢》5 輯。

爲了說明古文字對研究諧聲的重要性，我們舉出从“去”得聲之字的問題來討論一下。“去”是魚部字，但是从“去”得聲之字的讀音却分成兩系。一系是屬魚部的，如“𠵿”、“𠵿”等。一系是屬葉部收-p 尾的，如“劫”、“𠵿”、“𠵿”、“𠵿”等。《說文》把“𠵿”、“𠵿”說爲从“劫”省聲，但“𠵿”字仍然說爲从“去”聲。古音學家則大都把屬於葉部的从“去”聲的字全都看作从“劫”省聲。經驗告訴我們，“省聲”的說法往往是不可信的。並且從漢字結構的通例看，“劫”字本身就應該是一個从“去”聲的字。《說文》把“劫”當作會意字，說“人欲去以力脅止曰劫”，顯然是牽強附會。所以从“劫”省聲的說法並沒有把問題解決。高本漢提出一個解釋，認爲“去”字在諧聲時代是收-b 尾的，但是這在音理上又講不通。^⑤

從古文字來看，這個問題非常簡單，原來小篆的“去”把較古的文字裏兩個讀音不同的字混在一起了。古文字裏有𠵿字，^⑥从“大”从“口”，表示把嘴張大的意思，這就是“口𠵿而不合”（《莊子·秋水》）的“𠵿”字的初文，也就是離去的“去”字。張開跟離去這兩個意義顯然是有聯繫的。古文字裏又有一個象器皿上有蓋子的𠵿字（也寫作𠵿），^⑦“蓋”字所从的“盍”字上部的“去”就是這個字。^⑧這個字應該讀爲“盍”，正好是葉部字。甲骨文有𠵿字，^⑨前人不識，其實就是“盍”，也就是《說文》訓“閉”的“𠵿”。在小篆裏𠵿、𠵿這兩個形狀相近的字已經混同了起來。這樣，問題就清楚了。从“去”得聲的魚部字，所从的是離去的“去”。从“去”得聲的葉部字，所从的則是象器蓋相合的“去”（盍）。過去認爲是會意字的“灋”（法）字也可能是从“去”（盍）聲的。有些从“去”的字有魚部和葉部兩讀，這應該是後起的混亂現象。

古文字資料還可以爲一些古音現象提供重要的例證。我們從馬王堆三號墓出土的竹書裏舉一個例子。這座墓是西漢文帝時代下葬的。墓中出了一些講房中術的竹書，估計是漢初人從《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務成子陰道》、《堯舜陰道》、《湯盤庚陰道》一類書裏抄錄下來的，其著作年代大概在戰國晚期。這些東西當然是古文化中的糟粕，但是從語言學的角度看，却仍然是有價值的。例如這些文章大

⑤ 看董同龢《上古音韻表稿》（《史語所集刊》十八本 58 頁）。

⑥ 《甲骨文編》230 頁。

⑦ 《說文》“盍”字篆文作“盍”，古文字多从“去”，看《金文編》31 頁【見 1985 年版 37 頁】“蓋”字、277 頁【見 1985 年版 348 頁】“盍”字。

⑧ 《後》下 10·14【《合》4853】。

都用韻，對於研究古音就是很好的材料。在古音學中，古音有無四聲問題^⑨和王力先生提出來的脂微分部問題，^⑩是兩個很重要的問題。在這批材料裏，四聲分用和脂微分用的現象都比較明顯。這裏舉比較典型的《師癸治神氣之道》一篇，簡單說明一下。這篇文章除開頭一小段外，基本上每句用韻，現在把各句的韻腳依次抄錄於下，後面加括號注明韻部和聲調（個別不入韻的字用“○”號表示）：

紀、始（之部上聲，“紀”字本讀上聲）

行、央（殃）、宗（東陽合韻，平聲）

續、族（侯部入聲）

忘（與上“行”、“央”、“宗”等字爲韻。“忘”在韻書中有平聲一讀，漢人韻文都押平聲）

施、移（歌部平聲）

志、事（之部去聲）

節、實、疾（脂部入聲）

陰、筋（“陰”是侵部字，“筋”是文部字，可能反映了-m尾和-n尾的相混。

二字皆平聲）

訕（屈）、骨、○、出、○、物（微部入聲）

○、味、氣（微部去聲）

蔥（聰）、光（東陽合韻，平聲）

盈、生、○、寧（耕部平聲）^⑪

這一篇文章的韻腳，四聲分用和脂微分用的現象非常明顯，連一個例外也沒有。在同時代的古書裏，似乎還沒有能够這樣清楚地集中地說明這兩個問題的資料。

其次談談語法方面的問題。

商代後期的甲骨文是我們現在能够利用的最古的漢語資料。古漢語裏的很多語法現象，都可以在甲骨文裏找到最古的例子。但是我們在研究漢語史的時候，在這方面注意得很不够，甚至連研究甲骨文的學者已經指出的有關材料都沒有充分

⑨ 關於這個問題，可看周祖謨先生的《古音有無上去二聲辨》，見《問學集》。

⑩ 看王力先生的《漢語史論文集》、《漢語史稿》上册及注④所引文。

⑪ 此材料尚未公開發表，蒙湖南省博物館給予引用的方便，謹致謝意。（《新探》編按：此篇已發表於文物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馬王堆漢墓帛書〔肆〕》，釋文見149—150頁。我們認爲其釋文見於此書147頁的40號簡應移入其釋文見於150頁的72、73號二簡之間。所引韻腳中的“味、氣、聰、光、盈、生”即見於40號簡。參看拙文《馬王堆醫書釋讀瑣議》，《古文字論集》525—526頁。）

利用。例如陳夢家在《殷虛卜辭綜述》裏講卜辭語法的時候,指出“王吉茲卜”的“吉”字是當動詞用的(103頁),研究漢語史的同志在講意動用法的時候,似乎很少引用這條材料。

甲骨卜辭還反映了一些商代特有的語法現象,這就更值得我們注意了。這裏舉否定詞“毋”的例子簡單說明一下。

卜辭最常用的否定副詞可以分爲兩組,即“𠄎(一般釋“勿”)、𠄎”和“不、弗”。前者通常是表示意願的,往往可以翻成現代漢語的“不要”。後者通常是表示可能性或事實的,往往可以翻成“不會”或“沒有”。^⑫“毋”在古書裏的用法跟“勿”相近。在卜辭裏,一般“毋”字的用法也接近於“勿”,例如:

貞:王聽□,毋告。

貞:王于甲午告。

乙 5317【《合》1051】

丙申卜,□貞:翌丁酉其又于中丁。

貞:毋又。

續 1·12·4【《合》22861】

庚午卜,王曰貞:翌辛未其田,往來無災,不遘囚。茲用。

庚午卜,王曰貞:毋田。

京津 3454【《合》24502】

向先王禱告不禱告,舉行不舉行“又”祭,去不去田獵,都是要不要這樣做的問題。這類卜辭的“毋”字都可以用“勿”或“𠄎”代替。^⑬

但是在與語氣詞“其”的關係上,“毋”却跟“不、弗”相似。卜辭裏“勿、𠄎”之後幾乎從來不用“其”字,“不、弗”之後則常常用“其”字。“毋”字之後也可以用“其”字,並且這樣的“毋”字的用法也就不再跟“勿、𠄎”相似,而變得跟“不、弗”相似了。例如:

貞:翌戊申毋其星(晴)。

柏 12(《新探》編按:拓本見《合》11496 正)

丁亥卜貞:既雨。

貞:毋其既[雨]。

乙 5574【《合》1784】

⑫ 另詳《說“𠄎”》一文,待刊。(《新探》編按:已發表於《古文字研究》第一輯。)

⑬ 除去下面講到的“毋其”以外,還有少數“毋”字的用法似乎與“不、弗”沒有明顯的區別。如第二期卜辭裏的成語“茲毋用”和“茲不用”,在意義上似乎就沒有什麼區別(看胡厚宣先生《釋茲用茲御》,《史語所集刊》八本四分)。但是這類成語大概是占辭的一部分,在占辭裏“勿”字的用法也有與“不”相似的現象,這類現象尚待研究(詳上注所引文)。還有些卜辭,由於辭義不够明白,所用“毋”字到底屬於“勿、𠄎”組還是“不、弗”組,不容易肯定,但絕大多數不帶“其”的“毋”字的用法顯然與“勿、𠄎”相似。

戊毋其雨。

壬毋其雨。

安明 1867【《合》29901】

貞：毋其延有祟（《新探》編按：實為“求”字，疑當讀為“咎”）。

丙 297【《合》17079】

貞：王目.

王目毋其.

乙 3018【《合》13623】

貞：婦妊毋其有子。

丙 190【《合》13931】

癸亥卜，殼貞：我史戔缶？

癸亥卜，殼貞：我史毋其戔缶？

丙 1【《合》6834】

天是晴是雨，王是否遭祟、有病，婦是否懷孩子，這些都不是要不要這樣的問題，而是會不會這樣的問題。所以上引這些卜辭裏的“毋”字的用法都與“不、弗”相似。最後所引的《丙》1 號的卜辭，其同版卜辭有說“多臣弗其戔缶”的，此辭的“毋其”顯然與“弗其”同意。^⑭

總之，在卜辭裏，不帶“其”的“毋”基本上屬於“勿、弔”一組，而帶“其”的“毋”則屬於“不、弗”一組。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種現象。此外如卜辭裏的否定詞“不”和“弗”、語氣詞“惟”和“惠（惠）”的細微區別，詞序的各種變化^⑮等等，都是與商代語言的特點有關的重要語法問題。不把這一類問題搞清楚，對於商代語言絕不可能有深刻的認識。

對於周以後古漢語語法的研究，古文字資料也是很重要的。例如去年第二期的《文物》上發表了馬王堆三號墓出土的一幅帛書的片段（圖版貳、叁），這幅帛書對於解決係詞“是”產生的時代問題就極為重要。王力先生最初認為係詞“是”出現於六朝。^⑯後來洪誠先生根據《史記》和《穀梁傳》的材料，把這個時間提前至漢初。^⑰王先生在《漢語史稿》中冊裏修改了自己的說法。但是他認為《史記》有經後人改動的地方，難以為據，《穀梁傳》年代未定，也不能用，只承認《論衡》裏的係詞“是”可信，因此把係詞“是”產生的時代定在西漢末或東漢初（353—354 頁）。上面所舉的帛書是根據星辰、彗星、雲氣等天象判斷吉凶的一種占書。在一些彗星的

⑭ 有人認為“戔”應該讀為“捷”，是戰勝的意思，看管燮初先生《說戔》（《中國語文》1978 年 3 期）。

⑮ 關於詞序請參看後面論複合詞構詞法的一段。

⑯ 《中國文法中的係詞》，《漢語史論文集》241 頁。

⑰ 《論南北朝以前漢語中的係詞》，《語言研究》2 期。

圖像下分別注着“是是帚彗”、“是是竹彗”、“是是蒿彗”、“是是苦彗”等句子。這些句子裏的第二個“是”字顯然是係詞。這幅占書是漢初人所抄錄的。從內容看，原書大概為戰國後期的楚國人所著。^⑮ 由此可見，係詞“是”大概在戰國後期就產生了。^⑯ 【編按：上引馬王堆帛書《天文氣象雜占》“是是帚彗”等語，“是是”原皆作“是=”。據魏宜輝《再論馬王堆帛書中的“是=”句》（《東南文化》2008年4期）、楊錫全《出土文獻“是=”句淺析》（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09年11月3日）等研究，帛書“是=”當讀為“是謂”，即同幅占書上文出現過的“是謂”之省。以帛書《天文氣象雜占》為係詞“是”出現時代的證據，應存疑。】

再舉一個跟“是”字有關的例子。在先秦時代，代詞“是”用作賓語的時候常常前置。《馬氏文通》就已經指出“是”字用作介詞“以”的賓語的時候以“倒置為常”（336等頁）。王力先生在《漢語史稿》中冊裏又進一步指出，用作賓語的“是”在某些情況下可以自由地放在動詞前面（見357—358頁）。在現有的古文字資料裏，代詞“是”始見於大約作於周昭王前後的沈子簋。我們檢查了一下西周、春秋金文裏“是”字作賓語用或者可能作賓語用的二十來個例句，發現“是”字全部是前置的。例如沈子簋的“懿父迺（乃）是子”（“是”似指作器者自己），陳逆簋的“子孫是保”（“是”指這件簋），陳公子甗的“子子孫孫是尚”（“是”似指這件甗），虢盤的“是曰（以）先行”，毛公簠鼎的“是用壽老”等等，連一個例外也沒有。由於這一事實的啟發，我們又檢查了一下古書裏把“是”字用作賓語的句子，發現凡時代可靠的西周、春秋時代的作品（如《詩經》和《尚書》中時代可靠的各篇），所用的賓語“是”也全部是前置的。尤其是《詩經》，“是”字前置的句子非常多，如“君子是識”（《大雅·瞻卬》）、“他人是保”（《唐風·山有樞》）、“是刈是穫”（《周南·葛覃》）、“是剝是蒞”（《小雅·信南山》）等等。到《論語》、《左傳》等書裏，賓語“是”的位置已經變為以後置為常。不過，《論語》裏“以”和“用”的賓語“是”仍然都是前置的。《左傳》由於是根據較古史料編纂而成的，在大量出現賓語“是”後置的句式的同時，也保留了不少賓語“是”前置的句子，如“寡人是問”（僖公四年）、“小國是懼”（襄公二十八年）、“商人是因”（昭公元年）等等。《論語》和《左傳》大約分別編成於戰國初期和中期。賓語“是”位置的變化也許是在春秋晚期開始發生的。所以我們可以得出一條規律：在西周春秋時代（春秋晚期也許要除外），代詞“是”用作賓語時

⑮ 看顧鐵符先生《馬王堆帛書“天文氣象雜占”簡述》，《文物》1978年2期。

⑯ 與秦律竹簡同出於雲夢睡虎地11號秦墓的一種占書，也有用法與上引帛書相似的“是”字。

必定置於動詞或介詞之前。這是代詞“是”不同於“之”、“此”等詞的一個重要特點。如果沒有古文字資料，這條規律是不大容易肯定下來的。

下面再談談構詞法方面的問題。

對於研究古漢語單純詞的構詞法（也可以說是單純詞的分化），古文字資料是極有啓發性的。例如：從甲骨文看，“史”、“事”、“吏”、“使”四個字的寫法本來並無區別。^② 這就告訴我們，這四個語音相近、意義相關的詞，應該是由一個詞分化而成的。

對於研究古漢語複合詞的構詞法，古文字資料也很重要。例如：邢公畹先生曾經指出古漢語在構詞法上曾經有過跟臺語一致的現象——大名冠小名。^③ 在甲骨文裏就有不少這方面的資料。除去邢先生已經談到的“大乙”、“大戊”等先王名也可以倒作“乙大”、“戊大”等例子外，還可以在一、二期卜辭裏找到很多大名冠小名的地名，如“丘商”、“丘剌”、“丘雷”、“自榮”、“自喜”、“自裕”等等。^④ 結合《左傳》裏的“丘輿”（成公二年）、“丘薳”（昭公四年）、“城潁”（隱公元年）、“城濮”（僖公二十八年，也見於經）、“城棣”（襄公五年）等地名來看，似乎可以確定，在較早的漢語裏，地名的構詞法曾以大名冠小名為常。這個例子還給我們一個啓示，如果要展開漢語跟親屬語言的比較研究，應該儘量利用時代較早的古文字資料。

最後，談談詞義方面的問題。

古文字表意字的字形對於詞義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這裏舉兩個字形能够糾正古書訓詁的例子。先說“保”字。《說文》：“保，養也。”“養”其實並不是“保”的本義。《尚書·召誥》：“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以“保”與“抱”並提。在古文字裏，“保”的較古寫法是，象一個人把孩子背在背上。所以唐蘭先生認為“保”的本義是負子於背，襁褓的“褓”是“保”的孳生字，“養”是“保”字的後起意義。^⑤ 這個意見是很正確的。再說“暴”字。暴虎馮河的“暴”，古書訓為徒搏。從漢代學者開始，就把徒搏理解為徒手搏虎。但是，暴虎之“暴”的本字是“𪔐”，甲骨文寫作，詛楚文寫作，象用戈搏虎。可見暴虎應指徒步搏虎，並

② 參看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103 頁。

③ 《漢臺語構詞法的一個比較研究》，收入《中國語文研究參考資料選輯》。

④ 以上所引甲骨文地名分別見於《乙》4518【《合》9774】、《前》1·24·3【《合》780】、《南》明 395【《合》24367】、《粹》1210【《合》24298】、1211【《合》24336】、《存》下 663【《合》22606】等。“自”當讀為京師、洛師的“師”，也可能應讀為“次”。

⑤ 《殷虛文字記·釋保》。

不是一定不拿武器。古代盛行車獵，對老虎這樣凶猛的野獸通常是用車獵取的，所以徒步搏虎是勇敢行爲。馮河是無舟渡河，暴虎是無車搏虎，這兩件事是完全對應的。^{②4}

某些詞在古文字資料裏的用法，對於詞義研究也有重要價值。例如《說文》說：“自，鼻也。象形。”從字形上看，這個解釋應該是正確的。但是在全部古書裏，使用“自”字的這個本義的例子一個也找不到。有一條甲骨卜辭說：“貞：有疾自，唯有咎。”（《乙》6385【《合》11506】）跟卜辭裏常見的“疾身”、“疾齒”等語對照起來看，“疾自”無疑是鼻子有病的意思。這個“自”字用的正是本義，可以補古書的不足。

如果要全面研究古漢語的詞彙，更是離不開古文字資料。

總之，古文字資料對於古漢語研究的各個方面都能提供重要的材料，並且還能解決不少僅僅依靠古書難以解決的問題。對於古漢語研究，古文字資料絕不是可有可無的，而是必不可少的。目前我們所能看到的古文字資料，數量已經相當可觀。僅就有字的甲骨片來說，就多達十多萬片，估計甲骨文資料的總字數可能已經超過百萬。隨着我國考古事業的發展，古文字資料一定還會不斷地豐富起來，古文字資料對古漢語研究的重要性自然也會越來越增加。古文字資料大都是由考古工作者發掘出來的。由於這個特點，多年來古文字學一直跟考古學有密切關係，跟語言學的關係則若即若離。古漢語研究中或多或少地有忽視古文字資料的傾向，這恐怕是一個原因。這種情況不但影響到古漢語研究工作的進展，同時也影響到古文字研究工作的進展，因為古文字學是非常需要語言學的指導和幫助的。希望語言學界多多關心古文字學，把對古文字資料不夠重視的傾向迅速扭轉過來。

附記：

朱德熙先生對本文多次提出修改意見，給作者很大幫助，謹誌謝忱。

原載《中國語文》1979年6期，又載《古代文史研究新探》、《裘錫圭自選集》，今據《裘錫圭自選集》收入。

^{②4} 關於“𪔐”字，參看拙作《說“玄衣朱褕衿”》，載《文物》1976年12期。

漢字的性質*

從比較文字學的角度來看，漢字跟古埃及的聖書字和古代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是同類型的。近代研究比較文字學的學者，起初把這種類型的文字稱為表意文字。這種類型的文字都包含大量表音的成分，把它們簡單地稱為表意文字，顯然是不妥當的。到本世紀 40 年代，有人提出了“過渡文字”（指由表意向表音過渡的文字）的說法。但是，把古漢字、聖書字、楔形文字等有幾千年歷史的成熟的文字體系稱為過渡文字，顯然也是不妥當的。進入 50 年代之後，採用表意文字說和過渡文字說的人越來越少了，代之而起的是“詞—音節文字”（word-syllabic writing，或譯“表詞—音節文字”）“表意—音節文字”等說法。國內在 50 年代也有人提出了漢字不是表意文字，而是“綜合運用表意兼表音兩種表達方法”的“意音文字”的主張。^① 下面談談我們對漢字性質的看法，重點放在分析漢字所使用的符號的性質上，因為一種文字的性質就是由這種文字所使用的符號的性質決定的。至於究竟給漢字這種性質的文字體系安上一個什麼名稱，那只是一個次要的問題。

文字是語言的符號。作為語言的符號的文字，跟文字本身所使用的符號，是不同層次上的東西。例如漢字“花”是漢語裏的花草之{|花|}這個詞的符號。^② “艹”（草字頭，原作“艸”，即古“草”字）和“化”則是“花”這個字所使用的符號（“花”是一個形聲字，“艹”是形旁，“化”是聲旁）。

在漢字裏，像“花”這樣可以從結構上進行分析的字，一般稱為合體字。合體字的各個組成部分稱為偏旁。秦漢以後所造的合體字，基本上都是用已有的字充

* 本文是正在寫作中的《漢字》一書的第二章，現在先發表出來，希望得到批評指正。在寫作和修改的過程中，得到了朱德熙先生的很大幫助，謹致謝意。（《自選集》編按：《漢字》後來改名《文字學概要》，於 1988 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第二章的文字與此篇稍有出入。此篇收入本集時，文字亦有少量的修改。）

① 周有光《文字演進的一般規律》，《中國語文》1957 年 7 期。又見《字母的故事》2—7 頁，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 年修訂版。

② 為了行文的方便，並為了明確字跟詞的區別，我們一般用花括號來標明文章裏提到的詞或語素。

當偏旁的(有些字用作偏旁時有變形的現象,如在上方的“艸”變作“艹”,在左邊的“水”變作“氵”等)。在上古漢字裏,有不少表意字是用兩個以上不一定能獨立成字的象形符號組成的,如象用手開弓射箭形的𠂔(射)字。這類字是否可以稱為合體字,是需要商榷的。我們姑且把它們稱為準合體字。

有些漢字從結構上看不能分析,一般稱為獨體字。對於獨體字來說,也存在語言的符號跟文字所使用的符號這兩個不同的層次。例如古漢字裏的“日”,作為{日}這個詞的符號來看,是一個有音有義的字;作為“日”字所使用的符號來看,則僅僅是象太陽之形的一個象形符號。這種區別在拼音文字裏同樣存在。例如英文裏的“a”作為英語裏不定冠詞{a}的符號來看,是有音有義的;作為英文所用的符號來看,則僅僅是一個表示一定語音的字母。為了使概念明確,下面把文字所使用的符號稱為“字符”。

語言有語音和語義兩個方面,作為語言的符號的文字,也必然既有音又有義。就這一點來說,各種成熟的文字體系之間並沒有區別。只有根據各種文字體系的字符的特點,才能把它們區分為不同的類型。

英文可以說是一種表音文字,但是這並不是說英文只有音沒有義,只是說英文的字符,即二十六個字母是表音的,不是表意的。例如:英文的 sun 是英語裏{sun}這個詞的符號。它既有音,即{sun}這個詞的音——[sʌn];也有義,即{sun}這個詞的義——太陽。但是 sun 所使用的字符 s、u、n,跟它所代表的詞只有語音上的聯繫,沒有意義上的聯繫,所以我們把它叫做表音字。同樣,我們所以把古漢字日(日)叫做表意字,是因為日作為字符,即太陽的象形符號來看,跟{日}這個詞只有意義上的聯繫,沒有語音上的聯繫。如果作為{日}這個詞的符號來看,它也是音、義兼備的。^③

討論漢字性質的時候,如果不把文字作為語言的符號的性質,跟文字本身所使用的字符的性質明確區分開來,就會引起邏輯上的混亂。

各種文字的字符,大體上可以歸納成三大類,即意符、音符和記號。跟文字所代表的詞,在意義上有聯繫的字符是意符,在語音上有聯繫的是音符,在語音和意義上都沒有聯繫的是記號。拼音文字只使用音符,漢字則三類符號都使用。

漢字的字符裏有大量意符。傳統文字學所說的象形、指事、會意這幾種字所使

③ 以上一段所說,大體上是根據趙元任先生的意見。參看 *Language and Symbolic Systems*, 劍橋大學出版社, 1968, 105 頁。

用的字符，跟這幾種字所代表的詞都只有意義上的聯繫，所以都是意符。我們所說的表意字就是總括這幾種字而言的。形聲字的形旁跟形聲字所代表的詞也只有意義上的聯繫，所以也是意符。

意符內部還可以分類。有的意符是作為象形符號使用的，它們通過自己的形象來起表意作用，如古漢字裏的“人”“日”等字所使用的亻、日等符號，又如構成𠂔(射)字的弓箭形和手形。幾何形符號如果不是用作記號，而有以形表意的作用，如一、二、三、四(古“四”字)、口(古“方”字)、○(古“圓”字)等字所用的符號，也應該歸入這一類。古漢字裏的獨體字，基本上都是用單個象形符號造成的表意字。

有的意符不是依靠自己的形象來起作用的。這種意符通常都是由已有的字充當的表意偏旁，它們就依靠本身的字義來表意。例如：合體表意字“歪”由“不”“正”二字組成，它的意思就是“不正”。“不”和“正”在這裏就是依靠它們的字義起作用的意符。形聲字的形旁一般由依靠本身字義來指示形聲字字義的字充當，所以也應該歸入這一類(少數在象形字上加注音符而成的形聲字，如“齒”的繁體字“齒”等，在這方面是例外。這種字過去多看作加聲的象形字)。

在有必要區分上述這兩種意符的時候，可以把前一種稱為形符，後一種稱為義符。在漢字變得不象形之後，形符基本上就不使用了。

漢字的字符裏也有很多音符。假借字就是使用音符的。人們在假借某個字來表示一個跟它同音或音近的詞的時候，通常並不要求它們之間原來在意義上有什麼聯繫。例如古漢字借“箕”的象形初文來表示語氣詞{其}，{其}、{箕}二詞在意義上就毫無聯繫。又如近代假借花草之“花”來表示動詞{花}（如花費、花錢），花草之{花}跟動詞{花}在意義上也毫無聯繫。所以儘管本來是表意字，“花”本來是形聲字，在它們借來表示語氣詞{其}和動詞{花}的時候，都是純粹作為音符來起作用的。當然，“”和“花”作為語氣詞{其}和動詞{花}的符號來看，也是既有音又有義的；但是作為假借字所使用的字符來看，則只有表音作用。這跟日作為{日}這個詞的符號看既有音又有義，作為“日”字的字符看則只有表意作用的情況是一致的。

有時也能看到被假借的字跟借它來表示的詞不但同音或音近，而且在意義上也有某種聯繫的現象。這種現象大概有很多是無意中造成的。在漢語裏，彼此的語音相同或相近並且意義也有聯繫的詞，是很常見的。人們在為某個詞找同音或音近的字充當假借字的時候，很有可能無意中找了一個跟這個詞在意義上也有聯

繫的字。有意假借一個跟某個詞在意義上也有聯繫的字來表示這個詞的情況，也是存在的。例如明代初年怕“元由”“元來”的“元”跟元朝的“元”相混，假借意義跟它相近的“本原”的“原”字來代替它。這種情況並不常見，可以作為假借的特例來處理。

形聲字的聲旁也是音符。聲旁也有兩類。一類是單純借來表音的，如“花”的聲旁“化”。另一類跟形聲字所代表的詞在意義上也有聯繫。例如一種用玉石等物作的耳飾叫做{珥}（與“耳”同音，古代讀去聲），“珥”字从“玉”（“玉”用作左旁時寫作“王”）从“耳”，“耳”就是跟“珥”在意義上有聯繫的聲旁。這種聲旁可以看作音符兼意符。

漢字的音符跟拼音文字的音符有很大區別。即使撇開漢字還同時使用意符和記號這一點不談，也不能把二者等量齊觀。拼音文字的音符是專職的，漢字的音符則是借本來既有音又有義的現成文字充當的。有很多漢字在充當合體字的偏旁的時候，既可以用作音符，也可以用作意符，而且還能兼起音符和意符的作用。例如“耳”字在“餌”“鉦”（音耳，金屬元素名）等字裏是音符，在“聰”“聾”等字裏是意符，在“珥”字裏是音符兼意符。一般拼音文字所使用的字母，數量都相當少。漢字音符的情況則不同了。從原則上說，漢字裏每一個字都有可能借用為音符；實際上用作音符的字，數量也很大（古今用作聲旁的字估計在一千左右）。同樣的字音往往借用不同的字來表示。如果要強調漢字和拼音文字的音符的區別，可以把漢字的音符稱為“借音符”。不過為了行文的方便，我們在下文中仍然稱它們為音符。

下面再討論漢字字符裏的記號。

用記號造的字，字形跟所代表的詞沒有內在聯繫，不易為人們所接受。所以用記號造字的情況是極為少見的。在文字體系形成過程的開始階段，可能有少量在原始社會中長期沿用的記號被吸收到文字裏來。古漢字裏X（五）、∧（六）、+（七）、八（八）等數字，大概就來自這種記號。除此之外，用記號造字的情況就很難找到了。^④但是在漢字發展的過程中，由於字形和語音、字義等方面的變化，却有很多意符和音符失去了表意和表音作用，變成了記號。

由於漢字字形的演變，獨體表意字的字形大都喪失了原來的表意作用。例如古漢字的☼變成隸書、楷書的“日”之後，已經一點也看不出太陽的樣子了。如果

^④ 天干中的“十”（甲）、“乚”（乙）、“•”（丁）等字，可能也是源於原始社會所使用的記號的。參看拙作《漢字形成問題的初步探索》，《中國語文》1978年3期164頁。

不考慮“日”字的歷史，根本無法找出“日”這個字的字形跟{日}這個詞有任何聯繫。可見“日”字的字符已經從意符變成了記號，“日”字已經從表意字變成了記號字。同類的例子舉不勝舉。唐蘭先生在《中國文字學》“記號文字和拼音文字”節裏說：“圖畫文字和記號文字本是銜接起來的。圖畫演化得過於簡單，就只是一個記號。”（109 頁）這是很正確的。

有人把“日”這一類字形由象形到不象形的變化，看作由表形到表意的變化，認為☉是表形符號，“日”是表意符號。這是不妥當的。所以會產生這種看法，大概是由於沒有把字符的作用跟文字的作用區分開來。“日”這一類字使用的字符變為記號這個事實，並沒有改變這些字作為語言裏相應的詞的符號的性質。字形變得不象形之後，這些字仍然保持着原來的字音和字義。這一點並不能反過來證明它們的字符沒有變成記號。如果因為“日”字還有意義，就把它字符看作表意符號，把它看作表意字；那末根據“日”字還有讀音這一點，豈不是也可以把它的字符看作表音符號，把它看作表音字了嗎？這顯然是不合理的。

由於記號字仍然代表着它們原來所代表的詞，它們在用作合體字的偏旁，或假借來表示其他詞的時候，仍然能起意符或音符的作用。例如“日”字雖然已經變成了記號字，“晴”字所从的“日”却並不是記號，而是以“日”字的身份來充當意符的（只取“日”字之義而不取其音）；“駟”字（音日，古代驛站用的馬車）所从的“日”和假借來記錄外國地名日內瓦的“日”，也不是記號，而是以“日”字的身份來充當音符的（只取“日”字之音而不取其義）。總之，儘管“日”一類字自身使用的字符是沒有表意表音作用的記號，它們仍然能夠作為意符或音符來起作用。

所以，漢字字形的演變雖然使絕大部分獨體字——它們也是構成合體字的主要材料——變為記號字，却並沒有使合體字由意符、音符構成的局面發生根本的變化。漢字絕大部分是合體字。合體字的性質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也就是漢字的性質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所以我們既要充分認識到記號字跟表意字的不同，又不能過分夸大記號字的出現對漢字的整個體系所發生的影響。唐蘭先生在《中國文字學》裏說：“截至目前為止，中國文字還不能算是記號文字……還是形聲文字”（109 頁），已經把這個意思很扼要地講了出來。

在獨體表意字之外，還有一些字也由於字形的演變而成了記號字。

準合體字有不少變成了記號字。例如：“立”字本作，象人立地上，“並”字（現已併入“并”字）本作，象兩個人並立在地上，演變成隸書、楷書之後，就都變成不能分析的記號字了。前面講過的“射”字雖然從表面上看仍可分成兩個偏旁，

但是由於弓箭形被改成形近的“身”字，實際上也已經成為記號字了。

合體表意字也有少數變成了記號字。例如：“表”字本作𦃟(表)，由“衣”“毛”二字合成。“表”本是罩在皮衣外面的衣服的名稱。古人的皮衣有毛的一面朝外，所以“表”字从“衣”在“毛”上示意。這個字寫成“表”之後，也就只能看作一個記號字了。

形聲字偶爾也會演變成記號字。例如从“禾”“千”聲的𥽿字，就變成了形旁、聲旁全都遭到破壞的記號字“年”。

字形的演變還造成了一些半記號字，即由記號跟意符或音符組成的字。這類字大都是由形聲字變來的。例如：“春”字本作“萅”，《說文》分析為“从艸，从日，艸春時生也，屯聲”。後來聲旁“屯”跟“艸”旁省併成“𠂔”旁。這個偏旁既無表音作用，也無表意作用，是一個只有區別作用的記號。可是偏旁“日”仍有表意作用，所以“春”就成了由記號跟意符組成的半記號半表意字。

還有不少字，雖然其結構並沒有由於字形演變而遭到破壞，但是由於語音和字義的變化，對一般人來說實際上也已經變成了記號字或半記號字。比較常見的一種情況，是形聲字的聲旁由於語音的變化喪失表音作用，轉化為記號。例如“恥”（“耻”的本來寫法）本是从“心”“耳”聲的字，後來“耳”“恥”二字的讀音變得毫無共同之處，“耳”實際上成了僅有區別作用的記號，“恥”實際上成了半記號半表意字。“恥”字寫作“耻”，始見於東漢碑刻，可能當時“耳”“恥”二字的讀音已經有了很大距離，有的人不知道“耳”是聲旁，就把“心”旁改成了讀音與“恥”相近的“止”（漢隸中“止”和“心”的字形相當接近）。“耻”可以看作由記號“耳”跟音符“止”組成的半記號半表音字。

合體字的表意偏旁由於字義的變化喪失表意作用，轉化為記號的情況也是存在的。例如：形聲字“特”的本義是公牛，所以用“牛”為形旁。由於這個本義早已不用，對一般人來說，“牛”旁實際上已經成為記號。

形聲字有時還會由於語音和字義兩方面的變化而完全變成記號字。例如上面所舉的形旁喪失表意作用的“特”字，由於聲旁“寺”的表音作用也已經由於語音演變而喪失，對一般人來說，實際上已經完全成為記號字了。

假借字也可能變成記號字。假借字是借用已有的字作為音符來表示跟這個字同音或音近的詞的。對根本不認得被借字的人來說，假借字實際上只是個記號字。有些假借字所借之字的原來用法已經被人遺忘。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所借之字不是形聲字，假借字就會變成記號字。例如：“我”字在較早的古文字裏寫

作𠂔，象一種鋸或刃形近鋸的武器。它本來所代表的詞，一定就是這種鋸或武器的名稱。由於第一人稱代詞{我}跟這個詞同音或音近，古人就假借“我”字來記錄它。可是在相當早的時候，“我”字本來所代表的詞就已經廢棄不用了。因此作為你我之“我”所用的字符來看，“我”已經喪失表音作用，變成了一個硬性規定的記號；作為一個文字來看，“我”已經從假借字變成了記號字。現在用來表示虛詞{其}的“其”字，^⑤一般人並不知道它本來所代表的詞是{箕}，實際上也已經成為記號字了。

如果被借字是形聲字，當本義已經湮沒的時候，聲旁一般仍有表音作用。例如“笨”本來當竹子裏的白色薄膜講，後來這個字被假借來表示愚笨的{笨}，本義不再使用，形旁“竹”實際上已經變成記號，但聲旁“本”仍有表音作用。

總之，由於種種原因，在我們現在使用的漢字裏，原來的意符和音符有很多已經變成了記號。相應地，很多表意字、形聲字和假借字，也就變成了記號字或半記號字。

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結論：漢字在象形程度較高的早期階段（大體上可以說是西周以前的階段），基本上是使用意符和音符（嚴格說應該稱為借音符）的一種文字體系；後來隨着字形和語音、字義等方面的變化，逐漸演變成為使用意符（主要是義符）、音符和記號的一種文字體系（隸書的形成可以看作這種演變完成的標誌）。如果一定要為這兩個階段的漢字分別安上名稱的話，前者似乎可以稱為意符音符文字，或者像有些文字學者那樣把它簡稱為意音文字；後者似乎可以稱為意符音符記號文字。考慮到後一階段的漢字裏的記號幾乎都由意符和音符變來，以及大部分字仍然由意符、音符構成等情況，也可以稱它為後期意符音符文字或後期意音文字。

前面說過，有人把漢字這種類型的文字體系稱為“詞—音節文字”。此外，還有人把漢字稱為“詞文字”（word writing，或譯表詞文字）或“語素文字”。^⑥ 這些名稱應該怎樣理解呢？

⑤ “其”由“𠂔”變來，演變情況大致如下：𠂔—箕—其—其。有人認為“𠂔”（音基）是加注的音符。“箕”是由“其”分化出來專門表示它的本義的。

⑥ 關於漢字是詞文字的說法，參看布龍菲爾德的《語言論》（袁家驊等譯，商務印書館，1980，360頁）。詞—音節文字說是美國的 Gelb 在 1952 年發表的 *A Study of Writing* 中提出來的（第三章，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63）。語素文字說是趙元任在 1959 年發表的《語言問題》中提出來的（商務印書館，1980，144 頁）。趙氏在這本書裏稱語素為“詞素”，現在一般都稱“語素”。

首先應該指出,語素文字說跟詞文字說在基本觀點上並無多大分歧。語素是語言中最小的有意義的單位,能够獨立活動的語素就是詞。上古漢語裏單音節詞佔絕對優勢,漢字一般都是代表單音節詞的。但是有很多單音節詞後來變成了不能獨立活動的語素,在今天一個漢字往往只是一個語素的符號,而不是一個詞的符號。這是有些人不願意把漢字叫做詞文字,而要叫做語素文字的原因。按照這種考慮,詞—音節文字這個名稱也可以改為語素—音節文字。^⑦

所謂語素文字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文字體系呢? 拼音文字可以按照字符所表示的是音節還是音素,分成音節文字和音素文字,“語素文字”是不是可以理解為字符表示語素的文字呢? 不能這樣理解。一般認為“日”這一類字是典型的語素字。但是我們只能說“日”字表示語素{日},而不能直接說字符“日”表示語素{日}。這一點前面早就說明了。有的人是因為看到漢字裏一個字通常代表一個語素,稱漢字為語素文字的。像這樣撇開字符的性質,僅僅根據文字書寫的基本單位所代表的語言成分的性質,來給文字體系定名,也是不妥當的(這裏所說的文字書寫的基本單位,就是一般所說的字。漢字的筆畫可以稱為用筆的基本單位)。英文是以詞為書寫的基本單位的,大家不是並沒有把它看作表詞文字,而是把它看作音素文字的嗎? 這樣說來,語素文字這個名稱是不是根本就不能成立呢? 那倒也不必這麼看。音素、音節、語素,是語言結構系統裏由低到高的不同層次(這裏所說的“語言結構”是廣義的,包括語音結構)。我們可以把語素文字解釋為字符屬於語素這個層次,也就是說,字符跟語素這個層次發生關係而跟音素、音節這兩個層次沒有關係的文字;或者解釋為能够表示語言的語素結構(即能够表示詞由什麼語素構成)而不能表示語言的音素或音節結構的文字。語素—音節文字可以解釋為既使用屬於語素這個層次的字符,又使用表示音節的字符的文字。

按照上面的解釋來看,漢字究竟應該稱為語素文字呢,還是應該稱為語素—音節文字呢? 下面就來探討這個問題。

漢字的意符和記號都不表示語音,前者只跟文字所代表的語素的意義有聯繫,後者只能起把代表不同語素的文字區別開來的作用。它們都是屬於語素這個層次的字符。所以漢字裏的獨體、準合體和合體表意字以及記號字和半記號半表意字,

⑦ 趙元任在注③所引書中“文字”章的一個小標題裏,已稱漢字為“語素—音節文字”(102頁),他還認為如果當初假借字能自由發展,漢字會由語素—音節體系發展為純音節體系(105頁),但是他對稱漢字為語素—音節文字的理由沒有作具體說明。(《自選集》編按:本文原來的注介紹趙說不够正確,承伍鐵平先生指出,今已作修改。)

都可以看作語素字。

但是，漢字使用的音符，雖然都由原來是語素的符號的現成文字充當，却應該看作表示音節的符號。使用音符的假借字（就記錄漢語固有語素的假借字而言），以及由意符和音符構成的形聲字，通常也以一個字代表一個語素，但是我們不應該因此就把它們也都看作語素字。

那些記錄具有兩個以上音節的音譯外來詞的假借字，它們表示語素的音節結構的性質，是十分明顯的。例如元代假借來記錄出自蒙古語的官名的“達魯花赤”這四個字（“達魯花赤”的本來意義是統治者、掌印者），顯然都是作為音節符號使用的。記錄漢語裏固有的雙音節語素的假借字，如“倉庚”（鳥名）、“猶豫”之類，表示音節結構的性質也很明顯。

那些用來記錄漢語固有的單音節語素的假借字，其實同樣具有表示音節結構的性質。只不過在一個語素只包含一個音節的情況下，語素和音節之間的層次界綫容易被忽略而已。作為字符來看，假借來表示動詞{花}的“花”跟“達魯花赤”的“花”，其本質並無不同，二者都是表示 huā 這個音節的符號。它們的不同在於前者單獨用來表示一個單音節詞的音，後者則只表示一個多音節語素裏的一個音節。“花”作為假借字所使用的字符看，只有表音節的作用；但是作為記錄動詞{花}的假借字來看，則既有音也有義（即“花”字的假借義）。“達魯花赤”這四個字必須連在一起才能表示出一定的意義，其中每一個字都只能看作一個沒有意義的表音節的符號。如果不是按照一般習慣以“書寫的基本單位”當作“字”的定義，而是以“語素或詞的符號”當作“字”的定義的話，只有“達魯花赤”這個整體才有資格稱為假借字。

英文裏表示不定冠詞的“a”字所使用的字母“a”，其本質並不因為單獨成字就跟與其他字母拼合成字的“a”有所不同。漢字裏表示動詞{花}的假借字“花”，以一個字代表一個語素這一點，當然也不會影響到它所使用的字符的表音節的本質。所以假借字都可以看作音節字。

形聲字的聲旁也是表音節的符號。例如：讀音相同的“餌”、“洱”、“鉅”、“珥”代表四個不同的語素，但是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表音成分——聲旁“耳”。這個“耳”顯然應該看作表音節的符號（“珥”所從的“耳”兼有表意作用，已見上文）。由於形聲字的形旁只跟語素的意義有聯繫，可以把形聲字看作介於語素字跟音節字之間的一種文字。半記號半表音字的性質，也可以這樣看。

前面曾經指出，漢字使用的音符跟拼音文字的音符有很大區別。這種音符作

爲表音節的符號來看,跟音節文字的音符當然同樣是有很大區別的。漢字既使用表音節的符號,也使用屬於語素這個層次的符號。表音節的符號都是借現成的文字,即語素的符號充當的,而且借來表示同一個音節的字往往有很多個。^⑧ 這些都是跟音節文字不同的地方。

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知道,漢字不應該簡單地稱爲語素文字,而應該稱爲語素—音節文字。不過,對漢字使用的表音節的符號跟音節文字的音符之間的區別,也應該有足够的認識。

語素—音節文字跟意符音符文字或意符音符記號文字,是從不同的角度給漢字起的兩種名稱。前者著眼於字符所能表示的語言結構的層次,後者著眼於字符的表意、表音等作用。這兩種名稱可以並存。意符和記號都是屬於語素這個層次的字符,所以語素—音節文字這個名稱對早期和晚期的漢字都適用。

原載《中國語文》1985年1期,又載《裘錫圭自選集》,今據後者收入。

⑧ 這種現象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於本來不同音的字演變爲同音字而造成的。例如《新華字典》yī音節下所收的全部形聲字使用了“意”、“衣”、“奇”、“毆”、“耳”、“伊”、“韋”、“多”等十來個不同的聲旁,但是這些形聲字有很多在古代並不同音。爲了區別同音詞而借用不同的字來表示同一音節的現象也是常見的(參看游順釗《中國古文字的結構程序》,《中國語文》1983年4期277頁、279頁注⑪)。例如:“潢”和“滄”,“蟻”和“蝗”,都是同音的。爲了從字形上把它們區別開來,分別使用了“黃”和“皇”這兩個聲旁(這跟拼音文字有時爲了區別同音詞把它們拼得不同形的情況相似)。此外,借用不同的字來表示同一音節的現象,當然也有不少僅僅是由於選擇音符缺乏規律性而造成的。

《辭源》《辭海》注音商榷

本文所說的《辭源》指由 1979 年至 1983 年陸續出版的四冊修訂本，《辭海》指 1979 年版。這兩部詞典都是作者隨時需要請教的“老師”。由於經常使用，發現其中也還存在不少問題。現在先把平日翻閱時碰到的一些有問題的注音提出來討論，希望對這兩部重要詞典的修訂工作多少能起一些作用。無論是《辭源》還是《辭海》，作者翻閱所及的都只是全書中很小的一部分。所以本文指出的問題，完全是舉例性質的。作者水平有限，恐怕會有以不誤為誤之處，請識者指正。

下面把單字注音跟詞條注音分開來討論。有些需要討論的例子，既可以看作單字注音的問題，也可以看作詞條注音的問題。我們主要根據討論的方便來歸類。文中引用《新華字典》、《現代漢語詞典》、《中文大詞典》、《漢語詞典》、《國音字典》、《康熙字典》時，簡稱“新華”、“現代”、“中文”、“漢語”、“國音”、“康熙”。

一、單字注音的問題

在這一節裏，我們按照問題的性質，把要討論的例子分別歸入四個小節。

1. 把不讀常用字音的義項收在常用字音之下

(1) 怵 《辭海》怵字只出 chù 一音，義項③釋曰：

被誘惑而動心。《漢書·食貨志下》：“善人怵而為姦邪。”

按：當“誘”講的“怵”，讀音與怵惕之“怵”有別。《漢書·武帝紀》“怵於邪說”句顏師古注：“如淳曰：怵音怵惕，見誘怵於邪說也。師古曰：……如說云見誘怵，其義是也，而音怵惕又非也。怵，或體誅字耳。誅者，誘也，音如戌亥之戌。”顏氏認為訓“誘”的“怵”是“誅”的異體，與怵惕之“怵”雖同形而實無關。這是正確的。《廣韻》收“誅”字於入聲術韻辛聿切卹小韻內，《集韻》卹小韻內已將訓“誘”的“怵”作為異體列於“誅”字之下。這個“怵”字的今音應據同小韻的“卹”、“恤”等字定為

xù,《辭海》讀怵惕之“怵”的音是不對的。《辭源》不誤。上引《漢書》顏注說“詠”音如“戌”。這兩個字本來完全同音,《廣韻》把它們都收在卹小韻裏。現在“戌”讀平聲,彼此的聲調就不同了。

(2) 枷 《辭海》“枷”字只出 jiā 一音,義項②釋曰:

衣架。《禮記·曲禮上》:“男女不雜坐,不同櫜枷。”陸德明釋文:“枷,本又作架。”

按:櫜枷之“枷”實即“架”字異體,應讀為 jià,不應讀枷鎖之“枷”和連枷之“枷”的音。《辭源》不誤。《廣韻》去聲禡韻古訝切駕小韻:“架,架屋,亦作枷,《禮記》曰‘不同櫜枷’。”上舉《辭海》“枷”字義項②所引《釋文》,其後原來尚有“徐音稼”一語,“稼”、“架”同音。

(3) 唬 《辭源》“唬”字第一音為 xià,下收兩個義項。義項㊟為“虎吼”。義項㊟釋曰:

哭號。《漢郎中鄭固碑》:“俯哭誰訴,印唬焉告。”(《隸釋》六)

按:當“哭號”講的“唬”實即“號”字異體,應讀為 háo,不應該讀當“虎吼”講的“唬”字的音。《說文·木部》“號”字以聲旁“唬”為“號”之省。《集韻》平聲豪韻乎刀切豪小韻:“號、皋、號、唬,《說文》‘呼也’,或作‘皋’、‘號’、‘唬’。”《漢冀州從事郭君碑》“卜商唬咷”(《隸續》卷十九),亦以“唬”為“號”(參看《隸辨》平聲豪韻)。《辭海》“唬”字下未收此義。

(4) 彙 《辭源》“彙”字只出 huì 一音,義項㊟釋曰:

刺蝟。“蝟”本字。……

按:《說文》以“彙”、“蝟”為一字。古書“彙”字多訓為“類”,是假借義。這兩種意義的“彙”字本來都讀“于貴切”(見《廣韻》去聲未韻于貴切胃小韻),今音應為 wèi。訓“類”的“彙”讀為 huì,是特殊情況。作為“蝟”字異體的“彙”當然不能讀 huì,而仍應讀 wèi。《辭海》不誤。

(5) 矜 《辭源》“矜”字第一音為 jīn,其旁所列《廣韻》反切為“巨巾”、“居陵”二切,下收“矛柄”、“憐憫”等義項。按:“矛柄”為“矜”之本義,其字亦作“矜”。“憐憫”等為“矜”之假借義,其字一般不寫作“矜”。《廣韻》中“矜”(矜)字三見。平聲真韻巨巾切矜小韻:

矜,矛柄也,又鉏耰也,古作“矜”。

欣韻巨斤切勤小韻：

矜，矛柄，古作“矜”。

蒸韻居陵切兢小韻：

矜，本矛柄也，巨巾切，《字樣》借爲矜憐字。

由此可知“巨巾切”、“巨斤切”爲“矜”字本義之音，“居陵切”爲假借義“矜憐”之音。“巨巾”、“巨斤”二切的今音皆爲 qín。“居陵切”的今音本應爲 jīng，但矜憐之“矜”已變音爲 jīn。所以《新華》、《現代》、《辭海》等都給表示本義的“矜”注 qín 音，給表示“憐憫”等義的“矜”注 jīn 音。《辭源》給它們都注 jīn 音是不對的。“巨巾”、“居陵”二切，讀音和所屬之義都不相同，《辭源》把它們都列在 jīn 音之旁也是不妥當的。

(6) 麋 《辭海》“麋”字只出 mí 一音，義項②釋曰：

通“湄”。《詩·小雅·巧言》：“居河之麋。”陸德明釋文：“麋，本又作湄。”陳奐傳疏：“湄本字，麋假借字。”

義項③釋曰：

通“眉”。《荀子·非相》：“伊尹之狀，面無須麋。”

按：“麋”字既已通假爲“湄”和“眉”，就應該讀“湄”和“眉”的音。《辭源》“麋”字條另出 méi 音，下列“通‘湄’”、“通‘眉’”兩個義項，是正確的。從原則上說，在 A 字通假爲 B 字的情況下，如果 A 字原來的讀音跟 B 字不同，必須改讀 B 字的音。有些人不同意這個原則，是沒有道理的（參看盛九疇《通假字小議》，《辭書研究》1980 年 1 期）。不過，“麋”和“湄”、“眉”在古代倒都是同音字。《廣韻》把它們都收在平聲脂韻武悲切眉小韻裏。按漢語語音演變的常規，“武悲切”的普通話今音應爲 méi，“麋”讀 mí 是特殊情況。因此《辭海》把借爲“湄”和“眉”的“麋”字讀爲 mí，就更顯得不合理了。

(7) 又 《辭海》“又”字只出 yòu 一音，義項⑥釋曰：

通“有”。《詩·周頌·臣工》：“亦又何求？”

按：“又”既通假爲“有”，就應該讀爲“有”。《辭源》爲通“有”的“又”字另出 yǒu 音，是正確的。古代“有”、“又”二字可以相互通用。《辭海》把通“又”的“有”讀爲 yòu，但通“有”的“又”却不讀爲 yǒu，未免自相矛盾。

(8) 丞 《辭源》“丞”字只出 chéng 一音，義項③釋曰：

通“拯”。《文選》漢揚子雲(雄)《羽獵賦》：“丞民乎農桑。”注：“《聲類》曰：‘丞亦拯字也。’”

按：“丞”既通假爲“拯”(有的古文字學家認爲“丞”即“拯”之初文)，就應該讀爲“拯”。《集韻》上聲拊(拯)韻拊小韻已將“丞”字作爲異體列於“拊”字之下(《集韻》從《說文》，以“拊”爲“拯”之正體)。《辭海》爲通“拯”的“丞”別出 zhěng 音，是正確的。

(9) 蚤 《辭源》、《辭海》都只給“蚤”字注 zǎo(子皓切)一個音。《辭源》“蚤”字義項①釋曰：

通“爪”。《儀禮·士喪禮》：“蚤揃如他日。”注：“蚤讀爲爪，斷爪揃須也。”

《辭海》“蚤”字也收有通“爪”的義項。按：爪牙、爪甲之“爪”音 zhǎo(側絞切)。“蚤”既通假爲“爪”，就應該讀爲 zhǎo。《辭源》、《辭海》都把通“爪”的“搔”讀爲 zhǎo，但是通“爪”的“蚤”却不讀爲 zhǎo 而仍讀爲 zǎo，這是自相矛盾的。《集韻》上聲巧韻側絞切爪小韻：“叉、蚤、搔，《說文》‘手足甲也’，或作‘蚤’、‘搔’，通作‘爪’。”可見古人確是把當爪甲講的“蚤”讀爲“爪”的。《說文》：“叉，手足甲也。从又，象叉形。”“爪”本象覆手形，當爪甲講也是假借用法。所以《集韻》以“叉”爲爪甲之“爪”的本字。

(10) 介 《辭源》、《辭海》都只給“介”字注 jiè 一個音。《辭海》“介”字義項⑬釋曰：

通“个”。《書·秦誓》：“如有一介臣。”《禮記·大學》作“若有一个臣”。

《辭源》“介”字也收有通“箇”(个)的義項。按：《釋文》注《書·秦誓》“一介臣”的“介”字說：“介，音界。馬本作‘介’，云‘一介，耿介心端慤者’。字又作‘个’，音工佐反。”《集韻》去聲箇韻居賀切箇小韻：“箇、个、介，《說文》‘竹枚也’，或作‘个’、‘介’，通作‘個’。”“居賀”、“工佐”二切同音，今音爲 gè。由此可知，“一介臣”之“介”如當耿介講應讀爲 jiè，如認爲通“个”就應讀爲“个”(gè)。兩音兩義，各有所當。一方面說“介”通“个”，一方面又仍然把它讀爲 jiè，是不妥當的。現在還在書面語裏使用的“一介書生”的“介”，一般都讀爲 jiè，在古代是否也有兩音兩義。待考。

(11) 橫 《辭源》“橫”字第一音爲 héng,義項㊟釋曰:

學舍。通“鬻”。見“橫舍”、“橫塾”。

《辭海》“橫”字 héng 音下也收有通“鬻”的義項。按:“橫”和“鬻”在古代本是同音字,《廣韻》把它們都收在平聲庚韻戶盲切橫小韻裏。但是現在這兩個字的讀音已經變得不同了。通“鬻”的“橫”自然應該改讀爲“鬻”(hóng),不應仍讀 héng 音。這跟前面指出的通“眉”的“麋”應讀爲 méi 而不應讀爲 mí 的情況相同。

(12) 錫 《辭源》“錫”字第一音爲 xī,義項㊟釋曰:

細布:同“錫”。《儀禮·燕禮》:“罍用綌若錫。”注:“今文‘錫’作‘錫’。……”。

《辭海》“錫”字 xī 音下也有通“錫”的義項。按:“錫”和“錫”本是同音的入聲字,《廣韻》把它們都收在錫韻先擊切錫小韻裏。現在“錫”字讀陰平(《國音》、《漢語》讀陽平),“錫”字在口語裏已經不用,《國音》、《漢語》、《辭源》、《辭海》等都給它注 xì 音。按照這種注音,通“錫”的“錫”就應該改讀爲 xì 而不應仍讀爲 xī。不過,《廣韻》錫小韻裏現在尚在使用的“析”、“蜥”、“浙”、“皙”、“惕”等字都讀陰平,“錫”字的讀音其實也未嘗不可以改定爲 xī。這樣,通“錫”的“錫”也就不存在改讀的問題了。

(13) 茶 《辭源》“茶”字第一音爲 tú,義項㊟釋曰:

茶。茶古字本作“荼”。《爾雅·釋木》:“檟,苦茶。”參看“茶”。

《辭海》則爲作爲“茶”字古體的“荼”另出 chá 音。我們認爲《辭海》是正確的。《釋文》注《爾雅·釋木》“檟,苦茶”條的“茶”字說:“茶,音徒,下同。《埤蒼》作‘檟’”。這可能就是《辭源》讀 tú 的根據。但是《釋文》接着就說:“案今蜀人以作飲,音直加反,茗之類。”“直加反”就是“荼”(chá)的音了。《廣韻》平聲麻韻宅加切(音同直加切)荼小韻裏既有“荼”字也有“茶”字。“茶”字下注“苦菜”,“茶”列爲“檟”的俗體。《集韻》直加切秬小韻:“荼、檟、茶,茗也,一曰葭茶,或从‘木’,亦省。”明確指出當“茗”講的“茶”讀爲“直加切”(chá),“茶”就是省“荼”而成的。

我們並不否認在較早的時候,作爲“茶”的古體的“荼”有可能跟當苦菜講的“荼”一樣,也是讀“同都切”(tú)的。但是既然至遲在唐代,一般都已經把它讀爲“直加切”,我們在今天就沒有理由不給它注 chá 音了。

2. 未注應注的又音

(14) 𤯂 《辭源》“𤯂”字第一音爲 tuō, 旁列“託何”、“他干”二切。義項○釋曰:

馬病。見《說文》。後稱疲極曰𤯂。《全唐詩》六一〇皮日休《上真觀》:
“襪袂風聲𤯂, 跣跣地力𤯂。”

按: tuō 爲“託何切”的今音, “他干切”的今音應爲 tān。唐人用“𤯂”字多讀“他干切”, 《辭源》所引皮日休詩就是一個例子(《全唐詩》此詩“𤯂”字下注“音灘”二字)。《辭源》只給“𤯂”字注 tuō 音而不注 tān 音, 是不妥當的。又《廣韻》託何切的“𤯂”字有“馬病”、“力極”二義, 他干切的“𤯂”字只有“力極”一義。據此, “馬病”和“力極”實應分爲兩個義項, 前者只注 tuō 一音, 後者則注 tuō、tān 二音。

(15) 窳 《辭源》“窳”字第一音爲 jiào, 旁列“匹兒”、“居效”二切(後一切見《集韻》)。義項○釋曰:

地窖。《周禮·考工記·匠人》:“囷、窳、倉、城, 逆牆六分。”注:“穿地曰窳。”《荀子·榮辱》:“餘刀布, 有囷窳, 然而衣不敢有絲帛。”注:“窳, 窖也。”

《辭海》“窳”字只注 jiào 一音。按: jiào 爲“居效切”之今音。《集韻》去聲效韻居效切教小韻:“窖、窳, 《說文》‘地藏也’, 或作‘窳’。”《釋文》注《考工記·匠人》說:“窳, 劉古孝反(引者按: 音同居效切), 依字當爲‘窖’, 作‘窳’, 假借也。”由此可知, 古人是把讀“居效切”的“窳”看作“窖”的異體字或假借字的。從“窳”和“窖”的聲旁來看, 它們本來應該是不同音的兩個字。《說文·穴部》:“窳, 窖也。从穴, 卯聲。”又:“窖, 地藏也。从穴, 告聲。”把它們當作兩個同義字。《辭源》“窳”字所引《荀子注》釋“窳”爲“窖”, 大概也是把它們看作同義字的。這種“窳”字顯然不能讀“居效切”, 而應該讀“匹兒切”, 今音爲 pào。《辭源》、《辭海》只給“窳”字注 jiào 音而不注 pào 音, 是不妥當的。嚴格說起來, 讀 jiào 的“窳”跟讀 pào 的“窳”雖然同義, 但並不代表同一個詞, 應該當作兩個義項來處理。讀 pào 的“窳”是“窖”的同義字, 讀 jiào 的“窳”是“窖”的通用字。

(16) 𤯂 《辭源》“𤯂”字只出 chuò 一音, 旁列“丑略”、“呵各”二切。按:《新華》、《現代》都根據現代方言給“𤯂”注 hē 音。這個音出自“呵各切”。《辭源》只注出“丑略切”的今音而不注出“呵各切”的今音, 是不妥當的。《辭海》“𤯂”字注 hē、ruò 二音比較合理(ruò 音是《集韻》入聲藥韻“日灼切”的今音)。

(17) 亢 《辭源》把“亢”字的“星名”這一義項收在 gāng 音之下。按: 當星名講的“亢”在古代有數種讀音。《釋文》注《爾雅·釋天》當星名講的“亢”字說:

“音剛，又口浪反，或戶剛反。”《康熙字典》、舊《辭源》、《國音》、《漢語》、《現代》和《辭海》等，都只給當星名講的“亢”注相當於“口浪切”(kàng)的音。這顯然反映了長期以來一般知識分子的讀音習慣。《辭源》只取 gāng 音而不取 kàng 音，是不妥當的。

《辭海》說當喉嚨講的“亢”通“吭”。但是“吭”的喉嚨一義注 háng 音，“亢”的喉嚨一義則只注 gāng 音，這也是不妥當的。《集韻》平聲唐韻寒剛切吭小韻以“亢”爲“吭”的異體。“寒剛切”的今音即 háng。既說“亢”通“吭”，就應該給它加注 háng 音。

(18) 綱 《辭海》“量”字第一音爲 liàng，義項⑤釋曰：

通“綱”。雙。《晉書·阮孚傳》：“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

但是“綱”字下只注 liǎng 一音。這也是不妥當的。“綱”是當“雙”(指鞋)講的“兩”的後起分化字，讀音本有上聲、去聲兩種。《詩·齊風·南山》“葛屨五兩”句《釋文》：“兩，王肅如字，沈音亮。”《廣韻》上聲養韻良獎切兩小韻、去聲漾韻力讓切亮小韻都有“綱”字，義同。《康熙字典》、舊《辭源》、舊《辭海》中的“綱”字，也都注上聲、去聲二音。跟“量”相通的“綱”顯然是讀去聲的。《辭海》既指出“量”通“綱”，就應該在“綱”字下加注 liàng 音。《辭源》也只給“綱”注 liǎng 音，而且把通“綱”的“量”也讀爲 liǎng。這樣做，避免了通用字讀音不同的矛盾，可是却違背了語言事實。顏師古《匡謬正俗》卷七：“或問曰：今人呼履、舄、屐、屨之屬一具爲一量，於義何耶？答曰：字當作兩。《詩》云‘葛屨五兩’者，相偶之名。屨之屬二乃成具，故謂之兩。兩音轉變，故爲量耳。”這最後一句話可以證明通“綱”的“量”確實不是讀“兩”的本音而是讀去聲的。

(19) 麕 《辭源》說當幼鹿講的“麕”同“麕”。但“麕”注 mí 音，“麕”注 ní 音，無從相“同”。《集韻》平聲齊韻綿批切迷小韻：“麕、麕……，《說文》‘鹿子也’，或从兒……”。《辭源》既說“麕”同“麕”，就應該給“麕”加注 mí 音。《辭海》正是這樣做的。

(20) 坩 《辭源》據《廣韻》指出當塵土講的“坩”同“坩”。但“坩”注 bèn 音，“坩”注 fèn 音，無從相“同”。《廣韻》去聲恩韻蒲悶切(bèn)坩小韻：“坩，塵也，亦作坩。”《辭源》既指出“坩”同“坩”，就應該給“坩”字的塵土一義加注 bèn 音。

(21) 抓 《辭源》“抓”字注 zhāo、zhuā 二音，旁列“側交”(平聲肴韻)、“側

絞”(上聲巧韻)、“側教”(去聲效韻)三切。“爪”字注 zhǎo(側絞切)一音,義項①釋曰:

覆手持取,見《說文》。爪,俗字作“抓”。

按:“抓”在古代有與“爪”同音的“側絞切”一讀,《辭源》已列出。既說“抓”就是“爪”的俗字,給“抓”字注音的時候就應該注出跟“側絞切”相應的 zhǎo 音。《辭源》在“抓”字的第二義項之末說“㊀㊀兩義古俱讀 zhāo”,“古俱讀 zhāo”可以改爲“本讀 zhāo、zhǎo 等音”。

(22) 螯、蝨 《辭源》說“蚌賊”同“螯賊”,又說螯賊之“螯”同“蝨”,這是對的。但“螯”、“蝨”二字只注 máo 音,“蚌”字只注 móu 音,這就不合理了。“螯”、“蚌”既不同音,“蚌賊”怎麼能同“螯賊”呢?《廣韻》把螯賊之“螯”收在平聲尤韻莫浮切謀小韻裏,同小韻有“蚌”字,注曰:“蝓蚌,似蟹而大。”在《集韻》中,“莫浮切”作“迷浮切”,屬侯韻,所收“螯”字下注明“亦作‘蝨’”,“通作‘蚌’”。“莫浮切”的今音應爲 móu,現在“螯”被讀爲 máo,情況跟同小韻的“矛”字相同(《辭源》“螯”字 máo 音之旁列“莫交”、“莫浮”二切。前者是斑螯之“螯”的音,實與螯賊之“螯”無涉)。《辭源》既不把蚌賊之“蚌”讀爲 móu,就應該像《辭海》那樣給“螯”字注 máo、móu 二音。“蝨”字也可以這樣注音。

(23) 徘徊 《辭源》“裴”字第一音爲 péi,義項①釋曰:

通“徘徊”,見“裴回”。

但“徘徊”字下只注 pái 音。按:“裴”和徘徊的“徘徊”本是同音字,《廣韻》都收在平聲薄回切裴小韻裏。“薄回切”的今音應爲 péi。“徘徊”的“徘徊”現在讀 pái,是比較特殊的情況。《辭源》既不把裴回的“裴”讀爲 pái,就應該像《辭海》那樣給“徘徊”字加注 péi 音。

(24) 呵 《辭海》“哈”字第一音爲 hā,義項①釋曰:

通“呵”,張口呼氣。如:哈一口氣。

“呵”字下跟“張口呼氣”相當的義項是“吹氣使溫”,只注 hē 一音。按:《國音》“呵”字下注明“噓氣使暖”一義有口語音 hā。《辭海》既說當張口呼氣講的“哈”通“呵”,就應該注出“呵”字的這個音。既然不注這個音,就只能說“哈”表示“呵”的口語音,而不應說“哈”通“呵”。因爲讀 hē 的“呵”跟讀 hā 的“哈”,雖然意義相同,也還是不能相通的。附帶說一下,《辭海》把“呵腰”的“呵”讀爲 hā,這個“呵”

跟“哈腰”的“哈”的通用關係，非常明顯，《辭海》却反而不加指出，這也是不妥當的。又：當笑聲講的“哈哈”，大概也是表示“呵呵”的口語音的。

在這一小節的末尾，簡單提一下《辭源》有時不注出跟傳統讀音不合的現代讀音的問題。《辭源》在遇到一個字的現代讀音跟傳統讀音不合的情況的時候，或採用現代讀音，或採用由傳統讀音折合的今音，並無嚴格的規律。如果採用傳統讀音，有時在釋義時附帶指明現代讀音。例如：“風”字的諷勸義收在 fèng 音之下，釋義時說明“今音 fěng”。“汰”字的淘汰義收在 dài 音之下，釋義時說明“此義今讀 tài”。有時則完全不管現代讀音。例如：口吃的“吃”(chī)只注 jí 音(《新華》、《辭海》皆作 jī)，土著的“著”(zhù)只注 zhuó 音(見“著”字條)，裨益的“裨”(bì)只注 bēi 音，儂相的“儂”(bīn)只注 bìn 音，婀娜的“婀”(ē)只注 ě 音，“娜”(nuó)只注 nuǒ 音。《辭源》不注輕音。因此現在讀輕音的字，《辭源》都不注現代讀音。例如：苜蓿的“蓿”注 sù 不注“·xu”，助詞“了”注 le 不注“·le”。後者的 le 音未注反切，恐怕沒有什麼根據。《辭源》主要為閱讀古書服務，理應較多地照顧傳統讀音。但是跟傳統讀音不合的現代讀音，最好還是注出來，因為使用這部詞典的畢竟是現代人。

不注現代讀音的問題，在《辭海》裏也不是沒有。例如上面舉過的“儂”字，《辭海》也是只注去聲一音的。有些輕聲字，《辭海》也沒有注為輕聲。例如上面舉過的“蓿”字，《辭海》的注音就是“xù，舊讀 sù”。“蓿”的 xù 音恐怕跟《辭源》給“了”注的“le”音一樣，是從它們的輕聲讀音反推出來的。

3. 反切折合今音方面的問題

(25) 會 《辭海》“會”字第二音為 kuài，下收兩個義項：

①總計。見“會計”、“要會”。②姓。漢代有會栩。

第三音為 guì，下收一個義項：

蓋子。《儀禮·士虞禮》：“命佐食啓會。”鄭玄注：“會，合也，謂敦蓋也。”

又詞條“會稽”的“會”也注 guì 音。按：《辭海》給“會”字注的 kuài、guì 二音，中古的反切都是“古外切”(參看《辭源》“會”字條)。古外切的今音按理應為 guì。但是《廣韻》去聲泰韻古外切會小韻所收的字，凡是現在尚在使用的，普通話絕大部分都讀 kuài，如“會”、“膾”、“獐”、“鄣”、“澮”等。只有“檜”和“劊”讀 guì(《國音》、《漢語》都給“檜”、“劊”注 kuài、guì 二音。《古今字音對照手冊》中，“檜”音 kuài，“劊”有 guì、kuài 二音)。會稽的“會”和當蓋子講的“會”，既然本來跟會計的

“會”一樣也讀“古外切”，現在完全可以跟會計的“會”一樣也讀為 kuài。《辭源》就是這樣處理的。在有些方言裏，會稽的“會”讀 guì，但會計的“會”也讀 guì。可見把它們分讀兩音是沒有必要的。附帶說一下，用作姓氏的“會”，《廣韻》讀“黃外切”（去聲泰韻黃外切會小韻：“會，合也，……又姓，漢有會栩。”），《康熙字典》則讀“古外切”。《辭源》據《廣韻》讀 huì，似較《辭海》讀 kuài 為妥。

(26) 仄 《辭源》給本讀“阻力切”的“仄”字注 zé 音。按：“仄”是莊母入聲字。入聲消失後，莊母入聲字多數讀陽平，但是“仄”字却是讀去聲的。《國音》、《漢語》、《新華》、《現代》、《辭海》等都給“仄”注 zè 音。《辭源》讀為 zé 是不妥當的。附帶說一下，“仄”和“側”本來都讀“阻力切”，現在“側”讀為 cè，跟“仄”已不同音。《辭源》為通“仄”和“𠂔”的“側”字別出 zè 音，但是却沒有為通“側”的“仄”字別出 cè 音，不免自相矛盾。

(27) 𠂔 《辭源》給“𠂔”字注 jù、xù 二音，跟前者相應的反切是入聲錫韻“古闕切”。按：入聲消失後，入聲字的聲調變化沒有很嚴格的規律。因此，為口語中不用入聲字今音定聲調，往往會遇到困難。“𠂔”也是口語中不用的字，不過為這個字定聲調倒還不能算困難。“𠂔”的聲母屬見母，見母入聲字的聲調以變為陽平者居多。《廣韻》收入古闕切鄭小韻的字如“𠂔”、“𠂔”和“𠂔”，現代的字典、詞典都注 jú 音，《辭源》也不例外。跟這些字同反切的“𠂔”字，當然也應該讀為 jú。《中文》也收入“𠂔”字，其讀音正是注為 jú 的。《辭源》注為 jù，缺乏理由。“𠂔”的反切下字“闕”，現在讀去聲。但“闕”的聲母屬溪母，見母和溪母的入聲字，聲調變化的情況並不一致。我們不能根據“闕”字今音的聲調來決定“𠂔”字今音的聲調。

(28) 𠂔 此字《辭海》音 wàn。按：據《廣韻》，“𠂔”字音“亡范切”，是微母上聲字。微母上聲字今音仍讀上聲，此字應從《辭源》音 wǎn。“𠂔”的反切下字“范”是全濁聲母上聲字，由於“濁上變去”，今音為去聲。我們不能根據“范”字今音的聲調來決定“𠂔”字今音的聲調。

(29) 𠂔 《辭源》給本讀“符容切”的“𠂔”字注 fēng 音。按：“𠂔”是濁聲母平聲字，應讀陽平。《國音》、《辭海》等注為 féng，可從。

(30) 𠂔 《辭源》給本讀“而證切”的“𠂔”注 rèn 音。按：“而證切”的今音應為 rèng，《中文》不誤。《廣韻》去聲證韻而證切小韻的第一個字是“認”。“認”字有“而證”、“而振”兩音（後一音見《廣韻》去聲震韻而振切刃小韻）。它的今音 rèn 是出自“而振切”的。不能因為而證切小韻有“認”字，就把“而證切”的今音也定為 rèn。《辭海》“𠂔”字讀 réng，當是取《集韻》平聲蒸韻如蒸切之音。這也是可以的。

4. 其他方面的問題

(31) 萑 《辭海》“萑”字第二音爲 tuī, 釋曰:

通“葑”。藥草名。即茺蔚。

按:《爾雅·釋草》以“葑”釋“萑”。二字音近義同,所代表的詞當有同源關係,但既已分化,就不能再混爲一談了。《辭源》據《廣韻》給當茺蔚講的“萑”字注 zhuī 音,是正確的。《辭海》認爲“萑”通“葑”,不取 zhuī 音,而取“葑”的 tuī 音,是錯誤的。

(32) 行 《辭源》把“行”字的道路一義收在 háng 音之下,跟行列之“行”同音。按:當道路講的“行”本與行走之“行”同音,所以《經典釋文》經常爲行列之“行”注音,却從不爲當道路講的“行”字注音。《康熙字典》、舊《辭源》、舊《辭海》、《國音》、《漢語》、《現代》等字典、詞典,都給當道路講的“行”和行走的“行”注一個音。但是有些人由於感到“行”字的道路之義跟行走之義的關係不如跟行列之義的關係密切,誤把當道路講的“行”跟行列的“行”讀成了一個音。《辭源》的注音就是由此而來的。《辭海》給“行”字道路一義注的音是:“xíng, 又讀 háng”。“又讀 háng”可刪。

(33) 邢 《辭源》、《辭海》都給“邢”字出 gěng 音,《辭海》釋曰:

古地名。亦作耿。《史記·殷本紀》:“祖乙遷于邢。”在今河南溫縣東。一說在今山西河津。

按:《史記》謂祖乙遷於邢,《尚書序》則謂祖乙遷於耿。舊說讀“邢”爲“耿”,認爲故地在今山西河津縣。近人王國維則認爲祖乙所遷之邢,應即位於今河南溫縣的邢丘(見《觀堂集林》卷十二《說耿》)。《辭源》取舊說,給“邢”注 gěng 音是合理的。邢丘之“邢”無“耿”音。《辭海》既取王說,就不應再給“邢”字另出 gěng 音了(但可在介紹“一說”時指出舊音“耿”)。

(34) 榦、幹 《辭源》“榦”字只出 gàn 一音,義項④釋曰:

欄。《莊子·秋水》:“吾樂與?吾跳梁乎井榦之上。”《釋文》:“司馬(彪)云:井欄也。”

同書“幹”字義項⑥音 hán, 釋曰:

井上木欄,通“韓”。《莊子·秋水》:“出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

按：“榦”和“幹”是異體字，《辭源》“榦”、“幹”二字下所引《莊子·秋水》“井榦（幹）”句，也是同一個句子。但是引用時不但對前後文字的取舍有所不同，連所據的本子也不一樣（“跳梁”上一字一爲“吾”一爲“出”，“井”下一字一作“榦”一作“幹”）。這實在太不審慎了。更不應該的是同一個當井欄講的“榦”（幹）字，一處音 gàn，一處音 hán，叫人無所適從。這兩個音本來都是有根據的。《釋文》注《莊子·秋水》“井榦”的“幹”字說：“古旦反，司馬云井欄也。諸詮之音《西京賦》作韓音。”《集韻》去聲翰韻居案切軌小韻：“榦……一曰井欄承輓轡者。”平聲寒韻河干切寒小韻：“韓、韓、榦、幹，《說文》‘井垣也’……”。“古旦反”、“居案切”相當於 gàn，“韓音”、“河干切”相當於 hán。可是在一部詞典之內，忽而音 gàn，忽而音 hán，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國音》、《漢語》、《辭海》等都只取 hán 音。從井榦（幹）之“榦”（幹）也作“韓”來看，取 hán 音是比較合理的。

二、詞條注音的問題

詞條注音的問題不大容易分類，所以這一節就不再分小節了。下面對有問題的一些注音逐個進行討論。

(35) 荇蓂 蓂莢之“蓂”音 míng，荇蓂之“蓂”音 mì（參看《辭源》）。《辭海》“荇”字下有“荇蓂”一條，“蓂”字未注音，而“蓂”字下又只收蓂莢之“蓂”的音義，這樣會使人誤以爲荇蓂之“蓂”也讀 míng。

(36) 朱提 《漢書·地理志上》犍爲郡“朱提”下顏注引蘇林曰：“朱音銖，提音時。”《集韻》把朱提之“朱”收在虞韻慵朱切殊小韻裏（“銖”字古與“殊”同音，也收在殊小韻裏。慵朱切相當於《廣韻》的市朱切），朱提之“提”收在之韻市之切時小韻裏。《辭海》給“朱提”注 shú shí 二音，是正確的。“殊”是濁聲母字，按理應讀陽平。所以雖然“殊”的今音是 shū，《辭海》却把朱提的“朱”讀爲 shú。不過這個字其實也未嘗不可以就讀爲 shū（殊小韻的“殳”現在一般也讀爲 shū）。《辭源》可能是由於沒有注意到蘇林用來注音的“銖”字的古音同“殊”，仍然用一般的“朱”字的音來讀朱提的“朱”，這是不妥當的。朱提的“提”應該讀什麼音，《辭源》也沒有交代（《辭源》“提”字有 shí 音，出自“是支切”，與朱提之“提”無關）。

(37) 枳首 《爾雅·釋地》有“枳首蛇”，以一身有二首而得名，“枳”當讀爲“歧”（qí）或“枝”（zhī）。《集韻》把它兼收在支韻翹移切祗小韻和章移切支小韻裏（參看《中文》）。從近年出土的秦漢簡帛文字來看，讀“歧”或“枝”的

“枳”其實就是“枝”的異體(“枝”字古代也有“歧”音),就跟“肢”是“肢”的異體一樣。這個“枳”跟枳樹之“枳”(zhǐ)形同而實不同。《辭源》“枳”字下有“枳首蛇”條,但“枳”字只注 zhǐ 一音,顯然把枳首之“枳”也讀為 zhǐ 了。《辭海》無“枳首蛇”條。

(38) 侯官 福建的侯官縣因漢代在此置有侯官而得名(侯官是以侯為首長的負責斥候等事的一種機構)。“侯本作候,清以後通作‘侯’”(見《辭海》“侯官”條)。這個“侯”字應讀為“候”(hòu)。1912年,侯官縣與閩縣合併為閩侯縣。閩侯之“侯”現在仍讀為 hòu。《辭源》“侯”字下有“侯官”條,但“侯”字只注 hóu 一音,顯然把侯官之“侯”也讀為 hóu 了。《辭海》“侯”字出 hòu 音,注曰“見閩侯”。但“侯官”條“侯”字不注音,只能理解為讀作 hóu。“閩侯”條的“侯”字也沒有注音。

(39) 蜚鴻 “蜚”的本義是一種發臭的小飛蟲,音 fěi。《山海經·東山經》提到一種名“蜚”的怪獸,“蜚”也音 fěi。古書中常常借“蜚”為“飛”,這種“蜚”字音 fěi。“蜚鴻”的“蜚”,一般都讀為 fěi。但是《辭海》“蜚鴻”條義項①却音“蜚”為 fēi,釋曰:

害蟲名。《史記·周本紀》:“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司馬貞《索隱》引高誘曰:“蜚鴻,蟻蠊也。言飛蟲蔽田滿野,故為災,非是鴻雁也。”

揣其意,蓋以“蜚”為蟲名,所以讀上聲。但是《辭海》引為根據的《史記索隱》雖然認為蜚鴻不是鴻雁而是飛蟲,却並沒有說“蜚”不應讀為“飛”。《索隱》原文此下尚有“隨巢子作‘飛拾’,飛拾,蟲也”一句。《史記正義》反駁《索隱》說:“此云‘蜚鴻滿野’,《淮南子》(本經篇)云‘飛蛩滿野’,高誘注云:‘蛩,蟬、蟻蠊之屬也。’按飛鴻、拾、蛩,則鳥、蟲各別,亦須隨文解之,不得引高誘解此也。”可見《索隱》之說並非定論。而且《索隱》既然認為飛拾、飛蛩、蜚鴻都是飛蟲,無疑也是把蜚鴻的“蜚”讀為“飛”的。《辭海》把“蜚”讀為 fěi,毫無根據。《辭源》不誤。

(40) 蜚雲 《辭源》“蜚”字以 fěi 為第一音, fēi 為第二音。“蜚雲”條解釋為浮雲,但“蜚”字後不標數碼“2”,表示仍讀第一音 fěi。按:“蜚雲”既指浮雲,“蜚”就應該讀為“飛”(fēi),讀為 fěi 無義。《中文》謂“蜚雲”即“飛雲”是正確的。

(41) 蜚遽 《辭源》把“蜚遽”的“蜚”也讀為 fěi。按:蜚遽是司馬相如《上林賦》裏提到的一種神獸。《漢書·司馬相如傳》顏注引張揖曰:“飛遽,天上神獸也,鹿頭而龍身。”“蜚”作“飛”。《辭源》“飛”字下“飛遽”條,也指出“飛遽”即“蜚

遽”。這個“蜚”字顯然也應該讀爲 fēi。《辭源》大概是由於看到《山海經·東山經》裏當獸名講的“蜚”讀 fěi，所以把神獸名蜚遽的“蜚”也讀爲 fěi 的。其實，蜚和蜚遽是兩種不同的獸，沒有必要把兩個“蜚”字讀成一個音。

(42) 蜚廉 “蜚廉”亦作“飛廉”，是古代傳說中的神獸名，又是古代的神名和人名。《辭海》把作人名用的“蜚廉”的“蜚”讀爲 fēi，作獸名用的“蜚廉”的“蜚”讀爲 fěi。其實後者同樣應該讀爲 fēi。《辭海》致誤的原因，跟《辭源》把蜚遽之“蜚”誤讀爲 fěi 的原因大概是相同的。《辭源》把用作獸名、神名和人名的“蜚廉”之“蜚”，全都讀爲 fěi，比《辭海》錯得更厲害。《辭源》已經指出“蜚廉”亦作“飛廉”（參看“飛廉”條），可是又把二者讀成不同的音，這是自相矛盾的。

(43) 於越 《辭海》給“於越”的“於”注 wū 音。按：“於越”的“於”一般都讀“於”字“央居切”的音，不讀“烏”音。《經典釋文》常常給讀“烏”的“於”字注音，但是見於《春秋》的“於越”的“於”却不注音。一般的字典、詞典也都沒有把“於越”的“於”讀爲“烏”。《辭海》的注音不知有什麼根據。“央居切”折合今音應爲 yū，但是本讀“央居切”的介詞“於”現在却是讀爲 yú 的。“於越”的“於”究竟應該讀 yū 還是讀 yú，倒是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作姓氏用的“於”，《新華》、《現代》、《辭海》讀 yū，《國音》、《漢語》、《辭源》讀 yú）。

(44) 渾渾 《辭源》“渾渾”條有三個義項，“渾”都讀爲 hún。義項③釋曰：

水流奔涌貌。同“滾滾”。《荀子·富國》：“……財貨渾渾如泉源……”

注：“渾渾，水流貌。……渾，戶本反。”

按：《集韻》上聲混韻古本切衮小韻：“滾、混、渾，大水流貌，或作混、渾。”既認爲“渾渾”同“滾滾”，就應該把它讀爲 gǔn gǔn，《辭海》正是這樣做的。如取《荀子注》“戶本反”之音，則應讀爲 hùn。總之，讀 hún 是缺乏根據的。“渾渾”的其他兩個義項，《辭源》讀 hún hún，《辭海》讀 hún hùn。由於“渾”字平聲、去聲（本讀上聲）二讀的意義不易分清，很難定其是非，有待研究。

(45) 渾元 “渾元”的“渾”，《辭源》讀平聲，《辭海》讀去聲。按：《廣韻》上聲混韻胡本切混小韻：“渾，渾元。”這個“渾”是全濁聲母上聲字，今音變讀去聲。可見《辭海》的注音較《辭源》有據。附帶說一下，“渾一”、“渾沌”的“渾”（亦作“混”），《辭源》也讀平聲，《辭海》也讀去聲，恐怕也應該從《辭海》。

(46) 閒氣 《春秋演孔圖》：“正氣爲帝，閒氣爲臣。”“閒氣”之“閒”，《辭源》讀平聲，《辭海》讀去聲。按：“閒氣”跟“正氣”相對。跟“正色”相對的“閒色”之

“閒”讀去聲，“閒氣”之“閒”也以讀去聲爲宜。

(47) 諒陰 《辭海》讀“諒陰”爲 liáng ān, 釋曰：

亦作“諒闇”、“梁闇”、“亮陰”。指帝王居喪。《論語·憲問》：“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一說“諒陰”是凶廬，即守喪之處。見劉寶楠《論語正義》引鄭玄注。

“諒闇”、“梁闇”、“亮陰”等條注音皆同。按：“諒闇”的解釋主要有兩種。一種爲僞古文《尚書》孔傳之說（以下簡稱孔說）。《說命》、《無逸》孔傳皆釋“亮陰”爲“信默”。一種本爲《尚書》今文家說，鄭玄主之（以下簡稱鄭說）。《尚書大傳·毋逸》：“《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倚廬，三年不言。’”《禮記·喪服四制》引《書》“高宗諒闇，三年不言”，鄭玄注：“‘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鷃之‘鷃’。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這兩種說法的讀音是不同的。依孔說當讀 liàng yīn，依鄭說當讀 liáng ān，《喪服四制》的《釋文》說得很清楚。在“諒陰”、“亮陰”、“涼闇”、“梁闇”這些寫法裏（古書裏還有“亮闇”、“諒闇”、“涼陰”等寫法），除“梁闇”這種寫法只能用鄭說的讀音外，其他幾種寫法都可以有兩種讀法。《集韻》平聲侵韻於金切音小韻：“闇，默也，何休曰‘高宗諒闇’。”可見如用孔說，下一字即使寫作“闇”，也要讀 yīn。“諒陰”的解釋，過去多從孔說，《經典釋文》就是一個例子（看《禮記·喪服四制》的《釋文》）。《釋文》沒有給《尚書》的《說命》和《無逸》中的“亮陰”出音，就是由於按照孔說這兩個字的音“如字”。《辭海》既然只把鄭說當作次要的“一說”，“諒陰”的讀音當然仍應從孔說注爲 liàng yīn，而不應像現在這樣從鄭說注爲 liáng ān，不過在提到鄭說時可以附帶指出這種讀音（“梁闇”一條的注音和解釋應另作處理）。《辭源》“闇”字第三音爲 ān，所屬義項④釋曰：“治喪之廬。見‘諒闇’。”“陰”字第二音爲 ān，所屬義項④釋曰：“默。《書·說命》上：‘王宅憂，亮陰三祀。’注：‘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年不言。’一說通‘闇’，爲居喪之廬。……”。按：“亮陰”之“陰”只有在解釋爲“廬”的時候才讀 ān。《辭源》一方面主要採用以“默”釋“陰”的孔說，一方面却不把“陰”讀爲 yīn 而讀爲 ān，這是自相矛盾的。而且《辭源》在把“諒闇”的“闇”和“亮陰”的“陰”讀爲 ān 的同時，並沒有把“諒”和“亮”讀爲 liáng。這樣，“諒闇”、“亮陰”等就被讀成了 liàng ān，上一字的音從孔說，下一字的音從鄭說，這顯然是不妥當的。

(48) 趣舍 《辭海》讀“趣舍”爲 qū shě, 釋曰：

亦作“取舍”、“趨舍”。趨向或舍棄；進取或退止。……

“趨舍”條的注音同“趣舍”。“取舍”條分兩個義項。義項①讀 qǔ shě，釋曰：“採取和舍棄；選擇。……”。義項②讀 qū shè，釋曰：“同‘趣舍’。猶言行止。《漢書·王吉傳》……顏師古注：‘……取，進趣也；舍，止息也。’……”。按：《辭海》認為“趣舍”、“趨舍”跟“取舍”相通，但是“趣舍”和“趨舍”的讀音却跟“取舍”的兩個義項的讀音都不完全相同，上字的讀音跟“取舍①”不同，下字的讀音跟“取舍②”不同，這顯然是不合理的。其實，《辭海》“取舍”條在義項②下注明“同‘趣舍’”，義項①下則不注“同‘趣舍’”，是對的。至少就多數情況來看，這樣處理是合理的。“取舍①”的“取”，用的是本義，取跟舍（捨）棄，意義相對。“取舍②”的“取”通“趣”（趨），趣跟舍止，意義相對。“趣（趨）舍”應該跟“取舍②”一樣，讀為 qū shè（《莊子·天地》“趣舍滑心”的“趣舍”，很多人認為應該讀為“取舍①”，但這種情況很少見）。《辭源》雙音詞條一般不注第二字的讀音，但從“趣舍”條的釋義“趣向或舍棄”來看，編者大概也是把舍讀為 shě 的。

（49）辨護 《辭源》“辨”字下所收詞條裏有兩條“辨護”。第一條釋為“照管”，“辨”讀本音（biàn）。第二條釋為“照顧，維護”，“辨”讀為 bàn。按：“辨護”的這兩種意義並無多大區別，實在看不出分讀兩音有什麼道理。《公羊傳·宣公十五年》注文有“辯護”之語，《校勘記》說：“‘辯’當作‘辨’。‘辨’即今人所用之‘辨’字。辨護謂能幹辦護衛也。”《辭源》的兩條“辨護”似可併為一條，“辨”讀為“辨”（bàn）。

（50）漸漬 《辭源》“漸”字有 jiàn、chán、jiān、qián 四音。“漸”字下所收詞條“漸漬”的“漸”，顯然應該讀第三音。但是這個字後所注的，却是表示第二音的“2”。這無疑是筆誤或排印的錯誤，是《辭源》校勘工作不夠細緻的一個例子。《辭源》所注反切之後標出的韻目、聲調和聲紐，屢有明顯錯誤（參看下文所引唐文 474 頁。我們也發現了幾例，如“斲”字音“側角切”，應屬覺韻而標為藥韻；“綢”字音“直由切”，聲紐應為“澄”而誤標為“泥”；“讜”音“多朗切”，應為上聲而標為去聲；“咬”音“古肴切”，應為平聲而標為上聲）。“呵”字條甚至把義項㊟之前所列的“呼箇切”的聲紐“曉”誤植為“箇”。漢語拼音的注音也有一些技術性錯誤，如“械”字的注音作 húō，竟給一個字音標了兩個調號。如果校勘工作能做得細緻一些，這類錯誤是可以避免的。

《辭源》在注反切方面也有一些問題。唐作藩同志在發表於《中國語文》1984 年 6 期上的《〈辭源〉（修訂本）注音疑誤舉例》裏，已經舉了不少例子，可以參閱。

我們也搜集了一些這方面的例子，準備另寫一篇文章加以討論。

1985年6月29日寫畢

原載《北京大學學報(社科版)》1985年5期，又載《古代文史研究新探》，
今據後者收入。

《辭源》修訂本在注反切方面的一些問題

《辭源》修訂本(以下簡稱“辭源”)不但用漢語拼音和注音字母給單字注音,而且還注出了《廣韻》的反切。“《廣韻》不收的字,採用《集韻》或其它韻書、字書的反切。”(見出版說明)這為學習、研究古代語文提供了方便,受到很多人歡迎。但是《辭源》在注反切方面還有一些做得不够妥當的地方,下面把我們平日翻閱時發現的一些問題提出來,供使用和修訂《辭源》的同志參考。唐作藩同志在發表於《中國語文》1984年6期上的《〈辭源〉(修訂本)注音疑誤舉例》中,已經指出了不少這方面的問題。本文引用此文時簡稱“唐文”。作者水平有限,又沒有時間對《辭源》全書的反切作通盤的考察,所提意見恐怕會有很多錯誤,希望大家指正。

一

《辭源》裏有不少應注反切而未注的地方,下面分別情況,舉例加以說明。

《辭源》注反切好像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一個反切在一個字條內只能出現一次。因此在有些有兩個以上讀音的字條裏,雖然有的讀音確實出自某個反切,但是由於這個反切已經注在其它讀音之後,這個讀音後面就只好空而不注了。下面舉幾個例子。

當姓氏等義講的“任”字,古代讀平聲“如林切”。當“保”、“堪”等義講的“任”字,古代既可讀去聲“汝鳩切”,也可讀“如林切”。現在後一種“任”字只讀去聲,前一種“任”字仍讀平聲。《辭源》“任”字條以去聲為第一音,平聲為第二音。第一音後注“汝鳩”、“如林”二切,表示這一去聲讀音的“任”字在古代有平聲的又音。真正出自“如林切”的第二音後面,反而不注這個反切。

按照傳統的韻書、字書,“寫”字的傾泄、排除等義跟摹寫、書寫等義,都讀上聲“悉姐切”。《國音字典》、《漢語詞典》、《辭海》等都是依此注音的。《辭源》“寫”字條有上聲、去聲二音。去聲為第一音,下收上舉前一類義項,注明古讀上聲(《辭

源》把這些義項讀爲去聲，是否妥當尚待研究，但這不是本文所要討論的問題）。上聲爲第二音，下收上舉後一類義項。去聲後注“悉姐切”，上聲後反而不注（《辭源》“寫”字第一音下還收有一個本讀去聲的“通‘卸’”的義項。“悉姐切”對它根本不適用，詳後第三節）。

三台星的“台”和台州的“台”本來都讀“土來切”（《廣韻》平聲咍韻土來切胎小韻：“台，三台星，又天台，山名。”台州即因天台山得名）。現在三台的“台”讀 tái，台州的“台”讀 tāi。“土”是清聲母字。“土來切”的今音按理應讀陰平，三台的“台”讀陽平是特殊情況。《辭源》“台”字條以 tái 爲第二音，tāi 爲第三音。第二音後注“土來切”，跟“土來切”密合的第三音後反而不注這個反切（第二音下還收有一個“通‘鮐’”的義項，這個義項的今音實際上並不是出自“土來切”的，詳後第三節）。

“大”字本來有“唐佐切”、“徒蓋切”二讀。現在一般的“大”字讀 dà，“大夫”（口語中指醫生）、“大王”（指舊時的國王或強盜頭目）等少數複合詞裏的“大”字讀 dài。這兩個音都出自“徒蓋切”。“徒蓋切”的今音按理應讀 dài，讀 dà 是特殊情況。《辭源》“大”字條以 dà 爲第一音，dài 爲第二音。第一音後注“唐佐”、“徒蓋”二切，跟“徒蓋切”密合的第二音後反而不注這個反切。

宮闕的“闕”和闕失的“闕”本來都讀入聲“去月切”（《廣韻》月韻去月切闕小韻：“闕，門觀也……又失也，過也，不供也，又姓……”）。現在宮闕的“闕”讀去聲，闕失的“闕”讀陰平。《辭源》“闕”字條以去聲爲第一音，陰平爲第二音。第一音後注“去月切”，第二音後不注。

上面舉出的這種注反切的方法顯然是不合理的。我們應該尊重事實，只要某個今音確實出自某個反切，就應該在這個今音之後注上這個反切。硬性規定一個反切在一個字條內只能出現一次，是沒有道理的。

《辭源》對那些“同某”或“通某”的字的讀音，有時注反切（如“同‘藻’”字的“藻”字，“同‘辭’”的“辭”字，“辨”字“通‘貶’”的義項，“辯”字“通‘便’”的義項等），有時不注反切。唐文舉出了《辭源》沒有注出已見於《廣韻》、《集韻》的反切的一些例子（《中國語文》1984年6期473頁），其中的“藁”、“鑒”等例就屬於這一類（“藁”同“稟”、“稟”，“鑒”同“鑑”）。我們認爲這類字的反切，只要有可能最好還是注出來。下面再舉幾個這一類的可注反切而未注的例子。

“並”字“通‘傍’”的義項的讀音 bàng 未注反切。按：《集韻》去聲宕韻蒲浪切傍小韻：“傍、並……，近也，或作‘並’……”。上舉讀音後應據《集韻》注“蒲浪切”。

“亡”字“通‘無’”的義項的讀音 wú 未注反切。按：《集韻》平聲虞韻微夫切無小韻：“無、无、亡……，《說文》‘亡也’，奇字作‘无’……或作‘亡’……”。上舉讀音後應據《集韻》注“微夫切”。

“渾”字“通‘混’”的義項的讀音 hùn 未注反切。按：《廣韻》上聲混韻胡本切混小韻：“渾，渾元。”《集韻》戶衮切（音同胡本切）混小韻：“混、渾，《說文》‘豐流也’，一曰雜流，或作‘渾’。”“渾元”在古書中也作“混元”，是“渾”、“混”相通的一個例子。上舉“渾”字讀音後應據《廣韻》注“胡本切”。如認為《廣韻》以“渾元”作釋，跟“通‘混’”的說法有別，至少可以據《集韻》注“戶衮切”。《辭源》把詞條“渾元”的“渾”誤讀為 hún，可能根本沒有注意到《廣韻》混韻中的“渾”字。

“号”字條注“同‘號’”，列 háo、hào 二音，未注反切。按：“号”字去聲一讀當據《廣韻》注“胡到切”，唐文已指出。《集韻》平聲豪韻乎刀切豪小韻：“號、皋、号、唬，《說文》‘呼也’，或作‘皋’、‘号’、‘唬’。”平聲一讀應據《集韻》注“乎刀切”。唐文認為“‘号’本無平聲讀法”。如果 hào 音後注出《集韻》反切，就不會有這種誤解了。這可以說明為“同某”或“通某”的字注反切是很必要的。

《辭源》有時還由於不注意這種字的反切而誤讀其音。例如通“爪”的“蚤”字應讀“爪”字“側絞切”（zhǎo）的音，見《集韻》上聲巧韻側絞切爪小韻，《辭源》沒有注意，仍把它讀為“子浩切”（zǎo）。有的被注為“同某”或“通某”的字，如果注意到它的今音所從出的反切，就可以發現它實際上並不“同某”或“通某”。例如：《辭源》“比”字第二音為 pí，未注反切，所屬義項⑤釋曰：“同‘皮’。《左傳》莊十年：‘自雩門竊出，蒙皋比而先犯之。’注：‘皋比，虎皮。’”其實古人雖釋皋比為虎皮，却並沒有把“比”看作“皮”的通用字。《左傳》“皋比”的“比”，《經典釋文》音“毗”，《康熙字典》“比”字條把它收在“房脂切”下是正確的。“皮”字本讀“符羈切”，中古音不跟“比”同韻，上古音也不跟“比”同韻部。從今音來看，說“比”通“皮”似乎沒有問題，從反切來看就大有問題了。上面所說的這種情況，更能說明為“同某”或“通某”的字注反切的必要性。

《辭源》對《廣韻》、《集韻》僅在注文中作為異體或通用字提到的那些字，更是往往不注反切。唐文已經舉出了“嗅”字，下面再舉兩個例子。

“枷”字第二音 jià 未注反切，所屬義項⑥釋曰：“衣架。通‘架’⊖”。《禮·曲禮上》：“男女不雜坐，不同櫬枷，不同巾櫛。”……按：《廣韻》去聲禡韻古訝切駕小韻：“架，架屋，亦作‘枷’，《禮記》曰‘不同櫬枷’。”已在注文中提到了同“架”的“枷”。上舉 jià 音後應注“古訝切”。

“它”字“同‘他’”的義項的讀音 tuō, “同‘駝’”的義項的讀音 tuó, 都未注反切。按:《集韻》平聲戈韻湯何切佗小韻:“佗、他, 彼之稱, 或从‘也’, 通作‘它’。”唐何切駝小韻:“駝……通作‘它’。”已在注文中提到了通“他”和通“駝”的“它”。上舉 tuō、tuó 二音後應據《集韻》分別注“湯何切”和“唐何切”。

不見於《廣韻》、《集韻》而見於其他韻書、字書的反切,《辭源》有時加以採用,有時置之不理。其去取似乎並沒有一個明確標準。這也是不妥當的。

唐文所舉的《辭源》未注出已見於《廣韻》、《集韻》的反切的例子裏,有“朦”字一例。這個字的情況比較複雜。《廣韻》、《集韻》所收的“朦”字的反切,的確跟它的今音相合。但是《廣韻》、《集韻》給“朦”字注的意義,却跟《辭源》所收“朦”字義項不合(如《廣韻》平聲東韻莫紅切蒙小韻和上聲董韻莫孔切蒙小韻所收的“朦”字都訓“大貌”,《辭源》“朦”字無此義)。這大概是《辭源》不注“朦”字反切的原因。這樣做不能說沒有道理。不過《辭源》“朦”字條收有“朦朧”一詞。《集韻》東韻謨蓬切(音同莫紅切)蒙小韻既有訓“大貌”的“朦”,也有訓“朦朧”的“朦”。《辭源》對後者也置之不理,是缺乏道理的。恐怕應該在“朦”字 méng 音下增添跟“朦朧”有關的義項,把《集韻》的“謨蓬切”列在這個義項前面。

二

由於語音演變(如濁上變去、入聲消失)或其他原因,一個字的不同義項的讀音從不同變為相同的現象,是很常見的。《辭源》在遇到這種情況的時候,有時把原來的不同讀音的反切分別列在相應的義項之前。例如:“上”字讀 shàng 音的義項,有的本讀去聲,有的本讀上聲。《辭源》“上”字條把本讀去聲的那些義項排在前面,本讀上聲的那些義項排在後面。shàng 音之後只注去聲“時亮切”,本讀上聲的那些義項之前另出上聲“時掌切”,單獨佔一行地位。這樣做是合理的(由於“時亮切”只能管 shàng 音下所收的一部分義項,最好不要像現在這樣,把它直接注在 shàng 音之後,而要像“時掌切”那樣,放在有關義項之前單獨佔一行地位。以下對類似情況不再說明)。但是有時《辭源》却對分屬於原來不同音的義項的反切不加區分,把它們都列在統攝各義項的今音之後。這就不够妥當了。下面舉幾個例子。

“只”字 zhǐ 音後列“諸氏”、“章移”二切,下收兩個義項:“⊖語氣詞。……⊖祇,僅僅。……”。按:“諸氏切”為義項⊖之音(《廣韻》上聲紙韻諸氏切紙小韻:“只,語辭。”《集韻》注文作“《說文》‘語已詞’”),“章移切”為義項⊖之音(《廣韻》

平聲支韻章移切支小韻：“只，專辭。”此義“只”字今音按理應爲 zhī，但今皆讀 zhǐ，也許此今音另有來源）。所以 zhǐ 音後“章移”一切應移至義項㊟之前（要這樣做，義項㊟必須另起一行排，其上並應空出一行以容納移來的反切。以下對類似情況不再說明）。

“背”字 bèi 音後列“補妹”、“蒲昧”二切，下收八個義項。按：這兩個反切所屬之義不同。背脊、背面的“背”本讀“補妹切”，義項㊟至㊟屬此音。向背、違背、背誦之“背”本讀“蒲昧切”，義項㊟至㊟屬此音。義項㊟釋爲“日暈的外圍”。這一義項的“背”字，有人認爲應讀“補妹切”，有人認爲應讀“蒲昧切”。從排列的位置來看，《辭源》似乎主張讀“蒲昧切”。所以 bèi 音後的“蒲昧”一切應移至義項㊟之前（如認爲義項㊟的“背”應讀“補妹切”，可以把它向前移到義項㊟之後）。

“覆”字 fù 音後列“芳福”、“敷救”、“匹北”三切，下收七個義項。按：《廣韻》入聲屋韻芳福切蝮小韻：“覆，反覆，又敗也，倒也，審也。”去聲宥韻敷救切副小韻：“覆，蓋也。”其義不同。入聲德韻匹北切覆小韻“覆”字未釋義，“匹北切”當是讀“芳福切”的“覆”字的又音（《集韻》匹北切的“覆”字注“反也”）。此外，宥韻扶富切復小韻中也有“覆”字，注曰“伏兵曰覆”。這個反切《辭源》未收。如以《廣韻》爲準，應該把當“遮蓋，掩蔽”講的義項㊟和當“埋伏”講的義項㊟移至最後，把 fù 音後“敷救”一切移至前一義項之前，再在後一義項之前另出“扶富切”。

“著”字 zhuó 音後列“張略”、“直略”二切，下面依次收“附著”、“穿著”、“土著”、“酒器”等義項。按：“張略”、“直略”二切所屬之義不同。穿著之“著”本讀“張略切”（《廣韻》入聲藥韻張略切芍小韻：“著，服衣於身。”），附著之“著”本讀“直略切”（藥韻直略切著小韻：“著，附也。”）。這種區別在保存濁聲母的方言裏至今還存在。土著之“著”和作爲酒器名的“著”，都取義於附著，本來也都讀“直略切”（“土著”指附著於土地不流動的人，“著”本應讀 zhuó，但現在已經習非成是地改讀爲 zhù 了。著這種酒器是因“著地無足”而得名的，見《禮記·明堂位》鄭注，《釋文》讀“著”爲“直略反”）。所以應該把“穿著”這個義項移到“酒器”那個義項之後，把 zhuó 音後的“張略”一切移到它前面來。在“酒器”那個義項之後，原來還有“‘着’的本字”一個義項。這個義項實際上包含了很多意義。這些意義有本讀“直略切”的，也有本讀“張略切”的，現在的讀音也並不都是 zhuó。所以這個義項應該另作處理。

有時候，《辭源》列在同一個讀音後的不同反切，不但分屬於不同的義項，而且其今音實際上也並沒有變得相同。下面也舉兩個例子。

“蜺”字 xiǎn 音後列“呼典”、“胡典”、“苦甸”三切，下收兩個義項：“○小黑蟲……俗名縊女……。○小蛤。……”。按：“胡典”、“苦甸”二切是義項○的音，“呼典切”是義項○的音，《廣韻》注文說得很明白。而且“胡”是全濁聲母字，按濁上變去的通例，“胡典切”的今音應是 xiàn，不能像“呼典切”那樣仍讀上聲。所以對“蜺”的兩個義項來說，不但反切應該分開，就是今音也應該分開（《國音字典》、《漢語詞典》、《辭海》給“蜺”字注的今音都與《辭源》相同，《中文大字典》不誤）。

“矜”字 jīn 音後列“巨巾”、“居陵”二切，下收“矛柄”、“憐憫”等義項。按：“巨巾切”是“矛柄”這個義項的音，“居陵切”是“憐憫”等義項的音（參閱拙作《〈辭源〉〈辭海〉注音商榷》）。而且“巨巾切”的今音應為 qín，“矜”字的 jīn 音出自“居陵切”（韻尾有變化），跟“巨巾切”無關。所以對“矜”字的“矛柄”這個義項和“憐憫”等義項來說，不但反切應該分開，就是今音也應該分開（《新華字典》、《現代漢語詞典》、《辭海》等都給“矛柄”一義注 qín 音，給“憐憫”等義注 jīn 音）。

“賑”字 zhèn 音後列“章刃”、“章忍”二切，下收兩個義項：“○富饒。……○救濟。通‘振’。……”。按：據《廣韻》，“章忍切”是義項○的音（《廣韻》上聲軫韻章忍切軫小韻：“賑，隱賑，《說文》‘富也’。”），“章刃切”是義項○的音（去聲震韻章刃切震小韻：“賑，贍也。”這個“賑”與“振”同音，實即“振”的分化字）。這兩個反切的今音也不相同，“章忍切”的今音是 zhěn。所以“賑”字注音錯誤的情況跟上舉的“蜺”、“矜”二字是同類的。但是《集韻》上聲軫韻和去聲震韻都有訓“富”的“賑”字。如果從《集韻》，“章刃”、“章忍”二切對義項○就都適用了，以 zhèn 音來統攝兩個義項也就勉強說得過去了。不過即使如此處理，在義項○之前仍應把“章刃切”單列一次，以表示這個義項只能讀“章刃切”不能讀“章忍切”。

三

《辭源》在遇到一個字的本來不同音的義項後來變為同音的情況的時候，有時如上一節所指出的那樣，把分屬不同義項的反切不加區別地同列在統攝各義項的今音之後，有時又用只屬於某個或某些義項的反切來統攝同讀一種今音的全部義項。下面舉幾個例子。

“寫”字 xiè 音後注“悉姐切”，下收三個義項：“○移置。……○宣泄，排除。……○解，脫。通‘卸’。……”。按：“悉姐切”是○、○兩個義項的音，跟通“卸”的“寫”字無關。《集韻》去聲禡韻四夜切卸小韻：“卸、寫，《說文》‘舍車解馬也，从

𠂔、止、午’，或作‘寫’。”義項㊟之前應據《集韻》另出“四夜切”。

“台”字 tái 音後注“土來切”，下收兩個義項：“㊟三台，星名。……㊟通‘鮐’。見‘台背’。”按：“鮐”字在《廣韻》中只有“土來切”一音，但在《集韻》中則有“湯來切”（音同土來切）、“堂來切”二音。台背之“台”也有與之相同的兩種讀音。《釋文》注《詩·大雅·行葦》“黃耆台背”的“台”字說：“湯來反，徐又音臺。”“台”就是讀“堂來切”的。《集韻》也把台背之“台”收在哈韻堂來切臺小韻內。在第一節裏討論“台”字 tái 音的反切時已經說過，按理“土來切”的今音應為 tài，三台之“台”讀 tái 是特殊情況。“堂”是全濁聲母字，“堂來切”的今音正是 tái。台背之“台”的 tái 音顯然是出自“堂來切”，而不是出自“土來切”的。義項㊟之前應據《集韻》另出“堂來切”。

“進”字 jìn 音後注“即刃切”。義項㊟釋曰：“收入的錢財。通‘賁’、‘贐’。……”，義項㊟釋曰：“竭盡，通‘盡’。……”。按：在古代，“進”跟“贐”、“盡”本來並不同音。“進”既通假為“贐”或“盡”，就應該改讀“贐”或“盡”的音。《集韻》去聲稊韻徐刃切燼小韻：“賁、贐、進，《說文》‘會禮也’，或从‘盡’，亦作‘進’。”義項㊟之前應據《集韻》另出“徐刃切”。竭盡之“盡”，《廣韻》音“慈忍切”，但是通“盡”的“進”字不見於《廣韻》、《集韻》。義項㊟的解釋如確實可信的話，其前應另出“慈忍切”，注明據“盡”字反切補。如果不這樣做，這個義項原來的讀音跟其他義項不同的事實就表示不出來了。

“倍”字 bèi 音後注“薄亥切”，下收“㊟照原數加等”、“㊟更加”、“㊟背向”、“㊟背棄”、“㊟背誦”五個義項，並注明“㊟㊟㊟通‘背’”。按：“薄亥切”是㊟、㊟兩個義項的音。㊟、㊟、㊟三個義項的“倍”字跟讀“蒲昧切”的“背”字相通，本來也應該讀“蒲昧切”。“倍”字的這個音不見於《廣韻》、《集韻》，但在古書中還是有根據的。《周禮·春官·大司樂》鄭注“倍文曰諷”的“倍”當背誦講，《釋文》音“佩”。“佩”就是讀“蒲昧切”的。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倍”字條對“倍”的讀音有所討論，可以參閱。義項㊟之前應另出“蒲昧切”，注明據“背”字反切補。

“俳”字 pái 音後注“步皆切”，最後一個義項，即義項㊟釋為“徘徊”。又所收詞條有“俳徊”，注明“同‘徘徊’”。按：俳徊之“俳”與俳倡之“俳”古代不同音。“步皆切”為後者之音。《集韻》平聲灰韻薄枚切斐小韻：“俳、俳，徘徊，便旋，或从‘彳’。”義項㊟之前應據《集韻》另出“蒲枚切”。

“俳”字 pái 音後注“薄回切”（音同蒲枚切），所收詞條有“徘徊”，注明“同‘俳倡’”。前面已經說過，俳倡之“俳”與徘徊之“俳”本不同音。“俳”字下既有“徘

倡”詞條，就應該先出“同‘俳’”的義項，其前另出“步皆切”，注明據“俳”字反切補。

四

除了上面指出的那些方面的問題，在《辭源》裏還可以看到一些選用反切不當的情況。下面舉幾個例子。

“枒”字 yé 音後注“吾駕切”，又據《集韻》注“余遮切”，所屬義項⊖釋曰：“木名。《說文》：‘枒，木也。’……也作‘桺’、‘榔’。”按：《廣韻》去聲禡韻吾駕切迓小韻：“枒，木名，……”，平聲麻韻以遮切邪小韻：“榔，椰子，木名，出交州，……”《集韻》去聲禡韻魚駕切訝小韻：“枒，木名，……”，平聲麻韻余遮切邪小韻：“枒、榔、榔，木名，出交趾……”《集韻》魚駕切的“枒”跟《廣韻》吾駕切的“枒”相當，今音爲 yà。《集韻》余遮切的“枒”是“榔”的異體，跟《廣韻》以遮切的“榔”相當，今音爲 yé。《辭源》“枒”字義項⊖既以“枒”爲“榔”之異體，讀爲 yé，就不應該再注《廣韻》的“吾駕切”了（義項⊖引《說文》“枒”字，也不一定恰當。這個“枒”可能是音“魚駕切”的“枒”）。

“綠”字 lù 音後注“力玉切”，下收“青黃色”一個義項。lù 音後據《正字通》注“力竹切”，下收“草名。即蓋草。同‘葦’”一個義項。按：《廣韻》入聲燭韻力玉切錄小韻既有“綠”字也有“葦”字。《辭源》“綠”字 lù 音後注“力玉切”是正確的。“綠”字“同‘葦’”的義項的 lù 音後不注“力玉切”，而據晚出的《正字通》注“力竹切”則是錯誤的。“力玉切”的今音讀 lù，合乎常規。綠色的“綠”讀 lù，是特殊情況。“力竹切”屬屋韻，“力玉切”屬燭韻。雖然它們的今音都是 lù，古音却並不相同。

“輶”字 róu 音後注“人九”、“人又”二切。按：“人九切”屬上聲，“人又切”屬去聲，聲調都跟“輶”字今音不合。《集韻》平聲尤韻而由切柔小韻也有“輶”字。“輶”字的 róu 音當出此切。《辭源》應據《集韻》在 róu 音後注“而由切”，“人九”、“人又”二切都只能看作又音。

“羨”字 yán 音後注“于線切”，下收兩個義項：“⊕墓道。通‘埏’。……⊙引進，延請。通‘延’。……”。按：《廣韻》去聲線韻于線切衍小韻的“羨”字，訓爲“延也，進也”，並無墓道之義。而且“于線切”的今音也不是 yán 而是 yàn。《集韻》平聲僊韻夷然切延小韻：“埏、羨，登也，方也，墓道也，或作‘羨’。”“夷然切”的

今音正是 yán。對義項㊶來說, yán 音後顯然不應注“于線切”, 而應據《集韻》注“夷然切”。《廣韻》平聲仙韻以然切(音同夷然切)延小韻: “延, 稅也, 遠也, 進也, ……”。如認為義項㊶的“羨”通“延”, “夷然切”對它也適用。如認為這個“羨”就是《廣韻》于線切的“羨”, 那就應該為它另立 yàn 的音項。像現在這樣, 既給它注“于線切”, 又把它讀為 yán, 說它通“延”, 是自相矛盾的。

“粗”字 cū 音後注“徂古切”, 所屬義項前注明“同‘麤’、‘麤’”。按: “徂古切”的今音為 zù, 與“粗”字今音不合。“粗”和“𦏧”都與“麤”相通。《辭源》在“麤”和“𦏧”的 cū 音後都注“倉胡切”, 但“粗”字的 cū 音後却注“徂古切”, 這是自相矛盾的。“粗”字通“麤”的讀音不見於《廣韻》而見於《集韻》。《集韻》平聲模韻聰徂切(音同倉胡切)麤小韻: “粗、𦏧, 大也, 疏也, 物不精也, 或作𦏧, 通作麤。”“粗”字 cū 音後應據《集韻》注“聰徂切”。“粗”和“𦏧”在古代都還有“徂古切”的讀音。古書中屢見“麤”與“粗”或“𦏧”連文之例(“麤粗”見盧校本《春秋繁露·俞序》、《論衡·正說》等, “麤𦏧”見《漢書·藝文志·數術略》、《公羊傳·隱公元年》何休注等)。這種“粗”和“𦏧”就顯然應該讀“徂古切”。所以“粗”和“𦏧”的“徂古切”一音也還是應該表示出來的。但是恐怕需要為它另立 zù 的音條, 不能簡單地把它注在 cū 音之後。

“廈”字第一音為 shà, 其後注“胡雅切”, 下收兩個義項: “㊶房屋。古作‘夏’。夏有大義, 故稱大屋為夏屋。……㊶兩廂, 廊。見《玉篇》”。第二音為 xià, 不注反切; 下收“㊶見‘廈門’”一個義項。按: “胡雅切”的今音為 xià, 跟㊶㊶兩個義項的今音不合。《廣韻》“廈”字只有“胡雅切”一音。《集韻》“廈”字有兩音, 訓“大屋”之“廈”音“亥雅切”(音同胡雅切), 訓“旁屋”之“廈”音“所嫁切”。“所嫁切”的今音正是 shà。《辭源》在 shà 音後不注“所嫁切”而注“胡雅切”, 在 xià 音後反而不注“胡雅切”, 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大廈之“廈”本應讀“胡雅切”, 當旁屋、廊廡講的“廈”古代也可以讀“胡雅切”(《玉篇·广部》: “廈, 胡假切, 今之門廡也。”“胡雅”、“胡假”二切同音)。這些可以在釋義時加以說明。

“呵”字 hē 音後注“虎何切”, 下收三個義項: “㊶大聲喝斥, 同‘訶’。……㊶噓氣。……㊶笑聲。……”。㊶、㊶兩個義項間空出一行, 另出“呼箇切”。按: 《廣韻》把讀“虎何切”的“呵”當作“訶”的異體, 把讀“呼箇切”的“呵”訓為“噓氣”, 後者同小韻還有訓為“歌歌, 大笑”的“歌”字。這些是《辭源》注反切的根據。但是“呼箇切”的今音是 hè, 聲調跟㊶、㊶兩個義項的今音不合。《集韻》平聲歌韻虎何切訶小韻: “呵、歌、《博雅》‘呵呵, 啞啞, 笑也’, 一曰氣出, 或从‘欠’。”據此, ㊶、㊶

兩個義項的“呵”字在古代也有“虎何切”的音。它們的今音顯然是出自這個反切的。《辭源》給㊦、㊧兩個義項注反切，不應該不取《集韻》的“虎何切”。按我們的意見，據《廣韻》注的“虎何切”應該置於義項㊦之前，專屬這一義項。㊦㊧兩個義項之前應該據《集韻》再一次出“虎何切”，“呼箇切”只能作為又音附列於下。

“豸”字第一音為 án，其後注“俄寒”、“可顏”二切，下收“㊦古時生於北地之野狗”一個義項。第二音為 àn，其後注“五盱”、“侯盱”二切，下收“㊧古代鄉亭的拘留所”一個義項。按：《廣韻》去聲翰韻侯盱切翰小韻所收的“豸”字訓“野狗”。可知“侯盱切”（今音為 hàn）是義項㊦的又音，與義項㊧無涉。àn 音後的“侯盱切”應該移到 án 音後面的“可顏切”下面去。

以上，我們主要根據平日翻查《辭源》時摘錄的資料，粗略地討論了《辭源》注反切方面的一些問題。我們注意到的問題是很不全面的。讀者如果想比較全面地瞭解一下這方面的問題，可以參閱唐文。最後提出一個願望：希望在《辭源》進一步修訂的過程裏，跟反切有關的各種問題都能得到妥善的解決。

1985 年 6 月 29 日寫畢

原載深圳大學國學研究所主編《中國文化與中國哲學》（東方出版社，1986），又載《古代文史研究新探》，今據後者收入。

文字職務的分化

在漢字裏，由於語義引申以及文字的假借和合併等原因，一字多職的現象，也就是一個字表示多種意義或多種音義的現象，不斷在產生。另一方面，爲了增加文字表達語言的明確性，對多義字（包括多音義字）也在不斷分化它們的職務。

分化文字職務的方法，主要有三種：假借別的字來分擔部分職務，利用異體字進行職務的分工，造一個字來分擔部分職務。在應用後兩種方法的時候，文字職務的分化同時也是文字的分化。爲了分化職務而造的字，我們稱它爲分化字。

下面把分化文字職務的情況分成五類（造分化字細分爲三種情況），分別舉例加以說明。

（一）假借別的字來分擔部分職務

有些字在有了常用的假借義或引申義之後，本義另借別的字來表示。例如：

何——荷 “何”的本義是擔荷（《說文·人部》：“何，僂也。从人，可聲。”“僂”跟“担”的繁體“擔”本爲一字。甲骨文“何”字作，象人有所擔荷之形），由於假借來表示疑問代詞“何”，本義另借荷花的“荷”字表示。

前——翦 “前”是“剪”的初文（“前”本作“荊”，《說文·刀部》：“荊，齊斷也。从刀，𠂔聲。”“𠂔”是前進之“前”的本字，《說文·止部》：“𠂔，不行而進謂之𠂔。”）。由於“前”假借爲“𠂔”，另借“翦”字來表示它的本義（“翦”本作“翦”。《說文》：“翦，羽生也。一曰矢羽。从羽，𠂔聲。”）。較早的古書幾乎都借“翦”爲前斷的“前”，如《詩·召南·甘棠》“勿翦勿伐”。後來又造了“剪”字來表示“前”的本義，借“翦”爲“前”的辦法就逐漸不通行了（唐顏元孫《干祿字書》把“剪”當作“翦”的俗體）。

內——納 “內”的本義是納入（《說文·入部》：“內，入也。”），《荀子·富國》：“婚姻媾內，送逆無禮。”引申而爲內外的“內”，本義另借“納”字表示

(《說文·糸部》:“納,絲溼納納也。从糸,內聲。”)。

有些字借用別的字來表示它們的某個假借義或引申義。例如:

女——汝 “女”字在古代曾假借來表示第二人稱代詞(先秦古書中常見,如《詩·召南·行露》“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後來這一意義改借汝水的“汝”字來表示。

見——現 看見的“見”引申而有呈現的意思(古書常見,如《史記·淮陰侯列傳》“情見勢屈”)。後來爲了跟本義相區別,假借“現”字來表示這一意義(據《集韻》,“現”的本義是“石之次玉者”或“玉光”)。

指——旨 指示的“指”引申而有意旨的意思(《漢書·河間獻王德傳》:“文約指明”,顏師古注:“指謂義之所趨,若人以手指物也。”),後來假借本當味美講的“旨”字來表示這一意義(“指”的這個引申義,或者說“旨”的這個假借義,另有爲它而造的分化字“指”,但使用得不普遍)。

起分化職務的作用的假借字,通常都是由本義跟所要表示的假借義很少有可能混淆的字充當的,而且有不少字的本義是不常用的,如上舉的“翦”、“納”、“現”。不然,一方面減少了舊有的字義混淆的可能性,一方面又會增加新的字義混淆的可能性。

多義字轉移給假借字表示的意義,跟仍然由它自己表示的意義,通常都是不同的詞,在語音上一般也是有差別的,上舉各例中只有“指”和“旨”語音全同,是一個例外。

有些多義字利用異體字分化職務。例如:

邪——耶 “邪”字从“邑”“牙”聲,本是地名字(琅玕古作琅邪),假借來表示邪正的“邪”(本字作“襄”),又假借來表示句末語氣詞“耶”(古書常見,如《史記·項羽本紀》“羽豈其苗裔邪”)。漢隸常常把“牙”旁寫得跟“耳”旁難以分辨,所以“邪”字有作“耶”的異體(《干祿字書》分文字爲正、通、俗三體,“耶”列爲“邪”字的“通”體)。這兩個異體的用法本來沒有區別。後來邪正的“邪”不再寫作“耶”,疑問語氣詞“耶”也不再寫作“邪”,兩個異體分化成用法不同的兩個字。

猶——猷 “猶”的本義是獾屬獸,假借爲謀猶的“猶”(《詩·小雅·小旻》:“謀猶回遹。”)、猶如的“猶”以及猶豫的“猶”等等。“猶”字有一個偏旁位置不同的異體“猷”。後來“猷”被專門用來表示謀猶的意思,“猶”則用來表

示其他意義，兩個異體分化成用法不同的兩個字（在古代猶如的“猶”也可以寫作“猷”，如《爾雅·釋言》“猷，若也”）。

亨——享 “亨”（亦作亨）和“享”（亦作享）本是一字異體，《說文》小篆作（由變來）、（開母廟石闕作）兩形，用法並無區別。本來，祭享、享受的“享”也可以寫作“亨”（《易·大有》九三爻辭“公用亨于天子”。東漢劉熊碑“子孫亨之”），亨通的“亨”和烹飪的“亨”（烹）也都可以寫作“享”（《周易》“元亨利貞”的“亨”，馬王堆漢墓帛書本《周易·乾卦》和東漢時代的張公神碑都作“享”。“烹”，古書一般寫作“亨”，如《詩·豳風·七月》“七月亨葵及菽”，但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作“享”，如“享而食之”）。這兩個字的分工可能是在唐代才基本固定下來的（《千祿字書》說“亨”是“亨通、亨宰字”，“享”是“祭享字”。不過在較晚的古書裏仍可看到以“亨”為“享”之例，如《太平廣記》卷二五二錄《玉堂閒話》“俳優人”條，有“經年與人旋磴亨利”之文）。後來又為“亨”字的烹調一義造了加“火”旁的分化字“烹”，原來的一個字分化為用法不同的三個字。

利用異體字分化職務是常見的現象。除上舉各例外，如“常”和“裳”，“雅”和“鴉”，“諭”和“喻”，“吏”和“事”，“烏”和“於”，“句”和“勾”，“弁”和“卞”，“沈”和“沉”，“著”和“着”等等，都是由異體字分化為用法不同的文字的。

（二）造與母字僅有筆畫上的細微差別的分化字

有些多義字通過筆畫上的細微變化，分化出一個字來分擔它的職務。例如：

母——毋 古文字通常借“母”字來表示否定詞“毋”。到戰國時代，才有人把“母”字的兩點改成一畫，分化出“毋”字來表示這一假借義（戰國時代秦國的詛楚文刻石用“毋”字，但是絕大多數戰國時代的文字資料仍借“母”為“毋”）。

巳——已 已然之“已”這個詞，本來假借地支“巳”字表示（漢代人除有時借“以”表“已”外，一般都以“巳”表“已”，如孔頴碑“事巳即去”。漢簡中以“巳”表“已”之例屢見）。後來才用在“巳”字左上角留缺口的辦法，分化出“已”字來（《說文》無“已”字）。過去也有用有鉤無鉤來區別“巳”、“已”的：“巳”仍寫作“巳”，地支“巳”寫作“巳”，末筆不帶鉤。

刀——刁 “刀”字在古代本有“雕”音（《漢書·李廣傳》“刁斗”作“刀

斗”。《公羊傳·僖公十八年》“豎刁”作“豎刀”。漢印刁姓字皆作“刀”。後來才變“刀”字的一撇爲一挑，分化出“刁”字來取代讀“雕”的“刀”（《說文》無“刁”字）。

此外如“气”分化出“乞”（乞求之“乞”本借“气”字表示），“荼”分化出“茶”，“余”分化出“佘”，“洗”分化出“冼”（“佘”、“冼”都是姓氏用字），“角”分化出“𠩺”（lù。“角”本有“錄”音）等等，也都是這一類的例子。這類分化字的讀音跟母字保留的讀音通常都是不同的。

如果沒有充分的資料，上述這種文字分化的現象，跟利用寫法略有出入的異體字（如“亨”和“享”，“著”和“着”）分工的現象，往往不易區別。可能上面所舉的例子有些本應歸入異體字分工，我們由於掌握資料不充分，把它們的性質理解錯了。

有少數造分化字的情況，介於對母字作筆畫上的細微改動，跟下面就要講到的改換母字偏旁之間。例如：

陳——陣 陳列的“陳”引申而有戰陣的意思（《論語·衛靈公》：“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後來改“東”旁爲“車”旁，分化出“陣”字來表示這一意義（《說文》無“陣”字）。“東”和“車”的字形很接近，改“陳”爲“陣”既可以看作改換母字的偏旁（古代戰爭中車很重要，“陣”字的“車”旁跟字義多少有些聯繫），也可以看作對母字作筆畫上的細微改動。

辨——辦 《說文·刀部》：“辨，判也。从刀，辨聲。”“丩”是“刀”字篆文“𠂆”在隸書楷書裏的變形。辨別的“辨”引申而有辦治、辦理的意思（《史記·項羽本紀》：“項梁常爲主辦。”），後來改“刀”旁爲“力”旁，分化出“辦”字來表示這一意義（《說文》無“辦”字）。改“辨”爲“辦”也介於改換母字偏旁跟對母字作筆畫上的細微改動這兩種情況之間。

（三）通過加注或改換偏旁造分化字

在各種分化文字職務的方法裏，這是最常用的一種。這裏所說的“偏旁”包括表意的（以下稱意符）和表音的（以下稱音符）兩種。不過在造分化字的時候，大都加注或改換意符，很少加注或改換音符。下面把這種造分化字的方法分爲加注意符、改換意符以及加注或改換音符三類，分別舉例加以說明。最後再專門講一下用這種方法給雙音節詞造分化字的情況。

（1）加注意符 有些有比較常用的假借義或引申義的字，通過加注意符分化

出一個字來表示它們的本義。這種分化字跟母字是後起字跟初文的關係。例如：

它——蛇 “它”本作等形，是“蛇”的象形初文，表示指示代詞是假借的用法，後來加注“虫”旁分化出“蛇”字來表示本義（《說文》以“蛇”為“它”的或體）。

莫——暮 “莫”本作，象日落草莽之中，是“暮”的初文，表示否定詞是假借的用法，後來加注“日”旁分化出“暮”字來表示本義（《說文》無“暮”字）。

衰——蓑 “衰”字小篆作，象衣上有草，本義是草雨衣，假借來表示衰弱之“衰”、等衰之“衰”（cuī）等詞，後來加注“艸”旁分化出“蓑”字來表示本義（《說文》無“蓑”字。古代曾為衰弱一義造分化字“瘵”，但不通行）。

止——趾 “止”字本作，本義是脚（《漢書·刑法志》“斬左止”“斬右止”，就是“斬去左脚”“斬去右脚”的意思）。“止”引申而有停止、禁止等義，後來加注“足”旁分化出“趾”字來表示本義（《說文》無“趾”字）。

州——洲 “州”字本作，象水中間有陸地，本義是水中可居之地，引申而為州縣之“州”，後來加注“水”旁分化出“洲”字來表示本義（《說文》無“洲”字）。

益——溢 “益”字小篆作，象水從器皿中漫出來，是“溢”的初文。“益”引申而有增益、利益等義，後來加注“水”旁分化出“溢”字來表示本義。

北——背 “北”本作，象二人相背，是“背”的初文。“北”（bèi）引申而為南北的“北”（北方是背陰的一方），後來加注“肉”旁分化出“背”字來表示本義。

原——源 “原”所从的“泉”是“泉”字的變形。“原”字从泉出厂下會意（“厂”音 hǎn，象山石的邊崖，跟“廠”的簡化字“厂”無關），本義是水的源頭。“原”字引申而有本原的意思，又假借為平原的“原”（《說文》以“遼”為平原之“原”的本字。據金文，此字中的“录”是“象”字之誤），後來加注“水”旁分化出“源”字來表示本義（《說文》無“源”字）。

有些字通過加注意符分化出新字來表示假借義。這種分化字跟母字是後起本字跟假借字的關係。例如：

胃——謂 “謂”這個詞本來借“胃”字表示（東周時的吉日壬午劍銘文有

“胃之少虞”之語),後來才加注“言”旁造出本字“謂”(雲夢秦墓發現的竹簡文字裏已有“謂”字,但西漢前期的竹簡、帛書仍多借“胃”爲“謂”)。

師——獅 “獅”是古代的音譯外來詞,本來假借師衆的“師”字表示(《漢書·西域傳上》烏弋山離國“……有挑拔、師子、犀牛”),後來才加注“犬”旁造出本字“獅”(《說文》無“獅”字)。

牟——𠩺、眸、倖 “牟”的本義是牛鳴(《說文·牛部》:“牟,牛鳴也。从牛,象其聲氣从口出。”),古代假借來表示當大麥講的“𠩺”(《詩·周頌·思文》:“貽我來牟。”),又假借來表示當瞳人講的“眸”(《說文·目部》:“盲,目無牟子。”),又假借來表示當齊等講的“倖”(《漢書·司馬相如傳下》:“德牟往初。”)。後來通過加注偏旁分化出“𠩺”、“眸”、“倖”等字,作爲這些詞的本字(《說文》無“眸”字)。

有些字通過加注意符分化出新字來表示引申義。例如:

取——娶 “取”引申而有娶妻的意思(《詩·豳風·伐柯》:“取妻如之何。”),後來加注“女”旁分化出“娶”字來專門表示這一引申義。

景——影 《說文·日部》:“景,光也。”“景”引申而有陰影的意思(《周禮·地官·大司徒》:“正日景以求地中。”),後來加注“彡”旁分化出“影”字來專門表示這一引申義(《說文》無“影”字)。

奉——俸 “奉”的本義是兩手捧物,引申而有供給的意思,供給的意思又引申而有俸祿的意思(《漢書·王莽傳上》:“其令公奉、舍人賞賜皆倍故。”),後來加注“人”旁分化出“俸”字來專門表示這一引申義(《說文》無“俸”字)。

坐——座 “坐”引申而有座位的意思(《三國志·魏志·王粲傳》:“賓客盈坐。”),後來加注“广”旁(音 yǎn,與“廣”的簡化字“广”不同),分化出“座”字來專門表示這一引申義(《說文》無“座”字)。

兩——𨋖、輶 “兩”引申而爲成對的鞋的單位詞(《詩·齊風·南山》:“葛屨五兩。”),又引申爲車的單位詞(《詩·召南·鵲巢》:“百兩御之。”古代的車一般用兩輪,所以稱車爲兩)。後來通過加注偏旁分化出“𨋖”、“輶”二字來專門表示這兩個引申義(《說文》無“輶”字)。

(2) 改換意符 改換母字意符而成的分化字,多數是表示引申義的。例如:

振——賑 振起的“振”引申而有賑濟的意思(《禮記·月令》季春之月

“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後來把“手”旁換成“貝”旁，分化出“賑”字來專門表示這一引申義（《說文》以振救為“振”的本義，恐非。又《說文》有訓“富”的“賑”，跟賑濟的“賑”無關）。

赴——訃 “赴”的本義是“趨”，引申而有奔赴告喪的意思（《禮記·文王世子》：“死必赴。”），後來把“走”旁換成“言”旁，分化出“訃”字來專門表示這一引申義（《說文》無“訃”字）。

綿——棉 我國本來只有絲綿，沒有木棉。中古時代種植木棉以後，起初仍用“綿”字表示木棉，後來才把“糸”旁改成“木”旁，分化出“棉”字來（《說文》無“棉”字）。

張——帳、脹 擴張的“張”引申而有帳幕的意思（《史記·袁盎傳》：“乃以刀決張”，《集解》音“帳”。《說文·巾部》：“帳，張也。”）、膨脹的意思（《左傳·成公十年》：“將食，張，如廁”，杜注：“張，腹滿也。”），後來通過改換意符分化出“帳”、“脹”二字來表示這兩個引申義（《說文》無“脹”字）。

下面再舉兩個通過改換意符造分化字表示假借義的例子：

澹——贍 “澹”的本義是水搖貌（《說文·水部》：“澹，水搖也。”《文選》卷三張衡《東京賦》：“淥水澹澹”，李善注引《說文》：“水搖貌也。”）。古代曾假借它來表示“贍”這個詞（《漢書·食貨志上》：“猶未足以澹其欲也”，顏注：“澹，古贍字也。贍，給也。”），後來才把“水”旁改成“貝”旁，分化出“贍”字來。

苧——殍 “苧”字本來當一種草名講（《說文·艸部》：“苧，艸也。”），或當蘆葦秆子裏的薄膜講（《漢書·中山靖王傳》：“非有葭苧之親”，顏注：“苧，葭裏之白皮也。”）。古代稱餓死的人為“餓苧”（《孟子·梁惠王上》：“民有飢色，野有餓苧。”），這個“苧”字是假借字，後來把“艸”旁改為“歹”（è）旁，分化出“殍”字來作為本字（讀è的“歹”由“歹”變來，與好歹的“歹”無關）。

（3）加注或改換音符 加注音符的例子如：

午——悟 “午”是“杵”的初文，古代曾假借來表示悟逆之“悟”這個詞（《禮記·哀公問》：“午其衆以伐有道。”），後來加注音符“吾”，分化出“悟”字來作為這個詞的本字（《說文·午部》：“悟，逆也。从午，吾聲。”“悟”是“悟”的訛體）。

食——飼 “食”引申而有餵食的意思（《戰國策·齊策四》：“左右以君賤

之也，食以草具。”)，後來加注音符“司”，分化出“飼”字來表示這一意義(“飼”字本來通用於人、獸。《說文》無“飼”字)。

改換音符的例子如：

潦——滂 “潦”指下雨引起的地面積水(《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天雨，廷中有潦。”)，引申而有水大淹沒田地莊稼的意思(《後漢書·順帝紀》永建六年“連年灾潦”)，後來把聲旁“奈”改為“勞”，分化出“滂”字來表示這一意義(《說文》“滂”字為河流名，跟災潦之“滂”無關)。

濫——灑 “濫”可以當用水漬果子講(《禮記·內則》：“飲：……漿、水、醢、濫”，鄭注：“濫，以諸和水也”，《釋文》：“乾桃乾梅皆曰諸。”)。後來為了跟其他用法的“濫”字相區別，把聲旁“監”改為“覽”，分化出“灑”字來表示這一意義(《說文》無“灑”字。《集韻》上聲敢韻：“灑，漬果也，一曰染也，或作濫。”“灑”、“潑”同義，現在這兩個字都讀為 lǎn，一般看作一字的異體。《廣韻》無“灑”字，“潑”字在感韻。《集韻》也把“潑”字收入感韻，並不把它當作“灑”的異體)。

(4) 通過加注或改換偏旁為雙音節詞造專用的分化字 通過加注或改換偏旁，把記錄雙音節詞的假借字改造成專用字的現象，是很常見的。例如：

吳公——蜈蚣——蜈蚣 蟲名“蜈蚣”本來假借“吳公”二字表示(《廣雅·釋蟲》：“蜘蛛，吳公也。”)。後來在上一字上加注“虫”旁(《莊子·齊物論》釋文引《廣雅》作“蜈公”)。最後，兩個字都加上了“虫”旁。這樣就從“吳公”分化出了“蜈蚣”二字(《說文》無“蜈”字。“蚣”字重文作“蚣”，與“蜈蚣”無關)。

毒冒——瑋(玳)瑁 “玳瑁”一詞本來假借“毒冒”二字表示(《漢書·郊祀志》：“毒冒犀玉。”)。後來在這兩個字上加注“玉”旁，分化出了“瑋瑁”二字。“玳”是“瑋”的異體，現在用“玳”不用“瑋”(《說文》無“瑋”字，“瑁”字當天子用來冒諸侯所執的圭的一種玉器講，與“瑋瑁”無關)。

婀娜——婀娜 形容姿態柔美的“婀娜”一詞，古代曾假借“阿那”二字來表示(《文選》卷三〇陸機《擬古詩十二首·擬青青河畔草》：“皎皎彼姝女，阿那當軒織。”)。後來在這兩個字上加注“女”旁，分化出了“婀娜”二字(《說文》無“婀娜”二字而有“嬰”字，但意義與“婀娜”無關。後來“嬰”被當作“婀”的異體)。

蒲陶——蒲萄——葡萄 “葡萄”是漢代自西域傳入的一個音譯外來詞。這個詞《史記》、《漢書》記作“蒲陶”(《史記·大宛傳》:“有蒲陶酒。”《漢書·西域傳》中屢見“蒲陶”),兩個字都是假借字。《後漢書》、《玉篇》等作“蒲萄”(《後漢書·西域傳》:“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萄。”),“陶”字的“阜”旁改成“艸”頭,“蒲”字因為本有“艸”頭未加改動。後人爲了統一字形,又把“蒲”字的聲旁“浦”改成“甫”,兩個字都變成了專用字(《說文》有“萄”字,爲草名,跟“葡萄”無關)。

此外如“夫容”、“目宿”加“艸”頭而成“芙蓉”、“苜蓿”,“科斗”、“即且”加“虫”旁而成“蝌蚪”、“蜚蛆”,“丁寧”加“口”旁而成“叮嚀”,“方皇”加“彳”旁而成“彷徨”(亦作仿徨,舊又作徬徨、傍徨),“常羊”(亦作尚羊)加注或改換偏旁而成“徜徉”(亦作倘佯)等等,都是這一類的例子。

有時對並非用假借字記錄的雙音節詞,也通過加注或改換偏旁爲它們造專用字。例如:

綠耳——騶耳——騶駼 古代有一種名馬叫“綠耳”(《穆天子傳》卷一:“天子之駿……綠耳。”據說這種馬是因兩耳綠色而得名的)。後來爲了表示“綠耳”是馬名,把“綠”字的“糸”旁改成了“馬”旁(《商君書·畫策》:“騶駼騶耳。”)。最後又在“耳”字上加注“馬”旁,把兩個字都變成了專用字(《廣雅·釋獸》有“騶駼”。《說文》無此二字)。

此外如“流黃”變爲“硫黃”、“硫磺”,“馬腦”變爲“馬瑙”、“瑪瑙”,“虎魄”變爲“虎珀”、“琥珀”等等,似乎也都可以看作這一類的例子。

有些記錄雙音節詞的字,在兩個字裏只有一個字加過或改過偏旁,如“伐閱”變爲“閔閱”,“展轉”變爲“輾轉”等等。

從上舉諸例可以看到,使用漢字的人往往喜歡把記錄雙音節詞的字改成具有同樣的偏旁。也就是說,他們希望用來記錄雙音節詞的兩個字之間有明顯的形式上的聯繫。有時爲了達到這個目的甚至可以完全不管文字學的原則。例如“鳳凰”本作“鳳皇”,“鳳”字从“鳥”“凡”聲,“凰”字所从的“几”則既無音也無義,純粹是爲了跟“鳳”字取得形式上的聯繫而加上去的。

(四) 造跟母字在字形上沒有聯繫的分化字

有些分化字不是以母字的字形爲基礎,而是另起爐竈地造出來的。例如:

鮮——𩺰(𩺰) 據《說文》,“鮮”的本義是一種魚名。一般假借它來表示新鮮的“鮮”(據《說文》,本字作𩺰)和鮮少的“鮮”(《詩·鄭風·揚之水》:“終鮮兄弟。”)。後來另造“𩺰”字來表示後一個假借義(“𩺰”字已見《說文》,“𩺰”是較晚出的異體。這個後起本字出現後,假借字“鮮”仍然很常用。現在“𩺰”、“𩺰”已經作為異體併入“鮮”字)。

步——埠 船埠的“埠”,宋以前本用“步”字表示(柳宗元《永州鐵爐步志》:“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後來另造从“土”“阜”聲的“埠”字來表示這個詞。

有些字看起來像是拋開母字字形另造的分化字,實際上却有比較曲折的產生過程。例如陰陽的“陽”引申而有佯裝的意思(《漢書·田儋傳》:“儋陽為縛其奴”,顏注:“陽即僞耳。”),這一意義後來用“佯”字表示。從表面上看,“佯”似乎是拋開母字字形另造的分化字。其實,古代多借用“詳”字來表示由“陽”引申出來的“佯”這個詞(上引《田儋傳》語,《史記》就作“田儋詳為縛其奴”),“佯”應該是改換“詳”字偏旁以表示其假借義的分化字。

分化文字職務的方法,大體上有以上所說的五種。此外還有些比較特殊的情況,這裏就從略了。

原載王問漁主編《訓詁學的研究與應用》(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今據以收入。

談談漢字整理工作中 可以參考的某些歷史經驗

在漢字發展演變的過程裏，有很多值得我們在今後的漢字整理工作中認真加以參考的歷史經驗。對這一問題作全面論述，不是這篇短文所能勝任的，下面只準備簡單談談字數和字形變化這兩方面的歷史經驗。

先談字數。一般都認為漢字是不斷增多的，而且增加的數量相當可觀。就大型字典收字的情況來看，確實是這樣。例如：公元2世紀編纂的《說文解字》收字9353個，加上重文共10516個。本世紀70年代開始編纂，去年已出版了第一卷的《漢語大字典》，全書收字56000左右，是《說文》字數的五倍多。但是大型字典裏收了很多實際上已經死亡的字，如果以各個時代一般使用的漢字為考察對象，就會發現漢字的數量其實是相當穩定的。

我們所說的一般使用的漢字，就是除去很生僻的字和比較專門的專業用字以後的實際使用的漢字，跟有些人所說的“通用漢字”大致相當。在具體劃定一般使用的漢字的範圍的時候，人們很難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見。所以即使是統計現在一般使用的漢字的數量，也很難得出一個公認的精確數字。統計歷史上一般使用的漢字的數量，困難當然就更大了。不過在這方面作一些比較籠統的估計，還是有可能的。由於掌握的資料太少，我們只能考察一下漢字發展史的上古和現代這兩頭的情況。先看現代漢字的情況。1965年1月由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聯合發佈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收字6196個。1981年國家標準局發佈的《信息交換用漢字編碼字符集·基本集》收字6763個（其中比較常用的一級字3755個）。據鄭林曦先生統計，現代書報刊物的用字數為6335個（鄭林曦《精簡漢字字數的理論和實踐》，1981）。據另一種統計，掌握了3800個漢字，就能閱讀一般書刊內容的99.9%左右；掌握了5200個漢字，就能閱讀一般書刊內容的99.99%左右（陳明遠《數理統計在漢語研究中的應用》，《中國語文》1981年6期468頁）。又據香港的一個統計，4份中文報在45天內所用字數為4687個（陳重瑜《試評漢字簡化的一

些論說》，《文字改革》1985年4期13頁）。此外，從漢字構詞能力的角度來看，據中國人民大學語言文字研究所統計，4990個漢字就“構成了《現代漢語詞典》中的幾乎所有的詞”（據上引陳明遠文469頁）。從上面舉出的一些數據來看，大致可以說，現在一般使用的漢字的數量是五六千左右（一般知識分子個人掌握的字數只不過兩三千左右）。

接着來看一下上古漢字的情況。在已發現的內容比較豐富的古文字資料裏，商代後期（約公元前14—前11世紀）的殷墟甲骨文字是時代最早的一批資料。出土的殷墟有字甲骨已達十五萬片左右（胡厚宣《八十五年來甲骨文材料之再統計》，《史學月刊》1984年5期），總字數當以百萬計，大體上應該能够反映商代後期一般使用文字的情況。1965年出版的《甲骨文編》根據當時已出版的40種甲骨著錄書的資料，整理出單字4672個。此書《編輯序言》認為“其中有些字還可以歸併；目前甲骨刻辭中所見到的全部單字的總數，約在四千五百字左右”（引者按：《甲骨文編》中也有應分而誤合之字，但數量不多）。于省吾先生在1973年發表的《關於古文字研究的若干問題》一文中也說：“截至現在為止，甲骨文不重複的字約共四千五百多個。”（《文物》1973年2期33頁）在此後新發表的甲骨文資料裏，出現了一些《甲骨文編》所未收的新字，但數量不是很多。如果把商代後期一般使用的漢字數量估計為五千個左右，大概離事實不會很遠。周代遺留下來的主要文獻是十三經。據《十三經集字》統計，十三經共用單字6544個（據錢玄《秦漢帛書簡牘中的通假字》轉引，見《南京師院學報（社科版）》1980年3期47頁）。十三經由於後世的傳抄刊刻，用字情況已不完全是原貌，但是在單字總數方面大體上總還是能够反映周代的情況的。十三經的時代延伸得比較長，幾乎包括了整個兩周時代，而且其中還有一些秦漢時代的東西。如果有可能以周代某一段一二百年的時間為範圍來進行統計，當時一般使用的字數大概要比十三經使用的字數低一些。

從上述情況來看，從商代到現代，一般使用的漢字的數量似乎並沒有顯著的變化，很可能一直在五六千左右。在這三千多年裏，新字在不斷產生，但是舊字也在不斷退出歷史舞臺。二者相抵，字數的變化就不大了。一般說來，時代越晚，新詞增加得越快。但是由於複合詞在漢語裏越來越佔優勢，音譯外來詞又大多數用假借字記錄，所以需要為它們造新字的新詞却並不是越來越多。這是一般使用的漢字的數量有可能比較穩定的重要原因。

漢字使用意符、音符和記號三種字符（字符專指文字所使用的符號，記號指跟文字所代表的詞在語音和意義上都沒有聯繫的字符，參見拙文《漢字的性質》，《中

國語文》1985年1期36頁),跟拼音文字相比,的確有結構複雜、不易記憶的特點。這種性質的文字體系,單字如果太多,使用的人就會無法掌握。所以漢字裏常常用假借等方法,讓一個字在不同場合代表不同的語素,也就是用一個字代表兩個以上不同的語素(對雙音節或多音節語素來說,則是語素的一個音節)。但是如果單字太少,讓一個字承擔過多的任務,或是讓一個字代表兩個容易混淆的語素,又會影響記錄語言的明確性,使用起來也會發生困難。在漢字發展的過程裏,幾乎始終同時存在文字分化和文字合併這兩種相反相成的現象。前者如由“師”分化出“獅”(“獅子”在古代本作“師子”),由“陳”分化出“陣”(軍陣之“陣”古本作“陳”)等等。從漢字歷史上看,新字大部分是分化字。後者如順逆之“逆”併入迎逆之“逆”,開耑之“耑”併入端正之“端”,又如漢字簡化中把“鬥”併入“斗”等等。進行合併是爲了控制單字的數量,進行分化是爲了加強記錄語言的明確性。字太多了固然不行,字太少了也同樣不行。漢字裏一般使用的字數從古到今變化不大,顯然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

建國後,有少數語文工作者主張通過以同音借代爲主的合併文字的辦法,大量壓縮通用漢字的數量,有的人甚至想把通用漢字砍掉一半以上。從三千多年的漢字發展史來看,這種辦法顯然是行不通的。如果方塊漢字還要長期使用下去的話,只允許漢字合併而絕對不允許進行新的文字分化,恐怕也是做不到的。

其次談字形變化。這裏所說的字形變化是廣義的,既包括某一個字的寫法的變化,也包括某一個語素前後使用不同的字,即原來用甲字表示後來改用乙字表示的那種現象。鬥爭的“鬥”這個詞本來用“鬥”字,由於漢字簡化改用“斗”字,就是後一種現象的一個例子。

一般都認爲歷史上漢字字形變化的主要趨勢是簡化。這應該說是正確的。但是在這個問題上也存在一些不够全面的認識。

有的人把字形簡化跟減少筆畫等同起來。這跟歷史事實有出入。

在漢字發展史上,由古文字演變爲隸書,是最重要的一次字形簡化。這次簡化使帶有圖繪性質的象形的字符變成用點、橫、撇、捺等筆畫組成的字符,大大方便了書寫。由於這次簡化的主要目的是改造那些需要描畫的不便於書寫的形體,所以並不斤斤計較筆畫的多少。有些字經過隸書的改造,筆畫甚至反而增多了。如“日”字的外框在古文字裏是可以一筆畫成的圈圈,在隸書裏却分解成了三筆(豎、折、橫)或四筆(豎、橫、豎、橫)。但是隸書的“日”書寫起來的確比古文字的“日”方便,所以我們還得承認由古文字的“日”變爲隸書的“日”是簡化。

爲了擺脫古文字的象形性質以便書寫，隸書不得不破壞了一部分字的結構。經過隸書的改造，獨體表意字（大致相當於一般所謂象形字）的字形大都喪失了表意作用，它們成了所謂“不象形的象形字”，用我們的話來說就是成了記號字。一部分圖繪意味比較濃厚的合體表意字的構造也遭到了破壞。例如象二人並立之形的𠂔字，變成了字形毫無意義可言的記號字“並”（現已併入“并”字）。但是由常見的成字的偏旁所組成的合體表意字和形聲字的結構，絕大多數沒有遭到破壞。尤其是形旁的表意作用和聲旁的表音作用都很明確的那些形聲字，它們的結構幾乎全都沒有遭到破壞。僅僅爲了減少一些筆畫而破壞文字結構的情況，在古文字演變爲隸書的過程裏是並不多見的。所以從歷史上看，不但不能把字形簡化跟減少筆畫等同起來，甚至能否把減少筆畫看作字形簡化的主要內容都還是個問題。

還有人由於過分強調簡化的重要性，而忽視了對漢字的發展起了正面作用的大量字形繁化現象的存在，至少對這種現象的重要性估計不足。

在漢字發展的過程裏，一方面存在爲了書寫的方便而簡化字形，甚至不惜因此破壞文字結構的現象，另一方面也存在爲了改進文字的功能，主要是字形的表意、表音功能，不惜使字形繁化的現象。

形聲化是漢字發展的一個極爲重要的標誌，而形聲化就往往是跟字形的繁化聯繫在一起的。前面舉過的“獅”字就是一個例子。假借字“師子”的“師”加上“犬”旁，成爲形聲字“獅”。對於“獅”這個詞來說，它的字形就繁化了。這類例子是極其常見的（被加偏旁的字不限於假借字）。有些表意字後來被改成了字形較繁的形聲字。例如象坎穴形的“凵”字，後來就改成了从“土”“欠”聲的“坎”字。有時爲了改善假借字或形聲字聲旁的功能，也不惜改用筆畫較多的字。例如：表示古漢語裏主要的第二人稱代詞的假借字，本來用“女”字，後來改用表音更確切，並且其原來字義跟假借義不會發生混淆的“汝”字。形聲字“褲”本來寫作“袴”，後來聲旁“夸”爲表音更確切的“庫”所取代。“褲”字《康熙字典》未收，大概出現得很晚，從傳統文字學的觀點看是一個“俗字”。“庫”字未簡化時比“夸”多四筆。但“夸”、“褲”不同音，“庫”、“褲”同音，所以大家寧願多寫幾筆，接受了這個俗字。

此外，還存在僅僅爲了避免跟其他字的字形相混淆而繁化某個字的字形的現象。例如“上”、“下”二字本來寫作“𠂔”、“𠂔”，爲了避免與一二之“二”相混，後來各加一豎而寫作“上”、“下”。“四”字古作“𠂔”，改作“四”也是爲了避免跟“一”、“二”、“三”相混。這跟數字大寫的用意相同（“四”用作數字，可能是假借用法，大寫數字也大多是假借字）。

上面所舉的那些字形繁化的現象,大多數起了改善字形的表意、表音功能的作用。當然,改善字形的表意、表音功能,也並非一定要繁化字形。簡化字形跟改善字形的表意、表音功能也有相一致的情況。例如改“孌”爲“奶”,既是簡化,又改善了聲旁的表音功能。但是在許多情況下,簡化字形對字形的表意、表音功能是起破壞作用的。漢字裏的記號字大部分是字形簡化的產物。這是爲了書寫方便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從歷史上看,對於漢字的發展,字形的簡化是不可缺少的,改善文字功能的字形繁化也同樣是不可缺少的。只重視前者的作用而不重視後者的作用,是不妥當的。如果古人把字形的表意、表音功能放在無足輕重的地位,絕對排斥字形繁化,一味追求字形簡化,漢字裏的記號字就會大大增多。記號字的字形跟字音、字義都沒有聯繫,掌握起來要比掌握合乎規律的形聲字和表意字困難得多。在我們現在使用的漢字裏,記號字已經佔有不算小的比例了。如果這種字大大增多的話,漢字勢必成爲非常難掌握,甚至根本無法掌握的一種文字。

最後還應該指出,簡化字形的重要性在古代和現代是有所不同的。古人爲了把象形的古文字簡化成隸書而破壞一部分字的結構,是不得已的,也是值得的。今天,在比隸書更便於書寫的楷書早已形成的情況下,僅僅爲了減少一些筆畫而去破壞某個字的結構,或打亂某一組字的系統性(如讓有些从“盧”聲的字从“户”),這樣做究竟是不是必要,是不是值得,就大可懷疑了。有的人援引隸書改造古文字的例子,作爲這類簡化的歷史依據。這是不合適的。在不太遠的將來,隨着電腦和複印機等設備的普及,書寫文字的負擔肯定會大大減輕。今後的漢字整理工作,究竟應該把重點放在簡化上,還是放在文字結構的合理化上,這恐怕是一個需要認真考慮的問題。

原載《語文建設》1987年2期,又載《現代漢字規範化問題》(語文出版社,1995)、《裘錫圭學術文化隨筆》,今據《裘錫圭學術文化隨筆》收入。

研究漢字切忌爲感情所支配

過去有不少人認爲漢字跟拼音文字相比是一種落後的文字，漢字沒有發展成爲拼音文字是歷史的錯誤，是由於封建統治階級起了阻障作用。這種看法未必妥當。漢語中單音節語素佔優勢，同音語素很多。記錄這樣的語言，漢字這種類型的文字體系顯然是比較適宜的。脫離漢語的特點，抽象地討論漢字跟拼音文字的優劣，是沒有意義的。

應該承認，在文字信息處理方面，漢字的確有不如拼音文字方便的地方。我們相信在科學技術迅速發展的今天，這方面的困難是有辦法克服的。漢字信息處理技術目前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我們應該更快地發展有關的科學技術，使漢字信息處理變得越來越方便；而不能脫離實際，爲了文字信息處理的方便，勉強地去改革漢字。

我們說不能脫離漢語實際抽象地討論漢字跟拼音文字的優劣，並不意味着反對把漢字作爲一種符號體系或信息載體來研究其優缺點。

要想提高漢字研究和教學的水平，這方面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爲了今後更好地開展漢字的整理和改革工作，更需要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作爲考慮的出發點。這方面的研究我們過去做得很不够，而且研究者往往容易被感情所支配。認爲漢字不能拼音化的同志千方百計給漢字評功擺好，甚至把缺點也說成優點。主張漢字拼音化的同志則只看到漢字的缺點，甚至連漢字真正的優點也不願承認。只有克服了這兩方面的偏向，才有可能使我們的研究走上軌道。

最後附帶談一下對當前一部分人濫用繁體字的意見。50年代以來的漢字整理和簡化工作雖然有缺點，但成績還是主要的。《簡化字總表》、《現代漢語通用字表》是我們使用漢字的規範。在沒有必要的場合使用已廢除的繁體字，尤其是在面向大家的招牌上和電影、電視的字幕裏使用繁體字，是沒有道理的。如果一定要使用繁體字，就應該使用得正確。但是很多喜歡寫繁體字的人，對繁體字並不熟悉。因此，把“復印”錯誤地繁化爲“復印”（繁體字本作“複印”）、由於不願寫簡化的

“𠂔”旁而把“易”旁誤寫爲“易”旁一類現象，就隨處可見了。在中央電視臺介紹電視片《末代皇帝》的演員的專題節目裏，屏幕上甚至出現了“西太後”字樣。這並不是寫繁體字，而是寫不折不扣的錯別字。希望有關方面加以引導，使這種怪現象及早消滅。

原載《漢字文化》1989年1期，今據以收入。

漢字的起源和演變

世界上目前正在使用的各種文字以漢字為最古老。漢字的歷史究竟可以上溯到什麼時代？漢字從古到今發生過哪些重要變化？這是關心中國文化史的人都很感興趣的問題。下面介紹一下這方面的知識。

第一節 漢字的起源

事物的形成一般都要經歷一個或長或短的過程，文字也不例外。以別的語言的文字為依傍，有時能為一種語言很快地製定出一套完整的文字來。但是就完全或基本上獨立創造的文字來說，從第一批文字的出現到能夠完整地記錄語言的文字體系的最後形成，總是需要經歷一段很長的時間的。還不能完整記錄語言的文字可以稱為原始文字。漢字是一種獨立創造的文字，它無疑是在經歷了相當長的原始文字階段以後，才發展成為完整的文字體系的。所以漢字起源的問題實際上包含了下述兩方面的內容：漢字是怎樣從最原始的文字逐步發展成為能夠完整地記錄漢語的文字體系的；漢字這一文字體系的形成過程開始於何時結束於何時。由於缺乏原始漢字的資料，對這兩個問題目前都還無法作出確切的答覆。下面先對已有的關於漢字起源的一些說法略作討論，然後簡單談談我們對漢字形成的過程和時間的一些初步推測。

（一）關於漢字起源的舊說

1. 倉頡造字的傳說

這一傳說最早見於戰國晚期的文獻：

奚仲作車，倉頡作書，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鯀作城，此六人者，所作當矣。

《呂氏春秋·君守》

沮誦、倉頡作書。

《廣韻》魚韻“沮”字下引《世本》

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

《韓非子·五蠹》

秦代李斯所編的字書《倉頡篇》也是由於首句是“倉頡作書”而得名的。古人稱文字爲“書”，作書就是造字。

倉頡作書的傳說在戰國晚期顯然已經很流行。這一傳說無疑在較早的時候就已經出現了。它有沒有某種程度的可靠性呢？漢字當然不是個別人造出來的。不過在漢字形成的過程裏，尤其在最後階段，很可能有個別人曾起過極其重要的作用。倉頡也許就是這樣的人。早在戰國晚期，就有學者作過類似的解釋。《荀子·解蔽》說：“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認爲倉頡只是衆多“好書者”中由於用心專一而最有成就的一個。

但是上引《呂氏春秋》所舉的六個人，除倉頡外都是見於時代較早的典籍的古史名人，唯獨倉頡在現存的早於戰國晚期的古籍中從來沒有提到過，在戰國晚期的古籍中也沒有關於倉頡的時代以及他在造字之外的事跡的任何記載。漢代人多認爲倉頡是黃帝的史官（《尚書·序》孔穎達《正義》：“司馬遷、班固……皆云倉頡黃帝之史官也。”），恐怕未必有確據。魏晉以後人把倉頡說成早於黃帝的遠古帝王，就更荒誕無稽了。（參看唐蘭《中國文字學》53—54 頁。以下引作“唐書”。【編按：近年發表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中的《容成氏》，所舉遠古帝王中有“倉頡氏”，可見戰國時人已以倉頡爲古帝王。但他大概不是一個真實的歷史人物。】）也許倉頡只是古人所虛擬的一個文化英雄。

在上引《世本》中跟倉頡並提的沮誦，也是名不見經傳的人物。漢魏間的宋衷的《世本》注說：“黃帝之世始立史官，蒼頡、沮誦居其職。”（《初學記·卷二十一·史傳第二》引）恐怕也是想當然的說法。近人唐蘭、高亨懷疑“沮誦”就是“祝融”（唐書 52 頁、高亨《文字形義學概論》27—28 頁。高氏認爲祝融是倉頡的官名），是否可信，尚待研究。

2. 文字出自八卦說

這是較晚出的一種說法。

古代學者很早就認爲在文字產生之前，結繩和八卦曾經起過某些類似文字的作用。一般認爲作於戰國晚期的《易·繫辭·下》說：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罔（網）罟，以佃以漁……

又說：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

包犧氏就是伏犧氏。“書契”據漢末鄭玄注，指寫有文字的木質契券。後來這個詞往往用作“文字”的同義語。東漢許慎所著的《說文解字》“敘”（通“序”）文的第一段，是根據上引《繫辭》文改寫的。比較重要的改動是把“結繩而治”歸在晚於伏犧氏的神農氏名下，並指實“後世聖人”為“黃帝之史倉頡”。不過不管是《繫辭》還是《說文》“敘”，都沒有直接把八卦跟文字聯繫起來。

《尚書》僞孔傳的“序”說：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這篇序的作者大約是魏晉時人。他認為三皇時代就已出現文籍，所以把“造書契”這件事提早到了伏犧之世，與“畫八卦”並列，同時不得不把為書契所取代的“結繩之政”推到了伏犧王天下之前。但是他也還沒有直接把八卦跟文字聯繫起來。

據《易經》的《象傳》和《說卦傳》，乾、坤、震、巽、坎、離、艮、兌八卦分別是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的象徵。易緯《乾鑿度》進一步認為八卦就是“天”“地”等八個字的“古文”。易緯本出漢代，但是今所傳《乾鑿度》一般認為是宋代僞書。上引說法究竟出於何時尚難確定。如果撇開此說不管，最先明確主張“天”“地”等字出自相應卦形的，似是一些宋代學者。下面舉比較有代表性的鄭樵的說法略加評論。

鄭樵在《通志·六書略·第五》“因文成象圖”節中說：

有近取：取𠄎（天）於☰（乾體）。取𡿨（地，亦為坤字）於☷（坤體）。取𡿨（水）於☵（坎體）。取𡿨（火）於☲（離體）。……有遠取：取“山”於☶（艮體）。取“雷”於☳（震體）。取“風”於☴（巽體）。取“澤”於☱（兌體）。

在“論便從（縱）”節中又說：

坎、離、坤、衡卦也。以之為字，則必從。故☵必從而後能成“𡿨”，☷必從而後能成“火”，☲必從而後能成“𡿨”。

鄭樵顯然是先有了“天”“地”等字應該出自相應卦形的成見，然後去硬加比附的。“山”“雷”“風”“澤”諸字跟相應的卦形實在太不相像，只得立了一個“遠取”的名目來搪塞。近取諸例中，“天”與乾卦，“火”與離卦，其實也都並不相似。“𡿨”在古

書中有用爲“坤”字之例(《經典釋文·周易音義》說“坤”“本又作𪚗。𪚗,今字也。”),但並無用爲“地”字之例。漢碑“坤”字作川 𪚗 𪚗 𪚗 等形,即“𪚗”字所從出。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一“𪚗”字條,據漢碑和《玉篇》等,指出漢人借“川”爲“坤”,“𪚗”即“川”之變體。這是很對的。“川”字本作“𪚗”,三筆的中部都不作尖折形,跟坤卦之形也聯繫不上。只有“水”字跟坎卦的確比較相似。但是八卦是由陽爻“—”和陰爻“- -”組合而成的八組符號,古文字中的“水”則是個象形字,二者的相似只能認爲是一種巧合。“水”字決不會是根據坎卦造出來的。古人以坎卦爲水的象徵,倒有可能是由於受了坎卦之形與“水”字相似的啓發。總之,“天”“地”等字出自八卦之說是完全不可信的。

清末民初的劉師培也認爲“八卦爲文字之鼻祖,乾坤坎離之卦形即天地水火之字形”(《中國文學教科書》“象形釋例”節)。他還把結繩也扯了進來,說“字形雖起於伏羲畫卦,然漸備於神農之結繩”(同上“論字形之起源”節)。這種很沒有道理的說法,在當時却產生過不小的影響。

在商代和西周時代的甲骨文、金文和陶文等資料裏,屢見一種用三個或六個數字組成的符號,如 𠄎 (八一六) 𠄎 (六一八六一一) 等。近年來經過張政烺等學者的研究,證明是一種易卦(張政烺《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之易卦》,《考古學報》1980年4期)。相傳的周易卦形中的陽爻可能是由數字“一”變來的,陰爻可能是由數字“𠄎”(六)變來的(參看樓宇烈《易卦爻象原始》,《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1986年1期)。這種爻形出現的時代,無疑要比漢字起源的時代晚得多。從這些新的研究成果來看,文字之形出自八卦的說法的荒謬性就更明顯了。

(二)跟漢字起源有關的考古資料及其研究情況

在已發現的各種性質既明確、內容也比較豐富的古漢字資料裏,時代最早的是商代後期(約前14—前11世紀)的殷墟甲骨文。它所代表的是已經能够完整地記錄漢語的文字體系。現代考古學在中國興起以後,主要是50年代以來,陸續發現了少量商代前期(約前17—前14世紀)的漢字以及一些跟漢字的起源可能有關的考古資料。後者主要指刻劃或繪寫在原始社會時期遺物上的各種符號以及被有些學者認爲是夏代文字的一些符號。這些資料還不足以解決漢字起源問題,但是對這方面的研究工作起了相當大的推進作用。

根據外形上的特點,大體上可以把原始社會時期遺物上的符號分爲兩大類。一類是象實物之形的。一類是幾何形符號。有些雖非幾何形但也不像是象實物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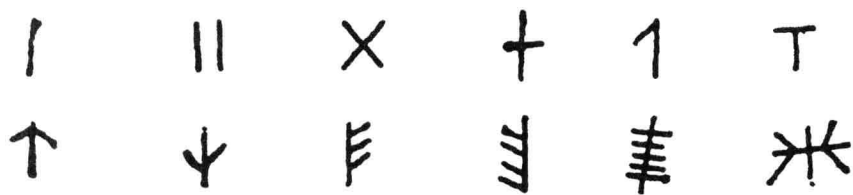
形的符號，可以附在後一類裏。下文稱後一類爲甲類，前一類爲乙類。

1. 原始社會時期的甲類符號

就已發現的情況來看，甲類符號絕大部分刻劃或繪寫在陶器上，小部分刻在龜甲、獸骨或骨器上。這類符號分佈得很廣，在仰韶、馬家窑、龍山、良渚等文化的遺址中都有發現（參閱拙文《漢字形成問題的初步探索》，《中國語文》1978年3期。下文引作“探索”。我們所說的“遺址”包括墓地在內）。它們行用的時間也很長久。就上限來說，在距今七八千年的早於仰韶文化的大地灣一期文化遺址和接近裴李崗文化的“賈湖”遺址裏，都已發現了這類符號。大地灣一期文化的符號發現於甘肅秦安縣大地灣，是用顏料繪寫在陶鉢形器內壁上的（《文物》1983年11期22—25頁）。“賈湖”符號發現於河南舞陽縣賈湖，是刻在龜甲等物上的（《河南舞陽賈湖新石器時代遺址第二至六次發掘簡報》，《文物》1989年1期）。就下限來說，這種符號不但直到原始社會末期還在使用，而且在進入歷史時期以後，在漢字已經形成的情況下，仍然在某些領域延續使用了很長的一段時間。在商代以至春秋戰國時代的陶器上，都可以看到不少這一類的符號（參看高明《中國古文字學通論》36頁。甚至在某些西漢陶器上都還可以看到這類符號，參看《廣州漢墓》上冊89—91、210—211頁）。

在甲類符號裏，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類型遺址出土陶器上的符號，時代既比較早（距今約六七千年），資料也比較豐富，因此在關於漢字起源的討論中最受人注意。我們就以它們爲例來討論一下甲類符號跟漢字的關係。

在半坡類型各遺址中，西安半坡和臨潼姜寨這兩個遺址發現的符號數量最多。下面是半坡遺址發現的符號的一些例子（引自《西安半坡》197頁圖141，又圖版167—171）：



臨潼姜寨遺址發現的符號，有不少跟半坡的相同或相似，此外還有一些形體比較複雜的例子，如（引自《考古與文物》1980年3期15頁）：



半坡類型符號一般是單個地刻在陶鉢外口緣的黑寬帶紋或黑色倒三角紋上的,例外很少。

對半坡類型符號的性質存在不同看法。有些學者認為它們是文字。有的並且把它們跟古漢字直接聯繫了起來,如認為×是“五”字,十是“七”字,丨是“十”字,丁是“示”字,丩是“艸”字,𠂔是“阜”字,等等(于省吾《關於古文字研究的若干問題》,《文物》1973年2期32頁)。有些學者則認為這種符號還不是文字,而“可能是代表器物所有者或器物製造者的專門記號”(《西安半坡》198頁)。還有學者認為它們只不過是製造陶器時“為標明個人所有權或製作時的某些需要而隨意刻劃的”(汪寧生《從原始記事到文字發明》,《考古學報》1981年1期23頁。下文引作“汪文”)。

這種符號所代表的顯然不會是一種完整的文字體系。它們有沒有可能是原始文字呢?恐怕也不可能。我們絲毫沒有掌握它們已經被用來記錄語言的證據。從同類的符號在漢字形成後還在長期使用這一點來看,它們也不像是文字(參看上引高明書35—36頁)。把半坡類型的幾何形符號跟古漢字裏象實物之形的符號相比附,更是我們所不能同意的。這兩種符號顯然是不同系統的東西。我們不能因為前一種符號跟後一種符號裏形體比較簡單的例子(如草的象形符號)或某些經過簡化的形式(如殷墟甲骨文裏的“示”和某些“阜”旁)偶然同形,就斷定它們之間有傳承關係。

但是已發現的半坡類型符號,絕大部分都刻在同一種陶器的同一個部位上,規律性很強。有些符號不但重複出現在很多個器物上,而且還出現在不同的遺址裏。看來這種符號,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很可能已經比較固定地用來表示某些意義了。除了用作個人或集體的標記之外,這種符號也有可能用來表示其他意義。

沒有文字的民族往往已經知道用符號記數。我國原始社會使用的甲類符號估計也不會沒有這種用途。古漢字除了使用象實物之形的符號之外,也使用少量幾何形符號。一、=、≡、≡(四)、X(五)、^ (六)、+(七)、八(八)、丨(十)等數字是最明顯的例子(數字“九”很多學者認為是一個假借字)。跟這些數字同形或形近的符號,在我國原始社會使用的甲類符號裏是常見的。很多學者認為這種符號就是這些數字的前身,這是有道理的。不過這並不能證明原始社會使用的記數符號是文字。因為這種符號並不跟語言裏的數字嚴格相對應。過去雲南的哈尼族由於不會使用文字,在訂立買賣契約的時候,用𠂔、十、丨、·四種符號分別代表

一百元、五十元、十元和一元。要表示五元就點五個點(汪文 12 頁)。這是記數符號並非文字的一個實例。

此外還應該指出一點。由於構成甲類符號的要素一般比較簡單,不同地區的人很容易造出相同的符號來。這種同形的符號,其意義往往並不相同。所以雖然古漢字有些數字的外形跟半坡類型符號相同,我們仍不能得出這些數字就源於半坡類型符號的結論。它們完全有可能出自其他原始文化。

商代和西周時代(主要是西周前期)的銅器上常常鑄有族徽(這裏所說的族徽包括族名)。大部分族徽具有象形程度明顯高於一般銅器銘文的特點,而一小部分則跟原始社會的甲類符號很相似,例如:



它們也有可能源於這類符號(參看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考古學報》1972 年 1 期 4—5 頁)。原始社會裏用作個人或集體的標記的符號,是很容易變成族徽的。在商周時代,這一小部分族徽符號是否已經成為文字,還是一個問題(參看汪文 39 頁)。它們的性質也許就跟後代的花押差不多。

總之,我們認為我國原始社會時期普遍使用的甲類符號還不是文字。除了有少量符號(主要是記數符號)為漢字所吸收外,它們跟漢字的形成大概就沒有什麼直接關係了。而且即使是那些為漢字所吸收的符號,也不見得一定是來自半坡類型符號的。有些學者以半坡類型符號為據,說漢字已有六千年以上歷史。這是不妥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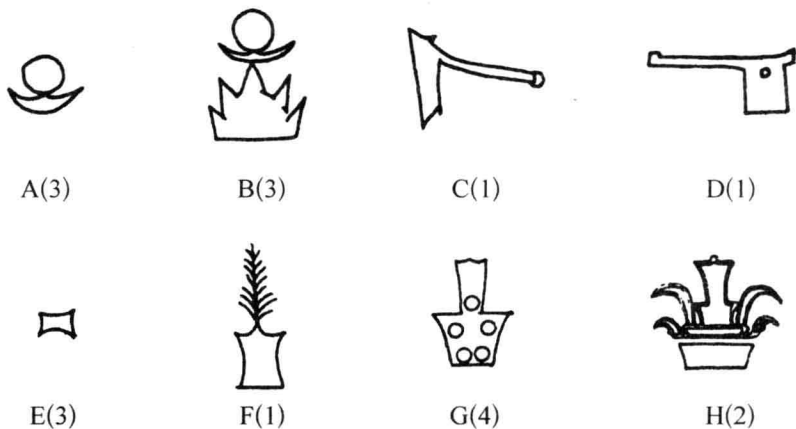
近年在西安市郊區長安縣花樓子的客省莊二期文化遺址裏,發現了一些刻在骨片和骨器上的甲類符號(《陝西長安花樓子客省莊二期文化遺址發掘》,《考古與文物》1988 年 5、6 合期)。有人稱之為甲骨文,認為跟殷墟甲骨文有淵源關係。這恐怕也是不妥當的。

2. 原始社會時期的乙類符號

在田野考古中,乙類符號主要發現於山東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遺址,一般都刻在一種大口的陶尊上。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年代約為前 2800—前 2500 年。近年王樹明在《談陵陽河與大朱村出土的陶尊“文字”》一文中,集中發表了大汶口文化乙類符號的資料(文見《山東史前文化論文集》,齊魯書社,1986。下文引作“王文”)。據此文,已發現的刻有符號的陶尊和殘器片共有十六件。其中十五件是在莒縣的陵陽河和大朱村採集或出土的,一件是在諸城縣前寨採集的。出土的大都出自墓

葬。這些墓葬大部分有豐富的隨葬品，墓主身份似比一般人高。

十六件陶尊及殘器片上，共刻符號十八個，可以歸納為八種，下面每種各舉一例（各種符號以拼音字母為代號，旁注數字表示出現次數）：



B 是在 A 下加山形而成的。G 跟 H 上部的中間部分象同一種東西。這些符號絕大多數刻在陶尊外壁靠近口沿的部位（下文依王文稱為頸部），少數刻在外壁近底處。通常一個陶尊只刻一個符號，只有兩件陵陽河採集的陶尊刻有兩個符號。一件頸部刻 G，近底處刻 E。一件在頸部兩側分刻 G 與 D。G 四見，都塗朱。H 兩見。完整的一例即上圖所示，下部盆形是朱繪的（未刻），其他部分塗朱。殘缺的一例不塗朱。他種符號各例，除諸城前寨採集陶片上殘去左上部的符號 B 塗朱外（《文物》1974 年 1 期 75 頁），全都不塗朱，就是跟塗朱的 G 共見於一器時也不塗朱。

在山東泰安、寧陽二縣之間的大汶口墓地的發掘中，曾在一個大汶口文化中期的墓葬中發現過一件背壺，器身上半有如下朱繪符號（《大汶口》73 頁）：



這個符號跟晚期陶尊上的乙類符號是否屬於一個系統，尚待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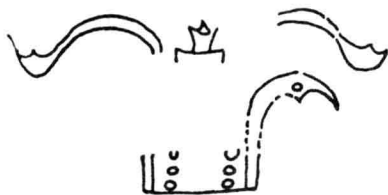
上舉 A—D 四例，在 1974 年出版的《大汶口》考古報告中就已發表。在 70 年代有好多位學者對這種符號作過研究。1986 年發表的王文和接着發表的李學勤的《論新出大汶口文化陶器符號》（《文物》1987 年 12 期。下文引作“李文”），根據新的資料作了進一步的研究。

對這種符號的性質主要存在兩種看法。有些學者認為它們是文字，並且把它們當作比較原始的漢字加以考釋。例如：于省吾在《關於古文字研究的若干問題》

裏釋 A 爲“旦”(《文物》1973 年 2 期 32 頁)。唐蘭在《關於江西吳城文化遺址與文字的初步探索》等文中釋 A 爲“炅”, B 爲“炅”的繁體, C 爲“斤”, D 爲“戊”和“戊”(《文物》1975 年 7 期 72—73 頁。唐氏以爲“戊”“戊”古爲一字)。李學勤釋 B 爲“炅山”合文(下文所引《起源》155 頁), F 爲“封”, 並指出 E 也見於甲骨文和銅器銘文, 在那些資料裏用作人名或族氏(李文 78 頁)。有些學者則認爲這種符號還不是文字, 例如汪寧生認爲它們“屬於圖畫記事的範疇”, 是“代表個人或氏族的形象化的圖形標記”(汪文 27 頁)。此外, 這兩派學者裏都有人主張某些符號與祭祀或器主的身份有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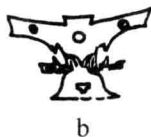
在良渚文化(?)或作風接近良渚文化的某些遺物上, 可以看到跟上舉大汶口文化乙類符號相類甚至相同的符號。

南京北陰陽營遺址二號灰坑曾出土一個大口陶尊, 頸部刻有如下符號(引自李文 79 頁)。這個符號跟上面舉過的 H 很相似, 似可看作同一符號的異體。據發掘單位的文章, 北陰陽營二號灰坑遺存“大體與張陵山類型相近……可能屬於張陵山類型向良渚類型過渡階段”(《文物》1978 年 4 期 52 頁)。



解放前流入美國、現藏於華盛頓的弗利爾美術館的幾件古玉器, 也刻有這類符號。首先注意到這批資料並加以研究的, 是日本學者林巳奈夫。後來李學勤也進行了研究, 其意見發表在《考古發現與中國文字起源》(《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二輯, 1985。下文引作“起源”)以及上引李文中。下面主要根據李學勤的文章介紹一下這批玉器上的符號(有關的圖皆轉引自《起源》157 頁)。

這批玉器包括一件“玉臂圈”(?)和三件玉璧。玉臂圈兩側各刻一個符號:



a 跟上面舉過的 A 相同。三件玉璧上各刻一個複合符號(圖見下頁)。這三個複合符號都以“作鳥立於山上之形”的符號爲主體。其山形跟上面舉過的 B 的山形一



樣，也有五個峰，“不過峰頂是平的”。《起源》把這個符號釋為“島”字(155 頁)。c 的下部包含一個跟“臂圈”的 a 相同的符號，只是象太陽的圓圈形內加了文飾。d 的山形之內，上部有一個跟“臂圈”的 b 有點相似的符號，底部所添加的究竟是符號還是文飾不易斷定。e 的山形之內也有一個符號。這個符號也許是一個甲類符號。刻有 c 的玉璧的邊緣上還刻有如下兩個符號：



李文已指出 f 跟上面舉過的 F 是同一符號的異體(78 頁)。

林已奈夫和李學勤都認為上述玉器是良渚文化的遺物。良渚文化的年代約為前 3300—前 2200 年。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年代正在其範圍之內。這兩種文化分佈的地域比較接近，並有某些同類型的器物，彼此顯然是互有影響的。所以李學勤認為“這兩種文化有共同的文字聯繫，實在情理之中”(《起源》156 頁)。他把大汶口文化乙類符號和上述玉器上的符號都看作文字，所以用“共同的文字聯繫”這種說法。不同意把大汶口文化乙類符號看作文字的學者，當然也不會同意把上述玉器上的符號看作文字。

近年在國內博物館藏品中也發現了兩件刻有這類符號的玉器。兩件玉器都是大型玉琮，形制相類。首都博物館收藏的一件，上端兩側面各刻一個符號。其中一個跟上舉玉璧上的幾個符號相類，也是以“作鳥立於山上之形”的符號為主體的複合符號。另一個符號已磨損不可辨。李文認為這件琮屬良渚文化玉琮中最晚的一式(78—79 頁)。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的一件據傳出於山東省，上端正中刻有跟“玉臂圈”的 a 相同的符號，底部內壁一側刻有斜三角形。發表者認為此琮與“玉臂圈”應為大汶口文化遺物(石志廉《最大最古的 Q 紋碧玉琮》，《中國文物報》1987 年 10 月 1 日 2 版。此文稱“玉臂圈”為“矮筒形小玉琮”)。還有學者認為此

琮是山東龍山文化遺物(安志敏《關於良渚文化的若干問題》,《考古》1988年3期241頁、245頁注⑭)。由於在考古發掘中尚未發現過刻有這類符號的同類玉器,上述那些玉器究竟應該歸屬於哪種文化,還是有待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我們過去曾經根據前面舉出的A—D四個符號,斷定大汶口文化乙類符號是用作族名的原始文字,並認為它們跟古漢字之間很可能“存在着一脈相承的關係”(《探索》165—166頁)。現在看來,這樣說是不妥當的。正如上引汪文所指出的,“真正的文字要從表音開始,是能够記錄語言的符號。陶器上這幾個孤立的圖形,還不能證明這一點”(28頁)。而且如果說A—D這幾個符號確實跟古漢字很相似的話,新出的G、H兩個符號以及玉器上的鳥立山上形符號和符號b,跟古漢字顯然就不怎麼相似了。所以把這類符號看作原始文字是根據不足的,把它們直接看作古漢字的前身就更不妥當了。

估計刻在陶尊上的乙類符號可能有兩種用途。有的用作性質接近後世的族氏或人名的標記,有的用作器主或其所屬之族的職務或地位的標記。在同一個陶尊上出現的兩個符號也許是分屬這兩類的。汪文說:“這些圖形(引者按:指乙類符號)刻於陶器上,當是作為作器者的一種氏族標記。例如,石斧形標記可能代表善製石斧的氏族……”(28頁)。他說的這種標記接近我們所說的後一種標記。不過古代往往“以官為氏”、“以爵為氏”、“以技為氏”(參看《通志·氏族略》),後一種標記往往會轉化為前一種標記,二者的界綫不是絕對的。玉器上的符號的用途尚待研究。

一個象形符號如果用作了性質接近後世族氏或人名的標記,從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可以認為已經變成了文字。例如一個名“鹿”的族用象鹿之形的符號(也可以說“鹿的圖形”)作為自己的標記,這跟用“鹿”的象形字來記錄“鹿”這個族名豈不是一回事嗎?但是實際上問題並不這樣簡單。早在舊石器時代,只要人們已經會畫鹿,就有可能指着鹿的圖形說出“鹿”這個詞來。我們能不能說這時“鹿”字就產生了呢?當然不能。因為這跟有意識地用鹿的象形符號來記錄成句的語言中的“鹿”這個詞,完全是兩回事。根據考古工作者的研究來看,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社會的貧富分化已經相當顯著,階級的形成已經不是遙遠的事情了。在這種條件下使用的作為族或個人標記的象形符號,跟原始社會較早時期的圖畫當然不能等量齊觀。但是在並非用來記錄成句語言中的詞這一點上,二者却是相同的。所以我們還不能把這種符號看作文字。

另一方面也應該看到,大汶口文化乙類符號雖然不能斷定為原始文字,畢竟是

我國已發現的最像古代象形文字的一種符號。從有些符號在並非出於一地的遺物上不止一次地出現的情況來看,這種符號的穩定性顯然也是相當強的。它們無疑可以看作原始文字的先驅。如果文字形成的過程接着開始的話,它們的大多數應該是會轉化成文字的。大汶口文化分佈的地域接近古代中國的中心地區。有些大汶口文化乙類符號的作風,跟古漢字確實很相似。看來這種符號雖然不見得是原始漢字的前身,但是很有可能曾對原始漢字的產生起過某種影響。

在這裏附帶討論一下前面講甲類符號時提到過的、商周銅器上象形程度比較高的那類族徽的性質。下面是這類族徽的一些例子:



龍



蜚



未



戎(?)

上引汪文認為這類族徽跟大汶口文化乙類符號一樣,是一種“圖畫記事”,而不是真正的文字(33 頁)。這類族徽的確可能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早在原始漢字產生之前就已經出現。在當時它們當然還不是文字。但是汪文也承認“圖畫記事”中的“大部分圖形成為後來文字的前身”(40 頁)。在漢字形成的過程裏,那部分族徽無疑大都轉化成為文字了。而且象形程度較高的族徽肯定也有一部分是在漢字形成後才被使用的。這部分族徽一般都應該是文字。所以我們認為商周銅器上象形程度較高的族徽,至多只會有很小的一部分還不是文字。它們的絕大部分是沒有理由不當作文字看待的。由於族徽具有保守性,同一個字在銅器上用作族徽時的寫法,往往要比一般使用時更接近圖形。這種區別是文字的古體與今體之別,而不是圖形與文字之別。事實上銅器上的族徽的寫法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同一個族徽往往有時寫得比較象形,有時則寫得跟一般金文比較接近。有些圖繪性比較濃厚的、現在還無法確釋的族徽,在殷墟甲骨文中有作為族名或人名使用的例子。它們作為文字的性質是不容懷疑的。這一點郭沫若在《殷彝中圖形文字之一解》中早就指出來了(見《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

在一般稱為族徽文字的象形程度較高的金文裏,有一些字是用作個人的私名的。所以有的學者把這種金文稱為記名金文,而不稱為族徽金文或族名金文。我們在下文中也採用這一名稱。

3. 關於所謂夏代文字

一般認為夏代已經進入階級社會時代。目前除少數學者外,大家都認為夏代

應該有文字，至少應該已有原始文字。但是在考古發掘中却還沒有發現確鑿無疑的夏代文字。

在河南偃師縣的二里頭文化遺址裏發現過一些刻在陶器上的符號，例如（引自《考古》1965 年 5 期 222 頁）：



這些符號大多數刻在大口尊的內口沿上。它們大都發現於二里頭遺址的三、四期地層，屬於二里頭文化後期。二里頭文化後期，有人認為相當於商代早期，有人認為相當於夏代。持後一種看法的學者大都把上舉這種符號看作夏代的文字。我們認為這種符號跟原始社會時期的甲類符號屬於一個系統，不但不可能是成熟的文字，而且也不可能是原始文字。

陝西商縣紫荊的二里頭文化遺址裏也發現過少量刻在陶器上的符號，個別的可能是象形符號。報導者認為可能是夏代文字（王宜濤《商縣紫荊遺址發現二里頭文化陶文》，《考古與文物》1983 年 4 期 1—2 頁）。由於資料太少，尚難肯定其性質。

河南登封縣王城崗的龍山文化晚期遺址裏也發現過一些刻在陶器上的符號。有的學者認為這個遺址是夏代的，並把所出陶器符號看作夏代文字（李先登《夏代有文字嗎》，《文史知識》1985 年 7 期 51—52 頁）。由於已發表的資料太少，其性質也難以肯定。

4. 商代前期的文字資料

由於至今還沒有發現確鑿無疑的夏代以前的漢字（包括原始漢字），商代前期的漢字是已知的最古的漢字。可惜已發現的資料也很貧乏。

50 年代以來發現了不少商代前期的遺址，但是出土的文字資料却很少。在鄭州二里崗和南關外的商代前期遺址裏發現了一些刻在陶器上的符號（《鄭州二里崗》17 頁，又圖 31。《鄭州南關外商代遺址的發掘》，《考古學報》1973 年 1 期 83—84 頁）。它們跟二里頭文化陶器符號一樣，大多數刻在大口尊的內口沿上，也是跟原始社會時期的甲類符號同類的東西，並不是文字。在二里崗還發現過兩塊字骨（《鄭州二里崗》38 頁，又圖 30）。一塊只刻有一個像是“虫”的字（“虫”字見於殷墟甲骨文），出自商代前期地層。一塊是採集品，上面刻有十來個字，字形跟殷墟甲骨文相似，文例則比較特殊。

河北藁城縣臺西商代遺址裏也發現過一些刻在陶器上的文字和符號,其中一部分的時代稍早於商代後期(季雲《藁城臺西商代遺址發現的陶器文字》,《文物》1974年8期)。它們一般都是單個地刻在陶器上的,確實像文字的有“止”、“目”、“刀”等(同上50頁):



止



目



刀

其字體古於殷墟發現的商代後期的陶文和甲骨文。

江西清江縣吳城商代遺址裏發現的刻在陶器上的文字和符號,也有一些是早於商代後期的(唐蘭《關於江西吳城文化遺址與文字的初步探索》,《文物》1975年7期。《江西清江吳城商代遺址第四次發掘的主要收穫》,《文物資料叢刊》2)。它們既有單個地刻在器物上的,也有四五個以至十來個刻在一起的。可惜後一類刻文還沒有讀通。吳城出土的有些陶器上的文字或符號,作風比較獨特,似乎不屬於商文化的系統。

在已發現的商代前期銅器裏,有銘文的銅器非常少,器上的銘文通常只有一兩個字。有的究竟是不是應該看作文字,還有討論餘地(參看李學勤《論美澳新收藏的幾件商周文物》,《文物》1979年12期73頁;曹淑琴《商代中期有銘銅器初探》,《考古》1988年3期247—252頁)。

總之,已發現的商代前期的文字資料又少又零碎,顯然不能充分反映漢字當時的發展水平,對我們研究漢字的起源沒有重大參考價值。

(三) 對漢字形成過程的推測

由於確鑿可信的夏代以前的漢字尚未發現,商代前期漢字的資料又很貧乏,我們只能以商代後期的漢字為主要依據,參考文字發展的一般規律和某些時代較晚的原始文字的情況,對漢字形成的過程試作一些初步的推測。下面所用的古漢字一般都引自殷墟甲骨文,少量的引自銅器銘文(如“方”“圓”的古字)。在原始文字方面則引用雲南的納西族所使用過的納西圖畫文字(以下簡稱“納西文”)的資料(參看傅懋勳《納西族圖畫文字和象形文字的區別》,《民族語文》1982年1期1頁)。

在文字產生之前,人們早已在用實物、圖畫或各種符號記事表意了,而且所用的各種方法跟古漢字的造字原則有很多共通之處(參看汪文40—41頁)。所以從

技術上看,文字產生的條件很早就出現了。可是文字產生的社會條件却出現得相當晚。在社會生產和社會關係發展到使人們感到必須用記錄語言的辦法來記事和傳遞信息之前,文字是不會產生的。而這種形勢通常要到階級社會形成前夕甚至階級社會形成之後才會出現。孤立地來看似乎可以認為是跟語言中的某個詞相對應的符號的出現,如上一小節所說的用作性質接近後世族氏的標記的象形符號的出現,並不意味着文字形成的過程已經開始。只有用符號記錄成句語言中的詞的認真嘗試,才是這一過程開始的真正標誌。

按照一般的想法,最先造出來的字應該是最典型的象形字,如象人形的“人”字、象鹿形的“鹿”字等。因為這一類字顯然最容易造。但是實際情況恐怕並不是這樣的。跟這類字相比,圖畫的表意能力不見得有多大遜色。唐蘭在《中國文字學》裏曾經引原始巖窟藝術裏人射鹿的圖畫,跟古漢字裏的“人射鹿”三個字對比(91頁):



誰都能看出來,如果僅僅爲了表示人射鹿這類意思,並沒有必要撇開圖畫去另造文字。從後面要談到的納西文的情況來看,在原始文字階段,文字和圖畫大概是長期混在一起使用的。對人、鹿等物和射這種具體動作的象形符號來說,文字和圖畫的界綫是不明確的。

人們最先需要爲它們配備正式的文字的詞,其意義大概都是難於用一般的象形方法表示的,如數詞、虛詞、表示事物屬性的詞等等。原始文字產生之前,人們在用圖畫、符號等記事表意的時候,已經在使用抽象的幾何圖形和象徵等比較曲折的表意手法了。這些方法可以用來爲一部分上面提到的那些詞造字。有些詞的意義可以用抽象的圖形表示,如古漢字最初以“口”“○”來表示“方”“圓”這兩個詞。古漢字裏襲用原始社會時期劃道道的記數方法的“一”“=”“≡”“≡”(四)這幾個數字,其字形也可以認為是抽象圖形。還有一些詞的意義可以用象徵等手法表示。如古漢字用成年男子的圖形亼表示“大”這個詞,因為成年人比孩子“大”(也有人認為“大”字以張開兩臂的人形表示大的意思,這也是一種曲折的表意方法)。用這些方法造出來的字雖然外形往往仍然像圖畫,本質上却跟圖畫截然有別。例

如用“𠂔𦍋”表示“大鹿”，跟畫一頭很大的鹿來表示這個意思，是根本不同的兩種表意方法。不知道𠂔表示“大”，就無法理解“𠂔𦍋”說的是什麼。如果把它們當圖畫看待，只能理解為一個人跟一頭鹿在一起。鹿這類具體事物的象形符號，大概是在“大”這類跟圖畫有明確界綫的文字產生之後，才在它們的影響之下逐漸跟圖畫區分開來，成為真正的文字符號的。

凡是字形本身跟所代表的詞的意義有聯繫，跟詞的語音沒有聯繫的字，包括前面講過的“鹿”、“射”、“𠂔”、“大”各類字，我們都稱為表意字。顯然，語言裏有很多詞是很難或完全不可能為它們造表意字的。上面指出過的那些難以用一般的象形方法表示其意義的詞，其中的大多數，即使採用象徵等比較曲折的表意手法，也仍然無法為它們造出合適的文字來。

在文字產生之前，人們還曾使用過跟所表示的對象沒有內在聯繫的硬性規定的符號，把這種符號用作所有權的標記，或是用來表示數量或其他意義（如前面舉過的哈尼族用於記數的𠂔和十）。原始社會時期使用的甲類符號，顯然有很多是屬於這種性質的。我們姑且用一個現成的詞——“記號”，作為這種符號的專稱，那些難以為它們造表意字的詞，是不是可以分別為它們規定某種記號作為文字呢？

在文字形成過程剛開始的時候，通常是會有少量流行的記號被吸收成為文字符號的。古漢字裏“𠂔”（五）“𠂔”（六）“十”（七）“八”（八）這幾個數字的前身，大概就是原始社會時期用來記數的記號（參看第二小節）。但是要新造很多記號字却是有困難的。記號字的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詞沒有內在聯繫，比較難認難記，不容易被人接受。它的局限性實際上比表意字還要大得多。

要克服表意字和記號字的局限性所造成的困難，只有一條出路：採用表音的方法。這就是借用某個字或某種事物的圖形作為表音符號（以下簡稱“音符”），來記錄跟這個字或這種事物的名稱同音或音近的詞。這樣，那些難以為它們造表意字的詞，就也可以用文字記錄下來了。這種記錄語言的方法，就是文字學上所說的假借。用這種方法為詞配備的字就是假借字。假借字所用的音符嚴格說應該稱為“借音符”，以與拼音文字的音符相區別。

從民族學資料來看，有不少還沒有文字的民族，在利用實物表意的方法中就已經用上了表音原則。例如：雲南的景頗族過去通行“樹葉信”。他們把一些不同種類的樹葉和其他東西分別用來表示某種固定的意義。在景頗族載瓦支系用來談情說愛的樹葉信中，“蒲軟”樹葉所表示的意思是“我要到你們那裏去”，“豆門”樹葉所表示的意思是“你快打扮起來吧”。因為在他們的語言裏，當到達講的那個詞跟

樹名“蒲軟”同音，當打扮講的那個詞跟樹名“豆門”同音（汪文 5—6 頁）。看來表音原則早在文字出現之前就已經普遍為人們所熟悉了。

前面已經說過，最先需要為它們配備文字的那些詞，有很多是難以用表意的造字方法來對付的。人們無疑很快就會發現可以用自己本來就熟悉的表音原則來解決面臨的問題。所以，跟圖畫有明確界綫的表意字的開始出現和假借方法的開始應用這兩件事，在時間上不會有什麼顯著的距離，大體上應該是同時發生的。

在古漢字裏有大量假借字，而且有很多是用來記錄極為常用的詞的。例如常用的語氣詞“其”，就是用音近詞“箕”的象形字來記錄的。在納西文裏，使用假借字的情況跟古漢字差不多。例如“有”這個常用詞，就是用音近詞“蕪菁”的象形字來記錄的。這種現象說明假借字的歷史一定非常悠久。在文字形成的過程中，表意的造字方法和假借方法應該是同時發展起來的，而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樣，只是在表意字大量產生之後，假借方法才開始應用。

前面曾經指出，跟圖畫有明確界綫的表意字的產生，有助於使那些本來跟圖畫分不出明確界綫的象形符號，逐漸跟圖畫區分開來，成為真正的文字符號。假借方法也能起這樣的作用。那些性質還不明確的象形符號如果經常跟假借字放在一起使用，或是被假借來記錄跟它們所象的事物的名稱同音或音近的詞，就會較快地成為真正的文字符號。在這一小節開頭我們曾說過，“用符號記錄成句語言中的詞的認真嘗試”是文字形成過程開始的真正標誌。根據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進一步說，跟圖畫有明確界綫的表意字和假借字的出現，是文字形成過程正式開始的具體標誌（參看汪文 42 頁）。

假借方法的普遍應用大大提高了文字記錄語言的能力。但是假借字多起來以後，又出現了新的問題。被假借的字原來有自己所代表的詞，同時又被假借來記錄同音或音近的詞，而且假借它的詞可以有好幾個。因此閱讀文字的人有時難以斷定某一個字在某一具體場合究竟代表哪一個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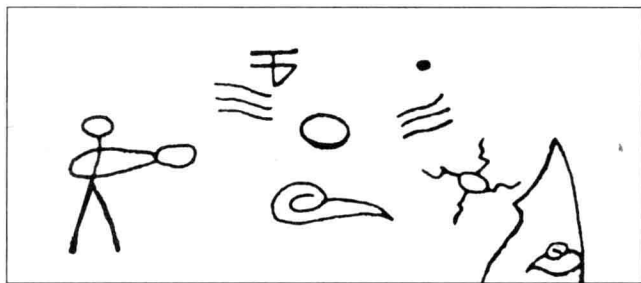
為了克服假借所引起的字義混淆現象，人們把有些表意字或表意符號（以下簡稱“意符”）用作指示字義的符號，加注在假借字上。例如：在殷墟甲骨文裏，“翼”的象形字（象鳥或蟲的翼），在假借來表示當明天講的“翌”這個詞的時候，有時加注“日”字，寫作。在納西文裏，“蕪菁”的象形字在假借來表示同音詞“小官”的時候，往往加注端坐人形而寫作。這種由表音的符號和指示字義的符號一起組成的字，就是文字學上所說的形聲字，表音部分稱為聲旁，表意部分稱為形旁。

人們爲了使文字跟它們所表示的詞的聯繫更爲明確，一方面在一些被假借的字上加注形旁，另一方面還在一些表意字上加注音符。例如：在殷墟甲骨文裏，“鳳”字本作，象高冠(?)美羽的鳳鳥，後來加注音符H(凡)而成爲 (“鳳”“凡”古音相近。大約在周代，鳳鳥形簡化爲“鳥”旁，“凡”旁移到上方，就成了“凤”的繁體“鳳”)。在納西文裏，“山崖”寫作。納西語當山崖講和當鷄講的那兩個詞同音，所以在山崖的象形符號上加畫一個鷄頭作爲音符。過去的文字學者把在象形字上加注音符而成的字看作象形字的一種特殊類型，其實還不如看作一種特殊的形聲字合理。

形聲字起初都是通過在已有的文字上加注指示字義的意符或音符而產生的。就漢字的情況來看，直到它已經成熟之後，這仍然是形聲字產生的主要途徑。

形聲字的應用大大提高了文字表達語言的明確性，是文字體系形成過程中一個極爲重要的步驟。但是這件事似乎並沒有很快導致文字體系的最後形成，已經使用形聲字的納西文就是一個例證。

下面是引自麗江納西族經典《古事記》的一段原始文字(據傅懋勳《麗江麼些象形文“古事記”研究》，武昌華中大學1948年版29頁)：



 表示拿蛋。 本是“解開”的表意字，在納西語裏當“解開”講和當“白”講的那兩個詞同音，所以這裏假借它來表示“白”。• 是“黑”的表意字。 是風。 是蛋。 是湖。 表示蛋破發光。最右邊是上文已經提到過的“山崖”的形聲字。據納西族經師的解釋，這段原始文字的全部意思是：把這蛋拋在湖裏頭，左邊吹白風，右邊吹黑風，風蕩漾着湖水，湖水蕩漾着蛋，蛋撞在山崖上，便生出一個光華燦爛的東西來。在這段原始文字裏，雖然已經使用了假借字和形聲字，但是很多意思仍然是用圖畫手法表示出來的。

漢字一定也經歷過跟納西文相類的、把文字跟圖畫混合在一起使用的原始階段。不過二者的具體情況肯定會有較大的不同。納西文主要是用來幫助經師記憶

經典的，所以圖畫的成分很多。原始漢字當然不會長期停滯在這種階段。

在殷墟甲骨文裏可以看到接近圖畫的表意手法的一些殘餘痕跡。其中比較突出的一點，就是某些表意字往往隨語言環境而改變字形。例如：甲骨卜辭裏時常提到商王對祖先舉行進獻食品的“𩇛”祭（“𩇛”在典籍裏多作“登”。《周禮·夏官·羊人》“祭祀割羊牲，登其首”，鄭玄注“登，升也”）。甲骨文“𩇛”字作，象兩手捧着一種叫做豆的盛食器皿。如果卜辭提到的𩇛祭所用的食品是鬯（一種香酒），“𩇛”字往往改寫為“𩇛”，兩手所捧的“豆”換成“鬯”。卜辭裏既有“𩇛鬯”之文，又有“𩇛鬯”之文，看來“𩇛”僅僅是“𩇛”字有特定用途的一個異體。但是在漢字發展的較早階段（這裏所說的“漢字”包括原始漢字），情況恐怕並不如此簡單。納西文在這方面可以給我們一些啓發。在納西文裏，字形隨語言環境而變化的現象很常見。例如“吼”字通常寫作，象牛嘴出聲氣，如果說到“馬吼”，通常就把這個字裏的牛頭換作馬頭，並不需要另加一個“馬”字。在漢字發展的較早階段，“𩇛”也應該是用來表示“𩇛鬯”的。到商代後期，這種比較原始的用字習慣基本上已經被拋棄，“𩇛”字則作為“𩇛”的特殊異體而保存了下來。類似的例子在甲骨文裏還可以找到一些。此外，文字排列方式跟語言中的詞序不完全相應的現象，在甲骨文裏偶爾也能看到。這些都可以看作古漢字曾經經歷過把文字跟圖畫混在一起使用的原始文字階段的證據（參看《探索》168—169 頁）。

在形聲字出現之後，原始漢字大概還經過了多方面的改進，才最後發展成為能够完整地記錄漢語的文字體系。估計在不斷增加新字的同時，至少還需要進行這樣一些改進：逐漸摒棄圖畫式表意手法，簡化字形並使之趨於比較固定，使文字的排列逐漸變得與語序完全一致。

對漢字的形成過程目前只能作以上這些很初步的推測。

附帶說一下，在古埃及的聖書字和古代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等古文字體系裏，也可以看到表意字、假借字和形聲字這幾種性質的文字。由於漢字跟這些古文字體系都具有兼用意符和音符的特點，有的學者稱它們為意符音符文字，簡稱意音文字。

（四）對漢字形成時間的推測

由於缺乏資料，對漢字形成過程從何時開始的問題，目前還無法進行認真的討論。我們在第二小節裏曾推測大汶口文化晚期（約前 2800—前 2500 年）的乙類符號有可能曾對原始漢字的產生起過某種影響。按照這種推測，漢字形成過程開始

的時間可能在公元前第三千年的中期。

下面我們來討論漢字大約在什麼時候脫離原始文字階段而形成完整的文字體系。由於前面屢次講到的研究資料的局限性，我們只能主要根據商代後期漢字的發展水平來推測漢字形成完整體系的時間。

商代後期的漢字不但已經能够完整地記錄語言，而且在有些方面還顯得相當成熟。前面已經說過，商代的記名金文情況特殊，象形的程度比較高。一般的金文和甲骨文跟這種金文相比，寫法要簡單得多（參看第二節的第二小節裏講商代字體變化的部分），不少字已經變得不大象形了。有些字還由於文字直行排列的需要，改變了字形原來應有的方向，例如𠂔（犬）、𠂔（豕）等字都已變得足部騰空，𠂔（疒，即疾字初文）所包含的人形和牀形也已經豎了起來。當時，在上層統治階級的政治和社會生活裏，文字已經使用得相當廣泛，為他們服務的史官一類人的書寫技巧也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從這些方面看，商代後期距離漢字脫離原始文字階段而形成完整文字體系的時代，應該已經有一段不太短的時間了（參看董作賓《中國文字》、《中國文字在商代》、《從麼些文字看甲骨文》等文，皆已收入《董作賓先生全集》乙編第四冊）。

但是另一方面，在商代後期文字裏仍然可以找到一些比較原始的跡象，例如前一小節提到過的，某些表意字隨語言環境而改變字形，以及文字排列偶爾跟語序不相應等現象。這些現象在西周以後的漢字裏基本上已經絕跡。從這方面看，商代後期距離漢字形成完整文字體系的時代似乎也不會很遠。

《尚書·多士》記載西周初年周公對商朝遺民的訓話說：“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周公特別強調殷的先人有典冊記載“殷革夏命”之事，也許我國就是從夏商之際才開始有比較完備的記事典冊的。漢字形成完整的文字體系，很可能也就在夏商之際。前面說過，原始漢字可能開始出現於公元前第三千年的中期。大約到這一千年的末期，夏王朝建立了起來，我國進入了階級社會時期。統治階級為了有效地進行統治，必然迫切需要比較完善的文字。因此原始漢字改進的速度一定會大大加快。夏王朝有完整的世系流傳下來這件事，就是原始漢字有了巨大改進的反映。漢字大概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在夏商之際（約在前17世紀）形成完整的文字體系的。有的學者主張漢字形成於夏初（孟維智《漢字起源問題淺議》，《語文研究》1980年1期106—108頁）。由於大家都缺乏確鑿的根據，究竟誰是誰非，只有留待發現有關的新資料以後再去判斷了。還有學者認為“中國象形文字出於商代後期（盤庚、武丁以後）的卜人集團”（徐中舒、唐嘉弘《關於夏代文字

的問題》，中國先秦史學會編《夏史論叢》127、140 頁）。這未免把漢字形成的時間估計得過晚了。

在漢字由原始文字發展成為完整的文字體系的過程裏，起主要作用的應該是為部落首領或國家統治者服務的巫、史一類人。漢代人說倉頡是黃帝的史官，未必有可靠的根據，但是把史官當作造字的人還是有點道理的。

第二節 漢字形體的演變

即使只從商代後期算起，漢字也已經有三千三百多年的歷史了。在這段很長的時間裏，漢字的意音文字的本質沒有改變，但是無論在形體上還是在結構上，都發生了很重要的變化。我們將在這一節和下一節裏分別說明這兩方面的變化。在這一節裏，先簡單說明漢字形體的主要變化，然後再對各種主要字體分別作些介紹。

（一）漢字形體的主要變化

從形體上看，漢字主要經歷了由繁到簡的變化。這種變化表現在字體和字形兩方面。字形的變化指一個個字的外形的變化。字體的變化則指文字在字形特點和書寫風格上的總的變化，而且通常是指較明顯較巨大的變化而言的。這兩方面的變化往往交織在一起而難以截然劃分。

1. 字體的主要變化

漢字字體演變的過程可以分成兩個大階段，即古文字階段和隸、楷階段。前一階段起自商代終於秦代（公元前3世紀晚期），後一階段起自漢代一直延續到現代。

由象形變為不象形，是字體演變過程中最容易覺察到的變化。在整個古文字階段裏，漢字的象形程度在不斷降低。古文字所使用的字符（“字符”是我們為文字所使用的符號，也就是構成文字的符號所起的專名），本來大都很像圖形。古人為了書寫的方便，把它們逐漸改變成用比較平直的線條構成的、象形程度較低的符號。這可以稱為“線條化”。在從古文字演變為隸書的過程裏，字符的寫法發生了更大的變化。它們絕大多數變成了完全喪失象形意味的、用點畫撇捺等筆畫組成的符號。這可以稱為“筆畫化”。下面所舉的是“馬”“魚”二字字體演變的簡單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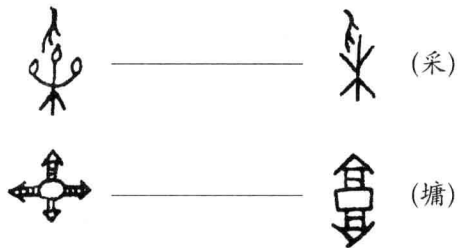
古 文 字				隸書	楷書
記名金文	甲骨文	周代金文	小篆		
				馬	馬
				魚	魚

隸書書寫起來要比古文字方便得多。由古文字變為隸書，應該看作漢字形體上最重要的一次簡化。從表面上看，楷書對隸書的改變似乎不大。但是楷書的筆畫書寫起來比隸書更加方便，所以由隸變楷也是一次重要的簡化。

2. 字形的簡化和繁化

字體的變化跟字形的簡化往往是相伴的，這從上面所舉的“馬”“魚”二字就可以看出來。在第二小節裏講古文字階段的字體演變和隸書改變古文字字形的方法的時候，還會舉到可以說明這一點的例子。

在字體沒有發生顯著變化的情況下，字形的簡化也在不斷進行。早在殷墟甲骨文裏就有很多這樣的例子，如：



漢字演變為楷書之後，字形仍在不斷簡化。50 年代以來，還在政府的領導下有組織地進行了大規模的漢字簡化工作。前面舉過的楷書的“馬”和“魚”，就在 50 年代簡化成了我們現在所用的“马”和“鱼”。

另一方面，在漢字發展的過程裏也存在着字形繁化的現象。字形繁化可以分成兩類。一類純粹是外形上的繁化，一類是文字結構上的變化所造成的繁化。

前一類繁化有時是爲了明確字形以避免混淆而進行的。例如“上”“下”二字在古文字裏本來多寫作“二”“𠂇”，爲了避免相互混淆，並避免與“二”字相混，後來各加一豎而寫作“上”“下”。但是在多數情況下，這類繁化似乎只是書寫習慣上的一種變化，並沒有什麼有意義的目的。例如𠂇變爲𠂇𠂇（辛），𠂇變爲𠂇（角）等。總的來看，純粹外形上的繁化只涉及全部漢字的一個很小的部分，繁化的程度也很輕微，通常只不過增添一兩筆而已。

文字結構上的變化所造成的繁化，最常見的是增加偏旁，如第一節裏舉過的“鳳”的象形字加注音符“凡”的例子，又如“韭”字俗寫加草頭作“韭”等。漢字裏有大量加旁字，但是大部分加旁字跟未加偏旁的原字都分化成了兩個字。例如“獅”這個詞本來用假借字“師”表示（《漢書》《後漢書》都把“獅子”寫作“師子”），後來加“犬”旁分化出了“獅”字來專門表示這個詞。像上舉“鳳”“韭”那樣，用法跟原字毫無區別的加旁字，爲數並不太多。所以大部分加偏旁的現象可以解釋爲文字的分化或字數的增加，不必看作字形的繁化。不過如果以詞爲本位，加偏旁的分化字的出現就應該看作字形的繁化了。例如對“獅”這個詞來說，由寫作“師”變爲寫作“獅”，的確是字形的繁化。漢字簡化有時也是以詞爲本位的。例如：鬥爭的“鬥”本來寫作“鬥”，50年代漢字簡化時用音近字“斗”取代了它。從文字的角度來看，這是文字合併或字數減少的現象。從詞的角度來看，鬥爭的“鬥”這個詞由寫作“鬥”變爲寫作“斗”，是字形的簡化。

即使是加旁字，如果就組成它們的偏旁來看，字形變化的主要趨向仍然是簡化。因爲在漢字形體演變的過程裏，偏旁跟獨立的字一樣，寫法絕大多數是由繁趨簡的。有些偏旁還經歷了比一般的字形演變更爲劇烈的簡化。例如在隸書裏，“水”用作左旁時變爲三短橫或三點，寫法比獨立成字時簡單得多。所以有的學者認爲：“就漢字的單個符號來看，並不存在繁化的趨向。”（周有光《字母的故事》，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年修訂版9頁）這是有道理的。當然，少數例外還是有的，如前面所說的“上”“下”之類。

（二）漢字的各種主要字體

在這一小節裏，我們先簡單介紹一下研究漢字字體的主要資料，然後再分頭介紹古文字階段和隸楷階段的各種主要字體。

1. 研究漢字字體的主要資料

研究漢字的字體，主要依靠各種古代遺物上的文字資料。下面主要按照遺物

的性質，分類加以介紹。漢字字體比較劇烈的變化都發生在南北朝之前，所以我們介紹這些資料的時候也以南北朝之前的為主，南北朝的附帶提到一點，隋唐以後的就從略了。

A. 甲骨文

指刻在占卜用的龜甲獸骨以及一般獸骨和骨角器上的文字。寫而不刻的字在甲骨上也有發現，但數量很少。在已發現的甲骨文裏，最重要的是殷墟甲骨文。

殷墟甲骨文發現於商代後期王都的遺址——殷墟（河南安陽市西北），絕大部分是這一時期商王室的占卜記錄，即研究者所說的甲骨卜辭。從清末開始發現以來，在殷墟已經出土了十多萬片刻有卜辭的甲骨（絕大多數是碎片）。這是研究商代文字的最重要的資料。在殷墟也發現了刻有跟占卜無關的文字的獸骨和骨器，但數量不多。

50 年代以來，在山西省、北京市和陝西省的一些地方陸續發現了一些西周時代的甲骨卜辭。其中以周原的發現最為重要。1977 年在陝西岐山縣鳳雛村周原遺址西周前期宮室廢墟的窖穴裏發現了大量卜甲碎片，其中有近三百片刻有卜辭。據研究有一小部分卜辭的時代早到周滅商之前。1979 年在同屬周原範圍的扶風縣齊家村一帶也發現了一些刻有卜辭的西周時代甲骨。

B. 金文

指鑄在或刻在銅器上的銘文。古代銅器銘文的搜集和研究，早在宋代就已開始。一千年來陸續發現的有銘文的古銅器為數頗多，屬於先秦時代的就有萬件以上。

在第一節裏已經說過，在商代前期銅器上，銘文極為少見，而且一般只有一兩個字。到了商代後期，有銘文的銅器逐漸增多，不過銘文內容多數仍然很簡單，主要記作器者之名（多用族名）和所紀念的先人的稱號（如父乙、祖己等）。在商代後期較晚的階段，出現了一些篇幅較長的銘文，已發現的最長銘文有四十餘字。

西周是銅器銘文的全盛時代。這一時期的銅器銘文不但數量多，而且篇幅也往往比較長。比較突出的，如西周前期的大孟鼎有 291 字，西周後期的毛公鼎有 498 字。春秋時代也有長篇銘文，但已不如西周時代多見。研究西周、春秋時代的文字，金文是最重要的資料。

進入戰國時代以後，銅器銘文發生了很大變化。從西周到戰國早期，銅器銘文中習見的內容變化不大，主要是器主敘述作器緣由以及祝願子孫保有器物等類的話。大約從戰國中期開始，傳統形式的銘文已經變得很少見，“物勒工名”式的銘

文則大量出現。這類銘文字數一般不多，所記的主要是作器年份、主管作器的官吏和作器工人的名字等。春秋以前，銅器銘文大都是鑄在器物上的。戰國中期以後，則往往是在器物製成後用刀刻出來的，兵器等物上的銘文還往往刻得很草率。

秦漢時代的銅器銘文，除了度量衡銅器上的銘文情況比較特殊外，大多數是物勒工名式的和標明器物主人或使用地點的簡短銘文。魏晉以後的銅器銘文一般就不大受研究者重視了。

C. 石刻文字

先秦的石刻文字往往見於戈、磬等器物上，非器物的刻石為數不多，其中最著名的是石鼓文。

石鼓文刻在十個一米左右高的高腳饅頭形的石碣上（《說文》：“碣，特立之石也。”），原來立在秦國雍城（今陝西鳳翔縣）南面的三畝原上，唐初始見記載，後來曾經經過幾次遷徙，現在收藏在故宮博物院內。由於這些石碣的外形稍有些像鼓，一般稱之為石鼓。石鼓各石都刻有一首四言詩，原來共有七百餘字，由於石的表面不斷剝蝕，殘脫的字已達一大半。關於石鼓的時代，歷來有很多爭論。由於石鼓有些字的寫法跟《說文解字》所收的、相傳為西周宣王時文字的“籀文”相似，過去很多人把它看作周宣王時的東西。經過一些學者研究，石鼓已經證明是東周時代秦國的東西。但是關於它的具體年代仍有不少異說，最早的早到春秋早期，最晚的晚到戰國中期。從字體看，石鼓文似乎不會早於春秋晚期，也不會晚於戰國早期，大體上可以看作春秋戰國間的秦國文字。【編按：近些年來，以石鼓文為春秋中晚期秦國文字的說法漸為多數學者所接受。】

石鼓文之外，比較重要的先秦石刻文字，還有北宋時發現的秦王詛楚王的告神之文，即所謂詛楚文。當時大概每告一神即刻一石，埋在祀神之處。北宋時發現了三塊這樣的刻石，每塊刻有三百餘字，除神名各異外，文字基本相同。由於原石早佚，現在只能看到摹刻本。多數學者認為詛楚文是秦惠文王詛楚懷王之文，其時代屬戰國中晚期之交。石鼓文和詛楚文是研究春秋戰國時代秦國文字的重要資料。

秦統一後，始皇巡行天下，在多處地方立石銘功，二世時又在各處刻石上加刻了一道詔書。這些石刻文字是研究秦代篆書即一般所謂小篆的最好資料。可惜原物幾乎都已毀壞，只有琅邪臺刻石尚有殘塊存留（保存的主要是二世詔部分）。此外，嶧山刻石的文字尚有徐鉉摹本的石刻傳世，泰山刻石也有殘拓的摹刻本傳世（傳世的會稽刻石摹刻本恐不可信，所謂泰山刻石宋拓本實際上是一種失真的摹刻的拓本，參看《燕京學報》17期所載容庚《秦始皇刻石考》）。

西漢石刻文字傳留下來的不多。東漢時代,刻碑之風興起(碑有特定的形制,秦始皇刻石等不能稱碑只能稱碣),有大量碑文和摩崖文字(刻在崖壁上的文字)等傳留下來。在近代發現漢代簡牘之前,碑刻是研究漢代字體的最重要的資料。東漢碑刻一般使用工整的隸書。現代書法家所寫的隸書多數出自漢碑。魏和西晉時代的碑刻一般也用隸書。

漢末曾將儒家主要經典刻石立於洛陽太學。由於其事始於靈帝熹平四年(175年),世稱熹平石經。其字體也是工整的隸書。曹魏正始(240—249年)間,又將《尚書》《春秋》二經的“古文”本刻石立於洛陽太學,每個字都用古文、小篆、隸書三種字體書寫三次,世人稱為正始石經或三體石經。兩種石經都早已毀壞,但自清末、民國以來發現了一些殘石,對研究古代文字形體頗有幫助。

晉以後,墓誌逐漸流行。墓誌放在墓葬內,多數刻在石質的板上,也可以看作石刻文字。

東晉時代的碑刻(包括墓誌)往往使用一種介於隸書、楷書之間的字體(即後面要講到的“新隸體”。魏和西晉時代的碑刻,有少數已經使用了這種字體)。南北朝時代的碑刻一般就用楷書了。

D. 簡牘文字

我國在使用植物纖維紙之前,長期以竹木簡為主要書寫材料。簡是細長條的薄片,用繩把簡編連起來就成為冊,通常用毛筆蘸墨在上面書寫。殷墟甲骨文屢見“冊”字,《尚書·多士》也說“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可見至遲在商代簡冊就已通行。商代和西周春秋時代的主要文字資料應該是簡冊文字,可惜竹木易腐,未能保存下來。

已發現的簡冊以戰國時代的為最早。西漢和西晉時代都曾發現過大批戰國時代的簡冊(西漢時代發現的就是後面要講到的“古文經”。西晉時代發現的是“汲冢竹書”),但原物早已毀壞。50年代以來,在湖南長沙市、常德市、慈利縣、河南信陽市和湖北江陵縣、荊門市等地的楚墓裏都出過竹簡。此外,1978年在湖北隨州市發現的戰國早期的曾侯乙墓也出土了一批竹簡。這是已發現的時代最早的一批簡。曾是附屬於楚的小國,文字作風與楚國基本相同。

秦簡是在70年代第一次發現的。1975年底,湖北雲夢睡虎地11號秦墓出土了一千一百多枚竹簡。這座墓是在始皇三十年(前217年)或稍後的時間下葬的。竹簡抄寫時間不一,估計不出戰國末年至秦初這段時期。

從清末(20世紀初)以來,在西北地區兩漢和魏晉時代的邊塞等遺址裏,陸續

發現了很多漢簡和一些魏晉簡。50 年代以來還在各地的漢墓裏發現了很多漢簡。西北邊塞遺址出土的漢簡包括所謂敦煌漢簡、居延漢簡等，一般都是木簡，時代起自西漢武帝晚期終於東漢晚期。墓葬出土的漢簡大都是竹簡，時代有不少屬於西漢早期，補上了邊塞漢簡時代上的空白。魏晉簡主要出土於新疆羅布泊西南的“樓蘭遺址”以及新疆民豐北部的尼雅遺址，都是木簡。“樓蘭遺址”所出木簡記年的較多，所記年份由曹魏晚期延續到東晉初，而以西晉的為多。【編按：1996 年長沙走馬樓發現大批三國時的吳簡，數量大大超過以往發現的魏晉簡。】

古代往往以簡、牘並稱。簡很窄，通常只寫一行字。牘是可以寫幾行字的長方形木板（寬度不一）。已發現的最早的牘出土於戰國晚期的秦墓。漢代的邊塞遺址和墓葬也都出過一些木牘。

對研究字體來說，簡牘文字跟下面就要講到的帛和紙上的文字非常重要。因為這些文字一般是以當時日常使用的字體書寫的，不像金石文字往往比較保守，傾向於使用比較舊的字體。秦簡是研究秦代隸書的最重要的資料。漢簡是研究隸書的發展變化和草書形成過程的最重要的資料。魏晉時代簡、紙上的文字是研究行書、楷書等字體的重要資料。

E. 帛和紙上的文字

在使用植物纖維紙之前，除竹木簡外還有一種比較重要的書寫材料，這就是帛。古人常說“竹帛”，以帛與竹簡並提。

已發現的時代最早的一件帛書，也是屬於戰國時代的楚國的。這件帛書是 1942 年在長沙的一個楚墓中盜掘出來的，早在 40 年代中期就流入了美國。它是一張長 47 釐米高 38.7 釐米的帛，上面有墨書的九百多個字，還有一些跟文字配合的彩色圖像。

1973 年在下葬於西漢文帝十二年（前 168 年）的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中發現了大批帛書，有《老子》《易經》等典籍和醫書、占書等等，種類很多。其中有一件字體為篆書的占書，是秦統一前一年（前 222 年）抄寫的。大部分帛書的字體屬於早期隸書。其中一部分，字體跟篆書比較接近，可能抄寫於秦末或漢初。此外的抄寫於西漢早期。

2 世紀初蔡倫改進造紙方法之後，植物纖維紙開始較多地用於書寫。作為書寫材料，紙跟帛的性質比較接近。帛由於價格高昂，不能取代簡牘。紙出現後逐漸把簡牘排擠出歷史舞臺，成為主要的書寫材料。這一過程大概到四世紀才基本完成。

比較重要的時代較早的字紙，發現於上面提到過的魏晉時代的“樓蘭遺址”，其年代範圍大概跟同出的簡牘差不多，內容有書信、文書和簿籍殘片等。在敦煌莫高窟和新疆吐魯番等地，發現過一些晉代和南北朝的卷子和字紙，對研究字體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自古流傳下來的魏晉以來名家書跡，一般也屬於帛紙文字。可惜現存的大都是臨摹本或臨摹本的刻本。

F. 其他

除上面所舉的五大類外，還有不少對研究字體有用的古代遺物上的文字資料，例如在山西侯馬市和河南溫縣發現的、時代大約在春秋戰國間的盟書（用朱或墨寫在玉、石片上的盟辭），戰國時代的貨幣文字，戰國秦漢時代的印章文字，商代以來的各種陶瓦製品上的文字，戰國以來的各種漆木器上的文字等。這裏不一一介紹了。

以上介紹的這些資料，同時也是研究漢字字形和結構的重要資料。

2. 古文字階段的字體

我們把早於小篆的各種字體和小篆都看作古文字。這是現代多數文字學者的觀點。按照傳統文字學的觀點，小篆是不算古文字的。古文字階段字體變化的情況非常複雜。所以這一階段的字體不像隸楷階段的那樣，有公認的分類方法。下面先介紹一下傳統文字學對古文字字體的看法，然後主要根據古代遺物上的文字資料，簡單講一下古文字在字體方面的演變情況。

A. 傳統文字學對古文字字體的看法

按照傳統文字學的看法，我們所說的古文字包含古文、大篆（以籀文為代表）和小篆三種字體。許慎《說文解字》“敘”說他編書的體例是“今敘篆文，合以古、籀”。“篆文”在這裏指小篆。“古、籀”指古文和籀文，是小篆之前的兩種古文字。《說文》所收的字，其字形一般根據小篆，如果古文或籀文的寫法跟小篆不同，就兼錄古文或籀文。書中所錄的籀文出自相傳為西周晚期宣王時代的太史籀所編的字書《史籀篇》，古文出自西漢時代在孔子故宅牆壁裏發現的以及張蒼等人所獻的、用古文字抄寫的《尚書》《春秋左氏傳》等儒家經典，下文簡稱古文經。

許慎在《說文》“敘”裏對上述幾種字體的時代和相互關係有所說明。他說：“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可見他認為古文的時代最早，籀文即大篆，是在古文之後出現的。但是《說文》所錄古文出自古文經，《尚書》等儒家主要經典為孔子所傳，《春秋左氏傳》相傳為春秋時人左丘明所編寫，他們的時代都

晚於太史籀，為什麼古文經的字體却古於籀文呢？許慎認為這是由於孔子和左丘明有意要用較古的字體傳寫經書。所以他在說了籀文“與古文或異”之後，緊接着就說：“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至於小篆，許慎認為是秦始皇併天下後李斯等人“省改”“史籀大篆”而成的、用來統一全國文字的標準字體。古文字學在近代興起之後，學者們通過對古代遺物上的文字資料的研究，發現許慎對古代字體的看法並不符合實際。

首先，許慎對古文的看法有問題。他把早於籀文的字體稱為古文，當然是可以的。但是認為古文經的字體就是古文，則是錯誤的。據王國維等學者研究，《說文》所錄的“古文”的字形跟早於籀文的殷墟甲骨文和西周金文都不相近，然而跟戰國時代東方國家（指秦之東各國）遺物上的文字却往往相合。這說明西漢時代發現的古文經，是戰國時代東方國家儒生用當時通行的字體抄寫的。所以《說文》中的“古文”實際上是戰國時代東方國家的文字，而不是早於籀文的古文字（參看王國維《桐鄉徐氏印譜序》《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分見《觀堂集林》卷六、卷七）。前面講過的三體石經的古文，跟《說文》的古文是同性質的。

其次，許慎對大篆跟小篆的關係的看法也有問題。按照他的說法，西周晚期的大篆在春秋戰國時代的秦國似乎沒有發生過什麼變化，小篆是秦統一後李斯等人通過對大篆進行簡化而制定出來的。但是從春秋戰國時代的秦國遺物和秦代遺物上的文字來看，秦代的小篆顯然是由春秋時代秦國使用的篆文逐漸演變而成的。例如：可以代表春秋戰國間的秦國篆文的石鼓文，把“吾”寫作（見於偏旁），把“中”寫作（與《說文》“中”字籀文相近），字形確實比小篆繁。但是在戰國中晚期之交的詛楚文裏，“吾”（見於偏旁）和“中”的寫法就已經跟小篆相同了。可見這兩個字的簡化是秦國文字演變的結果，並不是在秦統一後才由李斯等人規定的。在書寫風格的變化上也存在類似情況。實際上在統一前夕的秦國篆文跟統一後的小篆之間，無論在字形上還是在書體上都不存在任何明顯的區別。這一點很多學者都已經指出來了。錢玄同在為卓定謀《章草考》所作的序裏說：“許叔重（引者按：叔重是許慎的字）謂李斯諸人取大篆省改為小篆，實則戰國時秦文已如此，可見李斯諸人但取固有的省改之體來統一推行，並非創自他們也。”這是很正確的。

有些講字體的人以《說文》所錄的籀文以及石鼓文、毛公鼎銘文等代表大篆。還有些人把所有早於小篆的古文字都稱為大篆，相應地把包括小篆在內的、隸書之前的文字都稱為篆文或篆書。現代的有些古文字學者又根據自己的研究給大篆下了新的定義，如唐蘭認為“由春秋到戰國初期的文字，就是所謂大篆”（唐書 156

頁)。由於對“大篆”的理解有分歧,目前很多文字學者都避免使用這個名稱。

不少古文字學者認為傳統文字學把籀文看作周宣王時的文字也是錯誤的。王國維認為籀文是戰國時代的秦國文字。唐蘭對籀文的看法跟他對大篆的看法一致。他們的意見不一定正確,限於篇幅不能在此討論了。

現在,大家往往把“甲骨文”“金文”用作早於小篆的字體名稱。嚴格說,這也是不大妥當的。因為同樣是甲骨文或金文,甚至同樣是殷墟甲骨文或周代金文,由於早晚不同或用途不同,在字體上往往仍有較大差別。下面就會談到這方面的情況。總之,對古文字階段的字體,目前還沒有理想的分類方法。

B. 古文字在字體方面的演變情況

爲了講述的方便,我們把古文字階段分成商代、西周春秋時代和戰國至秦代三個小段。下面依次介紹各段字體演變的主要情況。

a. 商代

研究商代文字的字體,主要根據殷墟甲骨文和商代金文。

首先應該指出,甲骨文跟金文在字體上有不同的特點。在商代,毛筆是主要的書寫工具。我們今天雖然已經無法看到用毛筆書寫的商代典冊,但是還能在商代後期遺留下來的甲骨和玉、石、陶等類物品上看到少量毛筆字。金文基本上保持着毛筆字的樣子,甲骨文就不同了。商代統治者頻繁進行占卜,需要刻在甲骨上的卜辭數量很大。在堅硬的甲骨上刻字非常費時費力。刻字的人爲提高效率,不得不改變毛筆字的筆法,主要是改圓形爲方形,改填實爲勾廓,改粗筆爲細筆,如:



與此同時,他們還比較劇烈地簡化了很多字的字形。我們可以把甲骨文看作當時的一種比較特殊的俗體字,而金文大體上可以看作當時的正體字。所謂正體就是在比較鄭重的場合使用的正規字體,所謂俗體就是日常使用的比較簡便的字體。商代人有時在獸骨上刻辭記錄跟占卜無關的有紀念意義的事件。這種刻辭的字體,作風就往往跟甲骨卜辭不同,而跟銅器銘文相似。

甲骨文(不包括跟金文作風相似的少數記事刻辭)和金文各自的形體,又由於時代的早晚或用途的不同而產生差別。商代後期的甲骨文有兩百多年歷史,可以

按照形體的特點分早晚期。早期甲骨文一般要比晚期更象形。在金文裏，記名金文的象形程度顯著地高於用於記事的一般金文。後者大都見於商代後期的晚期銅器上，字形跟晚期甲骨文接近。記名金文不管是見於早期銅器的，還是見於晚期銅器的，一般都比早期甲骨文還要象形。在記名金文裏，彼此的象形程度也有高低之別，不過這種差別似乎並不是完全為時代的早晚所決定的。下面把上述這幾種文字列表對照一下（部分例子取自偏旁）：

	虎	犬	牛	止	戌
記名金文					
					
早期甲骨文					
一般金文					
晚期甲骨文					

從上面的字形對照表，可以把商代文字形體變化的情況看得很清楚。上引記名金文中象形程度較低的那部分字，即“犬”“牛”“止”的第二體，也許大體上可以代表跟早期甲骨文同時的正體（早期甲骨文中有些時代較早的“止”字，寫法跟記名金文第二體相似）。至於象形程度較高的那部分記名金文，可能還保持着商代前期甚至更古的漢字的面貌。象形程度較低的記名金文和早期甲骨文，比起這種記名金文來已經大為簡化。晚期的一般金文和甲骨文，又進一步簡化了它們。“虎”“犬”等字，早期多畫出腹部，晚期就都把腹背合併成一筆了。

在文字形體演變的過程裏，俗體所起的作用十分重要。有時候，一種新的正體就是由前一階段的俗體發展而成的（如隸書，詳後）。比較常見的情況是俗體的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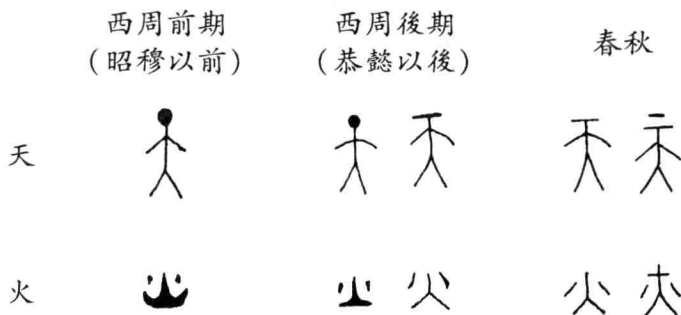
些寫法後來為正體所吸收,或者明顯地促進了正體的演變。從上面的字形對照表就可以看出,在商代後期文字裏,正體(在表中由金文代表)的演變是受到甲骨文一類俗體的強烈影響的。

b. 西周春秋時代

研究西周春秋時代的字體,主要根據金文。

西周金文的形體,最初幾乎完全沿襲商代晚期金文的作風。到康、昭、穆諸王的時代,字形逐漸趨於整齊方正,但是在其他方面變化仍然不大。恭、懿諸王以後,變化才劇烈起來。西周金文形體演變的主要趨勢是綫條化、平直化(第一小節講漢字形體的主要變化時所說的綫條化包括了平直化)。商代晚期和西周前期金文的字形,象形程度仍然比較高,彎彎曲曲的綫條很多,筆道有粗有細,並且還包含不少根本不能算作筆道的呈方、圓等形的團塊,書寫起來相當費事。為了改變這種情況,就需要使文字綫條化、平直化。

綫條化指粗筆變細、方形圓形的團塊為綫條所代替等現象,例如(下引諸“火”字取自偏旁):



到西周晚期,綫條化已基本完成。平直化指曲折象形的綫條被拉平,不相連的綫條被連成一筆等現象,例如(下引部分“貝”字取自偏旁):



經過這些變化，文字的象形程度顯著降低，書寫起來就比較方便了。

在春秋時代，不同地區的金文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一個地區可以是一個國家，如秦國自成一區；也可以包含幾個國家，如楚、徐、吳等東南國家構成一區。各地區金文的特色主要表現在書寫風格上，字形構造大體上還是相似的。

西周春秋時代一般金文的字體，大概可以代表當時的正體。一部分寫得比較草率的金文，則反映了俗體的一些情況。前面講研究資料時提到過的、侯馬等地發現的春秋戰國間的盟書文字，也有俗體的作風，有些字的寫法跟後來的六國文字已經很相似了。

c. 戰國至秦代

在春秋、戰國之交，古代社會發生了劇烈變化。這對漢字形體的演變產生了巨大影響。春秋以前，貴族階級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都佔有統治地位，文字當然也為他們所壟斷。春秋戰國之交，舊的貴族階級逐漸為新興剝削階級所取代，文字開始擴散到民間。進入戰國時代以後，隨着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變化和迅速發展，文字的應用越來越廣，使用文字的人也越來越多，因此文字形體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劇烈變化。這主要表現在俗體字勢力的迅速發展上。

在春秋時代的各個主要國家裏，建立在宗周故地的秦國是最忠實地繼承了西周王朝文字的傳統的國家。進入戰國時代以後，秦國由於原來比較落後，又地處西僻，各方面的發展比東方各國慢了一步，文字的劇烈變化也開始得比較晚。因此秦國文字正體所受到的俗體的衝擊，要比東方各國文字輕一些。在戰國時代（主要是戰國中期以後）東方各國的文字裏，傳統的正體已經被衝擊得潰不成軍了。而在秦國文字裏，繼承舊傳統的正體却始終保持着重要的地位。因此古文字學者把戰國時代的秦國文字跟東方各國文字區分開來，稱後者為六國文字。

六國文字中流行的俗體字，以各種簡體字為多，例如：

馬			獻	
樂			區	 

此外也有一些加點畫或偏旁的繁化字，例如：

平			阿	
---	---	---	---	---

由於存在大量的往往相當劇烈的簡化現象以及數量不算太少的繁化現象，六國文字的面貌就跟傳統的正體很不一樣了。

跟六國文字相比,戰國時代的秦國文字顯得比較保守。春秋時代秦國金文(如秦公簋、秦公鐘等)的形體,跟西周晚期周王朝的金文很接近。它們的主要區別在於秦國金文字形規整勻稱的程度有了提高。戰國時代秦國文字的正體繼續沿着這個方向發展,同時字形有所簡化。從總體上看,其形體跟西周晚期寫得比較規整的金文仍然頗為接近。但是秦國人日常使用文字的時候,也在不斷破壞、改造舊的字形。在秦國文字裏,俗體也在發展。在戰國中期以後的秦國的銅器(主要是兵器)銘文、印文和陶文等資料裏,可以看到很多俗體的寫法。有不少寫法跟後來的隸書已經極其相似甚至完全相同。例如惠文君四年(前334年)或惠文王更元四年(前321年)所造的相邦樛游戈的“游”字,以及莊襄王三年(前247年)或秦王政三年(前244年)所造的上郡戈的“漆”字,其“水”旁都已經寫成三短橫了。

在正體和俗體的關係上,秦國文字的情況跟六國文字很不一樣。六國文字俗體的字形跟傳統的正體的差別往往很大。秦國的俗體側重於用方折、平直的筆法改造正體,其字形一般跟正體有明顯的聯繫。而且秦國文字的正體雖然並不是一點沒有受到俗體的影響(戰國時代秦國文字正體中出現的簡化現象,就可能跟俗體的影響有關),但是沒有像六國文字的正體那樣被俗體衝擊得潰不成軍,始終保持着自己的系統。後來,正體演變為小篆,俗體則發展成為隸書。二者的變化基本上是平行的。

戰國時代,文字劇烈變化,而各國文字變化的情況又往往不一樣(上面舉過的六國文字簡化和繁化的例子,就大都只見於一個或一部分國家),因此形成了“文字異形”的局面(《說文》“敘”：“其後……分爲七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下面從戰國中期以後的文字資料裏舉兩個例子(下引部分“者”字取自偏旁。三晉——魏、趙、韓——的文字比較接近,作為一個單位處理):

	秦	楚	齊	燕	三晉
者					
市					

*此外如燕國把“中”寫作,齊國把“馬”寫作,三晉把“佳”寫作,都是很獨特的。秦始皇統一全國後,六國文字與秦文不合的異體都被廢除,因此它們對後來的漢字沒有顯著的影響。

隸書在戰國晚期的秦國已經初步形成。雲夢睡虎地秦墓發現的簡文就是早期的隸書。在這批數量很大的簡文裏，左旁从“水”的字屢見，“水”旁幾乎全都寫作三短橫，例外極少。此外還有不少跟漢代的隸書相同或相似的字形。《漢書·藝文志》和《說文》的“敘”都說隸書是秦代官府爲了應付當時繁忙的官獄事務而造的一種簡便字體。從漢代以來還廣泛流傳着程邈爲秦始皇造隸書的傳說。這些說法顯然跟事實有出入。唐蘭在《中國文字學》裏指出，《漢書》等說秦代“由於官獄多事，才建隸書，這是倒果爲因，實際是民間已通行的書體，官獄事繁，就不得不採用罷了”（165頁）。這是很正確的。也許在秦的官府正式採用隸書辦事的時候，曾由程邈對這種字體作過一些整理工作，所以就產生了程邈造隸書的傳說。

在秦代，小篆是法定的主要字體，但是在日常使用的文字裏，隸書顯然已經佔據了統治地位。到了漢代，隸書取代小篆而成爲主要字體，漢字發展史就進入了隸楷階段。小篆在漢代逐漸成爲主要用來刻印章、銘金石的一種特殊字體。

3. 隸楷階段的各種主要字體

下面分頭介紹一下隸楷階段的各種主要字體。

A. 隸書

上面已經講過了隸書的形成，現在講隸書形成後的發展變化。

秦代和西漢早期的隸書，在字形構造上還有較多跟篆書相似的成分，在書體上也還沒有形成東漢碑刻上所見的標準隸書的那種作風。一般稱這種隸書爲古隸或秦隸。

在東漢碑刻上的標準隸書裏，大部分字的字形構造跟後來的楷書已經很接近。其書體具有下述特點：字的結體一般呈扁方形。向右下方的斜筆大都有略向上挑的捺腳。較長的橫畫收筆時也往往略向上挑，形成上仰的捺腳式的尾巴。先豎後橫的彎筆收筆時大都上挑，而且幅度往往比較大。向左下方的斜筆（即撇）收筆時多數也略向上挑。收筆時上挑的橫畫，整道筆畫往往略呈微波起伏之勢，較長的捺有時也有這種筆勢。書法家用來形容隸書書法特點的“挑法”、“波勢”等語，就是指這些筆法而言的（早期隸書中已出現挑法，但還不成熟，使用得不普遍）。一般把上述這種類型的隸書稱爲八分或漢隸。

從漢簡上的隸書來看，至遲在西漢宣帝時期，八分書體就已成熟。但是石刻文字中的隸書比較保守，八分書體的特色要到東漢中期以後才充分顯示出來。所以過去根據石刻文字研究隸書的人，大都把八分形成的時間定得比較晚。如果以漢簡爲主要根據，結合字形構造和書體的情況來考慮，可以把武帝（或武帝後期）和

昭帝時代看作由早期的隸書向成熟的隸書,或者說由古隸向八分過渡的時期。不過隸書成熟後,字形構造還在繼續發生變化,總的傾向是變得跟後來的楷書越來越接近。

八分的形成使隸書的書法有了比較明確的規範,但是這種字體書寫起來却相當費事。人們日常使用文字的時候,往往並不完全按照這種字體的要求去書寫。大約在東漢中期,從日常使用的隸書裏演變出了一種跟八分有明顯區別的比較簡便的俗體。在東漢後半期,雖然士大夫們相競用工整的八分書勒石刻碑,一般人日常所用的隸書却大都已是這種俗體了。這種俗體在很大程度上拋棄了收筆時上挑的筆法,還接受了當時的草書的一些影響,如較多地使用尖撇等,呈現出由八分向楷書過渡的面貌。講字體的人時常引用的熹平元年(172年)陶瓶上的文字,就是屬於這種字體的。有的學者把這種字體稱為新隸體,下文採用這個名稱。“八分”之稱大約出現於漢魏之際。正是由於當時一般使用的隸書已是新隸體,才有必要為碑刻上那種正規的隸書另起八分的專名(參看啓功《古代字體論稿》34頁)。

在漢字字體演變的過程裏,由篆書變為隸書是最重要的一次變革。以成熟的隸書跟篆書作比較,可以看出隸書改造篆書字形的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幾種(為印刷方便,隸書字形用楷書表示):

(1) 解散篆體,改曲為直 這是隸書改造篆書的最重要的方法,如把篆書“日”(日)字長圓形的外框分解為兩道豎畫和兩道橫畫,或是分解為豎、折、橫三筆。

(2) 省併 如把篆字“𡗗”(大)字象兩臂的兩筆併為一橫,象身軀和左腿的兩筆併為一撇;把篆書“𡗗”(寒)字中間象人在草中的部分省併為無意義的筆畫結構“共”。

(3) 省略 如“雷”字篆書本从“雨”从三“田”,隸書省从一“田”;“屈”字篆書本从“尾”,隸書省从“尸”。

(4) 偏旁變形 在篆書裏,一個字用作偏旁時的寫法,通常跟獨立成字時沒有明顯區別。在隸書裏,獨立成字和用作偏旁的寫法明顯不同的情況,就時常可以看到了。例如“水”字用作左旁時作三短橫或三點,“人”字用作左旁時作“亻”(這種寫法實際上比“人”更接近篆文),“邑”字用作右邊的形旁時作“卩”(用作聲旁的,如“浥”“挹”的右旁仍作“邑”),“阜”字用作左旁時也作“卩”等等。偏旁的寫法往往隨所處的位置而異,例如“水”旁的位置在上或在下時就仍作“水”,如“沓”“漿”。有時即使位置相同,寫法也不同,例如在下的“火”有變作四點的(如

“然”),也有仍作“火”的(如“炙”)。因此同一個偏旁在不同的文字裏可以分化成多種形式。

(5) 偏旁混同 隸書為求簡便,把某些生僻的或筆畫較多的偏旁,改成形狀相近、筆畫較少、又比較常見的偏旁,如把“活”、“括”等字的聲旁“昏”(音 kuò)改成“舌”。省併、省略和偏旁變形,也會造成偏旁的混同。例如由於偏旁變形,在左的“肉”旁、一部分在下的“肉”旁、“朕”“服”等字的“舟”旁和“青”字的“丹”旁,都變得跟“月”旁沒有區別了。

經過上述這些變化,漢字象形的性質幾乎完全喪失,很多字的結構遭到了破壞,但是書寫起來就方便多了。

B. 草書

“草書”有廣狹二義。廣義的,不論時代,凡是寫得潦草的字都可以算。狹義的,即作為一種特定字體的草書,則是在漢代才形成的(上引《啟功書》38頁)。這是主要用於起草文稿和通信的一種輔助字體。大約從東晉時代開始,為了跟當時的新體草書相區別,稱漢代的那種草書為章草。新體草書相對而言稱為今草。

早在戰國時代秦國文字的俗體演變為隸書的過程裏,就出現了一些跟後來的草書相同或相似的草率寫法,如把“止”旁寫作“𠂔”之類。隸書形成後,這些草率寫法作為隸書的俗體繼續使用,此外還出現了一些新的草率寫法。草書就是在這些新舊草率寫法的基礎上形成的。

從居延漢簡中記年號的簡來看,有些宣帝和元帝時簡的字體已有很濃厚的草書意味;有些成帝時簡,如陽朔元年(前24年)簡,其字體就已經是相當純粹的草書了。所以草書形成的時代可以暫定為西漢晚期。

唐張懷瓘《書斷·上》“章草”條引南朝宋代王愔的話說:“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書粗書之,漢俗簡墮,漸以行之”(《法書要錄》卷七),把章草的出現跟《急就章》聯繫了起來。這是不可信的。“急就章”是史游所編字書《急就篇》的別名。《急就篇》以六十三字為一章,共分三十一章,所以有人稱之為“急就章”。這個別名在漢代可能還沒有出現。魏晉時代的書法家喜歡用章草寫《急就篇》(吳國皇象寫的一本現在尚有輾轉摹刻之本流傳)。今所傳趙孟頫、宋克等所書章草《急就章》也都輾轉出自皇本。但是敦煌漢簡、居延漢簡中的《急就篇》殘簡却全都用隸書抄寫,可證王愔所說之妄。湊巧的是史游的時代倒跟我們根據漢簡推測的草書形成的時代大致相合。

在魏晉時代,由於下面就要講到的早期行書和楷書的影響,章草逐漸演變為今

草。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東晉大書法家王羲之的草書(皆為後人臨摹之本或其刻本,其他字體之帖亦同),大都已經是今草了。今草的字形多因襲章草,但是改掉了跟隸書相近的筆法,連筆較多,有時對章草的筆畫還略有省併,書寫起來更為方便。此外也有些字形是直接由行書或楷書草化而成的。章草每字自成起訖,今草則字與字可以相連。總之,今草比章草更草,因此也更難辨認。唐以後更有所謂狂草,寫出來人多不能識,幾乎完全成了一種供欣賞的藝術品。

C. 行書

據說行書是東漢晚期桓、靈時代的劉德昇所創造的。他的行書“雖以草創,亦豐妍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漢魏之際的著名書法家鍾繇曾跟他學過這種書體(張懷瓘《書斷·中》,見《法書要錄》卷八)。

我們所熟悉的行書是介乎楷書和今草之間的一種字體。在劉德昇的時代,今草還不存在。他所創的行書當然不會跟我們所熟悉的行書完全一樣。可惜劉氏的書跡已經看不到了,現存鍾繇字帖中的墓田丙舍帖(為王羲之臨本的摹刻本),有人認為是行書,但也有人認為是楷書,還有人認為根本不能反映鍾氏書法的真面目。所以早期行書究竟是怎樣的一種字體,還是個問題(法帖所載作風跟後來的行書無別的鍾繇行書不可信)。

在我們所能看到的魏晉時代日常所用的文字,如“樓蘭遺址”出土的簡、紙文字裏,除了比較規整的新隸體和處於章草向今草過渡的階段中的草書之外,還有不少字體風格介乎二者之間的文字。它們在字形構造方面跟新隸體沒有多大不同,在書體上則受到草書的較大影響,比規整的新隸體活潑得多。它們的情況並不完全一致。有些簡紙上的字似乎只能看作比較草率的新隸體。有些簡紙上的字則比較明顯地呈現出一種獨特的風格,筆畫的寫法和文字的結體都明顯地比新隸體更接近楷書;無論是對新隸體還是對章草而言,都稱得上是一種“風流婉約”的新體。如曹魏晚期的景元四年(263年)簡以及時代大約不晚於東晉初的署名“濟遄”的兩封信和署名“超濟”的一封信,就是比較典型的例子。我們認為這種字體就是早期的行書。這是在帶有較多草書筆意的新隸體的基礎上,通過在筆畫的寫法和文字的結體上進行美化而形成的一種字體。

今所傳王羲之行書的字體幾乎都是介乎楷書和今草之間的,只有姨母帖比較古拙。而此帖的字體正好跟上面提到的濟遄的書信相似。這可以當作上述那種字體就是早期行書的一個證據。

由魏晉向上追溯,在70年代發現的安徽亳縣東漢晚期曹氏宗族墓的部分刻字

墓磚上,也可以看到風格跟上舉早期行書相似的字體。其時代大致與劉德昇相當。可見行書的形成也是有群眾基礎的,並非劉氏一人的功勞。

前面提到過的鍾繇的墓田丙舍帖,要比以上所舉的那些早期行書更像楷書,不過總的風格跟它們還是比較一致的。南朝宋代的羊欣說:“鍾書有三體:一曰銘石之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傳秘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狎書,相聞者也。”(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法書要錄》卷一)行狎書後人多作行押書,跟行書是一回事。墓田丙舍帖正是書啓一類“相聞”的文字。現在的傳本可能有臨摹失真之處,不過大體上大概還是可以反映出鍾氏行書的面貌的。

楷書是在行書的基礎上形成的(詳下),今草的形成也受到行書的影響。另一方面,楷書的形成和發展以及草書書體的變化,又對行書產生了很大影響。在王羲之等東晉書法家手裏,隨着今草的形成,行書也相應地變成介乎楷書和今草之間的一種字體,面貌跟早期的行書有了不同。行書沒有嚴格的書寫規則。寫得規矩一點,接近楷書的,或稱為真行或行楷。寫得放縱一點,草書味道較濃的,或稱為行草。

D. 楷書

我們所知道的最早的楷書書法家是鍾繇,所能看到的最古的楷書是鍾繇宣示表、力命表等帖的臨摹本的刻本(薦季直表很多學者認為不可信)。宣示表等帖的字體顯然是脫胎於早期行書的。如果把比較規整的早期行書寫得端莊一些,把在早期行書裏已經出現的橫畫收筆用頓勢的筆法普遍加以應用,再增加一些捺筆和硬鉤的使用,就會形成宣示表那種字體。鍾繇的行書如墓田丙舍帖本來就比一般的早期行書更接近楷書。他在一些比較鄭重的場合,如在給皇帝上表的時候,把字寫得比平時所用的行書更端莊一些,這樣就形成了最初的楷書。以上所說如果基本符合事實的話,我們簡直可以把早期的楷書看作早期行書的一個分支。明人孫鑛在《書畫跋跋》中說:“余嘗謂漢魏時,隸乃正書,鍾、王小楷乃隸之行。”這是很精闢的見解。“鍾、王”之“王”指王羲之。他的某些楷書和他的兒子王獻之的楷書,在鍾氏楷書的基礎上又有發展,顯得更為美觀。

應該指出,儘管楷書在漢魏之際就已形成,但是在整個魏晉時代,使用楷書的人却一直是相當少的,恐怕主要是一些文人學士。從魏晉時代的文字資料來看,當時一般人所用的仍然是新隸體或介乎新隸體和早期行書之間的字體。已發現的晉代的古書和佛經的抄本也大都使用新隸體,而且有的還有意增加一些八分筆意。碑刻(包括墓誌,下同)選擇字體更為保守,這在前面講研究字體的資料時已經提

到過了。有些東晉碑刻上的新隸體想摹仿八分而又學不像，顯得很不自然，大亨四年（即義熙元年，公元405年）所立的爨寶子碑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有些研究字體的學者，由於看到魏晉時代的碑刻上用的是八分和新隸體，一般人所用的也大都都是新隸體之類的字體，就認為當時根本不可能有楷書和跟楷書相近的行書存在，傳世的鍾王楷書和行書基本上都靠不住。這是不正確的。他們不知道古人在不同的用途上往往使用不同的字體，而且文人學士，特別是開風氣之先的書法家所寫的字，跟一般人所寫的字往往有很大距離。鍾王楷書跟新隸體同時並存，是一點也不奇怪的。在魏晉時代的“樓蘭遺址”出土的、時代不會晚於東晉初期的字紙上，不但可以看到早期行書，而且還可以看到作風跟鍾王很相似的楷書。可見那種認為魏晉時代不可能有楷書、傳世鍾王字帖都靠不住的說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進入南北朝以後，楷書終於成了主要的字體。東晉時代的有些新隸體，跟行、楷已經相當接近。到了南北朝，就出現了在鍾王楷書的影響下由新隸體演變而成的一種楷書。在南北朝早期的碑刻上，佔統治地位的已經是這種楷書了（其形成似當在東晉時代）。這種楷書在結體和筆法上保留了新隸體的一些比較明顯的痕跡，而且在使用於碑刻時，就跟東晉碑刻上的新隸體一樣，往往有仿古的傾向，筆法略帶八分的意味，因此其面貌要比鍾王楷書古拙。在北朝的碑刻裏，這種楷書較長期地佔據着統治地位。由於使用這種楷書的北魏和東西魏的碑刻很多，後人稱之為魏碑體。

南朝到了齊梁時代，碑刻上就出現了跟鍾王體很接近的楷書。北朝到了後期，碑刻上的楷書也出現了向鍾王體靠攏的現象。唐以後，魏碑體基本上退出了歷史舞臺，到了清代才由於書法家的提倡而重新受到重視。

鍾王楷書脫胎於行書，作為碑刻上的正體來用，結體和筆法都有不够莊重的地方。南北朝時人已經爲了這個原因對鍾王楷書作了一些改造。不過直到唐初的歐陽詢，才較好地完成了這項改造工作。因此也有人認為楷書到唐初才真正成熟。例如認為“鍾王小楷乃隸之行”的孫鑛就說：“若楷書則斷自歐陽始，點點畫畫，皆具法度，無一筆遷就從便，意正與隸同，法正與行草相配也。”（《書畫跋跋》）

楷書的“楷”當楷模講，“楷書”的原意就是可以作為楷模的字或有法度的字，本來並非某種字體的專名。魏晉時代人曾稱工整的八分書體為“八分楷法”或“楷法”。脫胎於行書的鍾繇楷書，在當時顯然沒有資格稱“楷書”，說不定本是包括在鍾書三體的行狎書即行書裏的。從南北朝到唐代，楷書有正書、真書、隸書等名稱。

正書、真書都是相對於行書、草書而言的，隸書是相對於八分而言的（後人或稱楷書爲今隸，漢隸爲古隸。這種“古隸”的意義跟前面講隸書時所說的“古隸”不同）。“楷書”這個名稱也曾經跟“楷法”一樣，被用來指稱過八分。唐張懷瓘《書斷·上》“八分”條就說八分“本謂之楷書。楷者，法也，式也，模也”（《法書要錄》卷七）。不過在唐代，“楷書”大概也已經用來指稱我們所說的楷書了。宋以後，“楷書”就成爲我們所說的楷書的專稱了。

楷書通行後，漢字字體就沒有很大的變化了。

第三節 漢字結構的主要變化

從結構上看，漢字主要發生了三項變化：（一）形聲字由少數變成多數。（二）所使用的意符從以形符爲主變爲以義符爲主。（三）記號字、半記號字逐漸增多。下面分別加以說明。

（一）形聲字由少數變成多數

在漢字發展的過程裏，形聲字在全部漢字裏所佔的比重逐漸上升，由少數變成了佔壓倒優勢的多數（這裏所說的“全部漢字”指全部表意字、形聲字和記號字、半記號字，不包括借這些字充當的假借字。關於記號字、半記號字參看第三小節）。

漢字形成完整的文字體系之後，新增加的字大多數是通過加偏旁或改偏旁等途徑從已有的字分化出來的。有的通過在假借字上加注意符而形成，如前面講字形繁化時舉過的“獅”字。有的通過在某個字上加注意符表示它的引申義或本義而形成。例如：“取”引申而有娶妻的意思（《詩·豳風·伐柯》：“取妻如之何。”），後來加“女”旁分化出了“娶”字。“莫”本作，象日落草莽之中，是表示“暮”這個詞的，後來由於常常假借來表示否定詞“莫”，加注“日”旁分化出“暮”字來表示本義。有的通過在某個字上加注音符而形成。例如“食”本有“使……食”的意思，後來加“司”旁分化出“飼”字來表示這一意義（也有可能“飼”是把“飢”的“人”旁換爲“司”旁而成的字）。改變某個字的偏旁而成的分化字，多數是表示引申義的。例如張開的“張”引申而有發脹的意思（《左傳·成公十年》：“將食，張，如廁。”），後來把它的“弓”旁改成“肉”旁，分化出“脹”字來專門表示這一意義。通過上述這些途徑分化出來的字，絕大部分是形聲字。

由於用圖形表示字義是造表意字的重要方法，漢字象形程度的不斷降低，對造

表意字很不利,並使很多已有的表意字的字形難以再起原有的表意作用,但是形聲字一般却不受影響。這不但促使人們越來越多造形聲字,少造表意字,而且還促使人們陸續把一些表意字改成形聲字。例如“𣎵”(𣎵)字本作,用人跟太陽之間的位置關係來表示日已西斜的意思,後來通過把傾斜的人形改爲形近的音符“𠂔”而變成形聲字。前面講過,“鳳”字曾由象形的表意字變爲从“鳥”“凡”聲的形聲字,這也是這方面的一個例子。有時爲了簡化等目的,也會把表意字改成形聲字。例如當捕兔網講的“罝”在甲骨文裏寫作从“网”从“兔”,是一個表意字,後來通過把“兔”旁換成筆畫較少的聲旁“且”而變成形聲字。爲了簡化等目的把形聲字改成表意字的現象也是存在的,例如把从“山”“巖”聲的“巖”改成从“山、石”會意的“岩”,把从“戶”“𡩊”聲的“𡩊”(有加“木”旁的繁體)改成表意字“門”(“一”象門門)。不過這種現象要比表意字改成形聲字的現象少見。

一方面,在新增加的文字裏形聲字佔了絕大多數;一方面,已有的表意字還有不少陸續被改成了形聲字。因此形聲字在全部漢字中所佔的比重就逐漸上升了。有人曾對殷墟甲骨文裏已認識的那部分字的結構作過研究,發現形聲字還明顯地少於表意字(參看李孝定《中國文字的原始與演變(上篇)》“甲骨文的六書分析”節,臺北史語所集刊四十五本二分 374—380 頁,1974)。在周代,特別是在春秋戰國時代,形聲字增加得非常快,新造的表意字則已很少見。這從有關的古文字資料裏可以清楚地看出來。可能早在春秋時代,形聲字的數量就已經超過表意字了。關於《說文解字》所收的九千三百多個小篆裏的形聲字的數量,有幾種統計數字,一般認爲形聲字佔百分之八十以上。南宋鄭樵在《通志·六書略》裏對兩萬三千多個漢字的結構作過研究。根據他的統計數字,形聲字的比重已經超過百分之九十。不過在常用字裏,表意字比較多,所以形聲字的比重就比較低。有人根據教育部 1952 年公佈的常用字表裏的二千個字作過統計,算出形聲字約佔百分之七十四。在漢字裏,有些字的結構應該歸入哪一類尚無定論,因此上引的那些統計數字是不可能很精確的。但是這些數字所反映的、形聲字由少數逐漸變成佔壓倒優勢的多數的情況,顯然是合乎歷史事實的。

形聲字既有表音成分,又不像有些假借字那樣有造成誤解的可能。在使用意符、音符的文字裏,尤其是在漢字這種記錄單音節語素佔優勢的語言的文字裏,這是最適用的一種文字結構。形聲字比重的上升,是漢字發展的主要標誌。

(二)所使用的意符從以形符爲主變爲以義符爲主

漢字的意符可以分成形符和義符兩大類。

有的意符是作為象形符號使用的，它們通過自己的形象來起表意作用，如古漢字裏“人”“日”等字所使用的亻、日等符號，又如構成𠂆（射）字的弓矢形和手形。我們把它們稱為形符。幾何形符號如果有以形表意的作用，如“一”“二”“三”等字表數用的橫畫，也可以看作形符。在古漢字裏，那些從結構上不能進一步分析的獨體字，如上舉的“人”“日”“一”和前面舉過的“鹿”“大”等字，一般都是用形符造成的表意字。有些形符只能用來構成合體表意字，本身不能獨立成字。例如：古人畫一前一後的兩隻腳作為𣥂（步）字。𣥂象人的左脚（參看第二節的第二小節裏講商代字體變化時所列的字形對照表），獨立使用時就成為“止”字（“止”的本義就是腳，“趾”是表示它的本義的分化字）。但是象右脚的𣥂（止）却不能獨立成字（《說文》把“止”也看作一個獨立的字，是有問題的）。又如亼（立）字使用的兩個形符，亼象站着的人，一象地面，表面上跟“大”字、“一”字同形，實際上却跟這兩個字沒有關係，所以也應該看作不能獨立成字的形符。

有的意符不是依靠自己的形象來表意的。這種意符通常都是由已有的字充當的表意偏旁，它們就依靠本身的字義表意。例如：合體表意字“歪”由“不”“正”二字構成，它的字義就是“不正”，“不”和“正”在這裏就是依靠本身的字義來表意的。我們把這種意符稱為義符。形聲字的形旁一般由依靠本身字義來指示形聲字字義的字充當，這種形旁也是義符。在我們現在使用的漢字裏，有少數義符不能獨立成字，只作偏旁用，如“辵”（由“辵”簡化）“疒”“宀”等。它們通常是很常用的偏旁，所代表的意義是一般人所熟悉的（“疒”和“宀”在古文字裏本來可以獨立成字。“辵”本是由用作偏旁的“辵”和“止”合成的一個偏旁。《說文》把“辵”看作獨立的字，所根據的恐怕是後起的用法。這種用法也已淘汰。“辵”其實也可以看作不能獨立成字的義符，它本是“行”用作偏旁時的省體，“辵”的用法是後起的）。

形符和義符的界綫也並非總是很明確的。在古文字裏，有些表意字的偏旁既可以看作形符，也可以看作義符。例如𣏟（林）字，無論把構成這個字的兩個𣏟看作形符——樹木的象形符號，還是看作義符——由“木”字充當的表意偏旁，都可以從字形體會出樹林的意思來。不過從隸、楷的角度來看，這類偏旁就只能歸入義符了。

在象形程度較高的古文字裏，表意字絕大部分是用形符造的，形符是意符的主流。漢字由象形到不象形的變化，破壞了絕大部分形符的表意作用，但是對依靠本身的字義來起作用的義符則並無多大影響。因此隨着漢字象形程度的降低，造表意字的方法就逐漸由主要用形符變為主要用義符了。春秋戰國以後新造的表意字

不但只佔全部新增加的文字的一個很小的部分,而且大多數是用義符構成的合體字,如“劣”(弱而少力爲劣)、“羶”(“膾”的異體,指羊的臭味)之類,用形符造的字如“凹”“凸”等爲數極少。

一方面,在造表意字的時候,形符使用得越來越少。另一方面,舊有的表意字裏的形符也在不斷減少。在漢字象形程度不斷降低和字形不斷簡化的過程裏,人們陸續把一些象形意味較濃厚的合體表意字裏由不能獨立成字的形符充當的偏旁,改成能够獨立成字的偏旁。例如:前一節講商代字體變化時舉過的“戍”字,本象人荷戈形。早在殷墟甲骨文裏,這個字就已經簡化爲,荷戈人形改成一般的“人”字,橫置在人肩上的戈形也豎了起來,跟一般的“戈”字取得一致。當匹配、對偶講的“雝”(chóu)本來寫作,象兩鳥相對,後來變作,左邊那個向右的“佳”改成了一般的“佳”字。涉水的“涉”本來寫作,以一脚在水南一脚在水北示意,後來變作,成爲从“水”从“步”的字。折斷的“折”本來寫作,象用斧斤砍斷樹木之形,後來斷木形改成兩個“中”,再後兩個“中”又改成外形與之相近的(手),就成爲从“手”从“斤”的字了。這類表意字經過改造之後,大都可以認爲已經變成了由義符組成的字。

爲了儘量使偏旁成字,以便書寫,往往不得不在字形的表意作用方面作些犧牲,“戍”“雝”“涉”“折”等字後來的字形,其表意作用顯然不如原來的字形明確。有時爲了使偏旁成字,甚至不惜完全破壞字形的表意作用。例如“射”字象弓矢的部分後來改成形狀略有些相近的

形聲字的形旁一般是義符。因此形聲字比重的不斷上升,也意味着義符的重要性在逐漸增加,形符的重要性在逐漸降低。而且有些形聲字的產生是直接跟某些形符的消失聯繫在一起的。用形符造的表意字加注音符之後,往往通過把形符改爲義符的途徑變成一般的形聲字,如前面舉過的“鳳”字。還有一些表意字通過把用作偏旁的形符改爲音符的途徑轉變成形聲字,如前面舉過的“昊”(昊)字。

由於在造字的時候,形符使用得越來越少,義符則使用得越來越多(主要用作形聲字的形旁),並且已經使用的形符也有不少陸續爲義符或音符所取代,大概早在春秋時代,義符的重要性就已經超過了形符。在漢字演變爲隸、楷的過程裏,獨體表意字所用的形符大都變成了喪失表意作用的記號(關於記號參看第一節第三小節)。例如“人”字和“日”字所用的形符變成隸書的“人”和“日”以後,已經一點

也不像人和太陽的樣子，只能認為已經變成了記號。充當表意字偏旁的不能獨立成字的形符，如果在隸書形成前還沒有為成字的偏旁所取代，在隸書形成和發展的過程裏也大都變成了記號。例如構成“立”字的人形和地面形合在一起變成了一個記號，“步”字下部的右脚形也變成了記號。這樣，曾經作為漢字意符主流的形符就基本上退出了歷史舞臺。在現代漢字裏，可以認為真正是用形符造成的字，如“一”“二”“三”“凹”“凸”等，為數極少，而且幾乎都是使用幾何形形符的。

(三) 記號字、半記號字逐漸增多

在第一節裏已經說過，漢字裏用記號造字的情況極為少見。但是在漢字發展的過程裏，由於字形象形程度的降低和簡化、訛變等原因，有些表意字和形聲字所用的意符或音符喪失了表意或表音作用，變成了記號。與此相應，這些表意字和形聲字就變成了記號字或半記號字（半記號字指由記號跟意符或音符組成的字）。例如前面講過，“日”字所用的形符在隸書裏已經變成記號，因此“日”字就從象形的表意字變成了記號字（注意：稱一個字為記號字，只是表明它所用的字符已經喪失了跟字音字義的內在聯繫。至於記號字作為文字所具有的表音表意作用，包括它用作合體字偏旁時的表音表義作用，是不會因此而喪失的。例如“日”變為記號字後，不但仍有字音字義，而且在“晴”“晦”等字裏仍能起意符的作用，在“駟”“昶”等字裏仍能起音符的作用）。又如“春”字本作“萅”，从“日”从“艸”“屯”聲，後來聲旁“屯”跟作為形旁之一的“艸”省併成記號“夊”，因此這個形聲字就變成了半記號字。

估計早在古文字階段，就已經有一些表意字和少量形聲字變成了記號字或半記號字。前面提到過的“射”字，在屬於古文字的小篆裏已經寫作从“身”，就未嘗不可以認為已經變成了記號字。

在漢字演變為隸、楷的過程裏，有一大批表意字和一些形聲字變成了記號字或半記號字。在前一小節裏已經說過，在這一過程裏，獨體表意字所用的形符和象形意味較濃厚的合體字所包含的不能獨立成字的形符，大都變成了記號。這就是說，獨體表意字大都變成了記號字，包含不能獨立成字的形符的合體表意字也大都變成了記號字（如“立”）或半記號字（如“步”）。由形聲字變成的半記號字，上面已經舉過了“春”字。此外如“布”（本从“巾”“父”聲）、“在”（本从“土”“才”聲）、“寺”（本从“寸”“之”聲）、“責”（本从“貝”“束”聲）等，都是例子。少數形聲字，如本來是从“禾”“千”聲的“年”字，甚至完全變成了記號字。

50年代的漢字簡化也採用了一些記號字和半記號字，如“头”是記號字，“鸡”“疍”是半記號字。

總之，在我們現在使用的漢字裏，記號字、半記號字的數量已經相當可觀了。

還有不少字，雖然從表面上看，其結構並未由於字形演變和簡化等原因而遭到破壞；但是由於語音和字義等方面的變化，對一般人來說，實際上也已經變成了記號字或半記號字。比較常見的一種情況，是形聲字的聲旁由於語音的變化喪失表音作用，實際上變成了記號。如“淦”的聲旁“金”、“斛”的聲旁“角”、“特”的聲旁“寺”，對一般人都已經起不了表音作用了。“特”的形旁“牛”由於字義的變化也已經起不了表意作用了（“特”的本義是公牛，此義早已不用）。所以可以說“特”字實際上已經變成了記號字。上面舉過的由形聲字變成的半記號字“寺”“責”等，情況與“特”類似。還有上面舉過的、下部偏旁已經變成記號的表意字“步”，也可以認為實際上已經變成了記號字，因為一般人大概不會知道“止”跟“步”在意義上有什麼聯繫。此外，在這方面還有一些比較複雜的情況，這裏不能一一說明了。

對以上所說的漢字在結構上所發生的變化，可以作如下概括：在象形程度較高的早期階段（大體上可以說是西周以前），漢字所使用的字符主要是意符（以形符為主）和音符（嚴格說應該稱為借音符，下同），形聲字在全部文字裏尚未佔多數；後來隨着字形等方面的變化，所使用的字符逐漸變成既有大量意符（以義符為主）和音符，也有相當多的記號，同時形聲字逐漸由少數變成了多數。

在第二和第三節裏，我們對漢字發展過程中形體和結構這兩方面的主要變化分別作了介紹。事實上，這兩方面的變化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漢字象形程度的降低，是促使人們少造表意字多造形聲字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形聲字成為漢字主流這件事，回過頭來又為漢字象形程度的進一步降低創造了條件。文字結構的變化，客觀上常常造成字形繁化或簡化的後果。文字形體的變化，也常常造成改變或破壞文字結構的後果。記號字的大量出現，主要是漢字形體的變化所引起的。這從文字結構上看是一種倒退，然而却是為了簡化字形、提高書寫速度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但是記號字如果增加得太多，漢字就會變成極難記憶的一種文字，使用起來一定會非常不方便。在今天，如何處理好字形簡化跟文字結構的矛盾，仍然是一個需要認真對待的問題。

原載《中國古代文化史》（一）（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今據以收入。

四十年來文字學研究的回顧

我們所說的“文字學”取其傳統用法，指以記錄漢語的方塊漢字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四十年來，在語言學的帶動下，文字學的理論水平有了提高。同時，埋藏在地下的古代漢字資料的不斷發現，以及國家的語文工作和語文教學等方面的實踐，都對漢字的研究工作起了較大的促進作用。因此在文字學領域內取得了多方面的進展。下面擇要作簡單的介紹，並附述我們對某些問題的看法，偏頗之處希望大家指正。文中加注時，以加方括號的數字為文章或書的代號，請參閱文末所附參考文獻目錄。

一、漢字性質的研究

漢字的性質，也就是漢字屬於哪一種文字類型的問題，早在 50 年代就受到了注意。70 年代末期以後，這個問題成了文字學研究的熱點，討論的人很多，意見頗為分歧。

各種不同說法大體上可以概括成兩大類。一類是根據漢字所能起的表意、表音等作用來為它定性的，另一類是根據漢字所能表示的語言結構的層次（也可以說語言單位的大小）來給它定性的。

屬於前一類的，有表意文字說、意音文字說（見〔1〕）、商代甲骨文為形意文字周代以後漢字為意音文字說（見〔2〕）、古漢字為表形文字隸變後漢字為表意文字說、古漢字為意符音符文字（即意音文字）隸變後漢字為意符音符記號文字說以及表音文字說（關於以上三說出處參看〔3〕）。

要評價這些說法，首先必須分清作為詞或語素的符號的文字和文字所使用的符號（如拼音文字的字母）這兩個不同層次。詞和語素都是音義結合體。作為詞或語素的符號，不管哪種文字都是既表音又表意的。要劃分表音、表意等類型，必須從文字所使用的符號的性質著眼（參看〔4〕10—11 頁）。

有人根據既表音又表意是所有文字的共性這一點，批評表意文字、表音文字、意音文字等說法全都毫無意義。這是從作為詞或語素符號的文字這個層次來看問題的。但是主張上述那些說法的人，雖然不見得都對我們所說的兩個層次有清晰的認識，大體上都還是根據漢字所使用的符號的性質來給它定性的，如說形聲字的形旁是表意的，聲旁是表音的等等。可見那種批評是不恰當的。

從漢字使用的符號的性質來看，表音文字說顯然很難為人所接受。漢字大量使用表意符號（如象形字所用的象形符號、會意字的偏旁、形聲字的形旁），而且其表音符號（如被“假借”的字和形聲字的聲旁）是借用既有音又有義的文字充當的，跟拼音文字的字母大不相同。一般所說的“表音文字”都是指拼音文字而言的。有的人過分強調假借方法的表音性質及其使用的普遍性，把漢字也稱為表音文字，是不妥當的。這一點已經有很多人指出來了（參看〔3〕）。

大多數持表意文字說和持意音文字說的人，他們的實際看法似乎並無本質的分歧。前者一般並不否認假借方法和形聲字的聲旁具有某種表音作用，他們堅持把漢字稱為表意文字，是為了強調這種表音作用跟拼音字母的表音作用的區別以及漢字跟拼音文字在總體上的區別。後者雖然強調漢字使用了很多表音符號，但是也並不否認這種區別的存在。二者之間的分歧也許可以歸結為側重點的不同。個別人承認漢字是意音文字而把商代甲骨文排除在外，這是不妥當的。甲骨文大量使用假借字，形聲字雖然不如周以後的漢字多，但也並不少見。既然承認周以後漢字是意音文字，就沒有理由不承認甲骨文是意音文字。

主張甲骨文是形意文字和主張古漢字是表形文字的人，把象形符號看作表形符號，跟表意符號並列。象形符號實質上是用圖形來表意的一種符號。它們所要表示的仍然是文字所記錄的詞的意義，而不是詞的什麼“形”。所以“表形”的說法恐怕是有問題的。有的人稱古漢字為象形文字。如果只是為了指明文字所用的符號在外形上的特點，當然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跟稱古漢字為表形文字是一個意思，那就不妥當了。

主張把隸變後的漢字稱為意音符號文字的人，認為漢字裏的很多意符、音符，在隸變以後已經成為既無表意作用也無表音作用的“記號”。例如他們認為“日”所用的符號由“☉”到“日”的變化，就是由象形的意符到記號的變化，而不是像很多人所說的那樣，是由表形符號到表意符號的變化（但是“日”字所用的符號變成記號，並不妨礙“日”字作為語言裏“日”這個詞的符號，仍然具有音義。因而“日”在用作合體字偏旁的場合，也仍然能起表意或表音作用。這正是有些人把記

號誤認為表意符號的原因(參看[4]11頁)。持此說者承認隸變後的漢字所使用的符號仍以意符和音符為主,所以此說與意音文字說並無大的分歧。

屬於前面說過的、為漢字定性的後一類說法的,主要有語素文字說和語素一音節文字說(參看[3])。有的同意語素文字說的人,為了突出漢字的特點,主張稱之為“方塊、拼符、語素文字”(見[5]337頁)。持語素文字說者,一般都承認在單音節詞佔絕對優勢的古代,漢字可以稱為表詞文字。持語素一音節文字說者一般也承認那個時代的漢字可以稱為表詞一音節文字。有人認為現代漢字是“記寫單音節詞和詞素以及音節的文字”(見[6])。“詞素”和“語素”是一詞的異譯。一個單音節詞通常就是一個能獨立活動的語素。所以此說似可併入語素一音節文字說。

這裏必須指出,對“語素文字”“語素一音節文字”這類名稱,實際上存在兩種不同的理解。這種不同也跟“兩個層次”有關。持語素文字說者幾乎都是以每個漢字通常都是一個語素符號這一點為立說根據的。有些持語素一音節文字說者也同意這種看法。他們所以稱漢語為語素一音節文字,只是為了強調漢字都是單音節的,或是為了強調有些漢字(如“葡萄”“日內瓦”)只記錄雙音節或多音節語素中的一個音節。但是有的主張語素一音節文字說的人却不同意這種看法,認為即使根據文字所能表示的語言結構的層次來為它定性,也必須著眼於文字所使用的符號,而不能把作為語素符號的字當作單位來考慮問題。他們認為漢字所用的意符只跟語素的意義有聯繫,沒有表意表音作用的記號只能起區分不同語素的作用,所以都是屬於語素這個層次的。由這兩類符號構成的字,只能表示出語言中語素這一層次的結構(即表示出詞和句子由哪些語素構成),而不能表示出語言的語音結構。至於漢字使用的音符,雖然跟音節文字的字母有很大區別,却應該看作屬於音節這一層次的符號(如“隍”“惶”“惶”“惶”等形聲字的聲旁“皇”,是表示這些同音節字的音的,加上“阜”“口”“心”“水”等意符作形旁,才構成分別代表不同語素的字)。所以他們得出了漢字是語素一音節文字的結論。這種語素一音節文字說跟上面所說的那一種貌同實異,但是跟意音文字說在實質上則是一致的(持上述這兩種語素一音節文字說者,只是在對待“倉庚”“日內瓦”之類由兩個以上的字組成的假借字組的時候,才有共同立場。他們都認為在這類假借字組裏,每一個字只是一個記錄音節的符號。對“葡萄”一類字,二者的看法就不同了。主張後一種說法的人認為它們的本質跟一般形聲字相同,不能由於它們所記錄的是雙音節語素,就把每一個字看作一個記錄音節的符號)。

一般所說的音節文字和音素文字,都不是根據這些文字中的字的性質,而是根

據它們使用的符號即拼音字母的性質來定名的。已經有人指出,在判斷漢字是否語素文字的時候,“拿漢字同英語或俄語等其他文字的字母比”,是不合理的;然而要是拿漢字跟英文的字比,漢字如稱為語素文字,英文就要稱為詞文字了([5] 341—342 頁)。可見上述前一種對“語素文字”和“語素—音節文字”的看法是有問題的。上述後一種“語素—音節文字”說是否完全合理,也還有待討論,因為有些人認為被假借的字和形聲字的聲旁,跟音節文字的字母有本質區別,把它們也看作表音節的符號未必妥當。

有人認為漢字是一種特殊的音節文字。對兄弟民族所用的跟漢字同類型的文字如老彝文等的性質,也有人這樣看。這就跟把漢字看作表音文字一樣,顯然是不妥當的。

總之,語文學界對漢字性質問題尚未取得一致意見,但是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已經比過去深刻得多了。

跟漢字性質有密切關係的、漢字是否適合漢語的問題,也有不少人加以討論。在 50、60 年代,人們往往強調漢字與口語脫節的一面。近年來則有很多人認為,由於在漢語裏迄今為止單音節語素仍佔優勢,而且新詞大都由已有的語素合成,所以作為語素文字或語素—音節文字的漢字,跟漢語基本上仍是適合的。

二、漢字起源的研究

50 年代以來,考古工作者在原始社會時代的遺址裏(本文所說的遺址包括墓葬),發現了不少刻劃或描繪在器物上的符號,其數量和重要性都遠遠超出過去的發現。例如在屬於仰韶文化早期的一些半坡類型遺址裏發現了很多形狀大都比较簡單的刻劃符號(多作幾何形),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的一些遺址裏發現了一批象實物的圖形符號等等。這些發現推進了對漢字起源問題的研究。

大家對這些符號的性質尚無一致意見。有些人認為它們是文字,並且直接把它們當作早期的漢字加以辨釋(如[7])。有些人認為它們都還是非文字的標記(如[8])。有些人認為半坡類型遺址出土的以及與之相類的那些符號不是文字,大汶口文化象形符號則是原始的漢字(如[9]32—37、39—40 頁)。從各方面看,上述前一類符號大概不可能是文字(參看[8]、[9])。不少人根據半坡遺址發現的符號,說漢字有六千年以上的歷史,恐怕是不妥當的。在偃師二里頭等可能屬於夏代的遺址裏也發現過這類符號。很多人認為是文字,但也沒有提出足夠的證據。近

年在西安市郊區的龍山文化晚期遺址裏發現了一些刻有符號的骨片和骨器。有人稱這些符號爲甲骨文，認爲跟殷墟甲骨文有淵源關係。在河南舞陽縣距今七八千年的賈湖新石器時代遺址裏發現的龜甲上的簡單刻劃符號，也有人稱爲“原始文字”。這些說法都嫌輕率。不過上述那類符號，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跟古漢字大概也不是毫無關係的。即使在不承認這類符號是文字的人裏，也有人認爲古漢字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等數字和某些天干字的字形，有可能出自這類符號（見〔10〕）。

大汶口文化象形符號在外形上跟古漢字相當接近。同類型的以至完全相同的符號，在傳世的某些古玉器上也有發現。這些古玉器有人定爲良渚文化遺物（見〔11〕）。但是迄今爲止還沒有發現這類符號確已用作文字的證據。這類符號究竟是不是文字，它們跟古漢字究竟是什麼關係？這是漢字起源的研究中亟待解決的問題。但是如果沒有新資料發現，恐怕很難取得突破性的進展。

在漢字起源的研究中，研究者除了大量使用考古資料外，還普遍把兄弟民族的各種原始記事方法和納西原始文字（或稱納西圖畫文字）用作比較的資料。有些人並提出了關於漢字形成過程的一些比較具體的設想，如認爲在漢字形成過程之初，假借方法就已普遍應用；在漢字的原始文字階段，文字和圖畫曾混雜在一起使用；形聲字在原始文字階段就已出現等等（見〔8〕〔10〕等）。

對漢字最後形成能完整記錄語言的文字體系的時代，目前主要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爲形成於夏商之際（見〔10〕），一種認爲形成於夏初（見〔12〕）。有人認爲“中國象形文字出於商代後期的卜人集團”（見〔13〕），恐怕把漢字形成的時代估計得過晚了。

三、六書的研究

四十年來，講漢字結構的人大多數仍然沿用六書說。在六書中，討論得比較多的是轉注和假借。

“轉注”究竟是什麼意思？這是爭論了一千多年的老問題。對轉注的不同解釋非常多，幾乎所有可能想到的解釋都已經有人提出過了。在今天要想確定許慎或創立六書說者的原意，恐怕是不可能的。這些年來講轉注的人，多數把轉注解釋爲新字孳生的途徑。不過他們所說的轉注現象的具體範圍則或廣或狹，仍然很不一致。新字如何孳生，當然是很值得研究的問題。然而研究這個問題完全可以拋

開轉注問題不管,把二者糾纏在一起,只有壞處沒有好處。我們應該把轉注問題看作文字學史上已經過時的一個問題,完全沒有必要再去為它花費精力。

對假借的看法也存在分歧,其癥結在於假借和引申的分合。有些人認為假借就是借用本為其他詞造的字來表示同音或音近的詞,一個字由於語義引申而表示新的意義不能看作借用,所以由於語義引申而引起的一字多義現象應該排除在假借現象之外。有些人則認為一個字由於語義引申而表示新的意義,也應該看作假借。還有些人比後者更進一步。他們主張嚴格區分六書的假借即無本字的假借跟有本字的通假,認為凡是無本字的假借都是由語義引申引起的(見[14][15])。應該承認,把引申包括在“假借”裏,曾是傳統文字學中長期佔統治地位的一種觀點。就實際情況來看,由引申和由借字表音引起的一字多義現象,有時也確實很難區分。但是語義引申畢竟是語言現象而不是文字現象。所以引申跟假借還是區分開來為好。認為無本字的假借都由語義引申引起,很可能符合許慎的原意。但是不論在漢字裏,還是在世界上曾經使用過的與漢字同類型的其他古文字裏,都存在很多顯然跟語義引申無關的無本字的借字表音現象。所以此說是不能成立的。

形聲字結構方面的一些現象,如省聲、聲旁有義和“右文”等,也有不少人寫文章或在文字學通論性著作裏作過研究。由於有些人把原始社會時代遺址裏發現的、外形跟指事字比較接近的簡單刻劃符號看作文字,指事字和象形字究竟哪一種先出現的老問題,又一次引起了人們的興趣。但是這個問題恐怕是沒有什麼意義的。因為早在文字形成過程開始之前,“指事”和“象形”的表意方法就都已經在廣泛使用了。文字形成過程開始的時候,這兩種方法當然都會被用來造字,我們有什麼必要去討論二者出現的先後呢?

與多數人沿用六書說同時,也有人想打破六書說的框框。早在30年代,唐蘭就提出過把古漢字的結構分為象形、象意、形聲三書的主張。50年代有人提出了新的三書說,主張把古漢字分為象形、假借、形聲三種基本類型(見[16]76—80頁)。後來又有人在此說的基礎上提出了表意、假借、形聲三書說。表意包括六書中的象形、指事和會意(見[4]106—107頁)。

四、異體字、古今字和通假字的研究

過去研究文字學的人往往只講文字形體和六書,忽略了對漢字跟漢語之間的複雜關係的研究。50年代,為了配合文字改革工作,很多人強調文字對語言的從

屬性,但是很少有人去研究漢字跟漢語裏的詞的各種具體關係。60 年代以後,情況有了一些變化。如呂叔湘《形、音、義》(《文字改革》1964 年 3、4 期,已收入所著《語文常談》)和李榮《漢字演變的幾個趨勢》(《中國語文》1980 年 1 期)等文,就都很注意從字跟詞的關係的角度去研究文字現象。有不少人參加的關於異體字、古今字和通假字的討論和研究,也反映出對字跟詞的關係的重視,因為異體字、古今字和通假字實際上都是指同一個詞的不同書寫形式而言的。下面對這些討論和研究作簡單的評介。

50 年代進行異體字整理時,基本上是從一個個的字出發來考慮問題的。因此很多本來應該加以整理的、雙音節複合詞的異形(如“交代”和“交待”、“折中”和“折衷”等),就沒有得到整理。後來有不少人指出,在漢字規範化中不能只注意字的異形,而不注意詞的異形。這是一個進步。對詞的異形的各種具體情況,也有人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

但是一方面研究有了進展,一方面却出現了術語的混亂。所謂詞的異形就是詞的不同書寫形式,也可以說就是廣義的異體字(在 50 年代的異體字整理裏,有些被合併的異體字也並不是同一個字的異形,而是可以用來表示同一個詞的不同的字,如“瑯”和“雕”)。但是有不少研究詞的異形的人,爲了強調自己的觀念跟舊的以單字爲本位的異體字觀念的不同,使用了“異體詞”或“異形詞”的名稱(如〔17〕)。這樣就在概念上把詞跟詞的書寫形式也就是語言跟文字弄混了。有些人還把音近的同義詞或同一個詞在不同方言中的變體(如“跟頭”和“斤斗”、“羅唆”和“嚕蘇”等)也包括在“異體詞”的範圍裏。按照這種觀點,整理“異體詞”就不但要整理文字,而且還要“整理”語言了。出現這種情況就跟“名不正”有關。

附帶說一下,大約從 60 年代開始,有些人在講到漢語拼音的拼寫法的時候,把“正字法”改稱爲“正詞法”。現在這種說法已經佔了絕對統治地位。這也是不妥當的。漢語拼音的分詞連寫等問題當然跟漢語裏的詞的劃分有關。但是在拼寫漢語時,把表示一個雙音節或多音節詞的字母連寫在一起,只不過是反映而不是創造一個語言事實。如果不採取連寫的辦法,這個詞並不會因此而喪失詞的資格。方塊漢字不用分詞連寫法,漢語裏的雙音節和多音節詞照樣存在。可見就拼寫方法而言,我們要正的並不是語言中的詞,而是詞的書寫形式,即文字。所以,“正字法”這個舊名稱恐怕還是應該恢復的。

在很多拼音文字裏,作爲書寫單位的一個字通常就代表一個詞。但是在漢字裏,字跟詞往往不是一對一的關係。人們容易由於注意了字而忽略了詞,甚至被文

字現象牽着鼻子走,以致誤解了語言現象。認識並指出這一點,確實很重要。但是我們不應該走到另一個極端,在應該說“字”的時候,也不說“字”而說“詞”。

古今字指同一個詞的、通行時代有古今之別的不同書寫形式。在古今字的範圍應該怎樣劃的問題上有分歧意見。有些人主張把古今字跟通假字分開來,只把有“造字相承的關係”的那些字(如“縣”和“懸”、“說”和“悅”等)定為古今字(見[18])。有些人認為古今字跟通假字是從不同角度對同詞異字現象作出的“不同歸類”,二者“不是平行關係”,古今字應該包括通行時間有古今之別的通假字;而且古今字不但“可以指形義不同的兩個字,也可以指形不同但義同的異體字”(見[19])。後一種意見符合歷史上使用“古今字”這類說法的實際情況。“古今字”本來是在解釋古書中的難字時所用的一種術語,並不是用來說明文字產生的先後的。我們似乎沒有必要賦予這個舊術語以新的意義,把古今字限制在有造字相承關係的範圍裏。

“通假”有狹義、廣義之分。一般認為狹義的“通假”指本有本字的假借,不過實際上有很多人把假借字跟假借字相通的現象(如“女”通“汝”)也包括在狹義的通假裏。廣義的“通假”跟古人所說的“通用”相當,不同的字被用來表示同一個詞的各種現象,幾乎都可以納入其範圍。有些人把廣義的“通假字”說成“通用字和假借字的簡稱”(見[20])。他們把假借字(指狹義的通假字)排除在通用字之外,賦予通用字以不同於傳統觀念的新定義(如[20]認為通用字就是“同源字”)。這恐怕是不妥當的。

通假字的讀音問題,即本讀A音的字用作一個讀B音的字的通假字時,究竟應該改讀B音還是仍讀A音的問題,曾引起較多的討論。對這個問題有三種意見:(1)“通假字一般不應當讀同本字的音讀,而仍應讀……自身的音讀。”(見[21]) (2)“凡古代字書、韻書或前人注疏裏注有通假字與本字讀音相同的反切或直音的,則通假字的今讀同本字”,不然就讀原來的字音。(3)“不管古代字書、韻書或前人注疏裏是否注有通假字與本字讀音相同的反切或直音,只要它確切是通假字,其今讀應當同本字。”(皆見[22])。此文作者持第三種意見)一個字用作另一個字的通假字,意味着這個字被用來表示通常由後者表示的一個詞。詞是通過一定的語音來表示一定的意義的。兩個表示同一個詞的字當然應該讀同一個音(參看[22])。上舉第三種意見顯然是正確的。

在關於通假字的定義和讀音的討論之外,還有人對古代文獻中的通假現象進行了其他方面的研究。例如有人研究了秦漢帛書簡牘中的通假字,認為秦漢之際

大量用通假字，“其主要原因是沿襲舊的用法”，並非由於字少（見〔23〕）。這類研究也可以歸到下一節所說的歷代漢字的研究中去。

五、歷代漢字的研究

四十年來，由於新資料的發現和研究者的努力，先秦古文字的研究有了比較明顯的進展。其中，戰國文字研究的成績尤其突出。40年代以前，研究戰國文字的人很少。50年代以後，隨着楚簡等重要新資料的不斷發現，研究者逐漸增多，對戰國文字特點的認識也漸趨深刻，有很多過去不認識的字被陸續辨釋了出來。前人把戰國文字分成秦和六國兩系。現在戰國文字的研究已經進入了分國研究的階段。

這四十年裏，除發表了大量古文字學方面的論文和一些比較專門的古文字學著作（如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侯馬盟書》、饒宗頤、曾憲通《楚帛書》等）外，還出版了不少古文字的文編（即單字彙編），如孫海波《甲骨文編》（中華書局，1965）、容庚《金文編》（科學出版社，1959）。又張振林、馬國權摹補本，中華書局，1985）、商承祚《石刻篆文編》（科學出版社，1957。包含秦漢篆文）、羅福頤主編的《古璽文編》（文物出版社，1981）、張頤《古幣文編》（中華書局，1986）、高明《古文字類編》（中華書局，1980）、徐中舒主編的《漢語古文字字形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等。這些文編對50年代以來考釋古文字的成果有或多或少的反映。進入80年代後，還出版了一些古文字學的通論性著作，如李學勤《古文字學初階》（中華書局，1985）、林澧《古文字研究簡論》（吉林大學出版社，1986）、高明《中國古文字學通論》（文物出版社，1987）、陳煒湛、唐鈺明《古文字學綱要》（中山大學出版社，1988）、陳世輝、湯餘惠《古文字學概要》（吉林大學出版社，1988）等。唐蘭在30年代寫成的《古文字學導論》也在1981年由齊魯書社正式出版。

在古文字學的論著中，可以看到不少根據古文字糾正《說文》篆形和解說的錯誤的意見。可惜還沒有一本總結這方面成果的高質量的著作。

70年代，考古工作者發現了大量秦和西漢早期的簡牘和帛書。這是劃時代的新發現。通過這些資料，大家才認識到早期隸書的真正面貌，並且認識到隸書不是秦統一後在小篆的基礎上形成的，而是在戰國晚期的秦國，以秦國文字的簡俗體為基礎而形成的。漢語大字典字形組編的《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四川辭書出版社，1985），收入了一些秦和西漢早期的簡牘、帛書文字的字形。

對漢以後的歷代漢字，研究工作做得比較少。雖然新發現的和長期流傳的這一時期的文字資料為數很多，研究的人也不算少，可是從文字學角度進行的研究却相當少見。

對字體方面的問題，注意的人還算稍多一些。尤其是郭沫若在60年代中期提出《蘭亭序》真偽問題之後，魏晉時代楷書、行書的真面貌究竟如何這個老問題，又引起了一些人的興趣（參看〔24〕）。郭沫若根據某些東晉時代的墓誌和晉代的古書寫本的字體，懷疑像《蘭亭序》那樣漂亮的字體在當時不可能存在。有些人則根據出土的其他魏晉時代文字資料，認為那種字體在當時是可能存在的，傳世魏晉名家的楷書、行書的後人臨摹本大多數是可靠的。通過討論，對魏晉時代在不同社會階層中和不同用途上使用着新舊不同的字體的現象有了比較清楚的認識。對先秦以下各種字體作全面研究的專著，有啓功《古代字體論稿》（文物出版社，1964）。

對漢以後各代文字在字形和結構上的特點以及各代用字的特點，進行研究的人少得可憐。這方面已發表的比較重要的研究成果，見聞所及的只有一些研究敦煌卷子所用文字和其他唐代文字的論文，以及一本研究晚明刻本小說用字的薄薄的專著（〔25〕）。這方面的研究工作很需要加強。

已出版的漢以後各代文字的文編，除上面已經提到過的上包秦文的《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外，還有羅福頤《漢印文字徵》（文物出版社，1978）及《補遺》（同上，1982）、秦公《碑別字新編》（文物出版社，1985）、洪鈞陶《草字編》（文物出版社，1983—1984）等。杭州大學的同志正在編寫的《敦煌吐魯番俗字典》，無疑會成為對文字學研究很有用的工具書。可惜書尚未成，作為主編的中年學者郭在貽就在今年年初過早地辭世了。

正在分冊出版的《漢語大字典》，收古今所用漢字約五萬六千多個。這部字典在楷書字頭下“收列了能够反映形體演變關係的有代表性的甲骨文、金文、小篆和隸書的形體”，並“酌附字形解說”。這在字典體例方面是一個創舉。

附帶說一下，對漢字在歷史上發生的簡化、繁化和分化、合併等現象，也有人寫文章或在文字學通論性著作裏進行了研究。

六、現行漢字的研究

在漢字的整理和改革、漢字規範化、語文教學、字典和詞典的編纂、出版印刷以及漢字信息處理等方面的工作的推動下，現行漢字的研究（也可以說是應用漢字學

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績。下面的介紹是挂一漏萬的。

在字量的研究上,多年來各有關機構做了大量工作,在通行漢字的數量和字的使用頻率等方面取得了很多數據。國家語委漢字處在這些工作的基礎上,經過進一步的研究,制訂了包含 2500 個常用字和 1000 個次常用字的《現代漢語常用字表》,於 1988 年 1 月由國家語委和教委聯合發佈。國家語委漢字處還制訂了包含 7000 個字的《現代漢語通用字表》,於同年 3 月由國家語委和新聞出版署聯合發佈。這兩個表的科學性比過去的同類字表有所提高。不但所用的數據比較精確,而且選字時較多地考慮了字的構字和構詞能力等方面的條件。爲了瞭解現行漢字的總數量及其他使用情況,國家語委漢字處(前身爲文改會漢字處)等單位還進行了姓氏、地名等方面用字情況的調查研究。對方言用字也有人作了一些調查研究。

對現行漢字的構形成分,也就是構成全部字形的單元,一直有人在研究。構形成分有不同的層次。層次不同,單元數量大不一樣。如果以傳統文字學所說的偏旁爲構形成分,即使只以一般所謂通用字爲統計範圍,單元數量也要多到 1000 左右。如果不顧六書結構,把本身由偏旁組成的偏旁全都分拆開來,單元數就會大大減少。如果以筆畫爲構形成分,並對相似的筆形加以歸併,單元數甚至可以降到 10 以下。1984 年,文改會漢字處跟武漢大學合作,用電腦對《辭海》1979 年版所收漢字的“結構、部件”等進行了統計,部分統計成果已在《中國語文》1985 年第 4 期上發表。研究構形成分的人,尤其是具有某種實用目的(如想爲漢字信息處理的機械化、電腦化服務)的研究者,在分解全部字形時往往同時採用不同層次的構形成分。如王竹溪《新部首大字典》(1988 年上海翻譯出版公司、電子工業出版社聯合出版)有 56 個部首(大多數有變體),它們同時也是“漢字組成的單元”,其中就既有筆畫和筆畫結構,也有偏旁。

構形成分的研究跟漢字教學有密切的關係。60 年代中期,爲了教學的方便,在《文字改革》等刊物上還曾開展過關於規定偏旁部件名稱問題的討論(參看[26])。

在現行漢字字形的表意表音作用方面,研究得比較多的是聲旁的表音作用。研究成果除論文外還有專著([27][28])。

漢字的整理、簡化和規範化以及字典和詞典的編纂,推動了對異體字、通假字的研究。這方面的情況前面已經提到過一些,這裏就從略了。

我國學者早在 20 年代就開始用心理學的實驗方法,研究漢字習得和閱讀的難易程度等方面的問題了。這些年來仍有人從事這方面的研究,但人數極少,進展較

慢。近年來在國外還出現了從神經心理學等角度研究漢字問題的動向。考慮到漢字教學以及漢字的整理和改革等工作都需要這方面的知識,我們認為應該積極開展這方面的研究工作。

爲了加強對現行漢字的研究以適應各方面的需要,已經有人提出了建立現代漢字學的建議(見[29])。

七、通論性著作

四十年來出版了不少文字學的通論性著作。其中比較有影響的,有梁東漢《漢字結構及其流變》(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蔣維崧《漢字淺說》(山東人民出版社,1959)、楊五銘《文字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蔣善國《漢字學》(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以及舊著重印的唐蘭《中國文字學》(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等書。文字形體方面的通論性著作,有蔣善國《漢字形體學》(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限於篇幅,對這些書的內容就不作評介了。

參考文獻目錄

- [1]周有光《文字演進的一般規律》,《中國語文》1957年7期。
- [2]張照《論文字發展的規律》,《中國語文》1965年6期。
- [3]陸錫興《近年來關於漢字性質的討論》,《語文導報》1975年10期。
- [4]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商務印書館,1988。
- [5]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編《漢字問題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語文出版社,1988。
- [6]鄭林曦《漢字記寫的是漢語的哪個層次?》,《語文建設》1988年2期。
- [7]于省吾《關於古文字研究的若干問題》,《文物》1973年2期。
- [8]汪寧生《從原始記事到文字發明》,《考古學報》1981年1期。
- [9]高明《中國古文字學通論》,文物出版社,1987。
- [10]裘錫圭《漢字形成問題的初步探索》,《中國語文》1978年3期。
- [11]李學勤《論新出大汶口文化陶器符號》,《文物》1987年12期。
- [12]孟維智《漢字起源問題淺議》,《語文研究》1980年1期。
- [13]徐中舒、唐嘉弘《關於夏代文字的問題》,載中國先秦史學會編《夏史論叢》,齊魯書社,1985。

- [14]陸宗達《六書簡論》，《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 1978 年 5 期。
- [15]王伯熙《六書第三耦研究》，《中國社會科學》1981 年 4 期。
- [16]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科學出版社，1956。
- [17]高更生《談異體詞整理》，《中國語文》1966 年 1 期。
- [18]洪成玉《古今字概說》，《中國語文》1981 年 2 期。
- [19]陸錫興《談古今字》，《中國語文》1981 年 5 期。
- [20]劉又辛《大型漢語字典中的異體字、通假字問題》，《中國語文》1979 年 4 期。
- [21]趙天吏《古音通假的條例以及通假字的讀音問題》，《開封師院學報》1979 年 2 期。
- [22]盛九疇《通假字小議》，《辭書研究》1980 年 1 期。
- [23]錢玄《秦漢帛書簡牘中的通借字》，《南京師院學報》社科版 1980 年 3 期。
- [24]《蘭亭論辨》，文物出版社，1977。
- [25]李榮《文字問題》，商務印書館，1987。
- [26]費錦昌《關於規定偏旁部件名稱問題的討論》，《語文現代化》（叢刊）1980 年 1 輯。
- [27]周有光《漢字聲旁讀音便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
- [28]倪海曙《現代漢字形聲字字匯》，語文出版社，1982。
- [29]周有光《現代漢字學發凡》，《語文現代化》（叢刊）1980 年 2 輯。

原載《語文建設》1989 年 3 期，又載《文史叢稿》（作為《殷墟甲骨文研究概況》的附文），今據後者收入。

釋詞兩則

一、釋“拉雜”

漢樂府《有所思》：

……何用問遺君？雙珠瑇瑁簪，用玉紹繞之。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
……（《宋書·樂志四》漢鼓吹曲辭鐃歌）

此詩中“拉雜”二字之義似尚無確詁。

舊版《辭源》“拉雜”條注：

樂府。有所思。拉雜摧燒之。拉雜。不問好醜併於一處也。今吳諺於不整齊潔靜者謂之拉雜。見〔吳下方言考〕。

新版《辭海》釋“拉雜”為“混雜；雜亂”，其意當同。這是一種比較通行的解釋。

“拉雜”二字古音都屬緝部，中古音都屬合韻。古音緝部和葉部都是韻尾為-p的入聲韻，兩部之字，義多相通。《廣韻》入聲緝韻以下諸韻都來自這兩部。有一批按古音系統屬於這兩部，中古音主要屬合、盍等韻，聲母與“拉雜”相近的雙音聯綿詞，詞義都與混雜或不整齊之意有關，如“攏揜”（《廣韻》訓“和雜”，《集韻》訓“和攪也”，《類篇》訓“和攪貌”）、“襪襪”、“拉襪”、“拉襪”（以上三詞《集韻》《類篇》皆訓“衣敝”）、“儻儻”（《集韻》《類篇》皆訓“惡貌”）、“朶朶”（《集韻》《類篇》皆訓“肉雜也”）、“纖颯”（《集韻》訓“紛雜貌”，《類篇》訓“絲雜貌”）、“拉颯”等（《晉書·五行志中》：“太元末京口謠曰：‘黃雌鷄，莫作雄父啼，一旦去毛衣，衣被拉颯栖。’”《辭海》《辭源》皆以“零亂”“穢雜”釋“拉颯”）。這些顯然都是同源的親族詞（現在還在使用的“垃圾”一詞即由“攏揜”變來，參看《辭源》《辭海》有關諸條。“邇邇”一系的詞跟這一詞族有密切關係）。吳諺當不整齊講的“拉雜”無疑也是屬於這一詞族的一個聯綿詞。所以用“混雜”一類意思來解釋“拉雜”，應該說是

相當有根據的。現代漢語用“拉雜”表示“沒有條理”，這一意義跟混雜和不整齊兩義都聯繫得起來。

但是對《有所思》的“拉雜摧燒之”來說，上述那種解釋却不見得合適。從此詩上文看，所“摧燒”的只是飾有珠玉的一根瑇瑁簪（參看余冠英《樂府詩選》5—6 頁注及下引《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507 頁注④），所謂“混雜”、“雜亂”或“不問好醜併於一處”，實在有些無從說起。

大概就是由於考慮到了上面指出的問題，北京大學中國文學史教研室選注的《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對《有所思》的“拉雜”作了“‘拉’，猶‘折’；‘雜’，猶‘碎’”的新解（中華書局 1962 年版 507 頁注⑤）。新版《辭源》襲用了這一解釋。這一解釋也有不妥之處。因為訓“拉”為“折”雖有根據（《說文》：“拉，摧也。”“摧”古訓“折”。《說文》：“摧……一曰折也。”《廣雅·釋詁一》：“摧、挫、摺……摺……折也。”古書中，訓“折”的“摺”和“摺”都有與“拉”通作的例子，參看王念孫《廣雅疏證》），但是訓“雜”為“碎”却是於古無徵的。而且“摧燒”的“摧”《參考資料》釋為“摧殘，毀壞”，也不妥當。這個“摧”實應訓為“折”（參看上面括號內附注），“摧燒”是說折斷瑇瑁簪將它燒掉。如果把“拉”也訓作“折”，意義就犯複了。

我們認為《有所思》的“拉雜”確是一個疊韻聯綿詞，不能拆成兩個詞來解釋。但是一個聯綿詞有可能具有兩種或更多的意義。有時候，兩個書寫形式完全相同的聯綿詞，意義相距頗遠，是否應該看作屬於同一詞族，都還是問題。例如：《集韻》葉韻尺涉切韻小韻“咕”字下注：“咕囁，附耳小語聲，一曰多言。”同韻莊輒切厠小韻“怙”字下注：“怙怙，黠貌，一曰心動貌。”敕涉切錡小韻“倂”字下又注：“倂怙，黠貌，一曰皮皺。”《廣韻》盍韻才盍切垂小韻“擗”字下注：“擗擗，和雜。”盧盍切臘小韻“擗”字下又注：“擗擗，破壞也。”（《廣韻》盍韻私盍切倂小韻也有“擗”字。當破壞講的“擗擗”的“擗”可能應讀此音。《集韻》“私盍切”作“悉盍切”，所收“擗”字下注：“破聲。一曰持也。”）所以《有所思》的“拉雜”很可能具有與“混雜”“不整齊”之類意義不同的其他意義。

《廣韻》合韻盧合切拉小韻有“磳”字，注曰“磳磳”。《集韻》也有此字（“盧合切”作“落合切”），注曰：“磳磳，破物聲。”《類篇·九下·石部》“磳”“磳”二字注文同。“磳”字在《集韻》中有兩個音。合韻昨合切雜小韻有“磳”字，注曰：“磳磳，山高貌。”業韻有士劫切小韻，只收“磳”一個字，注曰：“磳磳，破物聲。”據此，“磳磳”之“磳”讀士劫切。不過在《廣韻》中，“磳”字只見於組合切（與《集韻》“昨合切”同音）雜小韻，注曰“山高”，並無士劫切一音。“磳磳”之音與“拉雜”極近，“破物聲”

正可用作《有所思》的“拉雜”的確詁。這個“拉雜”跟“磳磳”可以看作由於細微的語音差別而形成的同一個詞的兩個變體，至少可以看作關係極其密切的親屬詞。如果“磳”字取徂合切一讀，二者便完全同音，可以直接看作同一個詞的兩種異寫了。如果把“拉雜摧燒之”勉強譯成現代口語，也許可以譯為“喀嚓折斷燒掉它”。

前面說過，《廣韻》“攔”字下釋“攔捶”為“破壞也”。這裏所說的“破壞”恐怕應該理解為“破壞貌”。前面曾經提到過，“磳磳”一詞《廣韻》釋為“山高”，《集韻》釋為“山高貌”；“攔捶”一詞《廣韻》“捶”字下釋為“和雜”，《集韻》釋為“和攪也”，《類篇》釋為“和攪貌”。可見韻書中的不少注文是應該加上“貌”字來理解的。“攔捶”與“磳磳”音近，“破壞貌”與“破物聲”義亦相因（“捶”也可訓“破聲”，已見前引）。《有所思》的“拉雜”如釋為“破壞貌”，似亦可通。

《新探》追記：

裴務齊正字本《刊謬補缺切韻》入聲合韻徂合反“雜”小韻：“磳，磳磳，山高；又磳磳，壞兒。”（周祖謨《唐五代韻書集存》618 頁。蔣斧印本《唐韻》及敦煌所出“斯”2071 號《切韻》的入聲合韻“磳”字注略同，見周書 716、105 頁）據此，“磳磳”確有與“拉雜”全同之音；並且既可訓為破物聲，也可訓為破壞貌。

二、釋“涉獵”

“涉獵”是至今尚在書面語中應用的一個文言詞。《現代漢語詞典》把“涉獵”解釋為“粗略地閱讀”，新版《辭海》解釋為“瀏覽群書，不深入鑽研”。

在現存古籍中，“涉獵”一詞首見於《漢書》。《漢書·賈山傳》：

山受學祛（指賈山的祖父賈祛），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

同書《司馬遷傳·贊》：

……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已）勤矣。

此後，《三國志》《後漢書》等書也都使用過這個詞，用法與《漢書》相類。但是《文選》卷四左思《蜀都賦》有“蹴蹈蒙籠，涉獵寥廓”之語，可見在古代“涉獵”一詞並不是只能用於跟學問之事有關的場合的。上引《蜀都賦》文據《文選》五臣注本。李善注本“涉獵”作“涉躅”。“躅”為“躡”之俗體。高步瀛《文選李注義疏》謂“《說

文》無‘躡’字，當依五臣作‘獵’”(中華書局1985年版994頁)，今從之。

古人解釋“涉獵”，主要有兩種說法。《漢書·賈山傳》顏師古注：“涉若涉水，獵若獵獸，言歷覽之不專精也。”《後漢書·班超傳》“有口辯而涉獵書傳”句李賢注略同。此爲一說。《文選·蜀都賦》呂向注：“涉獵，經過也。”此爲又一說。顏注認爲“涉獵”一語中“獵”字的意義是由獵獸之義引申的。這種說法不但對《蜀都賦》所用的那種“涉獵”來說根本講不通，就是對顏氏所注的那種“涉獵”來說也顯得很牽強，顯然是不可信的。呂注則過於簡單，有待闡發。

《辭通》將“涉獵”“涉歷”“涉略”(所引之例實作“略涉”)“涉躡”諸詞歸爲一組，加按語曰：“歷、獵聲轉義通，《文選》宋玉《風賦》‘獵蕙草’注‘獵，歷也’。”(卷二四138頁。《風賦》見《文選》卷一三，所引爲李善注)“歷”字古訓“經”(《漢書·天文志》“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鬪食”句顏注引韋昭曰：“經之爲歷。”)，訓“過”(《說文》：“歷，過也。”)。《辭通》指出“獵”字古可訓“歷”，對我們理解“涉獵，經過也”這條呂注是很有幫助的。不過《辭通》作者似乎並不主張把“涉獵”的“獵”訓爲“歷”。他解釋“涉獵”這組詞的意義的注文，是“不專精之義”，組內雖然收入了《蜀都賦》的“涉躡”(案語中已指出“躡當作躡，躡、獵同音通假”)，但並未另作解釋，對上引呂注根本沒有理會。看來他引用“獵，歷也”，僅僅是爲了說明“歷、獵聲轉義通”，所以“涉獵”可以轉爲“涉歷”，並不是爲“獵”字釋義。新版《辭海》“獵”字第三義項注：

經歷。如：涉獵。宋玉《風賦》：“獵蕙草”。

認爲“涉獵”的“獵”跟“獵蕙草”的“獵”同義，當訓爲“歷”。這應該是符合上引呂注之意的(但《辭海》“涉獵”條並未提到經歷一義，却全文引錄了《漢書·賈山傳》顏注，跟此條矛盾)。

在古書裏，“涉歷”一詞也跟“涉獵”一樣，可以用來表示瀏覽一類意義。三國魏鍾會爲其母作傳，說她“雅好書籍，涉歷衆書，特好《易》《老子》”(《三國志·魏書·鍾會傳》裴注)。《魏書》《北史》等也有“涉歷經史”“涉歷文史”“涉歷書傳”等文(參看《辭通》)。與《蜀都賦》“涉獵”同義的“涉歷”也見於古書。《後漢書·郎顗傳》載郎顗所上章奏說“又比熒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又說“涉歷天門”，都是例子。《蜀都賦》的“涉獵寥廓”，當脫胎於揚雄《羽獵賦》的“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閼”(《文選》卷八、《漢書·揚雄傳上》)。揚雄分用“涉”、“歷”二字，左思易之以“涉獵”。由此看來，把“涉獵”的“獵”訓爲“歷”是很合

理的。

“涉”字在古代也可以訓爲“歷”(《穀梁傳·襄公二十七年》“與之涉公事矣”句《正義》引徐邈云“涉猶歷也”)。呂向把《蜀都賦》的“涉獵”訓爲“經過”,是完全有根據的。“涉獵”和“涉歷”所具有的瀏覽這類意義,應該是由經過這類意義引申出來的。爲了說明這一點,需要考察一下“涉”字的各種引申用法。

“涉”的本義是“徒行瀟水”(見《說文》)。由於語義引申,對水以外的某些事物,甚至某些抽象的概念,也可以用“涉”字。例如:《左傳·僖公四年》說“不虞君之涉吾地也”,“涉”的對象是土地。同書《昭公十三年》說“楚君子干(子干爲楚君名)涉五難以弑舊君”,《穀梁傳·襄公二十七年》說“與之涉公事矣”,“涉”的對象都是某種事情。《晉書·儒林·孔衍傳》說“涉世聲譽過之”,“涉”的對象是人世。《後漢書·文苑·杜篤傳》“歷載三百”句李賢注說“此言三百者,謂出二百年、涉三百年也”,“涉”的對象是時間。《漢書·游俠·陳遵傳》和漢末的《竹邑侯相張壽碑》(《隸釋》卷七)都有“略涉傳記”之語,“涉”的對象是書籍。最後舉出的這種“涉”字,用法跟一般解釋爲瀏覽的“涉獵”和“涉歷”十分類似。“歷”字也有相近的引申用法。《漢書·楚元王傳》附《劉向傳》有“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之語,顏注:“歷謂歷觀之。”由此可見,把瀏覽這類意義看作“涉歷”和“涉獵”的引申義,是很合理的。

上面講“涉”的引申用法,舉出了以時間爲對象的例子。“涉歷”也有類似用法,如漢末公孫瓚表袁紹罪狀,有“紹既興兵,涉歷二年”之語(《三國志·魏書·公孫瓚傳》裴注引《典略》,亦見《後漢書·公孫瓚傳》),《晉書·孔愉傳》附《孔坦傳》所載奏議也有“涉歷三載”之語。這種“涉歷”也可以解釋爲“經歷”或“經過”(《辭通》沒有顧及“涉歷”的這種用法)。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七“交涉”條說:“《倉頡篇》云水中行爲涉歷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正續一切經音義》第一冊252頁)如所引無誤,“水中行”當是“涉歷”的本義,就跟“徒行瀟水”是“涉”的本義一樣。由“水中行”之義引申出“經歷”“經過”之義,是很自然的。

“涉”跟“涉歷”“涉獵”,意義很相近,其主要區別在於“涉”雖然也可以訓爲“歷”,但是往往當涉及或進入講(《漢書·高帝紀·贊》顏注引晉灼曰“涉猶入也”),“涉歷”“涉獵”則強調經歷的意思。如果“涉歷”的本義確是水中行的話,一定是指距離較長的水中行而言的。在水中走兩步不會叫做“涉歷”。上引的“略涉傳記”的“涉”,其用法有可能是直接由“涉”的本義引申出來的,也就是說,是以涉水者與水的關係來比喻學習者與衆多的書籍的關係的。“涉歷”“涉獵”的瀏覽這

類意思，說不定也是直接由“涉歷”的本義引申出來的。不過這樣說，跟說瀏覽這類意義由經過之義引申，實際上並沒有多大矛盾。因為涉歷水中就是從水中經過的意思。

在這裏應該指出，一般解釋為瀏覽的“涉獵”，其含義實際上並不是這樣單純的。古人使用這種“涉獵”的時候，既可以把某種範圍的書籍（如“書傳”“經史”）或泛指的“群書”“群籍”當作對象，也可以把某種學問當作對象（參看《辭通》）。《三國志·蜀志·向朗傳》“初朗少時雖涉獵文學”，《後漢書·儒林·李育傳》“頗涉獵古學”，就是後一種情況的例子。即使對象是書籍，也不一定是僅就閱讀而言的。就拿《賈山傳》的“所言涉獵書記”這一句來說，如果以“瀏覽”或顏注所說的“歷覽”取代“涉獵”，文義顯然不可通。可見用瀏覽一類意思來解釋這種“涉獵”是不够全面的。“涉獵”有經過的意思。既是“經過”，當然談不上對學問或書籍進行深入的鑽研。顏注說“涉獵”“言歷覽之不專精也”，撇開把“涉獵”的含義看得太窄這一點不論，這句話還是很有道理的。由此看來，在以某種學問為對象時，“涉獵”大概是指一般地學習或研究這種學問而言的；在以某種範圍的書籍或泛指的“群書”“群籍”為對象時，“涉獵”大概是指廣泛瀏覽或參考這些書籍而言的。

最後，對“涉獵”是否聯綿詞的問題略作討論。

從表面上看，“涉獵”很像是“捷獵”、“狎獵”等詞那樣的疊韻聯綿詞（關於“捷獵”“狎獵”，參看《辭源》有關條）。此外，古代的植物名裏有“獵涉”。《爾雅·釋木》：“櫛，虎櫛。”郭璞注：“今虎豆，纏蔓林樹而生，莢有毛刺。今江東呼為櫛櫛，音涉。”郝懿行《義疏》：“虎櫛即今紫藤……云江東呼櫛櫛者，謝靈運《山居賦》云‘獵涉蔓莢’，自注云‘獵涉字出《爾雅》’。是獵涉即櫛櫛，皆音同假借字也。”古代的植物名有不少是聯綿詞。在古漢語裏，有些聯綿詞上下二字可互換，例如上面舉過的“捷獵”就可以倒作“獵捷”。“獵涉”這種植物名的存在，也容易使人把“涉獵”看作聯綿詞。

從我們在上面介紹過的《辭通》對“涉獵”“涉歷”等詞的處理情況來看，此書編者好像就是把“涉獵”看作疊韻聯綿詞，並把“涉歷”看作由於音轉而從“涉獵”派生出來的一個詞的。新版《辭源》“獵涉”條第一義項注：

經歷。宋書謝靈運傳山居賦：“野有蔓草，獵涉蔓莢。”也指瀏覽書籍。參見“涉獵”。

此條雖然把植物名“獵涉”誤訓為“經歷”，但是從語氣看似也是把“涉獵”和“獵

涉”看作上下字可以互換的聯綿詞的(把“獵涉”訓為“經歷”,當是襲《聯綿字典》之誤。新版《辭源》“櫛櫛”條已指出《山居賦》的“獵涉”即“櫛櫛”,並注明“參見獵涉”,不知“獵涉”條為何犯此錯誤。此條說“獵涉”“也指瀏覽書籍”,也是有問題的,因為古書中並無這種實例)。

我們既然認為“涉獵”之“獵”應訓為“歷”,當然不同意把“涉獵”看作聯綿詞。“涉獵”二字確實疊韻,但是疊韻的雙音詞並非全部是聯綿詞。至於櫛的別名“獵涉”跟“涉獵”究竟有沒有關係,是還有待研究的問題。而且據《爾雅》郭注,“櫛櫛”(獵涉)是櫛的較晚起的名稱,恐怕很難用作“涉獵”本是聯綿詞的確證。按照上文對“涉獵”和“涉歷”的考察,這兩個詞都應該是複合詞。我們推測“涉獵”是由“涉歷”分化出來的。用跟“涉”同韻的“獵”來取代“歷”,可能是為了念起來順口。前面說過,《蜀都賦》的“涉獵寥廓”當脫胎於《羽獵賦》的“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閔”。“涉獵寥廓”的前一句是“蹴蹈蒙籠”。“蹴蹈”二字古音雖不同部,韻母還是相當接近的。左思在下一句不用“涉歷”而用“涉獵”,很可能是為了求字音和諧。這對我們考慮“涉獵”一詞出現的原因是有啟發性的。

1988年3月9日完稿

原載《王力先生紀念論文集》(商務印書館,1990),又載《古代文史研究新探》。其中《釋“拉雜”》又載《裘錫圭自選集》、《裘錫圭學術文化隨筆》。今據《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收入。

談談《同源字典》

王力先生的《同源字典》是漢語語源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劉又辛、李茂康二位先生在《漢語詞族(字族)研究的沿革》一文中,評論此書說:“這部書在詞族研究的理論和方法上批判地繼承了前人的成果,對許多有關的問題,如同源詞確定的原則問題、音轉問題等,有許多精闢的見解;有利於把這項研究從玄學的迷途中解放出來而走向科學的道路。”(《古漢語研究》1990年1期8頁)同時,他們也指出:“正如王力先生自己所說,這部書並不是十全十美的。……王先生在理論和方法上提出的原理和條例,在實踐上就往往不能貫徹。即使理論上,也還有一些需要深入討論的問題。”(同上)應該說,他們的評論是頗為公允的。在本文中,我們想談談《同源字典》的編寫原則和長處,附帶討論一些有關的問題,希望能有助於使王先生留給我們的這份寶貴遺產更好地在語文研究工作中發揮作用。

王先生對漢語語源的研究很早就加以注意了。1941年,他作過一個題為“理想的字典”的演講,其內容後來寫成文章發表在1945年的《國文月刊》上(據《龍蟲並雕齋文集》一·379、378頁。以下引此書簡稱“龍蟲”)。這篇文章指出,好的聲訓有可能揭示被訓字和訓釋字之間的“字源上的關係”,也就是“字族的關係”(同上353頁)。在1946年發表的《了一小字典初稿》一文中,每個字條都有“語源學”一項。雖然內容並不限於嚴格意義的語源學的範圍,但是確有不少語源研究方面的有價值的意見,如“仆”字條說“按仆覆雙聲,音義皆近”(同上386頁),“仕”字條說“今按,‘仕’‘事’古音相近或相同,義亦同源。從政必有所事事;故曰‘仕’”(同上389—390頁),等等。1947年發表的《新訓詁學》一文,也談到語源研究方面的問題。文中對章炳麟關於“詞族”的研究,既肯定了其成績,也中肯地指出了其嚴重缺點(同上317—320頁)。

在1954年至1957年間寫出來的《漢語史稿》中,王先生在談“語音和語法、詞彙的關係”時,提到了有雙聲疊韻關係的“反義詞”和韻母有對轉或旁轉關係的“駢詞”(《王力文集》九·64—66頁。以下引此書簡稱“文集”);在談古漢語的形態問

題時,又指出上古漢語“靠着聲母的變化或韻母的變化”來表示“不同的語法用途”,“中古漢語的形態”則“表現在聲調的變化上面”(同上 273 頁),並舉出了通過變讀爲去聲,名詞或形容詞轉化爲動詞、動詞轉化爲名詞、內動詞轉化爲外動詞和一般動詞轉化爲致動詞(即使動詞)的很多實例(同上 274—280 頁)。這些都跟語源研究有關。在《漢語史稿》第四章“詞彙的發展”裏還有“同類詞和同源詞”一節,專門討論“語源”“詞族”等問題(同上 696—706 頁)。

在 1962 年基本完成、1981 年出版的《中國語言學史》裏,王先生講到了聲訓與語源研究的關係(42—53 頁)以及與古代方言有關的“語轉”現象(26—28 頁),並對王念孫、章炳麟、高本漢等人關於“語源”“詞族”的研究作了評介(160—162、168、193—194 等頁)。1965 年,王先生發表了一篇語源研究方面的重要論文——《古漢語自動詞和使動詞的配對》(下文簡稱“配對”)。文末指出自動詞和使動詞的配對既是構詞法的問題,也是“詞族問題的一個方面”(《龍蟲》三·29 頁)。

從 1974 年到 1978 年,王先生集中力量進行漢語語源的研究,“用四年的時間,三易其稿”(《同源字典》序文 2 頁),寫成了包含 439 個同源字條、涉及三千多個單字的《同源字典》(下文簡稱“字典”。根據《字典》的部首檢字表統計,如不算出現在括號裏的字,不重複的單字數爲 3059 個)。發表在《中國語文》1978 年第一期上的《同源字論》,可以說是這部《字典》的導論。跟漢語語源研究有關的各種重要問題,此文大都已經討論到了。1979 年,王先生又寫了一篇語源研究方面的論文——《漢語滋生詞的語法分析》(下文簡稱“分析”),發表在 1980 年出版的北大中文系《語言學論叢》第六輯上。這兩篇論文都收入了商務印書館 1982 年出版的《同源字典》的卷首,對《同源字論》的內容還作了很多補充(也有可能此文在《中國語文》上發表時預先作過刪節)。

王力先生的語源研究的特點是比較客觀比較謹慎。他認爲前人研究漢語語源有兩大缺點:“聲音不相近而勉強認爲同源,意義相差遠而勉強牽合”(《字典》41 頁。以下注《字典》頁數時一般省去書名)。他指出,據有的學者研究,“一個詞族可以收容一二百字。但是仔細審察其實際,在語音方面,則通轉的範圍過寬,或雙聲而韻部相差太遠,或疊韻而聲紐隔絕;在字義方面,則展轉串連,勉強牽合”,可信程度不高(序文 1—2 頁)。此外,他還著重批判過前人研究語源時喜歡“遠紹”的錯誤傾向,即“假定某一種語義曾於一二千年前出現過一次,以後的史料毫無所見,直至最近的書籍或現代方言裏才再出現”。他認爲這種現象“語言史上是不會有的”(《新訓詁學》,《龍蟲》一·324—325 頁。參看《理想的字典》,同上 371 頁)。

爲了免蹈前人的覆轍，王先生在編寫《字典》時定下了一些原則。根據我們的體會，主要有下述四條。

1. 要求同源字“必須韻部、聲母都相同或相近”(20 頁)，“而且必須以先秦古音爲依據，因爲同源字的形成，絕大多數是上古時代的事”(12 頁)。王先生在《〈同源字典〉的性質及其意義》一文中，把這一原則簡明地說成“同源字必須是雙聲兼疊韻的”(《王力論學新著》178 頁，廣西人民出版社，1983)。

2. 判斷同源字時，在字義方面主要“以古代訓詁爲根據，避免臆測”(43 頁)。《〈同源字典〉的性質及其意義》把這一原則簡明地說成“同源字必須有訓詁的根據”。

3. 不作系統的詞族研究，分條列出同源字。每條所收同源字，不求其多，但求可信(序文 1—2 頁，參看 43 頁)。

4. 不武斷地肯定兩個同源字哪個是源哪個是流。王先生在《同源字論》裏，把“不武斷地肯定某詞源出某詞”看作高本漢的詞族研究勝於章炳麟的一個優點(41 頁)；在《字典》序裏，又指出他所以不把這部書“叫做《語源字典》，而叫做《同源字典》”，就是由於“有時候某兩個字，哪個是源，哪個是流，很難斷定”(序文 1 頁)。可見他對這一點相當重視。

下面就依次來看看《字典》貫徹這幾條原則的情況，附帶討論一些有關的問題。

先來看第一條原則貫徹的情況。《同源字論》裏有“從語音方面分析同源字”一節，指出了同源字之間在聲母和韻母上可能有的各種關係(12—20 頁)。《字典》正文的編排，以韻部爲綱，聲紐爲目。每個字條按所列第一字的古音編入相應韻部的相應聲紐之下。條中所列的同源字，全都用音標注出擬構的古音，它們彼此間在聲韻上的關係，另加括號注明。讀者對《字典》所收的同源字之間的語音關係，可以一目瞭然。

應該說，王先生定爲同源的字，在語音上都是有同源的可能的。不過在韻母的關係上，旁轉、旁對轉、通轉這類稍嫌疏遠的關係，其出現次數似乎還是多了一些。在某些公認的同源詞之間，的確存在着這類語音關係。可是如果在把並未被公認爲同源的、一對意義相近的詞確定爲同源詞的時候，除去情況一般的意義相近，只能提出這類語音關係作爲根據的話，說服力就不強了。總的來看，《字典》對同源字語音關係的要求還是嚴格的。這就是說，第一條原則是貫徹得相當好的。

附帶說一下，《字典》在注音方面偶有可商之處。例如：“函”字古音，王先生歸

入談部,因此“含”(侵部字)和“函”的擬音不同,“頤”和“頤”的擬音也不同(605、606 頁)。其實“函”“含”古通,《說文》“函”字或體作“𠔁”,从“今”聲,不少古音學家把“函”歸入侵部,大概是正確的(參看陳復華、何九盈《古韻通曉》383 頁。王先生曾在所著《漢語音韻》中把“函”歸入侵部,但《漢語語音史》仍歸入談部)。“含”和“函”,“頤”和“頤”,在上古大概是同音的。485 頁“艾、乂、忝”條給“艾”注相當於今音 ài 的音,給“乂、忝”注相當於今音 yì 的音。此條“艾”字當“懲”講,從來都認為這種“艾”字與“乂、忝”通。我們可以把它們都讀成 yì,也可以把它們都讀成 ài(《集韻》去聲泰韻牛蓋切艾小韻收“乂”字,注曰:“創乂,懲也。或作忝,通作艾。”)。《字典》給它們分注兩種音,恐怕是不妥當的。375 頁“邕、臃”等字條把“臃”的音也注成 iong。“臃”跟“瓮”同音,似應注 ong 音。264 頁“𡗗”等字條把“𡗗”當作幫母字。但是在字書、韻書中,這個字只有滂母的音(“𡗗”字有幫母音,但跟“𡗗”不是一個字,一从“广”,一从“厂”),不知王先生是否另有所據。《字典》注同源字的音韻關係,也有個別使人難解之處。如 292 頁“百、佰”條給這兩個字注了相同的音,但却把它們的關係注成“疊韻”而不注成“同音”。按《字典》的體例,同音不同調的字,包括有長入、短入之別的字,都只看作疊韻而不看作同音。但是“百”和“佰”的聲調並無不同,不知為什麼不看作同音。或許竟是筆誤?

應該指出,王先生給有些字注不同於一般讀法的音,是有他的道理的。如 267 頁“扼”等字條,把當大車輓講的“輓”注為與“輓”同音。這種“輓”字在字書、韻書裏只有跟“革”相同的音,但是跟它同義的“𨔵”字則讀“輓”音。王先生當是由於認為“‘輓(輓)、輓(𨔵)’實同一詞”(268 頁),而把“輓”也讀為與“輓”同音的。

上舉第二條原則也貫徹得相當好。《字典》“大量地引用古人的訓詁”(序文 2 頁),很多字條還引用了段玉裁、王念孫、徐灝等在語義研究上有較高成就的清代學者的有關意見;而且無論是古人的訓詁,還是清儒的意見,基本上都是引用得當的。這大大增強了王先生關於同源字的判斷的可信性。我們只要略為翻閱一下《字典》,就能強烈地感到這一點。

當然,如果求全責備的話,在這方面也還是可以找到一些缺點的。下面舉幾個例子。

130 頁以“据、戟、擻、搨”為同源字,所引的跟“戟”字有關的古代訓詁是:

說文:“戟,有枝兵也。”左傳哀公二十五年:“公戟其手。”注:“抵徒手屈肘如戟形。”

一般認為，與“据、搨”義近的“戟”是見於《說文》的“𠄎”的假借字（《說文·三下》：“𠄎，持也。象手有所𠄎據也。……讀若戟。”），“搨”是“𠄎”的異體。王先生好像認為“搨”義與“戟”的本義有聯繫，可是他所引的《左傳》注却並不能證明這一點。從所引的《左傳》那句話的上下文看，杜注的意思顯然是說衛侯把自己的手的形狀弄得像戟形。這跟“搨”的意思很難聯繫起來。

236—237 頁以“柔、揉、輶、肉”等為同源字。王先生在引用了《考工記·輪人》“揉輻必齊”、《荀子·勸學》“輶以為輪”等文之後，解釋說：“按，揉木為輪，故車輞稱‘輶’。”（輞即車輪周圍的框子）這是很有道理的。他所引的關於“輶、肉”同源的訓詁資料如下：

爾雅釋器：“肉倍好謂之璧。”注：“肉，邊也。”孫注：“肉，身也。”漢書食貨志下：“肉好皆有周郭。”韋昭曰：“肉，錢形也。”律曆志上：“圓而環之，令之肉倍好者。”集注引如淳：“體為肉，孔為好。”說文“輶”字下段注：“按，輶之言肉也。凡物邊為肉，中為好。”

以此來說明肉好之“肉”與“輶”同源，是有問題的。從所引《爾雅》孫炎注“肉，身也”和《漢書》如淳注“體為肉”等語來看，古人大概認為肉好之“肉”是骨肉之“肉”的引申義。段注“輶之言肉也”是說明“輶”字得義之由的，意思說“輶、肉”音近，凡物之邊稱為“肉”，所以車輪之邊稱為“輶”。這跟王先生“輶”得義於“揉”的說法是相矛盾的。《釋名·釋形體》說：“肉，柔也。”王先生沒有引用，想來是不信此說的。即使承認骨肉之“肉”與“柔”同源，“輶之言肉也”與“輶”得義於“揉”這兩種說法仍然無法並存。

320 頁“經、綱”條引了古書中提到“經紀”“綱紀”“紀綱”的一些話，還引了《左傳正義》“經者，綱紀之言也”這條訓詁資料。從表面上看，似乎可以說明“經、綱”二字同源。可是稍往深處一想，就產生了疑問。“經”字的經紀之義應該是由“織縱絲”這一本義引申出來的，“綱”字的綱紀之義應該是由“網之大繩”這一本義引申出來的。這兩個本義並不相近。如果不能說明它們確有共同的來源，就不能斷定“經、綱”二字有同源關係。我們當然不能完全排斥“經、綱”二字同源的可能性，但是僅僅根據二者的引申義相近，是不能證明它們有同源關係的。

必須指出，《字典》引用古代訓詁和清儒之說不够恰當的情況，是相當罕見的。這方面的缺點是無傷大體的。

《字典》有對古代訓詁注意得不够的情況。這裏舉一個例子。“管”等字條把

當門門講的“關”列爲當鎖鑰講的“管”的同源詞(551—552 頁)。但從所引的訓詁資料,却看不出它們在意義上有多密切的關係。古書中訓爲“貫”或“穿”的“關”字,《字典》收入“貫(卣)”等字條,認爲是“貫”的同源字(552—553 頁)。這是很正確的。《說文》:“關,以木橫持門也。”“卣,穿物持之也。”由此可見當門門講的“關”跟貫穿之“貫”,在意義上也是有明顯聯繫的(門關橫持門,是要貫穿在附著於門扇的門耳裏的)。把它看作“貫”的同源詞,顯然要比把它看作由於形似樂器的管而得名的、當鎖鑰講的“管”的同源詞合理得多。《字典》把《說文》對“關”字和“卣”字的解釋分引在“管”等字條和“貫”等字條裏,沒有注意到其間的聯繫。這是很可惜的。王先生在《分析》裏認爲當門門講的“關”是由當貫穿的“攢”滋生的(52 頁。這是動詞滋生名詞之例,《分析》誤列於名詞滋生動詞類)。這個意見基本上是正確的。《分析》是在《字典》書稿完成後寫的。也許我們可以認爲《字典》裏“管”“關”同源的意見已經被王先生自己否定掉了。

附帶說一下,有很多字根據古代訓詁可以對它們的語源得出兩種甚至更多的、看來都有一定道理的解釋,研究者往往各主一說。例如“語”字,《禮記·文王世子》注、《廣雅·釋詁四》等都訓爲“言”。《說文》“言”字下說:“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字典》著眼於“語”跟“言”音義皆近,認爲二者同源(138 頁)。章炳麟《文始》則著眼於“語”有“論難”的性質,認爲“語”由悟逆之“悟”孳乳(五·5 頁)。由於一個字往往代表兩個以上的詞,即使都承認某詞出自某字,對其得義之由仍可有不同解釋。例如“臀”字,《釋名》和《字典》都認爲出自“殿”字。《釋名·釋形體》說:“臀,殿也,高厚有殿還也。”大概認爲殿堂是高起的(“殿”“堂”本指堆土而成的殿基、堂基),臀部也是高起的,因而得名。《字典》則認爲“殿”字古代訓爲“後”,臀部在身後,因而得名(514 頁)。《文始》認爲“堆”孳乳爲“脰”,其音對轉,變易爲“臀”(二·6 下),意見跟《釋名》相近。按照《字典》的體例,當然只能用一種說法。但是對讀者來說,最好也能知道別的有一定道理的說法。這是一個矛盾。

上舉第三條原則對《字典》的編纂形式起了決定作用。序文說:“在這部《同源字典》中,每一條所收最多不過二十多個字,少則只有兩個字,寧缺毋濫。收字少了,就能避免或減少錯誤,具有實用價值。”(2 頁)就漢語語源研究的現狀來看,這樣做是很明智的。

不過,王先生這樣做,並不意味着他認爲凡是被他歸入不同字條的字,彼此都沒有可以確定的同源關係。他有時在某個字條裏加按語,指出這一字條的字跟另一條的字也同源或可能也同源。例如:103 頁“剖、副、劈”等字條之末說:“按,

‘劈’等字和‘擘’等字亦同源。參看‘擘’等字條。”268—269 頁“嗑、咽”等字條中說：“段玉裁曰：‘嗑者，扼也，扼要之處也。咽嗑雙聲。’按，依段說，則‘嗑、扼’亦同源。參看‘扼’字條。”280 頁“擴”等字條之末說：“按，‘擴’與‘廣’亦同源，參看‘廣’字條。”293 頁“暮、晚”條之末說：“按，‘莫（暮）’字亦與‘冥’字同源。參看‘冥’字條。”359 頁“涼”等字條之末說：“按，‘涼’亦與‘冷’同源，參看‘冷’字條。”369—370 頁，“藏、臟”“藏、倉、贓”兩條相次，後一條中說：“按，‘臟’與‘藏’亦同源。參看‘臟’字條。”426—428 頁，“比、妣”等字條、“比、密”等字條和“比、頻”條相次，最後一條之末說：“按，比同的‘比’，密比的‘比’，頻比的‘比’，可能都同源。參看上文兩‘比’字條。”453 頁“屈、詘”條之末說：“‘屈、詘’可能與‘曲’等字亦同源。參看‘曲’等字條。”502 頁“溫、輻”條之末說：“按，‘輻’與‘鬱’等字亦同源，參看‘鬱’字條。”可見王先生不但不把他認為有可能但還不能確定是同源的字寫在一條裏，而且還往往把他已經確認為同源的字也分寫成不同的字條。

在王先生加了上述那種按語的字條之外，《字典》裏彼此顯然有同源關係或很可能有同源關係的字條還多得很。而且它們之間的關係，王先生無疑大都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例如 407 頁有“非、誹”條，王先生解釋說：“‘非’是不對，‘誹’是認為不對，故得同源。”排在這一條後面的是“非、匪、微”條，其中的“非”當“不是”講（407—408 頁）。這兩條的“非”顯然是同源的。王先生雖然沒有加按語指出，但無疑也是這樣看的。據我們觀察，如果一個字代表着兩個以上同源詞，而這些詞又各有自己的同源詞的話，王先生往往是把它們分別寫成兩個以上字條的。除“非”字外，上面舉過的“藏”字也是一個例子（“藏、倉、贓”條的“藏”訓“匿”，讀平聲。“藏、臟”條的“藏”是府藏之“藏”，讀去聲）。“比”字其實也可以看作一個例子。比同的“比”、密比的“比”和頻比的“比”之間的同源關係，恐怕不大會有人懷疑。此外還有這一類例子，如 265—266 頁“踣……伏、覆”條和 266 頁“伏、服”條中的“伏”字，97 頁“事、使”條和 97—98 頁“史、事、士、仕”條中的“事”字，等等。有關字條的同源關係，大都沒有加按語指出。

王先生對由同一個字代表的同源詞，採取分而不合的處理方法，大概主要是由於他覺得這樣處理，眉目清楚，寫起字條來也比較方便。附帶說一下，如果由同一個字代表的兩個同源詞，各自都沒有同源詞收入《字典》，或者只有其中一個有同源詞收入《字典》的話，《字典》通常也不出條目來表示它們的同源關係。例如：讀 zhé 的“折”和讀 shé 的“折”是同源詞，《配對》和《分析》都曾舉到過（《龍蟲》三·48 頁、《字典》49 頁），《字典》正文就沒有收。《字典》正文有“顯、見、現”條（559

頁。“見”讀“現”，跟“現”表示同一個詞），但卻沒有“見、現”條，大概也是由於呈現的“現”在較古的文獻裏一般都寫作“見”的緣故。這一體例恐怕不能認為是恰當的。對於可能出自中古經師私意、對口語沒有多大影響的“讀破”，我們可以不管。可是對上舉那種同源關係，《字典》似乎不應該不反映。

在前面舉過的，王先生加了按語的那些字條裏，他認為跟別的字條確有同源關係的那部分，多數並沒有牽涉到同一個字代表兩個以上同源詞的問題。不過，王先生不把那些有同源關係的字條合寫成一條的主要原因，可能仍與上面所說的、對同一個字所代表的同源詞採取分而不合的處理方法的原因相同。

從上舉的“非、誹”“非、匪、微”這一類字條的情況來看，王先生對他認為彼此確有同源關係的字條，顯然多數是不加按語指出的。對他認為雖有可能但還不能確定有同源關係的那些字條，不加按語的情況無疑會更多，下面也舉幾個例子。《字典》裏，在前面舉過的、王先生已經指出“可能與‘曲’等字亦同源”的“屈、詘”條之後，緊接着就是“劓、劓”條（453 頁）。條中引了“劓，劓劓，曲刀”、“劓，曲鑿也”等注釋，可是並沒有加按語指出“劓、劓”可能與“屈、曲”等字同源。王先生在《新訓詁學》裏曾指出“‘鬻’字可能就是‘糶’字的前身”（《龍蟲》一·327 頁），可是《字典》302 頁“糶”等字條和 310 頁“鬻”等字條都沒有加按語指出。王先生在《漢語史稿》裏講同源詞的時候，曾指出楊樹達《高等國文法》列舉的 16 個否定詞，按上古語音來說都是唇音字。其中 5 個屬幫母，即“不、弗、否、非、匪”。按照王先生所注的擬音來看，“非、匪”的上古音跟“不、弗、否”很接近（《文集》九·702—703 頁）。在《字典》裏，“不、否、弗”（102 頁）跟“非、匪、微”（407—408 頁）不但分為兩條，而且都沒有加按語指出它們可能同源。

我們猜想，王先生不給“非、誹”、“非、匪、微”這類字條加按語，可能是由於認為它們的同源關係極為明顯，不煩指出。至於不給很多彼此可能有同源關係的字條加按語，大概主要是為了跟那種不夠科學的詞族研究嚴格區別開來，避免在沒有充分把握的情況下，把同源詞的範圍擴得太大。

在《字典》裏，一個字重複出現在兩三個字條裏是很常見的事。在一般情況下，這種字在不同字條中所代表的是不同的詞（既有前面舉過的彼此有同源關係的詞，也有並無同源關係的詞，如 99 頁財寶之“財”和 100 頁與“纔、才”等字通的“財”，120 頁用作疑問詞的“安”和 543 頁安靜之“安”，等等）。但是也存在一些表示同一個詞的同一個字重複出現在兩個字條裏的情況，而且各條中為這個字引用的訓詁資料通常也基本相同。這種成對的字條大部分似可合併為一條。例如 154

頁“渚、沚、洲(州)”條和 235 頁“州、洲、島”條,224 頁“標……杪”條和 226 頁“藐、杪、杪……”條(後一條中加了“‘杪’與‘標’等字亦同源,參看‘標’等字條”的按語),279 頁的“隙……間”條和 549 頁的“間、隙、澗、干”條(這兩條有兩個重見的詞),535—538 頁“……延、衍”條和 572 頁“延、施、移”條,616 頁“……纖、嬋”條和 630 頁“纖、嬋”條,629 頁“斬……鑿”條和 629—630 頁“鑿、攬、鑿”條(兩條緊接),261 頁“惻、慟、慘”條和 616—617 頁“慟、慘”條(這兩條的“慟”同義,“慘”義稍有不同,情況比較特殊)。141 頁“娛、虞”條緊接在 140 頁“娛、偶”條後,兩條“娛”字之義無別,而且後一條未列“娛”字資料,按體例宜合併成一條。305 頁“暴、瀑”和“暴、爆”兩條相次,後一條也未列“暴”字資料,似乎表示“瀑、爆”都由“暴”字的同一意義滋生。如果確是這樣,這兩條也宜合併。

《字典》裏偶有兩個字條對同一個詞所作的語源上的解釋互相矛盾的情況。如《史記·南越列傳》“犁旦”的“犁”,既收在 419—420 頁“遲、遽(黎犁)”條內,認為與訓“徐、遲”的“遽”表示同一個詞;又收在 421 頁“黧、黎、犁”條內,訓為“黑”,並加了“在黑的意義上,‘黧、黎、犁’實同一詞”的按語。這當是由於疏忽而造成的。280—281 頁“壑……坑、坎、陷”條以“坎”與“壑、坑”等字為同源詞,433 頁“窠、科……坎”條又以“坎”與“窠、科”等字為同源詞;449—450 頁“蔓……隱”條以“隱”與“蔓”等字為同源詞,602—604 頁“暗……陰、隱”條又以“隱”與“暗、陰”等字為同源詞,也使讀者感到不好理解。不過,“壑、坑”等字跟“窠、科”等字,“蔓”等字跟“暗、陰”等字,從音、義上看,似乎還不是全無同源的可能的。因此“坎”“隱”兩詞的重見,究竟是完全由於疏忽而造成的,還是反映作者認為有關字條間有同源關係,就難以斷定了。

《字典》在收字方面有一些比較明顯的遺漏。例如 204—205 頁“高、驕”等字條未收“僑”(《說文》訓“高”)、“鑄”(《說文》訓“似鼎而長足”)等字,440—441 頁“叉、杈”等字條未收“汧”字,470—471 頁“暱、尼、邇”等字條未收“禰”字(《左傳·襄公十三年》“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句《正義》:“禰,近也,於諸廟,父為最近也。”)。又如一般都認為“藏、葬”是同源詞,《配對》也舉了這個例子(《龍蟲》三·24 頁),可是《字典》却只收“藏”未收“葬”。以一人之力來編這樣一部缺乏現成的書作為參考的《同源字典》,收字有所遺漏是難免的。這一點王先生自己在序裏就指出來了。讀者在這方面自不應有過高的要求。

對上舉第四條原則,即不武斷地肯定兩個同源字哪個是源哪個是流,閱讀和使用《字典》的人必須有充分的認識。《字典》列舉同源字的時候,常用 A:B 的形式。

讀者很容易認為這表示 A 是 B 的源,其實並不一定如此。《字典》正文通常避免對同源字的源流關係表示明確意見。一般說,“A:B”主要表示 A、B 是同源字,並不意味着 B 一定是由 A 滋生的。不然,對如下這類例子就無法理解了:

起:興

熙:興 (84 頁)

分:半

.....

判:別

辨:別 (523 頁)

“興”這個詞當然不可能是同時由“起”和“熙”這兩個詞滋生出來的,“別”這個詞也不可能是同時由“判”和“辨”這兩個詞滋生出來的。不過,綜觀全書,好像王先生在多數情況下還是把他認為是源的字放在 A 的位置上的。

王先生採取我們所說的第四條原則,並不意味着他認為同源字之間的源流關係不必研究或無法研究。他一方面指出有時很難斷定兩個同源字哪個是源哪個是流,一方面又指出“在多數情況下,源流還是可以斷定的”(序文 1 頁,參看 47 頁)。在《配對》、《同源字論》和《分析》等文中,他對很多同源字的源流關係表示了明確的意見。值得注意的是,王先生在這方面的意見是有一些變化的。例如《同源字論》說:

硯,硯臺;研,用硯臺磨。(27 頁)

柄,把子;秉,握住把子。(28 頁)

顯然認為“硯、柄”是源,“研、秉”是流。在《分析》裏則把“研—硯”、“秉—柄”當作動詞滋生名詞的例子(51 頁),認為“研、秉”是源,“硯、柄”是流。後一種意見應該是正確的(王先生在 1984 年脫稿的《漢語詞彙史》的第三章《滋生詞》的“語法分析”節中,用《分析》之說,以“研—硯”、“秉—柄”為動詞滋生名詞之例;但在“語義分析”節中仍保留《同源字論》“柄”滋生“秉”的說法。一章之內前後矛盾。“語義分析”節中已將《同源字論》“硯”滋生“研”的說法改為“研”滋生“硯”,“柄”滋生“秉”的說法也許是由於疏忽而漏改的。以上所引《漢語詞彙史》文,依次見《王力文集》第十一卷 590、570、571 諸頁)。附帶說一下,《字典》“研、硯”條引《說文》“硯,石滑也”,並引段注“今之研墨者曰硯,其引申義也”(558 頁)。這跟“研”滋生“硯”的看法和此條下文“(硯)字本作研”的說法是相矛盾的。硯臺之“硯”應該看

作“研”的假借字。

王先生對有些同源字的源流關係的看法似有問題。例如《分析》所舉名詞滋生動詞之例有：

獸—狩 禽—擒

認為狩獵、擒獲之義由野獸、禽獸之義滋生(53頁。此文把“禽”解釋為“獵物”)。但是殷墟甲骨卜辭裏“獸”字常見,主要用來表示狩獵義,用來表示野獸義的極為少見(《屯南》2326“更徂𠬞𠬞,禽又小獸”,可能用“獸”為野獸義);“禽”字也常見,主要用來表示擒獲義,用來表示禽獸義的連一例也沒有。從字形上看,“獸”字本來寫作从“單”从“犬”。“單”大概象一種狩獵工具,犬是獵人的最好助手。此字本義也以說成狩獵為妥(“狩”是“獸”的分別字)。野獸是狩獵的對象,所以“獸獵”之“獸”(狩)滋生出了野獸之“獸”。甲骨文“禽”字象一個捕鳥獸用的有柄的網。其本義也以說成擒獲為妥(“擒”是“禽”的分別字)。禽獸是人們擒獲的對象,所以“禽獲”之“禽”(擒)滋生出了禽獸之“禽”。在《分析》所舉其他名詞滋生動詞之例裏,恐怕還有少數有問題的例子。

上面所舉的一些例子說明,判斷同源字哪個是源哪個是流,的確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王先生編寫《字典》時,通常採取不明確說哪個是源哪個是流的態度,是很明智的。

從以上所說的可以看到,王先生在編寫《字典》的過程裏,是相當嚴格地貫徹了上舉的四個原則的。跟全面研究漢語語源的前人著作,如章炳麟的《文始》和高本漢的《漢語詞族》相比,《字典》在科學性和實用性上大大超過了它們。其主要原因就在這裏。

此外,王先生對漢語語源的研究,還有兩個值得指出的長處。

首先,王先生做到了擺脫字形的束縛,完全從語言的角度去研究語源。

王先生在他的著作裏曾強調指出,“研究語義的產生及其演變,應該不受字形的束縛”(《新訓詁學》,《龍蟲》一·324頁),“研究‘詞族’的時候,應該擺脫字形的束縛,從聲音和意義兩方面找它們的親屬關係”(《漢語史稿》,《文集》九·704頁)。他認為“章炳麟一部《文始》,其成功的部分就是突破了字形的束縛,從音義聯繫的觀點上得到了成功”(《新訓詁學》,《龍蟲》一·323頁);而其缺點之一則是以《說文》中的“初文”作為研究的根據,犯了“拘牽形體”之病(《同源字論》,39—40頁)。他還認為雖然清儒段、王等人主張以聲音明訓詁,但是“由於他們是從文

字的角上研究問題,不是從語言的角上研究問題”,就沒有可能“寫出一部同源字典或語源字典來”(《字典》序文1頁)。

王先生在寫《字典》的時候,確實很好地貫徹了“從語言的角上研究問題”的主張。《同源字論》說:“我們從語言的角上來看同源字,就會發現,同字未必同源,不同字反而同源。”(5頁)《字典》不但在編寫體例上充分體現了這一點,而且還常常強調指出這方面的實例。例如“娛、虞”條指出:“在虞樂的意義上,‘虞、娛’實同一詞;憂虞的‘虞’則是另一詞。”(141頁)“屈、詘”條指出:“說文:‘屈,無尾也。’那是另一字(引者按:這個“字”實指“詞”),讀九勿切,與屈曲的‘屈’無關。”(452頁)又指出:“在屈曲、屈折、冤屈、屈服的意義上,‘屈、詘’實同一詞。‘屈、詘’可能與‘曲’等字亦同源。”(453頁)。類似的例子很多。《字典》一方面經常指出某些字“實同一詞”,或在某種意義上“實同一詞”(有時還指出據字形強生分別的不當,如607頁說:“按,‘耽、湛、湛、酖’實同一詞。……朱駿聲曰:‘嗜色爲湛,嗜酒爲酖。’這是從字形上強生分別。”) ;另一方面,如前面曾說過的,《字典》不但把由同一個字表示的無同源關係的詞分別收入不同的字條,而且往往把由同一個字表示的同源詞也分別收入不同的字條。由此可見《字典》擺脫字形束縛的徹底程度。

王先生關於某些詞的語源的好意見,正是由於他能擺脫字形的束縛而取得的。下面舉兩個例子。

“埠”在中古時代本來寫作“步”。柳宗元《永州鐵爐步志》說:“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從“舟可縻而上下”的說法來看,他似乎認爲這種“步”字的意義是由“步”字本義引申出來的。至少這樣認識“步”(埠)的語源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字典》則拋開字形,完全從音義上考慮,認爲“步”(埠)就是當“水涯”講的“浦”的音轉(176頁)。這一意見顯然比較合理。

《文始》“𠂔”字條說:“𠂔又變易爲顧……又使人者,有旻,有眈,皆以目顧視使之也。故顧又孳乳爲故,使爲之也(引者按,《說文》:“故,使爲之也。”)。《史記·馮唐列傳·集解》據如淳引漢軍法曰: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故即今顧庸(引者按,今作雇傭)之本字,所謂使爲之也。然作顧亦可通。”(五·4下)章氏遷就“顧”“故”本義來解釋“雇(傭)傭”之“雇”的語源,說法比較牽強。《字典》則拋開字形,認爲“雇”是當“買、賣”講的“賈”的同源詞(124—125頁)。古書裏“雇”的意義,用《字典》的說法來解釋,顯然比用章說來解釋合理。如《漢書·鼂錯傳》有“斂民財以顧其功”語,注:“顧,讎也,若今雇賃也。”《後漢書·桓帝紀》有“以見(現)錢雇直(值)”語,注:“雇猶酬也。”很難設想“使爲之”的意思能引申出報酬的意思,

而由“買、賣”的意思引申出報酬的意思則是很自然的。

必須指出，在語源研究中，字形方面的線索是很重要的。進行語源研究，一方面要擺脫字形的束縛，完全從語言的角度出發；另一方面又要注意利用字形方面的線索。這兩方面決不是相互排斥的。王先生在後一方面也做得相當好。他在《漢語史稿》裏指出了“主張凡同聲符的字其意義一定也有相通之處”的“右文”說的缺點，但同時也承認“這個意思是大致不錯的”（《文集》九·704頁）。可見他並不反對在語源研究中利用“右文”的線索。他在《同源字論》裏指出“多數分別字都是同源字”（23頁）。分別字跟原來的字，大多數在字形上也是有明顯的聯繫的。有時他還引用到古文字裏的字形資料，如在講“受、授”本同字時，就引了甲骨文的“受”字（238頁）。

王先生對有些詞的語源的看法的變化，就跟注意到了字形方面的線索有關。下面也舉兩個例子。

王先生在《配對》裏把“瘳”和“療”看成配對的自動詞和使動詞，認為“療”是由“瘳”滋生的（《龍蟲》三·25頁）。在《字典》和《分析》裏，他把“療”跟“藥”看成同源字。《分析》舉“藥—療”為名詞滋生動詞之例，認為“療”是由“藥”滋生的（47頁）。這應該是正確的（《字典》對“藥、療”之間的源流關係沒有明確表示意見。從字條標目“療：惱，惱：藥”來看，可能認為“療”滋生“惱”，“惱”又滋生“藥”，跟《字典》完稿後所寫的《分析》的意見有所不同。但是也有可能這一字條的標目中的字序，主要是由同源字之間的聲韻關係決定的，並不反映王先生對它們之間的源流關係的看法）。從《字典》“療、惱、藥”條所引的有關資料來看，王先生對“療”字語源的看法的改變，大概跟他注意到“療”字或體作“瘳”跟“藥”字同聲旁，《詩·陳風·衡門》“可以樂飢”句《釋文》說“樂，本又作瘳”，以及“詩大雅板‘不可救藥’左傳作‘不可救瘳’”有關（215—216頁）。這些似乎都可以看作字形方面的線索。

王先生在《新訓詁學》裏，認為“趾”字由指稱足變為指稱腳趾，是語義演變中縮小式的例子（《龍蟲》一·321—322頁）。後來他發現腳趾之“趾”在古代寫作“指”（《史記·高祖本紀》：“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手指、腳趾本來是同名的，腳趾義跟“趾”的本義並無關係（《字典》421頁“指、指”條、94—95頁“趾、址”條）。王先生的舊說顯然受了“趾”字字形的束縛，而後來所以能糾正此說，又是由於有腳趾之“趾”本來寫作“指”這一字形方面的線索。這充分說明擺脫字形的束縛跟利用字形方面的線索是並行不悖的。關鍵在於無論是擺脫字形的束縛，還是利用字形方面的線索，都必須緊緊抓住從語言的角度出發這一點。我們覺得王先生關

於“趾”的新說可信，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這一說法從語言角度考慮也是合理的。手指的用處很大，其名稱無疑出現得很早。在需要為腳趾命名的時候，由於腳趾跟手指有明顯的相似之處，就用“指”來命名它，這是很自然的事。

王先生有時也有對字形方面的綫索不够重視的情況。他不把“居”跟“踞”聯繫起來，而把“居”看作“家”的同源字，是一個比較明顯的例子。《說文》以“尻”為居處之“居”的本字（此字見於楚國的鄂君啓節），以“居”為蹲踞之“踞”的初文。“踞”本指跟現代的“垂足而坐”相似的一種姿勢（《馮漢驥考古學論文集》155 頁及 160 頁注②）。從古文字字形看，“尻”正象有人踞几而坐，實應是“踞”的初文。踞坐是一種比較安穩、舒適的坐姿。居處之義應是由踞坐之義引申出來的。王先生考慮“居”的語源的時候，拋開字形方面的綫索，只重視古人的聲訓（《說文》：“家，居也。”），恐怕是不够妥當的。

王先生的語源研究的另一長處，是注意分析同源詞之間的語義和語法關係的各種類型。

《同源字論》有“從詞義方面分析同源字”一節，對同源詞之間在語義上的各種類型的關係進行了細緻的分析（20—38 頁）。《分析》一文則對同源詞之間的語法關係作了很好的分析（46—56 頁）。《配對》也可以看作研究同源詞之間的語義和語法關係的一篇論文（《龍蟲》三·11—29 頁）。在《字典》正文裏，有時也對所收的同源字作語法關係方面的分析。有的例子是上舉那些論文所未收的。例如《分析》一文“同音不同字的滋生詞”一節中，沒有“名詞—形容詞”一項。《字典》“穗、穢”條說：“‘穗’和‘穢’是名詞和形容詞的區別。”（464—465 頁）就可以補其缺。

近人對用四聲或清濁音別義的同源詞的語義和語法關係作過較多的討論。像王先生這樣對同源詞的語義和語法關係作全面分析的，似乎還沒有。這種分析工作無論從研究語源的角度，還是從研究古漢語構詞法的角度來看，都是非常有益的，無疑有助於研究的深化和科學化。

王先生在這方面的某些具體意見，似有商榷的餘地。例如王先生講自動詞轉變為使動詞的時候，把“買、賣”“賒、貰”“受、授”“資、貸”“糴、糶”等例子也包括在內（《文集》九·279 頁，《龍蟲》三·18—19、22—23 頁，《字典》37、119、164、238、255、302 等頁），這就不大妥當。“受、授”“買、賣”等都是一件事的兩個不可或缺的方面。既不能說授、賣等行為在先，也不能說受、買等行為在先。我們很難設想，先民會先有明確的接受、買入等概念，然後通過用“受、買”等表示“使受、使買”等意思，而形成授與、出賣等概念。楊樹達認為：“古人言語施受不分，如買與賣，受與

授，糴與糶，本皆一辭，後乃分化耳，教與學亦然。”（《靜簋跋》，《積微居金文說》191頁。參看《字典》302頁“糶、糴”條所引徐灝說。楊說與徐說接近）這一意見可能比較接近實際。梅祖麟先生在《四聲別義中的時間層次》一文中，把“受、買”等稱為內向動詞，“授、賣”等稱為外向動詞（《中國語文》1980年6期438—439頁）。這比稱它們為自動詞、使動詞合理。王先生在《分析》裏沒有用“自動詞、使動詞”的說法。他把自己過去看作自動詞和使動詞的“見”和“見（現）”稱為主動詞和被動詞，“折”（shé）和“折”（zhé）稱為不及物動詞和及物動詞（49頁）。看來，王先生對“受、授”、“買、賣”等例的看法，大概也已經有了變化。可惜他在這方面沒有留下明確的意見。

總的來看，王先生對漢語語源的研究，方法是正確的，成績是主要的。《字典》是王先生在這方面的主要成果。它提供了大量可靠的和比較可靠的同源詞以及有關的訓詁資料，為我們更深入地研究漢語語源準備了較好的條件。正如本文第一段引過的劉、李二位先生的文章，在評論《字典》時所指出的那樣，“我們今後漢語詞族的研究就要在這個基礎上前進”（《古漢語研究》1991年1期9頁）。

附錄：

在讀《字典》的過程裏，發現了一些排印等方面的技術性錯誤和其他小疏失，現在列舉於下，供讀者參考。

21頁倒4行“月望本寫作‘望’”。後一“望”字似應作“𠄎”。“望”字比“𠄎”晚出。

24頁13—14行的四個“詞”字依文義都應作“字”。

30頁6行訓“柔順”的从“木”之字應改為从“手”。

37頁15行“馬”字前脫漏“驥”字。

40頁倒4行“文始”後“七”字應作“二”。又所引《文始》認為“出”與“生”同義，“生”孳乳為“青”，所以“出”也可孳乳出與青有關的意義。這種說法當然不科學，但並不包含“生”“出”同源的意思。王先生以“出”“生”二字“聲音相差很遠”來批評此說（見倒3行），是不恰當的。

43頁2行“摩”當作“攀”。

56頁2行“幫”當作“邦”。

106頁倒5行“說文：‘繫，約束也。’”。按，《說文》原文與此大異，此是《玉篇》文。

131 頁 5 行“kua”後衍“:”號。

151 頁 11 行“盧”字應改爲“廬”。

169 頁倒 1 行“已”當作“己”。

217 頁 8 行“同音”似當作“音近”。本頁 5 行爲所舉之字注的古音並不全同。

223 頁 6 行“票”後所注異體,上部不應从“白”而應从“囟”。

265 頁 2 行“‘福’屬長入”。“福”當作“富”。

265 頁倒 3 行“‘菑’應是‘備’的初文”。按,從古文字看,“菑”本爲“箴”字初文。

267 頁 5、6、12 諸行的“陝”字應改爲从“阜”从“夾”。

285 頁 9—10 行引“敔、殺”二字資料,加按語說:“在擊的意義上,‘桮、敔、殺’實同一詞。”但 284 頁這一字條(“斫”等字條)的標目脫漏此二字。

306 頁 6 行“徐鍇”當作“徐灝”,“廣韻”當作“篇韻”。

311 頁 1 行兩引《集韻》“鐵生衣”語。“生”字原作“上”,《康熙字典》誤引作“生”。

351 頁“杭、航”等字條中的“旂”字皆應改爲从“方”从“亢”。

375 頁 16 行括號內“癰”字所从的“雍”缺上面的“亼”。

379 頁“缸”等字條所收的見於《廣韻》《廣雅》的“缸”字異體,从“瓦”从“缶”,實爲从“瓦”从“工”之字的訛體(參看周祖謨《廣韻校本》下冊 33 頁及《廣雅疏證》卷七下),似不必引用。正常的从“瓦”从“缶”之字是“缶”的異體。

402 頁 14 行、403 頁倒 10 行从“金”从“執”之字當作从“金”从“執”。

402 頁倒 9 行从“木”从“造”之字當作“槌”。

402 頁倒 9 行、403 頁 7 行都引了《後漢書·禰衡傳》裏的同一句話,但是“參”下一字 402 頁从“木”从“過”,403 頁則作“搗”,不統一。

430 頁 12 行“inai”的“n”當作“u”。

430 頁倒 6 行“‘餵、喂’是近代的‘餒’字,由上聲變爲去聲。”按,“餒”音“於僞切”,本爲去聲寘韻字(“僞”本去聲字),並非從上聲變爲去聲。

481 頁 16 行从“羊”从“易”之字當作“羯”。

485 頁 3 行“子”字當作“予”。

506 頁 17 行“侵”上脫“朋”字。

517 頁“唇”等字條 17 行所引“說文:‘宸,屋宇也。’”,已見引於同條 12 行。15—16 行引“脰”字資料,但此條標目脫漏此字。

536 頁 2 行引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由漸而滿曰引，滿而審所向在弇矢，離弦曰發。”據原書當作：“……由漸而滿曰引，已滿曰彎，滿而審所向曰弇，矢離弦曰發。”

541 頁倒 6 行“濱”當作“瀕”。

542 頁倒 3—2 行“荀子脩身：‘君子有扁善之度’。注：‘扁，讀爲辯。’”按，《荀子》原文無“君子有”三字，注文原作“扁，讀爲辨”。“扁善之度”之“扁”，按王念孫說當讀爲“偏”，與“辯”無關。

572 頁倒 7 行“延、施、移”條引《說文》“移，禾相倚移也”。按，《說文》：“逡，遷徙也。”以“逡”爲移徙、移易之“移”的本字（指與假借字相對的本字）。此條似應引《說文》“逡”字。

594 頁 11 行“四止則不通字義也”。按，“字”當作“之”。

596 頁“鑠、鑠”條內有“葉”字，但標目無此字。

596 頁“襲、疊”等字條內提到與“襲”通的“習”字，但標目無此字。

605—606 頁“含、哈”等字條的標目裏有“函、涵、賺”等字，但條內缺有關資料。

617 頁倒 1 行、618 頁 3 行从“帛”之字的“帛”旁未寫全。

618 頁 13 行从“牛”从“市”之字當作从“牛”从“市”。

618 頁倒 5 行“三分”後引號當前移至“三也”後。

619 頁 7 行“參之”後當加逗號。

626 頁 16 行“復作”後脫“詩”字，其後並應加逗號。

以下爲檢字表的問題：

631 頁左欄 ài 音所收“艾”字，注 485、486 兩個頁碼。後一頁碼應刪去。此頁“艾”字又見 655 頁中欄 yì 音下，讀 yì 是對的。

631 頁左 ǎng 音所收“盎”字應讀去聲。

631 頁右 bèi 音所收“婢、庖”二字當讀 bì。

632 頁左 bì 音所收“廨”字，注 264、276 兩個頁碼。見於 264 頁者實爲“廨”字，从“厂”不从“广”，應讀 pī 或 pì，參看正文 172 頁。

632 頁右 cēn 音所收从“木”从“參”和从“竹”从“參”二字應刪去。此二字又見 649 頁左 shēn 音下，讀 shēn 是對的。

633 頁左 chéng 音所收“瞪”字，據《字典》所取之音，其今音當爲 dèng。

634 頁左 cuán 音所收的三個从“贊”之字，“先”旁都誤作“旡”旁。

634 頁右 dāo 音所收“舠”字後括號內的“船”字，其右旁當作“召”。

- 634 頁右 dí 音所收“髡”字當讀 dì。
- 635 頁左 dié 音所收从“衣”之字的聲旁應改爲“執”。
- 635 頁中 dǔ 音所收“渚”字應讀 zhǔ。
- 636 頁右 fù 音所收“仆”字，據《字典》所注之音，其今音當爲 pū。
- 637 頁左 gāo 音所收“縞”字應讀上聲。
- 637 頁右 hán 音所收“琤”字應讀去聲。
- 638 頁左 háng 音所收第三字的右旁當作“亢”。
- 638 頁右 huītūi 的後一陰平號應改爲陽平號。
- 639 頁左“huì”應下移一行。
- 639 頁左 hún 音所收“混”字應讀去聲。
- 640 頁左 jiǎn 音所收“斂”字，據《字典》所注之音，其今音應爲 cuán。
- 641 頁左 jiù 音所收最後一字應刪去。此字已見 634 頁左 cù 音下，讀 cù 是正確的。
- 642 頁左 kuì 音所收“潰、殞”二字，據《字典》所注之音，其今音當爲 huì。如以現在實際讀音爲準，至少“殞”字應讀爲 huì。
- 643 頁中 lòu 音所收“體”字當讀陽平。
- 644 頁右 miàn 音所收从“虫”从“面”與从“虫”从“丐”（檢字表誤爲“丐”）二字都應讀陽平。
- 644 頁右 mǐn 音所收“忒”字應讀陽平。
- 646 頁中 pí 音所收“陂”字，據《字典》所注之音，其今音應爲 bēi。
- 647 頁右 qū 音所收“肱”字，據《字典》所注之音，其今音應爲 qiè。
- 648 頁右 què 音所收“缺”字，宜讀陰平。
- 651 頁中 tuī 音所收“頹”字應讀陽平。
- 651 頁右 wàn 音所收“蔓”字，注 389、585 兩個頁碼。前一頁碼應刪。此頁“蔓”字又見 643 頁右 mán 音下，讀 mán 是正確的。
- 652 頁左 wěi 音所收“菱(餒)”字應讀去聲，參看上文“430 頁倒 6 行”條。
- 652 頁左 wén 音所收“狠”字，據《字典》所引音切，其今音當爲 wán。
- 652 頁左 wēng 音所收“瓮”字應讀去聲。
- 653 頁右 xiè 音所收最後一字本从“執”，誤从“執”。
- 654 頁右 yǎn 音、655 左 yè 音皆收“魘”字。這兩個音都有根據。如以《字典》所注之音爲準，可刪去讀 yǎn 者。

655 頁左 yào 音所收“籥”字當讀 yuè, “鑰”字亦以讀 yuè 爲宜, yào 是口語音。

655 頁右 yǒng 音所收“臃、壅、擁”諸字宜讀通行的陰平音(即與“邕、癰”等字讀一個音), “鼈”字當讀 wèng。

656 頁中 yǔ 音所收“芋”字應讀去聲, “筭”字應讀陽平。

656 頁右 yùn 音所收“隕、殞”二字宜讀通行的上聲音。

658 頁左 zhì 音所收从“金”从“執”之字應作从“金”从“執”。

658 頁右 zhù 音所收“屬、矚”二字應讀上聲, “躅”應讀陽平。

658 頁右 zhuī 音所收第二字以下各字(包括第二字)都應讀去聲。

659 頁右 zuàn 音所收“纂”字應讀上聲; “簪”字據《字典》所注之音, 其今音應爲 zhuàn。

659 頁右 zuǐ 音所收“𦣻”字, 據《字典》所注之音, 其今音應爲 jù。即使取“最”音, 亦應讀去聲。

669 頁广部十一畫以上所收“廨”字, 注 264、276 兩個頁碼。見於 264 頁者實爲“廨”字。

674 頁木部七畫所收从“木”从“豕”之字爲“𣎵”字之誤而重出者。“𣎵”字見 675 頁木部八畫。

684 頁肉部八畫所收从“肉”从“豕”之字爲“𦣻”字之誤, 應改正字形, 移入七畫。

687 頁衣部十一畫第一字(外加括號者)應从“執”而錯从“執”, 第二字應从“執”而錯从“執”。

691 頁金部十一畫第一字應从“執”而錯从“執”。

1990 年 7 月 30 日寫畢

本文是提交給 1990 年召開的紀念王力先生誕辰九十周年學術討論會的論文。原載《紀念王力先生九十誕辰文集》(山東教育出版社, 1992), 又載《古代文史研究新探》, 今據後者收入。

再談古文字中的“去”字

馮蒸同志：

來信及大作已收到。

大作已拜讀，甚有啓發。但竊以爲敝說與尊說實難融爲一體。尊說由《說文》出發。敝說則由古文字出發。我既不信《說文》△爲筭廬、凵象開口之說，也不信“去”从“△”聲之說。故據古文字分𠂔𠂔爲二字，以前一字爲从大、口會意，即離去之去，亦即𠂔之初文；以後一字爲象器蓋相合，即盍之初文。口犯切之凵，古文字學者多從朱駿聲、楊樹達等人說，以爲是“坎”之初文。既不信此字象開口，則吳承仕以爲𠂔之本音當在閉口韻之說自亦不必信。且“𠂔”非罕見之字，傳統讀音在魚部，當屬可信。如謂𠂔可由談部變入魚部，或錯讀爲魚部字，則凡从去聲字之讀音皆可如此解釋，亦不必假設有去₁、去₂之別矣。又敝文所取𠂔字及字旁皆出自賓組卜辭，此組卜辭中，𠂔(大)從來不作𠂔(壺字的蓋形則作𠂔)；而凵形之寬窄在古文字中實無辨字之作用。故尊文中有關假設似尚有進一步考慮之必要。

平心而論，敝說實亦未能視作定論。關鍵之一在於甲骨文中的𠂔字尚不能從辭例上確證爲離去之“去”。尊說以《說文》爲據，自有其價值，甚望早日發表，以推進“去”字諧聲問題的研究。

大作8—9頁似有一些筆誤，我用鉛筆在稿上改了一下，不知是否合乎您的原意。

《漢字文化》上似有不少學術論文。我未訂此刊，您手頭如有多餘的複本（特別是有您文章的那些期），甚盼賜讀。

祝

春節好

裘錫圭

1991年2月3日

附：《漢字文化》原編按

北京大學的裘錫圭教授在1979年第6期的《中國語文》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談談古文字資料對古漢語研究的重要性》的論文。最近，北京師範學院的馮蒸先生對此文中所討論的古文字“去”字問題從《說文》的角度又作了新的探索，寫了一篇《〈說文〉中應有兩個“去”字說》，並寄給裘教授請益。裘教授寫了這封回信。古文字中的“去”字是一個十分重要而複雜的學術問題，裘信和馮文並十分重要。今徵得二位先生同意，一同在本刊發表。裘信的題目為本刊編者所加，馮文見本刊本期9—14頁。歡迎學術界繼續對這個問題進行討論。

原載《漢字文化》1991年2期，今據以收入。

從純文字學角度看簡化字

近幾年來，漢字簡化的功過，成了不少人的話題。這個問題只有在多方面的、深入的調查研究工作的基礎上，才能得到比較科學的結論。我們沒有在這篇短文中全面討論這個問題的奢望，只想從純文字學的角度淺談一下簡化的利弊。

從漢字字形的表意表音作用來看，有很多簡體顯然優於繁體。例如繁體“衆”早已成為字形講不出道理的記號字，簡體“众”則是很好理解的會意字。繁體“塵”是造得不很成功的會意字（籀文本从三“鹿”，大概表示衆鹿疾奔塵土飛揚的意思），簡體“尘”也是很好理解的會意字。繁體“滅”是聲旁已經起不了表音作用的形聲字（因為充當聲旁的字早已不獨立使用，一般人不認識），簡體“灭”則是造得相當成功的會意字。繁體“竈”的結構難以說清（《說文》以為是省聲字），簡體“灶”是一個會意字，字形的表意作用雖不很理想，但還是可以理解的（竈是砌造時需要用“土”的、燒“火”煮物的一種設備）。繁體“叢”的結構也難以說清，簡體“丛”的“从”旁却有很好的表音作用。繁體“郵”是不大好理解的會意字（《說文》：“郵，境上行書舍。从邑、垂。垂，邊也。”“垂”是邊陲之“陲”的初文），簡體“邮”的“由”旁也有很好的表音作用（但“由”的古音與“郵”不同部）。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出不少。

有些字的繁簡體都是形聲字，而簡體聲旁的表音作用明顯優於繁體，如肤、幫、护、赶、运等。有些簡體的聲旁从古音系統看雖不如繁體合理，但對今人而言則比較適用，如递、桩、胶、犹、惊、补、舰、担、胆、迟、酝等。這類簡體也應該看作比繁體優越。

還有很多字的繁簡體，從字形的表意表音作用來看難分高下。下面也舉些例子。

有些字的繁簡體都是字形講不出道理的記號字（至少一般人不能理解這些字形的表意表音作用），如“長”和“长”、“爲”和“为”、“貝”和“贝”、“單”和“单”、“婁”和“娄”、“對”和“对”等等。

在都是形聲字的繁簡體裏,有些形旁相同的繁簡體,它們的聲旁的表音作用沒有明顯的優劣(講表音作用根據今音)。如“糧”和“粮”、“園”和“园”、“犧”和“牺”、“極”和“极”、“礬”和“矾”等,是繁簡體聲旁的讀音都跟字音相同的例子。如“認”和“认”、“遠”和“远”、“腫”和“肿”、“選”和“选”、“釀”和“酿”、“擾”和“扰”等,是繁簡體聲旁的讀音都跟字音不完全相同的例子。不過認識上舉的“牺”“极”“矾”“选”諸字的聲旁的人,要比認識它們的繁體的聲旁的人多得多。從這一點看,也可以認為這些簡體的聲旁的表音作用優於繁體。有的聲旁相同的繁簡體,它們的形旁的表意作用沒有明顯的優劣,如从“思”的“慮”和从“心”的“慮”(在較古的篆文裏,“慮”其實是从“心”“慮”聲的字,不過《說文》中的“慮”字已从“思”)。有的繁簡體的形旁和聲旁都不同,但是表意和表音作用都沒有明顯的優劣,如从“音”“鄉”聲的“響”和从“口”“向”聲的“响”。

有時,字形的表意表音作用還算不錯的形聲字,簡化成了字形的表意作用還算不錯的會意字,如“陽”簡化成了“阳”。它們的優劣也很難評定。

依據偏旁類推原則產生的簡化字,字形的表意表音作用跟繁體一般也分不出高下。

判斷文字的優劣不但要看字形的表意表音作用(對拼音文字來說,只看字形的表音作用),而且還要看字形是否既簡單又不會彼此混淆。所以在字形的表意表音作用上跟繁體難分高下的簡體,只要字形不會跟別的字相混,就可以認為比繁體優越。

另一方面,也有大量的簡體,是通過破壞或削弱繁體的字形的表意表音作用,來達到簡化的目的的。

有些簡體同時破壞了形聲結構的繁體字形的表意和表音作用,如从“艸”“闌”聲的“蘭”字的簡體“兰”,从“旨”“尚”聲的“嘗”字的簡體“尝”,从“頁”“豆”聲的“頭”字的簡體“头”,从“鳥”“凡”聲的“鳳”字的簡體“凤”,从“示”“齊”省聲的“齋”字的簡體“斋”(不過後兩例繁體聲旁的表音作用已不明顯)。

有些簡體完全破壞或削弱了形聲結構的繁體的聲旁的表音作用。前一種情況的例子如“顾”(顧)、“爷”(爺)、“际”(際)、“层”(層)、“导”(導)、“邓”(鄧)、“标”(標)、“鸡”(鷄)、“触”(觸)等字,後一種情況的例子如“灯”(燈)、“邻”(鄰)、“淀”(澱)、“灿”(燦)、“吨”(噸)、“岭”(嶺)、“础”(礎)、“拥”(擁)、“价”(價)、“袄”(襖)等字。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原从“慮”聲的幾個形聲字的簡體。从“慮”聲的十多個比較常用的形聲字,除去“驢”字都跟“慮”同音。漢字形聲字聲旁

的讀音跟字音大都不能密合。從“盧”聲的字是很難得的一組表音作用很健全的形聲字。可是其中的“芦”“庐”“炉”“驴”四個字，由於是在全面採用偏旁類推的簡化方法之前推行的“約定俗成”的簡化字，卻把聲旁改成了聲母跟字音有明顯區別的“户”字。這是很可惜的。

有些繁體的字形的表意作用，受到了破壞或削弱。例如：從“手”從“帚”的會意字“掃”簡化成了“扫”。從“食”“羊”聲的“養”字簡化成了“养”。“买”“卖”二字繁體所從的“貝”、“产”字繁體所從的“生”，在簡體裏都看不到了。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出一些。

在古文字演變為隸書的過程裏，為了書寫的方便，破壞或削弱了很多字形的表意表音作用。這是合理的，因為古文字實在太難寫了。在楷書早已成熟的時代還這樣做，是否很有必要，就需要認真考慮了。

由於簡化，漢字體系裏增加了一些基本結構單位（即有些學者所說的部件），如“头”“乐”“专”“戈”（“尧”字上部）等。偏旁的簡化，如“金”旁簡化為“钅”、“言”旁簡化為“讠”等，也起到了這樣的作用（至少應該認為增加了基本結構單位的變形）。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束”旁的簡化。在“束”字和“闌”“棟”等字中的“束”旁並未簡化的情況下，把“揀”“煉”“練”這幾個字的“束”旁簡化為“东”，是不够妥當的。何況這個簡化的形體還十分容易跟“东”相混呢。為了減少一些字的筆畫，而去增加原來已經十分龐大的漢字體系基本結構單位的數量，恐怕不能認為是一件合算的事情。

“同音代替”的簡化方法最為人詬病。但是平心而論，有很多同音代替的例子還是合理的。如以“才”代“纔”、以“冬”代“鼐”、以“出”代“齣”、以“板”代“闆”等，有什麼不好呢？臺灣省並未實行漢字簡化，但是臺灣人通常都寫“台灣”而不寫“臺灣”。這充分說明合理的同音代替是大家所願意接受的。但是為了照顧文字表音表意的明確性，使用這種方法的時候的確應該十分謹慎。

所謂“同音代替”的“同音”，實際上包括“音近”。因此使用這種方法有時會造成一字多音的現象。例如：讀上聲的“斗”由於代替了“鬥”，增加了去聲一音。讀陽平的“別”由於代替了“斃”，增加了去聲一音。讀陰平的“干”由於代替了“幹”，也增加了去聲一音。其他簡化方法也有可能造成一字多音現象。不同的字用了同樣的簡化字形，或者某個字的簡體跟別的字同形，都有可能造成這種現象。例如：“脏”（“髒”“臟”）有平、去二音。“纤”（“縴”“纖”）有 qiàn、xiān 二音。“籲”的簡體跟吁嘆之“吁”同形，因此“吁”就有了 xū、yù 二音。“癩”的簡體跟病證之“證”

的後起字“症”同形,因此“症”就有了平、去二音。由於“麼”的簡體跟讀 yāo 的“么”同形,“寧”的簡體跟讀 zhù 的“宁”同形,《簡化字總表》不得不規定把讀 yāo 的“么”寫作“幺”,把讀 zhù 的“宁”寫作“亯”。甚至普通話審音工作都有可能造成一字多音現象。1985 年發表的《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規定“曝”(pù)在“曝光”一詞裏讀 bào,就使這個字變成了多音字。漢字裏多音字很多,引起了不少麻煩,讀音的錯誤往往跟多音字有關。因此增加一字多音現象顯然是不合適的。

使用同音代替的方法時,如果被代替的字和代替它的字的意義有可能混淆,也會引起麻煩。1964 年發表的《簡化字總表》規定,在“迭”和“疊”、“象”和“像”、“余”和“餘”以及“折”和“摺”的意義可能混淆時,仍應使用“疊”“像”“餘”“摺”諸字。1986 年重新發表《總表》時又進一步規定,“疊”“覆”“像”不再作“迭”“復”“象”的繁體字處理。這些規定就可以說明問題。(《隨筆》編按:但“象”和“像”的意義,實際上很少有混淆的可能。)在異體字整理中也有類似問題。如以“并”代“並”就很不妥當,因為“相並”和“合并”這兩種意義很容易混淆。考慮到以“並”為偏旁的“普”“碰”等字仍在使用的,取消“並”字就更顯得沒有道理了。

我們衷心希望在今後的漢字整理工作中,不要再破壞字形的表意和表音作用,不要再給漢字增加基本結構單位,不要再增加一字多音現象,不要再把意義有可能混淆的字合併成一個字。

原載《語文建設》1991 年 2 期,又載《現代漢字規範化問題》(語文出版社,1995)、《裘錫圭學術文化隨筆》、《簡化字研究》(商務印書館,2004),今據《裘錫圭學術文化隨筆》收入。

在紀念《漢字簡化方案》公佈 35 周年座談會上的發言

對待簡化字，首先要從現實出發，其次是在評價簡化字的時候應該盡可能地客觀。不管是進行科學研究也好，從事語言文字的實際工作也好，這兩點恐怕都是很重要的。

首先一點是要從現實出發。從這點出發，我完全擁護堅持以簡化字為我們當前使用漢字的規範。這個道理非常簡單，因為世界上使用漢字的人裏面，90% 以上是使用簡化字的，而且其中大部分人（像大陸上四十歲以下的人）基本上不熟悉繁體字，只熟悉簡化字。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廢除簡化字，或者對簡化字進行很大的改動，對於語言文字的使用是很不利的。我們只能而且必須以簡化字為使用漢字的規範，對目前社會上使用漢字不規範的現象應該盡可能加以引導。當然，這不等於說簡化字的一些規定就不能更改了。我們重新公佈《簡化字總表》的時候，就已經作了一些修改，比如重疊的“疊”和交迭的“迭”不再合併，形象的“象”和畫像的“像”不再合併。不過總的來講，簡化字毫無疑義是應該堅持的。

關於第二點，我只想從純文字學的角度簡單談一談。現在有些人對簡化字有反感，認為所有簡化字都是破壞文字的構造的，都是不如繁體字的。我感到這個看法是很片面的。事實上，從字形的表意表音作用來看，有相當一部分簡化字是優於繁體字的，不管是會意字還是形聲字都有例子。有些字，簡體和繁體都講不出什麼道理，但簡體寫起來比繁體簡單，如果這個簡化字形不容易跟其他的字形相混，也應該認為優於繁體字。另外一方面，我們也不能認為簡化字全都那麼好，不能認為字形簡單就一定容易認、容易記，就一定對文字信息處理有利。從文字學的角度看，漢字簡化至少有這樣一些問題：破壞了相當一部分漢字的結構，增加了漢字構造的基本單位（部件），增加了本來就已經够多的多音字的數量，不適當地合併了一些意義容易混淆的字。希望我們的語言文字主管部門吸取這些教訓，在今後進

一步整理或簡化漢字的時候不要再出這一類的問題。

原載《語文建設》1991 年 3 期，今據以收入。

讀古書要注意字的古義

讀古書必須按照古人的語言習慣和用字習慣去理解字義，這是十分明白的道理。可是要做到這一點却並不容易。不但初學者往往按照自己的語言習慣和用字習慣去讀古書，以致發生誤解；就是研究者，甚至是頗有經驗的研究者，有時也不免犯這種錯誤。在這篇小文裏，我們從平常讀書時注意到的這類錯誤裏，選出一些例子，加以說明，希望能促使初學者提高警惕，在讀古書時少犯這種錯誤，在讀跟古書有關的今人著作時少受這種錯誤的影響。我們所從取例的著作，有一些從總體上看是相當不錯的。我們指出的個別錯誤自然無損於這些著作的價值。從另一方面說，既然在比較好的著作裏也有這種錯誤，強調讀古書要注意字的古義，就更顯得有必要了。

有一種中國哲學史，在論述漢代思想家王充對卜筮的態度時，說了這樣一段話：

他指出卜筮完全是人根據自己的主觀願望祈求福祐，關於占卜吉凶，全係人們隨意解釋。如像同為一件事，子貢占卜得凶，而孔子占卜得吉，乃是因為孔子較子貢有“詭論之材”（《卜筮篇》），即孔子解釋卦辭時更善於詭辯。^①

作者的這種說法跟王充的原意幾乎完全相反。

在漢代，世俗認為龜、蓍是神物，卜兆、筮數是天地對卜筮者的答覆，因此往往“捨人議而就卜筮，違可否而信吉凶”（《論衡·卜筮》）。王充對這種迷信思想的確是反對的。可是他反對卜筮並不徹底。《論衡·卜筮》裏還有這樣的話：

夫鑽龜揲蓍，自有兆數；兆數之見，自有吉凶；而吉凶之人，適與相逢。吉人與善兆合，凶人與惡數遇；猶吉人行道逢吉事，顧睨見祥物，非吉事祥物為吉人瑞應也；凶人遭遇凶惡於道亦如之。

① 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史》第2冊，人民出版社，1963，123頁。

可見王充認為卜筮所得的兆數，本身是有客觀的吉凶的，吉人必得吉善的兆數，凶人必得凶惡的兆數。

王充還認為雖然兆數有吉凶，可是一般的占者（對兆數的吉凶作出判斷的人）水平太低，解釋兆數時往往把吉凶弄顛倒；尤其是那些比較特殊的兆數，只有孔子這類智者才能作出正確的解釋。他的原話是這樣的：

世人言卜筮者多，得實誠者寡。……夫鑽龜揲蓍，兆數輒見。見無常占，占者生意。吉兆而占謂之凶，凶數而占謂之吉。……夫蓍筮龜卜，猶聖王治世；卜筮兆數，猶王治瑞應。瑞應無常，兆數詭異。詭異則占者惑，無常則議者疑。疑則謂平未治，惑則謂吉不良。……魯將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為凶。何則？鼎而折足，行用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為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之吉。魯伐越，果克之。……周多子貢直占之知，寡若孔子詭論之材，故觀非常之兆，不能審也。（《論衡·卜筮》）

王充在這裏顯然是贊美孔子的。可是上引哲學史的作者却根據“魯將伐越”以下一段話，得出了王充認為“孔子解釋卦辭時更善於詭辯”的結論。這跟他不瞭解“詭”字的古義有很大關係。

在現代漢語裏，“詭”總是用於貶義的。在古代，“詭”有“不同”、“殊異”等義，本是一個中性的詞。例如《呂氏春秋·淫辭》說：“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相詭”就是相異、相反的意思。言行相反是壞事，但是“詭”字本身却並不包含不好的意思。《漢書·劉輔傳》記辛慶忌等人上書救劉輔說：“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顏師古注：“卓，高遠也。詭，異於衆也。”這裏所說的“卓詭”，顯然是肯定的話。在《論衡》本書中，“詭”字也有不少中性的或肯定的用例，如《講瑞》：“然則鳳皇騏驎，都與鳥獸同一類，體色詭耳，安得異種。”《自紀》：“其論說始若詭於衆，極聽其終，衆乃是之。”《吉驗》：“堯體就之如日，望之若雲……有殊奇之骨，故有詭異之驗。”所以《卜筮》篇用“詭異”來形容兆數的特殊，用“詭論”來贊美孔子異於衆人的論斷，是毫不足怪的。上引哲學史的作者以今人的眼光來看《卜筮》篇的“詭”字，所以才會誤解王充本來講得很清楚的意思。

有一篇研究漢初“黃老思想”的論文說：

在古佚書（引者按：指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老子》甲乙本卷前後佚書）中，名法不是主從關係，而是自然地溶為一體。用那時對法家學說的稱呼，即

“刑名之言”。^②

這篇論文的作者認為“刑名之言”這一名稱，是名家與法家“自然地溶為一體”的體現。他大概把“刑名”的“刑”理解成刑法的“刑”了。

其實，“刑名之言”的“刑”應該讀為“形”。從“彡”的“形”是一個晚出的字，大概到東漢時代才出現。在我們所能見到的西漢時代的簡帛文字裏，“形”這個詞都是用“刑”字表示的。古書中也保留着不少以“刑”為“形”的例子，“刑名之言”的“刑”便是一例（當刑法名稱講的“刑名”與此無關）。《辭海》“刑名”條第一義項說：

亦作“形名”。原指形體（或實際）和名稱。……先秦法家則把“刑名”和“法術”聯繫起來，把“名”引申為法令、名分、言論等，主張循名責實，慎賞明罰。《韓非子·二柄》：“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刑名者，言與事也。為人臣者陳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因而以後有人稱他們的學說為“刑名”、“刑名之學”或“刑名法術之學”。又因名家也著重研究刑名問題，所以名家也稱為刑名家或形名家。

這條解釋寫得很好，只是末一句稍有語病，因為“刑名家”和“形名家”只不過是同一名稱的不同寫法而已。上引論文的作者在引用帛書《經法·名理》篇文時，曾根據帛書原整理者的釋文在“刑名出聲”的“刑”字後加括號注出“形”字。^③可是從他對“刑名之言”的理解來看，他對“刑”字通“形”的古義並沒有真正掌握。

《辭源》“刑名”條第一義項，把“刑名”定義為“戰國時法家的一派，即刑名之學”。條中對“刑名”二字的意義沒有分別作解釋，只在最後說：“‘刑’通‘形’，故刑名也作‘形名’”。初學者讀了這一條，恐怕也會認為“刑名”的“刑”就是刑法的“刑”，或作“形名”則是不規範的寫法。也許這一條文的編寫者自己就沒有認識到“刑名”應該讀為“形名”（《辭源》“形名”條解釋的角度跟“刑名”條完全不同，而且根本沒有提到“形名”跟“刑名”的關係）。《辭源》是幫助人們閱讀古書的詞典（參看《辭源》卷首出版說明），可是屢有由於不明字的古義，或者說由於受到今義的影響，而作出不妥當的解釋的情況。下面舉兩個例子。

先秦多以“金”稱銅，跟後世多以“金”稱黃金不同。如《考工記》講青銅所含

② 程武《漢初黃老思想和法家路線——讀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帛書札記》，《文物》1974年10期47頁。

③ 同上注46頁。

銅、錫的比例時說：“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就把“銅”稱為“金”。《左傳·僖公十八年》：“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杜預注：“古者以銅為兵。”注文的“銅”就相當於《左傳》的“金”。《辭源》“金”字的第一義項是“黃金”，第二義項是“金屬的通稱”，但卻沒有釋為“銅”的義項。這跟先秦古書中“金”字的用法是不相應的。第一義項的書證是《書·舜典》的“金作贖刑”。先秦贖刑本用銅，漢儒馬融和偽《孔傳》據漢代法律釋《舜典》之“金”為黃金，前人早已指出其誤（參看清人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上册 54—55 頁，中華書局，1986）。唐孔穎達《尚書正義》解釋偽《孔傳》“金，黃金”之語說：“此傳‘黃金’、《呂刑》‘黃鐵’，皆是今之銅也。”雖然曲意回護《孔傳》，但是已經明確指出《舜典》的“金”是銅。《辭源》編者却從偽《孔傳》之說，把《舜典》的“金”解釋為黃金。這是不應該的。

《辭源》“金石”條第三義項說：

金銀、玉石之屬，常以喻堅固、堅貞。《荀子·勸學》：“鍥而不舍，金石可鏤。”……

這也是問題的。在金屬中，黃金和白銀都是硬度不高的。古人“常以喻堅固、堅貞”的“金石”一詞中的“金”，當然主要是指銅，而不是指金銀的。

《辭源》“糞”字條把“掃除”列為第一義項，這是很正確的。但是第二義項為“糞便、污穢”，所引書證為《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這就不妥當了。“糞”字的初義是掃除，引申而有穢土、污穢等義。糞便義是出現得相當晚的。《辭源》把糞便與污穢二義併為一個義項，並且把糞便義放在前面，是對“糞”字意義古今演變情況瞭解得不够清楚的表現。《辭源》“糞土”條把《論語·公冶長》和《左傳·襄公十四年》的“糞土”解釋為“腐土、穢土”，這是正確的。“糞”字第二義項所引的《左傳·僖公二十八年》的“糞土”，也應該理解為穢土，跟糞便是扯不上關係的。

《辭源》是我們讀古書時不能須臾或離的工具書，有不少優點，遺憾的是錯誤或不精確之處比較多。很希望有關方面能把它認真修訂一下。這對初學者將是功德無量的事。

有一篇推薦一種古文名篇選讀的文章，在介紹這種選讀“注釋詳密”的優點時，舉了下面這個例子：

如釋《過秦論》“贏糧而景從”的“贏”字，廣考同類選本，或釋為“擔負”、

“攜帶”，編者認為這顯然是望文生義，不足為據；因查《說文》：“贏，賈有餘利也，从貝，羸聲。”又查《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孔穎達疏：“贏，讀為盈，盈是滿也。”由此義引申出“裝足”，早見於《荀子·議兵》：“贏三日之糧，日中趨百里。”可知“贏糧”者，乃裝足糧食也。編者認為，注釋非如此，不足以啓迪後學。^④

但是被選讀編者斥為“望文生義”的“擔負”一解，實際上却是有可靠的古訓作為根據的。

《方言》卷七：

攬（引者按：有的本子此字右旁作“羸”，音義同）、贅、賀、勝、僇也（郭璞注：今江東呼擔兩頭有物為勝）。齊、楚、陳、宋之間曰攬（郭璞注：《莊子》曰：“攬糧而赴之。”引者按：見《莊子·胠篋》，今本作“贏糧而趨之”）。……

錢繹《方言箋疏》解釋說：

古擔荷字多作“僇”，與“擔”同。《廣雅》：“攬、旅、何、撻，擔也。”（引者按：見《廣雅·釋詁三》）又《釋言》：“攬，負也。”賈誼《過秦論》“贏糧而景從”，李善注引《方言》“贏，擔也”（引者按：此據《文選》卷五十一。見於《新書》、《史記》、《漢書》的《過秦論》，“贏”皆作“羸”）。《後漢書·鄧禹傳》“鄧公羸糧徒步”，李賢注引《方言》，“攬”亦作“羸”，“僇”亦作“擔”。又《儒林傳·論》曰：“羸糧動有千百。”注云：“羸，擔負也。”《莊子·胠篋》篇“羸（引者按：應作“羸”）糧而趨之”，《釋文》引《方言》“攬”作“羸”（引者按：應作“《釋文》引《廣雅》‘攬’作‘羸’”）。“羸”、“羸”並與“攬”同。

又《玉篇·卷六·手部》：“攬，擔也。《莊子》云：攬糧而趨之，本亦作羸。”按：今本《莊子·胠篋》作“羸”，前已言之。

由以上所引可以清楚地看到，把“贏糧”的“羸”釋為“擔負”並非望文生義，而是有確鑿可靠的古訓作為根據的。選讀編者不知道“羸”通“攬”的古義，釋為“裝足”，倒多少有些望文生義的味道。上引那篇推薦選讀的文章，以此來說明此書“注釋詳密”的優點，可說是找錯了例子。

下面再舉一個不恰當地把古義跟自己所熟悉的字義牽合在一起的例子。

④ 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古籍書訊》12期，1983年6月4日。

《孫子·作戰》：

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曹操注訓上文中的“屈”爲“盡”。這是古書中常見的義訓，例如：《呂氏春秋·安死》“智巧窮屈”，高誘注：“屈，盡也。”《荀子·王制》“使國家足用而財物不屈”，楊倞注：“屈，竭也。”“竭”、“盡”義同。“屈”字篆文本作从“尾”“出”聲，《說文》訓爲“無尾”。“無尾”、“竭盡”二義是明顯相關的。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說：“今人‘屈伸’字古作‘詘申’，不用‘屈’字。此古今字之異也。”訓“無尾”或“竭盡”的“屈”字讀 jué，字音也跟“屈伸”之“屈”有別。“屈伸”之“屈”可以看作“詘”的假借字。

有一種《孫子》的譯注，爲上引《作戰》篇文加了這樣一個注：

屈力，力量消耗，或力量不能伸張。^⑤

這位譯注者既知道曹操訓“屈”爲“盡”，也知道曹注對《孫子》的文義是合適的。這從他把“攻城則力屈”譯爲“攻城就會使力量耗盡”，把“屈力殫貨”譯爲“力量耗盡，經濟枯竭”，^⑥就可以看出來。但是他在注釋裏却不把“屈力”釋爲“力量耗盡”，而釋爲“力量消耗”，而且還加上“或力量不能伸張”一句，可見對曹注並不完全同意。

在後來出版的修訂本裏，這位譯注者把他對“屈”字意義的看法表示得比較明確。修訂本對原來的注釋作了不少增補和修改。“攻城則力屈”句原無注，修訂本釋爲“攻擊城堡則力量不能伸張”。^⑦“屈力”在修訂本中改釋爲“指力量消耗失却鋒利”。^⑧在譯文部分，“攻城則力屈”改譯爲“攻城就會使兵力消耗”，“屈力殫貨”改譯爲“力盡、財竭”。^⑨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譯注者雖然在譯文中把“屈”譯爲“盡”或“耗盡”，却並不承認“屈”字本來就有這一意義。他顯然認爲“力屈”、“屈力”的“屈”，就是他所熟悉的“屈伸”的“屈”；並認爲由“力量不能伸張”可以引申出“力量消耗失却鋒利”的意思，由此又可以引申出“力量耗盡”的意思。至於像曹注那樣直接把“屈”釋爲“盡”，在他看來無疑是因文生義，是不謹嚴的。他所以會有這些錯誤看法，就是由於不知道“盡”確是“屈”字的古義，不知道當竭盡講的

⑤ 郭化若《孫子今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55 頁注⑨。

⑥ 同上書 4 頁。

⑦ 郭化若《孫子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89 頁注②。

⑧ 同上書注③。

⑨ 同上書 39 頁。

“屈”跟屈伸的“屈”在語言中本是毫不相干的兩個詞。

附帶說一下，把訓“竭盡”的“屈”誤解為屈伸的“屈”，是古已有之的。《黃帝內經素問·調經論篇第六十二》：“外門不閉，以出其疾，搖大其道，如利其路，是謂大瀉，必切而出，大氣乃屈。”唐代王冰注：“言欲開其穴而泄其氣也。切謂急也，言急出其針也。……大氣謂大邪氣也。屈謂退屈也。”從文義看，這個“屈”也應該訓為“竭盡”，但是王冰却把它當成了“屈伸”的“屈”。這是因為“屈”字在唐代通常已經只用於屈曲義而不用於竭盡義了。

如果太粗心大意，甚至在讀時代很晚的淺近古文時，都會由於忽略某些字的極為常用的古義而犯錯誤。例如從先秦古書直到近代人寫的古文，都常常用“與”字表示句末疑問語氣詞“歟”。讀過幾篇古文的人，幾乎都知道“與”可通“歟”。可是由於忽略這一點而讀錯時代很晚的古文裏的句子的情況，却相當常見。

吳宣德《〈不下帶編〉〈巾箱說〉校點舉疑》，指出中華書局出版的《不下帶編、巾箱說》標點本 137 頁“世傳灝八十二歲成名，且在其子成名之後，殆好事者為之。與梁氏世居東平州……”標點有誤，“‘與’字應屬上。與，今作歟，句末語氣詞”。^⑩

王海根在《整理古籍要有訓詁修養》一文中，也談到了跟“與（歟）”有關的標點錯誤：

……如 1985 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譚人鳳集》……第 169 頁：

“前言黨衆猶軍隊也，則不知所謂黨衆者亦有確數可得稽？與其在黨者亦有標幟可得辨？與資遣而後果安歸？與既歸，而後能不更為亂，與不資遣者其將聚為亂歟？”

讀了真令人不知所云！稍一琢磨，便發現文中四個“與”字義同“歟”，均為句末疑問語氣詞，大概是由於加工者未明其“奧秘”，將“與”字後的問號“？”的位置挪錯了地方，“牽一髮而動全身”，使此段話語意轉為晦澀難明了。^⑪

我在拙著《文字學概要》裏也曾指出，魯迅用文言寫的一篇佚文《會稽禹廟窆石考》初次發表時，整理者由於沒有看出其中的一個“與”字應該讀為“歟”，把“豈以無有圭角，似出天然，故以為瑞石與？晉宋時不測所從來，乃以為石船……”標點成了“豈以無有圭角，似出天然，故以為瑞石。與晉宋時不測所從來，乃以為

^⑩ 《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143 期，中華書局，1985 年 7 月，20 頁。

^⑪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領導小組等主辦《古籍研究》1987 年 4 期，113 頁。

石船……”。^⑫

中華書局出版的《郎潛紀聞初筆、二筆、三筆》標點本 319 頁有如下一句：

余喟然曰：此漆園所稱宋人者與有不龜手之藥而泝泝統，則何邪？

也是由於不知道“與”當讀為“歟”，沒有在“此漆園所稱宋人者與”句後加疑問號，以致文意變得難以索解。同頁還有如下一句：

夫程朱大賢人也，人即至不肖，有不趣向者誰與。

這一句結尾的“與”也應該讀為“歟”。標點者似乎也沒有覺察，所以在句末沒有用疑問號。

安徽出版的《古籍研究》1987 年 2 期刊登了經過標點的《王侍郎奏議》遺稿六篇。其中的《論刑威好惡摺》中有如下幾句：

謂賊難剿，則前何以勝？謂賊易剿，則後何以不勝？豈兵之初勇而後怯，與抑賊之先弱而後強？與蓋其前之勝敢於歟也，後之不勝敢於怠也？（2 頁）

兩個通“歟”的“與”字也被標點者當作一般的“與”字，誤斷入後句了。附帶說一下，上引文最後一句句末的問號應該改為句號。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的標點本，對《說文·四下·肉部》“羸”字下解說“或曰𦘒名”句的段注作了如下標點：

或曰、不定之詞。云𦘒名、蓋羸為羸之古字。與驢羸皆可畜於家。則謂之畜宜也。（177 頁）

這也是由於不知道“與”當讀為“歟”而斷錯句的例子。這裏的“𦘒”並非野“獸”之“獸”的簡體。《說文·十四下·𦘒部》：“𦘒，𦘒也。”段注認為畜牲之“畜”本應作“𦘒”。“羸”跟“驢”是一字異體。段氏根據《說文》所說的“或曰𦘒名”，推測“羸”就是“羸”的古字，所以說：“蓋羸為羸之古字與（歟）？”上引標點本誤將“與”字斷入後句。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位已故的學問很好的著名語文學者，在他晚年所寫的一篇論文裏引用“羸”字段注時，也犯了同樣的錯誤。這當然只是一個偶然的疏失，不必因此而責備這位學者。但是這件事確實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教訓。這就是說，讀古書時一定要十分注意字的古義，一點也不能掉以輕心。不然，很好的學者也會在很平常的問題上犯錯誤。

^⑫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商務印書館，1988，202 頁。

初學者怎樣去掌握字的古義呢？除了多讀、細讀古文和一些古代漢語讀本中的“常用詞”部分外，還應該勤查《辭源》、《辭海》和《經籍纂詁》等工具書（注意：纂字从“食”，通“撰”，不要認作“纂”字）。我們在前面說過，《辭源》的錯誤較多（其他工具書同樣有錯誤，只是數量有多有少而已）。這是就錯誤的絕對數量說的。從總體來看，錯誤部分無疑只佔一個很小的比例。對讀古書的初學者來說，《辭源》仍是必須參考的重要工具書。

原載《中國典籍與文化》1992年1期，又載《裘錫圭學術文化隨筆》，今據後者收入。



秦漢時代的字體

一、緒 言

秦漢時代是漢字字體演變史上極為重要的一個階段。

秦代的正規字體是作為古文字殿軍的小篆，但是在日常使用的文字裏，形成於戰國晚期的隸書已經成為主流了。隸書本是由秦國篆書的簡率寫法演變而成的一種輔助字體。到了漢代，隸書被視為正規字體，小篆逐漸變成只在一些特殊場合使用的古字體。

秦代和西漢早期的隸書保留篆書的成分比較多，今人多稱為古隸。西漢中期，隸書逐漸成熟，並形成了魏晉以後稱為八分的那種書體。比八分的形成稍晚一些，還在隸書草體的基礎上形成了草書。這是兩漢時代的重要輔助字體。

八分形成以後，在書體方面受八分影響不大、書寫起來比較方便的隸書，始終大量存在。這種隸書，在字形構造方面大體上跟八分同步變化；在書體方面早期跟古隸接近，後來逐漸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大約在東漢中期，從這種隸書裏演變出了一種溶入草書筆法的、呈現由隸書向楷書過渡的面貌的俗體，今人或稱之為新隸體。到東漢晚期，又在新隸體和草書的基礎上形成了行書。隸書就是通過新隸體和行書而演變成為魏晉以後所使用的楷書的。不過，終東漢之世，在比較鄭重的使用文字的場合，八分始終佔有統治地位。

從漢字字體演變史的全局來看，隸書未嘗不可以看作古文字和楷書之間的過渡字體，秦漢時代未嘗不可以看作古文字逐漸演變為今文字的過渡階段。

二、研究秦漢字體的資料

研究古代字體最重要的資料，是當時人遺留下來的書跡。秦漢時代人的書跡，

主要見於簡帛、石刻、銅器、印章、陶瓦等物上。以下分項進行介紹。戰國晚期的秦國文字資料，跟秦代的文字資料往往不易區分，而且對研究秦代字體也很有用處。所以我們一般把這兩種資料合在一起介紹。

1. 簡帛文字

秦漢時代的主要書寫材料是竹、木製成的簡、牘。

秦簡是在 70 年代才初次發現的。1975 年底，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十一號秦墓出土了一千一百多枚竹簡，其內容有秦律和《日書》（與時日有關的占書）等。這座墓是在始皇三十年（前 217 年）或稍後的時候下葬的。竹簡抄寫時間不一，估計不出戰國晚期至秦代初年這段時期。其字體屬於古隸。跟睡虎地十一號墓同墓地的四號秦墓出土了兩塊家信木牘，從內容看是寫於戰國末年秦統一前夕的，字體是比較草率的古隸。此後，秦簡、秦牘續有發現。1979 年在四川青川縣一座戰國晚期的秦墓裏，發現了一塊抄有律文的木牘。1986 年在甘肅天水市放馬灘一座戰國晚期的秦墓裏，發現了四百六十枚竹簡（內容主要為日書）以及四塊注有文字的木板地圖。1989 年在雲夢縣龍崗的一座秦代墓裏，又發現了一批秦律竹簡和一塊木牘。這些簡牘的字體也都屬於古隸。

漢簡發現得比較早，數量也比較多。從清末 20 世紀初以來，在西北地區的兩漢時代邊塞遺址裏，陸續發現了很多漢簡。50 年代以後，還在湖南、湖北、安徽、山東、河北、甘肅、青海、江蘇等地的漢墓裏，發現了很多漢簡。

邊塞遺址出土的漢簡，習慣上按出土地區分成三類：

A. 敦煌漢簡 發現於甘肅省的敦煌、安西、酒泉、鼎新（毛目）等地。這些地方在漢代屬敦煌、酒泉兩郡，但是一般把這些地方出土的漢簡統稱為敦煌簡。

B. 居延漢簡 發現於甘肅和內蒙兩地的額濟納河（即弱水）兩岸等地。這些地方的邊塞在西漢屬張掖郡的肩水和居延二都尉管轄，但是一般把這些地方出土的漢簡統稱為居延簡。

C. 羅布泊漢簡 發現於新疆羅布泊北岸。由於出土地接近所謂樓蘭遺址，也有人稱之為樓蘭漢簡。這種簡為數不多。已發現的邊塞漢簡絕大多數是居延簡和敦煌簡。

上述這些漢簡通常是在漢代邊塞地區的官署和烽燧的遺址裏發現的，大都是屯戍吏卒遺留下來的文書、簿籍以及私人書信等類東西。其時代起自西漢武帝晚期，終於東漢晚期（但東漢晚期的簡數量不多）。

墓葬裏發現的漢簡，多數是書籍和記隨葬物品的“遣冊”。邊塞漢簡裏沒有早

於武帝晚期的簡。墓葬漢簡裏，如臨沂銀雀山一號墓、長沙馬王堆一號、三號墓、阜陽雙古堆一號墓、江陵張家山二四七號等墓和江陵鳳凰山漢墓群所出的簡，都屬於西漢早期（指武帝初年以前）。

邊塞漢簡基本上是木簡。墓葬漢簡裏竹簡比較多。此外，邊塞遺址和墓葬都出土了一些木牘。

已發現的西漢早期簡一般用古隸，只有銀雀山漢簡裏有一種用篆書抄寫的占書。邊塞漢簡一般用隸書，但也有不少草書簡，此外還有少數篆書干支簡。在西漢中晚期簡上，可以看到隸書逐漸成熟和草書逐漸形成的情況。在東漢中晚期簡上，可以看到一些新隸體。

在廣泛使用植物纖維紙之前，除簡牘外還有一種重要的書寫材料，這就是帛。古人常說“竹帛”，以帛與竹簡並提。但是帛比竹木貴重，使用量比簡牘少得多，並且還比簡牘容易損壞和腐爛，所以遺留下來的古代帛書為數不多。

1973 年在下葬於西漢文帝十二年（前 168 年）的長沙馬王堆三號墓中發現了一批帛書，內容有《老子》、《易經》等典籍和醫書、占書等。其中有一件字體為篆書的占書，大概是秦統一前一年（前 222 年）抄寫的。大部分帛書的字體屬於古隸。其中一部分，字體跟篆書比較接近，可能抄寫於秦末或漢初。其他的抄寫於西漢早期。

過去還曾在漢代敦煌、居延（包括肩水）的邊塞遺址裏，發現過少量寫在帛上的隸書，內容是書信和題署。

此外，50 年代以來，在甘肅武威市磨咀子的一些漢墓裏，發現了用帛或麻布製的銘旌，大都是篆書的。1973 年在甘肅金塔縣的漢代肩水金關遺址，出土了一件帛製的張掖都尉榮信，也是篆書的。

2. 石刻文字

在發現秦漢簡牘之前，石刻文字是研究秦漢時代字體的最重要的資料。

秦統一後，始皇巡行天下，在嶧山、泰山、琅琊臺、之（芝）罘、碣石、會稽等地刻石銘功。秦二世時又在每處刻石上加刻一道詔書，說明這些石上的文字是始皇刻的。這些刻石是研究秦代小篆的最好資料。可惜原物幾乎都已毀壞，只有琅琊臺刻石尚有殘塊存留，保存的主要是二世詔文。不過，嶧山刻石的文字尚有完整的摹刻本傳世，泰山刻石尚有存字頗多的殘文的摹刻本見於宋人叢帖，都可以用作研究的參考。



泰山刻石

在這裏有必要對明人安國舊藏的所謂泰山刻石宋拓本(以下簡稱“安國本”)的性質作一些討論。

見於宋人叢帖(如流傳的所謂絳帖)的泰山刻石摹刻本(以下簡稱叢帖本),大約出自宋代劉跂的《泰山秦篆譜》,存字一百四十六(“大夫”的合文“夫=”作一字計。關於這一摹刻本,參看容庚《古石刻零拾·秦泰山刻石考釋》。在劉跂之前,宋人只知道泰山刻石上尚可辨識的字為二世詔文,而不知道始皇刻文仍有存留)。安國本較叢帖本多出十九字(大都是殘字,但也有個別整字,如“治道運行”的“運”)。可是在二者共有的文字裏,安國本的有些字反而不如叢帖本完整,如二世詔“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句中的“刻”、“辭”、“稱”三字以及“如後嗣為之者”的“者”字。有的字二者殘損情況不同,如二世詔“其於久遠”的“遠”字,安國本“袁”旁右側略殘“辵”旁完整,叢帖本則“袁”旁完整“辵”旁全殘。這是很可怪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字的寫法二者有明顯出入。現擇要舉例於下:

	臨	平	靡
安國本	𠂔	𠂔	靡
叢帖本	𠂔	𠂔	靡

西周晚期銅器毛公鼎“臨”字所从的“臣”，跟三個“口”都有綫條相連（見《金文編》583 頁），《漢印文字徵》八·一二下“臨”字條所收第一例亦同。可見叢帖本“臨”字所从“臣”下豎畫必為刻石所原有，而非摹刻者所臆增。安國本“平”字篆形與《說文》相合。但是先秦古文字中的“平”字，中豎絕大多數直通頂畫（參看《金文編》326 頁）。《漢印文字徵》五·六上“平”字條共收十四例，中豎沒有一例不通頂畫。《金文續編》五·四下至五上“平”字條共收三十五例，除一例之外，中豎也都直通頂畫。那個例外是平陸鼎的“平”字，它的中豎也是穿出下一道橫畫的，只不過沒有一直延伸到頂畫而已。所以叢帖本“平”字的寫法一定是反映刻石原貌的。安國本“靡”字篆形也與《說文》相合，但是漢印“靡”字篆形却與叢帖本相合（看《漢印文字徵》一一·一九上）。在早於漢印的古文字資料裏，“靡”字尚未見到，“非”字的寫法也與叢帖本“靡”字所从之“非”相合（看《金文編》760 頁“非”字）。而且據馬衡研究，《說文》“非”字篆形本來也作𠄎，今本作𠄎，實為後人所改（《談刻印》，《凡將齋金石叢稿》299 頁，中華書局，1977）。所以叢帖本“靡”字的寫法也一定是反映刻石原貌的。叢帖本為後人所摹刻，無疑不能完全保持刻石原貌。但是由上面所舉的例子來看，此本篆形基本可靠；而安國本的篆形則有後人臆改之處。可見後者斷非拓自原石。

容庚在 30 年代所寫的《秦始皇刻石考》中，早已指出安國本“靡”字所从之“非”的寫法有問題，並指出全拓“石花（指石上泐痕）板滯”。他明確認為此本“非原石拓本”（《燕京學報》17 期 154 頁）。這是很正確的。還有人由於安國本的書法“較之《琅琊臺刻石》乏古厚峻拔之氣”，而疑其為“複刻”（楊震方《碑帖敘錄》128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這也是的道理的。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卷三，在記述劉跂訪得泰山秦篆之事以及刻石原文與《史記》所載之文的異同後說：“北海王壽茂松（引者按：茂松為王壽之字）刻於石。”上引容文懷疑安國本就出自此刻。這也很可能是正確的。不管是否如此，根據上文的分析已經完全可以斷定，安國本所據拓者是後人對泰山刻石殘文的一種不很忠實的摹刻。傳世泰山刻石明拓本只存二世詔中的二十九個字。從字形和泐痕看，所據拓者應該就是這一摹刻的殘石。萬一不是這樣，就應是另一種摹刻的殘石（清人宋鳳翔《秦泰山刻石殘字考》疑為劉跂之前的江鄰幾摹刻的殘石）。二十九字殘石至清乾隆初毀於火，嘉慶二十年時發現了尚餘十字的碎塊，今存泰山岱廟。

由於現在還有不少研究碑刻和書法的人，認為安國本是原石拓本，今存岱廟的十字殘石是原石的殘餘；我們不得不多花了一些篇幅來討論它們的性質。



會稽刻石

傳世尚有會稽刻石摹刻本，係傳自元人（元人摹刻之石，其文字在清康熙中被石工磨去，現只存拓本），過去有人懷疑過它的可靠性。此本“臨”、“平”、“靡”三字篆形，與泰山刻石安國本全同。此外，“陳”（右旁中部从“申”）、“甲”（所从之“十”，豎畫不出頭）、“中”（作中）、“得”（右旁上部从“見”不从“貝”）、“皆”（从咎不从日）、“同”（从月不从凡）等字和“逃”字所从的“兆”（作𠂔），其篆形都與《說文》相合，而與秦和西漢金石上所見的篆書不合（新莽天鳳五年鬱平大尹馮君畫像石墓題記的“中”字篆形與《說文》合，這是漢代金石文字中少見的例外。秦詛楚文的摹刻本，有把“中”摹作中的，當據元至正刻本詛楚文改爲中）。又“刑名”之“刑”左旁作“开”而不作“井”，也與秦漢文

字不合（參看張書巖《試談“刑”字的發展》，《文史》第二十五輯）。可見此本很不可靠，前人的懷疑是正確的。

已發現的西漢和王莽時代的石刻文字不多，而且都比較簡短。字體有篆有隸。其中比較著名的，篆書的有趙廿二年（趙王遂廿二年，前158年）群臣上齋刻石、魯六年（魯恭王六年，前149年）北陛石、居攝二年（7年）上谷府卿與祝其卿二墳壇、天鳳五年（18年）鬱平大尹馮君畫像石墓題記等；隸書的有地節二年（前68年）巴州民楊量買山記、五鳳二年（前56年）刻石、河平三年（前26年）庶孝禹刻石、建平五年（前2年）郫縣刻石（只存摹本）、天鳳三年（16年）萊子侯刻石等。

東漢時代，尤其是東漢後期，刻碑之風盛行，所以遺留下來的石刻文字很多。東漢後期的碑刻，篇幅往往較長，書法也多有可觀，如石門頌（即楊孟文頌，爲摩崖）、乙瑛碑（即孔廟置守廟百石卒史碑）、禮器碑（即韓勅造孔廟禮器碑）、孔宙碑、華山碑（即西嶽華山廟碑）、史晨前後碑、西狹頌（爲摩崖）、韓仁銘、曹全碑、張遷碑和熹平石經（只存一些殘石）等，都是爲後代書法家所推崇的。東漢石刻文字一般是隸書，但也有一些是篆書，比較著名的有袁安碑、袁敞碑、祀三公山碑、開母廟石

闕銘、少室石闕銘等。隸書碑的碑額也多為篆書。

3. 金文

銅器銘文一般簡稱金文。戰國晚期和統一後的秦金文，多見於兵器、權量、虎符和鼎等器物上。

秦統一後，把始皇二十六年（前 221 年）統一度量衡的詔書刻在或鑄在很多權、量上。二世時，為了說明這些是始皇時的刻辭，又在很多權、量上加刻了一道詔書。有些二世時新造的權、量，則同時刻上或鑄上兩道詔書。一部分秦代權、量上還有記重量或地名的銘文。銘有詔書的秦代權、量，以及原來嵌在或釘在權、量上的刻有詔書的銅板，即一般所謂“詔版”（亦作“詔板”），發現得很多。這些權、量、詔版上的銘文，佔了已發現的秦代金文的大部分。秦代金文一般是篆書，但是在作風草率的刻銘中往往夾雜與古隸相同的字形，如見於某些權、量的𠄎（皆）、𠄎（明）、𠄎（者）等字。

漢代金文多見於鼎、鍾、鐙（燈）等日用器物 and 兵器、權量等物上。字體有篆有隸。

漢代銅鏡往往有銘文，字體也有篆有隸，但多訛體、簡體，情況比較特殊。

4. 印章文字

戰國晚期和統一後的秦印，歷來發現得很多。印文大部分是篆書，小部分是古隸或接近古隸的篆書俗體。已發現的漢印，數量更多。印文一般是篆書，但隸書的影響也不時可以看到。秦印文往往有闌格。漢初尚多沿襲此風，西漢中期以後一般就不用闌格了。

在用紙之前，一般印章主要用來打在封文書信札或其他物品的封泥上。漢代封泥文字已大量發現，秦代封泥文字發現得還不多（王獻唐在 30 年代所寫的《臨淄封泥文字敘》裏，認為出土於臨淄縣城東門外偏北一帶的、有闌格的封泥文字屬於秦代）。

5. 陶文

陶瓦之類物品上的文字，一般稱為陶文。戰國晚期和秦代的陶文，見於磚瓦、陶器、陶俑等物上，有用戳印打出來的，也有刻劃出來的。字體的情況跟上面介紹的秦印相似。有些秦代陶量上有用四個字一方的大戳打出來的始皇詔書，頗有後代活字排版的意味。

漢代陶文的情況比較複雜。瓦當頭上模製的文字一般是篆書。磚上模製的文字有篆有隸（磚面上裝飾性的模製文字多為篆書，如西漢時的“海內皆臣，歲登成

孰,道毋飢人”十二字方磚等【編按:學者多已指出,“道毋飢人”之“飢”實爲“飢”字,意即道上無乞食之人】),刻劃出來的文字一般爲隸書(發現得較多的,有洛陽東漢刑徒墓地出土的墓中磚誌),但有時也能看到草書等字體(例如在70年代發現的安徽亳州市東漢晚期曹氏宗族墓墓磚上隨意刻劃的文字裏,除了篆書,當時使用的各種字體幾乎都能看到)。用毛筆書寫的文字偶爾也能在磚上看到(如河北滄縣北塔村東漢墓出了一塊面上寫有五行字的朱書磚,字體屬新隸體,見劉化一《記新出土的一塊漢代朱書磚》,載《書法》1987年1期35頁)。陶器上的文字,用戳印打出來的、模製的、刻劃的和用筆書寫的都有。用戳印打出來的多爲篆書,其他的多爲隸書。東漢中、晚期,主要是晚期,有在墓中放置寫有鎮墓文的陶瓶的風氣。這種鎮墓文是研究新隸體的重要資料。

除以上所舉各種資料外,秦漢漆木器上的文字、秦漢貨幣上的文字以及東漢時代隨葬用的買地鉛券和墓壁題字等,也都是有用的資料,不一一介紹了。

研究秦漢時代的字體,還有一種書面資料,那就是《說文》中的小篆。不過《說文》的篆形有一部分是有問題的。前面討論泰山刻石安國本和會稽刻石摹刻本的可靠性的時候,已經指出《說文》中的有些篆形跟見於秦漢金石的小篆不合。下一節中還會談到這方面的問題。

三、秦漢時代的小篆

《說文解字敘》在講到秦始皇統一文字的時候,是這樣說的:

其後(按:指孔子之後)……分爲七國……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按:實際上李斯當時還沒有任丞相)。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

這段話給人這樣一種印象,似乎秦始皇用來統一全國文字的小篆,是李斯等人通過對籀文進行簡化而制定出來的一種字體。其實,籀文並非秦國在統一前夕所用的文字。小篆不是直接由籀文省改而成的,而是由春秋戰國時代的秦國文字逐漸演變而成的(參看拙著《文字學概要》48—51頁,商務印書館,1988)。傳世的新鄭虎符和70年代發現的杜虎符都是秦在統一前所鑄造的,但是銘文的字體跟統一後的小篆並無區別。這說明在秦統一前後的篆書之間,實際上無法劃出

一條界綫，李斯等人作小篆的說法是有問題的。錢玄同在爲卓定謀《章草考》所作的序裏說：“許叔重（引者按：即《說文》作者許慎的字）謂李斯諸人取大篆省改爲小篆，實則戰國時秦文已如此，可見李斯諸人但取固有的省改之體來統一推行，並非創（創）自他們也。”這是正確的。

由此可見，過去把統一前秦國的篆書劃入大篆，把統一後的篆書稱爲小篆，是不妥當的。爲了照顧傳統，我們仍把秦漢時代的篆書稱爲小篆。但是我們使用這一名稱，只是爲了從時代上區分秦統一前後的篆書，並不是承認篆書在秦統一之際發生過什麼突變。

在秦漢兩代四百多年的時間裏，篆書是有變化的。從風格上看，時代較晚的篆書的形體，一般不如時代較早的緊湊、自然。在秦篆中，字的筆畫故作宛曲以求美觀的現象已屢有所見（如嶧山刻石“上”、“下”、“于”等字的豎筆）。在漢篆中，這種現象更爲常見，而且宛曲的程度往往超過秦篆。

此外，一般地說，時代越晚，篆書受隸書的影響就越深。隸書流行以後，一般人在寫篆書的時候，往往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把隸書的成分攙雜進去。在上一節裏已經說過，秦代權量上刻得草率的詔文裏，往往雜有與古隸相同的字形。在上節提到過的西漢早期篆書刻石裏，魯六年北陛刻石“月”字的字形是古隸的，趙廿二年群臣上齏刻石由於筆法方折，有些字也有隸書意味。此後，隨着隸書的發展和人們對篆書熟悉程度的降低，隸書對篆書的影響就更爲顯著了。

在西漢中期以後金石上的篆書裏，即使是書法很工整的銘刻，也時有跟小篆不合而跟隸書相近的字形。例如在建平四年（前3年）的南陵大泉鍾的篆書銘文裏，“乘輿”二字的字形近於隸書（銘文見容庚《漢金文錄》二·一下）。上節提到過的袁安碑，在東漢人的篆書裏可算是篆味比較足的，但碑文“除”字“余”旁的字形近於隸書；“事”字中部作（小篆本作），“海”字“每”旁上端作（小篆本作）。



新鄭虎符

都受了隸書的影響；“賓”字“𠂔”旁下部作 ㄥ，雖是漢印中常見的寫法，追溯其源，也應與隸書的影響有關。金石文字之外的篆書也有這類現象。《說文》中有些問題的篆形，如上節提到過的不从 月 而从 冂 的“同”字，其形成大概也跟隸書的影響有關（《說文》“凡”不作 冂 作 冂，情況與此相類）。

在著名的篆書碑刻中，受隸書影響最深的是元初四年（117 年）所立的祀三公山碑。此碑的書手主觀上無疑是想寫篆書的，但是由於他受隸書影響太深，不但筆法近於隸書，所用的字形也有不少同於或近於隸書。其中如“寸”、“處”、“立”、“闕”、“夾”、“無”等不少字，簡直完全是隸書，只是筆法跟當時通行的八分還有距離而已。因此整篇碑文呈現篆隸雜糅的面貌。這是隸書時代的人所寫的不標準的篆書，有些人評為“由篆入隸之漸”（清翁方綱《兩漢金石記》語），或“由篆向隸演變的字體”（《中國美術全集·書法篆刻編 1》圖版說明 57 頁），是不妥當的。所謂延光殘碑的書體的作風，跟祀三公山碑有些相近。此碑筆法非篆非隸，而字形真正合乎小篆的幾乎連一個也找不出來，是想仿古而根本未仿成的怪體，或以為是“由篆趨隸之漸變時的書體”（同上 60 頁），也是不妥的。康有為等人以上舉二碑的字體為“繆篆”，離事實就更遠了。



袁安碑



上林共府銅升銘

在漢代金石銘刻中還可以看到這樣一種情況：整篇銘刻基本上是隸書，但是某些字的筆法雖仍似隸書，字形却是全部或部分依據小篆的。例如初元三年（前 46 年）上林共府銅升銘基本上是隸書，但“上林”二字可以看作用隸書筆法寫的小篆，“受”、“邪”的字形也比較接近小篆。一直到東漢晚期的有些隸書碑刻仍存此風。

如夏承碑的有些字和偏旁就用了小篆字形，“中”字甚至用了籀文字形。這跟我們今天用楷書來隸定古文字，是類似的現象。有些人把這種銘刻的字體評為介於“篆隸之間”，似乎也不很妥當。

由於人們對小篆原來的字形越來越不熟悉，篆書的時代越晚，出現訛體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在漢代篆書，尤其是東漢篆書裏，訛體要比秦代篆書多得多。《後漢書·馬援傳》李賢注引《東觀記》曰：

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城臯令印，“臯”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

可見在東漢初年，印章上的篆書已常有訛體（“白下羊”、“四下羊”兩種訛體也見於漢隸，印文可能受了隸書影響）。上面提到過的袁安碑，據碑文當立於永元四年（92年）。碑上“徒”字所从的“土”作出（時代較早的漢印，偶爾也有這種寫法），“正”字作𠂔，“薨”字變爲从“𠂔”，“閏”字變爲从“𠂔”，都是錯誤的（碑文“葬”字从“竹”，也被人看作訛體。但是三體石經的古文和睡虎地秦簡的“葬”字都从“竹”，究竟是否訛體尚待研究）。

《說文》成書於東漢中期，自難完全避免當時訛體的影響。書中所以會有不少有問題的篆形，這應該是原因之一。此外，包括許慎在內的文字學者，對小篆的字形構造免不了有些錯誤的理解。這種錯誤理解有時也會導致對篆形的竄改。例如“戎”字，《說文》作𠂔，分析爲“从戈，从甲”。這個字在西周前期金文裏本作从“戈”从“𠂔”，後來“𠂔”簡化成了“十”。嶧山刻石、漢印和隸書、楷書中的“戎”字，都从“十”而不从“甲”。《說文》的篆形顯然有問題。在古文字裏，“甲”本作“𠂔”，跟“戎”字所从的“十”的確沒有什麼區別。但是西周金文可以證明“戎”所从的“十”並不是古“甲”字，而是𠂔（𠂔，音貫）的簡化之形。“𠂔”本象盾牌。在古代，戈和盾分別是進攻和防衛的主要器械。兵戎的“戎”字由“戈”、“𠂔”二字組成是很合理的。大概漢代某些文字學者誤以爲“戎”字所从的“十”是古“甲”字（甲冑也是重要的戎器），所以把“戎”的篆文改成了𠂔。《說文》“早”字作𠂔，“卓”字作𠂔，也犯了類似的錯誤（“早”、“卓”二字的結構，目前還不能作確切的解釋）。附帶說一下，《說文》篆形的有些錯誤，是在後來傳抄、刊刻的過程中造成的，上節中提到的“非”字便是一例。

使用在某些特定場合的篆書，往往有獨特的風格。如印章文字要求“勻而滿之”（清孫光祖《六書緣起》論繆篆語，韓天衡《歷代印學論文選》334頁，西泠印社，1985），即要求整個印面和每個字形都顯得勻稱，而且每個字形基本上能填滿分配給它的空間。要做到這一點就往往需要改變小篆筆畫原來的長短、曲直，有時還需要調整原來的偏旁位置。秦印中已有這種現象，漢印中這種現象更為顯著。舉例說，秦漢印中“馬”字的寫法，一般都不屬於正規的小篆這種類型，而屬於這種類型。所以採取這種寫法，應該就是由於要求字形“勻而滿之”。這種寫法比較接近隸書。這是由於隸書的字形一般比篆書方正勻稱，而印文也要求寫得方正勻稱的緣故，不能簡單地看作印文受隸書影響。漢代其他金石篆書裏“馬”字的寫法（多見於偏旁），大都與印文同類型。這倒有可能主要是由於印文的影響。秦漢時代的私印和吉語印中有一些圓印。這種印更需要改變小篆原來的寫法。不過它們的改變方法往往跟一般的方印有異，而跟某些瓦當文字有相似之處。因為後者的文字也是安排在圓形平面上的。

在漢印等物的篆書裏，還可以看到一些裝飾性特強的美術字。它們以筆畫屈曲為特點，並且往往加上小曲綫、鳥紋或魚紋等作為裝飾，有時還把整道筆畫改變成魚形或鳥形。例如（以下諸例引自羅福頤《古璽印概論》7頁，文物出版社，1981）：



著名的滿城中山靖王墓出土的鳥篆壺的銘文和傳世的“永受嘉福”瓦當的文字，也都是這一類的美術字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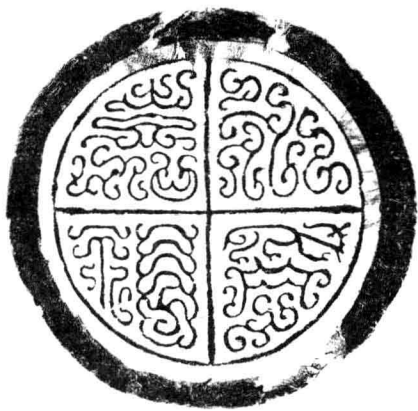
《說文解字敘》說：

……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為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按：“秦始皇”句或以為原當在下文“即秦隸書”之後。說程邈作小篆，與《說文敘》上文說李斯等人作小篆矛盾。據古書所載，東漢蔡邕、南北朝羊欣、王僧虔、江式

等人，都認為隸書為程邈所作）。四曰佐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

秦書八體中的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和王莽六書中的繆篆、鳥蟲書，大概都是小篆的變體。

前面已經說過，印章文字對字形有特殊要求。這應該就是摹印自成一體的原因。王莽六書中的繆篆，一般都認為相當於秦的摹印。近人羅福頤別創新說，認為一般印章文字不能稱繆篆，只有漢私印中“故作屈曲迴繞的書法”的篆書，才是繆篆（《古璽印概論》7頁）。上面講美術體時所引的“王獲私印”、“杜臨私印”，就是羅氏所舉的繆篆的例子。此說提出後，信從者似不多。



永受嘉福瓦當

秦的蟲書和王莽六書中的鳥蟲書無疑是相類的。羅福頤認為漢印中“不但筆劃屈曲，而且有些筆劃作魚形或鳥頭狀”的書體，應為鳥蟲書（《古璽印概論》7



張掖都尉榮信

頁）。上面講美術體時所引的“綈仔妾娟”等三印，就是羅氏所舉的鳥蟲書的例子。羅氏所定的“繆篆”和“鳥蟲書”這兩種書體，性質很接近，有時不太好區分。例如羅氏把“永受嘉福”瓦當的文字歸入繆篆（《古璽印概論》7頁），但是這些字的作風跟羅氏認為是鳥蟲書的“綈仔妾娟”很相似，二者都是筆劃屈曲又有小曲線作裝飾的，只不過前者的屈曲程度甚於後者而已，似不應分入兩類。馬國權在《繆篆研究》一文中，對鳥蟲書提出了另一種看法。他認為漢印中“每字的若干筆道都以鳥頭為裝飾”的，就是鳥書（《古文字研究》第五輯 266 頁）；漢印和漢代其他篆書中，凡筆

畫“故作蜿蜒”的（他認為這是象徵蟲身的“蜿蜒迴繞”），包括羅氏認為是繆篆的那些字在內，都是蟲書（同上 266—267 頁）。此說比較合理。不過以鳥為飾的印文，筆劃一般也具有屈曲的特點，似乎沒有必要把鳥書和蟲書嚴格區分開來。秦的蟲書也許就是包括鳥書在內的。附帶說一下，馬文定為書於幡信的蟲書實例的“張掖都尉榮信”的文字，據《中國美術全集·書法篆刻編 1》所載徐祖蕃的說明，本是正規的小篆，只是由於原物出土時，“已團成皺折，絹面已破損；雖經修整亦未能恢復原貌，故使某些字的筆劃似帶有‘婉’狀”（該書圖版說明 44 頁）。所以即使馬文關

於蟲書的說法能够成立，張掖都尉榮信也不能視為蟲書的實例。

關於秦書八體中的刻符、署書和殳書的面貌問題，雖然也有人發表意見，但都語焉不詳或缺乏根據，這裏就不介紹了。

四、秦漢時代的隸書

《漢書·藝文志》和《說文解字敘》都說隸書開始出現於秦代，是爲了應付當時繁忙的官獄事務而造的一種簡便字體。此外，從漢代以來，還流傳着程邈爲秦始皇造隸書的傳說。這些說法跟事實是有出入的。

從考古發現的秦文字資料來看，隸書是在戰國晚期的秦國形成的。戰國時代是文字變化得非常劇烈的時代。跟東方六國相比，秦國文字顯得比較保守。但是秦國人在日常使用文字的時候，爲了書寫的方便也在不斷破壞、改造原來的字形。由此產生的秦國文字的俗體，就是隸書形成的基礎。

在秦孝公時代的銅器銘文裏，就可以看到規整的正體和草率的俗體並存的情況。孝公之後，文字的使用越來越頻繁，俗體也隨着越來越流行。在銅器（主要是兵器）銘文、漆器銘文以及印文、陶文裏，都可以看到一些俗體字（參看拙文《從馬王堆一號漢墓遣冊談關於古隸的一些問題》，《考古》1974年1期。以下所引秦國兵器銘文的出處皆見此文）。在這些俗體字裏，已經出現了不少跟後來的隸書相同或相似的寫法。例如：惠文君十三年（前325年）所造的相邦義（即張儀）戈“義”字所从的“羊”已經寫作𦍋（正規篆書作羊）。惠文君四年（前334年）或惠文王更元四年（前321年）所造的相邦樛游戈的“游”字、莊襄王三年（前247年）或秦王政三年（前244年）所造的上郡戈的“漆”字，其“水”旁都已經寫成三短橫。類似的例子可以舉出不少。

在秦國文字的俗體裏，用方折的筆法改變正規篆書的圓轉筆道的情況很常見。有些字僅僅由於這種變化，就有了濃厚的隸書意味。昭王廿一年（前286年）所造的相邦冉（即魏冉）戈的廿（𠂔）字、币（𠂔）字，就是例子。

對於研究字體來說，70年代發現的秦簡比上述那些資料更可寶貴。秦簡上的文字不但數量多，而且都是直接用毛筆書寫的，由此可以看到當時日常使用的文字的真正面貌。仔細觀察睡虎地十一號墓秦簡上的文字，可以知道在這批竹簡抄寫的時代，隸書已經基本形成。

睡虎地秦簡上的文字顯然不是正規的篆文。從筆法上看，在簡文裏，正規篆書

的圓轉筆道多數已經分解或改變成方折、平直的筆畫。從字形上看，簡文裏很多字的寫法跟正規篆書顯然不同，跟西漢早期的隸書則已經毫無區別，或者只有很細小的區別了。例如（寫在下面括號裏的，是供參考的小篆字形）：

毋	州	立	老	羊	人	亦	者	明	皆	即	書
毋	州	立	老	羊	人	亦	者	明	皆	即	書
(毋)	(州)	(立)	(老)	(羊)	(人)	(亦)	(者)	(明)	(皆)	(即)	(書)

這些字形的形成，都跟使用方折、平直的筆法有關。在簡文字體方面還有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現象。簡文中左旁爲“水”之字常見，除了《語書》部分中“江陵”之“江”的“水”旁作“𠂆”外，其餘的全都作“𠂆”。

根據上述情況，可以把睡虎地秦簡所代表的字體看作由篆書俗體演變而成的一種新字體。秦簡出土後，很多人認爲簡文就是秦隸，這應該是可信的。

1975 年在湖北江陵鳳凰山七十號秦墓裏，發現了兩顆同文的玉印（引自吳白匄《從出土秦簡帛書看秦漢早期隸書》，《文物》1978 年 2 期）：



甲



乙

這兩顆印的字體顯然不同。甲印是正規篆書，乙印的作風則與秦簡相合。大概墓主人有意用當時並行的兩種字體各刻一印。這也可以說明秦簡的字體是跟篆書已經分家的一種新字體。

第二節已經說過，睡虎地十一號墓竹簡抄寫於戰國晚期至秦代初年；已發現的戰國晚期秦墓所出的簡牘，其字體也跟睡虎地十一號墓竹簡同類型。由此可知隸書在戰國晚期就已形成了。隸書顯然是在戰國時代秦國文字俗體的基礎上逐漸形成的，而不是秦始皇讓某一個人創造出來的。錢玄同在爲《章草考》所寫的序裏指出，康有爲、梁啟超都認爲隸書是自然形成的，不是個別人所創造的。他表示同意，並說隸書“當亦始於戰國之世，爲通俗所用”。唐蘭在《中國文字學》中指出，《漢書》等說秦代“由於官獄多事，才建隸書，這是倒果爲因，實際是民間已通行的書體，官獄事繁，就不得不採用罷了”（165 頁）。這些意見都是正確的。

在秦代，小篆是正規字體，隸書只是一種新興的輔助字體，社會地位比較低。

“隸書”這個名稱就表示了它的身份。有人說隸書由於“施之於徒隸”而得名(《漢書·藝文志》),有人說隸書由於秦官府“令隸人佐書”而得名(晉衛恆《四體書勢》,見《晉書·衛恆傳》)。總之,隸書是上層階級所看不起的。秦代統治者允許官府用隸書來處理日常事務,是迫於形勢不得不然,並不說明他們喜歡或重視這種字體。在比較莊重的場合,一般是不用隸書的。

但是,隸書書寫起來比小篆方便得多,要想長時間抑制它的發展,是不可能的。從秦代權量上的銘文,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隸書侵入小篆領域的情況。權量銘文的內容是統治者想傳之久遠的統一度量衡的詔書,按理當然應該用正規的小篆來銘刻。可是遺留下來的權量詔文却不乏刻得很草率的、作風接近隸書的例子。第二節裏已經說過,有些權量銘文中的“皆”、“明”、“者”等字的寫法,甚至跟當時的隸書全同。從總體上看,這種銘文還不能算隸書。因為在這些銘文裏,“灋”字所从的“水”旁像隸書那樣寫作三短橫的例子,連一個也沒有發現過。但是這種包含着很多隸書成分的詔書銘文,確實預示着小篆即將為隸書取代的命運。



秦詔版

在秦代，隸書在日常使用的文字裏已經成為主流，而且已經動搖了小篆作為正規字體的地位。到了西漢，距離秦王朝用小篆統一全國文字並沒有多久，隸書就成了正規字體。所以我們未嘗不可以說，秦王朝實際上是以隸書統一了全國文字。

睡虎地秦簡所代表的秦代隸書，還只是尚未完全成熟的隸書。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

首先，有不少字的寫法仍然近於正規篆書，例如：

木： 自： 行： 塞：

其次，有些字雖然已經有了跟成熟的隸書相同或相似的寫法，但同時仍然使用接近正規篆書的寫法，例如：

比： 比

之： 之

辵(偏旁)：    

偏旁“辵”的各種寫法，實際上反映了它們由篆到隸的演變過程。

上面指出的這兩種現象，在西漢早期的隸書裏仍可明顯看到，只不過在程度上逐漸有所減輕而已。為了跟成熟的隸書相區別，可以把秦和西漢早期的隸書合稱為早期隸書。

在居延、敦煌等地發現的武帝晚期以後漢簡上的隸書裏，明顯地接近篆書的字形就大大減少了。這標誌着隸書的趨於成熟。例如“斗”字，西漢早期簡帛一般作、等形，居延簡則作、、、等形。“自”字，西漢早期簡帛一般作、等形，居延簡一般作、等形。“它”字，西漢早期簡帛一般作、等形，居延簡一般作、等形，“地”、“池”等字所从的“它”並多簡化為，所以後來就變得跟“也”旁混而不分了（“地”、“池”、“施”等字本來都从“它”，“池”和“沱”是後來才分化成兩個字的。《說文》“地”、“施”等字从“也”聲，是篆形受隸書影響而誤之例）。“大”、“木”等字，在西漢早期既有作、等形的，也有作、等形的。在居延簡裏，前一種寫法似乎已經絕跡。

在西漢中期到東漢晚期，隸書字形仍有不少變化，如“其”字由、等形變為其，“五”字由、等形變為五等等，總之，變得跟後來的楷書越來越相近了。

在隸書字形演變的過程裏，新的字形出現之後，舊的字形往往遲遲不退出歷史舞臺。不但早期隸書裏有這種現象，就是在成熟的隸書裏也常常可以看到這種現象。例如在東漢晚期的碑刻上，“其”字既作其，也作、；“五”字既作，也作

ㄨ、ㄣ；“恭”、“慕”等字的“心”旁有ㄣ、ㄣ、ㄣ、ㄣ、ㄣ等多種寫法。又如“口”旁，早在秦代隸書裏就出現了少量作“口”的寫法，但是在西漢中晚期的漢簡上仍然習見作“口”的寫法（“如”、“知”等字的“口”旁往往作此形），甚至在東漢晚期的碑刻上，都還能看到一些這樣的寫法。

下面再談談漢代隸書在書體上的變化。

我們在東漢晚期那種書法工整的碑刻上所看到的隸字，結體一般都是扁方的，用筆也有一套成規。向右下方的斜筆幾乎都有捺腳，捺腳往往向上挑。有些較長的橫畫，收筆時也略向上挑，形成上仰的捺腳式的尾巴，先豎後橫的彎筆，收筆時多數上挑，而且幅度往往比較大。向左下方的斜筆（即撇），收筆時多數也略向上挑。收筆時上挑的橫畫，起筆時還往往有下垂的頓勢，整道筆畫略呈微波起伏之勢，較長的捺有時也有這種筆勢，如一、ㄣ。書法家用來形容隸書書法特點的“挑法”、“波勢”和“波磔”（磔指捺一類筆勢）等語，就是指這些筆法而言的。

上述隸書書體的特點，是有一個形成過程的。一般把具備這些特點的隸書稱為八分，八分形成之前的隸書稱為古隸。不過，“古隸”這個詞有歧義。它也可以用作跟楷書的別名——“今隸”相對的名稱。這種用法的“古隸”跟一般所說的隸書同義。為了避免誤解，最好不要使用“古隸”的這一意義。

“八分”這個名稱大概在漢魏之際就已經出現。當時一般人日常所用的隸書，大都是第一節提到過的新隸體，其面貌跟標準的隸書已有顯著區別，所以有必要為標準的隸書另起一個名字（看啓功《古代字體論稿》34頁，文物出版社，1979）。直到唐代，一般人還把當時通行的字體（即楷書）稱為隸書，把標準的隸書稱為八分。

關於八分得名的原因，古人的說法不一。有人認為是由於這種書體以“字方八分”為大小的標準；有人認為是由於這種書體字形較扁，筆畫向兩旁伸展，勢若“八”字分散；還有人假託蔡文姬之名，說這種書體“割程隸八分取二分，割李篆二分取八分”，所以稱為八分（看唐蘭《中國文字學》169—170頁）。最後一說顯然不足信。前二說究竟哪一說符合八分命名者的原意，也難以斷定。也有可能這些說法都是不正確的。

八分究竟是在什麼時候形成的呢？

發現漢簡之前，石刻文字幾乎是研究隸書的唯一資料。在已發現的漢代碑刻的隸書裏，八分書體的特色要到東漢中期以後才充分顯示出來，所以前人往往把八分形成的時代定得比較晚。後來的研究者有大量漢簡上的隸書作為依據，結論就跟前人大不相同了。

八分筆法的萌芽出現得很早。在拋棄了正規篆書的筆法之後,如果把字寫得很快,收筆時迅速提筆,橫畫和向下方的斜筆很容易出現尖端偏在上方的尾巴。把這種筆法稍加改造,用較慢的速度書寫,八分的挑法就形成了。魏建功早在40年代就認為八分的挑法是草書筆法規整化的產物(《草書在文字學上之新認識》,《輔仁學誌》十四卷一、二期合刊236—240頁)。這是很有見地的。

早在秦代的隸書裏,就可以看到少量帶捺腳的斜筆和略有挑法的橫畫。在西漢早期的隸書裏,這類筆法的使用有明顯的增加。例如在馬王堆三號墓出土的抄寫於西漢早期的那部分帛書上,就有一些風格跟八分頗為相近的字。江陵鳳凰山九號墓出土的漢文帝時木牘上的有些字,筆法也相當像八分。不過在西漢早期的隸書裏,豎長的字形和接近篆書的寫法還很常見,八分式的書法還遠沒有成熟。

在敦煌、居延等地發現的武帝晚期到宣帝時代的簡上,可以看到八分逐漸形成的過程。在敦煌簡裏,武帝天漢三年(前98年)簡和王國維考定為武帝太始三年(前94年)以前之物的“使莎車續相如”簡,其書體都屬於古隸;而太始三年簡的書體則已經跟八分沒有多大區別了。在居延簡裏,有不少武帝征和至昭帝始元年間的食簿殘簡,書體大都呈現從古隸向八分過渡的面貌。還有一件昭帝始元七年(前80年)的出入符,雖然寫得不算很工整,其書體却已經可以看作八分了。此外,居延簡裏還有一些書體很像八分的昭帝時代的簡,不一一列舉了。在宣帝時代的簡上,出現了相當標準的八分書,如居延的本始二年(前72年)水門燧長尹野簡和敦煌的五鳳元年(前57年)簡等。由此可見,至遲在昭宣之際,八分已經完全形成。按照這種看法,古隸大體上跟早期隸書相當,八分是成熟的隸書的標準書體。

西漢銅器上的隸書銘刻所反映的字體變化的情況,跟漢簡大體相合。西漢早期銅器上的隸書,跟同時期漢簡上的古隸同類型。由於古隸本由篆書俗體演變而成,二者的界限有時不易劃定。有些西漢早期銅器上的銘文,如雲陽鼎銘文(《漢金文錄》一·七上),有人認為是“書風比較灑脫,筆畫隨意不受方整小篆格局所囿”的篆書(《中國美術全集·書法篆刻編1》卷首《秦漢的書法藝術》28—29頁)。我們覺得還是看作古隸為妥。在從武帝到宣帝時代的銅器上,可以看到古隸演變為成熟的隸書的過程。不過宣帝以後銅器上的隸書,大都沒有把用毛筆書寫的八分的特色充分表示出來。例如宣帝時的陽泉使者舍熏鑪的銘文,從字的結體看跟八分相近,但筆畫沒有明顯的波磔。

標準的八分書寫起來是比較費事的。第一節裏已經說過,在八分形成以後,在



陽泉使者舍熏鑪銘文

書體上受八分影響不大、書寫起來比較方便的隸書，始終大量存在。近年來有人稱之為“通俗隸書”（參看村莊《漢代書法分期》和賴非、王思禮《漢代通俗隸書類型》等文，載《漢碑研究》，齊魯書社，1990），是比較恰當的。目前所能看到的宣帝以後的西漢隸書刻石，其書體大都可以歸入通俗隸書。時代較早的，如第二節提到過的地節二年巴州民楊量買山記和五鳳二年刻石，尤其是後者，作風跟古隸還很接近。王莽時的萊子侯刻石也是無波磔的通俗隸書，不過由於字形和筆法的變化，面貌跟古隸已經很不相同了。東漢早期的三老諱字忌日記的書體，似可看作介於通俗隸書與八分之間，或以為“是碑石中篆隸嬗變時期的面貌”（《中國美術全集·書法篆刻編1》圖版說明51頁），恐怕不大妥當。漢簡裏同樣存在通俗隸書。例如在宣帝時代的居延簡裏，就既可以看到八分，也可以看到通俗隸書以及介於通俗隸書與八分之間的書體。有些銅器和陶瓦上的隸書，也可以看作通俗隸書（上面提到的陽泉使者舍熏鑪銘似可看作介於通俗隸書與八分之間）。大約在東漢中期，從通俗隸書裏演變出了新隸體，為隸書向楷書過渡奠定了基礎。這方面的情況將在下一節裏介紹。

五、漢代的草書、新隸體和行書

（一）草書

“草”字在古代可以當粗糙、簡便講。草書之“草”大概就取這種意義。“草書”有廣狹二義。廣義的，不論時代，凡是寫得潦草的字都可以算。狹義的，即作為一種特定字體的草書，則是在漢代才形成的（啓功《古代字體論稿》38頁）。大約從東

晉時代開始，爲了跟當時的新體草書相區別，稱漢代的草書爲章草。新體草書相對而言稱爲今草。

早在秦國文字的俗體演變爲古隸和秦古隸繼續演變的過程裏，已經出現了一些跟後來的草書相似或相同的寫法。在上一節講秦簡古隸尚未完全成熟時所舉的字形實例裏，“之”字的第二種寫法以及“辵”旁的第三、四、五種寫法，都是富有草書意味的（成熟的隸書裏的“之”字和寫作𠂔的“辵”旁，就是由這種寫法通過類似漢字簡化中的“草書楷化”那樣的途徑演變而成的）。“辵”旁第四種寫法把“止”寫作𠂔。後來的草書裏的“止”旁，寫法與此相同。第二節提到過的睡虎地四號秦墓所出的木牘，寫得特別草率。“攻”字的“工”旁寫作𠂔，“從”、“徒”、“定”等字的“止”旁都寫作𠂔，“遺”字的“辵”旁竟簡化成𠂔。到了漢代，這類草率寫法繼續被使用，此外還出現了一些新的草率寫法。草書就是在這些新舊草率寫法的基礎上形成的。

在使用古隸的簡牘裏，可以看到整簡、整牘的字都寫得比較草率的例子，如上面所說的睡虎地四號秦墓木牘，又如臨沂銀雀山一號漢墓竹簡中的一部分古書抄本等。在這些簡牘上，雖然有一些跟後來的草書寫法相同的偏旁；但是絕大部分字，除了寫得草率之外，跟一般的古隸並無多大區別。所以這些簡牘的字體只能看作草率的隸書，不能看作狹義的草書。

古代有稱爲“籀”的書體。《玉篇·辵部》：“籀，土洽切（今音 zhá），行書貌。”《廣韻·洽韻》：“籀，行書。”《集韻·洽韻》：“籀，行書也。秦使徒隸助官書艸籀，以爲行事，謂艸行之間，取其疾速，不留意楷法也。从筆，从辵。”據《集韻》，這種書體在秦代就已出現。上述那種草率的隸書，也許就可以稱爲籀書。

從居延簡中有明確紀年的那些簡來看，武帝晚期和昭帝時代的簡上只有草率的隸書；宣帝簡中如登記號爲 271·17 的神爵二年（前 60 年）簡，元帝簡中如登記號爲 562·3A 的永光元年（前 43 年）簡，尤其是後者，其字體已有很濃厚的草書意味；成帝簡中如 284·8A 陽朔元年（前 24 年）簡和 170·5A 元延二年（前 11 年）簡，其字體就已經是相當純粹的草書了。

由此推測，草書的形成至遲不會晚於元、成之際，很可能在宣、元時代就已經形成了。

唐張懷瓘《書斷·上》“章草”條引南朝宋代王愔的話說：“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書（粗）書之，漢俗簡墮，漸以行之。”（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卷七）王氏把章草的出現跟急就章聯繫起來，是不可信的。“急就章”是史游所編字書《急



居延漢草書簡

就篇》的俗名。《急就篇》分三十一章(每章六十三字),所以人們或稱之為“急就章”。這個名稱在漢代似乎還沒有出現。魏晉時代的書法家喜歡用章草寫《急就篇》,但是已發現的敦煌簡和居延簡中的《急就篇》漢代抄本,却都是用隸書寫的。所以章草決不會是史游作《急就篇》時所創造的字體。為編一種書而創造一種字體,實際上也是不可能有的事(參看唐蘭《中國文字學》172頁)。不過史游的時代倒恰好跟我們所推測的草書形成的時代大致相合。漢末的蔡邕、趙壹都說草書作於秦代,似無確據(蔡說見《書斷·上》“草書”條所引梁武帝《草書狀》。趙說見其所作《非草書》,收入《法書要錄》卷一)。過去有很多人認為草書起於東漢,則又失之過晚。

草書的形成比八分稍晚一些。不過,作為草書形成基礎的隸書草體(包括草體字、簡體字),有很大一部分在古隸階段就已經存在。所以也可以說,八分和章草是分別由古隸的正體和俗體發展而成的。這跟戰國時代秦國篆書的正體演變為小篆,俗體發展成隸書的情況很相似(參看拙文《從馬王堆一號漢墓“遣冊”談關於古隸的一些問題》,《考古》1974年1期)。

草書字形不出自成熟的隸書而出自古隸的例子是常見的,不但是偏旁的寫法,就是整字的寫法也往往由古隸變來。例如:“夫”的草書  當由古隸草體  變來,“天”的草書  當由古隸草體  變來,“可”的草書  當由古隸草體  變來,“鹿”的草書  當由古隸  變來(參看上引文)。古隸的形成以篆書俗體為基礎,二者的字形往往很相近。過去的學者如清人孫星衍等,有草書字形出自小篆之說

(見孫氏《急就章考異》)。應該承認他們已經接觸到了事情的真相。

草書是輔助隸書的一種簡便字體，主要用於起草文稿和通信。西漢時代一般人使用的隸書俗體裏所包含的草書因素，比戰國時代秦國一般人使用的篆書俗體裏所包含的隸書因素要少得多。所以草書的形成不如隸書自然，群眾基礎不如隸書廣泛。在草書形成後的西漢簡裏，純粹的草書簡並不多見。

敦煌、居延等地出土的新莽簡和東漢簡上所見的草書，比西漢簡的草書成熟。東漢簡中草書簡所佔的比重，也明顯地升高了。這跟古書所反映的、草書在東漢時代比較流行的情況相合。

漢代草書的字形，有一些是先後有變化的。如“受”字草書，西漢簡多作𠂔(由古隸俗體𠂔简化。隸書“爪”旁有時變作“日”，如“爭”字往往作𠂔)，東漢簡則作𠂔、𠂔等形。傳世三國吳皇象所書《急就章》的摹刻本，“受”字作𠂔，跟東漢簡接近。

草書由於寫得快，很自然地改變了隸書的筆法。例如：隸書較長的撇，尾部往往比較粗；草書的撇，尾部一般是尖的。隸書基本上只用彎筆而不用鉤，彎一般轉得很慢；草書轉彎轉得很快，把有些轉折後的部分較短的彎筆變成了帶鉤的筆畫；如隸書𠂔(𠂔)、𠂔(𠂔)等偏旁裏的𠂔，草書大都變作𠂔，接近於後來楷書的硬鉤。草書橫畫用挑法比八分少，點、捺等筆畫的寫法也都跟隸書有差別。草書除了往往劇烈簡化隸書字形外，還大量使用連筆，有的字甚至可以用一筆寫成，如“天”或作𠂔、“門”或作𠂔。不過跟今草比起來，章草使用的連筆還算是少的。章草每個字自成起訖，跟今草字與字時相鉤連的情況也不一樣。

關於章草命名的理由，過去有幾種說法。除了前面已經提到過的把章草跟《急就章》聯繫起來的說法之外，還有因東漢章帝提倡而得名、因可以施於章奏而得名等說法。這些說法都很難令人相信。“章”字有條理、法則等意義，近人多以為章草由於書法比今草規矩而得名。

(二) 新隸體和行書

大約在東漢中期，通俗隸書在草書的影響下演變出了一種比較有特色的俗體。這種俗體書寫起來比較方便，由於溶入了草書筆法，如較多地使用尖撇和接近後來楷書硬鉤的筆法，呈現出由隸書向楷書過渡的面貌。在東漢中晚期的木簡和鎮墓陶瓶上都可以看到這種字體。其中如敦煌發現的永和二年(137年)簡和傳世的熹平元年(172年)陶瓶，是經常為講字體的人所引用的例子。前者的字體的風格，羅振玉《流沙墜簡》考釋評為“楷七而隸三”。有些東漢晚期的墓壁題字和墓磚上的



熹平元年陶瓶

文字，如和林格爾護烏桓校尉墓的“莫府門”“護烏桓校尉莫府穀倉”等題字，第二節裏提到過的亳州市曹氏宗族墓的有些墓磚刻文和滄縣北塔村墓磚上的朱書等，也是屬於這種字體的。爲了區別於八分和其他的通俗隸書，可以把這種字體稱爲新隸體（參看啓功《古代字體論稿》34 頁）。有的東漢後期刻石，如永興二年（154 年）薊他君石祠堂石柱題記的字體，似乎也可歸入此類。不過由於是刻的而不是用筆寫的，新隸體的特點不像上舉那些例子顯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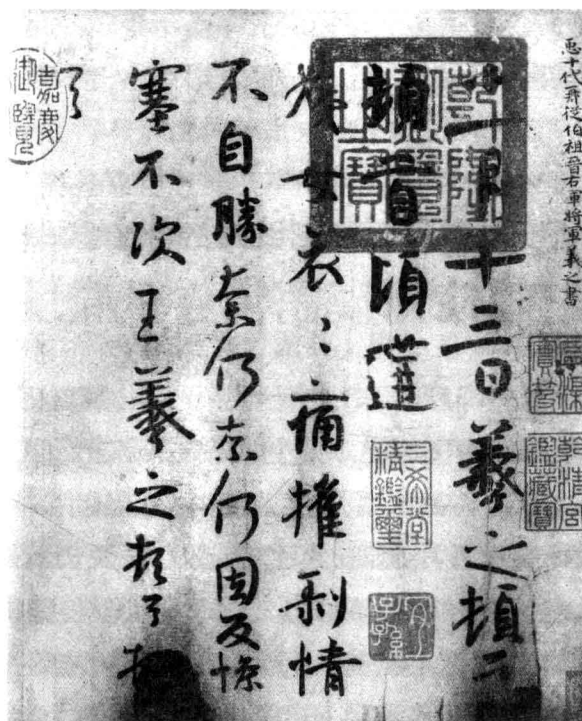
在東漢後期，雖然士大夫們相競用工整的八分書勒石刻碑，一般人日常所用的字體，却大都已經是新隸體了。

在東漢晚期還出現了一種新字體，就是行書。據說行書是桓、靈時代的劉德昇所創造的，他寫的行書“雖以草創，亦豐妍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張懷瓘《書斷·中》，《法書要錄》卷八）。

我們所熟悉的行書是介於楷書跟今草之間的一種字體。在劉德昇的時代，楷書和今草還未形成，他所寫的行書的面貌，究竟是怎樣的呢？

今傳王羲之的行書幾乎都是介於楷書跟今草之間的那種行書，只有姨母帖（也稱十一月十三日帖）比較古拙。在魏晉時代的樓蘭遺址出土的簡紙文字裏，也有一些跟姨母帖風格相近的書跡，如魏景元四年（263 年）簡以及時代不晚於東晉初期的、署名濟逞的兩封信和署名超濟的一封信。這應該就是早期的行書（參看拙著《文字學概要》90—91 頁）。劉德昇所寫的行書，其面貌應該跟它們相近。

在亳州市曹氏宗族墓的少數墓磚上，也可以看到風格跟上舉早期行書相似的



王羲之·姨母帖

字。其時代大致與劉德昇相當。可見行書的形成也是有一定群眾基礎的，並非劉氏一人的功勞。

行書可以認為是在新隸體的基礎上，進一步溶入草書筆法，並從筆法和字的結體上再加美化而形成的一種字體。寫得比較規整的早期行書，如前面提到過的樓蘭出土的超濟的書信，跟我們所能看到的最早楷書——鍾繇的宣示表等帖，面貌相當接近。如果把這種早期行書寫得端莊一些，把在早期行書裏已經出現的橫劃收筆用頓勢的筆法普遍化，再增加一些捺筆和硬鉤的使用，就會形成宣示表那種字體。所以我們在第一節裏，說隸書是通過新隸體和行書而演變為楷書的。隨着楷書的形成和發展，漢字字體的演變就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原載《中國書法全集》卷7（榮寶齋，1993），其中部分章節曾以《安國舊藏〈秦泰山刻石〉宋拓本真偽辨》為題載於《中國書法》1992年3期，今據前者收入。

大學生應該注意培養 正確使用漢語漢字的能力

什麼叫正確使用漢語、漢字的能力呢？如果寫出字來能讓人看得清，並且基本上沒有錯別字，寫出文章來能讓人看懂，並且基本上沒有用詞和語法等方面的錯誤，就可以算是具備了正確使用漢語、漢字的能力。（我們所說的“文章”是廣義的，包括各種書面語言。平時說話，不像寫文章那樣可以仔細推敲，所以不能像對寫文章那樣要求。如果說出話來也基本上沒有用詞和語法等方面的錯誤，當然更好。）一個大學生的語文水平理應達到上述的標準。

這樣的標準看起來似乎不高，實際上却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有可能達到。例如要做到不寫錯別字就很不容易。郭沫若是舉世聞名的古文字學家，可是在根據他的手抄清稿影印的書裏，却可以看到把“冢”（音 zhǒng）寫作“冡”（“蒙”字的聲旁，與“蒙”同音）那樣的錯誤。我忝為文字學教師，也免不了寫錯別字。我曾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把“偶爾”錯寫作“偶而”，此外還寫過一些別的錯別字。作為一個學生，應該怎樣對待學者和教師的這類失誤呢？我們不能把他們的失誤用作放鬆對自己的要求的借口，而應該通過他們的失誤深刻認識培養語文使用能力這項任務的艱巨性，對自己提出嚴格的要求。事實上，我們只有對自己提出比前面所說的標準更高的要求，才有可能達到這個標準。仍以錯別字為例來說，只有下定不寫一個錯別字的決心，才有可能做到基本上不寫錯別字。如果抱有寫幾個錯別字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態度，其結果必然是筆下常有錯別字。

現在的大學生使用漢語、漢字的實際情況是怎樣的呢？實在不容樂觀。字寫得不錯、錯別字很少、文章也寫得頗為通順的學生不是沒有，但是在全部學生中所佔的比例實在太小了。上我的文字學課的，是北大中文系二年級（不包括文學專業）的學生。根據“文化大革命”後十多年來改這門課的作業和試卷的經驗來看，上面所說的那種學生在全班學生中所佔的比例通常低於十分之二。

不少學生所寫的字不但不美觀，而且很難認。如果我改的不是自己所講的課

的作業和試卷,也就是說,如果不是事先知道學生在作業和試卷裏要說哪些話,有些字恐怕猜一輩子也猜不出來。作業和試卷上所署的姓名裏的有些字,如果沒有學生名單可以對照,也是沒有辦法辨認出來的。難認的字除了不規範的甚至是個人自造的簡體字外,大都是寫得過於潦草的字。有些人的楷書水平還沒有超過一般的小學生,寫起字來却往往“龍飛鳳舞”,草得要命,可又不合草書的規範。別人看到他們的字就頭痛,他們却“自我感覺良好”,認為自己的“書法”比那些規規矩矩寫字的同學高明得多。這實在有些可悲。

在舊社會裏,一般知識分子要想找到工作,最起碼的條件就是“字要拿得出去”。如果字寫得歪歪扭扭,難看難認,就沒有人會雇用他。解放以後,學生一畢業就有鐵飯碗,而且字的好壞通常跟工作崗位的好壞和升遷的遲速沒有關係。因此寫字訓練就越來越不受重視了。近年來,這方面的情況正在改變。1988年北大中文系分配畢業生的時候,勞動部來要人。介紹給他們的學生中,有一位學習成績和平時的表現都很好,但是勞動部派來的同志由於他的字寫得太壞沒有要他。據北大校刊記者報道,在北大89屆畢業生供需見面交流會上,“首鋼一位同志說:我們一看有些學生的字,就會決定不要”。同學們應該重視這些信息。

從我改過的作業和試卷來看,錯別字和用詞、語法等方面的問題也是相當嚴重的。有些小學生都不應該寫的錯別字,在某些大學生的筆下却時常出現。在全班範圍內找不出一份沒有錯別字的作業或試卷的情況並不罕見。沒有用詞、語法等方面的錯誤的作業和試卷,甚至更為難找。

在北大校刊發表的有些文章裏和校園的有些招貼上,也能看到不少錯別字和用詞、語法等方面的問題。下面隨便舉些例子。

先舉錯別字的例子。1988年12月14日北大校刊第3版上的《“夢巢”主人對你說》把“奄奄一息”的“奄”寫為“淹”。同版的《叫賣聲中的隨想》把“裨益”寫為“稗益”。第4版上的《花生米》把“媒妁”寫為“媒約”,把“獨當一面”的“當”寫為“擋”。1989年1月6日第3版的《臨別雜感》把“宣泄”寫為“渲泄”。第2版的一個標題把“摯誠”寫為“挈誠”(上舉例子中,有的也許是排印之誤)。在北大校園的招貼上,“啓事”幾乎全都錯寫作“啓示”,其他的同音錯別字和寫錯偏旁或筆畫的字也都不少。1989年1月,北大團委用校園裏的宣傳欄辦了一個攝影作品展。在為照片作配的小詩裏,出現了不少錯別字,如“慕(驀)然”、“萎(委)棄”、“汁葉(液?)”、“頂(鼎)立”、“高距(踞)”等。

再談談用詞和語法等方面的問題。先從上面提到過的幾篇校刊上的文章裏找

些例子。《“夢巢”主人對你說》裏有“香茗裊裊”的話。香氣可以用“裊裊”來形容，香茗却不能用“裊裊”來形容。如果把“香茗”改作“茗香”，就沒有問題了。同一篇文章說：“重複的舉動和話語，雖說平凡單調，但正是這簡單的體力技能培養，嘗盡酸甜苦辣後，始有靈魂上的震動和思想上的飛躍。”這句話也有問題。“培養”怎麼能作“嘗盡酸甜苦辣……”的主語呢？如果不想作大的改動的話，至少應該在“正是”之後加上“通過”或意義與之相近的詞。《叫賣聲中的隨想》裏有“樂得於幹小商小販”的話。我們可以說“樂得”怎樣做、“樂於”怎樣做，可是“樂得於……”這種說法却是不能成立的。從上下文看，上引那句話裏的“得”字應該刪去。在《花生米》裏不妥的語句更多，如“一個媒約（妁）之言的配偶”、“實在給人笑意”、“越來越多的人爲了功利的目的去摻入一種信仰”等。1988年12月28日北大校刊第1版的《理財的“洞天”》裏，出現了“洞天府地”、“分輕重之緩急，較成敗之利鈍，防近水之樓臺”等有問題的詞語。使用語言要尊重大家的習慣。不能因爲“天地”、“洞天”、“洞府”等說法都能成立，就造出“洞天府地”這種難以爲人們所接受的詞語來。在“近水樓臺”中間嵌入一個“之”字，雖然沒有必要，在語法上還是可以的。“輕重”與“緩急”，“成敗”與“利鈍”，原來都是並列關係，怎麼能在中間加“之”字呢？在上面提到過的爲照片作配的詩裏，有一首有這樣一句：“撥開你湍急的漩流和潦潑的水響”。“潦潑”應是“撩撥”的錯別字（“潦潑”的說法根本不存在）。這同時又是用詞不當的一個例子。《現代漢語詞典》對“撩撥”的解釋是“挑逗；招惹”。作者原來想表示的顯然是這個詞所沒有的意思。1988年12月14日北大校刊第4版的《散文詩一首》裏有這樣一句：“當暮色的煙雲輕吻那一條晚斂的夕陽，我再也走不上歸途。”《現代漢語詞典》對“條”字的解釋是“極快地”。“一條晚斂的夕陽”究竟是什麼意思，我百思不得其解。

一般說，中文系學生的語文水平應該比其他系高。在校刊上發表文章的和爲攝影作品配詩的，更不用說大都是被公認爲語文水平較高的學生。他們在使用漢語、漢字方面都還有不少問題，其他系學生的情況就可想而知了。

文章不通、錯別字多的人，閱讀能力也往往比較低。這兩方面是相互影響的。廣義地說，“使用漢語、漢字的能力”可以包括閱讀能力。語文使用能力低，無疑會嚴重影響學習。這對於文科學生來說是不言而喻的。對於理工科學生來說，問題同樣嚴重。曾經看到一位從事理工高校寫作課教學的老師所寫的材料，其中有這樣一段話：“當前，相當多的普通理工高校學生的語文能力不強，影響了專業課的學習。專業課教師往往要‘講書’‘講題’，否則學生就看不懂，做不出。”聽北大理科

的老師說,在一些理科學生裏,確實存在由於語文水平低而讀不懂專業書的情況。這樣的學生大概也不會有把學到的知識正確地、清晰地表達出來的能力。

走出校門以後,語文使用能力低還會造成更嚴重的後果,對工作和個人前途都會有影響。尤其需要著重指出的是下述情況。有很多大學生畢業後將走上教師、編輯等崗位。有不少人將要發表文章,著書立說。他們在使用漢語、漢字方面的錯誤,將會產生極其廣泛的影響。在目前的出版物上,錯別字和用詞、語法等方面的錯誤是相當常見的。我們當教師的人也往往過多地犯這類錯誤。這些顯然是很多大學生的語文使用能力有問題的重要原因。今天的大學、中學教師絕大多數是過去的大學生。為出版物撰稿的和編輯出版物的,大部分也是過去的大學生。這就是說,在使用漢語、漢字方面,一部分過去的大學生給現在的大學生以壞的影響,一部分現在的大學生將來又會給將來的大學生以壞的影響。這是一個惡性循環。我們應該盡力來打破這個循環。

要想普遍提高大學生使用漢語、漢字的能力,必須學校、教師、學生等有關方面共同努力,而且必須改進中、小學的語文教學。由於這篇短文的對象是大學生,我們只準備向他們提出一些供參考的意見。

正確使用漢語、漢字的能力不是短時間內所能獲得的。除了充分重視寫作課和其他有關課程外,還需要在課外盡可能多讀多寫,通過實踐不斷提高自己的語文使用能力。

對所讀的東西應該有所選擇。要多讀真正的名家的作品。即使是為了消遣,也要選擇語文水平較高的作品,不要花大量寶貴的時間去看那些烏七八糟的、充滿語文方面的錯誤的通俗書刊。對於大學生來說,多讀這些東西,不但不能提高甚至還會降低自己的語文使用能力。語文方面的錯誤並不是通俗書刊才有。就目前的情況來看,就是在國家級的大報上,這方面的錯誤也是時常出現的。所以我們不論讀什麼,都要提高警惕,以免受這類錯誤的影響。

此外,還應該注意不要受目前一些不好的文風的影響。有些人為了使自己的文章顯得有“科學性”,有“水平”,喜歡用比較複雜的說法表達本來用很簡單的話就可以說清楚的意思。例如他們不願說“期望太高”,而一定要說“期望值定得太高”。這是完全沒有必要的。更糟糕的是有些人為了顯示“學問”,甚至濫用一些自己也不確切瞭解的時髦詞語或古詞語。很多用詞不當的情況就是這樣產生的。下面舉一個例子。最近在一篇書評裏讀到這樣兩句話:“他的《‘土地廟’隨筆》導經(“涇”字之誤)分渭,披榛採蘭;但惜墨成癖,有開物成務的學風。他遜志時敏,

擅長‘大題小作’，堅持言有盡而意無窮。”“開物成務”和“遜志時敏”都是古書裏的話，大多數讀者大概不會理解它們的意義。不過這是翻一下詞典就能解決的問題。《辭海》對“開物成務”的解釋是“通曉萬物之理，按理辦事，得到成功”，對“遜志時敏”的解釋是“謂謙虛好學，時自策勵”。“有開物成務的學風”跟“惜墨成癖”，“遜志時敏”跟“擅長‘大題小作’”，彼此間有什麼必然的聯繫呢？把它們用在這兩個句子裏是很不合適的。其實，這種大多數讀者所不理解的詞語，如果不是無可替代，非用不可，即使意義完全合適，也不應該使用。寫文章跟進行科學研究一樣，需要的是老老實實的態度，來不得半點虛假。

要想切實提高自己使用漢語、漢字的能力，還需要有一絲不苟和不怕麻煩的精神。例如：讀報時碰到一個生字，寫文章時想到一個對它的寫法沒有把握的字，就應該去翻字典、詞典（如《新華字典》、《現代漢語詞典》等），必要時還應該去請教師友。對字的讀音也要注意。現在很多教師（包括我自己）、廣播員和演員都時常把字念錯，學生當然會受影響。要減少讀音錯誤，最好的辦法就是勤翻字典、詞典。碰到用詞、語法等方面的問題，也要勤翻字典、詞典和有關參考書，反復思考，必要時也要請教師友，以求得解決。寫出文章，要多看幾遍，多改幾遍，對每一個字、每一個標點都不要放過。這樣做，開始的時候一定感到很苦，習慣以後也就不以為苦了。如果能持之以恆，一定會大有收獲。

原載《學者論大學生的知識結構和智能》（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題為《注意培養正確使用漢語漢字的能力》），又載《裘錫圭學術文化隨筆》，今據後者收入。

一句至少被誤解了一千七百多年的 常用的話——“予取予求”

《左傳·僖公七年》：

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汝），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

杜預解釋“予取予求，不女疵瑕”句說：

從我取，從我求，我不以女為罪釁。

杜說一千七百多年來一直為人們所信從，“予取予求”成為表示任意索取、貪得無厭一類意思的常用成語。《現代漢語詞典》“予取予求”條說：

原指從我這裏取，從我這裏求（財物）（見於《左傳》僖公七年），後代用來指任意索取。

這可以代表今人對“予取予求”的理解。

其實，杜預的解釋是有問題的，把“予取予求”理解為“從我取，從我求”，跟古漢語一般句法不合，而且這樣理解，下文“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就顯得很突兀，文氣難接。

章炳麟《春秋左傳讀》“將求多於女”條說：

僖七年：“後之人將求多於女。”杜預注：“求多，以禮義大望責之。”此以“大”訓“多”，“望責”訓“求”。後之人將望責大於女，恐於詞未洽。然則“多”不當作本字讀，乃借為“疵”，為“祇”。《詩》“祇自疵兮”（引者按：見《小雅·無將大車》，《毛傳》訓“疵”為“病”）、“俾我祇也”（見《小雅·何人斯》，《毛傳》訓“祇”為“病”）。是“多”、“氏”聲通，如“娣”字或作“妣”也。此與上“不女疵瑕也”對。求多於女，猶言吹毛求疵耳。（《章太炎全集（二）》245頁，上

海人民出版社,1982。原書“疢”、“祇”、“妣”諸字字形有誤,今改正。)

杜氏對“求多於女”的解釋,確如章氏所批評的,“恐於詞未洽”。但是章氏“多”通“疢”之說,顯然求之過深,同樣難以使人接受。此文的“求多”,無疑跟《禮記·曲禮上》“分毋求多”的“求多”義近。“求多於女”就是對你有很多要求的意思。杜氏、章氏所以要對這樣一句本來很好懂的話作迂曲的解釋,就是由於按照正常的解釋,這句話的意思跟“從我取從我求”的意思連貫不起來。

我們認為“予取予求”應該解釋為“我只取我所要求的”。《左傳·昭公四年》:“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左傳·哀公二十八年》記盧蒲癸之語曰:“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予求”與“吾所求”同義,“予取予求”與“余取所求”同義。古書屢言“其求”,如《左傳·昭公二十二年》“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昭公二十二年》“其求不多”等。“其求”即“其所求”,與“予求”即“予所求”同例。

按照我們的解釋,“予取予求,不女疵瑕”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在文義上就十分連貫了。楚文王採取“無求備於一人”(《論語·微子》)的態度,對申侯的缺點能夠原諒。他知道後來的楚王一定會對申侯有多方面的要求,不會原諒他的缺點,所以要他離開楚國。

由此可見杜預和後人對“予取予求”的理解跟原意正好相反。語文要服從社會習慣。作者指出人們對“予取予求”的原意作了錯誤的理解,毫無要大家改變這一成語的用法的意思。不過我們應該明確認識到,這一成語跟“出爾反爾”、“每況愈下”等成語相似,其意義跟出典中的原義是完全不同的。

由“予取予求”還演化出了“予取予攜”、“予取予奪”等說法。這些可以說是歧中之歧。

原載《古漢語研究》1993年2期,又載《裘錫圭自選集》、《裘錫圭學術文化隨筆》,今據《裘錫圭學術文化隨筆》收入。

究竟是不是文字

——談談我國新石器時代使用的符號

山東大學歷史系考古實習隊在丁公遺址 1235 號龍山文化灰坑中，發現了一片刻有十一個符號的陶盤底部殘片。這是很重要的發現。關於這些符號，至少有以下幾個問題需要討論：它們是不是文字？如果是文字，處於何種發展階段？跟殷墟甲骨文等早期古漢字有沒有關係？下面簡單談一下不成熟的看法。

這些符號顯然不是圖繪，也不是無目的的任意刻劃的產物。它們大概也不會是跟語言毫無關係的一種表意符號，不然為什麼會有十一個符號排列有序地刻在一起呢？另一方面，從遺物的時代和符號的形式來看，它們也不可能是成熟的文字。所以它們大概是一種原始文字。不過我認為這並不是一種處於向成熟的文字發展的正常過程中的原始文字，而是一種走入歧途的原始文字。

發掘簡報指出，這些“文字”“字體的顯著特徵是多為連筆字，與後代的行草相類”。這是很正確的。龍山文化的先民在創造文字的時候，大概不會走拼音的道路。而在漢字這一類意音文字的範圍內，如果想使一種原始文字逐漸發展成為能為社會所接受的成熟的文字體系，決不能讓字形變得如此草率難辨。簡報認為這次發現的“文字”所以“和通常見到的甲骨文差別較大”，是由於“兩者字體有別”。這種“文字”類似後世行草，“甲骨文是宮廷占卜文字，書寫比較正規，類似於楷書”。其實在商代後期，相當於後世楷書的是金文，甲骨文則是一種簡俗字體（參看拙著《文字學概要》42—44 頁，商務印書館，1988）。在商代還不可能出現類似後世行草的字體，更不用說在龍山文化時代了。

我認為只有在下面所說的情況下，才會出現丁公類型的“文字”：原始文字出現之後，由於社會或其他條件的限制，不能正常地向成熟的文字體系發展，只為極少數人所使用，並且只使用在一些較特殊的場合，成了一種行業“文字”或秘密“文字”。在這種情況下，“文字”符號完全有可能變得為一般人所難以辨識。這並不一定表現在草率上，也可以表現為符號之間區別不顯著等等。上面所說的這類原

始文字的出現,既可能是自發的,也可能是周圍已有文字的先進群體的影響所促成的。總之,具體情況大概是比較複雜的。

一看到丁公“文字”,我馬上想起了1936年西湖博物館在良渚發現的刻在一件橢圓形陶器口緣上的“黑陶文字”(何天行編《杭縣良渚鎮之石器與黑陶》6、8等頁)、1974年江西省博物館等在清江吳城商代遺址中發現的灰陶鉢和黃陶盂底部的刻文(江西省博物館等《江西清江吳城商代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75年7期56頁、圖版拾·1、2。參看唐蘭《關於江西吳城文化遺址與文字的初步探索》,同上75頁),以及1981年萊陽縣文物普查小組在縣城南面的前河前村發現的西周陶盃上的刻文(李步青、吳雲進《山東萊陽發現一件罕見的仿銅陶盃》,《文物》1987年10月80—81頁)。這些都有可能是走入歧途的原始文字。此外,湖南等地發現的東周時代的奇字矛、奇字戈上的“文字”,也有可能屬於這一類(參看湖南省博物館《長沙楚墓》,《考古學報》1959年1期圖版十一、十二。奇字戈發現較多,且有傳世品,出處不一一徵引了)。奇字戈上的“文字”顯然受了漢字的影響。

在這次發表的丁公“文字”中,除了簡報已經指出的第二行第一字,確實有些像甲骨文的夔字外,其餘的都不像甲骨文。第二行第一字跟“夔”的相似,可能是一種巧合。從目前已有的資料來看,無法斷定丁公“文字”跟包括甲骨文在內的早期古漢字有關。

原載《文物天地》1993年2期,又載《考古》1993年4期(作為《專家筆談丁公遺址出土陶文》的一部分)、《裘錫圭學術文化隨筆》(題為《筆談丁公遺址出土陶文》),今用原題,據《裘錫圭學術文化隨筆》收入。

讀《魏晉南北朝詞語例釋》

蔡鏡浩著的《魏晉南北朝詞語例釋》(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是一本相當不錯的書。此書收入了很多魏晉南北朝時代使用的詞語。作者對這些詞語大都作出了正確的解釋,還附帶糾正了二十四史中有關各史標點本等因不明當時語例而造成的不少標點錯誤,頗有參考價值。但是此書也有不足之處,下面談談我所看到的一些問題。

作者在前言中說:“在撰寫過程中還參考了前人及時賢的不少論著,因體例及篇幅的限制,未能逐條作說明……”。我們覺得對這樣一部專著來說,不逐條說明所參考的論著,恐怕不是妥當的辦法。這使讀者失去了進一步研究有關問題的綫索,並且使他們弄不清究竟哪些意見是作者自己的創見。

此書所釋的詞義有很多在魏晉之前就已使用。作者有時對這種情況作了說明,如“可憐”條說“‘憐’有愛義,自先秦即如此”(203頁);“去、舉〔三〕”條說“‘去’‘舉’之收藏義,先秦時即有”(271頁);“挺身”條說“‘挺身’一詞於漢代即有”(323頁)等等。但是在不少詞條裏,對這種情況却没有作說明。這會使缺乏經驗的讀者誤認為作者所釋的詞義到魏晉南北朝時代才出現。下面舉幾個例子。

“續紛”條釋曰:“糾纏扭鬪貌。”(19頁)按:《說文·三下·鬥部》:“鬪,鬪也。从鬥,賓省聲。”“鬪,鬪連結鬪紛相牽也。”“鬪”音紛,“鬪鬪”即“續紛”,前人早已指出。可見此詞的“糾纏扭鬪貌”這一意義至遲在漢代就已經使用了。

“不翅”條釋曰:“同‘不啻’。”(23頁)按:從語言的角度看,“不啻”本是先秦以來的常用語,不煩解釋。從用字習慣看,把“不啻”寫成“不翅”也是古已有之的,如《莊子·大宗師》“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

“常”字條釋曰:“與‘嘗’通,猶曾經之義。”(38頁)按:借“常”為“嘗”也是一種用字習慣,而且在《史記》、《漢書》中就有這種例子。如《史記·高祖本紀》、《漢書·高帝紀上》都有“高祖常(嘗)繇(徭)咸陽”之文;賈誼《過秦論》“嘗以什倍之地”句(見《新書·卷一·過秦上》),《史記·始皇本紀·贊》、《漢書·陳涉項籍

傳·贊》都引作“常以十倍之地”。

“遲、想遲”條釋曰：“猶盼望、想念。”（43 頁）按：“遲”在先秦時代就有“等待”義（音 zhì），“盼望、想念”是其引申義。《後漢書·章帝紀》建初五年詔：“朕思遲直士，側席異聞。”注：“遲猶希望也，音持二反。”可見至遲在漢代已有這種用法。

“容、容可”條釋曰：“容猶能够、可能。”（280 頁）按：“容”字此義在古漢語中極為常見，而且早在先秦時代就已使用，如《左傳·昭公元年》“五降之後，不容彈矣”。

有時，作者還由於沒有注意到所釋詞義的較古用例，而作出了不妥當的解釋。下面舉兩個比較典型的例子。

“不造、不遇”條釋曰：“‘不造’為不幸之義。‘造’本有幸運之義，如：‘及明帝龍飛，諸人皆為鬼矣。吾與足下，得蒙大造，親過夙眷，遇若代臣。’（《南齊書·張敬兒傳》）‘大造’即大幸，故‘不造’有不幸之義。”（28 頁）按：“不造”、“大造”都是早在先秦時代就有的古語。這種“造”字古人一般訓為“成”。《詩·周頌·閔予小子》：“閔予小子，遭家不造。”鄭玄箋：“閔，悼傷之言也。造猶成也。可悼傷乎我小子耳，遭武王崩，家道未成……”。《左傳·成公十三年》：“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杜預注：“造，成也。言晉有成功於秦。”作者所引的《張敬兒傳》的“得蒙大造”，意謂得蒙明帝的栽培造就，“大造”的用法與上引《左傳》相近。“造”字本無幸運之義。但是指自然的創造化育的“造化”一語，引申而有幸運之義，作者大概是因此而誤解“造”字之義的。把“不造”和“不遇”合為一條，也是不合適的。

“掘”字條釋曰：“猶禿、鈍。”（195 頁）條中對所引用例也都有解釋，現在把原文抄錄在下面：

又千歲燕，其窠戶北向，其色多白而尾掘，取陰乾，末服一頭五百歲。（《抱朴子·仙藥》）孫星衍校勘云：《御覽》九百八十八引“尾”下有“曲”字。繼昌、陳其榮《校勘記》云：“‘而尾掘’，《御覽》九百二十二作‘而尾屈’，九百八十六作‘而尾毛掘’，一本作‘而尾毛掘’。掘、屈皆與屈相當。”此說不妥，作“屈”、“曲”蓋不明“掘”有禿義而誤改。“尾掘”即尾禿。

行經鄧艾廟，令燒之……怒曰：“艾今在尚方磨鎧，十指垂掘，豈其為神？”（《太平廣記》卷三二〇引《幽明錄》）“十指垂掘”，即十指將禿，為磨鎧所致。

陽羨縣小吏吳龕，有主人在溪南。嘗以一日，乘掘頭舟過水。（《太平御覽》卷五二引《幽明錄》）“掘頭舟”指平頭之小舟。

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大明世，常用掘筆書，以此見容。（《南齊書·王僧虔傳》）“掘筆”，即秃筆。

掘尾狗子自發狂，當死未死嚙人傷。（梁釋寶志《識詩》）《隋書·五行志》亦載此詩，上句云“兀尾狗子始著狂”，“兀”猶秃也。此為“掘尾”即秃尾之明證。（196 頁）

今按：作者所釋的“掘”，其本字應作“屈”。《說文·八下·尾部》：“屈，無尾也。从尾，出聲。”段玉裁注：“《韓非子》曰：鳥有翩翩者，重首而屈尾。高注《淮南》云：屈讀如秋鷄無尾屈之屈。郭注《方言》‘隆屈’云：屈尾。《淮南》‘屈奇之服’許注云：屈，短也；奇，長也。凡短尾曰屈，《玉篇》巨律切，玄應書、《廣韻》衢勿切，今俗語尚如是。引伸為凡短之稱。山短高曰崛，其類也。今人屈伸字，古作誦申，不用屈字，此古今字之異也。鈍筆曰掘筆，短頭船曰擱頭，皆字之假借也。”段注所說的擱頭船跟作者所引的後一條《幽明錄》裏的掘頭舟是一回事。當無尾、短尾講的“屈”，與屈伸之“屈”不同音，而與“掘”字同音，所以古人又借“掘”字來表示這個詞。作者認為《抱朴子》“尾掘”之“掘”或作“屈”，“蓋不明‘掘’有秃義而誤改”。實際上，“掘”字所以“有秃義”，正是假借為“屈”的結果。音“掘”的“屈”在古書中還時常當“竭、盡”講。這一意義跟“屈”的無尾之義是相通的。作者所引的前一條《幽明錄》裏的“十指垂掘”的“掘”，似應訓為“盡”。作者把“十指垂掘”解釋為“十指將秃”，不大好理解。

此書中還有一些誤解所引古書文義的情況。例如：“登”字條引《三國志·魏志·少帝紀》“堯既聞舜而不登用……非急於用聖恤民之謂也”，解釋說：“‘不登用’即不立即任用。”（71 頁）按：“不登用”之“登”，應與《尚書·堯典》“疇咨若時登庸”及《史記·夏本紀》“舜登用”之“登”同義，當“陞、進”講。作者理解為“登時”之“登”，是錯誤的。“奠”字條引庾肩吾《歲盡應令》“聊開柏葉酒，試奠五辛盤”句，解釋說：“此謂試以佳肴裝盛於五辛盤。”（74 頁）按：“五辛”指蔥、韭等五種有辛味的蔬菜。古人元旦設五辛盤，見《荆楚歲時記》等書。這跟裝盛佳肴毫無關係。“間”字條②謂“間”有“後面”之義，引《世說新語》注所引《文章志》“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為例（164 頁）。按：此例上文有“舉目徧歷溫左右衛士”語，“壁間”顯然不是指壁後而言的。“看〔一〕”條第①義為“測試”，第②義為語助詞（199—200 頁）。但是在第②義的用例中，《齊民要術》的“候看”、“嗅看”、“嘗看”，《百喻經》的“摸看”和《洛陽伽藍記》的“探看”，恐怕還是看作第①義的用例為妥。類似的用例與義項不相應的例子還有一些，不列舉了。

此書講同音通假時，有一些不大妥當的說法。“頓伏”條①釋曰：“猶顛仆，爲跌倒在地之義。‘頓’、‘顛’音近，‘伏’‘仆’古音同。”（88 頁）按：“伏”是並母（後爲奉母）屋韻字，“仆”是滂母屋韻字，中古音並不全同。“伏”在上古屬職部，“仆”在上古屬屋部，連韻也不同。“忽”字條①釋曰：“猶假使。當爲‘或’之同音假借。”（143 頁）按：“忽”、“或”二字上古、中古都不同音，古書中也沒有通假之例。“極”字條釋曰：“爲疲倦之義。‘極’當爲‘𩇛’的借字。……王念孫《廣雅疏證》卷一：‘窮、極、倦、𩇛，一聲之轉也。’”（153 頁）按：“一聲之轉”跟通假是兩回事。王念孫並沒有“極”是“𩇛”的借字的意思，“𩇛”屬藥韻，“極”屬職韻，古音並不很相近。“清閒”條說“‘清閒’通‘清言’，即閒談之義”（265 頁），也不妥當。閒談應是“清閒”的引申義。古書中並無當言語講的“言”與“閒”通用之例。

目錄部分的注音也有一些錯誤，如當“收藏”講的“去”應讀爲“弃”（jǔ），誤注爲 qù（8 頁），通“殺”的“殺”應讀 shài，誤注爲 shā（8 頁），當“多餘”講的“長”應讀 zhàng，誤注爲 zhǎng（12 頁）。

此書中引文的標點也偶有可商之處，如 24 頁“……因語曰：‘梁國葛龔，先善爲記文，自可寫用，不煩更作。’”“龔”字後逗號應移至“先”字後。“先”爲“先生”省稱。《史記·鼂錯傳》“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先”字用法與此同。又如 291 頁“彼設未辦，而日過中時不應食，故吾退耳”，“中”字後宜加逗。古人稱中午爲日中，“日過中”意謂時間已過中午。

以上意見不一定都對，歡迎此書作者和讀者指正。

原載《文教資料》1993 年 6 期，又載《裘錫圭學術文化隨筆》，今據後者收入。

不要以不誤爲誤

——語文瑣議之一

近年來，社會上使用漢語、漢字的情況很令人擔憂。且不談文學語言的粗俗化和學術語言“以艱深文淺陋，以‘摩登’文淺陋”等不良傾向（引號中語見季羨林先生發表在1995年8月9日《光明日報》第11版上的《我眼中的張中行》），光是一般的語文錯誤就够使人觸目驚心的了。在書報和其他各種印刷品、電視屏幕、影劇院的字幕、課堂的黑板以及馬路上的招牌和廣告上，都時常能看到錯別字和不通的語句。播音員、節目主持人、演員和教師們念錯字音，也早已成爲司空見慣的事情。針對這種情況，不少報紙開闢了指摘語文錯誤的專欄，有些報刊還發表了這方面的文章。這種糾正語文錯誤的工作，今後無疑應該用更大的力量進行下去。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那些專欄和文章認爲是語文錯誤的例子，有一些（數量當然不多）實際上並無問題，而批評者的正面意見倒往往是錯的；還有一些，究竟是不是錯誤還很難說，批評者斷然斥之爲誤，也是不妥當的。這兩種情況的“糾誤”不但不能起正面的作用，反而會“添亂”。下面舉出一些這方面的例子，略加說明，供關心語文糾誤工作的讀者參考。

先從關於錯別字的問題談起。

1984年6月11日《北京晚報》第2版“語言醫生”欄，發表了題爲《“商榷”還是“商推”》的短文。此文認爲根據“榷”“推”二字的意義看，“商榷”應是“商推”的誤寫，並要求出版部門今後“再莫將‘商推’印成‘商榷’”。

我們知道，“榷”“推”二字很早就可以通用，“商榷”和“商推”這兩種寫法在古書裏都很常見，並不存在誰是誰非的問題（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認爲“大榷”、“揚榷”、“辜榷”之“榷”——引者按：“商榷”之“榷”亦屬此類——其義都由“榷”字本義引申，“不當从手”。此說未免拘泥。值得注意的是，段氏之見正與上引短文相反）。但是1955年發佈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已將“推”當作“榷”的異體字加以廢除。所以《現代漢語詞典》（下文簡稱“現漢”）沒有列“推”爲字頭，只把它當

作“榷”字“商討”一義的異體字放在字頭之後的括號裏。上引那篇短文要求大家拋棄合乎規範的“商榷”的寫法，而去用不規範的“商推”的寫法，是毫無道理的。

《新華字典》由於“推”字尚有“榷”字所無的“敲打”一義，仍將它列為字頭。這是可以的。但是 1990 年重排本不加說明地為“推”字增加了以“商推”為用例的“商討”一義，這就違反了《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跟同書“榷”字條以“推”為“商討”一義的異體字的處理方式發生了矛盾。上引那篇短文的作者，正是在《新華字典》對“推”字的這種不妥當的處理方式的影響下，形成“商榷”應改作“商推”的看法的（在那篇短文的第一段裏有說明）。可見語文工作者在編纂或修訂字典、詞典的時候，應該十分謹慎，以免引起誤會。

1985 年 1 月 3 日《電視周報》第 2 版“熒屏語文病院”欄的《錯別字何其多》一文，正確地指出了電視屏幕上的很多錯別字，但偶爾也有“以不誤為誤”之處。

此文認為“叫你知道我的利害”這句話裏的“利”字是“厲”的錯別字。這是不對的。在《現漢》“利”字下所收的詞條裏有兩條“利害”。前一條的解釋是“利益和損害”。後一條有異體“厲害”，其解釋是“難以對付或忍受”。上引那句話用的是後一種“利害”。“厲害”本是這種“利害”的訛別寫法。我們念書的時候，如果在作業裏用了“厲害”這種寫法，老師是要打叉的。可是一般人覺得“利”字的意思跟“難以對付或忍受”的意思聯繫不起來（關於“利害”為什麼會有這種意思的原因，我在《文字學概要》190 頁有一個推測，可以參考），因此認為“厲害”是正確寫法的人越來越多。呂叔湘先生在發表於《讀書》1982 年第 2 期上的《錯字小議》裏就曾談到，他所寫的稿子裏的“利害”，常常被編輯或校對改成“厲害”。《現漢》承認“厲害”是“利害”的異體，應該說是有道理的。但是我們不應該數典忘祖，反而把“利害”看作錯誤的寫法。

上面所引的那篇文章，還認為“給與希望”的“與”是“予”的錯別字。這也是不對的。“與”和“予”都有“給”的意思，在這裏都可以使用。《現漢》“給予”條已注明“也作給與”。

再舉一個比較特殊的例子。在這個例子裏，被認為有問題的字，其用法的確有些問題，但並非錯別字。批評者把它當作同音別字，得出了荒謬的結論。

1993 年 9 月 16 日《光明日報》第 6 版“求疵”欄發表的《“入圍”應是“入闖”》說：

1993 年 8 月 26 日《北京晚報》第 4 版，刊登《全運連着我和你》徵文啓事寫道：“……初評入圍的稿件將……”句中的“入圍”有誤，應是“入闖”。

……“入闈”指科舉時代應考監考的人進入考場(《現代漢語詞典》)。“圍”,《辭源》上有七個義項……若按此七項,寫作“入圍”,無論哪一義項,都無法說明“稿件取得發表的資格”。

“圍”、“闈”二字音同形近,但含義各異,所以用時務必加以區別。

就在發表此文的同一個版面上,登載了一封題爲《收到“獲獎通知”後的苦惱》的讀者來信,信中有“凡進入獲獎範圍的作品均發‘榮譽證書’”的話。跟這句話對照一下,就可以明白“初評入圍”是指應徵作品進入初評錄取的範圍。“圍”字的這種用法不合語言規範,的確有問題,但其意義還是可以勉強捉摸出來的。把它當作“闈”的同音別字,則大錯特錯了。科舉時代,考生入闈後才寫應試文章,寫出了文章也不一定被錄取。這跟應徵作品的“入圍”根本不能相比擬。如果把“初評入圍”改成“初評入闈”,文義就完全不通了。

接着談字音方面的問題。

1995年4月15日《光明日報》第2版發表的《聽覺的煩惱》一文,指出“標識”的“識”不應讀爲 shí 而應讀爲 zhì,是正確的;又認爲“銅臭”的“臭”不應讀爲 chòu,而應該像“其臭如蘭”、“乳臭未乾”的“臭”字那樣讀爲 xiù,則有商榷餘地。

“銅臭”的出典在《辭源》、《辭海》等常用詞典中就可以查到。東漢崔烈入錢五百萬買官,得爲司徒。有一天他問兒子,外間對他位居三公有何議論。兒子回答說“論者嫌其銅臭”。後來人們一直用“銅臭”來譏諷買官者或有錢人,大多數人是把其中的“臭”理解爲香臭之“臭”的。不論是30年代出版的《國語辭典》,還是現在普遍使用的《現漢》,都把“銅臭”的“臭”讀爲 chòu。但是《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却規定“銅臭”的“臭”跟“乳臭”的“臭”一樣,也讀爲 xiù。這樣規定是否合理,恐怕還需要研究(崔烈之子可能並沒有把“銅臭”的“臭”當作香臭的“臭”,但是我們現在審音,並不是要正《後漢書》的讀音,而是要正一般人口中的音,似乎沒有必要去改變長期以來一般人對“銅臭”的理解)。所以上引那篇文章斷定 chòu 是誤讀,並不一定妥當。在誤讀之例舉不勝舉的情況下,實在沒有必要把這種其是非尚有爭議的讀音用作例子。(《隨筆》編按:1996年版的《現漢》修訂本“銅臭”條已改從《審音表》,但一般人說到這個詞的時候,恐怕不會遵從這一讀音。)

1993年6月13日《光明日報》頭版發表的《觀眾齊呼:淨化影視語言》一文,在正確地指出了影視語言中的一些讀音錯誤之後,還舉了下面這個例子:

自詡產品一流的廣告片,始終把“質量上乘(shèng)”讀爲“質量上乘

(chéng)”。

這種“乘”字的讀音也是有爭議的。

“上乘”本是佛教用語，世俗借用來表示高超、上下一類意思，可以看作引申的用法。（《隨筆》編按：《辭源》“上乘”條有三個義項，這種用法的“上乘”屬第三義項。或以這種“上乘”與車馬之“上乘”相比附，非是。）“上乘”之“乘”本與同為佛教用語的“大乘”、“小乘”之“乘”同義。《康熙字典》“乘”字條把這一義項收在“實證切”（shèng）之音後面，所引“宋沙門契嵩《原教篇》”說：“五乘皆統之於三藏……皆去聲。”《國語辭典》“大乘”、“小乘”、“上乘”諸條，也把“乘”字的音注為 shèng。但是《現漢》和新版《辭源》、《辭海》却都把這種“乘”字的音注為 chéng。《辭源》“乘”字條引隋慧遠《大乘起信論義疏》上之上：“所言乘，運載為義。……言行乘者自運運他，故名為乘。”又在“大乘”條下解釋說：“梵語摩訶衍，摩訶義為大，衍義為乘，乘車運載的意思。……比喻修行法門為乘大車，故名。”按照“乘”指“乘車運載”的說法，其音當讀為 chéng。但是過去一般都讀此字為 shèng，現在還有不少人這樣讀。《辭海》“上乘”條對佛教用語和世俗用語中的“上乘”分頭進行解釋，沒有指出其間的聯繫，並且讀音也注得不同。前者跟“大乘”、“小乘”一樣，“乘”字取 chéng 音；後者的“乘”字則注 shèng 音。這種把佛教和世俗所用的“上乘”看作無關的兩個詞並分讀兩種音的做法，顯然是不合理的；但也可說明過去一般人確實讀“上乘”之“乘”為 shèng。我查了一下《審音表》，發現此表沒有審這種“乘”字的音。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能姑且對兩種讀音都承認。把符合《現漢》等現行主要詞典的注音的 chéng 音簡單地斥為誤讀，恐怕是不妥當的。曾聽到有人把“上乘”的“乘”讀為 chèn，這才是地道的誤讀。

《審音表》有很多從俗的地方（上舉的“銅臭”之“臭”的審音，則是大反其道而行之的一個例外），有些人不知道《審音表》的規定，以舊音為根據，把符合《審音表》規定的讀音當作誤讀。這也是不妥當的。徐有修《“鑿”字讀音辨》指出，由於 1985 年修訂的《審音表》規定“鑿”字統讀為 záo，我們就不應該繼續認為，把“確鑿”、“穿鑿”、“方枘圓鑿”等詞語中本讀 zuò 的“鑿”讀為 záo，是誤讀了（《語文研究》1995 年 3 期 40 頁）。這一意見是有道理的。不久前去世的夏衍先生，1991 年在一次關於廣播電視的談話中，談到新聞廣播中讀錯字音的問題的時候，舉的例子是“把‘葉公好龍’的‘葉公’讀成‘yè’”（《文摘報》1991 年 5 月 26 日文學藝術版《夏衍對廣播電視的意見》，原摘自《海上文壇》第 2 期）。這也是由於夏老沒有注意到《審音表》的有關規定。《審音表》已經規定，本讀 shè 的地名“葉”也讀作 yè。

下面再談跟使用詞語有關的問題。

1993年2月1日《光明日報》第1版“大家談”欄發表了題爲《不要生造誰也不懂的詞語》的短文。文中說：

……語言文字使用的不規範，除了錯別字和濫用詞語外，還有一個生造詞語的問題。

請看筆者手頭的這個例子：

“長期以來所形成的對於詩的赤裸裸的命意的追求……”

這裏，什麼叫“命意”？什麼叫“赤裸裸的命意”？什麼又叫“對於詩的赤裸裸的……追求”？

……

上述的“命意”，以及“赤裸裸的……追求”等詞語是不是可以歸入毛澤東所批評的那種“生造”和“誰也不懂”一類呢？

這些話恐怕沒有多少道理。

“命意”並不是生造的詞語。《現漢》對“命意”的解釋如下：

①（作文、繪畫等）確定主題。

②含意：大家不瞭解他這句話的～所在。

詩一般都有命意。詩的命意可以是明白的、顯露的，也可以是晦澀的、隱藏的。“赤裸裸的命意”當指十分明白、顯露的命意，並沒有什麼不可理解之處。“追求”是常用詞。理解了“詩的赤裸裸的命意”，決不會不理解“對於詩的赤裸裸的命意的追求”。上引那篇短文的作者，認爲“‘命意’以及‘赤裸裸的……追求’”可以歸入“生造”和“誰也不懂”的詞語之列。看來他在分析被批評的那句話的結構的時候，大概把本是“對於”的賓語的“詩的赤裸裸的命意”分成了兩截，以爲“赤裸裸的命意”是跟後面的“的”連在一起，直接形容“追求”的，所以才會認爲這句本來並不很難懂的話“誰也不懂”。還應該指出，由於“命意”、“赤裸裸”和“追求”都不是什麼生造的詞語，即使被批評的那句話確實不通，也只能批評寫這句話的人“濫用詞語”，而不能批評他“生造詞語”。

1992年7月13日《光明日報》第2版“求疵”欄發表的《“未來”不能“再造”》說：

《半月談》1992年第7期《老區，祝你重振雄風——鹽阜紀行》一文有這樣

一句話：“老區，祝願你，重振雄風，再造一個更為輝煌的未來。”

……“再造……一個未來”言外之意是說已經造過一個未來。這句話句意悖理，動賓搭配不當。可將“再造”改為“創造”或“造就”等。

這種批評也是沒有道理的。“再造一個更為輝煌的未來”，其“言外之意”並不是“已經造過一個未來”，而是“已經創造過（也可以說“有過”）一個輝煌的過去”。這樣說並無悖理之處。

1995年8月21日《中國教育報》第3版《語言文字》副刊第36期，發表了題為《有億萬富翁嗎？》的短文。此文第一段說：

近讀天津《采風報》中題為“中國30位億萬富翁發跡揭秘”的文章，題目、文中也（引者按：此“也”字應刪，此句還有不通順之處，這裏就不評論了）多處出現“億萬富翁”一詞，文中寫道：“富翁龍虎榜的‘狀元’也許當屬王富生，他擁有的個人資產已超過人民幣10億元”。稍有數學知識的人便知10億是十位數，“億萬”是以萬為基數有億個，即十三位數。這不是自相矛盾嗎？

這種批評一定會使被批評者哭笑不得。《現漢》“億”字下有詞條“億萬”，其解釋是“泛指極大的數目”。又有“億萬斯年”一條，其解釋是“形容無限長遠的年代”。“億萬”一語從古到今都是用來泛指上億的大數的（但要注意古以十萬為億，與今不同），決不能理解為指一億個一萬。如果真的要表示“十三位數”，按照漢語的習慣只能說“萬億”而不能說“億萬”。我們還往往用“千百”來泛指上千的數目，“千百”也決不能理解為十萬。

“以不誤為誤”的例子就舉這一些。希望大家注意這個問題，對各種“糾誤”的意見不要輕信，而要仔細鑒別其是非；在準備批評別人的錯誤的時候，也要反復考慮，多加研究，不要把不成熟的意見隨便拿出去發表。更希望有關的報刊編輯能注意這個問題，認真把關，不要把“以不誤為誤”的“糾誤”意見發表出來。

我自己在主觀上是極力想避免“以不誤為誤”的錯誤的。但限於水平，恐怕無法完全做到。在這篇小文裏可能會有把本來是正確的糾誤意見說成是錯誤的地方。讀者如發現問題，務請加以批評。如果有時間，我還想接着寫一些糾正語文錯誤的小文章。如果那些文章裏有“以不誤為誤”之處，也希望大家加以指正。

原載《中國教育報》1995年10月7日3版，又載《裘錫圭學術文化隨筆》，今據後者收入。

積極慎重地進行現代漢語規範化建設

我想從一個語言文字工作者的角度，就加強漢語規範化工作的必要性談一些體會。

由於種種原因，社會上長期存在語文水平滑坡的現象，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漢語規範化工作的進展。改革開放以來，政治、經濟和科技迅速發展的新形勢，對漢語規範化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可是相當多的人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有些人甚至還在改革開放或開發技術的旗號下，幹着跟漢語規範化背道而馳的事情。因此，當前在語言文字的社會應用方面，存在着大量亟需加以規範的混亂現象。

普通話作為漢民族共同語的地位已由《憲法》確定，可是有些方言地區對推廣普通話卻不夠重視，部分人甚至以講方言為榮。我認識一個韓國留學生。他是韓國一所大學的中文系的碩士，想在中國攻讀博士學位。他在訪問了北京、南京、上海等地的一些大學以後，得出一個結論：不能考南方的大學。因為北京的老師講課他聽得懂；南方的老師講課，普通話太不標準，他很多地方聽不懂。這件小事告訴我們，不但從國內各地區、各民族之間越來越頻繁的社會交往的需要來看，必須大力推廣普通話，而且從對外開放、面向世界的需要來看，也必須大力推廣普通話。

在講普通話的人們中間，念錯字音的現象也比較普遍。教師、演員、節目主持人和播音員的語音，對群眾的影響極大。但是從他們的嘴裏卻不時能聽到念錯的字音。我的讀中學的兒子把“因為”的“為”念成平聲。據他說，老師們大都這樣念。有一次在電視上看到一個諷刺念錯別字的相聲，演員諷刺別人把“曹禺”念成“曹偶”，可是他自己也把“禺”字誤讀成了上聲。語音的混亂不但影響人與人之間的交際，還會影響中文信息處理中的漢字拼音輸入和人機對話，不可等閒視之。

在漢字字形方面，不合規範的混亂現象也很嚴重。其中比較引人注目的，是濫用繁體字。幾年前在電視上看到過一則報道我們在新加坡辦展覽的新聞，展覽會上的漢字標語竟然是用繁體的，而且在“系統”的“系”字左邊加了一個立人旁。寫

這條橫標的同志不知道,這種用法的“系”字在繁體字裏就是沒有立人旁的。新加坡是把我們的簡化字定為規範漢字的,在新加坡辦展覽而用繁體字。這件事本身就是可笑的,也是有失國體的。何況寫繁體字的同志並不真正認識繁體字,還寫了錯別字呢!展覽會主管人決定用繁體字,主觀上可能是想推進對外開放。我們的很多商業經營者,在招牌、廣告、商品標籤和其他宣傳品上使用繁體字,大概也是想跟臺港地區和外國多做一些生意。但是這樣做實際上只會被人看不起,並不能達到原來的目的。在新加坡、臺灣等地的報刊上,已經出現了批評、譏諷我們濫用、錯用繁體字的言論,我們應該吸取教訓。要想多做生意,應該把精力放在提高商品和服務的質量上。

當前,在書報刊物、影視字幕等社會用字領域裏,錯別字泛濫成災,其危害性決不亞於濫用繁體字。有些錯別字早已存在,但過去只見於文化水平較低的人如中小學生筆下,現在却在中央一級的報刊上公然露面了。例如“即刻”、“即使”的“即”與“既然”的“既”相互錯寫,就是一個例子。這是社會語文水平降低的反映。

除了對錯別字和濫用繁體字進行治理以外,在字形規範化方面還有大量工作要做。對《簡化字總表》和《現代漢語通用字表》範圍之外的漢字的字形標準,至今還沒有作出很明確的規定。簡化偏旁類推和關於新舊字形的規定,是否適用於所有漢字?對這個問題,大家的認識並不一致。有的很有影響的大字典,在處理這方面問題的時候顯得相當草率,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字形規範問題如不徹底解決,隨着中文信息處理所用的字庫的不斷擴大,混亂情況就會越來越嚴重。

在詞語的使用上,混亂情況也是觸目驚心的。有的作者爲了增加作品的文采,喜歡“轉文”,喜歡用書面成語,可是又沒有真正掌握這些“文”,不是寫錯了字,就是用錯了意思。有些作者在完全沒有必要的情況下,在文章裏夾用外文(包括外文縮寫)。有些作者濫用翻譯得很草率的外來術語以至自己生造的術語,來掩蓋文章內容的空虛和無理。這些都是應該受到批評的不良文風。

對於方言和外語的詞語以至語法對普通話的衝擊,很多語文工作者認爲不必過於緊張。這些闖進來的東西如果沒有生命力,經過一段時間自然會被淘汰,真正有生命力的,被群眾認可了,普通話就不妨吸收。這並不是壞事。可是,如果由於不恰當地接受方言和外語的影響,使漢語的表達能力受到了損害,語文工作者就有責任去管。例如有些同志指出,在外語影響下流行起來的“減少若干倍”的說法,既不合漢語規範,又影響表義的準確性,我們決不能讓這種說法取代“減少幾成”、

“減少幾分之幾”等正確說法。這種批評就是很必要的。

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在漢語規範化方面還有很多急需我們去管的問題。例如李嵐清副總理講話中指出的中文信息處理方面的管理工作,就需要有關部門馬上去抓。

總之,擺在我們面前的漢語規範化的任務是極其繁重又十分迫切的。國家語委和其他有關的政府部門,無疑需要在這方面大大加強工作力度並提高工作質量。全國人民也都應該關心並支持這方面的工作。我們語言文字工作者更是義不容辭,應該起好帶頭作用,為漢語規範化做出應有的貢獻。

最後,還想對今後的漢語規範化工作談一點個人的希望。

在今天的社會裏,任何法規都必須合理、可行,才能有真正的權威,才能為人們所普遍遵守。語言文字方面的規定,跟使用語言文字的每一個人都有切身關係,牽一髮而動全身,尤其需要有充分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今後不論是制定基礎性的法規,還是為一些具體的字決定語音和字形的規範,希望都能在事先充分做好調查研究工作,充分貫徹群眾路線,多方諮詢,反復討論,做到慎上加慎。切忌“我輩數人定則定矣”,率爾讓不夠成熟的規定出臺。

漢語規範化的法規所適用的範圍,也就是必須受法規約束的社會行為的範圍,究竟應該有多大,這是一個需要極其慎重地加以研究的問題。該管的不管,是錯誤。不該管或可以不管的一定要去管,也是錯誤。這個問題處理得稍有不當,就會引起嚴重的後遺症。

在字形、字音等方面的具體規定上,我們是有過一些教訓的。《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的廢止,是一個突出的事例。在現行的規範裏,也還包含着少量不夠合理或缺乏可行性的規定。例如對普通話審音表中的個別規定,正在修訂《現代漢語詞典》的同志們就認為無法照辦。又如80年代重新發表《簡化字總表》時,恢復了加立人旁的“像”字的使用,這個規定也引起了一些麻煩。簡化字把加立人的“像”併入不加立人的“象”,似乎並沒有造成有關文義混淆不清的情況。但是在某些有關的詞語裏,究竟應該用加立人的“像”還是用不加立人的“象”,却是容易決定的。根據1990年全國自然科學名詞審定委員會召開的專門會議所提出的《關於科技術語中“象”與“像”用法的意見》,“圖象”、“錄象”、“音象”等詞語裏的“象”都不加立人旁。可是一般人寫這些詞語時,却大都用加立人的“像”。這樣就使一些本來有統一寫法的詞語有了不同寫法。規範化的規定反而造成了新的不規範現象。這個例子說明,在規範化工作中,不論是改變舊的傳統,還是恢復舊的傳

統,都要十分慎重。衷心希望今後盡可能防止各種疏失的出現,使漢語規範化工作能够十分健康地進行下去。

以上意見中的不妥之處,請同志們批評指正。

1995 年 12 月 北京

本文是在紀念文字改革和現代漢語規範化工作 40 周年大會上的發言。
原載《語文建設》1996 年 2 期,又載《裘錫圭學術文化隨筆》,今據後者收入。

貝、錢、幣

——雜談古代貨幣制度對語言文字的影響

我國古代，跟有些國家一樣，曾經把學名叫貨貝和環紋貨貝的海貝用作原始貨幣。這兩種海貝形狀相近，在沒有失掉它們原來的色澤的時候，都相當美觀。它們被古人看作可以跟玉比美的裝飾品，並且由於主要出產在熱帶和亞熱帶的海邊，中原地區不是很容易得到，而成為古人所追求的一種財寶，並進而成為專門鑄造的金屬貨幣出現之前最重要的一種貨幣。貝的這種職能，已經為有關的古文獻和考古發掘所證明；此外，在古文字的字形裏也得到了反映。

“貝”的字形本來是很象形的（商代金文中“買”字的“貝”旁有寫作的，見《金文編》436頁），為了書寫的方便，後來就逐漸變得看不出貝的樣子了。

在商代金文裏，有一個字像一個人肩上扛着一大挂貝，有時候還在扛貝的人的脚下加上一條船（同上1030頁）。有人認為這個字的字形表示古人帶着貝外出做生意，不知道是不是正確。得到的“得”在古文字裏的寫法，象一只手拿到一個貝（同上114頁），旁邊還往往加上像道路的形狀的“行”字的一半（同上113頁）。加這個偏旁，可能就是表示，為了得到貝，需要外出進行交易。古人用得到貝的形象來表示“得”這個詞，充分反映了他們對貝的重視。敗壞的“敗”字，像一只手拿着棍棒一類東西將貝打壞，也反映出古人對貝的重視。

此外，在現存的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裏，還可以看到把“貝”用作表意偏旁的“買”、“責”、“賁”、“貯”等字。《說文解字》說“賁”字的意思是商人，但是在古文字裏則是用它來表示賞賜的意思的。“貯”的意思是儲藏財物，不過有的學者認為甲骨、金文裏的所謂“貯”字，其實應該釋為商賈的“賈”字。儘管這些字當時的字義可能跟後代有出入，但是它們的字形裏所包含的“貝”，顯然都已經被當作財富或貨幣來看待了。

周代金文裏所能看到的以“貝”為表意偏旁的字，比商代金文和甲骨文裏的明顯增多。《說文解字》所收的從“貝”的字為數更多。它的“貝”部，連“貝”字在內

共收了五十九個字。其中，當裝飾講的从“貝”“卉”聲的“賁”字，以及當頸部裝飾講的由兩個“貝”字組成的“賁”字，反映了貝用於裝飾的功能。“女”部的“嬰”字，下半是“女”字，上半就是這個“賁”字，字形表示一個女子戴着用作裝飾的貝。“貝”部裏其他的字，大都是跟財富有關的，或是表示某種商業行為的，如“財”“貨”“賄”“賂”“賞”“賜”“贈”“賀”“賒”“貸”“賃”“贖”“購”“買”“貿”“販”“貴”“賤”“貧”“貪”“贏”“費”等等。

在貝已經不再用作貨幣並且不再被看作重要財富之後很久，“貝”字仍然被當作跟財富和商業行為有關的表意偏旁，繼續用來造字。有些从“貝”旁的字是唐宋以後才造出來的。例如：賬簿的“賬”本來是寫作从“巾”的“帳”字的。从“貝”的“賬”字出現得比較晚，而且直到清代才比較普遍地被使用，因此沒有被收入《康熙字典》。不過現在大家都已經用慣从“貝”的“賬”字了。此外，雖然人們早已不再像古人那樣珍視貝了，可是在口語裏直到今天還在頻繁使用“寶貝”這個詞。語言文字中的這類滯後現象是很常見的。

在使用貝的時代，一定數量的貝（很多學者認為是十個貝）穿成一串，稱為“一朋”。“朋”字的朋友一義，可能就是由貝朋的意思引申出來的。

取代貝的主要貨幣是錢。“錢”本是鍤子一類生產工具的名稱。按照字書，當工具講的“錢”應該讀為 jiǎn。《詩經·周頌·臣工》篇說：“命我衆人，庀乃錢鎛。”就是要大家為種地準備好起土的鍤子和除草的鋤頭。我國最早的金屬鑄幣的形狀，有很多是模仿錢這類生產工具的。人們就把這種貨幣叫做“錢”，字音雖然小有變化，字形並沒有變。後來其他種類的鑄幣如圓錢，也被叫做“錢”，而“錢”字的本來意義却被人們淡忘了。唐代鑄開元錢，十個重一兩。因此“錢”又演變出相當於十分之一兩的重量單位的意義。

錢也稱“幣”。“幣”本來指用作禮物的絲織品，由於詞義引申也可以指用作禮物的馬匹和玉等物品。這些物品都是古人比較重視的財物。“幣”既然成了它們的通稱，後來就進一步演變成了貨幣的通稱。它的本來意義也被人們淡忘了。

總之，古代的貨幣制度對我們的語言文字是有不小的影響的。限於時間，不能詳細說明了。

本文是為北京電視臺教育節目而作（寫於1996年12月）。修改後載《裘錫圭學術文化隨筆》，今據以收入。

研究古代文化應該有訓詁常識

研究我國古代文化應該有文字訓詁方面的常識，這是極為明白的道理。但是讀一下八、九十年代發表的古代文化方面的研究文章，就能發現有些作者是缺乏這方面的常識的。在這篇小文裏，我想舉幾個跟訓詁有關的例子，以引起注意。小文是對事不對人的，所以所引實例都不注明出處。但是這幾個例子不但沒有一個是杜撰的，而且都是出自一般認為水平較高的報刊的。

有一篇談儒、釋、道三教融合的文章，把歐陽修“晚年又自號‘六一居士’”看作他“也未嘗不留意於佛理”的一個證據。這是對本來用其較古意義的“居士”，按照較後起的，也就是現在仍然通行的意義來加以理解而造成的錯誤。

“居士”之稱早在佛教傳入之前就已出現。《禮記·玉藻》：“……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鄭玄注：“居士，道藝處士也。”處士即居家不當官的士人。《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說“齊有居士田仲者”，這就是一位很著名的道藝處士。佛教傳入後，往往借用中土固有之詞來翻譯佛經裏意義並不全同的詞，“居士”被用來指稱在家奉佛者。這一後起意義現在是唯一的通行義，“居士”的古義則已經被淡忘了。

唐宋以來，退居林下的士大夫往往以“某某居士”為別號。“居士”通常用古義，但已稍有變化（《禮記》、《韓非子》所說的居士，當是未曾出仕者，而不是退居林下者）。至於取這種別號是否跟他們對佛教的態度有關，則要作具體分析。如白居易，在任江州司馬時就已禮佛參禪，晚年致仕後居洛陽，跟香山寺僧人結社，捐錢修寺；他自稱“香山居士”，大概語帶雙關，兼取“居士”的新舊二義。歐陽修晚年自稱“六一居士”，其原因他自己曾作說明。他在所作《六一居士傳》中說：“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可見跟“佛理”是毫無關係的。

有一篇研究中西古鎖的文章，其作者竟不瞭解“鎖”字的古義。“鎖”本指鏈子。現在仍然通行的“鎖鏈”、“枷鎖”等詞裏的“鎖”字，用的就是這一意義。鎖鏈

是捆綁、拘繫囚徒的，也可以用來捆繫某些物品。所以“鎖”引申而成為起封鎖作用的需要用鑰匙打開的器具的名稱。那位作者所研究的是用鑰匙的鎖。他對古書中用其本義的“鎖”字，也按照他所熟悉的引申義來加以理解，因此得出了古代有很大的鎖的看法。他說：

《三輔黃圖》：“飛燕命飲飛之士，以金鎖纜雲舟於波上”，金鎖蓋銅鎖。能鎖舟於水上，其鎖必大。……《漢書·王莽傳》下：“鐵鎖琅當其頸”，師古曰：“琅當，長鎖也”，此刑具之鎖，亦必長大。

這裏所引的古書裏的“金鎖”、“鐵鎖”，顯然都指鏈子，所以可以用來纜繫船隻，或捆在犯人的頸項上。但那位作者却把它們理解為指用鑰匙的鎖了。天下哪會有能直接鎖住“雲舟”的大鎖！

有一篇研究雕板印刷術起源的文章，其作者由於誤解了古書裏“刊”字的意義，得出了西漢時代就有雕板印刷的結論。

“刊”字本來當砍除、削除講。《左傳·襄公二十五年》“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杜預注：“隧，徑也。堙，塞也。刊，除也。”《周禮·秋官·柞氏》“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正義》：“謂先刊削以去其皮乃燒之。”我國古代以竹木簡牘為書寫材料，寫錯的和作廢的文字往往用刀削去。所以校正文字叫“刊正”、“刊誤”、“刊謬”。認為某種著作寫得好，內容不可更改，並永遠不會喪失價值，則可以用“不刊”來形容，意即其文字永遠不會被刊削。贊揚正確言論的“不刊之論”這一成語，今天還在使用。從刊削的意思又引申出了刊刻的意思。王充《論衡·實知》：“上會稽，祭大禹，立石刊頌，望於南海。”“刊頌”的意思就是刊刻頌文。因此，雕板印刷術出現之後，就把刻書叫做“刊板”，把印刷發行叫做“刊行”。這是“刊”字的後起用法。

上面所說的那位作者，在文章裏引了三條文獻材料來證明漢代有雕板印刷。其中一條是他發現的，另二條他說明是別人已經用過的，實際上也就是多數印刷史家所已經否定的。我們先來看他所發現的那條材料。他在作為全文重點的第一段裏說：

偶讀揚雄《方言》，揚雄在《答劉歆書》中說：

張伯松不好雄賦頌之文，然亦有以奇之。嘗為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憲典訓，屬雄以此篇目頗示其成者，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

“不刊之書”四字連用一起，意思是很明顯的，不刊刻的書也就是不刊印的書。可惜長期被學者們忽視而未引證。揚雄是公元前53年至公元18年

人,此時已有雕板印刷了。

“不刊之書”是張伯松贊美揚雄的《方言》的話,“不刊”的意思前面已經解釋過了,而且在一般詞典裏就可以查到。這位作者竟然不顧文義,硬把“不刊”曲解為“不刊印”,當作揚雄時代已有雕板印刷的證據;還對這一“證據”“長期被學者們忽視而未引證”表示遺憾,真叫人感到啼笑皆非。這位作者似乎連“不刊之論”這一並不生僻的成語的意思都不瞭解。

在這位作者所引的兩條別人已經用過的材料裏,有一條也是跟“刊”有關的。《太平御覽》卷六〇六引《風俗通》,說劉向校書“皆先書竹,改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也”。“刊定”之意與“刊正”相同。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劉向校書,先把所校之書抄寫在竹簡上,改正文字之後,認為已經沒有問題了,才謄寫在帛上。文義本來很明白。這位作者却認為這是說劉向校書“採用‘刊’和‘寫’兩種方式作為定本”,硬要把“刊”理解為刻書。他還說:

什麼是“刊”?距劉向約百年的許慎(約58—147),在其所著《說文解字》中釋“刊,剟也”,“剟,刊也”,意思也很清楚。

我們讀了這段話,一點也不明白他所說的“意思也很清楚”是什麼意思。《說文·刀部》在“剟,刊也”這一條之後,緊接着就是“刪,剟也”。許慎顯然是把“刊”和“剟”的意思都理解為刪削,而不是理解為刊刻的。這位作者大概一點也不瞭解“剟”字的真實意義,所以才會把實際上對他不利的《說文》的這些注解引作論據。

這位作者還認為他所舉出的那些“早期文獻”,可以“和莫伯驥《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錄初編》轉引《勿齋集》的話‘漢靈帝時詔刊章捕張儉等,是刻印之法漢已有之’”相印證。“靈帝詔刊章捕儉等”,是《後漢書·黨錮傳·序》中語。李賢注已指出“刊”是“削”的意思。當時張儉鄉人朱並拍宦官馬屁,上書告發張儉等人。靈帝為了保護朱並,下令削去奏章上的朱並之名,以免別人知道他是告發者。“刊章”跟印刷也是毫無關係的。

我們在前面提到過的兩篇文章,雖然有些毛病,從整體上看還是很有發表價值的。這篇講雕板印刷起源的文章,則可以說是“一無是處,徒亂人意”。這樣的文章是缺乏發表價值的。

希望某些作者寫稿時多查查詞典(上面舉出的問題,通過查詞典都能解決),某些編輯審稿時把關把得嚴一點(也不妨多查查詞典),大家一起努力把研究古代

文化的文章中屢見的由於缺乏訓詁常識而造成的錯誤消滅掉。

原載《人民政協報》1997 年 2 月 24 日 3 版,今據以收入。

二十世紀的漢語文字學^{*}

(與沈培合著)

一、概 說

對漢字的研究,在我國開始得很早,但是具有現代意義的文字學則是在進入二十世紀以後才逐漸形成並發展起來的。

舊的文字之學是所謂“小學”的一個部分。我國最早的目錄學著作是西漢劉歆的《七略》。其“六藝略”中有“小學”類。此書早已不傳,但班固《漢書·藝文志》是根據它寫的。《藝文志》“小學”類裏記載的書,基本上是一些識字課本(如《蒼頡》《凡將》等篇)。後來,“小學”的範圍有了擴大。《唐書·藝文志》經部小學類的書,大體包括文字、音韻、訓詁、書法四個方面。清代乾隆時所編《四庫全書總目》的經部“小學類”下分“訓詁”“字書”“韻書”三小類。

“小學”一向被認為是經學的附庸。它所注重的材料基本上都是書面材料,所以這種研究大致屬於“語文學”的範圍,與“語言學”尚有區別(參看王力《中國語言學史·前言》,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研究者中,很少有人直接以語言為研究對象,絕大多數人不能正確處理語言和文字的關係。因此在“小學”研究中形成了以文字統帥語言的局面。傳統文字學的經典,東漢許慎所著的《說文解字》在整個“小學”界長期享有非常崇高的地位,治“小學”的人大都把它奉為圭臬。

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有兩件事為現代意義的文字學的形成準備了初步的條件。這兩件事是西方語言學思想的傳入和古文字研究的進步。

晚清以來,由於金石學的發達和古文字資料的大量發現(其中包括殷墟甲骨文

* 限於時間和資料,本文所述主要是中國大陸地區的漢語文字學研究情況,港臺和國外情況偶有涉及。

等前所未見的重要資料的發現),古文字研究的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清末的吳大澂、孫詒讓等人已經根據古文字指出了《說文》的一些問題。進入民國時代以後,這方面的研究有進一步的發展。大量的古文字資料和有關的研究成果,為現代意義的文字學的建立準備了重要的條件。

對現代意義的文字學的建立起了更重要的作用的,是西方語言學思想的影響。

1906年,章太炎發表《論語言文字之學》一文(《國粹學報》2卷12、13號)。他認為:“合此三種(按:指文字、音韻、訓詁之學)乃成語言文字之學。此固非兒童佔畢所能盡者,然猶名為小學,則以襲用古稱,便於指示,其實當名語言文字之學,方為確切。”章氏的理論和實踐都證明他已經有了比較明確的語言學思想。他提出“語言文字之學”這一名稱,標誌着中國現代語言學的發端。

但是,正確確立語言和文字之間的關係,需要經歷一段時間。民國初年,很多人把“小學”改稱“文字學”,而不把它稱為“語言文字學”,這是小學研究中以文字統帥語言的思想的反映。他們所研究的“文字學”,仍包括文字、音韻、訓詁三個方面。如1917年,北京大學的文字學分別由朱宗萊、錢玄同兩位學者擔任,他們所寫的講義分別叫《文字學形義篇》、《文字學音篇》,前者包括文字與訓詁之學。又如,何仲英1922年出版的《新著中國文字學大綱》(上海商務印書館),是一部為中等學校編寫的文字學教科書,其內容也是包括音韻與訓詁的。此外如1931年賀凱的《中國文字學概要》(北平文化學社)、1933年劉大白的《文字學概論》(上海大江書鋪)、1933年傅介石的《中國文字學綱要》(北平自刊本,1940年中華書局昆明印本)、1935年戴增元《文字學初步》(上海中華書局石印本)、馬宗霍《文字學發凡》四卷(上海商務印書館綫裝本),都是同一類的著作。即使在文字學跟音韻學、訓詁學已經明確分家之後,仍有人寫這種文字學著作,如1971年臺北正中書局出版了林尹的《文字學概說》,此書到1980年已經出了第7版,可見影響頗大。其第三篇是“形音義篇”,下分字形的演進、字音的分析(講述聲、韻、反切等內容)、字義的訓詁等三章,仍是舊的格局。

由於研究音韻的學問比較專門,已有的成果又比較多,音韻學是較早脫離文字學而獨立的。早在30年代之前,有些人在講文字學的時候就已經不管音韻方面的內容,而只談“形義”,即文字和訓詁了。20年代初,沈兼士在北京大學講授的課程明確稱為“文字形義學”。此後頗有人仿效。由於研究訓詁“沒有現成的理論系統”,講“文字形義學”的往往以形為主,講“義”的部分只是附庸,“可有可無”(唐蘭《中國文字學》6頁)。例如1935年出版的周兆沅的《文字形義學》(上海商務印

書館石印本),上篇書體,下篇形論,並未專論訓詁。容庚在燕京大學開文字學,《形篇》講字體,《義篇》講說明文字結構的“六書”,也是有“義”之名而無“義”之實。

所以,唐蘭說:“民國以來,所謂文字學,名義上雖兼包形音義三部分,其實早就只有形體(引者按:這裏所說的“形體”包括文字結構)是主要部分了。”(《中國文字學》6頁)有的學者並明確把音韻、訓詁排除在文字學之外。如1926年出版的顧實的《中國文字學》,只論述文字之由來、文字之變遷和文字之構造。又如,1933年何仲英出版《文字學綱要》(上海民智書局),他認識到文字學不應包括音韻、訓詁,因此把自己原來的文字學著作改寫為此書,專門討論漢字的形體。1934年,唐蘭把他在北京大學所用的講義《古文字學導論》手寫石印出版,這部書明確主張“文字的形體的研究,是應該成為獨立的科學的”,認為“語言的主體是聲音,文字的主體是形體,我們可以把文字的聲音歸到語言學裏去,但形體却是獨立的,我們對於音符字可以認為語言,但形符字,意符字,和半音符字的非音部分,却不是語言所能解釋的。文字固然是語言的符號,但語言只構成了文字的聲音部分。我們要研究符號的起源和演變,我們要研究出一種適當的符號,那都是文字學的範圍。”他還說:“在我創立的新文字學裏所要研究的,是從文字起源,一直到現代楷書,或俗字,簡字的歷史。這範圍是極廣泛的,但最重要的,却只是小篆以前的古文字。”這本書奠定了現代意義的文字學的基礎,同時也使古文字的研究開始走上科學的道路。(此書1981年齊魯書社重新影印,補齊圖版,並附以作者1936年部分改訂稿及1963年為中央黨校版作的跋。)

後來,唐蘭又出版了《中國文字學》(開明書店,1949;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重印)。書中專設“中國文字學的範圍”一節,他說:“我在民國二十三年寫《古文字學導論》,才把文字學的範圍重新規定。我的文字學研究的對象,只限於形體,我不但不想把音韻學找回來,還得把訓詁學送出去。”(該書5頁)“文字學本來就是字形學,不應該包括訓詁和音韻。一個字的音和義雖然和字形有聯繫,但在本質上,它們是屬於語言的。”(該書6頁)唐蘭力主文字學應該與音韻學和訓詁學分開而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對於漢語文字學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40年代以後,研究形體的文字學著作已成為主流。40年代出版的比較重要的著作,除唐蘭《中國文字學》外,有張世祿《中國文字學概要》(貴陽文通書局,1941)、齊佩瑤的《中國文字學概要》(北平國立華北編譯館,1942)等書。前者提倡研究文字要形音義三方面互相推求,但並沒有去介紹音韻學、訓詁學基礎

知識。

五六十年代比較有代表性的文字學著作有梁東漢《漢字的結構及其流變》(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蔣善國《漢字形體學》(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漢字的組成和性質》(文字改革出版社,1960)。兩位學者力圖發掘漢字的構造和發展規律,梁書緊密結合語言學來研究文字,蔣書對隸變規律剖析得很細緻,這在以前都是不多見的。

唐蘭在主張文字學與音韻學、訓詁學分家的時候,並未否認字的音和義有“和字形有聯繫”的一面,但他的文字學著作很少談這方面的問題。這可以說是一種矯枉過正的做法。受到他的影響,一般講形體的文字學著作也很少討論字形跟音、義,即漢字跟漢語裏的詞的各種具體關係。從50年代起,在政府領導下,對漢字進行整理和簡化工作。開始的時候,語文學界爲了配合這項工作,大都著力強調文字對語言的從屬性,但仍很少有人有意識地去研究漢字跟漢語裏的詞的各種具體關係。像王力《字的形、音、義》(中國青年出版社,1953;1957年改爲《字的寫法、讀音和意義》)那樣的著作,極爲少見。60年代以後,情況有了變化,出現了一些從字跟詞的關係的角度去研究文字現象的有質量的文章(如呂叔湘《形、音、義》,《文字改革》1964年3、4期,收入所著《語文常談》;李榮《漢字演變的幾個趨勢》,《中國語文》1980年1期)。文字學者通過語文實踐,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研究文字雖然應以形體研究爲主,但是不管形體和音、義之間的關係是不行的。80年代以後,大量的文字學著作相繼出版,如楊五銘《文字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蔣善國《漢字學》(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孫錫鈞《漢字通論》(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商務印書館,1988)、王鳳陽《漢字學》(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顧正《文字學》(甘肅教育出版社,1992)、詹鄞鑫《漢字說略》(遼寧教育出版社,1992)、許長安《漢語文字學》(廈門大學出版社,1993)等,這些著作都或多或少地談到了形、音、義之間的關係。周祖謨爲1988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撰寫的“漢語文字學”條,把文字學定義爲“研究漢字的形體和形體與聲音、語義之間的關係的一門學科”,這可以代表目前大多數人的意見。

在80年代以來出版的文字學著作中,裘錫圭的《文字學概要》受到了較多的注意。該書使用了較多較新的出土文字資料,並且十分注意以語言學的觀點來討論文字問題。

通論性的漢字學的發展,跟漢字學各個分支的發展是相互促進的。各方面的

具體研究成果,後面將作簡單的介紹。

西方普通文字學理論的介紹和引進,對漢字學的發展也起了促進作用。1940年出版了英國愛德華·葛勞德著、林杞啟譯的《比較文字學概論》(商務印書館),1987年出版了蘇聯B. A. 伊斯特林著、左少興譯的《文字的產生和發展》(北京大學出版社)。歷年翻譯的西方語言學通論性著作,也大都有討論文字的部分。有人在研究漢字起源和漢字的性質時把比較文字學的方法引入進來,取得了較好的效果。近些年來,文字學界還成立了學會(如中國文字學會、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等)。除了學會的經常性學術會議,有關單位也舉辦了文字學方面的學術會議,如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在1986年12月和1991年9月兩次召開漢字問題學術討論會,第一次討論會後出版了論文集《漢字問題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語文出版社,1988)。

還需要提到的是,從本世紀初開始,陸續有人從語言文字學之外的角度來研究漢字,例如艾偉從心理學角度研究漢字,在1949年出版了專著《漢字問題》(中華書局),其中涉及許多現代漢字學問題(參看李鏡流等《建國前漢字心理學研究述評》,《語文建設》1987年11期;馬文駒《艾偉的漢字心理實驗研究》,《教育研究與實驗》1988年3期)。近年來,有人把這方面的研究成果運用於漢字教學,取得了一些良好的效果。

漢字是漢民族文化的載體,而且很多字的構造就是跟一定的文化背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從本世紀初開始,就有學者從文化史的角度研究漢字。前些年,由於“文化潮”的興起,這方面的研究受到了重視,出現了很多以“漢字與文化”為主題的文章和著作。其中,江西教育出版社的“漢字文化叢書”(陳海洋主編,1995)以及北京大學出版社的《中國漢字文化大觀》(何九盈、胡雙寶、張猛主編,1995),可以看作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幾年前就有人提出建立“漢字文化學”的主張。但遺憾的是,至今“漢字文化學”的界定還不是很清楚。雖然多數人主張“從漢字入手研究中國文化,從文化學的角度研究漢字”,但在一些人所寫的有關論著中,有不少內容其實可以歸到文化語言學的範圍裏去,有的內容甚至很難說跟漢字和漢語有什麼聯繫。

以上對本世紀的文字學研究作了一個簡單的回顧,下面分節介紹漢字學的各项研究成果。需要交代的是,現代漢字學是漢語文字學在80年代以後新興的一個分支,本書有關部分另有論述,本篇就略而不談了。

二、一般性的漢字學研究

(一) 漢字性質的研究

研究漢字的性質,就是要弄清漢字屬於哪一種文字類型。這個問題是西方語言學傳入後才提出的。70年代末期以後,這個問題一度曾成為文字學研究的熱點,參加討論的人很多,意見頗為分歧。人們基本上採用兩種方法來給漢字定性。一種是根據漢字字形所能起的表意、表音等作用來為它定性,另一種是根據漢字字形所能表示的語言結構的層次(也可以說語言單位的大小)來為它定性。屬於前一種的,主要有表意文字說和意音文字說。在早期,一般都認為漢字是表意文字,漢字為意音文字說到50年代才由周有光提出來。此外還有極少數人主張表音文字說(見姚孝遂《古漢字的形體結構及其發展階段》、《古文字的符號化問題》、《再論古漢字的性質》等文)。多數人認為漢字的性質自古至今沒有本質變化,但也有人認為漢字的性質發生過根本性的變化。從後一角度提出的觀點主要有:商代甲骨文為形意文字周代以後漢字為意音文字說、古漢字為表形文字隸變後漢字為表意文字說。根據漢字字形所能表示的語言結構的層次給漢字定性的,主要有語素文字說和語素一音節文字說。持語素文字說者,一般都承認在單音節詞佔絕對優勢的古代,漢字可以稱為表詞文字。持語素一音節文字說者一般也承認那個時代的漢字可以稱為表詞一音節文字。

裘錫圭首先提出要分清作為詞或語素的符號的文字和文字所使用的符號(裘氏稱之為“字符”)這兩個不同層次。詞和語素都是音義結合體。作為詞或語素的符號,不管哪種文字都是既表音又表意的。要劃分表音、表意等類型,必須從文字所使用的符號即字符的性質著眼(參看裘錫圭《漢字的性質》,《中國語文》1985年1期)。雖然以前研究漢字性質的人也常常根據漢字所使用的符號的性質來給它定性,如說形聲字的形旁是表意的,聲旁是表音的等等;但是他們之間的有些分歧確實是由於對兩個層次的區分沒有明確認識而引起的。例如說漢字是表音字,就不是著眼於漢字所使用的符號的性質,而是著眼於漢字作為詞或語素的符號具有一定讀音這一點的。因此,明確漢字的性質應當由漢字的字符的性質來決定,是有意義的。不過,對這一看法已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見,有必要繼續進行討論。

裘氏主張漢字在早期階段(隸變以前)基本上是使用意符和音符的一種文字,

可以稱為意符音符文字（即意音文字）；隸變後由於漢字裏的很多意符、音符，已經變為既無表意作用也無表音作用的“記號”，這時的漢字可以稱為意符音符記號文字。但隸變後的漢字所使用的符號仍以意符和音符為主，所以漢字的性質自古至今沒有本質上的變化。由記號構成的字就是“記號字”。“記號字”的概念並不是裘氏首先提出的。唐蘭在《中國文字學》“文字的構成”一章中專立“記號文字和拼音文字”一節，認為：“截至目前為止，中國文字還不能算是記號文字，因為我們認識一個‘同’字，就可以很容易地認識‘銅’，‘桐’，‘筒’，‘峒’等字，可見這還是形聲文字。”龍宇純《中國文字學》（臺灣學生書局，1987）指出漢字中有一種“純粹約定”或曰“硬性約定”的文字，字形跟字的音、義毫無關係（該書 108—109 頁），這也就是記號字。裘氏發展了他們的說法。

認為漢字是表意文字的人，主要著眼於漢字與表音文字的本質差別，並不是否認形聲字聲旁等有表音作用。

此外，還有人提出了關於漢字性質的一些新的說法，但影響不大，這裏就不具體介紹了。

跟漢字性質有密切關係的、漢字是否適合漢語的問題，也有不少人加以討論。在五六十年代，人們往往強調漢字與口語脫節的一面。近年來則有很多人認為，由於在漢語裏迄今為止單音節語素仍佔優勢，而且新詞大都由已有的語素合成，所以作為語素文字或語素一音節文字的漢字，跟漢語基本上仍是適合的。

（二）漢字起源的研究

本世紀以來，一般文字學者大都接受了文字源於圖畫的觀點（孫詒讓、沈兼士、唐蘭、蔣善國等人都曾明確指出象形文字與繪畫的源流關係），但對漢字起源的具體情況和漢字形成完整的文字體系的過程，並沒有認真討論。

中國考古學興起以後，尤其是 50 年代以來，在原始社會時代的遺址（這裏所說的“遺址”包括墓葬）裏發現了不少刻劃或描繪在器物上的符號。主要有兩類。一類多作幾何形。例如在屬於仰韶文化早期的一些半坡類型遺址裏發現的刻劃符號。另一類以象形符號為主，如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的一些遺址裏發現的一批符號，在傳世的一些良渚文化的玉器上，也刻有跟大汶口文化相似的符號。這些符號大都是單獨出現的，兩個以上符號排列成行的例子為數不多，主要見於良渚和龍山等文化的陶器上。

排列成行的符號大都發現得較晚。在注意到這類符號之前，學者們對上述原

始社會的符號是否文字的問題已經作了很多討論,但並沒有取得一致的意見。有些人認為它們是文字,有的甚至直接把它們當作早期的漢字加以辨釋(如于省吾《關於古文字研究的若干問題》,《文物》1973年2期)。有些人認為它們都還是非文字的標記(如汪寧生《從原始記事到文字發明》,《考古學報》1981年1期)。有些人認為半坡類型遺址出土的以及與之相類的那些符號不是文字,大汶口文化象形符號則是原始的漢字(如高明《中國古文字學通論》,文物出版社,1987)。

有一部分學者認為,判定這些符號是否文字應當有一個比較明確的標準,這就是看它們是不是記錄語言的符號。他們認為,上面所提的前一種符號不可能是文字。因為這類符號已經被用來記錄語言的確鑿證據,一點也沒有發現過。我們不能因為它們跟古漢字裏形體比較簡單的字偶然同形,就斷定它們之間有傳承關係。而且我們對新石器時代種族的情況瞭解得很少,把使用者的種族和語言情況都還不清楚的那些符號看作古漢字或其前身這件事,本身就是不妥當的。

至於後一類符號,從外形上看,有一些跟古漢字的確很接近。因此才有很多學者把這種符號看作原始漢字。但是由於誰也不能證明大汶口文化陶器上“幾個孤立的圖形”,就是記錄語言的文字,仍無法斷定它們確實是文字。

對於多個成行的符號,多數人認為它們是原始文字,有些人並嘗試加以釋讀。但是,也有人認為,由於材料太少,而且我們對它們的使用者的種族和語言情況缺乏瞭解,正確辨釋這種原始文字的可能性恐怕很小。

在漢字起源的研究中,研究者除了大量使用考古資料外,還普遍把兄弟民族的各種原始記事方法和納西原始文字(或稱納西圖畫文字)用作比較的資料。有些人還提出了關於漢字形成過程的一些比較具體的設想,如認為在漢字形成過程之初,假借方法就已普遍應用;在漢字的原始文字階段,文字和圖畫曾混雜在一起使用;形聲字在原始文字階段就已出現等等(參看汪寧生《從原始記事到文字發明》;裘錫圭《文字學概要》,1—8頁)。

從現在研究的情況來看,漢字起源的問題雖然討論得比較熱烈,但是如果沒有更新的重要資料發現,恐怕很難取得突破性的新進展。

70年代末以來,有越來越多的人明確地認識到,漢字從萌芽到形成能完整記錄漢語的文字體系,是經歷了漫長的過程的。有些學者提出了“原始文字”這一概念,以指稱處於形成過程中的文字。

對漢字最後形成能完整記錄語言的文字體系的時代,目前主要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形成於夏商之際(見《文字學概要》27頁),一種認為形成於夏初(見孟維

智《漢字起源問題淺議》，《語文研究》1980年1期）。

（三）漢字字體演變的研究

本世紀中葉以前，研究漢字字體變遷的人很多。各種漢字學通論性著作大都涉及這方面的問題，專門研究這方面的問題的著作也不少，比較重要的有尹桐陽《中國文字來源及變遷》（1925）、呂思勉《中國文字變遷考》（1926）、蔣善國《中國文字之原始及其構造》（1930）、容庚《中國文字學形篇》（1932）等書。但由於有關的考古資料還不很豐富，多數著作研究得不够深入。在研究字體演變的單篇論文中，除了王國維關於《說文》“古文”性質的一些文章外（詳後），比較重要的還有錢玄同《章草考序》（《師大國學叢刊》1卷1期，1930）、魏建功《草書在文字學上之新認識》（《輔仁學誌》14卷1、2期合刊，1946）等文。50年代以後，有關資料不斷發現，研究也漸趨深入。啓功對先秦以下各種字體作了全面研究，見所著《古代字體論稿》（文物出版社，1964）、《啓功叢稿》（中華書局，1981）等書。由於魏晉時代的碑志上所用的字體跟傳世的王羲之等人的字體不一樣，60年代中期郭沫若等人提出了《蘭亭序》真偽的問題。魏晉時代楷書、行書的真面貌究竟如何這個老問題，又引起了不少人的興趣（《蘭亭論辨》，文物出版社，1977）。通過討論，對魏晉時代在不同社會階層中和不同用途上使用着新舊不同的字體的現象有了比較清楚的認識。70年代以來秦漢古隸的發現，使關於隸書形成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後面將會比較具體地談到。

由於資料越來越豐富，研究越來越深入，人們對漢字字體的整個演變過程有了更深的認識。過去習慣於把漢字演變的過程描述為由甲骨文到金文再到篆文、隸書、楷書，簡單地把甲骨文和金文看作兩種有先後關係的字體。有人指出，應當把甲骨文看作當時的一種比較特殊的俗體，與之同時代的金文則代表當時的正體，並指出俗體在文字形體演變的過程裏所起的作用十分重要；有時候，一種新的正體就是由前一階段的俗體發展而成的（如隸書）；比較常見的情況是俗體的某些寫法後來為正體所吸收，或者明顯地促進了正體的演變（參看裘錫圭《文字學概要》第四章）。

本世紀出版的各種字體的字典多不勝數，就不一一介紹了。

（四）《說文》和“六書”的研究

《說文》是傳統文字學研究的中心。20世紀以來，研究《說文》的論著仍然非常

多。本世紀初期,章太炎及其弟子黃侃對於《說文》學有重大的貢獻。他們的特點是以《說文》為基礎,把對《說文》的研究擴展到語言的研究。章氏這方面的主要論著有《文始》、《新方言》、《小學答問》。黃氏這方面的著作經後人整理出版的,有《文字聲韻訓詁筆記》、《說文箋識四種》(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等。

由於古文字研究的進步,很多人能够利用古文字對《說文》的篆形和解說進行訂正。早在清末,吳大澂和孫詒讓等人就做過這方面的工作。此後不斷有人做這種工作。由於《說文》研究已多歷年所,本世紀以來,出現了不少總結前人研究《說文》的成果的著作。如馬叙倫創始於1911年完成於1928年的《說文解字六書疏證》(科學出版社,1957,上海書店1985年重印),對《說文》逐字進行疏證,既利用清人的校勘和研究成果,也表述自己新的見解。書中大量運用古文字的資料印證《說文》或糾正、指出《說文》的疏失。但馬氏利用古文字資料往往不够準確甚至有明顯的錯誤。馬氏還有《說文解字研究法》(商務印書館,1933)一書,指出了《說文》的一些體例,談了研究《說文》的方法和途徑。丁福保編的《說文解字詁林》是《說文》學的集大成著作(1928年上海醫學書局初版,1932年又搜集新的著述增刊補遺16冊,共82冊;1982年中華書局重印)。此書博採研究《說文》之書,將衆家說法列於每字之下。張舜徽《說文解字約注》(中州書畫社,1983),說解比較簡約,但對古文字成果利用得不够。

80年代以來,《說文》研究有明顯的進展。關於《說文》的通論性著作出現了不少,其中比較重要的有陸宗達的《說文解字通論》(北京出版社,1981)、姚孝遂的《許慎與說文解字》(中華書局,1983)。陸書通過對《說文》分析形、音、義的方法的總結,結合文獻典籍和古文字資料,說明了《說文》在解釋古代典籍上的重要性,同時也闡發了《說文》中蘊含的語言學素材,揭示了《說文》在探討古代社會狀況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姚書的特點是大量運用古文字研究成果糾正《說文》的錯誤。此外還有任學良《說文解字引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蔣善國《說文解字講稿》(語文出版社,1988)、余國慶《說文學導論》(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等書。

有關《說文》的學術活動也比較頻繁。1985年4月中國訓詁學會在河南鄭城召開首屆紀念許慎學術討論會,並成立了許慎研究會。會後,中國訓詁學會和許慎研究會編輯了論文集《許慎與〈說文〉研究論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1990年12月河南省社科院又在鄭城設立了許慎研究所。1991年9月河南省對外文化交流協會、許慎研究會、漯河市人民政府聯合主辦許慎與《說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並出版了論文集《說文解字研究》第一輯(河南大學出版社,1991)。為了普及

《說文》學的知識，王寧、董希謙主編了《許慎與〈說文〉小叢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這方面的書還有《說文解字助讀》（蘇寶榮，陝西人民出版社，1993）、《說文解字釋要》（王夢華，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等。《說文》系列的書也有很多人作了研究。特別是對於段注的研究比較多。清人已經對段注作了不少訂正工作。民國時期關於段注的著作側重於發凡舉例，對指導初學者讀段注很有裨益。雖仍有一些訂誤之作，但不佔主要地位。建國以後的段注研究是多角度的，從文字學、詞彙學、訓詁學、音韻學、辭書編纂學等角度都有人作過研究。郭在貽關於段注的系列論文，如《〈說文段注〉與漢文字學研究》等（見所著《訓詁叢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影響頗大。前人研究段注，對篆形問題不够重視，蔣冀騁《說文段注改篆評議》（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彌補了這一缺陷。還有人對徐鍇的《說文解字繫傳》作了研究（古敬恆《徐鍇〈說文繫傳〉研究》，重慶大學出版社，1995）。

本世紀中，研究跟《說文》有關的字體、六書、聲韻以及部首與檢字等方面的問題的人很多。我們只簡單介紹一下跟字體和六書有關的研究情況。

先談有關《說文》字體的研究。《說文》中收有小篆、古文、籀文三種字體。小篆方面，上面已經提到，不少人根據古文字（包括秦漢文字資料）對篆形作了訂正。對小篆的形成的研究也有了進步。不少人認為小篆是由春秋戰國時代的秦國文字逐漸演變而成的，而不是像《說文》所說的那樣由籀文“省改”而成的。古文和籀文討論得比較多。古文的時代的確定，是一個很重要的貢獻。吳大澂《說文古籀補》裏，已經根據《說文》古文多與較早的金文不合而有些字形却與戰國文字相合的現象，提出了許慎所謂古文實際上是周末文字的看法。他說：“竊謂許氏以壁中書為古文，疑周末七國時所作，言語異聲，非復孔子六經之舊簡。”陳介祺在為《說文古籀補》寫的序裏也說：“疑孔壁古經亦周末人傳寫，故……古文則多不似今之古鐘鼎。”後來王國維又根據大量資料斷定所謂古文是戰國時代東方國家的文字，其說見《桐鄉徐氏印譜序》（《觀堂集林》卷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同上卷七）、《史籀篇疏證序》以及就古文問題答容庚的信（《王國維全集·書信》436—438頁）。他認為籀文是秦國文字，不一定可信；關於古文為戰國時代東方國家文字的說法則是正確的，已為古文字學界所普遍接受。

傳統的看法，認為籀文是西周晚期的文字。隨着古文字研究的發展，對籀文的時代也產生了懷疑。吳大澂和陳介祺已經提出了《說文》所收籀文裏有時代較晚的文字的看法（分別見《說文古籀補》自序和陳介祺的《說文古籀補》序）。王國維和唐蘭都明確主張籀文是東周時代的一種文字（王說見《史籀篇疏證》和《戰國時

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唐說見《中國文字學》155 頁）。但近年來却有不少人認為這種說法的根據不足，結論不能成立，傳統的說法應當是可信的，但是籀文在後來的傳抄過程中確實產生了一些訛誤。

下面談談對“六書”的研究。

傳統的六書說中象形和會意的界綫並不十分清楚。例如“立”、“步”等字，講六書的人多數看作會意字。但是它們的性質跟“止戈爲武”一類會意字顯然是有區別的。鄭樵在《六書略》裏則把“立”和“步”列入象形字。他說“立”字“象人立地上”，“步”字“象二趾相前後”，解釋字形比《說文》高明。民國初期，林義光在《文源》裏明確主張，只有像“止戈爲武”“人言爲信”那樣“取其詞義連屬”的字，才可以算會意字。像射、涉、舂等字，林氏認為從古文字看都應該算象形字。這是有道理的。會意字跟所謂聲旁有義的形聲字也不易區分。

有的人仍然使用《說文》“會意”的名稱，但又用現代的理論對會意字加以分析。如最近出版的石定果所著的《說文會意字研究》（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6）“以構形和造意兩方面的標準，對會意字作了新的界定，劃清了會意字與合體會意字、會意字和形聲字的界綫”（見該書王寧序）。

由於有些人把原始社會時代遺址裏發現的、外形跟指事字比較接近的簡單刻劃符號看作文字，指事字和象形字究竟哪一種先出現的老問題，又一次引起了人們的興趣。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考古學報》1972 年 1 期）一文中說：“中國文字的起源應當歸納爲指事與象形兩個系統，指事系統應當發生於象形系統之前。”于省吾的看法與郭沫若相近（見《甲骨文字釋林·釋一至十之紀數字》）。但也有人認為這種討論沒有什麼意義，“因爲早在文字形成過程開始之前，‘指事’和‘象形’的表意方法就都已經在廣泛使用了。文字形成過程開始的時候，這兩種方法當然都會被用來造字，我們有什麼必要去討論二者出現的先後呢？”（裘錫圭《四十年來文字學研究的回顧》，《語文建設》1989 年 3 期）

在六書中，討論得最多的是轉注和假借。

《說文》所說的“轉注”究竟是什麼意思，這是爭論了一千多年的老問題。直到 90 年代還有人寫這方面的專著（孫雍長《轉注論》，嶽麓書社，1991）。但也有人認為，在今天再花大力氣討論這一問題，意義不大。從古到今對轉注的不同解釋非常多，幾乎所有可能想到的解釋都已經有人提出過了。有些說法所涉及的語言文字現象是有研究價值的，但是完全沒有必要把對這些現象的研究跟“轉注”定義問題糾纏在一起。

對假借的看法也存在分歧,其癥結在於假借和引申的分合。傳統文字學曾把字義引申看作典型的假借現象,直到現在還有人如此主張。但是,字義引申畢竟是語言現象而不是文字現象。所以現在多數文字學者主張把二者區分開來。

跟假借有密切關係的通假字的問題,有比較多的人進行研究。“通假”有狹義、廣義之分。一般認為狹義的“通假”指本有本字的假借。廣義的“通假”跟古人所說的“通用”相當,不同的字被用來表示同一個詞的各種現象,幾乎都可以納入其範圍。但也有人主張把“通假”看作通用和假借的合稱,認為“通用”不包括假借(劉又辛《大型漢語字典中的異體字、通假字問題》,《中國語文》1979年4期)。通假字的讀音問題,即本讀A音的字用作一個讀B音的字的通假字時,究竟應該改讀B音還是仍讀A音的問題,曾引起較多的討論。經過討論,多數人認識到,一個字用作另一個字的通假字,意味着這個字被用來表示通常由後者表示的一個詞,兩者應該讀同一個音(參看盛九疇《通假字小議》,《辭書研究》1980年1期;《通假字再議》,《辭書研究》1982年5期)。此外,還有人對古代文獻如秦漢帛書簡牘中的通假現象進行了研究。近年來,通假字字典性質的專著已出版了好幾種。其中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的《古字通假會典》(齊魯書社,1989)收集用例比較齊備。

對於形聲字的研究,已有專著出現(如李國英《小篆形聲字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形聲字結構方面的一些現象,如省聲、多形多聲、“右文說”等,都有不少人撰寫專文或在文字學通論性著作裏作過研究。其中討論“省聲”的論文尤其多。對於“右文說”的研究比較有代表性的論文是沈兼士1933年所作的《右文說在訓詁學上之沿革及其推闡》(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外編第一種《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下冊,1935),該文對右文說進行了系統的總結和理論探討,旨在建立漢語字族學。歷史上主張“右文說”的人沒有一部完整的著作流傳下來,其中王安石的《字說》在當時還是有影響的著作,今天也看不到原本。有人對此書作了輯佚工作,以胡雙寶的《王安石〈字說〉輯佚》(《古籍整理與研究》總第三期,1987)收集材料最多。

近年,王寧等人提出“漢字構形學”的說法(參看《中國教育報》的《語言文字》副刊從1996年年初開始連載的、由王寧撰寫的“漢字構形學講座”)。這種分析漢字字形結構的方法與傳統的六書說不同,我們附帶在這裏介紹一下。王寧認為:漢字的構形的基本元素是形位。形位是由個體字符中依層次切分出來的最小的、具有獨立的表現和區別造字意圖功能的構形單元。其中大部分是獨體字(成字構件),少部分是不成字的繪形或指事符號(非字構件)。近些年,北京師範大學漢字

所根據這種理論,採用計算機處理的新技術,對隸書、小篆和某些古文字的構形系統進行了大量研究工作。

(五) 漢字的結構類型的研究

這是漢字學的一個基本理論問題。

長期以來,研究漢字的人在這個問題上都跳不出“六書說”的圈子。直到20世紀30年代,唐蘭才試圖以自己的“三書說”來代替“六書說”。他的“三書說”是象形、象意、形聲(見《古文字學導論》)。50年代陳夢家提出了新的三書說,主張把古漢字分為象形、假借、形聲三種基本類型(《殷虛卜辭綜述》76—80頁,科學出版社,1956)。裘錫圭基本同意陳說,但把“象形”改成了“表意”(見《文字學概要》106—107頁)。他認為,從字符的性質上看,表意字使用意符,也可以稱為意符字。假借字使用音符,也可以稱為表音字或音符字。形聲字同時使用意符和音符,也可以稱為半表意字半表音字或意符音符字。這樣分類,眉目清楚,合乎邏輯。他還指出了一些不能納入三書的文字,如記號字、半記號字、變體表音字、合音字、兩聲字。

還有人提出了關於漢字結構類型的別的說法。例如張世祿的“寫實法”、“象徵法”、“標音法”(《中國文字學概要》),林澧的“以形表義”、“以形記音”、“兼及音義”(《古文字研究簡論》第一章)。龍宇純也提出了新的分類,有純粹表形、純粹表意、純粹表音、兼表形意、兼表形音、兼表音意、純粹約定等七種(《中國文字學》)。詹鄞鑫《漢字說略》把假借排除,又把表意字加以細分,得出象形、指示、象事、會意、形聲、變體六類。對漢字結構類型的研究是一個理論性的問題,從不同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的結論,現在還得不出公認的結論。

(六) 漢字形音義之間關係的研究

五六十年代以來,由於漢字整理和簡化等語文實踐的需要,對異體字、古今字的研究受到了重視。《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公佈前後,有不少學者討論到這類問題。80年代以後,有人對50年代規定的異體字進行了細緻的研究,提出了不少改進的意見。還有人專門對某些大型工具書中的異體字進行了研究(參看陳宜民《〈康熙字典〉的異體字及其整理》,《四川師範學院學報》1991年1期;陳抗《評〈現代漢語詞典〉對異體字的處理》,《中國語文》1994年4期)。

在異體字整理問題上,不少人注意到不僅要整理單個字的異體,還應該整理雙音節或多音節詞的異形(如“交代”和“交待”、“折中”和“折衷”等)。這在50年代

整理異體字時注意不够，後來有人指出了這一點，這無疑是正確的。但不少研究詞的異形的人，爲了強調自己的觀念跟舊的以單字爲本位的異體字觀念的不同，使用了“異體詞”或“異形詞”的名稱，混淆了語言現象和文字現象的界綫。這却是不够恰當的。

古今字指同一個詞的、通行時代有古今之別的不同書寫形式。在古今字的範圍應該怎樣劃的問題上有分歧意見。有些人主張把古今字跟通假字分開來，只把有“造字相承的關係”的那些字（如“縣”和“懸”、“說”和“悅”等）定爲古今字（見洪成玉《古今字概說》，《中國語文》1981年2期；《古今字概述》，《北京師範學院學報》1992年3期）。有些人認爲古今字跟通假字是從不同角度對同詞異字現象作出的“不同歸類”，二者“不是平行關係”，古今字應該包括通行時間有古今之別的通假字，而且古今字不但“可以指形義不同的兩個字，也可以指形不同但義同的異體字”（見陸錫興《談古今字》，《中國語文》1981年5期）。後一種意見符合歷史上使用“古今字”這類說法的實際情況。

同形字的現象，王力（《字的形、音、義》，中國青年出版社，1953）、李榮（《漢字演變的幾個趨勢》，《中國語文》1980年1期）等人都曾加以指出。裘錫圭在《文字學概要》中對這一現象作了較全面的論述。

同義換讀指用一個字表示意義跟它原來所代表的詞相同或相近的另一個詞，這兩個詞的音可以截然不同。現代學者中注意到這種現象的有沈兼士（《漢魏注音中義同換讀例發凡》，見《沈兼士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1986）、李榮（《語音演變規律的幾個趨勢》，《中國語文》1965年2期）、呂叔湘（《語文常談》，三聯書店，1980）等人。揭示這種現象，對於瞭解文字異讀產生的原因很有幫助。

（七）文字學史研究和常用漢字字源研究

關於漢字研究的歷史，本世紀以來有不少論文和專著。胡樸安《中國文字學史》（商務印書館，1936），是第一部文字學史專著。近些年來，出版了好幾種漢字學史方面的專著，如黃德寬、陳秉新《漢語文字學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孫錫鈞《中國漢字學史》（學苑出版社，1991）、姚孝遂主編《中國文字學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

本世紀以來不斷有人撰寫漢字字源的論文或專著。在近年出版的專著中，鄒曉麗編著的《基礎漢字形義釋源——說文部首今讀本義》（北京出版社，1990）、李樂毅編著的《漢字演變五百例》（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2）比較有影響。這種工

作無論對學術研究還是對普及漢字知識,都是有用的,但不容易做好,因為學術界對於很多字的說法還沒有統一的結論。

在這一節的最後,我們附帶談談漢字字典的編纂。

1915年,徐元誥、歐陽溥存等編的《中華大字典》出版(中華書局)。它以《康熙字典》為基礎,校正其錯誤2000餘條,並充實了一些詞義。收字48000多個,分214部。1968年,林尹、高明主編的《中文大辭典》在臺灣出版,共有40冊。該書博綜古今文獻,選收單字49888個,解釋比較精確扼要,並注重漢字的源流及其音、義的發展變化。1990年,四川辭書出版社和湖北辭書出版社出版了《漢語大字典》。這部字典收54000多字,還在字頭下收列了能够反映形體演變關係的有代表性的甲骨文、金文、小篆和隸書的形體,並附有簡單的字形解說。1994年出版的《中華字海》(中華書局、中國友誼出版公司),收字八萬多,是迄今為止收字最多的漢語字典。在中小型字典方面,1953年出版了《新華字典》(人民教育出版社)。該字典經過多次修訂,最新版是1979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這是一部使用十分廣泛的字典,釋義準確,編排合理,影響非常大。

本世紀以來,研究古代各種字典的論著也很多,這裏就不談了。

三、古文字研究

我國對古文字的研究開始得很早,但是,長期以來是包含在作為“小學”一部分的傳統文字學和以古銅器和碑刻等為主要研究對象的金石學裏的,一直到20世紀才有“古文字學”的名稱。古文字學的範圍有廣義狹義之分,我們這裏所說的是狹義的古文字學,是文字學的一個分支。它著重研究漢字的起源,古漢字的形體、結構及其演變,字形所反映的本義以及考釋古文字的方法。20世紀以來,在西方學術思想的影響下,中國現代的歷史學、考古學和語言學逐漸形成,古文字研究也逐漸加強了科學性。通過唐蘭等人的努力,古文字學終於擺脫了金石學和傳統文字學的束縛,呈現了新的面貌。建國以來,尤其是70年代以來,由於新資料的發現和研究者的努力,先秦、秦漢文字的研究有了比較明顯的進展。有人主張把“古文字”的範圍擴大到秦和西漢前期的文字,即把小篆和古隸也包括在古文字裏。1978年成立了中國古文字研究會,至今已舉行過十一屆學術討論會,研究會與中華書局合編的《古文字研究》已出版到第十九輯。

20世紀的古文字學研究可以30年代為界劃分為兩大階段。在前一階段,吳大

澂、孫詒讓和民國時期的羅振玉、王國維，是最重要的代表性學者。30年代以後的主要學者，有郭沫若、唐蘭、于省吾等人。唐蘭的《古文字學導論》是第一部古文字學理論性著作。其書第二部分闡明研究古文字，主要是考釋古文字的方法，特別強調了偏旁分析法和歷史考證法的重要性。此書標誌着現代意義的古文字學的建立。

80年代以來，有不少古文字學通論性著作出版，如李學勤《古文字學初階》（中華書局，1985）、林澐《古文字研究簡論》（吉林大學出版社，1986）、高明《中國古文字學通論》（文物出版社，1987）、陳煒湛、唐鈺明《古文字學綱要》（中山大學出版社，1988）、陳世輝、湯餘惠《古文字學概要》（吉林大學出版社，1988）等。這些書在古文字學的理論和研究方法方面，對唐氏的《導論》都有補充和發展。

本世紀還出版了一些包括多種古文字資料的古文字字典和文編，在比較舊的字典中，汪仁壽的《金石大字典》（1926）較為有名。比較新的有高明的《古文字類編》（中華書局，1980）和徐中舒主編的《漢語古文字字形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下面我們分甲骨文研究、金文研究、秦系文字研究、戰國文字研究四項，對研究成果作簡單介紹。

（一）甲骨文研究

殷墟甲骨文大約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開始受到古董商的注意。次年，王懿榮鑒定為三代古文並加以收藏。自發現以來，至今通過私人挖掘和公家發掘而得到的有字甲骨，據胡厚宣統計，約有十五萬片左右（《八十五年來甲骨文材料之再統計》，《史學月刊》1984年5期）。

1. 甲骨文著錄情況

1903年，劉鶚把自藏的一部分甲骨編成《鐵雲藏龜》出版。這是第一部著錄甲骨文的書。序言中將甲骨文稱為“殷人刀筆文字”。此後，著錄甲骨文的書不斷出版。比較重要的有羅振玉編的《殷虛書契》前、後、續三編，董作賓編的、著錄中央研究院發掘殷墟所得甲骨的《殷虛文字甲編》和《乙編》。中華書局1978—1983年出版了以郭沫若為主編，胡厚宣為總編輯的《甲骨文合集》，收甲骨41956片，是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殷墟甲骨文資料著錄書。1973年在河南安陽小屯南地，1991年在安陽花園莊，先後發現了重要的甲骨文資料。前一次發現的多達五千餘片，已由發掘者編成《小屯南地甲骨》（中華書局，1980）公佈於世。

2. 甲骨文字典和文編

王襄的《簠室殷契類纂》(天津博物院印行,1920;增訂本,1929),是第一部甲骨文字典。此後又有商承祚的《殷虛文字類編》(1923)、朱芳圃的《甲骨學文字編》(商務印書館,1933)、孫海波的《甲骨文編》(燕京大學哈佛燕京學社,1934)。孫書在1965年修訂成新版,由中華書局出版,影響較大。1959年,金祥恆《續甲骨文編》出版(臺北藝文印書館),收有一些孫書未及收的新材料,對孫書的誤摹誤釋之處也有所校正。

日本島邦男《殷墟卜辭綜類》是一部有創造性的工具書。此書根據甲骨文的字形特點分部排字,除部分極常用的字外,每個字下都按甲骨文原樣摹出含有這個字的所有卜辭,極便於研究者使用。姚孝遂、肖丁主編的《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和《殷墟甲骨刻辭類纂》(中華書局,1990)是近年出版的兩部大型工具書。後者仿島書而編,體例與島書基本相同,但增加了釋文和拼音檢索等項目。由饒宗頤主編、沈建華編輯的《甲骨文通檢》(香港中文大學)從1989年以來已經出版了四冊。另外,徐中舒主編的《甲骨文字典》(四川辭書出版社,1988)吸收了近年古文字研究及考古發掘的新成果,也是一部大型工具書。趙誠《甲骨文簡明詞典——卜辭分類讀本》(中華書局,1988)、崔恆昇《簡明甲骨文詞典》(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兩書,對於研究商代詞彙有一定的幫助。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新近出版的《甲骨文字詁林》(于省吾主編,中華書局,1996)。此書在每個單字下面把1989年以前各家與此字相關的、有代表性的說法收集在一起,比起李孝定在60年代出版的《甲骨文字集釋》,增加了不少新的內容。書中不少“按語”,或評價已往各家的得失,或提出自己的新見,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3. 綜合性或通論性著作

1956年,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由科學出版社出版。此書資料豐富,論述全面,並有一定深度,對於初學者和研究者都是非常有用的書。可惜成書倉猝,引用甲骨文資料有很多不應有的錯誤。陳氏自己對各種問題的意見也不盡妥當。1978年嚴一萍出版的《甲骨學》一書,比較全面地總結近八十年甲骨學研究的成果,有的內容比陳書豐富。80年代以後,通論性質的著作出版了好幾種,如王宇信《建國以來甲骨文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甲骨學通論》(同前,1989),吳浩坤、潘悠《中國甲骨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王明閣《甲骨學初論》(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陳煒湛《甲骨文簡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張秉權《甲骨文與甲骨學》(臺灣國立編譯館,1988)。

4. 甲骨文字研究情況

1904年，孫詒讓根據《鐵雲藏龜》寫成《契文舉例》（此書遺稿由羅振玉在1917年印行），是第一部考釋和研究甲骨文的著作。分上下兩卷。上卷對殷墟甲骨卜辭的內容作出初步的研究。下卷包含“文字”與“雜例”兩篇。“文字”篇對見於《鐵雲藏龜》的甲骨單字的很大一部分逐個進行考釋，釋出了不少關鍵字。羅振玉是甲骨學的奠基者。他最早打聽到甲骨的真實出土地點。1910年他的《殷商貞卜文字考》，考定甲骨出土之地是殷都故墟，甲骨文是殷王朝貞卜的遺物，把甲骨文研究推進了一大步（他當時誤認為殷墟只是“武乙之墟”）。1915年，他在此書基礎上寫成《殷虛書契考釋》，在文字的考釋和卜辭的通讀等方面取得了較大突破，並為甲骨學奠定了初基。王國維在羅振玉的影響下開始從事古文字研究，在甲骨文方面，王國維新識之字並不是很多，但往往都是關鍵字，如“旬”、“上甲”合文等，對通讀卜辭有重要意義。他的主要貢獻是以甲骨卜辭與典籍互證的“二重證據法”，進行歷史、地理和禮制等方面的研究。他的主要代表作有《殷禮徵文》（1916）、《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1917）、《殷周制度論》（1917）、《戡壽堂所藏殷虛文字》（1917）。王國維還是最早進行甲骨綴合的學者。

羅王以後，對甲骨學作出重大貢獻的有郭沫若、唐蘭、董作賓、于省吾等人。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1930，人民出版社1952年再版）、《卜辭通纂》（1933，日本文求堂書店印行）和《殷契粹編》（1937，日本文求堂印行）在卜辭的通讀上有重要貢獻。董作賓的主要貢獻是甲骨斷代研究，我們將在後面略作介紹。唐蘭有《天壤閣甲骨文存考釋》、《殷虛文字記》（1934年北京大學講義，1978年修改刻印本，1981年中華書局出版），考釋文字屢有創獲。于省吾在1940、1941、1943年，先後出版了《雙劍謠殷契駢枝初編》、《續編》及《三編》。1954年撰成《四編》（稿本）。70年代末，作者將《初編》到《四編》的文章加以刪削改訂，加上解放後發表的研究甲骨文的文章，成為《甲骨文字釋林》（中華書局，1979），反映了作者在考釋甲骨文方面的主要成績。唐蘭和于省吾都很注意考釋文字的方法，所得結論比較可信。此外，胡光燾、丁山、王襄等人在釋字方面也都有有一定的貢獻。

5. 甲骨文綴合情況

自王國維以後，有不少學者做過甲骨綴合工作，取得了相當好的成績。這方面的專著已經出版了好幾種。如曾毅公《甲骨彙存》（1939）、《甲骨綴合編》（1950）、郭若愚等《殷虛文字綴合》（科學出版社，1955）、張秉權《殷虛文字丙編》（1959—1972）、嚴一萍《甲骨綴合新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和《甲骨綴合新編補》（同

前,1976)等。另外,蔡哲茂發表了一系列有關《甲骨文合集》綴合的論文,很有價值。前些年有人嘗試用電子計算機綴合卜甲(童恩正等《關於使用電子計算機綴合商代卜甲碎片的初步報告》,《考古》1977年3期),但至今沒有太大的進展。

6. 殷墟甲骨文的分期斷代研究

這是甲骨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董作賓在1931年發表於《安陽發掘報告》第三期的《大龜四版考釋》一文中,第一次指出殷墟甲骨卜辭中記“貞人”之名的現象以及“貞人”名在甲骨斷代上的重要作用。以此為基礎,他初步提出了斷代的八個標準。在1932年寫成、1933年發表的《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一文中,董氏全面論述了他的斷代學說,提出甲骨斷代的十項標準,把甲骨文時代劃分為五期,大大提高了甲骨學的水平。斷代學說大大提高了甲骨文作為歷史和語言資料的價值,具有極為深遠的意義。後來,有好幾位學者對董作賓的意見作出了補充和糾正。50年代,陳夢家從董作賓所說的“文武丁時代卜辭”中分出了“午組”“自組”和“子組”卜辭,並考訂其為武丁時代之物,糾正了董氏所說的“文武丁復古”的錯誤。1953年,日本學者貝塚茂樹和伊藤道治發表《甲骨文斷代研究的再檢討》(《東方學報》第23冊),得到的結論與陳氏大體相同。1976年殷墟發現了商王配偶“婦好”的墓葬,其名見於武丁時代卜辭和被一般人認為屬於武乙、文丁(即文武丁)時代的有“貞人”歷之名的卜辭,由此引起關於“歷組卜辭”的時代的討論。參加討論的人分成觀點對立的兩派,一派認為這種卜辭應當屬於武丁和祖庚時代,另一派維持這種卜辭是武乙文丁卜辭的舊說。這次討論雖然還沒有結束,但是促使人們對斷代的標準進一步作認真的考慮,對甲骨文分期斷代的研究已經起了很大的推進作用。早在1957年,就有學者指出甲骨的分類與斷代應當分成兩個步驟來進行,分類要依據字體、字形等特徵(見李學勤《評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考古學報》1957年3期)。這在甲骨斷代的理論研究上是一個突破。但是直到70年代以後在關於歷組卜辭的討論中,這一觀點才真正受到重視。按照這種觀點進行甲骨分期斷代研究的代表性專著有黃天樹的《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文津出版社,1991)、彭裕商的《殷墟甲骨斷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以及李學勤和彭裕商合著的《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也有人從別的角度對甲骨進行斷代研究。貝塚茂樹較早注意到利用鑽鑿形態進行斷代。後來,許進雄在這方面做了比較多的工作,其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甲骨上鑽鑿形態的研究》(臺北藝文印書館)。值得一提的是,1996年5月16日“夏商周斷代工程”作為九五國家重大科研項目正式啟動,其目的是為了將夏、商、周時期的年代學進一步科學化、量

化。由於加速器質譜測定¹⁴C方法技術的進展,過去不能取樣測定的商周甲骨,現在可以取樣測定其年代了,因而有希望測出有關王的大致日曆年代。這項工作對甲骨分期學說也將是一個檢驗,具有重大的意義。

7. 甲骨語言研究及其他

本世紀以來在甲骨語言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主要體現在語法研究方面。1928年胡光燾《甲骨文例》出版,此書涉及不少語法問題。50年代,管燮初《殷虛甲骨刻辭的語法研究》、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文法》是甲骨文語法研究重要的兩部著作。近年來的專著有沈培的《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文津出版社,1992)、張玉金的《甲骨文虛詞詞典》(中華書局,1995)。其他還有一些關於句法、虛詞方面的單篇論文,但是關於語音、詞彙方面的論著一直比較少。1990年10月華中師大甲骨語言研究中心發起召開了全國首次甲骨語言研究方法討論會。會後出版了論文集《甲骨語言研討會論文集》(華中師大出版社,1993)。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學者在研究甲骨語言問題時較多地使用了甲骨分類、斷代的成果,同時,有些學者在進行甲骨文字考釋時,也注意從語言學的角度看問題,這都提高了研究的質量。但是,總的看來,目前對甲骨語言的研究還很不够,亟需加強。

近年還出現了從文字學角度研究甲骨文的專著,如趙誠《甲骨文字學綱要》(商務印書館,1993)和李圃《甲骨文文字學》(學林出版社,1995),這在漢字的斷代研究方面是一種有益的嘗試。

利用甲骨文進行社會歷史等方面研究的論著數量很多,其中不少涉及文字的考釋和卜辭的釋讀。這裏就不多談了。

現已發現的甲骨文,除了殷墟甲骨文以外,還有西周甲骨文。下面我們簡單談談這方面的研究情況。

50年代以來,發現了西周時代的甲骨。其中以70年代在陝西岐山、扶風一帶古代周原地區發現的最為重要。已發現的刻字西周甲骨總計有300多片(參看陳全方《陝西岐山鳳雛村西周甲骨文概論》,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10輯《古文字研究論文集》,1982),其中少量卜甲的時代可能屬於商代末期。已經出版了兩種全面研究西周甲骨文的專著,即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和徐錫臺《周原甲骨文綜述》(三秦出版社,1987)。目前,對西周甲骨的研究還是初步的,成果不很豐富,而且多側重於探史,應用這些新的文字資料來作文字學的研究則顯得比較薄弱。

這裏附帶談一下古文字中所謂“易卦”的問題。在殷周時代的甲骨、銅器和其

他物件上,有時可以看到一種用六個或三個數字組成的符號,其意義有很長時期沒有確解。李學勤在1956年曾敏銳地意識到它可能同《周易》的“九”和“六”有關(見《談安陽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11期)。1978年冬,張政烺在長春舉行的中國古文字研究會首屆年會上,指出這種數字符號並非什麼“奇字”,而是“易卦”。此後,張先生發表了《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考古學報》1980年4期)等文,其他學者也發表了一些這方面的文章。雖然各家討論的問題還有待於進一步深入研究,但甲骨、銅器上的這些由數字組成的“奇字”已不再是不可理解的神秘之謎了。

(二) 金文研究

這裏所說的金文指商周金文。在古文字學中,對金文的研究開始得比較早。清代古文字研究的重點是金文,有些學者主要生活在清末,但關於金文研究的著作則是20世紀以後才問世的。如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是1902年問世的。孫詒讓《古籀餘論》成書於1903年,但到1929年才出版。吳大澂的《憲齋集古錄》完成於1896年,但1918年才出版。方濬益的《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1899年完成,但直到1935年才出版。這幾本著作都有較高的參考價值。本世紀金文研究的情況,我們分幾個方面加以介紹。

1. 金文著錄情況

民國以後,著錄青銅器的著作很多。這裏只能提到一些重要的著錄書。1937年出版的羅振玉的《三代吉金文存》,是當時最大的一部青銅器著錄書。1957年,于省吾出版了《商周金文錄遺》,為補充《三代吉金文存》之作。1983年,嚴一萍《金文總集》出版。此書收1983年以前刊佈的青銅器銘文拓本8000多件,是收錄資料較全的書。1984年徐中舒《殷周金文集錄》出版。此書彙集解放以來至1980年底國內出版的書刊中已經著錄的商周有銘青銅器和部分未曾著錄的有銘青銅器。近年出版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的《殷周金文集成》(中華書局,1984—1994),是迄今為止最完整的金文資料著錄書。它包括銘文、圖像、釋文和索引幾大部分,而以銘文為主。所收各器以類為綱,分樂器、炊器、盛食器、酒器、水器、兵器、其它等七大類依次編排。每一類銘文皆以原大製版,按字數多少排列。銘文各冊後附有“說明”,注明所收各器的字數、時代、著錄、出土、流傳、收藏、資料來源等情況。

2. 通論性著作

1941年,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出版。此書分上下兩編,共十九章。對青銅器的起源、發現、分類、時代、銘文、花紋、鑄法、價值、去銹、拓墨、仿造、辨偽、銷毀、收藏、著錄等方面逐一加以詳論,在金文研究史上,第一次把有關青銅器的各種問題放在一起系統加以探討,意義重大。1958年,容庚、張維持的《殷周青銅器通論》是在《商周彝器通考》的基礎上增加新資料編寫而成的,比較簡明扼要,適合初學者使用。近年出版的、朱鳳瀚撰寫的《古代中國青銅器》(南開大學出版社,1995),充分利用了考古學的方法和成果,並結合古文字學和科技、美術方面的研究,內容豐富,深入淺出,適合各種讀者的需要(參看該書李學勤序)。

3. 工具書

收錄金文字形的工具書,以容庚的《金文編》最為有名。此書初版於1925年,1939年出第二版,1959年出第三版,1985年出版了經過增訂的第四版(張振林、馬國權摹補,中華書局)。此書收字比較全面,摹錄也比較精確。但在釋字方面比較保守。在通假問題上,往往本借不分,甚或本借顛倒。專門校訂此書錯誤的專著已經出版了兩種(陳漢平《金文編訂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董蓮池《〈金文編〉校補》,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校正《金文編》的單篇論文也發表了好幾篇。除了《金文編》以外,陳初生編纂、曾憲通審校的《金文常用字典》(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比較方便實用。1995年,戴家祥主編的《金文大字典》出版(學林出版社),該書的特色是所收金文都選自拓片,保證了字形的準確性。收集金文考釋成果的工具書,有周法高主編、張日昇、徐芷儀、林潔明編纂的《金文詁林》(1975)和李孝定、周法高、張日昇等人編著的《金文詁林附錄》(1977)以及周法高編撰的《金文詁林補》(1982)。這幾本書彙集各家說法,並加按語以評價其得失,是非常有用的參考書。現在缺少的是彙集此書出版以後新出的研究成果的工具書。

查找金文原始資料的索引,研究者也很需要。但至今還沒有像《殷墟甲骨刻辭類纂》那樣的書,研究者查找金文材料不太方便。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編輯出版過《青銅器銘文檢索》(原名《金文單字引得》,1995),但大陸學者難以見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張亞初已經編有《殷周金文集成引得》一書(見《疑難銘文擬定一覽表》,《于省吾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吉林大學出版社,1996),希望能夠早日出版。關於金文著錄書目的工具書,王國維曾編有《宋代金文著錄表》和《國朝金文著錄表》,柯昌濟編有《金文分域編》二十卷(1935)、《續編》十四卷(1937)。近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編輯了《新出金文分域簡目》(中華書局,1983)、孫稚雛編輯了《金文著錄簡目》(1981)。

4. 文字考釋、斷代等方面的研究情況

本世紀初，羅振玉、王國維對青銅器都有所研究。王氏在金文方面有《觀堂古金文考釋五種》和很多單篇論文。

30年代，郭沫若寫成《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對所收銘文都作了詳細的考證，有不少很好的意見。此書初版是1932年在日本印行的，只有考釋沒有圖版。1934年彙集銘文及器形照片，編為《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次年又撰成《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後來作者又對全書作了修改補充，抽換並增補了一部分資料，於1957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名為《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此書在考釋文字、對器物所作的分期和分域研究、利用金文資料闡發歷史等方面都有重要貢獻。郭沫若有關金文研究的論著還有《金文叢考》（日本文求堂書店印行，1932）、《金文餘釋之餘》（1954）。1954年，作者把這兩本書跟《古代銘刻彙考》正續編中有關金文的部分彙集在一起，加以刪改補充，編成三冊，仍名《金文叢考》，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影響較大。

楊樹達從40年代始研治金文，其成果大都集中在《積微居金文說》中。此書於1952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後來他又寫作了《積微居金文餘說》。1959年，科學出版社把二書合為《積微居金文說》增訂本出版。該書主要解釋兩周銅器銘文，參考前人的解說，將銅器銘文與經史相印證，解釋字詞深入細緻，考釋文字比較精到準確，不少地方超越了前人。

唐蘭在考釋金文方面也有不少貢獻。他的代表作有未完成稿《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中華書局，1986），其他論文見故宮博物院所編《唐蘭先生金文論集》（紫禁城出版社，1995）。

于省吾考釋金文的文章有不少篇，他綜合運用各種考釋方法，從對形、音、義縱橫關係的分析和對名物制度的考訂等方面，研究解決了一些難字的釋讀問題（見《雙劍謠吉金文選》，1934；《釋盾》、《釋能和羸以及从羸的字》、《釋兩》、《釋从天从大从人的一些古文字》，分見《古文字研究》第三輯，1980；第八輯，1983；第十輯，1983；第十五輯，1986）。

李學勤研究青銅器銘文的文章除已結集為《新出青銅器研究》出版（文物出版社，1990）以外，還有很多。其中有不少文章涉及對文字的釋讀，往往頗多新意，很有啟發性。此外，白川靜的代表作《金文通釋》（1964—1984）以及馬承源主編的《商周青銅器銘文選》（文物出版社，1985—1990）都是研究金文的重要參考書。

80年代以來有幾批80年代之前通過正式的考古發掘獲得的重要青銅器銘文

經過整理而發表,其中不少新材料引人注意。如尹盛平主編的《西周微氏家族青銅器群研究》(文物出版社,199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的《殷墟青銅器》(文物出版社,1985)、盧連成、胡智生編寫的《寶鷄強國墓地》(文物出版社,1989)、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單位編寫的《浙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

周代金文的分國研究已經取得了比較大的成績(有的研究已延及戰國時代)。30年代郭沫若在《兩周金文辭大系》一書首次對東周的161器進行了分國考察。近年來,有劉彬徽、李零等人對楚國銅器加以收集研究(見劉彬徽《楚系青銅器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李零《楚國銅器銘文編年匯釋》,《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輯,1986;李零《論東周時期的楚國典型銅器群》,《古文字研究》第十九輯,1992);董楚平對吳越等國金文的研究(《吳越徐舒金文集釋》,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徐少華對周代南方國家金文的研究(《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等等。前幾年,從位於山西曲沃和翼城之間的天馬一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盜掘出土的晉侯銅器,在香港等地的古玩市場上屢有出現。1992年以來,由北京大學考古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合組的曲村考古隊,在對墓地進行的搶救性發掘中,確定西周早中期至春秋早期晉侯墓地即在此處。發掘中發現了一些晉侯銅器,這些銅器對研究晉國歷史有重大價值,對我們瞭解西周晚期青銅器的整個面貌也有幫助(參看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馬一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二次發掘》,《文物》1994年1期;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馬一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四次發掘》,《文物》1994年8期;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馬一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五次發掘》,《文物》1995年7期)。

青銅器斷代研究對金文研究具有重大意義,一直是金文研究者注意的重點。郭沫若的《兩周金文辭大系》借鑒考古學的類型學方法,發明“標準器繫聯法”,奠定了青銅器的斷代基礎。除了郭書以外,唐蘭《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古文字研究》第二輯)、陳夢家未完成稿《西周銅器斷代》(《考古學報》第9冊,1956年4期)都是重要的著作。唐蘭和李學勤在西周銅器斷代上跟郭沫若有較大分歧,他們的討論促進了青銅器斷代研究的進步。近些年來,青銅器斷代研究的一個較大的特點是比較充分地發揮了窖藏和墓葬出土的銅器群的作用,學者們往往選擇具有標尺作用的銅器群,通過同群和異群各器間的縱橫聯繫來進行斷代研究(李學勤《西周中期青銅器的重要標尺——周原莊白、強家兩處青銅器窖藏的綜合研究》,《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79年1期;劉啓益《微氏家族銅器與西周銅器斷

代》，《考古》1978年5期）。

有人還嘗試利用金文的記時資料來推定銅器的年代。周代銅器銘文有些具備王年、月份、月相和記日干支，可以結合曆法研究推定其年代。但“月相”所指日期問題一直是爭論的焦點。由於這個問題比較複雜，關於西周各王在位年代也沒有統一的想法，所以這方面的研究雖然相當熱鬧，但目前還很難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

周代金文語法的研究也有比較大的進展，這都是近些年發展起來的。管燮初《西周金文語法研究》（商務印書館，1981）是迄今為止唯一一部對金文語法作全面研究的專著，作者採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分析比較細緻。此外，馬國權、張振林、陳永正、楊五銘、唐鈺明等人對代詞、語氣詞、連詞、被動式、複音詞的研究，可以補正現有漢語史著作中的某些結論。崔永東《兩周金文虛詞集釋》（中華書局，1994）是第一部金文虛詞詞典，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但可以進一步研究的地方還有不少。

金文材料往往能够跟古文獻材料相印證，學者們利用金文進行商周社會歷史等方面研究的著作非常多，這些著作對於青銅器銘文研究有較重要的參考價值，我們這裏就不作介紹了。

（三）秦系文字研究

秦系文字包括春秋戰國時代的秦國文字和秦代文字。

建國以後特別是70年代以來，秦系文字的材料不斷發現，其中簡牘文字資料佔有相當的數量。1975年12月湖北雲夢睡虎地十一號秦墓出土竹簡1100多枚。其內容有編年記、語書、秦律十八種、效律、秦律雜抄、法律答問、封診式、為吏之道、日書甲乙二種，是戰國末期至秦始皇時期之物。同年12月至1976年1月又在同地四號秦墓出土了家書木牘二件。此後，秦系文字的簡牘資料陸續有所發現。如1979年至1980年間四川青川縣發現的木牘、1986年9月甘肅天水放馬灘發現的竹簡、1989年湖北雲夢龍崗發現的簡牘、1993年湖北江陵縣荊州鎮郢北村王家臺發現的竹簡等等。睡虎地秦簡整理小組編寫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0），發表了1975年底睡虎地秦墓出土的全部竹簡，對研究有很大推進作用。到目前為止，以這批秦簡為資料的文字編已經出版了三種（張世超、張玉春《秦簡文字編》，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90；陳振裕、劉信芳《睡虎地秦簡文字編》，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張守中《睡虎地秦簡文字編》，文物出版社，1994）。

由於大量用古隸書寫的秦和西漢早期的簡牘和帛書的發現，大家才認識到早期隸書的真正面貌，並且認識到隸書不是秦統一後在小篆的基礎上形成的，而是在戰國晚期的秦國，以秦國文字的簡俗體為基礎而形成的（裘錫圭《從馬王堆一號漢墓“遺冊”談關於古隸的一些問題》，《考古》1974年1期；吳白匋《從出土秦簡帛書看秦漢早期隸書》，《文物》1978年2期）。這在隸書的研究上是一個突破。有人對小篆到隸書的演變作了專門的研究（趙平安《隸變研究》，河北大學出版社，1993），還有人對隸書作了比較全面的研究（任平《說隸》，杭州大學出版社，1997）。

秦系文字的金文、石刻、陶文等資料，也有不少人加以研究，並取得了較好的成績。金文方面的主要著錄有：羅振玉《秦金石刻辭》三卷（1914年石印本）、容庚《秦漢金文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五，1931）、《金文續編》十四卷（商務印書館，1935）。王輝《秦銅器銘文編年集釋》（三秦出版社，1990）按時代順序安排秦系金文資料，全書合計收器二百七十件。考釋中對已有成果加以總結，並提出了自己的不少新見解。

秦石刻文字的著錄主要有商承祚的《石刻篆文編》（科學出版社，1957）。大家對石刻文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石鼓文上。馬叙倫、楊壽祺、馬衡、唐蘭、張政烺、郭沫若都作過研究。近幾十年來，石鼓文的時代是討論的熱點（參看韓偉《北園地望及石鼓詩之年代小議》，《考古與文物》1981年4期；裘錫圭《關於石鼓文的時代問題》，《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5年1期；徐寶貴《石鼓文年代考辨》，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國學研究》第4卷，1997），其中徐文主要根據石鼓文的形體特點論證其年代是春秋中晚期之際，這一結論比較有說服力。陝西鳳翔南指揮一號秦公大墓曾出土一批石磬，銘文殘存一百餘字，對研究石鼓文的時代有很大的參考價值，有人公佈了它的資料並作了研究（王輝、焦南峰、馬振智《秦公大墓石磬殘銘考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六十七本二分，1996）。秦文字中另一種有名的石刻是詛楚文，較早的有郭沫若《詛楚文考釋》（作於1947年，1982年與《石鼓文研究》合併出版）。近年有人對它的時代作了進一步的研究（黃奇逸《石鼓文年代及相關諸問題》，《古文字研究論文集》，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10輯，1982；陳偉《詛楚文時代新證》，《江漢考古》1988年3期等）。

秦陶文的研究在比較早的時候就引起了人們的重視。羅振玉《秦漢瓦當文字》（1914）、陳直《關中秦漢陶錄》及《補編》（拓本，藏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陝西省博物館《秦漢瓦當》（文物出版社，1964）是比較早的著作。比較新的有袁仲一編寫的《秦代陶文》（三秦出版社，1987）。此書收集了很多陶文拓片，還附

有字表,便於使用。著名的秦封邑瓦書也有人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參看郭子直《戰國秦封宗邑瓦書銘文新釋》,《古文字研究》第十四輯,1986;黃盛璋《秦封宗邑瓦書及相關問題考辨》,《考古與文物》1991年3期)。

秦璽印、漆器文字、貨幣等也有人作了研究。

漢語大字典字形組編的《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四川辭書出版社,1985),收入了一些秦和西漢早期的簡牘、帛書文字的字形。袁仲一、劉鈺《秦文字類編》(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對出土的秦文字做了較全面的整理,可惜此書摹寫錯誤太多。

秦代之後的篆文資料也有人搜集整理。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羅福頤的《漢印文字徵》(文物出版社,1978)及《補遺》(同上,1982),還有施安昌的《唐代石刻篆文》(紫禁城出版社,1987)。

(四) 戰國文字研究

這是古文字學中較晚形成的一個分支,民國以來才發展起來。二三十年代,丁佛言、羅福頤、顧廷龍、丁福保等人編寫了《說文古籀補補》、《古璽文字徵》、《古陶文彙錄》、《古錢大辭典》等有用的工具書。解放後,朱德熙、饒宗頤、李學勤等人對促進戰國文字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貢獻。近一二十年來,一大批年輕學者又繼續努力,使得戰國文字研究的局面顯得生氣勃勃。在對戰國文字作比較全面、系統的概述性論著中,以李學勤的《戰國題銘概述》為最早(上、中、下,《文物》1959年7、8、9期)。其後,湯餘惠《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1986)是從構形學角度對戰國文字進行的比較全面的分析總結。80年代末出版了第一部戰國文字通論性專著——何琳儀的《戰國文字通論》(中華書局,1989)。現在,研究者對戰國文字形體的特點及各地區文字之間的差別,已有了較前深刻得多的認識。但是戰國文字各種資料比較分散,迄今還沒有一部比較全面集中的資料書,對於研究者十分不便。關於戰國文字的研究論著數量十分繁多,難以列舉,下面我們的介紹只提出一些主要情況。

1. 戰國金文研究

本世紀20年代末,在河南洛陽發現古墓,出土了魏國標準器羸羌鐘,還有一些東周的容器和金銀器。許多學者如劉節、唐蘭、郭沫若、徐中舒等人都有專文考釋。30年代,在安徽壽縣朱家集李三孤堆楚王墓出土有銘銅器三十多件,其中禽忌諸器的器主是楚幽王熊悍。這批銅器為戰國晚期的楚文字確立了可靠的標尺。唐

蘭、郭沫若、胡光燾、劉節等人都有文論述。50年代在安徽壽縣發現蔡侯墓，出土了許多有銘青銅器。陳夢家、孫百朋、于省吾、殷滌非、朱德熙等人都作過研究。1957年、1960年在安徽壽縣發現了五件楚鄂君啓節，引起了學術界的極大重視。對於節銘的釋讀以及其中涉及歷史、地理等問題，郭沫若、于省吾、商承祚、黃盛璋、朱德熙、李家浩等人的文章可以參考。1971年在河南新鄭“鄭韓故城”發現韓國兵器二百多件，提供了一大批有銘文的標準器，為韓國文字和兵器斷代提供了極好的材料。郝本性、黃盛璋等人曾作了比較全面的研究。

1977年在河北平山縣發掘了中山王墓，出土了大量有銘文的器物。其中“平山三器”很重要。張政娘、朱德熙、裘錫圭、李學勤、李零等人都作了認真的研究。張守中還編寫了《中山王鐸器文字編》（中華書局，1981），摹寫準確，方便實用。

1978年湖北隨縣發掘了曾侯乙墓。墓中出土了編鐘、編磬等許多有銘的青銅器，文字數量很多，內容十分重要。青銅器銘文共三千多字，六十四枚編鐘，個個都有關於樂律的銘文，總字數達兩千八百左右。不少學者都發表了討論文章。

2. 戰國竹簡研究

戰國竹簡是研究者極為重視的資料。已發現的戰國簡牘文字基本上都屬於楚國（包括曾國）。50年代至70年代先後在湖南長沙（五里牌竹簡、仰天湖竹簡、楊家灣竹簡）、河南信陽（信陽竹簡）、湖北江陵（望山竹簡、天星觀竹簡）、湖北隨縣曾侯乙墓發現了大量竹簡。這些竹簡的內容大部分是送葬物品的記錄，小部分是為病者占卜禱祝的記錄，只有很少是古書。80年代以來有新的重要發現，如1987年湖北荊門包山楚簡中有記事、司法文書、占卜祭禱和遺策，對於瞭解楚國的司法制度和社會情況很有價值。1994年底在湖北荊門郭店1號楚墓出土了《老子》等竹簡典籍，這是通過正式發掘而發現的古書，十分珍貴（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8）。近年來的楚簡研究，在古代簡冊的制度、職官和器物的考訂以及奇字難句的釋讀等方面，都有不少突破。李運富《楚國簡帛文字構形系統研究》（嶽麓書社，1997）對楚國文字作了窮盡性的系統整理與研究。李書後面附有《楚簡帛文字資料研究論著目錄》，可以參看。

戰國竹簡的文字編也出版了好幾種，如郭若愚編著《戰國楚簡文字編》（上海書畫出版社，1994），《包山楚簡·字表》（文物出版社，1991），滕壬生著《楚系簡帛文字編》（收入《楚學文庫》，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商承祚編著《戰國楚竹簡匯編·字表》（齊魯書社，1995），張守中《包山楚簡文字編》（文物出版社，1996），葛英會、彭浩《楚國簡帛文字編》（日本東方書店，1992），張光裕、黃錫全、滕壬生主編

《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

3. 楚帛書研究

楚帛書 1942 年在湖南長沙子彈庫出土,不久即被蔡季襄購得,並於 1944 年寫成《晚周繒書考證》,是第一部研究楚帛書的著作。50 年代中期以前,學者們主要根據蔡氏的石印本和美國佛利爾美術館 1952 年拍攝的照片,並根據這兩種底本,相繼複製了幾種複製本,但成果不大。50 年代中期以後,研究中有一些重大的進展。自從 60 年代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拍出紅外線照片以來,由於字跡較前大為清楚,研究工作有明顯進步。1967 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藝術史與考古系舉辦了“古代中國藝術及其在太平洋地區之影響”的學術座談會,會後出版了以座談會命名的論文集。近年來,帛書文字上的部分疑難問題又得到了解決。李零《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中華書局,1985)及《補正》(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七屆年會論文,1988)以及饒宗頤和曾憲通合編的《楚帛書》(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5)是比較全面介紹楚帛書研究情況的著作(參看曾憲通《楚帛書研究四十年》,見《楚帛書》,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5)。曾憲通還編寫了《長沙楚帛書文字編》(中華書局,1993,該書初稿附於《楚帛書》一書),對於瞭解帛書的情況很有幫助。

4. 戰國陶文研究

吳大澂是最早考釋古陶文字的學者,他的說法見於所著《說文古籀補》。1936 年,顧廷龍編《古陶文彙錄》是第一部古陶文字典。其書對於某些帶關鍵性的常見字的考釋有所突破,過去無法理解的一些文辭得以通讀。李學勤《山東陶文的發現和著錄》(《齊魯學刊》1982 年 5 期)、鄭超《戰國秦漢陶文研究概述》(《古文字研究》第十四輯)是比較全面的綜述性文章。收集陶文的書,舊的有劉鶚《鐵雲藏陶》、周進《季木藏陶》、陳介祺《簠齋藏陶》。丁佛言和強運開的《補補》和《三補》都收有不少陶文。其後,有金祥恆的《陶文編》。新出版的資料書和工具書,主要有高明的《古陶文彙編》(中華書局,1990)以及高明和葛英會的《古陶文字徵》(中華書局,1991)。

5. 戰國璽印文字的研究

本世紀 20 年代以來,印譜出版了很多。解放前有黃濬的《尊古齋印存》、陳漢第的《伏廬藏印》、陳寶琛的《澂秋館印存》等。丁佛言的《說文古籀補補》也比較重要。它特別注重收錄和考釋璽陶文字,認出了不少難字,可惜至今還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1930 年出版的羅福頤的《古璽文字徵》在當時也是很有用的工具書。解放後特別是近十年來出版的印譜有《故宮博物院藏古璽印選》、《上海博物館藏

印選》、《天津藝術博物館藏印選》、《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古璽印選》、《吉林大學藏古璽印選》等。這些新出的印譜所選一般比較精，數量多，種類廣，斷代準，多數印譜有釋文，有的還加簡單考釋。王人聰編纂的《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集》、《新出歷代璽印集錄》（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專刊之二，1982），也是兩部重要的璽印著錄書。羅福頤主編的《古璽彙編》（文物出版社，1981）和《古璽文編》（文物出版社，1981，係據《古璽文字徵》修訂而成），兩書相互配合，為古璽文研究提供了較好的條件。此外，還有康殷、任兆鳳主編的《印典》（1—4冊）（國際文化出版社，1993—1994），它從一百多種印譜中採選了四萬餘方古印（包括一些封泥），其中有不少是戰國古璽。此書的特點是編排以單字為綱，在每字下（少量常用字除外）收有出現此字的全部古印的整方印文，合印譜與璽印文字編於一書，資料集中，便於使用。但誤收了一些偽印，需要注意。關於古璽的通論性著作有羅福頤、王人聰合著的《印章概述》（三聯書店，1963）、羅福頤的《古璽印概論》（文物出版社，1981）、曹錦炎的《古璽通論》（上海書畫出版社，1995）以及葉其峰的《古璽印與古璽印鑒定》（文物出版社，1997）。1985年齊魯書社出版的王獻唐的遺著《五鐙精舍印話》，有一百七十九篇短文，內容豐富，涉及印學很多方面。他的另一部《那羅延室稽古文字》也有對古璽和漢印的分析考釋。古璽的分國研究也有進展。葉其峰《戰國官璽的國別及有關問題》（《故宮博物院院刊》1981年3期）是較早涉及戰國官璽國別研究的一篇文章，文中考釋了一些官璽，從文字和職官上提出了許多好的見解，尤其是關於官璽國別的意見，有很多得到了學術界的贊同。他的這方面的見解在他新出版的《古璽印與古璽印鑒定》中也可以看到。專門考釋古璽文字的文章非常多，精彩紛呈，不可勝舉。

6. 戰國貨幣文字的研究及其他

1938年，丁福保編有《古錢大辭典》（上海醫學書局出版，中華書局1982年影印出版），分總論、上編、下編三部分，上編是古錢圖，廣收先秦刀幣，下迄清末圓錢等。下編是古錢辭典，包括刀幣、圓錢、壓勝支錢三類。後來，丁氏又刊行了《古錢大辭典拾遺》。商承祚、王貴忱、譚棣華曾編《先秦貨幣文編》（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但書中有許多形體屬於當釋不釋或隸釋錯誤的。80年代出版了幾種較大的資料書和工具書，代表性的有汪慶正主編的《中國歷代貨幣大系·先秦貨幣》（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和張頡的《古幣文編》（中華書局，1988）。後者選材較謹慎，編排較為合理，注意吸收新成果。王貴忱的《三孔幣彙編》（1985年自印本），專門集錄三孔幣，十分完備。很多學者如裘錫圭、李學勤、吳振武、李家浩、何琳儀、黃

錫全等人都有不少考釋貨幣文字的文章。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林已奈夫將楚國貨幣中舊釋爲“郢爰”的“爰”改釋爲“𠄎”,這在貨幣文字研究中是一個貢獻。

除了以上提到的各方面研究以外,戰國玉石文字的研究,近年來也取得了一些成績(見陳邦懷《戰國“行氣玉銘”考釋》,《古文字研究》第七輯,1982;黃盛璋《平山戰國中山石刻初步研究》,《古文字研究》第八輯,1983等)。

對研究戰國文字有重要參考價值的《汗簡》和《古文四聲韻》二書,也有人作了整理和研究(見李零、劉新光整理《汗簡·古文四聲韻》,中華書局,1983;黃錫全《汗簡注釋》,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過去對《汗簡》不甚重視,但其中不少字形從地下發現的資料證明是有根據的。因此今天對《汗簡》一書似有重新估價的必要(張頌《中山王響器文字編序》;何琳儀《戰國文字與傳鈔古文》,《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1986)。

一般認爲屬於春秋晚期的侯馬盟書,也有人認爲屬於戰國早期,所以這裏也附帶介紹一下。這是指1965年底在山西省侯馬晉國遺址發現的五千餘件寫在玉石上面的“盟書”,它對於研究春秋晚期的字體和當時的社會經濟等情況有重大意義。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輯的《侯馬盟書》(文物出版社,1976)發表了其中比較完整的六百餘件,並對它們作了相當深入的研究。一些專家也發表了有關的論文。此外,現屬河南溫縣的西張計村,在三四十年代就發現過盟書(當時此地屬沁陽縣),70年代末80年代初又發現了大量墨筆寫的盟書(參看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溫縣東周盟誓遺址一號坎發掘簡報》,《文物》1983年3期),時代跟侯馬盟書相近,這批資料對研究晉國歷史非常重要,可惜至今還沒有全部公佈。

在這一節最後,我們附帶談一下對漢代以後、清代以前的文字的研究情況。從事這方面研究的人一直不多,直到近幾年來才有所改善。1930年劉復、李家瑞合編《宋元以來俗字譜》(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從宋代以至清代同治年間刊刻的十二種書中蒐集俗字一千六百個(不計重體)編成字譜,是研究文字俗體和漢字簡化的重要史料。但該書對正俗的判斷時有失誤。唐蘭對俗字的研究比較重視,1934年他在《古文字學導論》中提出創立“新文字學”,其中就倡導俗字的研究。1949年他在《中國文字學》中又指出:“俗文字在文字學史上應該有重要的地位。”建國以後,隨着簡俗字的被重新認識和《漢字簡化方案》的公佈,報刊上出現了許多討論簡俗字的文章,並出版了《簡體字原》(易熙吾,中華書局,1955)、《簡化漢字字體說明》(陳光堯,中華書局,1956)等探討簡體字來源的專著。蔣禮鴻《中國俗文字學研究導言》(《杭州大學學報》1959年3期)對俗字與正字的關係、俗字

研究的現狀和俗字研究的意義以及俗字研究的步驟和方法等作了分析和闡述。但此後一直反應不大。臺灣學者在這方面比較早地做了一些具體工作。1978年,潘重規偕弟子王三慶、曾榮汾、鄭阿財等十餘人編輯出版了《敦煌俗字譜》(臺北石門圖書公司)。此書共有2546號,收錄了大量唐五代前後流行的俗字異體,對古籍整理尤其是敦煌寫本的整理具有很大的參考價值,但仍嫌取材過窄。80年代以來,俗字研究漸漸多起來,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對敦煌卷子所用文字和其他唐代文字上。晚明刻本小說用字也有人進行了研究。其中1987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李榮的《文字問題》主要討論明容與堂刻《水滸傳》等晚明刻本小說用字及其演變情況。書中對許多俗字的淵源演變作了深入的分析,對與俗字有關的字形分化、繁化、類化、改換偏旁、增減筆畫、同音替代和音近替代等問題作了獨到的闡述。1988年,曾榮汾《字樣學研究》出版(臺北學生書局)。所謂“字樣學”,作者認為是“研究文字書寫法式諸種問題之科學”。此書有補充空白的作用。有些古籍整理的書也涉及俗字問題,這裏就不一一介紹了。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張涌泉的《漢語俗字研究》(嶽麓書社,1995)。這是迄今為止第一部俗文字學的概論性著作,作者不僅全面地介紹了俗字學的各種知識,還通過對大量俗文字資料的深入研究,揭示了前人未曾注意到的很多文字現象,指出了語文著作中與俗文字有關的很多疏失,解決了不少疑難問題。張涌泉還出版了《敦煌俗字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一書。此書分上下兩編,上編為“敦煌俗字研究導論”,下編為“敦煌俗字匯考”,既有較強的理論性,又有精確的具體考證,是俗字研究的一個新收穫。

四、結 語

迄今為止,漢語文字學已經建立了一套比較完整的理論,漢字學各方面比較重要的問題都有人作過不同程度的研究,各個分支的研究每年都有不少質量相當高的論著出現。漢字學的研究歷程已經給我們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和教訓,例如注意從語言的角度研究文字學,注意傳統文字學研究和古文字學研究的結合,注重加強對漢代以後、現代漢字以前的各代文字在字形和結構上的特點以及用字特點的研究,注意語文實踐對文字學提出的要求等等。儘管這樣,漢語文字學面臨的任務還是十分艱巨的。例如文字學的基本理論還需要豐富完善,文字學的斷代研究還很薄弱,很多漢字形音義變化的“歷史”還不十分清楚,各種漢字資料還需要全面的、科學的和現代化的整理等等。我們期望下一世紀的漢語文字學研究將會出現一個

嶄新的局面,並取得更大的成績。

參考文獻(所列論著目錄,以 80 年代以後為主,隨文已列者不錄)

- 曹定雲 殷墟甲骨文研究百年回顧與展望,《社會科學戰綫》(長春)1997 年 5 期
- 曹錦炎 《商周金文選》,西泠印社,1990
- 曹先擢 《漢字文化漫筆》,語文出版社,1992
- 曹先擢 《通假字例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 常耀華 許學研究綜述,《辭書研究》1993 年 4 期
- 常玉芝 《商代周祭制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 陳漢平 《屠龍絕緒》,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9
- 陳漢平 《西周冊命制度研究》,學林出版社,1986
- 陳煒湛 《甲骨文田獵刻辭研究》,廣西教育出版社,1995
- 董蓮池 十五年來《說文解字》研究述評,《松遼學刊》(四平)1994 年 3 期
- 高漢銘編著 《簡明古錢辭典》,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
- 高 敏 《雲夢秦簡初探》(增訂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
- 高啓沃 《古籍通假字選釋》,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
- 古 銘、徐谷甫選編 《兩周金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86
- 郭寶鈞 《商周銅器群綜合研究》,文物出版社,1981
- 郭在貽、黃 征、張涌泉 《敦煌變文集校議》,嶽麓書社,1990
- 國家文物局《中國古錢譜》編撰組編 《中國古錢譜》,文物出版社,1989
- 何耿庸 《古代漢語的通假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
- 何 舟 建國以來關於假借理論的探討,《語文導報》1986 年 8 期
- 洪家義編著 《金文選注釋》,江蘇教育出版社,1988
- 洪鈞陶 《草字編》,文物出版社,1983—1984
- 侯志義主編 《西周金文選編》,西北大學出版社,1990
- 胡厚宣 殷墟甲骨文發現九十周年,《中國史研究》1990 年 3 期
- 胡厚宣主編 《甲骨文與殷商史》第一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胡厚宣主編 《甲骨文與殷商史》第二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胡厚宣主編 《甲骨文與殷商史》第三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湖北省博物館編 《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

- 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 《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1991
- 湖南省博物館 《湖南省博物館藏古璽印集》，上海書店，1991
- 黃德寬 《古漢字形聲結構論》，黃山書社，1995
- 黃 征、張涌泉 《敦煌變文集校注》，中華書局，1997
- 荊門市博物館 《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8
- 荊州地區博物館 江陵王家臺 15 號秦墓，《文物》1995 年 1 期
- 李大遂 《簡明實用漢字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
- 李 瑾 《殷周考古論著》，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
- 李圃選注 《甲骨文選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李 實 《甲骨文字考釋》，甘肅人民出版社，1990
- 李萬福 關於漢字特徵的觀點述評，《寧夏教育學院、銀川師範專科學校學報》1991 年 1 期
- 李學勤 《東周與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
- 李學勤 《古文字學初階》，中華書局，1985
- 李學勤 《李學勤集》，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9
- 李學勤 甲骨學一百年的回顧與前瞻，《文物》1998 年 1 期
- 李學勤等編 《英國所藏甲骨集》，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編輯，中華書局，1985
- 劉樂賢 《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
- 劉寧生 關於漢字性質的研究，《語文導報》1987 年 6 期
- 劉慶俄 《漢字學綱要》，中國和平出版社，1994
- 劉一曼、郭振錄、徐自強編著 《北京圖書館藏甲骨文書籍提要》，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 劉又辛 《通假概說》，巴蜀書社，1988
- 劉志成 《中國文字學書目考錄》，巴蜀書社，1997
- 陸錫興 近年來關於漢字性質的討論，《語文導報》1985 年 10 期
- 羅福頤 《近百年來對古璽印研究之發展》，西泠印社，1982
- 羅福頤 近百年來古璽文字之認識及發展，《古文字研究》第五輯
- 羅福頤主編 《古璽彙編》，文物出版社，1981
- 羅福頤主編 《古璽文編》，文物出版社，1981
- 羅福頤主編 《故宮博物院藏古璽印選》，文物出版社，1982

- 羅君惕 《秦刻十碣考釋》，齊魯書社，1983
- 羅衛東 春秋金文研究概況，《古漢語研究》1997年2期
- 馬承源 《中國古代青銅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 馬如森 《殷墟甲骨文引論》，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
- 馬天祥、蕭嘉祉編 《古漢語常用通假字字典》，陝西人民出版社，1989
- 馬天祥、蕭嘉祉編、李毅夫校訂 《古漢語通假字字典》，陝西人民出版社，1991
- 馬向欣編著 《六朝別字記新編》，書目文獻出版社，1995
- 孟世凱編著 《甲骨學小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7
- 秦 公 《碑別字新編》，文物出版社，1985
- 裘錫圭 《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蘇教育出版社，1992
- 裘錫圭 《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
- 裘錫圭 究竟是不是文字——談談我國新石器時代使用的符號，《文物天地》1993年2期
- 裘錫圭、李家浩整理 《朱德熙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5
- 容 庚、張維持著、考古所編 《殷周青銅器通論》，文物出版社，1984
- 陝西歷史博物館編 《西周史論文集》，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 陝西歷史博物館編 《周文化論集》，三秦出版社，1993
- 沈培撰文、裘錫圭審訂 八十年代以來大陸地區漢字學研究狀況調查報告，《中國語言學現狀與展望》（許嘉璐、王福祥、劉潤清主編），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6
- 宋鎮豪 《夏商社會生活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 孫稚雛編著 《青銅器論文索引》，中華書局，1986
- 天津市歷史博物館編 《天津市歷史博物館藏中國歷代貨幣》（第一卷）先秦部分，天津楊柳青畫社，1990
- 天津市藝術博物館 《周叔弢先生捐獻璽印選》，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1984
- 王宏選釋 《金文選釋》，天津市古籍書店，1990
- 王明閣 《甲骨學初論》，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
- 王慎行 《古文字與殷周文明》，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 王宇信、楊陞南等主編 《甲骨文精萃選讀》，語文出版社，1989
- 王毓銓 《中國古代貨幣的起源和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 王蘊智 六十年來關於漢字性質問題的探討，《河南大學學報》1993年2期

- 吳長安 《文化的透視——漢字論衡》，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
- 吳振武 《古璽彙編》釋文訂補及分類修訂，《古文字學論集》初編，香港中文大學，1983
- 吳鎮烽編 《金文人名匯編》，中華書局，1987
- 吳鎮烽編 《陝西金文彙編》，三秦出版社，1989
- 吳鎮烽編著 《西周金文擷英》，三秦出版社，1987
- 楊陞南 《商代經濟史》，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
- 姚孝遂、肖 丁 《小屯南地甲骨考釋》，中華書局，1985
- 于豪亮 《于豪亮學術文存》，中華書局，1985
- 臧克和主編 《漢字研究新視野叢書》（包括《漢字文化綜論》（劉志基）、《漢字與書法文化》（姚淦銘）、《中國文字與儒學思想》（臧克和）、《〈說文〉漢字體系與中國上古史》（宋永培）），廣西教育出版社，1996
- 曾憲通 《楚帛書文字編》，中華書局，1994
- 曾憲通 建國以來古文字研究概況及展望，《中國語文》1988年1期
- 張 頤 《張頤學術文集》，中華書局，1995
- 張亞初、劉 雨 《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華書局，1986
- 張振宇 《古今字小字典》，湖南出版社，1988
- 鄭傑祥 《商代地理概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 鄭權中遺著、徐宗濤等整理修訂 《通假字萃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
- 中國人民銀行《中國歷代貨幣》編寫組編 《中國歷代貨幣》，新華出版社，1988
- 中華書局編輯部編 《雲夢秦簡研究》，中華書局，1981
- 周盈科編 《通假字手冊》，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
- 朱鳳瀚 近百年來的殷墟甲骨文研究，《歷史研究》1997年1期
- 朱鳳瀚 《商周家族形態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

原載《二十世紀的中國語言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今據以收入。

從方塊漢字能否廢除 說到外來詞的譯法

在中國，從清末開始就有人主張把漢字改成拼音文字。新中國成立後，漢字改革必須走拼音化道路，一度成為絕大多數人的共識。20 世紀 80 年代，尤其是 90 年代以來，情況起了變化。現在，主張拼音化的人大概已經成為少數，多數人認為方塊漢字無法廢除。

方塊漢字在檢索、打字、電腦處理等方面，使用起來確實不如拼音文字方便。但是在漢語語素中，單音節語素（其中很多能獨立成詞）佔絕對優勢，同音的語素和詞數量巨大，方塊漢字能起區別它們的作用。為了使漢字成為明確的可以快速閱讀的文字，這種作用是不可缺少的。我們只能想方設法使電腦等手段適用於方塊漢字（在這方面已經取得了很好的成績），不能為了遷就這些手段而廢除方塊漢字。在是否廢除方塊漢字的問題上，繼承文化傳統等方面的考慮其實是次要的。我相信如果拼音文字確實適合現代漢語，中國的絕大多數語言文字工作者都會舉雙手擁護拼音化。

既然方塊漢字無法廢除，就應該充分發揮其作用。例如在吸收外來詞時，就應該充分利用漢字適宜於用來意譯外來詞的特點。

漢語語素多為單音節，語素結合成詞的方式又靈活多樣，因此漢語詞彙的發展主要走增加複合詞的道路。這是學習漢語在開始的階段比較困難，而在掌握了數量遠較很多語言的基本詞彙為少的基本漢字，也就是掌握了漢語的基本語素之後，進一步學習漢語就會容易得多的重要原因；也是漢語吸收外來詞時能大量使用意譯法的重要原因（意譯的外來詞一般都是複合詞）。單音節語素佔優勢，給漢語帶來了同音語素、同音詞多的麻煩；但是便於構造複合詞，便於意譯外來詞，則可以看作漢語的一種優勢。然而如果沒有能區別同音語素的漢字，這種優勢就很難充分發揮，漢語意譯外來詞的能力就會大打折扣。漢字不是拼音文字，漢語的語音結構跟歐美等外國語言的距離又很大，這些是不利於音譯外來詞的條件。如果棄漢字

之長而用其短，濫用音譯，在不是必須用音譯的場合也用音譯，無疑會給漢語的發展帶來消極的後果。不但會給使用漢字的人增加理解外來詞的困難，而且會影響漢語的純潔性，並降低利用外來詞構成新的詞語的能力。

日本使用漢字的歷史極為悠久，而且直到今日還在混合使用假名和漢字。日文中的漢字跟日語的關係，當然與漢字跟漢語的關係有差別。但是由於使用漢字，並在古代吸收了大量漢語借詞，日語也有很强的意譯外來詞的能力。另一方面，雖然假名是拼音文字，但是日語的語音結構也跟歐美等外國語言有很大距離，音譯外來詞的條件並不理想。過多地使用音譯法，對日語的發展恐怕也會帶來消極的影響。

在 19 世紀，日語曾用意譯法吸收了大量外來詞，而且對漢語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現代漢語中很多常用的意譯的外來詞，如“革命”、“大學”、“博士”、“社會”、“經濟”、“憲法”、“世界”、“郵政”、“電話”、“哲學”、“動物學”等等好幾百個詞，都是由日本傳入的。日語意譯這些外來詞的時候，不但使用了漢字，而且還往往直接借用古漢語中原有的詞語，如上舉的“革命”、“大學”、“博士”等等。此外，日語還直接從 19 世紀傳播西洋文化的漢語文獻中採用了一些意譯的外來詞，如“國會”、“空氣”、“光學”、“植物學”等等。日語、漢語之間這種通過漢字的交流，對這兩種語言以至兩國的科學、文化等方面的發展，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但是在進入 20 世紀之後，日語在吸收外來詞的時候，就越來越多地使用音譯法了。對大量本來可以很恰當地加以意譯的外來詞，也使用了音譯法。如果在日文中將來可以完全廢除漢字，這樣做當然是有道理的。如果漢字不能完全廢除，也許就應該作另一種考慮。為什麼不能利用漢字，至少是日文中常用的漢字，對那些適宜於意譯的外來詞加以意譯呢？如果這樣做，可能對日語的發展反而有好處，而且肯定會對中日之間在科學、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起促進作用。我對日本語言文字學界的情況缺乏瞭解，很想知道他們對這一問題的意見。

本文是在 2001 年召開的第十二屆北京東京友好城市“漢字文化的未來”中日交流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言，今據以收入。

談談“異形詞”這個術語

2001年12月，教育部和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發佈了《第一批異形詞整理表》（以下簡稱“表”）。什麼是“異形詞”呢？《表》的正文之前，對有關術語作了解釋。我們把其中“異形詞”和“詞形”兩條全文引錄於下：

異形詞 (variant forms of the same word)

普通話書面語中並存並用的同音（本規範中指聲、韻、調完全相同）、同義（本規範中指理性意義、色彩意義和語法意義完全相同）而書寫形式不同的詞語。

詞形 (word form/lexical form)

本規範中指詞語的書寫形式。^①

“異形詞”的英文名稱，按字面回譯成漢語，應該是“同一個詞的不同形式”，如果說得簡單一些，就是“一詞的異形”。“詞形”條已經說明“形”指書寫形式。同一個詞的不同書寫形式，是屬於文字層面的。而“異形詞”按照漢語習慣只能理解為一種詞的名稱，應該是屬於語言層面的。這就是說，“異形詞”的中英文名稱是不相應的。

緊接着《表》的發佈，語文出版社在2002年1月出版了《第一批異形詞整理表說明》（以下簡稱“說明”）。《說明》的編寫者跟《表》的起草者是同一批學者。從《表》和《說明》的具體內容來看，所謂“異形詞”實際上確如其英文名稱所表示的那樣，是指同一個詞的不同書寫形式的。《說明》對各組“異形詞”的解釋，末了都有“宜以……為推薦詞形/形式”這種格式的話（“形式”用於“固定短語”）。例如“按語——案語”條的說明最後說“宜以‘按語’為推薦詞形”，^②“百廢俱興——百廢具興”條的說明最後說“宜以‘百廢俱興’為推薦形式”。^③由此就可以知道，《表》的

① 異形詞研究課題組《第一批異形詞整理表說明》，語文出版社，2002，5頁。

② 同上注21頁。

③ 同上注22頁。

起草者對他們所整理的是詞語的書寫形式這一點，是有十分明確的認識的。既然如此，為什麼要給所整理的對象加上“異形詞”這個名不副實的稱呼呢？為了解答這個問題，必須追溯一下“異形詞”這個術語的歷史。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進行的異體字整理和漢字簡化，基本上是以字為本位的。這些漢字整理工作，在規範單音節詞的書寫形式方面是有很有效的，但是對大部分多音節（包含雙音節）詞語的書寫形式却起不到規範作用。有鑒於這種情況，殷煥先生寫了《談詞語書面形式的規範》一文，發表在《中國語文》1962年第6期上，主張進一步“從詞語角度”來處理漢語書面形式的規範問題，“替‘那末’‘那麼’‘那嗎’（連詞）、‘歸根結蒂’‘歸根結柢’‘歸根結底’（常用語）等等訂個規範。”^④這是很見地的。但是此文主張加以規範的，不但有同一詞語的不同書寫形式，還有“胳膊”“胳膊”之類“形異而音亦異”的同義詞語。^⑤ 在上面的引文所舉的例子裏，“歸根結蒂”跟“歸根結柢/底”雖然總體意義相同，語音也十分相近，但由於“蒂”跟“柢（底）”音義不同，也只能當作同義語看待。^⑥ 此文還討論到“隱隱約約”與“影影綽綽”、“爆竹”與“爆仗”等等，是否同一詞語的兩種形式的問題，而作者的意見似乎是傾向於肯定的。^⑦ 這些都反映出作者未能很好地掌握語言和文字的界限，是此文的缺點。

到了1966年，《中國語文》第1期發表了高更生先生的《談異體詞整理》。在討論多音節詞語書寫形式的規範問題的早期論文裏，這應該是最重要的一篇。“異體詞”這個術語大概就是此文首先提出來的。不過此文發表後不久，“文革”就開始了，所以其影響要到70年代晚期以後才逐漸顯現出來。

為了討論的方便，我們先把此文中表明作者主要觀點的話引錄於下：

詞語的書面形式中有一種並存並用的現象（引者按：作者大概是為了明確文義，在此用了兩個已被併入“并”的“並”字），如“交代”也寫作“交待”，“照相”也寫作“照像”。這類同音同義而異形的詞語可以叫做異體詞。

.....

異體詞的整理不等於詞彙的規範。異體詞的整理是要消除同一個詞有幾

④ 《中國語文》1962年6期，272頁。

⑤ 同上注。

⑥ 《現代漢語詞典》“歸根結底”條說：“‘底’也作柢。也說歸根結蒂。”（1966年修訂第3版472頁）用“也作”和“也說”來區分不同的情況，是很正確的。

⑦ 《中國語文》1962年6期275頁。

種書面形式的混亂現象,因此,它是屬於文字範圍以內的事情。……^⑧

作者所說的“書面形式”顯然跟“書寫形式”同義。他明確指出,消除一個詞有幾種不同書寫形式的現象,是文字層面上的事,跟詞彙的規範是兩回事。這就避免了混淆語言現象和文字現象的毛病。^⑨

但是,高先生把同一詞語的不同書寫形式定名為“異體詞”,則是不妥當的。前面已經說過,書寫形式屬於文字層面,詞則屬於語言層面。高先生在探討詞語書寫形式規範問題的實踐中,很好地區分了文字和語言這兩個層面;可是在創立術語的時候,却又把它們混淆了。

《談異體詞整理》一文中這樣幾句話:

異體詞和異體字的整理都是文字上的整理……但是,異體字以字為單位,而異體詞是以詞語為單位的,因此,它們的整理原則又不能完全相同。^⑩

高先生是不是由於詞語的不同書寫形式“是以詞語為單位的”,就把它們稱為“異體詞”,以與“異體字”相區別的呢?如果真是這樣,那顯然是不合適的。書寫形式其實就是文字。一個詞的書寫形式,就是在書面上表示這個詞的文字。高先生強調“異體詞整理是屬於文字範圍以內的事”,又說“異體詞和異體字的整理都是文字上的整理”,對這一事實當然是十分清楚的。即使從詞語的角度,也就是“以詞語為單位”來看問題,這個事實也絲毫不會改變。我們怎麼能把那些作為同一詞語的不同書寫形式的文字稱為“異體”的“詞”呢?如果把它們稱為“詞的異體”,倒還說得過去。不過必須說明,這裏所說的異體不是一個詞在語言裏的變異之體,而是一個詞在書面上的不同形體。前一種意義的詞的異體未嘗不可以稱為“異體詞”,就跟字的異體可以稱為“異體字”一樣。我們所說的詞的異體則絕對不能稱為“異體詞”。對單音節詞來說,其異體是一些形體不同的單個的字;對多音節詞來說,則是一些彼此有差異的字組。總之,都是字而不是詞。

⑧ 《中國語文》1966年1期47頁。

⑨ 高先生的文章裏曾舉“表示說話絮叨的‘luōsuo’,就有‘羅蘇、囉嗦、囉唆、魯蘇、嚕囑’等幾種寫法”的現象,作為一個詞有幾種書面形式的例子(同上注)。但是實際上“魯蘇、嚕囑”讀 lūsū,跟“囉嗦、囉唆”同義不同音(“羅蘇”少見,不知該如何讀)。我們也許可以在語言層面上把“嚕囑”(用《現代漢語詞典》的字形)看作“囉唆”的方言變體。可是由於二者字面上的區別反映了語言中實際存在的區別,仍不能把它們看作同一個詞的不同書寫形式。這只是高先生文章中一個偶然的疏失,並不影響文章的觀點。

⑩ 《中國語文》1966年1期47頁。

但是,大概由於“同一個詞的不同書寫形式”之類說法比較囉唆,“一詞的異形”之類說法在一般人心目中也缺乏用作正式術語的資格;“異體詞”這個不合理的術語,在語文學界竟大受歡迎。只不過接受這一術語的人,多數把“異體”改成了同義的“異形”。據蘇新春等在2001年編成的《全國詞彙規範論文索引》,“1980年以來學術界共發表異形詞與異體詞方面的論文30多篇”。^⑪《表》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採用“異形詞”這個術語的。

“異體/形詞”這個術語的不合理,從使用這個術語的學者對它下的定義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來。我們可以回頭看一下高更生先生在上文所引的《談異體詞整理》的第一段裏所下的定義。在那裏,“交代——交待”、“照相——照像”這些同一詞語的不同書寫形式,被說成“同音同義而異形的詞語”。《表》對“異形詞”下的定義,內容跟高先生的基本相同,也已在前面引錄。還有一篇談詞語書面形式規範問題的文章,是這樣為“異體詞”下定義的:

意義、讀音完全相同,但書寫形體不同,如“ànyǔ”有“按語”“案語”兩種不同的形體……這種同一詞語的不同形體的詞,可以叫做異體詞。^⑫

同一詞語的不同書寫形體,怎麼能說成“同一詞語的不同形體的詞”呢?這種說法簡直是不可理解的。但是為了使“異體詞”的“詞”字有著落,却不能不這樣說。高先生和《表》的定義,跟這一定義在實質上並無區別,只不過他們用“同音同義”代替了“同一詞語”而已。

高先生把“異體詞整理”嚴格限定在對同一詞語的不同書寫形式進行規範的範圍裏,《表》也是這樣做的。^⑬這是很值得稱贊的。但是有些學者則把語音相近或“十分相近”的同義詞語也包括在“異體/形詞”的範圍裏。^⑭有的學者甚至完全

⑪ 蘇新春《異形詞規範的三個基本性原則——評〈第一批異形詞整理表(草案)〉》,《廈門大學學報》哲社版2002年2期25頁注①,亦見《人大複印報刊資料·語言文字學》2002年7期85頁。

⑫ 蔣蔭楠《談現代漢語詞語書面形式的規範問題》,《南京大學學報》社科版1978年3期103頁。

⑬ 《表》所收的個別例子,如“訂婚——定婚”,究竟能否看作同一詞語的不同書寫形式,似尚可商榷。“訂”和“定”的古音不同,在現代很多方言裏也不同音。而且二者的用法似亦不完全相同。如在“他們兩家兒女是指腹定婚的”和“他們舉行了訂婚儀式”這兩句話裏,“定婚”和“訂婚”似乎就不能互易。《現代漢語詞典》已將“訂婚”和“定婚”看作同一詞語的不同書寫形式,或即《表》之所據。

⑭ 例如:張文甫《“陪着不是”和“賠着不是”——異形詞小議》一文說:“所謂異形詞,就是讀音相同或相近,意義相同,而詞形不同的詞。”(《中學語文教育》1979年4期29頁)孟慶章《異形詞規範的範圍》說:“異形詞指的是一組組意義用法完全相同,讀音相同或十分相近,而只是書寫形式不同的詞。”(《語文建設》1993年6期14頁)

撇開語音條件，認為“所謂異形詞是指詞形不同而含義相同並在同一語言環境中可以換用的一組詞語”。^⑮ 在這位學者所著的《異形詞彙編》中，既收了“答復、答覆”這類由於漢字簡化而造成的異形，也收了“導火綫、導火索”、“胸有成竹、成竹在胸”等等同義詞語，內容龐雜混亂。這些情況的出現，是跟“異體/形詞”這一術語的不合理有關的。

由“異體/形詞”還引出了其他一些不合理的說法。《表》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據同一詞語的不同書寫形式的出現頻率，來選取推薦詞形的。由於不同的書寫形式被稱為“異形詞”，它們的出現頻率也被不合理地稱為“詞頻”。^⑯ 蘇新春先生有《異形詞規範的三個基本性原則——評〈第一批異形詞整理表(草案)〉》一文，發表在《廈門大學學報》上。這是一篇很有價值的文章。但是此文不但襲用了“異形詞”、“詞頻”等說法，而且在“429 組異形詞的構成情況”那一小節中，說了這樣一段話：

兩詞一組的有 429 組，三詞一組的有 31 組，四詞一組的有 4 組，共有詞語 893 詞。一組中的第一個詞為正體詞，對後面的幾個詞本文分別以異形詞 A、異形詞 B、異形詞 C 稱之。^⑰

詞的書寫形式被直截了當地稱作“詞”，同一個詞的兩種不同書寫形式就是“兩詞”，三種不同書寫形式就是“三詞”，四種不同書寫形式就是“四詞”。而且還出現了與“異體詞”相對的“正體詞”。此外，還有學者在文章裏使用了仿“異形詞”而造的術語“異形成語”。^⑱

《談異體詞整理》曾說“有的異體詞竟有四五種書面形式”。^⑲ 單就這句話來看，“異體詞”似可理解為“有不同書寫形式的詞”。然而即使在這一意義上使用“異體/形詞”，也還是不合適的。按照漢語的習慣，“異體/形詞”應該跟“同形詞”相對，指跟別的詞不同形的詞。當然，由於不同的詞具有不同的形是正常現象，在實際語言中其使用機會是不多的。至於本身有不同書寫形式的詞，應該稱為“多形

⑮ 朱炳昌《異形詞彙編》，語文出版社，1987，261 頁。

⑯ 異形詞研究課題組《第一批異形詞整理表說明》，語文出版社，2002，5、6 頁。

⑰ 蘇新春《異形詞規範的三個基本性原則——評〈第一批異形詞整理表(草案)〉》，《廈門大學學報》哲社版 2002 年 2 期 25 頁注①，亦見《人大複印報刊資料·語言文字學》2002 年 7 期 25—26 頁。

⑱ 汪惠迪《反唇相稽/反唇相譏》，《語文建設》2001 年 6 期 22 頁。

⑲ 《中國語文》1966 年 1 期 47 頁。

詞”。多形詞不能稱為“異形詞”，猶如多國部隊不能稱為“異國部隊”。也許會有人說，你說的多形詞往往只有兩形，但“多”却概括不了“兩”。其實在跟“單”、“一”相對的場合，人們早已在用“多”概括“兩”了。《現代漢語詞典》的“凡例”說：“本詞典所收條目分單字條目和多字條目。”^②多字條目大多數是兩字條目。

周有光先生在《傳聲時代的語言——開放文談之二》裏說：“文字只能把同音詞寫成‘異形詞’，不能把同音詞寫成‘異音詞’。”^③這裏的“異形詞”的用法，正是上文所說的符合漢語習慣的用法。不過在《表》發佈之後，周先生“從衆”，也以“異形詞”來指稱同一詞語的不同書寫形式了。^④

從上面關於“異形詞”和“多形詞”的討論來看，過去發佈的《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中所說的“異讀詞”，也以改作“多讀詞”為宜。這裏的“讀”字其實也有問題。“讀”的“讀音”義是由其動詞義引申出來的，而“讀”的對象則是字而不是詞。可是如果把“多讀詞”改為“多音詞”，又容易被誤解為指多音節詞。所以“多讀詞”和“多音詞”都不是理想的術語，最好用別的說法來表達有關的意思。

衷心希望語文學界不要再使用不合乎語言習慣和語言學學理的術語。^⑤“異形詞整理表”能不能改為“詞語異形整理表”呢？“異讀詞審音表”能不能改為“詞語異音審定表”呢？也許我的意見是不恰當的，歡迎大家批評指正。

原載《語言文字周報》2002年11月20日978號4版，又載《漢字規範百家談》（商務印書館，2004），今據後者收入。

② 《現代漢語詞典》2頁。

③ 《中國教育報》1993年10月27日4版。

④ 周有光《異形詞的整理和漢語詞彙的歧異現象》，《語文建設通訊（香港）》70期1、2頁，2002年5月。有意思的是，這一期《語文建設通訊》還刊登了周先生的另一篇文章《漢語即將成為世界第一語言嗎？》。在這篇文章裏有一句話，跟我們剛引過的《傳聲時代的語言——開放文談之二》的那句話基本相同（不同之處是句首的“文字”改成了“漢字”，“文字”後的“只”字被刪去，兩個原來未加引號的“同音詞”都加了引號）。這就是說，在同一期刊物登載的周先生的兩篇文章裏，“異形詞”的用法是不一樣的（這兩篇文章裏的“異音詞”的用法也不一樣）。

⑤ 附帶說一下，不少學者為了強調“分詞連寫”的重要性，把“正字法”改稱為“正詞法”。這也是不妥當的。不管是按字書寫還是按詞書寫，都是文字層面上的事。漢語中的多音節詞決不會因為漢字不分詞連寫而變為單音節詞。在是否分詞連寫的問題上，我們要正的只是文字的書寫方式，而不是語言裏的詞。所以“正詞法”應該回改為“正字法”。

用出土文字資料檢驗清儒 在語文學方面的一些具體見解

我們所說的語文學，主要指文字、音韻、訓詁和古籍校讀之學。清儒的語文學，其總體水平大大超越前代。爲了更好地繼承這份遺產，必須對他們的成果作出恰如其分的評價。要做到這一點，就應該站在今天已經達到的語言學水平的高度，審視這些成果；並用 20 世紀以來，尤其是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所發現的大量地下文字資料，檢驗這些成果。我在這裏只想談談後一方面的問題；而且由於研究不深，只能舉出少量實例，以見一斑。全面的研究有待大家一起來做。

新出土的文字資料往往能證明，無緣看到這些資料的前代學者在語文學上的某些見解不能成立。例如殷墟甲骨文字就能證明，清代的《說文》學家關於字形和本義的不少說法不能成立。這種情況是大家所熟悉的，沒有必要在這裏多說。下面著重談談新出土的文字資料支持清儒在語文學上的具體見解的情況。

先來看看清儒校讀古書的幾個例子。

王念孫《讀書雜誌》屢用理校法，即在並無其他版本可作根據、亦無見於他書的相同文句可作比較的情況下，僅據文理斷定傳本文字上的錯誤。他的這類意見，有些看起來似乎理由並不充分，但卻爲出土文字資料所證實，下面舉《讀晏子春秋雜誌》中的兩條爲例。

今本《晏子春秋·內篇諫下》第十八章有如下文字：

古者之爲宮室也，足以便生，不以爲奢侈也，故節于身，謂于民。

“謂于民”於義難通。王念孫說：

……“謂”當爲“調”，形相似而誤也（《集韻》引《廣雅》：“詎，調也。”今本“調”作“謂”）。“調”者，和也。言不爲奢侈以勞民，故節於身而和於民也。《鹽鐵論·遵道》篇曰“法令調於民而器械便於用”，文義與此相似。後《問上》篇曰“舉事調乎天，籍斂和乎民”，亦與此“調”字同義。

後來的學者多不同意王氏的意見而另立新說。洪頤煊《讀書叢錄》、黃以周《晏子春秋校勘記》，都認為這個“謂”字不誤，應從《爾雅·釋詁》訓為“勤”。劉師培在《晏子春秋補釋》中，認為“謂”是“為”字之誤，當讀為“化”，“此言為君者躬行節儉，則人民從其化”；在《晏子春秋斟補》中，又引《墨子·辭過》“故節於身誨於民”句作比較，認為《晏子》“謂”字也應作“誨”。于省吾《雙劍謄諸子新證·晏子春秋新證》明斥王念孫為誤，主張讀“謂”為“惠”。吳則虞《晏子春秋集釋》在引錄了上舉各家之說後，下斷語說：“作‘誨’是。”肯定了劉氏《斟補》之說。^①

1973年出土的銀雀山竹書中的《晏子春秋》簡，正好有上引那一章，相應之文作：

夫古之為宮室臺榭者，節於身而調於民，不以為奢侈。^②

證明王念孫完全正確，其他各家之說皆誤。

今本《內篇問上》第三章有如下之文：

今君好酒而辟，德無以安國。厚藉斂，意使令，無以和民。

“意使令”於義難通。王念孫說：

孫曰“意使令”者“任意使人”（引者案：“孫”指孫星衍，其說見附於《晏子春秋》經訓堂刊本之《晏子春秋音義》）。念孫案：“意”字文義不順。孫加“任”字以釋之，亦近於牽強。“意”疑是“急”字之誤。令急則民怨，故曰無以和民。

此說毫無佐證，頗難取信於人。好在銀雀山《晏子春秋》簡中也有此章，此句正作“急使令”，證明王氏又是正確的。^③

上舉二例反映了王氏的卓識，但如沒有銀雀山竹簡出土，其卓識就很難被人充分認識。

再看段玉裁、王先謙校讀《詩·邶風·北風》的例子。

《北風》第一章：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惠而好我”句亦見第

① 吳則虞《晏子春秋集釋》上冊，中華書局，1962，144頁。各家之說見引於143—144頁注五。

② 銀雀山漢墓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文物出版社，1985，91頁。

③ 同上注92頁。

二、三章)

《毛傳》釋“惠”爲“愛”，《鄭箋》釋“惠而好我”爲“性仁愛而又好我者”。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說：

古“然”“而”同字。“惠而好我”，猶言惠然好我，與《終風》“惠然肯來”句例同。

1977年出土的阜陽雙古堆漢墓《詩經》簡中，有《邶風·北風》殘簡，“惠”下一字正作“然”。^④“然”“而”古韻不同部，王先謙說“古‘然’‘而’同字”是不妥當的。但此二字在古漢語的某些語言環境中確可彼此換用。^⑤王氏不從毛、鄭之說，認爲“惠而”即“惠然”，與漢初《詩經》簡冥合，還是值得表揚的。不過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實已指出“惠而猶惠然”。

《北風》第二章：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

段玉裁說：“‘霏’，《說文》無此字，古當作‘非’，猶飛也。”^⑥段氏因《說文》無“霏”字，就說古當作“非”，似乎有些武斷。但是阜陽《詩經》簡《北風》殘簡中，此字確作“非”，^⑦使人歎服段氏之卓識。“霏霏”指雨雪等紛飛之貌。《漢書·揚雄傳·上》所載《河東賦》有“雲霏霏而來迎兮”之文，顏注：“霏，古霏字。霏霏，雲起貌。”“非”“飛”同音，“霏”應是由“飛”孳生的一個詞，所以段氏說“非”“猶飛也”。

另一方面，由於新資料的出土，清儒在古書校讀方面的某些頗爲學者所信的說法，被證明爲並不可靠的情況，也是存在的。例如：王念孫認爲《漢書·食貨志·上》“農民戶人已受田”句中的“戶”字下脫“一”字。從鳳凰山十號漢墓所出“鄭里廩籍”稱戶主爲“戶人”來看，其說恐非。^⑧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根據《九章算術》和《詩經》鄭箋，把《說文》“穀”字解說“米一斛舂爲八斗”的“八”字改爲“九”，“繫”字解說“糯米一斛舂爲九斗”的“九”字改爲“八”。但是睡虎地秦墓所出《秦律·倉律》中關於由粟舂米的折合比例的條文，却與上引《說文》解說的原文相符，

④ 胡平生、韓自強《阜陽漢簡〈詩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54頁。

⑤ 參看上注所引書55頁。

⑥ 《段大令所訂毛詩故訓傳》案語，《皇清經解》卷二百零二·十頁下。

⑦ 同注④55頁。

⑧ 參看拙文《考古發現的秦漢文字資料對於校讀古籍的重要性》，拙著《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27頁。

可見段氏擅改原文不一定妥當。^⑨ 這兩個例子在我的舊文中已較詳細地討論過，這裏就不細說了。【編按：關於此問題，參看本卷 360—361 頁“《十講》編按”。】

清儒關於字形的說法，有不少被新出土的文字資料證明為不可信。但是也有一些這方面的見解，得到了新出文字資料的支持。下面舉段玉裁的兩個例子。

《說文·十四上·矛部》：

矜，矛柄也。从矛，令聲。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改“矜”字篆文的“令”旁為“令”旁，改解說中的“今聲”為“令聲”，注曰：

各本篆作“矜”，解云“今聲”。今依漢《石經·論語》、《溧水校官碑》、魏《受禪表》皆作“矜”正之。《毛詩》與“天”“臻”“民”“旬”“填”等字韻，讀如“鄰”，古音也。漢韋玄成《戒子孫詩》始韻“心”。晉張華《女史箴》、潘岳《哀永逝文》始入蒸韻。……今音之大變於古也。矛柄之字改而為“矜”，云古作“矜”，他義字亦皆作“矜”，从“令”聲，又古今字形之大變也。

元周伯琦《六書正譌》就曾改“矜”為“矜”，但未受人重視。段說有理有據，影響較大。不過他所舉的字形的證據，出自東漢晚期和曹魏的碑刻，時代晚於《說文》，不免啓人疑竇。徐承慶《說文解字段注匡謬》和鈕樹玉《段氏說文注訂》，就都指責段氏“以隸正篆”。

在上世紀 70 年代以來出土的文字資料裏，時代不晚於西漢早期的馬王堆帛書和西漢前期的銀雀山竹書等，都把“矜”字寫作从“令”。^⑩ 1993 年郭店楚墓出土的《老子》簡甲組，把“果而弗（今本作勿）矜”的“矜”寫作从“矛”从“命”。^⑪ “命”“令”二字在古文字中通用。段氏“矜”本从“令”之說已完全證實。宋代發現的戰國時代秦國的《詛楚文》，也將“矜”字寫作从“令”，^⑫但段氏似乎沒有注意到。

⑨ 參看上注所引文 19—20 頁。

⑩ 參看拙文《〈墨經〉“𠄎”“謂”“廉”“令”四條校釋》，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國學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265 頁。廣西貴縣羅泊灣漢初墓出土木牘“矜”字亦从“令”，參看蔣冀騁《說文段注改篆評議》，湖北教育出版社，1993，106 頁。

⑪ 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圖版 3 頁、釋文 111 頁，文物出版社，1998。

⑫ 《詛楚文》只有摹刻本流傳，《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九卷（科學出版社，1982）所附“中吳本《詛楚文》”是最近真的一種，“矜”字見此書 319、325、330 諸頁。較差的摹刻本將“矛”旁摹得像“子”旁。“中吳本”有周伯琦《詛楚文音釋》，已將此字釋為“矜”。這與周氏《六書正譌》改“矜”篆為“矜”是相互聯繫的。

《說文·三上·収部》：

𠂔，舉也。从収，由聲。《春秋傳》曰“晉人或以廣墜，楚人𠂔（引者案：今本《左傳·宣公十二年》作“綦”）之”。……杜林以爲騏驎字。

小徐本此字篆文作𠂔，“由聲”作“𠂔聲”。徐鍇注文並指出“𠂔音菑”（引者案：《說文·十二下·留部》“留”字篆文作𠂔，古文作𠂔，鍇用古文字形）。《段注》改大徐本𠂔篆爲𠂔，改“由（段所據本似作“由”）聲”爲“𠂔聲”，但未引小徐本。

《說文·十三上·糸部》有用上舉之字爲聲旁之字：

綦，帛蒼艾色。从糸，𠂔聲。《詩》“綦衣縵（引者案：今本《詩·鄭風·出其東門》作“綦”）巾”，未嫁女所服。一曰不借縵。綦，縵或从其（引者按：大徐本書末所列、據《說文》“注義及序例、偏旁”而增於諸部之十九字中有“綦”字，則此或體爲大徐所增。但小徐本亦有此或體）。

小徐本此字篆形及說解都與大徐本同。《段注》改此字篆文爲綦，改“𠂔聲”爲“𠂔聲”，注曰：

𠂔，各本作𠂔，併篆體作綦，今正。此用《収部》之“𠂔”爲聲，非用《丌部》之“𠂔”爲聲也。《収部》之“𠂔”从𠂔𠂔之“𠂔”爲聲，非“由”，非鬼頭之“𠂔”也。“𠂔”在古音第一部，“𠂔”在古音第十五部，此不可或紊者也。“其”亦古音第一部也，故“綦”字亦作“綦”。

睡虎地秦墓所出《爲吏之道》中，有借爲“棋”的𠂔字。^⑬ 同篇中可能借爲“忌”的“綦”字^⑭以及同墓所出《封診式》中“綦履”的“綦”字，^⑮其“糸”旁上方的聲旁，都不作“其”而作“𠂔”，寫法與《爲吏之道》的“𠂔”字相同。^⑯ 可見上引段氏的意見是正確的。漢印“綦”字聲旁有寫作𠂔的，^⑰仍是“𠂔”而不是“其”（“其”的下部从“丌”），“田”應看作“𠂔”的省變之體。

⑬ 《睡虎地秦墓竹簡》圖版 81 頁 1 號簡第五段，釋文 174 頁注二，文物出版社，1990。

⑭ 同上圖版 83 頁 36 號簡第貳段，釋文 169 頁、170 頁注二。

⑮ 同上圖版 73 頁 59 號簡、75 頁 78 號簡。後一簡“綦”字兩見。

⑯ 由於《睡虎地秦墓竹簡》的圖版不够清晰，張守中《睡虎地秦簡文字編》（文物出版社，1994）196 頁“綦”字條（此條楷書字頭誤作“綦”）所摹字形不精確。但仔細審辨原書圖版，仍可看出諸“綦”字上部聲旁寫法與“𠂔”一致。

⑰ 羅福頤《漢印文字徵》13·4 上，文物出版社，1978。

通過上述幾個例子就能清楚地看到,評價清儒語文學成就時,必須重視出土文字資料。

本文是書面提交給 2002 年 12 月在香港中文大學召開的“明清江南:地域主體與歷史轉折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後因故未收入會議論文集,今據作者手稿收入。

談談進行古代語文的學習和 研究的一些經驗教訓

——基礎要扎實些，考慮要全面些

一、關於打基礎

要學習研究古漢語，首先要能夠掌握記錄漢語的文字的形、音、義。當然，這裏指的是一般古書的文字。如果研究商代漢語，那就要看甲骨文、金文，這是進一步的事情。有一些字的音義至今誰也搞不清楚，但是一般的字要爭取掌握好。要掌握漢字並不簡單，不能掉以輕心。漢字是很難掌握的一種文字。過去有一種論調說漢字落後，沒有形成拼音文字是因為封建社會長期停滯。這種說法現在大家都不相信了。應該說漢字是適合漢語的。到目前為止，漢語這樣的語言，恐怕只有漢字這樣的文字體系才能相適應。我們應當承認，漢語的特點決定了漢字的形式，漢字確實比較難掌握。那麼我們就應該尊重這個事實，戰戰兢兢、認認真真地來學習。

首先講講字形。要打好基礎，第一步就是要辨明字形。我先舉自己在字形方面犯過的錯誤。例如“棄”字，從甲骨文看就是兩隻手用簸箕把孩子扔掉。這有古代民俗的背景在裏面。“棄”字這樣寫是正確的，但是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却寫成這樣一個字形：“棄”，把中間部分錯寫成世界的“世”。又如“偶爾”這個詞，我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寫成“偶而”，甚至在我的《文字學概要》裏面也有痕跡，看校樣時已經改過了，但還有個別地方沒有改掉。

社會上也好，學術界也好，認錯、寫錯漢字的情況相當嚴重，這裏只能舉少數例子。“宦”(yí)本義是屋子的東北角，跟“宦”字形近。“宀”表示房子，“宦”本來表示到別人家裏當臣僕。這兩個字沒有什麼關係，但是因為形近而容易互訛。明代有個學者兼文學家，叫趙宦光，常被寫成“趙宦光”。他在明代是為數不多的研究

《說文》的學者，有一部著作叫《說文長箋》。有些講文字學的書就要提到他。照理說文字學的書不應該有錯字，但有些書還是印成了“趙宦光”。“宦”錯成“宦”還容易理解，因為“宦”字太偏僻，後來不用了。但是70年代以後有一個現象，“宦”字印出來變成“宦”字，這就奇怪了。有一位外交家宦鄉，過世的時候《光明日報》上登出來就變成“宦鄉”了。我現在看到有些書，“官宦人家”之類也印成“官宦人家”。這說明現在很多人“宦”字不認識，“宦”字也不認識。

下面幾個例子或許更典型一點。清代有個大官，大概是嘉道年間人，較早提倡宋詩，在文學史上有一定地位，所以在《中國大百科全書》裏有他的條目，他叫祁寯(jùn)藻，《大百科全書》裏却印成“祁嚮(xi)藻”。“嚮”本來从“佳”从“弓”轉個角度。這個字形比較少見，一般就寫成“隼”。簡化字還把“攜”寫成“携”，“嚮”、“隼”在偏旁裏混同了。《大百科全書》是否是排印錯誤呢？不是，因為它後面還注了音 xi。另外還有把“嚮”寫成“嚮”的，从“穴”也是不對的。漢字簡化以前就有把兩個字形混淆的，因為“嚮”太難寫。

清代阮元主編的《經籍纂詁》，“纂”字，从“食”“算”聲。《說文》：“纂，具食也。”字亦作“饌”，意思就是把食物等陳列出來，引伸為編撰的意思。好多小學家都講，“撰”是後起字。《漢書·刑法志》“刪定律令，纂二百章”，“纂”就應讀為“撰”。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人錯寫成《經籍纂詁》，包括研究小學的學者，這就很不應該了。

“閒”，原來象從門縫裏看到月亮，表示有空間、間隙。空間引申為時間上有空，意為空閑，所以“閒”既讀 jiān 又讀 xián。後來怕混淆，就用从“日”的“間”來表示空間、時間的“閒”，假借防閑的“閑”來表示空閑。現在就麻煩了，稍微古一點的書用“閒”就不知道該讀 xián、jiān、jiàn 哪一個音了。我舉本很有名的書，孫詒讓的《墨子閒(jiàn)詁》。很多資料，包括中華書局的介紹，都印成《墨子閑詁》，好像孫詒讓沒事做了就注《墨子》搞點訓詁消閑。孫詒讓用“閒詁”是有來歷的，漢代許慎給《淮南子》做過注，就叫《鴻烈閒詁》（“鴻烈”是《淮南子》內篇之名）。按照孫詒讓的《序》，這是讀書得閒的“閒”，即書本中的一些問題，提出來解決。一些地名人名中的“閒(jiān)”也被錯成“閑”。松江有個比較雅的古稱“雲閒”，有些書裏就錯成“雲閑”。《史記·貨殖列傳》有個人叫“刀(刁)閒”，有些書也印成“刀閑”。

有些大學問家有時也會把字認錯。先說“𣦵”跟“歹”的相混。《說文》裏說“𣦵”象殘骨，說實話我們研究古文字的人也看不出來如何象殘骨，這個說法未必對。但是从“𣦵”的字確有與傷殘、死亡有關的意思，比如“死”，字就从“人”从

“𠂔”。“𠂔”在偏旁裏多數變爲“𠂔”形，好歹的“𠂔”現在和“𠂔”的“𠂔”形寫法一樣了。據徐復先生研究，“好歹”的“𠂔”這個詞是從蒙古語裏傳過來的。最早是借用一個藏文字母表示的，發 da 這樣的音，本作“𠂔”，變爲“𠂔”、“𠂔”。一直到《康熙字典》，好歹的“𠂔”，字頭仍作“𠂔”，與“𠂔(𠂔)”是兩個字。梁啟超的《從發音上研究中國文字之源》把“殘”的形旁“𠂔(𠂔)”的聲母注爲 d，顯然認爲是好歹的“𠂔”。沈兼士《右文說在訓詁學上之沿革及其推闡》批評說：“至於殘字從𠂔，篆作𠂔，音蘖(η-)，梁氏以爲從蒙古文歹字(d)，大誤。”^①𠂔(è)讀爲 niè 也是可以的，因爲是疑母字。

郭沫若是古文字學大家，他的早期古文字著作都是用他手寫的清稿影印的，我們也能看到他寫的錯別字，而且不是一兩個。他的金文著作裏把“豕”寫成“豕”；假借的“段(假)”，右邊的偏旁寫成“殳”；《石鼓文研究》裏“沔水”的“沔”右邊寫成“丐”。

簡化字推行後引起了新的麻煩，如“詞彙”的寫法就是例子。簡化字把“匯”、“彙”、“滙”簡化成一個字形“汇”。“匯”一般用爲會合的意思。“彙”照《說文》的說法和“刺蝟”的“蝟”是一個字，未必對，但按古代韻書確應讀 wèi。古書中訓“彙”爲“類”，有按類別彙集的意思，所以一般編纂類書等都稱“彙編”，但也有例外，比如張相的《詩詞曲語詞匯釋》就用“匯”。簡化之後，再要寫繁體就不知道該寫哪個字形。產生問題最明顯的就是“詞彙”。當然，“詞彙”是較晚出的詞，有了近代語言學後才有這個詞。漢字簡化之前都寫成“詞彙”，沒有寫成“詞匯”的。比較有意思的是沒有進行漢字簡化的地方如香港的刊物上，“詞彙”、“詞匯”兩種寫法都有。有次我碰到一個臺灣學語言學的青年，他還以爲這兩種寫法有不同含義，“詞彙”指一個一個的詞，“詞匯”指整體。

再舉個例子。浙江有“天台山”、“台州”，讀 tāi，繁體字本作“台”，“臺”沒有 tāi 這個讀音。現在把簡化字復原的時候變成“臺”，這就很荒謬了，本來是兩個字嘛。有意思的是臺灣的有些地圖也寫成“臺州”，不用簡化字的地方也搞錯了，誤以爲寫“台州”是用簡化字。

總之，漢字的這些問題相當麻煩，我們中文系的學生一定要掌握這些，要學習研究古漢語更應該掌握。我過去寫錯別字，現在可能也還寫錯別字，自己不知道而已。像梁啟超、郭沫若這樣的大學者也寫錯別字。王國維在考釋毛公鼎的文章裏

① 收入《沈兼士學術文集》，中華書局，1986，116 頁。

也有把《說文解字》裏的兩個字誤混的情況。“蠢”的聲旁是“春”，意為蠢動；“蠢”的聲旁是“春”，意為愚蠢。“春”本作“𡗗”。毛公鼎裏有一個“𡗗”字，一般釋為“蠢”，是對的，但王國維隸定成“蠢”，讀為訓“作”、訓“動”的“蠢”。我這樣說，有同學會想，學問那麼大的人也寫錯別字，那麼我們寫幾個錯別字有什麼關係？要是造成這樣的結果就是我的不好了。我的意思是說：真正掌握漢字是很不容易的，大學者都會出問題，我們必須加倍提高警惕，少犯錯誤。

接着談談字義，主要是談字、詞的古義。古今詞義變化的問題很多書都講到，王力主編的《古代漢語》對此就很重視。比如走路的“走”，在古代是疾走、小跑的意思。又如“湯”古代指熱水、開水。這些好像大家都知道，但事實上有許多看似普通的古書詞義很多人並沒有掌握，包括編古漢語詞典的學者。如“金”，《辭源》等以“黃金”為第一義，又有“金屬通稱”義，而無“銅”義。但我們知道古書中如《左傳》、《周禮·考工記》中“金”就是指“銅”或者“青銅”，黃金稱“金”是較晚的。《辭源》“金石”條：“③金銀、玉石之屬，常以喻堅固、堅貞。《荀子·勸學》：‘鍥而不舍，金石可鏤。’……”。這顯然是錯誤的。喻堅固、堅貞的“金”當然指硬度較高的金屬，金銀都是硬度不高的，這裏的“金”顯然指古代常見的銅。

“牒”字在《辭源》中的義項有：①書札 ②授官之簿錄 ③訟辭 ④譜牒，唯獨沒有基本義“簡札”。《說文》：“簡，牒也。”“牒，札也。”“札，牒也。”《辭源》“書札”條的釋義是“書信、信札”。“牒”字“書札”項的引例是《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右師不敢對，受牒而出”，此“牒”字指記有各諸侯國應為周王輸粟、出戍人的數字的簡牒（參看《左傳正義》），釋為“書札”是錯的。在漢代，寫有文書、文件的簡札多稱“牒”，故引伸指文書、文件。《辭源》說“牒”可當“訟辭”講，所引古書用例中的“訊牒”、“訟牒”，都是“牒”跟前面的詞連用才表示“訟辭”，“牒”本身沒有此義。又如譜牒，一般也不能只稱“牒”，家譜沒有叫“家牒”的。作為一本古漢語詞典，犯以上的錯誤是很不應該的。不過我要申明：這不是說我比《辭源》高明，但編《辭源》的人很多，水平不一，不能完全被他們牽着鼻子走。我經常翻《辭源》，一個人的知識是有限的，我所知道的東西跟《辭源》比起來是微乎其微的，但是《辭源》有錯誤要指出來。

鎖，現在一般就理解為開鎖的鎖，但最早鎖是鏈條的意思，現在還說鎖鏈、枷鎖，用的是古義。有一位很有名的學者，他有一篇文章用實物來解釋古代的鎖，指的是鑰匙開的鎖，他引古書就不知古今義不同：“《三輔黃圖》：‘飛燕命飲飛之士，以金鎖攬雲舟於波上’，金鎖蓋銅鎖。能鎖舟於水上，其鎖必大。……《漢書·王

莽傳》下：‘鐵鎖琅當其頸’，師古曰：‘琅當，長鎖也’，此刑具之鎖亦必長大。”“金鎖”是銅鏈，“長鎖”很明顯指長的鐵鏈，他都誤認為後來的鎖。

詭，現在都用於貶義，古代其實是中性的。搞古代思想史的人，往往古漢語並不怎麼通。《論衡·卜筮》：“魯將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為凶……孔子占之以為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之吉。’魯伐越，果克之。……周多子貢直占之知，寡若孔子詭論之材，故觀非常之兆，不能審也。”有一種《中國哲學史》講王充思想時說：“他指出卜筮完全是人根據自己的主觀願望祈求福佑，關於占卜吉凶，全係人們隨意解釋。如像同為一件事，子貢占卜得凶，而孔子占卜得吉。乃是因為孔子較子貢有詭論之材。”作者認為孔子會詭辯，一方面是不理解“詭”字的含義，一方面也是沒有全面地去看《論衡》。《論衡》雖然有《問孔》篇，但王充其實是對孔子很尊敬的。另外王充是個命定論者，他認為沒有必要卜筮，但是並不認為卜筮沒有吉凶，他認為吉人去占卜一定得到吉兆，凶人占卜一定得到凶兆。詭原為中性詞，有時還用於褒義。《論衡》本書《吉驗》篇：“堯體就之如日，望之若雲……有殊奇之骨，故有詭異之驗。”這個詭異就是與眾不同的意思。同書《講瑞》：“然則鳳皇、騏驎，都與鳥獸同一類，體色詭耳，安得異種。”這個“詭耳”就是“異耳”，表示不同。《卜筮》篇說孔子有“詭論之材”是贊美孔子。

下面談談字音。講古音必須明字形。有的古音手冊把“冏”、“同”都歸入耕部。“同”和从“冏”的“炯”、“迴”等都歸耕部沒問題，但是“冏”應該歸陽部，反切也和“同”不同，光明的“明”原來就从“冏”。又如餓殍的“殍”，有的手冊就把它放在幽部，認為从“孚”，“孚”在幽部。但其實“殍”字原來寫作“殍”，右邊从上下兩隻手，“受”字《說文解字》有，通“標”biào，是宵部字。因為“受”、“孚”字形讀音相近，所以“殍”被寫成“殍”。“餓殍”之“殍”，較早用“芟”字表示，“芟”字後來也變作“莩”，跟“葭莩”之“莩”本非一字。

《辭海》、《辭源》注音錯誤很多，絕大部分是因為訓詁上面的問題，因為音和義是配合的，有時候不注意音義關係就注錯音了。舉兩個例子。怵，恐懼的意思，反切是丑律切，chù；另有利誘的意思，辛聿切，xù。但這兩種“怵”《辭海》都注為chù。又如《辭源》：唬 xià，①虎吼 ②哭號。其實第二個意思的“唬”就是“號”的異體，應讀為háo，《辭源》把它們都歸為xià，是不對的。不注意字形、訓詁，字音也就容易讀錯。

以上所說是最基礎的問題，字形、字音、字義，掌握起來其實也不是太難的，只要態度認真，勤於查書，並不憚向師友請教，大部分問題都是可以解決的，但是稍一

疏忽就會出錯誤。

二、關於全面考慮

學習、研究古漢語，不能像鐵路巡警各管一段。我們進行研究當然要有斷代的功夫，但是更要有全局的觀念，要照顧到以前和以後的情況。

《魏晉南北朝詞語例釋》：“續紛，糾纏扭鬬貌。”作者看到魏晉南北朝資料裏“續紛”往往有這樣的意思，指出當然是好的，但是却沒有略為向前追溯一下。《說文·三下·鬥部》：“鬬(bīn)，鬬也。从鬥，賓省聲。”“鬬(fēn)，鬬連結鬬紛相牽也。从鬥，夔聲。”“鬬紛”就是“續紛”。可見“續紛”的這種用法至晚在漢代就已存在。作者沒有“上掛”。

下面是我自己的一個例子，由於沒有“下連”，犯了錯誤，問題更嚴重。我的《論衡札記》“(19)拔訛作投：《知實》：‘塗有狂夫，投刃而候。澤有猛虎，厲牙而望。知見之者，不敢前進。’按：‘投刃’無義，當為‘拔刃’之誤。《異虛》：‘衛獻公太子……投殿將死，其御止之，不能禁，遂伏劍而死。’‘投殿’本當作‘拔劍’，拔字因形近訛作‘投’，與此同例。”(收入《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時加編按：“拔刃”為古代常語。《漢書·酷吏·嚴延年傳》：“道路張弓拔刃，然後敢行。”)②“投刃”講不通，“投”和“拔”字形很相近，古書又有“拔刃”的說法，那麼我認為“投刃”就是“拔刃”之誤，好像理由很充足，但後來看到劉百順《魏晉南北朝史書詞語札記》③有一條“投刀、投戈、投斤”，舉魏晉以下古書中此類用例頗多，謂此種“投”字當解作“揮”，並明確指出《論衡》“投刃”亦屬此類。我覺得他是對的。《論衡》後面說老虎利牙是很積極的動作，“投刃”解為揮刃正相符合，如果僅僅拔刃就太消極了。“道路張弓拔刃”是防備性的。我的說法是所謂“以不誤為誤”，沒有注意到稍晚的資料。所以一定要前後兼顧、上下貫通。

以前關於使動、意動的問題有錯誤的觀點，70年代以前一直認為是一種修辭手段，使文字簡練。我在70年代末一篇講甲骨文的短文④裏指出這是不對的，因為他們沒有注意到甲骨文的情況。我們現在所掌握的，靠得住的，又是比較豐富成系

② 裘錫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114、115頁。

③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

④ 裘錫圭《殷虛甲骨文研究概說》，《中學語文教學》1979年6期。收入裘錫圭《古文字論集》（篇名改為《殷虛甲骨文研究概況》），中華書局，1992，343—349頁。

統的語料,最早就是商代後期的甲骨文。甲骨文裏看不到“使某人做某事”的說法和“以……爲……”的結構,但是後來人解釋爲使動、意動的格式是有的。50年代陳夢家就指出過,甲骨文中“王吉茲卜”,就是王認爲這一卜是吉利的。甲骨文中使動的例子,我的那篇文章也已經舉出,此處從略。古漢語中並非先有“使……”、“以……”的結構再有使動、意動,而是原本就存在使動、意動,後來爲了表意明確才用“使……”、“以……”的結構。過去講使動、意動沒有“上掛”,所以出問題。

上下貫通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又須注意不要受表面相似的現象迷惑。如甲骨卜辭中的“出于”：“丁巳卜,方貞:王出于臺。貞:王勿出于臺。”“貞:于庚申出于臺。”^⑤表面上一看,很像我們熟悉的“青出於藍”的“出於”,就是“從……出來”。但其實只是表面一樣。再看一條:“壬辰卜,亘貞:王往出于臺。”^⑥這條我覺得能說明問題,按照我們解釋“青出於藍”的辦法來解釋,應是“王去從臺出來”,這話就不通,其實“出于臺”就是王出去到臺的意思。所以“出于”就是“出到”,關鍵在“于”的訓釋,古書裏“于”是可以訓“往”的。甲骨文的“出于”跟後來的“出於”不同。

另外我們對於語言資料的性質要有正確認識。下面舉的例子就是對語料性質認識不明確,造成最後結論也有問題。有一篇《殷墟甲骨文代詞系統研究》,討論了殷代有無疑問代詞的問題。作者說:“在殷代甲骨文裏,未見疑問代詞;在殷代金文中亦然。這就給我們提出一個問題:是殷代語言中已有疑問代詞而這種語料至今還未發現呢,還是殷代語言中根本就沒有疑問代詞呢?我個人傾向於後者。根據如下:其一、已發現的殷代語言原始資料已有一定數量了,應該有疑問代詞出現的機會。其二、殷商時代已有‘替代’疑問代詞的語言手段。我們知道,卜辭中的貞辭往往都是問句。……卜辭中有沒有特指問句?按着一般人的想像,既然沒有疑問代詞,就一定不會有特指問。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在卜辭裏相當於特指問的問句是有的。例如:‘自示壬至毓,有大雨?自大乙至毓,有大雨?’(懷 1369)‘庚申卜:唯河害禾?庚申卜:唯夔害禾?’(合 33337)‘庚辛丑酒?庚辛亥酒?’(明續 1686)。……這樣看來,殷代語言中雖然沒有疑問代詞,但是也可以表達特指問。”他認爲殷代沒有疑問代詞,我覺得就是沒有很好地認識甲骨卜辭的性質。

作者認爲商代語料很多,但還是沒有出現疑問代詞,而有特指問,所以當時沒

⑤ 《合》7942。

⑥ 《合》7941。

有疑問代詞。這是有問題的。已著錄的甲骨卜辭大概有六萬片左右,平均每片十個字,就有六十萬字,語料也不算少,一般常用詞彙都有,但是說因為甲骨卜辭沒有疑問代詞,所以殷代語言沒有疑問代詞,則是不對的。因為甲骨卜辭基本上是爲了想知道一件事是吉還是凶而提出來的,不宜用疑問代詞。例如有一件事要人做,可以派的選擇對象有幾個,到底讓哪個去好呢?其卜辭不可能用疑問代詞,只能用特指問,因為甲骨沒有靈驗到能直接告訴你派哪個去最好,甲骨只能回答派某個人好不好,占卜的人只能一個一個問,這是很明白的道理。商代金文的數量少得多,而且金文大都是爲了紀念某事而鑄在銅器上的,很少會有疑問句。所以他的論證可以說是沒有道理的。關鍵就在於對語料性質沒有充分考慮。

我剛才談了那麼多,不希望有副作用,大家不要認爲要求太高,望而生畏。我只是想提醒大家注意這些問題。打基礎要慢慢來。我們不是特別聰明的人。當然確實有特別聰明的人,像梁啟超,他的《飲冰室合集》字數非常多,他壽命不長但是做了許多事,還能寫那麼多東西,如果要我們來寫,不加考慮一天到晚地寫也寫不出來。有些人的確天分比我們高,記性比我們好,所以工作效率能那麼高。我們是一般的人,就我的經驗,真正記住一個字,翻字典不知要翻多少次。不要怕麻煩,就是一點點積累。通過學習研究不斷積累,才能夠深入,才能解決問題。過去學者的基礎一般比我們好。但他們需要讀的書也比我們少,讀書的時間也往往比我們多。像章黃學派,他們的觀點我不盡同意,但是他們讀書確實很扎實。根據黃侃等人的日記記載,他們對於一些基礎的大書都是讀過好幾遍的,基礎非常扎實。但現在這樣要求是不切實際的,比如研究古文字要求《說文解字》或者《段注》先讀一兩遍,這樣往往事倍功半。我可以坦白地說,我搞古文字學,到現在還沒有把《說文解字》一個字一個字地讀一遍,我是先對《說文》有一個大概的瞭解,然後在對古漢語、古文字的學習研究中不斷參考,逐漸熟悉的。當然,這不足爲訓,不能作爲一個好經驗介紹給大家。我只是要大家不要對打基礎望而生畏。

今天研究古漢語還要充分發揮現代的優勢,如果方法和材料還和段玉裁、王念孫、章太炎、黃侃一樣,那一輩子也追不上他們。他們功夫深,人又聰明,完全按照他們的路子追,是斷斷趕不上的。我們今天之所以能糾正許多他們的錯誤、知道他們所不知道的東西,就是靠着我們特有的條件。首先就是新資料,特別是出土資料。另一方面就是靠工具書,靠電腦,運用逐字索引、電腦檢索資料。此外,還有新觀點、新方法。所以我們不必悲觀。

我在前面強調打基礎和上下貫通等等,是爲了要大家頭腦裏有這些問題,知道

深淺,提高警惕,這樣才能學得好。我常常喜歡打一個比喻,我們這一代的學術修養沒有辦法和段、王、章、黃等前人相比,但我們還知道學問道路上哪裏有坑,想法繞過去,實在繞不過去就鋪一塊板再走過去。有好些年輕人經驗不足,已經掉在坑裏了還自我感覺良好,那就慘了。我就是告訴你們路上有很多坑,具體有哪些坑就要各位自己去摸索了。

本文是作者2004年11月30日在復旦大學演講的錄音整理稿,原由潘佳整理,發表於《雅言》2005年第40期。後經葛亮修改、作者審訂,發表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上(2008年6月8日)。今據網站發表者收入。

關於《規範字表》的一些想法

我覺得首先需要明確一點：以現有的人力和時間的條件，不可能制定出一個充分合理的“一勞永逸”的《規範字表》。而且由於大陸和港澳臺使用的漢字的統一，尚未出現現實的可能性，目前也不是制定這樣一個字表的合適時機。既然如此，就像朱德熙先生在二十多年前說過的那樣，我們在漢字規範方面，必須十分慎重，儘量少作變動。能不改就不改。我認爲最好把字表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簡化字表、通用字表中的字。在這部分，除了對已有的各種有關規定彼此有矛盾的問題妥善加以解決之外，一概不作變動。這當然不是說以後條件成熟時也不能變動，但目前以不動爲宜。

簡化字總表、通用字表未收的新增字，最好以“推薦字表”的形式出現，選擇過去（主要指漢字簡化前）最常用的一種字形（適當考慮港澳臺現在通行的字形），作爲推薦字形。嚴格避免按照偏旁類推等辦法造出過去的出版物中從未實際使用過的字形（《漢語大字典》、《中華字海》等的字形不能用作根據）。我們不可能使收入規範字表的字的偏旁字形統一，實際上簡化字的偏旁字形就不統一（如从盧旁的字有从户从卢兩種寫法等）。

在規範字表的前言中，要把調子放低，說明此表是在出版物和電腦使用的漢字量越來越大的情況下，爲了使簡化字表、通用字表之外的漢字字形有一個可以遵循的標準而制定的。

簡化中的同音通用和一對多現象，素爲學者們及使用繁體字的人們所詬病。在越來越使用得頻繁的繁簡轉化中，一對多帶來了很多麻煩。但是這個問題需要通盤解決，也許只有在大陸和港澳臺使用的漢字統一時才能解決。小打小鬧沒有意義，如選擇的例子不夠合適，如以前的“象”“像”分用，反而會招致批評。因此在這方面目前也只能採取儘量不加變動的方針。

異體字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提法要妥當，可避免的麻煩儘量避免，千萬不要“自找麻煩”。

本文是2006年6月《規範漢字表》專家委員會成立會的書面發言，今據以收入。

《論衡》札記

《論衡》一書向乏善本，文字訛誤衍脫之處甚衆，雖經孫詒讓、孫人和、吳承仕、黃暉、劉盼遂等家校正，贖義猶多。1974年讀《論衡》時曾寫成校正文字之札記七十餘條，今抄出發表，以求正於世之讀是書者。

札記分誤字、脫字、衍文、誤讀重文、字序錯亂等五類。通用字與音近誤字之界限，有時甚難劃分，故與通用字有關之例皆附入誤字類中。誤讀重文之例僅一條，本可歸入字序錯亂類中，以其情況較特殊，故獨立為一類以引起注意。札記中所引“校釋”即黃暉《論衡校釋》，所引“集解”即劉盼遂《論衡集解》。

一、誤 字

(一) 形近誤字

(1) 緇訛作繒

《累害》：“以塗搏泥，以黑點繒，孰有知之？清受塵，白取垢，青蠅所汙，常在練素。”

按：“以黑點繒”句黑字，朱宗萊據《初學記》引文謂當作墨（見校釋），似可從。繒非必黑色，若以墨污素繒，豈容不知？繒蓋是緇之誤字。武威所出《儀禮》簡緇字偏旁作𠂔（《武威漢簡》甲本服傳第12、53等簡），漢碑留字作𠂔（博士題字）、𠂔（州輔碑緇字偏旁）等形。本書《龍虛》篇“菑丘訢”之菑舊本作𦵏，《廣韻》𦵏同菑，𦵏、𦵏即𦵏之訛變。𦵏、𦵏等形與曾相似，故《累害》緇字訛而為繒。《說文》：“緇，帛黑色也。”

又按：“以塗搏泥”之搏似當讀為傅，附也。（《新探》編按：亡友郭在貽兄曾來信指出，搏不應讀為傅，《釋名·釋床帳》“搏壁，以席搏著壁也”，搏字之義與

此同。)

(2) 日月二字互訛

《說日》：“日蝕謂月蝕之，月誰蝕之者？……日時晦朔，月復爲之乎？”

按：月有晦朔，日相則不因晦朔而異。此文蓋本作“月時晦朔，日復爲之乎”，日、月二字以形近互訛。本篇下文“日在上，月在下，障於日之形也……日在上，月在日下，障於日”，“障於日”之“日”爲“月”之誤字。《偶會》“夜，月光盡”，月爲日之誤字（看校釋、集解）。此日、月二字易於相淆之明證。

(3) 且訛作旦

《說日》：“日食，月掩日光，非也。何以驗之？使日月合，月掩日光，其初食崖當與旦復時易處。”

校釋於上引文末句注曰：“旦復無義，當作其復。”集解無說。按：“旦”“且”形近易誤，“旦復時”本當作“且復時”。且復時謂日將復原之時也。如至已復之時，則無所謂崖矣。本書《遭虎》“盧奴令田光與公孫弘等謀反，其且覺時，狐鳴光舍屋上”，宋殘卷及元本，且覺時皆訛作旦覺時，與此同例。《論衡》書中且訛作旦之例頗衆，校釋、集解於它篇曾舉正之（見《遭虎》《書解》《寒溫》等篇），然於《說日》則思不及此，何也？

又按：《自紀》篇：“年歷但記，孰使留之。”孫詒讓謂“記”當爲“訖”，其言甚是。竊疑“但”亦“且”之訛文。蓋且字先誤作“旦”或“但”，後人遂改作“但”。《墨子·號令》“敵人但至”，孫詒讓謂“但舊本作但，从且，疑且字之誤”，例與此同。

(4) 課訛作謀

《程材》：“夫論善謀材，施用累能，期於有益。”

按：下文有“將以官課材”語，謀材疑是課材之訛。《文選》李善注本《出師表》：“陛下亦宜自課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課字，《三國志》及《文選》五臣注本皆作謀。此課、謀二字形近易訛之證。

(5) 又訛作反

《謝短》：“夫儒生所短，不徒以不曉簿書；文吏所劣，不徒以不通大道也。

反以閉閤不覽古今，不能各自知其所業之事未具足也。”

按：“反以閉閤不覽古今”一語，與上句文氣不接，疑“反”爲“又”之訛文。（《新探》編按：此條根據不足，當刪。）

(6) 任訛作正

《實知》：“方今占射事之工，據正術數。術數不中，集以人事。人事於術數而用之者，與神無異。”

按：“據正術數”本當作“據任術數”。本篇上文有“據術任數”之語，下文又謂“如俱任用術數，賢何以不及聖”，皆可證。

又按：“人事於術數而用之者”句，文義難通。疑句首脫一“集”字。

(7) 而訛作所

《超奇》：“好學勤力，博聞強識，世間多有。著書表文，論說古今，萬不耐一。然則著書表文，博通所能用之者也。入山見木，長短無所不知。入野見草，大小無所不識。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採草以和方藥。此知草木所不能用也。”

按：“博通所能用之者也”、“此知草木所不能用也”二句中之“所”字，皆當為“而”之誤字。王充以為世間博聞強識之人，多不能著書表文，故謂著書表文之人必“博通而能用之者”。人或能識草木，而不能伐木作屋，採草和藥，猶博通而不能著書表文者之比，故謂之“知草木而不能用”。如今本之文，其義不可通。隸書“所”“而”形近，故易淆亂。武威所出《儀禮》漢簡《燕禮》篇第51簡“樂作而后就物”之“而”字訛作“所”（見《武威漢簡》圖版拾叁，該書校記失校），即其一例。

(8) 遭訛作連

《超奇》：“夫鴻儒希有，而文人比然，將相長吏安可不貴。豈徒用其才力游文於牒牘哉？州郡有憂，能治章上奏，解理結煩。使州郡連事，有如唐子高、谷子雲之吏，出身盡思，竭筆牘之力，煩憂適有不解哉？”

按：“使州郡連事”，語不可解。集解疑連事為從事之誤。校釋以此五字連上為句，疑連事當作無事。按：二說皆非。連事當為遭事之訛。漢人書遭字或作遭（見鄭固碑、武榮碑等），故易誤為連字。本篇下文謂周長生為州郡舉奏上書，“事解憂除”，“長生死後，州郡遭憂，無舉奏之吏，以故事結不解”。“事解憂除”正與上文“州郡有憂”、“州郡遭事”相應；“州郡遭憂”與“州郡遭事”同意。

遭誤為連之例又見於《死僞》：

……（楚成）王縊而死，謚之曰靈，不暝；曰成，乃暝。……成王於時縊死，氣尚盛，新絕，目尚開，因謚曰靈；少久氣衰，目適欲暝，連更曰成。目之視暝，

與謚之爲靈(集解謂靈下當脫成字),偶應也。

“目適欲瞑,連更曰成”,意謂成王之日欲瞑之時,適逢改謚之事,“連更”當爲“遭更”之訛。同篇下文:“偶晉侯之疾適當自衰,子產遭言黃熊之占,則信黃熊鯀之神矣。”《奇怪》:“或時禹、契、后稷之母,適欲懷妊,遭吞薏苡、燕卵,履大人跡也。……堯、高祖之母,適欲懷妊,遭逢雷龍載雲雨而行。”此皆以遭字與適字相呼應,與“目適欲瞑,遭更曰成”同例。

(9) 而訛作不

隸書“不”“而”二字形近,故而字易訛作不字。本書《明雱》“慈父之於子,孝子之於親,知病不祀神,疾痛不和藥”,集解謂“二不字疑當爲而,形近之誤”,即其例。又本書“能”“不”二字時或相淆。如《辨崇》“歸之久遠,莫能分明”,錢、王、黃、崇文諸本“莫能”皆訛作“莫不”。《訂鬼》“其人能自知覺與夢,故其見物不能知其鬼與人”,上一句元本作“其人不自知覺與夢”,與文義相合,各本能字爲不字之誤。此亦由於漢代人多假“而”爲“能”(本書常見),故其字易與“不”相淆。明乎此,能校正本書訛文數條。

《氣壽》:“渥彊之人,不卒其壽。”

本篇上文曰:“夫稟氣渥則其體彊,體彊則其命長。”此文“不卒”當爲“而卒”之誤,而讀爲能。孫詒讓謂此不字當爲“必”。按:王充以爲人之命運除去由稟氣渥薄所決定之“彊弱壽夭之命”以外,尚有“所當觸值之命”,如遭“兵燒壓溺”之類。由此言之,渥彊之人不能必卒其壽,孫說似非。

《刺孟》:“求食者,皆多人所不得利之事。”

孫詒讓曰:“不,余(余允文《尊孟辨》)引作共,是也。”按:余氏所引疑是以意改之,未必可信。此不字疑亦當作而,讀爲能。又按:此文“多”字疑爲“目(以)”字之誤。《談天》“女媧多前”,孫人和謂多乃目字之誤,可與此互證。

《譏日》:“夫日之剛柔,月之奇耦,合於葬歷,驗之於吉,無不相得。”

校釋:“吉當作古……不,語詞。”按:校釋謂吉當作古,似可從;以“不”爲無義之語詞,不可信。疑此不字本亦作而,讀爲能。

《變虛》:“世間聖人,莫不堯舜;惡人,莫不桀紂。”

“莫不堯舜”“莫不桀紂”,義不可通。此二“不”字皆當爲“而”之訛文。《論衡》書

中“而”字用法往往與“如”字相同，各家多能言之，今略舉數例。《四諱》：“如以宅神不欲西益……何故惡之？而以宅神惡煩擾，則四面益宅，皆當不祥。”《刺孟》：“孟子所去之王，豈前所不朝之王哉？而是，何其前輕之疾，而後重之甚也。如非是，前王則不去，而於後去之，是後王不肖甚於前……”《感類》：“魂而有靈，將安之不也？”以上引文中字下加點之“而”字，其義皆與“如”無異。《明雱》：“然而世之聖君，莫有如堯舜。”《死僞》：“世間無道，莫如桀紂。”“莫而堯舜”“莫而桀紂”，猶言“莫如堯舜”“莫如桀紂”也。

本書似亦間有誤“不”爲“而”之例。《雷虛》：“呂后故爲，天不罰也。人誤不知，天輒殺之。不能原誤，失而責故。”校釋據宋、元本改失爲反，並謂責字當爲貫字之誤。今按：改失爲反可從，謂責當作貫則未必是。疑原文作“反不責故”，今本而字爲訛文。

(10) 宦訛作官

《別通》：“仕官爲吏，亦得高官。”

按：仕官當作仕宦。本書屢見仕宦之語，《定賢》“以仕宦得高官身富貴爲賢乎”，語意與此相近。古書中宦訛作官之例常見。本書《命祿》“故官御同才”，官御即宦御之誤，前人已言之。

(11) 斗訛作升

《定賢》：“數至多，升斛弗能。”

按：本書屢見“斗斛”之語，如《骨相》“猶察斗斛以知容矣”，《答佞》“斗斛之量多少”，《變動》“夫貴賤多少，斗斛故也”。本篇升斛當爲斗斛之訛。斗、升二字隸書相近，古書中常見相淆之例。本書《治期》：“吏百石以上，若升食以下”，升食即斗食之誤，孫詒讓已言之。

(12) 鄉訛作卿

《案書》：“卿決疑訟，獄定嫌罪。是非不決，曲直不立，世人必謂卿獄之吏才不任職。”

《對作》：“文吏就獄卿之事覆而考之。”

《自紀》：“獄當嫌辜，卿決疑事，渾沌難曉，與彼分明可知，孰爲良吏？”

按：以上各條皆以“卿”與“獄”並提，“卿”皆當爲“鄉”之誤字。卿、鄉形近，極易相淆。本書《謝短》“對卿便給”，吳承仕、劉盼遂皆謂“對卿”爲本書常見之“對鄉”

(或作對嚮)之訛,即其證。漢時鄉嗇夫“職聽訟”(見《漢官·百官表》),本書《物勢》謂“一堂之上必有論者,一鄉之中必有訟者”,《潛夫論·愛日》謂“鄉亭部吏足以斷決”,正與上引“鄉決疑訟”、“鄉決疑事”等言相合。《潛夫論·斷訟》“鄉部之治,獄官之治者,其狀一也”,以鄉、獄並提,更可證《論衡》“卿獄”必為“鄉獄”之誤。

(13) 其訛作非

《無形》:“龍之爲性也,變化斯須,輒復非常。”

《書解》:“世儒業易爲,故世人學之多。非事可析第,故官廷設其位。”

按:據文義,“輒復非常”當作“輒復其常”,“非事可析第”當作“其事可析第”。蓋“其”字筆畫不清,遂訛作“非”字。通行本《老子》第三十九章:“此非以賤爲本邪非乎?”“此非”之“非”,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甲、乙本及傅奕本皆作“其”,《戰國策·齊策》所引亦作“其”。此似亦“非”“其”二字相混之一例。

(14) 出訛作土

《本性》:“丹朱土於唐宮”,校釋據天啓、錢、黃、鄭、王等本改“土”爲“生”,集解謂“土爲出之誤字,草書出字作土,故易相淆。程榮本作生,亦通”。按:作“生”者,疑是後人以意改之。集解謂土爲出之誤字,可從;以草書說之,則非。漢隸出字簡體與土字極相似,故古書中“出”與“土”“土”諸字每易相淆(看《讀書雜誌》中《荀子·大略》等條),無須以草書說之也。《論衡》書中尚有一訛“出”爲“土”之例,今舉出之:

《驗符》:“芝生於土,土氣和,故芝生土。”

孫人和謂《證類本草》引末句作“故芝草生”,義較今本爲長;集解亦以“芝生”下“土”字爲衍文。按:此土字亦當爲“出”之誤字。下文“芝草延年,仙者所食,往世生出,不過一二”,亦“生出”連言。他篇“生出”之語屢見,不具引。

(15) 薦訛作蒙

《程材》:“其高志妙操之人……亦時或精聞不及,意疏不密,臨事不識,對向謬誤,拜起不便,進退失度,奏記言事,蒙士解過,援引古義,割切將欲,直言一指,觸諱犯忌……”

按:“蒙士解過”,義不可通。蒙當爲薦之誤字。漢人書薦字往往似“蒙”,如武威《儀禮》簡作 (《武威漢簡》圖版陸《少牢》1簡)、 (同上圖版拾《有司》75簡)等形,孔彪碑作,故易訛作蒙字。【編按:《爾雅·釋草》“薦,黍蓬”,《釋文》:

“薦，孫李本作薦。”亦爲此類“薦”字遺跡。】“薦士”之語，《論衡》屢見。《效力》“能舉賢薦士，世謂之多力也。然能舉賢薦士，上書曰〈白〉記也”，《須頌》“上書於國，記奏（二字當乙）於郡，譽薦士吏，稱術（述）行能”，《佚文》“上書陳便宜，奏記薦吏士”，皆其例。王充於《自紀》篇自言：“不爲利害見將。常言人長，希言人短。專薦未達，解已進者過。及所不善，亦弗譽；有過不解，亦弗復陷。”專薦未達即《程材》所謂薦士，解已進者過即《程材》所謂解過。解過謂人有過而解之將前。校釋於“蒙士解過”下已引《自紀》“專薦未達，解已進者過”之文，然既不能指出蒙爲薦之誤字，又誤釋解過爲“指摘過失”，蓋未解其意。

（16）不訛作亦

《量知》：“夫儒生之所以過文吏者，學問日多，簡練其性，雕琢其材也。故夫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材成德也。材盡德成，其比於文吏亦雕琢者，程量多矣。”

校釋以“亦雕琢者”爲句，注曰：“亦，語詞。”按：其說非是。亦雕琢者本當作不雕琢者。王充稱儒生“雕琢其材”，故稱文吏爲“不雕琢者”。不、亦形近，易於相淆，本書中即不乏其例。《雷虛》“難曰：人亦見鬼之形，鬼復神乎”，“亦”爲“不”之誤字（見集解）。《道虛》“五帝三王皆有聖德之優者，黃帝不在上焉”，《無形》“枘杵雖已成器，猶可復爍，枘可得爲尊，尊不可爲簋”，二“不”字皆“亦”之誤字（以上見校釋）。

（17）效訛作致

《識日》：“是以世人舉事，不考於心而合於日，不參於義而致於時。”

校釋：“致，宋本作驗，是。”按：驗字無由訛作“致”，疑本作“效”，因形近誤爲“致”。“效”“驗”義同。《書虛》：“今顏淵用目望遠，望遠目睛不任，宜盲眇。髮白齒落，非其致也。”吳承仕謂“致”疑當作“效”，與此可互證。

（18）迎訛作巡

《解除》：“虎狼入都，弓弩巡之。雖殺虎狼，不能除虎狼所爲來之患。”

按：“巡之”疑當作“迎之”，形近而誤。

（19）拔訛作投

《知實》：“塗有狂夫，投刃而候。澤有猛虎，厲牙而望。知見之者，不敢前進。”

按：“投刃”無義，當爲“拔刃”之誤。《異虛》：“衛獻公太子……投殿將死，其御止之，不能禁，遂伏劍而死。”“投殿”本當作“拔劍”（看校釋），拔字因形近訛作“投”，與此同例。（《新探》編按：“拔刃”爲古代常語。《漢書·酷吏·嚴延年傳》：“道路張弓拔刃，然後敢行。”）【編按：劉百順《魏晉南北朝史書語詞札記》（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投刃、投戈、投斤”條舉古書中此類語頗多，謂此種“投”字當解作“揮”，並以爲《論衡》“投刃”亦屬此類（36—37頁）。從《論衡》語氣看，劉說可從。此條當刪。】

（20）屑訛作肖

《正說》：“說事者好神道恢義，不肖以遭禍，是故經傳篇數皆有所法。”

按：“不肖以遭禍”句義不可通，故校釋以爲“文有脫誤”。疑“肖”爲“屑”字之訛。不屑以遭禍，謂說者不屑以遭禍說之。上文言《尚書》遭秦火，伏生老死，故遺脫七十一篇，傳二十九篇，而說者或謂《尚書》二十九篇法斗宿之數。此即“說事者好神道恢義，不屑以遭禍”之事。

（二）音近誤字或通用字

（21）工訛作公

《自紀》：“夫口論以分明爲公，筆辯以荻露爲通，吏文以昭察爲良。”

按：口論分明，不能稱爲公，“公”應爲“工”之音近誤字。本篇下文：“文不與前相似，安得名佳好，稱工巧。”工字用法與此相近。本書中音近致誤之例屢見，如《感虛》“魯襄公”爲“魯陽公”之音誤，《命義》“羊舌似我”爲“羊舌食我”之音誤，《自紀》“弔名”爲“釣名”之音誤（參看校釋、集解）。《吉驗》之“功曹史充蘭”，《初稟》作“公曹史充蘭”，“功”以音近誤作“公”，與“工”之誤作“公”更爲相似。漢碑亦有以“公”爲“工”“功”之例。如陳球碑“工正”作“公正”，樊安碑“功德”作“公德”（晉宋碑文亦往往以公爲功）。然則漢人或以“公”“工”“功”爲通用字乎？

（22）爲謂通用

古爲、謂二字通用，本書中不乏其例，校釋、集解多已言之，然亦偶有遺漏，今舉一例於下：

《答佞》：“成事：小盜難覺，大盜易知也。攻城襲邑，剽劫虜掠，發則事覺，道路皆知爲盜也。穿鑿垣牆，狸步鼠竊，莫知謂誰。”

末句“莫知謂誰”之“謂”當讀爲“爲”。

(23) 畏訛作爲

《薄葬》：“聖人懼開不孝之源，故不明死無知之實。……不明無知，爲人倍其親；獨明葬黃泉，不爲離其先乎？……不明無知，恐人倍其先；獨明罪定，不爲忽其親乎？……用偶人葬，恐後用生殉；用明器，獨不爲後用善器葬乎？”

按：“不明無知，爲人倍其親”，就上文“聖人懼開不孝之源，故不明死無知之實”而言；下文“不明無知，恐人倍其先”，與此同意。故知“爲”字之義當與“懼”“恐”等字相類，應是“畏”之音近誤字。“不爲離其先”與“爲（畏）人倍其親”爲對文，“不爲忽其親”與“恐人倍其先”爲對文，“獨不爲後用善器葬”與“恐後用生殉”爲對文，此三句之“爲”字亦當作“畏”。《問孔》：“凡學問之法，不爲無才，難於距師核道實義，證定是非也。”集解謂“爲當作畏，聲近而訛”。同篇：“子路入道雖淺，聞孔子之言，知死生之實，孔子誓以‘予所鄙者，天厭之’，獨不爲子路言‘夫子惟命未當死，天安得厭殺之乎？’”校釋謂“爲疑畏之聲誤”。凡此皆可與上引《薄葬》文互證。“爲”之聲母屬喻母三等，古歸匣母。“畏”爲影母字。然二者皆合口字，故在聽覺上區別並不明顯，易於相淆。

(24) 饗訛作相

《解除》：“解除初禮，先設祭祀。比夫祭祀，若生人相賓客矣。先爲賓客設膳，食已，驅以刃杖。”

《祀義》：“世信祭祀，以爲祭祀者必有福……謂死人有知，鬼神飲食，猶相賓客，賓客悅喜，報主人恩矣。”

按：上引二文“相賓客”之“相”，疑皆“饗”之音近訛字。

(25) 知訛作至

《治期》：“審一足以見百，明惡足以照善。堯湯證百王，至百王遭變，非政所致。”

“至百王遭變”，文不成義。校釋以“至”爲衍文。按：疑“至”當作“知”，音近而誤。

(三) 形音皆近之誤字或通用字

(26) 遇讀爲偶

《幸偶》：“氣結閼積，聚爲癰，潰爲疽創，流血出膿。豈癰疽所發，身之善

穴哉。營衛之行，遇不通也。”

按：“遇”疑當讀爲“偶”。《指瑞》“夫孔甲之人民室也，偶遭雨而磨庇也”，偶字崇文本即作遇。

(27) 丞讀爲承

《骨相》：“州郡丞旨召請，擢用舉在本朝。”

按：“丞旨”當讀爲“承旨”。此言州郡承御史大夫倪寬之旨而召請韓生也。古丞、承字通。本書《謝短》：“有尉史、令史，無承長史，何制？”孫詒讓謂承當讀爲丞，甚確。

(28) 俱讀爲具

《物勢》：“五藏(臟)在內，五行氣俱。”

按：“俱”當讀爲“具”。《率性》“人受五常，含五臟，皆具於身”，與此文義近。本書俱、具二字往往不別。《雷虛》“且怒喜具形，亂也”，《道虛》“諸學道死者，骨肉具在”，皆以具爲俱。

(29) 形讀爲型

《奇怪》：“爍一鼎之銅，以灌一錢之形，不能成一鼎，明矣。今謂大人天神，故其跡巨。巨跡之人，一鼎之爍銅也。姜原之身，一錢之形也。使大人施氣於姜原，姜原之身小，安能盡得其精？”

按：本文兩見“一錢之形”，“形”當讀爲“型”，謂鑄錢之範。《物勢》、《雷虛》等篇皆以形爲型，吳承仕等已舉出之。

(30) 獨訛作觸

《談天》：“如審然，天乃玉石之類也。石之質重，千里一柱，不能勝也。如五嶽之巔，不能上極天乃爲柱，如觸不周上極天乎？”

校釋注末句曰：“觸字疑涉上文諸‘觸不周’而衍……若有觸字，則文不成義。”按：此句如無觸字，文義仍不順。疑“觸”當作“獨”，因形音相近又涉上文而誤。“如觸(獨)”之“如”似當訓爲“而”。王充之意蓋謂五嶽皆不能高至天而爲柱(校釋訓“乃爲柱”之“乃”爲“而”)，豈獨不周山能高至天乎。

(31) 跣訛作跡

《效力》：“是故埴重，一人之跡不能蹈也；殫大，一人之掌不能推也。”

校釋謂埴當作確，礧爲礧之形誤。按：其說似可信。又“跡”當作“跣”，因形音相近而誤。本篇下文“鍤所以能掘地者，跣蹈之也”，可證此文之“跡”確爲跣字之訛。

(32) 尊讀爲遵

《超奇》：“長生死後，州郡遭憂，無舉奏之吏，以故事結不解，徵詣相屬，文軌不尊，筆疏不續也。”

按：“文軌不尊”之“尊”當讀爲“遵”。《答佞》“尊義者希”，校釋讀尊爲遵。

(33) 或讀爲惑

《變動》：“事以類而時相因，聞見之者或而然之。”

《案書》：“世人或疑，言非是僞。論者實之，故難爲也。”

按：上引二文之“或”字皆當讀爲“惑”。本書或、惑二字時或相亂，《效力》“時或恚怒”，宋本及朱校元本“或”並作“惑”。

(34) 集讀爲禿(雜)

《定賢》：“故真賢集於俗士之間。”

校釋曰：“集疑爲禿之壞字。”按：讀“集”爲“禿”，可從，謂是壞字則嫌鑿。“禿”从“集”聲，亦从“集”得義，二字古通。《講瑞》“蓂莢、朱草，亦生在地，集於衆草”，集字似亦當讀爲禿。

本書集字又有本不當讀爲禿，而校釋、集解誤讀爲禿者。《語增》記始皇燒書事曰“天下有敢藏詩書百家語諸刑書者，悉詣守尉集燒之”，校釋謂“集當從《始皇紀》作禿”。依文義，《史記》禿字實當訓爲集，不應反讀《論衡》集字爲禿。《別通》“東海之中可食之物集糅非一”，校釋、集解皆讀“集糅”爲“禿糅”。《累害》有“玉石禿糅”語，似可爲其佐證。然《對作》曰“紫朱禿廁，瓦玉集糅”，此以“集糅”與“禿廁”爲對文，必不能讀爲“禿糅”。故《別通》之“集糅”似亦可如字讀之。集糅猶言合糅也。

(35) 齋訛作齋

《辨崇》：“人之疾病，希有不由風濕與飲食者。當風臥濕，握錢問崇。飽飯饜食，齋精解禍。而病不治，謂崇不得；命自絕，謂筮不審，俗人之知也。”

“齋精”不詞。校釋曰：“精當作糒，形之誤也。……《離騷》‘懷椒糒而要之’，注：‘糒，精米，所以享神也。’《說文·貝部》：‘貶，齋財卜問爲貶。从貝，正聲。讀若所。’……貶本字，糒借字，同音相假。”按：校釋謂“精”當作“糒”，可從。“齋”本亦

當作“齋”，以形音相近而誤。“齋糈”與《說文》𦵏字注“齋財”義近。王充意謂俗人無知，本因風濕飲食得病，反以錢財求巫者卜問祟所從來，並求其爲己解禍於鬼神。校釋以擲錢卜卦說握錢問祟，非是。

(36) 校讀爲效

《正說》：“後生精者，苟欲明經，不原實；而原之者，亦校古隨舊，重是之文，以爲說證。”

按：“校古”疑當讀爲“效古”。（《新探》編按：《漢書·趙充國傳》：“上復賜報曰……又大開小開前言曰……得亡效五年時……充國奏曰……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校五年，宜亡它心。”宋祁曰：“校當作效。”此“校”讀爲“效”之例。）

(37) 列訛作烈

《書解》：“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出口爲言，集札爲文。文辭施設，實情敷烈。”

按：“敷烈”當作“敷列”，以形音相近而誤。《超奇》言“抽列古今”，《恢國》言“事情列見”，列字用法皆與此同。

(四) 涉上下文而誤

(38) 能誤爲相

《道虛》：“今學道而死者，尸與復育相似，尚未可謂尸解。何則？案蟬之去復育，無以神於復育。況不相似復育，謂之尸解，蓋復虛妄失其實矣。”

按：“況不相似復育”，頗嫌不詞。疑本作“況不能似復育”，蓋涉上文“尸與復育相似”之語而誤。

(39) 儒誤爲瑞

《講瑞》：“或問曰：‘《講瑞》謂鳳皇、騏驎難知，世瑞不能別。今孝章之所致鳳皇、騏驎，不可得知乎？’曰：‘《五鳥之記》：“四方中央皆有大鳥，其出，衆鳥皆從，小大毛色類鳳皇。”實難知也。故夫世瑞不能別。’”

按：“世瑞”無義。上文屢言世儒不能知鳳皇騏驎，此文則言世瑞不能別鳳皇騏驎，世瑞必爲世儒之訛文。本篇專論瑞應，文中瑞字屢見，儒、瑞二字之形亦有相近之處，故此文二儒字皆誤而爲瑞。

(40) 螯誤爲熒

《訂鬼》：“熒惑，火星。火有毒熒。故當熒惑守宿，國有禍敗。”

按：“毒熒”不詞。《言毒》：“萬物之生皆稟元氣。元氣之中有毒螫乎？……太陽火氣常爲毒螫，氣熱也。……天下萬物含太陽氣而生者，皆有毒螫。”據此，“火有毒熒”似當作“火有毒螫”，蓋涉上下文熒字而誤。

(41) 妖怪誤爲勇力

《言毒》：“生子叔虎，美有勇力。勇力所生，生於美色。禍難所發，由於勇力。……生妖怪者常由好色，爲禍難者常發勇力。”

按：古今未聞勇力生於美色之說。“勇力所生，生於美色”，與“禍難所發，由於勇力”爲對文。下文“爲禍難者常發勇力”與“禍難所發由於勇力”相應，“生妖怪者常由好色”與“勇力所生生於美色”相應。故知“勇力所生”本當作“妖怪所生”，蓋涉上文“美有勇力”之語而誤。

(42) 慇懃誤爲恩懃

《祀義》：“實者，祭祀之意，主人自盡恩懃而已，鬼神未必欲享之也。”

按：本書兩見“慇懃”之文，《明雩》“猶卜筮求祟，召醫和藥者，惻痛慇懃，冀有驗也”，《祭意》“慇懃厚恩，未必有鬼而享之者”。《祀義》之“恩懃”疑即“慇懃”之訛文。此處上下文皆有“恩”字（“賓客悅喜，報主人恩矣”，“則緣生人爲恩義耳”），“恩”、“慇”二字之形音又有相近之處，故慇懃遂誤爲恩懃矣。

(43) 解誤爲能

《實知》：“天下事有不可知，猶結有不可解也。見說善解結，結無有不可解。結有不可解，見說不能解也。非見說不能解也，結有不可解。及其解之，用不能也。聖人知事，事無不可知。事有不可知，聖人不能知。非聖人不能知，事有不可知。及其知之，用不知也。”

集解謂見說當作兒說，甚是。按：“及其解之，用不能也”，與下文“及其知之，用不知也”爲對文。“不能”當作“不解”，涉上文“不能解”之語而誤。《呂氏春秋·君守》：“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淮南子·說山》“兒說之爲宋王解閉結也”，高注：“結不可解而能解之，解之以不解也。”凡此皆可證上引《實知》之“不能”爲“不解”之誤。

(五) 涉常語而誤

(44) 孰爲訛作孰與

《書解》：“書無佚本，經有遺篇。折累二者，孰與蕞殘？”

按：王充之時，世人重經典而輕書記，斥非經典之一般著作爲蕞殘。王充非之，故發問曰，比較經、書二者，究竟何者爲蕞殘乎。按語意，“孰與蕞殘”本當作“孰爲蕞殘”。此篇上文謂“彼虛說，此實篇。折累二者，孰者爲賢”，下文謂“末失事實，本得道質。折累二者，孰爲玉屑”，文例皆與此相同，其末句皆用“孰爲”，不用“孰與”，可證。蓋因“孰與”“孰爲”皆古代熟語，遂致相淆。

二、脫 字

（一）因誤接而脫

（45）

《變動》：“故曰：‘王良策馬，車騎盈野。’非車騎盈野，而乃王良策馬也。天氣變於上，人物應於下矣。故天且雨，商羊起舞，使天雨也。”

校釋於末句加注曰：“尋上下文義，‘使’上當脫‘非’字。此文在明天能動物，物不能動天。今本脫‘非’字，則謂商羊使天雨矣，殊失其義。”按：依校釋說，文義仍不完。此文本當作“故天且雨，商羊起舞，非商羊起舞使天雨也”，文例與“王良策馬”一句相同。蓋抄書者將“故天且雨”後之“商羊起舞”與“非”字後之“商羊起舞”混而爲一，誤接“使天雨也”於前一“商羊起舞”之後，遂致脫去“非商羊起舞”五字。《卜筮》篇“春求雨，秋求實”句，今本誤作“春求實”（參看校釋），情況與此相類。

（46）

《卜筮》：“又試使人罵天而卜，毆（毆）地而筮，無道至甚，亦得兆數。苟謂兆數天地之神，何不滅其火，灼其手，振其指，而亂其數，使之身體疾痛，血氣湊踊……”。

按：兆數不得謂爲天地之神。下文有“兆數非天地之報”語，此文“苟謂兆數天地之神，何不滅其火……”，本當作“苟謂兆數天地之報，天地之神何不滅其火……”。蓋抄書者誤將“之報”前之“天地”，與“之神”前之“天地”混而爲一，遂致脫去“之報天地”四字。

(47)

《自紀》：“魯文逆祀，畔者五人。”

孫人和曰：“《定賢》篇云：‘魯文逆祀，去者三人。’《公羊》定七（當作八）年《傳》亦作三人。”校釋逕改正文“五”字爲“三”。按：《定賢》曰：“魯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畔者五人。貫於俗者，則謂禮爲非。曉禮者寡，則知是者希。”意謂世人不知禮，故文公逆祀去者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反至五人。《自紀》篇此處上下文文義與《定賢》篇全同，其引“魯文逆祀”之事亦必與《定賢》篇同意。此文本當作“魯文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畔者五人”，因前後兩句結構、文字相似，抄書者遂將後一句之下半誤接於前一句之上半，以致脫去中間八字。校釋改五爲三，疏矣。（按：1976年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之《論衡選注》，已據《公羊傳》定公八年，補出“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八字。）

(二) 脫重文

(48)

《語增》：“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損。考察前後，效驗自列。自列，則是非之實有所定矣。”

按：此文本當作“考察前後，效驗自列。效驗自列，則是非之實有所定矣。”古人於重複之字句皆用重文符號表示。如此文，於漢時必書作“考察前後，效=驗=自=列=，則是非之實有所定矣”。蓋“效驗”二字後之重文符號因傳寫脫落，遂成今本之文。《論衡》中脫落重文之例頗爲常見，校釋、集解皆曾屢加舉正，可參閱。

(49)

《藝增》：“稱堯之蕩蕩，不能述其可比屋而封。言賢者可比屋而封，不能議讓其愚而無知之夫擊壤者，難以言比屋。比屋難以言蕩蕩。二者皆增之，所由起，美堯之德也。”

按：“不能議讓其愚而無知之夫擊壤者……”，甚爲費解。校釋於“之”字斷句，集解於“愚”字斷句，文義皆不順適。疑此文本當作“……言賢者可比屋而封，不能議讓其愚而無=知=之夫擊壤者，難以言比屋。……”，讀爲“……言賢者可比屋而封，不能議讓其愚而無知。無知之夫擊壤者，難以言比屋。……”。今本脫落“無知”二字重文。又此文末句，疑本作“二者皆增=之=所由起=美堯之

德也”，讀爲“二者皆增之。增之所由起，起美堯之德也”。今本亦脫落重文。《問孔》：“孔子欲之九夷者，何起乎？起道不行於中國，故欲之九夷。”“起”字用法與此同。

(50)

《問孔》：“問曰：鳳鳥、河圖審何據始起，始起之時，鳥、圖未至。如據太平，太平之帝未必常致鳳鳥與河圖也。”

按：“鳳鳥、河圖審何據始起”，文義不通。此文“據”字當有脫落之重文，本應讀爲“鳳鳥、河圖審何據？據始起”。“據始起”與下文“據太平”爲對文。《宣漢》言及帝王之“初興始起”，《恢國》言及帝王之“初生始起”，本文之“始起”與此二篇之“始起”同義。《講瑞》謂“嘉瑞或應太平，或爲始生，其實難知”，以太平、始生相對而言，本文則以太平、始起相對而言，取意相近。

(51)

《說日》：“仰視天之運，不若麒麟，負日而馳，皆暮而日在其前。”

按：此文“麒麟”爲“騏驥”之誤字，“皆”字由“比日”二字誤合而成，前人皆已言之。今按“騏驥”二字當有脫去之重文，此文本當讀爲：“仰視天之運，不若騏驥。騏驥負日而馳，比日暮而日在其前。”意謂視日之行似不如騏驥之速，然騏驥在日前而馳，至日暮時，反落於日後。

又按：“負”“背”古音極近。《呂氏春秋·別類》：“騏驥驚綠耳背日而西走，至乎夕，則日在其前矣。”《淮南子·泰族》：“騏驥倍（倍、背古通用）日而馳，草木爲之靡，縣烽未轉，而日在其前。”此二書當爲王充所本，皆作“背日”而不作“負日”，疑《論衡》“負日”當讀爲“背日”。

(52)

《譴告》：“六經之文，聖人之語，動言天者，欲化無道，懼愚者之言非獨吾心，亦天意也。”

按：“……懼愚者之言非獨吾心……”，文義不通。校釋、集解皆於“者”字斷句，校釋並謂“之”字當從宋殘卷及元本改作“欲”。今按如“之”字本作“欲”，無從訛作“之”字，宋殘卷及元本似不足據。疑此文“言”字當有脫落之重文，本應讀爲“……懼愚者之言。言非獨吾心，亦天意也”。此文以“聖人之語”爲“欲化無道懼愚者之言”，《自然》篇謂“譴告之言，衰亂之語也”，文例相類。

(53)

《四諱》：“三曰諱婦人乳子，以爲不吉。將舉吉事、入山林、遠行度川澤者，皆不與之交通。乳子之家亦忌惡之，丘墓廬道畔，踰月乃入。惡之甚也。”

按：“丘墓廬道畔”，文不成義，故吳承仕謂“丘墓字疑誤”。今按：上句“之”字似脫落重文，疑原文當作“乳子之家亦忌惡之。之丘墓，廬道畔，踰月乃入”。“之丘墓”謂至先人丘墓旁之廬舍暫住，“廬道畔”謂暫時廬居於道路之旁。《論衡》一書中訓“往”之“之”字屢見，本篇下文“然而有甘之更衣之室，不以爲忌”，即其一例。

(三) 脫“不”字

(54)

《變虛》：“皇天遷怒。使熒惑本景公身有惡而守心，則雖聽子韋言，猶無益也。使其不爲景公，則雖不聽子韋之言，亦無損也。”

按：依文義，“皇天遷怒”本當作“皇天不遷怒”。下文曰：“……天使熒惑加禍於景公也，如何可移於將相若歲與國民乎？”此即皇天不遷怒之意。《論衡》一書中，脫“不”字之例屢見，吳承仕等已有所舉正，可參閱校釋、集解二書之《講瑞》《治期》《問孔》《別通》《調時》等篇。

(55)

《說日》：“日食，月掩日光，非也。何以驗之？使日月合，月掩日光，其初食崖當與旦（且）復時易處。假令日在東，月在西。月之行疾，東及日，掩日崖，須臾過日而東，西崖初掩之處光當復，東崖未掩者當復食。今察日之食，西崖光缺；其復也，西崖光復，過掩東崖復西崖。謂之合襲相掩障，如何？”

按：王充以爲日食若果由月掩日光而引起，日始食時所缺之邊，與日將復時所缺之邊，必分別在日之兩側，然日食之實際情況並不如此，故月掩日光之說爲不可信。上引一段文字即說明此一觀點者。按文義，“過掩東崖復西崖”一句，“過”字上必脫一“不”字。

(56)

《順鼓》：“迅雷風烈，君子必變，雖夜必興，衣冠而坐，懼威（畏）變異也。夫水旱猶雷風也。雖運氣無妄，欲令人君高枕幄臥，以俟其時，無惻怛憂民之心。”

校釋於“欲令……”句下注曰：“‘欲’疑當作‘設’，言若人君不鳴鼓告社，則非愛民之意。”按：依校釋說，句仍不順。疑“欲”字上脫“不”字。

(四) 其他脫字

(57)

《儒增》：“以有百物之象爲神乎？夫百物之象，猶雷罇也。雷罇刻畫雲雷之形。雲雷在天，神於百物。雲雷之象不能神，百物之象安能神也。”

按：依文義，“夫百物之象”句“夫”字下似脫“有”字。

(58)

《超奇》：“山之禿也，孰其茂也？地之瀉〈瀉〉也，孰其滋也？”

按：此謂禿不如茂，瀉不如滋，二“孰”字後皆當有“與”字。《書虛》“夫孔子死，孰與其生”，文例與此相近。

(59)

《感類》：“能徙三山，不能起大木，非天用力宜也。”

按：據本書文例，此句“宜”上當有“之”字。《譴告》“……非皇天之意，愛下譴告之宜也”，文例與此相近。

三、衍 文

(60)

《說日》：“日，火也。火在地不行，日在天何以爲行？”

按：下文曰：“……附地之氣不行，水何以行？……附地之氣不行，人附地何以行？”“何以”後皆無“爲”字，疑此文“爲”字乃衍文，蓋涉“何爲”“以爲”等熟語而衍。

(61)

《程材》：“世名材爲名器。器大者盈物多。然則儒生所懷可謂多矣。”

按：首句“器”上“名”字似不當有，蓋涉本句上文“名”字而衍。

(62)

《謝短》：“家人子弟，學問歷幾歲。人問之曰：‘居宅幾年，祖先何爲？’不

能知者，愚子弟也。”

按：《超奇》篇有“居之歷歲”語，此文“學問歷幾歲”本亦當作“學問歷歲”。此處下文有“居宅幾年”語，上文又有“從高朝至今朝幾世？歷年訖今幾載”等語，“歷”下“幾”字蓋涉上下文而衍。

(63)

《齊世》：“夫器業變易，性行不異。然而有質樸、文薄之語者，世有盛衰，衰極久有弊也。”

按：“極久”上“衰”字疑涉上一“衰”字而衍。

(64)

《卜筮》：“然則卜筮亦必有吉凶。論者或謂隨人善惡之行也，猶瑞應應善而至，災異隨惡而到，治之善惡善惡所致也，疑非天地故應之也。”

按：王充所述論者之言，以爲卜筮之吉凶爲卜筮者行爲之善惡所決定，與善政招致瑞應，惡政招致災異同理。“治之善惡善惡所致也”，校釋、集解皆分作兩句讀，以二“善惡”分屬上下兩句。實則“善惡”字不當重，“治之善惡所致也”應作一句讀。《對作》：“記謂之造作，上書上書奏記是作也。”校釋、集解並謂“上書”二字誤重，當刪去其一，與此同例。

(65)

《知實》：“孟子，實事之人也。言周公之聖，處其下不能知管叔之畔。”

按：“不”“下”形近，疑末句“不”上“下”字爲衍文。“處其不能知管叔之畔”，意謂孟子判定周公不能預知管叔之叛。處字訓作判定者《論衡》中常見。

四、誤讀重文

(66)

《卜筮》：“夫卜筮兆數，非吉凶誤也。占之不審吉凶，吉凶變亂。變亂，故太公黜之。”

按：“占之不審吉凶”，文義不順。此文本當作“占之不審，吉=凶=變=亂=，故太公黜之”。按古代重文例，本應讀爲：“占之不審，吉凶變亂。吉凶變亂，故太公黜之。”

抄書者誤將四字一句之重文分爲兩截讀之，遂成今本之文。

五、字序錯亂

(67)

《感虛》：“襄公爭鬪，惡日之暮，以此一戈麾，無誠心善言，日爲之反，殆非其意哉。”

按：“以此一戈麾”，疑本作“以此一麾戈”。

(68)

《禍虛》：“白起伏劍將自刎，曰：‘我有何罪於天乎？’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白起知己前罪，服更後罰也。”

校釋於末句加注曰：“‘更’‘受’古通。”按：更、受二字古實不通。疑此句本作“更服後罰也”，傳寫誤倒。“更”猶言“改”。白起於其死，心本不服，既悟前有坑降卒之罪，遂改其不服之心而服此罰，故言“知己前罪，更服後罰”。“更”字此種用法亦見他篇。《累害》：“偉士坐以俊傑之才，招致群吠之聲。夫如是，豈宜更勉奴下，循不肖哉。不肖奴下，非所勉也。”“更勉奴下”，意謂改舊節而以奴下自勉，“更”字用法與“更服後罰”之“更”相同。

(69)

《須頌》：“聖者垂日月之明，處在中州，隱於百里。遙聞傳授，不實形耀，不實難論。”

按：“不實形耀”句文義不順，故集解將此句分屬於上下兩句，讀爲“遙聞傳授不實，形耀不實難論”。然即如其說，文字仍不通順。疑“不實形耀”本作“形耀不實”，傳寫誤倒。（《新探》編按：此條根據不足，當刪。）

(70)

《書解》：“世儒說聖人之經，解賢者之傳，義理廣博，無不實見，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爲博士。”

按：“故在官常位”句文義不順。本書中《命祿》《死僞》《紀妖》《辨崇》等篇皆有“官位”之語，疑此文本作“故常在官位”，傳寫誤倒。

(71)

《對作》：“故夫賢人之在世也，進則盡忠宣化，以明朝廷；退則稱論貶說，以覺失俗。俗也不知還，則立道輕爲非。論者不追救，則迷亂不覺悟。”

按：“以覺失俗”，疑本作“以覺俗失”，傳寫誤倒。又“俗也不知還”，疑本亦作“俗失不知還”，“也”爲誤字。

附：關於《校釋》、《集解》二書的錯誤

《校釋》、《集解》二書對《論衡》都有重要的貢獻，但是也都有很多錯誤之處，札記中已有所涉及。下面再就校注和標點兩方面的錯誤各舉數例，以供使用此二書者參考。

（一）校注錯誤舉例

黃暉校釋搜集資料比較豐富，並且提出了不少可取的見解，對於讀《論衡》的人很有幫助。但是，黃氏往往對本來明白易解的文字橫生疑竇，或作錯誤的解釋，嚴重影響了這本書的質量。例如：

《刺孟》：“室因人故，粟以屨繻易之，正使盜之所樹巢，己不聞知。”

“室因人故”，意思是說陳仲子所住的是別人的舊室。“故”當“舊”講，古書習見。黃氏却以爲“故字無義，疑是攻字形訛”。

《譏日》：“肉盡殺牲，獄具斷囚。”

這兩句的意思是說，肉已賣完就宰殺牲口，獄案已具就斷決囚犯。黃氏却說：“‘肉盡殺牲’文不成義。肉當作‘屠’。屠、獄對言。”他不知道“獄具”是漢人常用之語，把“具”誤解爲“俱”了。

《解除》：“鬼神如有知，必患止戰，不肯徑去。”

校釋：“疑當作‘必患戰不肯徑去’，‘止’涉‘患’字下半心字而誤。”其實“止戰”就是留下來跟人戰鬥的意思，很好理解。黃氏受孫人和的影響把“止戰”理解爲停止戰鬥（看校釋所引孫說），所以作了這條錯誤的校注。

《順鼓》：“《春秋》說曰：‘人君亢陽致旱，沈溺致水。’夫如是，旱則爲沈溺

之行，水則爲亢陽之操，何乃攻社？”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既然“人君亢陽”會引起旱災，“人君沈溺”會引起水災，那末旱災的時候只要反爲“沈溺之行”就可以消災，水災的時候只要反爲“亢陽之操”就可以消災，爲什麼還要攻社呢？黃氏却認爲“旱則爲沈溺之行，水則爲亢陽之操”“當作‘旱則爲亢陽之行，水則爲沈溺之操’，與上文義方相屬”。其實這樣一改，反而與上文義不相屬了。

《恢國》：“（唐虞四凶）罪皆在身，不加於上……”。

“不加於上”是說四凶沒有把犯罪的行爲加到君上的身上去，所以下文說“怨惡謀上……罪重於四子（指四凶）”。黃氏却解釋爲對四凶“不加刑”，不但文義不合，語法也講不通。此外，在校釋裏還可以找到不少與上舉各例相類的錯誤，這裏就不列舉了。

劉氏集解的校注也有一些與黃氏相類的錯誤，例如：

《說日》：“況日去人以萬里數乎。”

集解：“下文天之去地六萬餘里，則此脫一六字。”“以萬里數”就是有好幾萬里的意思。王充講天跟人的距離時，也說“以萬里數”（見《紀妖》等篇）。如果說成“以六萬里數”，反而跟漢語的習慣不合了。

《卜筮》：“夫著筮龜卜，猶聖王治世；卜筮兆數，猶王治瑞應。瑞應無常，兆數詭異。詭異則占者惑，無常則議者疑。疑則謂平未治，惑則謂吉不良。”

“疑則謂平未治”，意思是說議聖王之治者惑於瑞應無常，誤謂已治平之世爲未治。“惑則謂吉不良”，意思是說占卜者惑於兆數詭異，誤謂吉兆爲不良。這本來很好理解。劉氏却把“平未治”“吉不良”誤解爲“平而未治，吉而不良”，以爲“語不可通”，並“疑平爲世誤字，吉爲占之誤字”。

《明雩》：“房星四表三道，日月之行出入三道，出北則湛，出南則旱。”

這跟《順鼓》所說的“月離於畢，出房北道，希有不雨”完全符合。在其他古書裏也可以看到類似的說法（看《明雩》校釋）。劉氏却認爲“房當爲畢”，以不誤爲誤。

《宣漢》：“今上即命……歲遭運氣，穀頗不登，迴路無絕道之憂，深幽無屯聚之姦。”

“今上”指章帝。章帝建初初年曾遇到天災，作物歉收，《論衡》中曾屢次提到這件

事(參看《宣漢》校釋)。上引文中的“穀頗不登”,顯然是收成不好的意思。王充讚美章帝治國有方,雖然遭到天災,作物歉收,却沒有人“作亂”,所以緊接着“穀頗不登”就說“迴路無絕道之憂,深幽無屯聚之姦”。《恢國》篇裏也有一段意思完全相同的話。但是劉氏却硬說“穀頗不登”就是“穀無不登”,“與下句迴路無絕道之憂,深幽無屯聚之姦,正同一語法”。他不管《論衡》一書中絕大多數“頗”字的用法,僅僅根據《論死》“能使滅灰更爲燃火,吾乃頗疑死人能復爲形”這條可能有訛誤的文字,就把《宣漢》的“頗”解釋成“無”,這是沒有說服力的。此外,劉氏把見於《程材》和《定賢》的“太史公序累”一語解釋爲史記的別名,也是牽強附會的突出例子(“序累”本來當動詞用,是次序排列的意思)。

集解出版晚於校釋很多年,所作校注有不少勝過校釋的地方,但是在吸收校釋的成果方面做得比較差。例如前面所舉的《明雱》的“房星四表三道”和《宣漢》的“穀頗不登”,校釋的注解都是正確的,集解沒有吸收。又如《效力》有“上書日記”之語,校釋指出“日”是“白”的訛字,以《文選》注引文爲證,確鑿可信。集解根本不理睬,說“日當爲占之形訛”。其實就是單從字形上看,說“日”是“占”的形訛,也不如說“日”是“白”的形訛合理。這類例子還可以找出不少。

最後,在校注方面再舉兩個校釋和集解全都錯誤的例子:

(1) 姑姊

《偶會》:“王莽姑姊正君,許嫁二夫,二夫死。”

校釋說:“‘姊’字衍。《骨相篇》正作‘王莽姑正君’。《漢書·王莽傳》:‘王莽,孝元皇后之弟子也。’莽父王曼,曼乃正君之弟。《元后傳》:‘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集解也說:“姊字衍文。……莽乃正君兄王曼之子也。下《骨相篇》云:王莽姑正君。”其實,姑姊就是姑。《左傳·襄公十二年》有“姑姊妹”之語,正義說:“父之姊爲姑姊,父之妹爲姑妹。”可見《偶會》的“姊”並不是衍文。據《漢書·元后傳》和《王莽傳》,莽父王曼是正君之弟。集解說王曼是正君兄,當是記憶有誤。即使正君確是王曼之妹,也仍然可以稱姑姊。《列女傳》卷五所記的“魯義姑姊”,棄己子抱兄子逃難;“梁節姑姊”因爲家中失火沒有救出兄子,赴火而死。這說明一般把姑妹也稱作姑姊,只要是姑就可以稱姑姊。

(2) 嫌

《論衡》中屢見“不嫌”、“何嫌”之語:

許由讓天下,不嫌貪封侯。伯夷委國餓死,不嫌貪刀鉤。

《書虛》

季子能讓吳位，何嫌貪地遺金。

《書虛》

季子不負死者，棄其寶劍，何嫌一叱生人取金於地。

《書虛》

則能至門庭，何嫌不窺園菜。

《儒增》

材能以其文爲功於人，何嫌不能營衛其身。

《書解》

如實論之，天體，非氣也。人生於天，何嫌天無氣。猶有體在上，與人相遠。

《談天》

劉氏認爲“嫌”與“慊”“嗛”通，猶言“貪”，言“快意”（集解2—3頁，又79—80頁）。黃氏認爲“嫌”與“兼”通，“兼”可訓“得”，“嫌”也應訓“得”（校釋27—28頁，又159頁）。

從上引各例看，黃氏把“不嫌”“何嫌”解釋爲“不得”“何得”，文義大體可以講通。劉氏認爲如果訓嫌爲得，《談天》的“何嫌天無氣”講不通。他並且認爲這一句有誤，注曰：“何嫌天無氣，是說天有氣也，則與上文‘天體，非氣也’句……不合矣。”其實天體是不是氣，跟天有沒有氣是兩回事。《氣壽》“人受氣命於天”，《命義》“天施氣而衆星布精”，都承認天有氣。校釋解釋上引《談天》篇文說：“仲任意謂：天體上臨，而含氣以施，非天體本氣也。”這是正確的。劉氏所以認爲“何嫌天無氣”句有誤，恐怕主要是因爲用他的訓嫌爲貪的說法，這一句根本講不通。這正好可以證明訓嫌爲貪是錯誤的。

但是，黃氏解釋“不嫌”“何嫌”的大意雖然接近事實，他的訓詁方法却仍然是錯誤的。姑且不說他認爲這些嫌字應該讀作“兼”是否正確，就是把“兼”訓爲“得”也是站不住腳的。他訓兼爲得的唯一根據是下引《戰國策》注：

《戰國策·秦策二》“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注：“兼得也”。

這一句話裏的“兼”，是兼得的意思。如果不包含“兼”的本來意思的話，“兼”字決不能當“得”講。並且，上引《秦策》的兼字，從上下文看，也未嘗不可以解釋爲“兼殺”“兼有”，並不是非解釋成“兼得”不可。所以黃氏讀“嫌”爲“兼”並訓爲“得”，是沒有根據的。

那末這種“嫌”字究竟應該怎樣講呢？說穿了也很簡單。嫌字古訓“疑”，在《論衡》裏就可以找到不少當“疑”講的嫌字（參看《問孔》《感類》《自紀》等篇）。“不嫌”“何嫌”就是“不疑”“何疑”，都是表示不應懷疑的口氣。由此引申出“不可能”“怎麼會”，即黃氏所謂“不得”“何得”一類意思，是非常自然的。

總之，在嫌字的問題上，劉氏完全錯了，黃氏最多只能算對了一半。

(二) 標點錯誤舉例

校釋、集解二書中，標點的錯誤很多。

有很多句子的標點是校釋誤而集解不誤。例如：

《四諱》：“然而有甘之，更衣之室，不以爲忌。”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有人願意到廁所去聞臭氣。“之”是動詞，當“去到”講。黃氏誤以爲代詞，因此把“甘之更衣之室”斷成兩截。集解不誤。

《書虛》：“吳越在時，分會稽郡越治，山陰吳都。今吳、餘暨以南屬越，錢唐以北屬吳。”

這一段文字，校釋標點得一塌糊塗。集解點作：“吳越在時。分會稽郡。越治山陰。吳都今吳。餘暨以南屬越。錢唐以北屬吳”，是正確的。

也有不少句子的標點，校釋不誤而後出的集解反誤。例如：

《恢國》：“孝明麒麟神雀，甘露醴泉，白雉黑雉，芝草連木嘉禾，與宣帝同，奇有神鼎黃金之怪。”

“奇有”也見《量知》《謝短》等篇，是“多出”的意思。明帝時的“神鼎黃金之怪”是宣帝時所沒有的“祥瑞”，所以說“奇有”。集解把“與宣帝同奇”點成一句，是錯誤的。

《詰術》：“由此言之，火，日氣也。日有甲乙，火無甲乙何？日十而辰十二，日辰相配，故甲與子連。……”。

集解點成“……火無甲乙。何日十而辰十二。……”，義不可通。

此外，還有不少句子的標點，校釋和集解二書都是錯誤的。下面從《道虛》等四篇中各舉一條以示例：

(1) 《道虛》

校釋：名之爲“黃帝”，何世之人也？使黃帝之臣子知君？使後世之人跡其行？

集解：名之爲黃帝。何世之人也。使黃帝之臣子知君。使後世之人跡其行。

這段文字的後兩句應該標點爲：“使黃帝之臣子，知君。使後世之人，跡其行。”《論

衡》裏這一類句法屢見，如《紀妖》“使非，妖也。使是，亦妖也”，《非韓》“使法峻，民無姦者。使法不峻，民多爲姦”。這種“使”字可以訓作“如”。上引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叫出黃帝這個名字來的是何世之人呢？如果是黃帝的臣子，應該是知其君之行而名之的（《藝增》：“知君莫如臣。”）。如果是後世之人，應該是追跡其行而名之的（《福虛》：“夫謚者，行之跡也，跡生時行以爲死謚。”）。校釋、集解大概都沒有弄懂後兩句話的意思，校釋把它們當作問句，更是錯得厲害。

（2）《儒增》

校釋：桀、紂之時，鼎不亡去；周之衰亂，未若桀、紂，留無道之桀、紂，去衰末之周，非止（亡）去之宜[有]神有知之驗也。（原注：“止”當作“亡”。……“有神”二字，傳寫誤倒。）

集解：桀紂之時，鼎不亡去。周之衰亂未若桀紂。留無道之桀紂。去衰末之周。非止去之。宜神有知之驗也。

這段話的最後十一個字應該點爲：“非止去之宜、神有知之驗也。”《書虛》“豈報仇之義、有知之驗哉”，《譴告》“非皇天之意、愛下譴告之宜也”，句法都與此相近。校釋、集解二書的標點都是錯誤的。“止去”等於說“留去”。《解除》“使鬼神乎，不爲驅逐去止”，“去止”與“止去”同意。校釋改“止”爲“亡”，也是錯誤的。

（3）《藝增》

校釋：天之去人，以萬數遠，則目不能見，耳不能聞。

集解：天之去人。以萬數遠。則目不能見。耳不能聞。

上引文應該標點爲：“天之去人，以萬數。遠則目不能見，耳不能聞。”《紀妖》：“天之去人，以萬里數。”《藝增》的“以萬數”就是“以萬里數”的意思。《調時》“則其爲禍宜以萬數”，也是說以萬里數，讀上下文自明。也可能《藝增》和《調時》的“萬”字下都脫了一個“里”字。校釋、集解把“以萬數遠”當作一句讀，文義不通。

（4）《佚文》

校釋：……文王之文傳在孔子；孔子爲漢制文，傳在漢也。受天之文。（原注：四字於義無屬，疑涉下文“文人”訛衍，“受”字後人妄加。）

文人宜遵五經六藝爲文；諸子傳書爲文；造論著說爲文；上書奏記爲文；文德之操爲文；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

集解：（上略）受天之文。文人宜遵五經六藝爲文。（下略）

這段文字裏，“受天之文，文人宜遵”應該作一句讀。校釋和集解都把“文人宜遵五經六藝爲文”連成一句，是錯誤的。校釋甚至把“受天之文”和“文人宜遵”分列於兩段，並懷疑“受天之文”是衍文，更是錯得厲害。

如果全面地看，校釋和集解都還不失爲比較有用的書，但是它們的缺點的确也是相當嚴重的。希望有人編出一部好的《論衡》注本來代替它們。

原載《文史》第五輯（中華書局，1978），又載《古代文史研究新探》，部分條目又載《裘錫圭學術文化隨筆》，今據《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收入。

考古發現的秦漢文字資料 對於校讀古籍的重要性

從歷史上看,我國學者自來都很注意利用考古發現的古抄本和其他古代文字資料來校讀傳世古籍。早在西漢時代,學者們就用在孔子故宅裏發現的戰國時代經書抄本,即所謂古文經,來校正流傳的今文經。西晉時代在汲冢戰國古墓裏發現了《紀年》、《穆天子傳》等竹書。從那時開始,歷代有不少學者用汲冢《紀年》來糾正《史記》的錯誤。唐代傅奕校訂的《老子》(《道德經古本篇》),據說是以北齊時在彭城項羽妾冢裏發現的古本為根據的。從傳本的內容看,他大概確實參考過某種較古的本子。有的學者利用古代銘刻訂正古書:隋代初年顏之推根據“長安民掘得”的秦權上的銘文,指出《史記·秦始皇本紀》丞相隗林的“林”是“狀”字之誤(《顏氏家訓·書證》);清代末年吳大澂等根據金文中“文”字的寫法,指出《尚書》中“寧王”和“前寧人”的“寧”是“文”字之誤。這些都是校勘學上為人稱許的發現。

現代學者中間,不少人在校讀《老子》、《尚書》等書時,很重視敦煌莫高窟發現的六朝和唐代寫本;還有人利用周代金文和秦漢金石文字等資料校讀古籍。他們大都取得了較好的成績。但是總的來看,近代和現代發現的古代文字資料及有關研究成果,並沒有充分運用到當前的古籍整理和注釋工作中來。

在與校讀古籍有關的古代文字資料中,20世紀初以來陸續發現的大批秦漢時代文字資料,是極為重要的一個部分。從清末到解放前,在甘肅敦煌、內蒙居延等地的漢代長城和邊塞遺址裏,發現了很多漢簡,大部分是戍軍的文書和賬冊。解放後發現了更多更重要的漢簡,而且還發現了西漢前期的帛書和秦簡。1959年在甘肅武威磨咀子六號漢墓裏發現了抄寫於西漢末至王莽時代的九篇《儀禮》。^① 1972

① 甘肅省博物館《甘肅武威磨咀子六號漢墓》,《考古》1960年5期。

年初在湖南長沙馬王堆一號西漢前期墓裏發現了一份記載隨葬物的遣冊。^②同年4月在山東臨沂銀雀山一號西漢前期墓裏發現大量竹書,其中有《吳孫子》(即《孫子兵法》)、《齊孫子》(即《孫臏兵法》)、《晏子》等書,但多非全帙,並且殘損得很厲害。^③同年11月在武威旱灘坡的一個東漢前期墓裏發現了一批內容主要為醫方的簡牘。^④1973年至1974年在居延甲渠候官和肩水金關等漢代邊塞遺址裏發現了近兩萬支漢簡。^⑤1973年11月至1974年初,發掘了漢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下葬的馬王堆三號墓,出土了大批帛書,其中有《易經》、兩本《老子》和很多佚書,一部分可能為秦代抄本。此外還出了遣冊以及講養生術和房中術的簡冊。^⑥1973年和1974年先後兩次發掘湖北江陵鳳凰山西漢前期墓群,在好幾個墓裏發現了簡牘。^⑦1975年12月在湖北雲夢睡虎地十一號秦墓裏發現了大量竹簡,其中有秦律的部分抄本。^⑧1977年在安徽阜陽雙古堆一號西漢前期墓裏發現了《蒼頡篇》、《詩經》等竹書,可惜都殘碎得很厲害。^⑨70年代發現的資料有很大一部分還沒有發表。不過就拿已經發表的來說,內容就已經很豐富了。這些資料在校讀古籍方面所能起的巨大作用是顯而易見的。除簡冊、帛書外,秦漢金石文字也可以用作校讀古書的參考。

就校讀古書來說,考古發現的古代文字資料與傳世古籍的關係大體上有以下四種情況:

一、二者是同一種書的古本和今本。

二、二者雖非一書但有很密切的關係,或者其中一種出自另一種,或者二者同出一源。二者僅有個別段落或文句屬於這種關係的,以及二者同記一事的,可以附

② 湖南省博物館等《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上下集,文物出版社,1973。

③ 山東省博物館等《山東臨沂西漢墓發現〈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等竹簡的簡報》,《文物》1974年2期。

④ 甘肅省博物館《武威旱灘坡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3年12期。又《武威漢代醫簡》,文物出版社,1975。

⑤ 甘肅居延考古隊《居延漢代遺址的發掘和新出土的簡冊文物》,《文物》1978年1期。

⑥ 湖南省博物館等《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4年7期。

⑦ 長江流域第二期文物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湖北江陵鳳凰山西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4年6期。紀南城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發掘整理組《湖北江陵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5年9期。鳳凰山一六七號漢墓發掘整理小組《江陵鳳凰山一六七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6年10期。

⑧ 孝感地區第二期亦工亦農文物考古訓練班《湖北雲夢睡虎地十一號秦墓發掘簡報》,《文物》1976年6期。

⑨ 安徽省文物工作隊等《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發掘簡報》,《文物》1978年8期。

入此類。

三、古代文字資料可以用來闡明傳世古書中某些詞語的意義，或者糾正某些詞語書寫上的錯誤。

四、古代文字資料表現出來的用字和書寫方面的習慣，可以用作校讀古書的根據。

這個分類方法並不很科學，有些例子按照不同的著眼點可以歸入不同的類別中去。所以作這樣的分類，主要是爲了敘述的方便。下面就按照上述四種情況，分別舉例說明考古發現的秦漢文字資料對於校讀古籍的重要性。

—

解放前發現的漢簡裏只有古書的少量殘簡，解放後才發現成篇成部的秦漢竹書和帛書。這些竹書、帛書，一部分是現在尚有傳本的，如武威發現的《儀禮》，銀雀山發現的《孫子》中的十三篇部分、《晏子》、《尉繚子》、《太公》中見於今本《六韜》的部分，馬王堆發現的《易經》及所附易說中與《繫辭》相合的部分、《老子》（有甲、乙兩本）、《戰國縱橫家書》中見於《戰國策》和《史記》的各章、^⑩阜陽雙古堆發現的《詩經》。不過，新發現的《儀禮》、《易經》和《詩經》，跟現在的傳本都不是同一家的本子。

武威簡本《儀禮》，銀雀山簡本《孫子》和《尉繚子》，以及馬王堆帛書本《老子》甲、乙本和《戰國縱橫家書》，都已經發表。^⑪發表的本子一般都附有對照今本而作的詳略不等的校注。

上述諸書的簡本和帛書本，要比現存的各種本子都古得多。它們在校勘學上的價值是不言自明的。當然，我們也不能盲目地推崇古本，排斥今本。由於底本和抄手的好壞不同，新發現的這些古本的價值是不一致的。並且就是比較好的本子，

^⑩ 《戰國縱橫家書》是整理者自定的名稱。下文中碰到整理者自定名稱的帛書、竹書，不再加注。

^⑪ 有關主要書目如下：甘肅省博物館等《武威漢簡》，文物出版社，1964。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孫子兵法（銀雀山漢墓竹簡）》（本文簡稱《孫子兵法》），文物出版社，1976。《銀雀山簡本〈尉繚子〉釋文（附校注）》，《文物》1977年2期、3期。《銀雀山漢墓竹簡〔壹〕》（綫裝），文物出版社，1975。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老子（馬王堆漢墓帛書）》，文物出版社，1976。《戰國縱橫家書（馬王堆漢墓帛書）》，文物出版社，1976。《馬王堆漢墓帛書〔壹〕》（綫裝），文物出版社，1974。《馬王堆漢墓帛書〔叁〕》（綫裝），文物出版社，1978。（《新探》編按：銀雀山竹書和馬王堆帛書後來都出版了有圖版的精裝本。）

也免不了有訛誤衍脫的地方需要用今本去校正。抄得壞的本子就更不用說了。^⑫在處理這些古本中的假借字的時候,也需要參照今本。秦漢人用假借字比後代多(有一些其實就是同音或音近的別字),並且所用的假借字往往與後代不同。如果沒有今本的幫助,有些假借字恐怕是很難讀通的。這些古本都不免有殘損,這也影響到它們的價值。但是,這些時代比現存其他各本都早得多的古本,畢竟有很多勝過其他各本的好處。即使是“抄寫最壞,顛倒錯亂,別字連篇”的本子,如馬王堆本《易經》,“也還有可以校正今本的地方”。^⑬所以我們一方面不能迷信這些古本,一方面也不能低估它們的價值。

在這一節裏,我們舉銀雀山簡本的《孫子》為例,說明這些古本對於校讀古籍的重要性。銀雀山本《孫子》的底本和抄手都比較好,可惜殘損得太厲害,所存字數只有今本的一半左右。即使如此,還是可以找到很多可以糾正今本的地方,下面所舉的僅僅是其中極少數的例子。舉例時先抄出《十一家注孫子》和簡本的有關文句,前者注“今”字,後者注“簡”字。所引簡本以本文注^⑩所舉《孫子兵法(銀雀山漢墓竹簡)》為準,整理小組注也引自此書。原書釋文一般未補缺文,本文爲了讀者的方便,根據原書校注盡可能補出缺文,所補缺文外加方括號。

(1)

《作戰》(今):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

《作戰》(簡):屈力中原,內虛於家。

此句張預注云:“運糧則力屈,輸餉則財殫,原野之民,家產內虛”,以“中原”二字連下讀,後人多從此說。按照簡本,“中原”二字就必須連上讀。《武經七書》本此句無“財殫”二字,《太平御覽》卷三三二引文同,與簡本合。十一家本此句下曹操注云:“丘,十六井也。百姓財殫盡而兵不解,則運糧盡力於原野也。”曹注是把上文“財竭則急於丘役”句與這一句連在一起解釋的,注文“財殫盡”與正文“財竭”相應,由於十一家本的正文和注文配置得不合理,很容易使人誤解爲與正文“力屈財殫”的“財殫”相應。“屈”字古訓“盡”。從曹注“盡力於原野”一語來看,曹氏所據本顯然無“財殫”二字,而且“中原”上二字很可能不作“力屈”而作“屈力”,與簡本完全相合。杜牧注也有“力盡於原野”語,所據本也應無“財殫”二字,但“屈力”大概已倒作“力屈”。整理小組認爲十一家本正文“財殫”二字爲後人所臆加,張預注

^⑫ 參看張政烺《〈春秋事語〉解題》,《文物》1977年1期39頁。

^⑬ 同上。

據誤本以“中原”二字連下爲句不可從。這個意見是正確的。

《詩·小雅·小宛》“中原有菽”，《毛傳》：“中原，原中也。”“屈力中原”，意即竭盡力量於原野之中，與“內虛於家”爲對文。古書中以“中原”指戰場的例子很多，如《左傳·僖二十三年》“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商君書·賞刑》“萬乘之國不敢蘇其兵中原”。《孫子》這一句的“中原”無疑也是指戰場而言的。近年出版的幾種《孫子》注本，大都參考過簡本，但是他們都沒有用簡本來校正這一句的文字，仍然按照張預的斷句來解釋文義。有的注本並認爲“中原”是指“國內農業發達的中心地區”。新版《辭源》第一冊“中原”條，也爲《作戰》篇的“中原”特立一解，釋爲“內地”。這是很不妥當的。就“屈力中原”這一句來說，無論從文義上看，或是從校勘學的角度看，簡本都顯然比十一家本好。爲什麼不願意相信簡本，而寧願相信時代晚得多的十一家本呢？

(2)

《謀攻》(今):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

[[《謀攻》](簡):[故君之]所以患軍[者三]。

十一家本“君之所以患於軍者”，從下文看是指國君爲害於軍隊的事。但是古漢語中的“於”字往往在被動句中引進主動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也可以理解爲國君受軍隊危害的事。因此明代的《武經七書直解》把這一句改成“軍之所以患於君者三”。楊炳安《孫子集校》、郭化若《孫子今譯》都同意《直解》的改法。簡本此句“患”下沒有“於”字，產生誤解的可能性比較小，勝於今本，今本“患”下“於”字當是後人所加。不過“患於軍”也可以當“爲患於軍”講，並非只能理解爲受患於軍，所以還不能說今本不通。《直解》任意改古書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3)

《形》(今):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

《形》(簡乙本):守則有餘,攻則不足。昔善守者,藏(藏)九地之下,動九天之上,故……(《新探》編按:據後出的有圖版的精裝本,末句當作“故能自葆全[勝]”。)

上引這兩句,今本皆同十一家本,簡本與今本出入較大。首先,前一句中“有餘”和“不足”的位置,簡本與今本互易。其次,簡本沒有“善攻者”三字,“藏九地之下”和“動九天之上”的主語都是“善守者”。從《漢書·趙充國傳》、《後漢書·馮異傳》

和《潛夫論·救邊》等篇看，上引第一句在趙充國、馮異、王符等人所見的《孫子》中，正作“守則有餘，攻則不足”，與簡本相合。這一點整理小組的注已經指出。把上引這兩句跟它們的上文聯繫起來看，簡文也顯然勝於今本。這兩句的上文是“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引文據今本，簡本此段文字不全。）簡本“守則有餘，攻則不足”句的意思是說，同樣的兵力，可能用於守尚有餘，用於攻則不足，跟上文扣得很緊。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就是“先爲不可勝”；動九天之上，當指找到來犯敵人的“可勝”之機而出擊，^⑭文義也跟上文很連貫。今本把“守則有餘，攻則不足”改成“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並使“藏九地之下”、“動九天之上”這兩件事分屬於“善守者”和“善攻者”，文義就跟上文不連貫了。

《趙充國傳》：“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敦煌、酒泉寇，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趙氏是堅持“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的作戰方針的。認真讀一下趙氏的這段話，對簡本和今本的優劣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但是新出版的幾種《孫子》注本都沒有根據簡本來糾正今本。

(4)

《虛實》（今）：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飢之，安能動之。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

《實虛》（簡）：能使適（敵）[自]至者，利之也。能使適（敵）……[佚]能勞之，飽能飢之者，出於其所必[趨也]。□行千里而不畏，行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守其所[不攻也]。

上引這段文字的問題，主要在於今本的“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這兩句。《御覽》卷二七〇引此文作“出其所必趨也”，卷三〇六引此文作“出其所必趣”。“趨”或“趣”上一字作“必”，並且都沒有後一句。《長短經·格形》“孫子曰安能動之，又曰攻其所必趨，何以明之……”，“趨”上一字也作“必”，而且所據本好像也沒有“趨其所不意”這一句。從十一家本所收各家注文看，各家所據之本“趨”上一字也都

^⑭ 見詹立波《略談銀雀山漢墓竹簡〈孫子兵法〉》，《文物》1974年12期17頁。

作“必”。今本作“不”，顯然是錯誤的。孫星衍校刻《孫子十家注》，把“不趨”改作“必趨”，這在校勘學上是有根據的。簡本的發現不但進一步證實“不趨”確為“必趨”之誤，而且還證明《御覽》所引《孫子》沒有“趨其所不意”一句，也是古本原貌，並非偶然遺脫。“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這兩句的文義聯繫得很緊密，後一句大概是在“必趨”錯作“不趨”以後才增添上去的。

我們再看“出於其所必[趨也]”之前的簡文。簡本“飽能飢之”下沒有“安能動之”四字，而有“者”字。“安能動之”四字可能是簡本抄脫的，但是“者”字却不像是衍文。（《雪泥鴻爪》編按：似已有學者指出，簡本中“安能動之”可能在“佚能勞之”之上，可參考。）此處上下文都使用“……者……也”的句式。（《雪泥鴻爪》編按：上引簡本後面三句省“者”字。）《御覽》卷二七〇引文“出其所必趨”下正好有“也”字，可以與“……飽能飢之者”構成同樣的句式。根據簡本，並參照《御覽》，把“……[佚]能勞之，飽能飢之，[安能動之]者，出於其所必[趨也]”連為一句讀，就把上下文很好地連貫起來了。^⑮ 今本“佚能勞之”上有“故敵”二字，簡本此處殘缺，原來可能有這兩個字，也可能只有“敵”字。曹注說：“攻其所必愛，出其所必趨，則使敵不得不相救也。”敵人不得不相救，當然就不能“佚”“安”而必須“勞”“動”了，同時也就有了使敵人由“飽”變“飢”的可能。《孫子集校》反對孫星衍把“不趨”改成“必趨”，認為“孫氏說與下文意相礙”。《集校》出版於1959年，簡本尚未發現。楊氏不知道“出其所不趨”應該屬上為句，而“趨其所不意”則為後人所竄入，因此有這樣的議論，這是可以理解的。現在有些已經看到簡本的學者仍然堅持與楊氏相同的觀點，這就有些難於理解了。

(5)

《虛實》(今)：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實虛》(簡)：……兵刑(形)象水，水行辟(避)高而走下，兵勝辟(避)實(此下似脫一“而”字)擊虛。故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兵無成勢(勢)，無恆刑(形)，能與敵化之胃(謂)神。

這一段文字，簡本與今本有出入的地方很多，我們只揀主要的兩點討論一下。首

^⑮ 見《孫子兵法》53—54頁注文。

先,這一段的第一大句和第二大句,文義緊相承接。簡本第二句中“水因地而制行”的“行”字與第一句中“水行”的“行”相應,“兵因敵而制勝”的“勝”字與第一句中“兵勝”的“勝”字相應,筆法很嚴密,可以相信是基本上保持着原本面貌的。今本第一句不用“行”和“勝”字而都用“形”字,第二句不用“行”字而用“流”字,第二句的開頭沒有“故”字。這些都應該是訛脫、竄改的結果。《群書治要》、《通典》、《御覽》、《文選注》等書的引文中,“行”字大都尚未訛成“形”字、“流”字,“故”字也多數尚未脫落,^{①⑥}可證。其次,簡本末一句最重要的特點,是“無恆形”上無“水”字,“無成勢”、“無恆形”的主語都是“兵”。整理小組注:“按此處下文云‘能與敵化之謂神’,專就軍事而言,‘水’字似不當有。”(59頁)此說可信,今本“水”字當為後人所加。今本此句“勢”字、“形”字上都用“常”字(本應作“恆”,避諱改),簡本一作“成”,一作“恆”,也勝於今本。《治要》卷三三引此文“勢”上一字作“定”,“定”、“成”音義俱近。總之,上引這一段文字,簡本要比今本好得多。但是,新出版的幾種《孫子》注本都沒有用簡本來校正今本。《今譯》在這一段的“水之形”下加注說:“形:《十一家注》、《武經》系統各本均作‘形’;‘竹簡’、《通典》、《太平御覽》、《群書治要》‘水之形’均作‘水之行’。前三個‘形’字,用‘行’字較容易理解。但第四個‘形’字,即‘水無常形’則以‘形’字為適宜”(76頁),對簡本的優點作了有條件的肯定。但是所謂“前三個‘形’字”,實際上是兩個形字(水之形,兵之形)、一個流字(水因地而制流),並且第二個“形”字,簡本實作“勝”而不作“行”。至於“水無常形”句,簡本異於今本之處在於沒有“水”字,末一字兩本都作“形”。這些都是《今譯》的這條注文所沒有注意到的。

(6)

《行軍》(今):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

[《行軍》](簡):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敵遠[而挑戰(也可能作“人”)者(也可能無此字),欲人之]進者,其所居易[利也]。

今本“其所居易者,利也”句,文不成義,各家解釋都很勉強。《通典》卷一五〇、《御覽》卷二九一引此句,皆作“其所處者居易利也”,應是說明上文所舉出之事的原因的;跟“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一類獨立說明一種情況的句子不一樣。賈林注:

^{①⑥} 見《孫子兵法》58頁。

“敵之居地多便利，故挑我使前，就己之便，戰則易獲其利，慎勿從之也。”從賈氏的解釋來看，他所見之本應該與《通典》、《御覽》所引之本相同或相近。孫星衍所校《孫子十家注》把“其所居易者利也”改為“其所居者易利也”，下有注云：“按杜佑、賈林諸家皆以此承上文言之，不別爲一事，則‘者’字應在‘易’字上。後人以上下文比例之，臆改在下耳。又按注云：‘士爭其所居者，易利也。’（引者按：此爲杜牧注所引一本之文，“士爭”二字當是不明文義者所臆加）‘者’字亦在上。從《通典》、《御覽》改。”簡本此句雖有殘缺，但“者”字確在“易”字上，而且“欲人之進”下不是“也”字而是“者”字，句子顯然沒有結束。這就完全證實了自“遠而挑戰”至“利也”是一句，孫星衍的校改是可取的。簡本“欲人之進”下既有“者”字，“敵遠[而挑戰]”下很可能就沒有“者”字，可惜簡文殘缺無法確定。^①新出的幾種《孫子》注本對於這一句都仍然按照今本作解釋，這是不妥當的。

簡本《孫子》還有大量勝於今本的地方，這裏不一一介紹了。

限於篇幅，對於已發表的其他幾種傳世古書的簡本和帛書本的勝處，我們也不準備介紹了。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去看注①舉出的那些書。

應該指出，古本和今本的異文有時候不只牽涉到個別文句的解釋，而且也牽涉到與作者的立場或整個思想體系有關的問題。在馬王堆帛書本《老子》裏就可以找到這種例子。

今本《老子》七十五章（王弼本）：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
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老子》作者雖然有不少偏激的話，但是他的立場顯然是完全站在統治階級一邊的。上面所引的可以算《老子》中最有人民性的一章。但是這一章在帛書本裏却有重要的異文：

人之飢也，以其取食逸之多也，是以飢。百姓之不治也，以其上有以爲[也]，是以不治。民之堽（輕）死，以其求生之厚也，是以堽（輕）死。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貴生。

上面所引的是甲本，乙本文字大體相同。

這段話包含四個句子，一、三兩句的涵義，帛書本和今本有很大的不同。帛書

^① 見《孫子兵法》70—71頁。

甲本的“𨔵”字，乙本作“𨔵”。這是一個从“𨔵”或“足”从“兌”聲的字。“兌”字古音與“隧”相近。《禮記·檀弓下》“齊莊公襲莒于奪”，鄭玄注認為“奪”指《左傳·襄二十三年》的“且于之隧”，“隧、奪聲相近，或爲‘兌’”。《晏子春秋·內篇問上·第二章》有地名“茲于兌”，王念孫《讀書雜誌》也認為就是“且于之隧”。帛書本的“𨔵”應該讀爲“隧”。《廣雅·釋宮》：“隊（與“隧”通），道也。”《左傳·文公元年》杜注：“隧，徑也。”“𨔵”字从“𨔵”或“足”，這兩個偏旁的意義正好跟道路有聯繫，“𨔵”也許就是當道路講的“隧”或“遂”的異體。“取食𨔵”的意思就是取得食物的途徑。今本說人民餓肚子，是由於統治者剝削得太厲害；人民不把死當作一回事，是由於統治者過分追求好的生活。帛書本則說人們餓肚子，是由於他們獲取食物的途徑太多；人民不把死當作一回事，是由於他們自己過分追求好的生活。^⑮从《老子》的思想和文章風格來看，帛書本應該是可信的。

从形式上看，今本這一章的一、二、三三句話似乎配得非常整齊。如果從內容上考慮，情況就不是這樣了。第二句從反面說明無爲而治的道理，意思是說正由於統治者想治民，民反而不治。統治者“有以爲”的目的與其結果是矛盾的。但是統治者食稅多本來就不是爲了要人民吃得飽，統治者想生活得好本來就不是爲了要人民重視生命。相反，“民之飢”、“民之輕死”正是統治者“食稅之多”、“求生之厚”的合乎邏輯的結果。所以一、三兩句跟第二句放在一起，實際上是不調和的。並且像統治者食稅多人民就要餓肚子這一類一般人都知道的道理，估計《老子》的作者也不會把它當作自己的心得來講。帛書本的一、二、三三句講的事情都與一般人的常識不符，放在一起是調和的。而且本章的末一句“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帛書本無此字）貴生”，用來承接这三句，也顯然要比承接今本的那三句合理。所以今本的一、三兩句大概是被有人有意修改過的，《老子》作者大概並沒有這種比較明顯的同情被剝削者的思想。（《新探》編按：今所傳王弼本“以其上求生之厚”句，景龍碑本、范應元本等作“以其生生之厚”——范本句末有“也”字；河上公本作“以其求生之厚”，與帛書本最相近。王弼本此句顯然經過竄改。）這兩句究竟是什麼時候改的？爲什麼要這樣改？這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古本的價值並不僅僅表現在能校出今本的明顯錯誤或有意的竄改上。古本和今本的文字往往有很多不影響文義的細微差別，有些差別看起來似乎無關緊要，實際上却反映了古今語言的變化。把上述幾種簡本和帛書本跟今本對照一下，可以

^⑮ 參看《老子（馬王堆漢墓帛書）》18頁。

發現“弗”字被改作“不”的現象非常普遍。例如帛書本《老子》裏有很多“弗”字，在今本裏幾乎全被改作“不”字。句子的詞序有時也被改動。例如銀雀山簡本《晏子》等書裏的“何如”、“之謂△”，往往被改作“如何”、“謂之△”（上引《孫子·虛實》篇文，就有一個“……之謂神”改作“……謂之神”的例子）。《戰國縱橫家書》第十五章的“未之嘗有也”，《戰國策·魏策三》作“未嘗有之也”。複合詞或詞組的字序也有被顛倒的情況。例如《孫子》的《虛實》篇，簡本原稱《實虛》篇；《九地》篇裏的“霸王”，簡本原作“王霸”。帛書本《老子·德經》裏的“侯王”，在現存的有些本子裏也被改成了“王侯”。上述這類現象對於研究漢語的人是有意義的，所以在校勘的時候也不應該放過。

二

銀雀山竹書和馬王堆帛書裏，都有不少內容與現存古書有密切關係的佚書。有的佚書幾乎整篇都能與現存古書對上。例如銀雀山竹書中的《王兵》篇，其內容錯見於《管子》的《參患》、《七法》、《地圖》、《兵法》等篇。據研究，《參患》等篇大概就是由《王兵》或與《王兵》相似的作品改編而成的。^①至於部分內容或某些文句與現存古書相合的佚書，數量就很多了。例如抄錄在馬王堆《老子》乙本卷前的《經法》等篇佚書，有很多與《管子》、《鶡冠子》、《慎子》、《淮南子》等書相合的內容。^②銀雀山竹書中的不少佚書，也有與《管子》、《淮南子》、《墨子》等書相合的內容。上述這類佚書，多數可以用來校讀有關的古書。下面舉一些例子。

銀雀山竹書《王兵》篇的發現，使我們對《管子》中《參患》、《七法》、《地圖》等篇的形成過程有了比較清楚的認識。這些篇的內容存在着由於割裂截取《王兵》或《王兵》一類作品而產生的文理欠通的現象。這在過去是不大容易被察覺到的。現在用《王兵》篇一對比，問題就暴露出來了。同時，《王兵》篇還能幫助我們糾正《管子》的一些錯字，並讀通一些借字。對於這些問題，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的《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王兵〉篇釋文》已經作了比較全面的論述，這裏僅舉一個校讀文字的例子簡單說明一下。

^①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王兵〉篇釋文》，《文物》1976年12期。

^② 看唐蘭《〈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與其它古籍引文對照表》，收入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經法（馬王堆漢墓帛書）》。

下面所引的是分別見於《管子》的《七法》、《兵法》和竹書《王兵》的三段大同小異的文字：

《七法·選陳》：官無常，下怨上，而器械不功。朝無政則賞罰不明，賞罰不明則民幸生。

《兵法》：官無常則下怨上，器械不巧。則（此字衍）朝無定，賞罰不明，則民輕其產。

《王兵》：官府毋（無）長，器械（械）苦使（竅）。朝廷無正，民幸生。

清人丁士涵曾指出，《七法》和《兵法》兩篇中“官無常”的“常”字當讀為“長”（見戴望《管子校正》），《王兵》篇證實了他的說法。此外，我們通過上引三段文字的對比，還可以知道《七法》“朝無政”的“政”和《兵法》“朝無定”的“定”，都應該按照《王兵》篇讀為正長之“正”。“政”和“正”在古書裏經常通用。“定”字本是从“宀”“正”聲的一個形聲字，古音與“正”相近，在這裏可以看作音近訛字。^② 孫星衍、丁士涵和俞樾都已看出《兵法》“朝無定”的“定”是“正”字之誤，但他們反據《七法》把“正”讀為“政”，可謂未達一間。

除《王兵》篇外，銀雀山竹書中還有一些可以用來校讀《管子》的佚書，這裏也舉一個例子。《管子·五行》：“日至，睹甲子木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總別列爵，論賢不肖士吏……”，下文中“命……內御”之語屢見。“命左右士師內御”下尹注云：“謂內侍之官也。”銀雀山竹書中有一篇與《五行》有密切關係的佚書，其中有“[正月朔日天子]出令，命東輔入御，令曰：總版列爵，選賢不宵（肖）……”等語，與上引《五行》篇文很相似。佚書下文“七月朔日”、“十月朔日”下，也可以分別看到命西輔、北輔入御之語（四月朔日命南輔入御之文缺去）。由此可見《五行》的“內御”應該讀為“入御”（“內”“入”二字古通），也可以說“內”是“入”的訛字。“御”在這裏是動詞，當訓為“侍”或“治事”。尹注不可信。

馬王堆《老子》乙本卷前佚書中的《順道》等篇，跟《管子·勢》篇有不少相同或相似的文句。《管子·勢》的“形於女色，其所處者柔……”一句，《順道》作“刑於女節，所生乃柔”。“刑”是效法的意思。“女節”與《淮南子·原道》和《老子》乙本卷前佚書《雌雄節》等篇中所說的“雌節”同意，指“外示柔弱，待時應變之道”。^② “刑於女節”文從字順，“形於女色”就不大好講。《勢》篇的“女色”當是後人由於不明

②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王兵〉篇釋文》，《文物》1976年12期43頁。

②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經法（馬王堆漢墓帛書）》69、87頁。

“女節”之意而臆改的。²³

馬王堆帛書《春秋事語》“魯桓公與文姜會齊侯于樂”章，與《管子·大匡》中講同一件事的一段文字非常接近，也可以用來校正《大匡》篇的一些錯誤。²⁴

《戰國縱橫家書》二十四“公仲惲謂韓王”章，與《戰國策·韓策一》“公仲明謂韓王”章基本相同，《史記·韓世家》、《韓非子·十過》也都有類似的文字。不過《十過》篇中的一段文字改動較大，已經不能看作同一篇文章了。《十過》有“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路”一句，“下路”之義不明。《韓策》和《韓世家》只說“令（《韓世家》作“命”）戰車滿道路”，沒有提到“下路”。但此句在《戰國縱橫家書》中則作“名（命）戰車盈夏路”，“夏”、“下”二字古通，可知《十過》的“下路”當讀為“夏路”，《韓策》、《韓世家》的“道路”很可能是“夏路”的訛文。夏路指楚國向北方的大道，見於《史記·越世家》。²⁵

銀雀山竹書中有一篇題為“唐革（勒）”的佚賦（已殘），第一句是“唐革與宋玉言御襄王前”，通篇論御馬之術的高下。《淮南子·覽冥》自“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以下論御術的一段文字，就是取材於此的。《覽冥》說王良、造父御馬，馬就“心怡氣和，體便輕畢，安勞樂進”。“輕畢”二字不可解，高注訓“畢”為“疾”，這在古書中是沒有根據的。佚賦中與上引《覽冥》篇文相當的文字是“馬心愈（愉）而安勞，輕車樂進”。由此可知《覽冥》的“畢”字是“車”的形近誤字，高注確為臆說。“輕車”就是不覺得所拉的車子沉重的意思。《覽冥》說“鉗且、大丙之御”能使車馬之行如“日行月動，星耀而玄運，電奔而鬼騰”，佚賦作“月行而日邁（動），星躍而玄愼（運），子（疑為衍文）神賁（奔）而鬼走”。《覽冥》的“耀”和“電”，當從佚賦讀為“躍”和“神”。

銀雀山竹書中的《奇正》篇說：“故聖人以萬物之勝勝萬物，故其勝不屈。”²⁶這一句可以校正《淮南子·兵略》的一處衍文。“屈”字古訓“盡”。這句話的意思是說，聖人掌握萬物的特性，知道該用什麼去制服什麼，所以他的勝利是無窮無盡的。《淮南子·兵略》裏有不少與《奇正》篇相合的內容，大概在編寫《兵略》的時候，《奇正》篇是很重要的參考資料。《兵略》說：“物物而不物，故勝而不屈。”這句話應該是脫胎於上引《奇正》篇的那句話的。“物物而不物”，就是超出於物而駕馭萬物的

²³ 同上，180 頁。

²⁴ 參看張政烺《〈春秋事語〉解題》，《文物》1977 年 1 期 39 頁。

²⁵ 見《戰國縱橫家書（馬王堆漢墓帛書）》108 頁注⑥。

²⁶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孫臏兵法（銀雀山漢墓竹簡）》121 頁。

意思，跟“聖人以萬物之勝勝萬物”的意思是相通的。前面已經說過，“勝不屈”是勝利無窮無盡的意思，《兵略》“勝”字下的“而”顯然是衍文，應據《奇正》刪去。《御覽》卷二七一引《淮南子》此句，“勝”下無“而”字，所據尚為未訛之本。^{②7}

《奇正》又說：“以一形之勝勝萬形，不可。”這一句可以校正《孫子》曹操注的一處脫文。《孫子·虛實》“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曹注：“不以一形之勝萬形。”據上引《奇正》文可知曹注“勝”字下脫落一重文。^{②8} 看來曹操也是讀過《奇正》篇的。

銀雀山所出的大約屬於《太公》的殘簡裏有如下一條：

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待），能明其世，胃（謂）之天子。

這句話，《呂氏春秋·聽言》引作《周書》，“能明其世”訛為“賢明其世”；《漢書·鼂錯傳》引作《傳》，“來者不可待”訛為“來者猶可待”，都應據簡文改正。

下面舉一個用雲夢所出《秦律》校正《說文》的例子。

《說文解字》裏有些字的注解是以《漢律》為根據的，《漢律》因襲《秦律》的地方很多，所以《秦律》可以用來糾正今本《說文》的一些錯誤。《說文·米部》：

粢，稻重一秬，為粟二十斗，為米十斗曰穀，為米六斗太半斗曰粢。

又《麥部》：

臈，麥穀屑也。十斤為三斗。

《秦律·倉律》裏有與上引《說文》有關的一條律文：

稻禾一石，為粟二十斗，舂為米十斗；十斗粢，毀（穀）米六斗大半斗。麥十斗，為臈三斗。

根據這條律文，《說文》“粢”字注解裏“穀”、“粢”二字的位置應互易（《十講》編按：據張家山247號墓所出《算數書》有關簡文看，過去對上引《秦律》關於“穀”“粢”文句的理解有誤。本文中“《說文》‘粢’字注解裏‘穀’‘粢’二字的位置應互易”一句應刪

②7 《銀雀山漢墓竹簡〔壹〕》中《孫臏兵法·奇正》篇注。《奇正》篇不應編入《孫臏兵法》，印刷中的新版已作調整。（《自選集》編按：所引《銀雀山漢墓竹簡〔壹〕》為綫裝本，1985年出版的精裝本已將《奇正》等篇從《孫臏兵法》中抽出。）

②8 同上注。

去。關於“穀”“粦”問題當另文討論)；“糲”字注解裏的“斤”字應改為“斗”。^②

這裏再根據《秦律》附帶談一下《說文》“繫”、“穀”等字段玉裁注的一些錯誤。《秦律·倉律》是先講了小米由粟舂米的折合比例，然後再講稻米由粟舂米的折合比例的。關於小米的那段律文如下：

[粟一]石六斗大半斗，舂之爲糲(糲)米一石；糲米一石爲繫(繫)米九斗；九[斗]爲穀(穀)米八斗。^③

《說文·米部》：

糲，粟重一石爲十六斗大半斗，舂爲米一斛曰糲。

又《穀部》：

繫，糲米一斛舂爲九斗曰繫。

穀，米一斛舂爲八斗也。

這些注解大概都是以《漢律》中的《倉律》爲根據的，所記折合比例與上引秦律完全相合。段玉裁因爲《九章算術》和《詩經》鄭箋所記的各種粗細小米的比例，都是糲十、稗九(稗即穀。《說文·米部》：“稗，穀也。”)、繫八，就把《說文》繫字注解裏的“九斗”改爲“八斗”，把穀字注解裏的“八斗”改爲“九斗”。這樣改，看起來似乎很有道理，所以得到很多人的同意。現在秦簡出土，才知道《說文》並不錯。至於《九章算術》和鄭箋所記比例與《說文》所據的《漢律》不同的原因，還有待研究。段注還認爲上引《說文》“繫”字注解“……爲米十斗曰穀”本應作“……爲米十斗，爲米九斗曰穀”，這當然也是錯誤的。

《文史》第五輯有武雷同志的《校勘小議》，他根據雲夢秦簡《編年記》昭王“卅八年攻武安”的記載，指出標點本《史記》據梁玉繩、張文虎等人的意見，把《秦本紀》昭襄王四十八年“王齕將伐趙武安、皮牢拔之”一句中的“武安”二字刪去，是錯誤的。這和段玉裁改《說文》的例子，都說明校勘古書必須十分審慎，不是有充分的把握，就不應該改動古書。

雲夢秦簡《編年記》昭王卅三年條記“攻蔡、中陽”四字。^④ 這條簡單的記載可

②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44—45頁。這一條律文原來抄寫有誤，引用時已據整理小組注改正。

③ 同上注。

④ 同上所引書5頁、10頁。

以校正今本《史記》的一處重要脫文。秦簡整理小組注：“《史記·六國年表》和《魏世家》載此年秦拔魏四城。《秦本紀》說秦‘客卿胡傷攻魏卷、蔡陽、長社’，只有三城，疑《秦本紀》‘蔡陽’係‘蔡、中陽’之誤。”^②這個意見很正確，《秦本紀》“蔡”、“陽”二字間顯然脫落了一個“中”字。

最後，舉一個用敦煌漢簡校正《淮南子》的例子。《淮南子·天文》：

斗杓爲小歲，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咸池爲太（當從錢大昕改“大”）歲，二月建卯，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

斗杓正月建寅，咸池建卯不言正月而言二月，頗爲可疑。有一條敦煌簡說：

正月大時在東方舍卯，小時并在東方舍寅。

《流沙墜簡》小學方技書5上，吉凶宜忌殘簡1

《淮南子·天文》：“大時者，咸池也。小時者，月建也。”斗杓所指之辰即月建。所以簡文與上引《天文》篇講的是一件事。簡文說正月大時舍卯，可證《天文》篇“二月建卯”之誤。大概後人不明白大時小時之說，以爲正月建寅與正月建卯矛盾，所以把第二個“正月”改作“二月”。

三

古書裏有些詞語（包括某些專名）的確切含義，我們現在已經不清楚了，或者在多數人中間已經不清楚了。還有些詞語已經被後人寫錯，這些詞語的含義往往也是不清楚的。如果我們能夠注意那些使用這一類詞語或與這類詞語有關的古代文字資料，就可以弄清一些詞語的含義，糾正一些書寫上的錯誤。

下面按照詞語的性質分四類舉例說明。

（一）專名

（1）巫咸招

《莊子·天運》：

巫咸招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

^②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5頁、10頁。

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釋文引李頤注：“巫咸，殷相也。招，寄名也。”成玄英疏：“巫咸，神巫也，爲殷中宗相。招，名也。”巫咸名招，從不見於他書，頗爲可疑。馬王堆三號墓出土的關於養生術的竹書提到神人巫成招（《新探》編按：見《馬王堆漢墓帛書〔肆〕》釋文 149 頁），應即務成子。巫、務皆微母字。巫屬魚部，務屬侯部，漢代魚、侯二部合一，故“巫成”與“務成”可通。《荀子·大略》“舜學於務成昭”，《路史》後紀卷十一作務成軺。“招”與“昭”、“軺”都從“召”聲，所以也可通用。銀雀山竹書中有舜與牟成牝問答殘簡。“牟”、“務”古音相近。“牝”從“勺”聲，“勺”與“召”古音也相近。牟成牝也即務成昭。有的古書上務成子之名作“跗”（《新序·雜事五》）或“附”（《韓詩外傳》五），恐有誤。《漢書·藝文志》有《務成子》十一篇、《務成子災異應》十四卷、《務成子陰道》三十六卷，可見古人著書頗喜依託此人。《莊子》的“巫咸招”無疑是“巫成招”之訛。“招”也從“召”聲。巫成招、巫成軺、務成昭，都是一名的異寫。也有可能“招”就是“軺”的誤字。

《莊子》所錄巫成招之語，當是從舜和巫成招的某篇問答中摘錄下來的，或即出自《藝文志》列於小說家的《務成子》（《藝文志》原注：“稱堯問，非古語。”疑“堯”爲“舜”之誤，也可能其中包括堯舜二人與務成子的問答）。《路史》後紀卷十一：“（舜）問於務成軺曰：‘天下未治，何以使我？’對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治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莊子》所引“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等語，意與此相近。

（2）孫軫

《漢書·藝文志》兵形勢家有《孫軫》五篇。過去大家不清楚這個孫軫是什麼人。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條理》以爲是戰國時的陳軫，純屬臆測。銀雀山竹書《孫臏兵法·陳忌問壘》篇殘簡中有“晉邦之將荀息、孫軫之於兵也”，“晉邦之將荀息、孫軫爲晉要秦於殽，潰秦軍，獲（獲）三率（帥）”等語。這個孫軫顯然就是晉將先軫。《藝文志》的孫軫無疑也是他。先軫本以善於謀劃善於用兵見稱。城濮之戰晉文公用其謀而勝楚國，殽之戰他襲擊秦軍俘獲三帥（看僖公二十八年、三十三年《左傳》，《晉語》四，《史記·晉世家》）。《說苑·指武》說“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軫不能戰不教之卒”，上引《陳忌問壘》篇也兩次提到他，可見在古人心目中先軫的軍事才能極受重視。有人託他的名而著兵書是很自然的事。“先”、“孫”二字古音極近，所以先軫可以寫作孫軫。《漢書·田廣明傳》記武帝時故城父令公孫勇作亂事。東漢時的《國三老袁良碑》提及此事，公孫勇作公先勇（《隸釋》六），可以與

此互證。如果沒有銀雀山竹書,《藝文志》孫軫的問題恐怕是難以解決的。^③

(3) 千章

《漢書·地理志》西河郡有千章縣。1976年內蒙古自治區伊克昭盟杭錦旗發現西漢銅漏壺,壺身刻銘文一行:“千章銅漏一,重卅二斤,河平二年四月造”,壺內底鑄“干章”二字。^④由此可知《地理志》千章爲干章之誤。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的同志報導此器發現消息時,把銅壺銘文中的“干章”仍釋爲“千章”。銅壺鑄銘“干”字作篆體,頂上分叉,顯然是“干”而非“千”。《漢書》是屢經傳抄刊刻的古書,“干”字錯成“千”毫不奇怪。銅漏壺在漢成帝時鑄於干章,當時當地的人把地名寫錯的可能性非常小。我們不應該舍實證而信書本。

(二) 器物名

(1) 斗卮

《史記·項羽本紀》鴻門宴一節記樊噲闖入以後事有如下一段文字:

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

太史公通過飲食寫樊噲的豪勇,斗卮酒與生彘肩爲對,斗卮自然是指容量爲一斗的酒卮。但是長期以來,有不少人認爲“斗”是衍文。清人李笠《史記訂補》:“《漢書·樊噲傳》‘與’下無‘斗’字。卮受四升,不得云斗卮酒,下云卮酒安足辭,此非泛言可知,斗蓋衍字。”(據《史記會注考證》轉引。《十講》編按:承復旦大學中文系傅傑教授告知,李笠之書著於民國時代,不應稱李爲“清人”。)日人《史記會注考證》和北大中國文學史教研室《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都引了李說,《參考資料》並加了“李說是”的按語。還有不少人認爲斗是酒器名。王伯祥《史記選》注:“斗,酒器之大者。就是《詩·行葦》‘酌以大斗’的斗(引者按:《詩經》的斗是舀酒的勺一類器,王氏似誤解“斗”字之義),今俗猶管大酒杯叫酒斗。”(42頁)從各種古文選本看,認爲“斗”是酒器名的人似乎比認爲“斗”是衍文的人更多。他們大概都認爲容量大到一斗的酒杯是不可能有的。其實秦漢時的一斗只相當於二升左右,斗卮相當於二升的啤酒杯,並不是不可能有的東西。

1972年發掘馬王堆一號墓,發現一份完整的遺冊,其中179號簡上所記的就是

^③ 此段據《銀雀山漢墓竹簡[壹]》中《孫臏兵法·陳忌問壘》注。

^④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內蒙古伊克昭盟發現西漢銅漏》,《考古》1978年5期。

“鬯畫斗卮二”。1973年出版的《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上集《竹簡》一節指出斗卮見於《項羽本紀》，就是盛一斗酒的卮，並說：“墓中所出的135號漆卮，容量為2100毫升，與七升卮（指底部朱書“七升”二字的137號漆卮）容量為1500毫升相較，其容量當在一斗上下，當即此簡所記的斗卮。”（144頁）後來發現的馬王堆三號墓的遣冊也記有斗卮。有了這樣堅強的地下證據，斗字衍文說和斗為酒器說總應該銷聲匿跡了吧。但是我們翻檢了十來種近年來出版的選入《項羽本紀》的古文注本（包括一部分未公開出版的），發現斗為酒器說仍然佔有絕對統治地位。有的直接把“斗”注為“大酒杯”，有的籠統地把“斗卮酒”釋為“一大酒杯”，沒有一種注本是把“斗”理解為容量單位的。

（2） 罍

《史記·貨殖傳》：

通都大邑，酤一歲千釀、醢醬千罍……

《漢書·貨殖傳》“罍”作“瓠”。《史記會注考證》改《史記》的“罍”為“瓠”，一般人也多認為《史記》的“罍”是“瓠”的誤字。馬王堆一號漢墓遣冊所記食物有“馬醬一坑”、“魴一坑”、“魴一坑”、“豉一坑”，“坑”為器名，應讀為“瓠”。^⑤司馬遷的時代與馬王堆一號漢墓的時代相距不遠。《史記》的罍盛醢、醬，遣冊的坑也用於盛醬、豉等物。“罍”顯然是“坑”（瓠）的誤字而不是“瓠”的誤字。

瓠和瓠是同類器物（二字聲亦相近）。《史記集解》引徐廣釋“罍”為長頸罍。《漢書》顏師古注也說：“瓠，長頸罍也，受十升〈斗〉。”《廣雅·釋器》把瓠、罍、瓠都訓作“瓠”。所以我們也不必說《漢書》的“瓠”是“坑”（瓠）的訛字。《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說墓中所出301號硬陶罐內藏豆豉，當即簡文所記“豉一坑”的“坑”。^⑥此器口較小，頸部較高，形制正與徐廣注所謂長頸罍相合。

（3） 有方

《墨子》和《韓非子》都提到“有方”。《墨子·備水》：

臨三十人，人擅弩，計四有方……選材士三十人共船，其二十人，人擅有方，劍甲鞮脅，十人擅苗（畢沅謂苗同矛）。

《韓非子·八說》：

^⑤ 《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上集138頁。《座談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文物》1974年9期52頁。

^⑥ 同上注。

搯笏千戚，不適(敵)有方鐵鉞。

畢沅校《墨子》改“方”爲“弓”，《韓非子》舊注訓方爲楯，“有”字都沒有著落。孫詒讓在《墨子閒詁》和《札迻》中主張“有方”是“酋矛”的誤字，亦無確證。

《流沙墜簡》所收敦煌漢簡，有兩條都記“有方一”三字(屯戍叢殘 13 上，器物類 28、29)，王國維考釋指出，見於《墨子》、《韓非子》和簡文的“有方”是一種兵器，但形制不可考。居延漢簡也屢見“有方”，如：

第二十隧卒□丘定 有方一刃生 右卒兵受居延 311·2, 居甲 1648
有方十六
盾十六
劍十六 232·31, 同上 2470

勞榦《居延漢簡考證》綜合古書和漢簡中關於有方的資料進行研究，認爲有方應是一種有刃的長兵，很可能是戈戟一類的東西。其說似頗可信。

有方的問題現在尚未徹底解決，但是我們對於有方的認識比起孫詒讓等人來已經進了一步。孫詒讓尚未見到漢簡，他把有方解釋爲酋矛的訛文，是可以理解的。奇怪的是，陳奇猷在解放後出版的《韓非子集釋》的《八說》篇注中，不僅沒有提到漢簡裏的有關資料，還別出心裁地提出了“有方”是執軍旗的人的奇說，比起清人來反而退了一大步(《十講》編按：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出版的陳氏的《韓非子新校注》，已將“有方”是執軍旗的人的說法刪除，但仍未引用漢簡研究者關於“有方”的說法)。

(三) 與古代制度有關的詞語

(1) 户人

《漢書·食貨志上》：

農民户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

王念孫《讀書雜誌》認爲“農民户人”本應作“農民户一人”，他說：“一人二字對下衆男爲餘夫言之。下文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又承此農民户一人言之。今本脫‘一’字，則文義不明。《通典·食貨一》無‘一’字，亦後人依誤本漢志刪之。《周官·載師》注及疏引此，並作農民户一人。陳氏《禮書》引同，則北宋本尚未誤。”

王說似乎很有道理，所以信從的人頗多。但是從江陵鳳凰山十號漢墓所出的“鄭里稟(廩)籍”來看，“戶人”是當時常用的詞語，《食貨志》並無脫文。鄭里廩籍共二十六簡，除首簡外，每簡都以“戶人某”開端，下記該戶的人口、田畝和所貸種食的數字。例如：

戶人擊牛 能田二人 口四人 田十二畝 貸一石二斗
 戶人野 能田四人 口八人 田十五畝 貸一石五斗

《文物》1974 年 7 期 51 頁

《食貨志》和廩籍的“戶人”顯然指同一種人，大致相當於後代的戶主(《十講》編按：《敦煌懸泉漢簡釋粹》——胡平生、張德芳編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61 頁引簡文：“驪軒武都里戶人大女高者君，自實占家當乘物……”，62 頁注〔2〕引《漢書·昭帝紀》顏注引如淳曰：“律，諸當占租者，家長身各以其物占，占不以實，家長不身自書，皆罰金二斤，沒入所不自占物及賈錢縣官也。”此簡文可證“戶人”即家長，亦即“戶主”)。《食貨志》以戶人與衆男對言，文義很順。王氏認為《通典》引文為後人所改。其實《通典》引文是正確的，《周禮》注疏、陳氏《禮書》引文裏的“一”字，恐怕倒是不明“戶人”之義的人給添加上去的。

(2) 循行

《後漢書·百官志五》劉昭注引《漢官》所記河南尹員吏，有循行二百三十人，雒陽令員吏有循行二百六十人。《晉書·職官志》所記州、縣吏也有循行。從漢簡看，“循行”應是“脩行”之誤。

居延簡屢見脩行：

脩行□里公乘霍利親年三十八 174·5,《居》166 頁 3326 號

脩行孤山里公乘范弘年二十一 今除為甲渠尉史代王輔

285·3,居甲 1534

□脩行除□

485·43,《居》228 頁 4189 號

上引後兩簡的“脩”字本寫成从“彳”，字形與“循”相似，末一簡的“脩”勞榦就誤釋為“循”。漢代隸書“彳”旁往往變作“彳”，漢簡、漢碑中“條”寫作“條”、“假”寫作“假”一類現象很常見，並非只有“脩”字如此。从“彳”的“脩”字跟“循”字的確很相似，所以這兩個字在古書裏時常互訛。但是如果仔細觀察，漢簡、漢碑裏的“循”字和从“彳”的“脩”字還是容易區別的。因為“循”字右下部為“目”，“脩”字右下部為“月”，這部分的寫法通常並不相混。上引居延簡第一條的“脩”字，本从

“亻”而不从“彳”，其非“循”字更為明顯。所以可以肯定《後漢書》《晉書》的“循行”是“脩行”的誤文。從文義上看，“脩行”也比“循行”合理。漢代雖有循吏之稱，但在講到品行的時候，一般不用循字，而常用脩字，例如《漢書·高帝紀上》“舉民年五十以上有脩行，能帥衆為善，置以為三老”，《漢書·于定國傳》“年且三十乃折節修行”。《漢書·陳湯傳》“有司奏湯無循行”，宋祁疑“循”當作“脩”，是正確的。

《論衡·程材》：“一縣佐史之材，任郡掾史。一郡脩行之能，堪州從事。”脩字未誤，甚為難得。黃暉《論衡校釋》反據《後漢書》的訛文說“脩行”應作“循行”，可謂是非顛倒。

《北海相景君碑陰》所記屬吏中有很多“脩行”，“脩”字都从“彳”。趙明誠《金石錄》：“按《後漢書·百官志》注河南尹官屬有循行一（當作“二”）百三十人，而《晉書·職官志》州、縣吏皆有循行。今此碑陰載故吏都昌台丘暹而下十九人，皆作脩行。他漢及晉碑數有之，亦與此碑陰所書同，豈循、脩字畫相類遂致訛謬邪？”（卷一四）他似乎認為此碑陰从“彳”的“脩”是“循”的錯別字。洪适《隸續》“脩（循）、脩（脩）二字隸法只爭一畫，書碑者好奇，所以从省借用”（卷一六），認為“脩”以形近借用為“循”。他們都上了古書誤字的當。

（3）伐閱名籍墨將

《論衡·謝短》：

吏上功曰伐閱名籍墨將，何指？

黃暉《校釋》、劉盼遂《集解》都在“伐閱”後加逗。最近出版的《論衡注釋》也如此標點，並在“伐閱”和“名籍墨狀”後分別加注（《注釋》據唐蘭說改“墨將”為“墨狀”），把“伐閱”解釋為“給有功的官吏記功”，把“名籍墨狀”解釋為“把名字記入墨筆寫的功勞簿上”（731頁）。從漢簡裏的有關資料看，這種標點方法是不妥當的，《注釋》的解釋更是不可信。

居延簡屢見“上功”或“不上功”之語：

吞遠候長放昨日詣官上功，不持射具，當會月二十八日，部遠不及到部，謹持弩詣官射，七月丁亥蚤食入。 203·24,《居》162頁3290號

□□候長□□□詣官上功，不持射具，當會□遠不及到部，謹持弩詣官射，七月丁亥蚤食入。 203·18,《居》162頁3286號

其四人病
· 右佐史七十人
六十六人不上功

265·27,居甲1388

止北隧長居延壘山里公乘徐殷年四十二 不史不上功

35·16,居甲251

還有一條簡有“過時不上不爲□”之語：

爲吏十一歲二月十二日

其一歲十二日過時不上不爲□

20·3,居46頁969號

“爲”下一字不清,似是“勞”字。

從上面這幾條簡文看,大概當時的官吏每隔一定時間就要向上級機關登記自己的服役時日等情況,叫做上功。

有幾條簡有“功勞墨將名籍”的文書名稱：

初元三年十月壬子朔辛巳,甲渠士吏彊敢言之,謹移所自占書功勞墨將名籍一編,敢言之。 282·7,居甲1511

☑墨將名籍一編敢[言之]

430·5,《居》121頁2498號

☑自占書功勞墨□□□上☑

227·7,《居》317頁5258號

這應該就是官吏們上功的文書。《漢書·食貨志下》：“各以其物自占。”自報財物是自占,自報功勞也是自占。從上引提到上功的第一、二條簡文看,候長似乎必須親自到候官治所上功,上功時並須試射。這當是由於候長職務重要,對他們要求比較嚴格的緣故。多數官吏大概只要自占功勞上報就可以。這種自占功勞上報的“功勞墨將名籍”,跟《論衡》所說的上功用的“伐閱名籍墨將”顯然是一種東西。所以把“伐閱”和“名籍墨將”用逗點開是錯誤的。至於“墨將”的確切含義,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四) 其他

(1) 燔治

《黃帝內經素問·繆刺論》：

鬻其左角之髮方一寸,燔治,飲以美酒一杯。

從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等出土的古醫書、古醫方看,燔治之“治”當是“冶”的誤字。《五十二病方》屢見“燔冶”之語：

取野獸肉食者五物之毛等,燔冶,合撓□,誨(每)旦[先]食,取三[指大撮]三,以溫酒一杯和,飲之。

……皆燔冶，取灰，以猪膏和〔傳〕。

取陳葵莖，燔冶之，以麋臍（臍）膏穀弁以〔傳〕疔。

癰居右，□馬右頰〔骨〕；左，□〔馬〕左頰骨，燔冶之。^⑦

此外，在《五十二病方》中還經常提到“冶”這種處理藥物的方法。帛書整理小組注：“冶，《醫心方》卷二二引《集驗方》‘已冶艾葉一筭’，冶字日文訓釋為碎。帛書醫方中冶字都是碎的意思。同樣意義的冶字，也見於《流沙墜簡》和《武威漢代醫簡》。”^⑧但是各種出土的醫書、醫方在講到藥物的處理方法的時候，從不用“冶”字，可見《素問》的“燔冶”一定是“燔冶”的訛文。

（2）入邑

《管子·小匡》記齊桓公與管仲論百官，管仲曰：

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爲大司田。

這件事也見於其他一些古書，文字彼此有些出入。其中，“墾草入邑”一句“邑”上一字的異文最值得注意。此句在《韓非子·外儲說左下》裏作“墾草仞邑”，《呂氏春秋·勿躬》作“墾田大邑”，《新序·雜事四》作“墾田仞邑”，連《管子》在內，四本書用了四個不同的字，即“入”、“仞”、“大”、“仞”。

“墾草入邑”之語又見於《史記·范雎蔡澤列傳》：

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墾草入邑，辟地殖穀。

《秦策三》作“大夫種爲越王墾草仞邑，辟地殖穀……”，姚本“仞”下有校語：“錢、劉一作仞，曾一作入。”這些異文沒有超出上面所說的範圍。

《韓非子》“墾草仞邑”句下舊注：“仞，入也。所食之邑能入其租稅也。”王先慎《韓非子集解》指出《管子·小匡》“仞”作“入”，爲舊注所本，並引《廣雅·釋詁三》：“入，得也。”《史記·范雎蔡澤列傳》“墾草入邑”句下《索隱》引劉氏云：“入猶充也，謂招攜離散，充滿城邑也。”俞樾《諸子平議》認爲《韓非子》的“仞邑”當從《新序》改正爲“仞邑”，仞邑“謂仞造其邑也”。陳奇猷《韓非子集釋》，許維遜、郭沫若《管子集校》都同意俞說。郭沫若並認爲《管子》的“入”、《呂氏春秋》的“大”，都是“立”的誤字。日人太田方認爲《韓非子》的“仞”當讀爲“仞”，訓爲“滿”，楊樹達說同（據《集釋》）。這些分歧的說法，究竟哪一種對？僅僅依靠上引幾種古書本

^⑦ 以上各條見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五十二病方（馬王堆漢墓帛書）》85、104、110、128頁。

^⑧ 同上書，28頁。

身，顯然很難作出判斷。

雲夢秦簡《爲吏之道》部分，有“根（壑）田人邑”一語，秦簡整理小組注讀“人”爲“仞”，解釋說：“仞邑，使城邑人口充實。”^③銀雀山竹書《王法》篇有“猥（壑）草仁邑”一語。銀雀山竹書每用“仁”爲“仞”。如《兵令》篇“前唯（雖）有千仁之溪”，《群書治要》引此文“千仁”作“千刃”，即“千仞”。^④《王兵》篇“得地而不能仁”，《管子·七法》作“得地而不能實”，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讀“仁”爲“仞”。^⑤《王法》“壑草仁邑”的“仁”無疑也應該讀爲“仞”，訓爲“實”。

根據上引秦簡和銀雀山竹書，可以斷定《韓非子》的“仞邑”是正確的。《管子》和《史記》的“人邑”都是“人邑”之誤，“人”也應讀爲“仞”（《十講》編按：《史記·平準書》：“……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繆，用充仞新秦中。”末一句《漢書·食貨志下》作“用充人新秦中”。《漢書》顏注說：“官得母馬之息，以給用度，得充實秦中人，——王先謙《補注》指出‘秦中’上脫‘新’字——故除告繆之令也。”顏注以“得充實[新]秦中人”釋“用充人新秦中”，可知其所見《漢書》“充人”作“充人”——疑《漢書》所據《史記》“充仞”本作“充人”——，“人”本應讀爲訓“滿、實”之“仞”，顏注誤以爲指人民。《漢書》之“充人”后訛爲“充人”，與“人邑”訛爲“人邑”同例）。仞邑是使城邑充實的意思。在各種舊說中，太田方和楊樹達的說法是正確的。《史記》劉氏注雖然據誤文爲說，但對文義的解釋尚可取。

太田方一面讀仞爲“仞”，一面又說《戰國策》作“𡵓邑”，義亦通。秦簡整理小組在上引那條注裏引了《呂氏春秋》的“壑田大邑”。他們大概認爲“仞邑”與“𡵓邑”或“大邑”，意思都講得通，可以並存。我們認爲“大邑”很可能也是“人邑”之誤，“𡵓邑”很可能是“仞邑”之誤。也就是說，古代本來只有“壑草（或作“田”）仞邑”一種說法，“仞”也可以寫作音近的“人”、“仁”（古代或許還可寫作“刃”）。後來不明白“仞邑”之義的人，有意無意地把“人”字寫成“人”或“大”，把“仞”字（可能還有“刃”）寫成“𡵓”，這才把問題搞得這樣複雜。

③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285—286 頁。

④ 《銀雀山簡本〈尉繚子〉釋文（附校注）》，《文物》1977 年 3 期 31—34 頁。

⑤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王兵〉篇釋文》，《文物》1976 年 12 期 37 頁。

四

文字的用法,也就是人們用哪一個字來代表哪一個詞的習慣,古今有不少變化。如果某種古代的用字方法已被遺忘,但在某種或某些傳世古書裏還保存着,就會給讀古書的人造成麻煩。秦漢文字資料表現出來的當時人的用字習慣,有時與保存在傳世古書裏的已被遺忘的用字方法相合,可以幫助我們讀通這些古書。下面舉幾個例子。

先談“𠂔”字。

《漢書·司馬遷傳》所載太史公《報任安書》有如下一句：

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而僕又茸以蠶室，重為天下觀笑。

顏注：“蘇林曰：茸，次也。若人相俾次。師古曰：此說非也。茸音人勇反，推也。蠶室乃腐刑所居溫密之室也。謂推致蠶室之中也。”劉奉世不同意顏說，認為“茸”應“讀如闔茸之茸”。《文選》卷四一《報任少卿書》“茸”字作“𠂔”，李善引如淳《漢書》注：“𠂔，次也，若人相次也。”可知《漢書》古本作“𠂔”。清人郭嵩燾解釋此句說：“𠂔次即副貳。遷言陵降後族誅，隤其家聲，己又以救陵下蠶室，罪居其次也。蘇解‘茸’為‘次’，則亦讀‘茸’為‘𠂔’耳。”（見《漢書補注》）但是無論把這個字讀為“𠂔”，訓作“次”，還是讀為“茸”，訓作“推”或“闔茸”，文義都顯得很彆扭。

“𠂔”字和“恥”字都从“耳”聲。馬王堆帛書有用“𠂔”為“恥”的例子，如《經法·君正》的“民富則有𠂔”。^④銀雀山竹書有時也以“𠂔”為“恥”，例如有一篇佚書說：“卿大夫官吏士民儆節，高其誼，𠂔其口，行其俗，民之請（情）也。”“𠂔”顯然應讀為“恥”。帛書和竹書的時代與司馬遷相近，《報任安書》的“𠂔”字沒有問題也應該讀為“恥”，“恥以蠶室”就是受宮刑之恥的意思。

其次談“炁”字。

《黃帝內經素問》裏屢見“炁”字，用法跟“熱”字十分相似。如《舉痛論》先言“炁氣”，後言“熱氣”，而意義無別，又言“寒則氣收，炁則氣泄”，以“炁”與“寒”對舉。居延漢簡中也常見同樣用法的“炁”字。^⑤但是字書裏的“炁”字，讀音跟“熱”字完全不同，而且並無“熱”的意思。《素問》既用“熱”字又用“炁”字，而用法又十

^④ 見《經法（馬王堆漢墓帛書）》13頁。參看《戰國縱橫家書》72頁注②。

^⑤ 陳槃《漢晉遺簡偶述》，史語所集刊十六本315—316頁。

分相似，二者究竟是什麼關係？《素問》的“炅”究竟應不應該按照字書“炅”字的音來讀？直到馬王堆帛書出土，才把問題解決。

《老子·德經》“靜勝熱”句，馬王堆帛書甲本作“靚生炅”（乙本此句殘去）。又甲本《道經》“或炅或□”句，乙本作“或執（熱）或硿”。帛書整理小組認為“炅，從火，日聲，當即熱之異體字，不讀古迴切或古惠切”。^④完全正確。馬王堆《老子》乙本卷前佚書《十大經·姓爭》“夫天地之道，寒涅燥濕，不能並立”，^⑤又借“涅”為“熱”。“涅”从“呈”聲，“呈”也从“日”聲。大概今本所從出的《素問》古本原來全用“炅”字，後人改“炅”為“熱”而又改之未盡，遂致全書“炅”、“熱”錯出。【編按：也有可能原來就“熱”、“炅”並用。】《長刺節論》“病風，且寒且熱炅，汗出，一日數過”，“熱”、“炅”二字相重。應是先有人注“熱”於“炅”，後人不明其意，遂將二字都抄作正文。《太素·雜刺》“病風，且寒且炅，一日數過”，“炅”上無“熱”字，可證。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的《黃帝內經素問》把上引《長刺節論》文標點為“且寒且熱，炅汗出”，是不妥當的。

最後談由“篡”字訛變而成的“募”字。

“算”、“選”二字在古代由於音近而相通。《論語·子路》“何足算也”，《鹽鐵論·雜事》引作“何足選哉”。《儀禮·喪服傳》“父母何算焉”，武威簡本《甲本服傳》第20簡“算”作“選”。在銀雀山竹書裏，屢見假借从“算”聲的“篡”字為選擇之“選”的例子。例如《孫臏兵法》的《威王問》和《篡（選）卒》都把“選卒”寫作“篡卒”，^⑥有一篇佚兵書裏“選卒”出現四次，兩次作“算卒”，兩次作“篡卒”，同篇“民不選”的“選”也寫作“篡”。簡本《晏子》也有以“篡”為“選”的例子。

古書裏的有些“募”字，其實是“篡”的形誤之字，應該讀為“選”。（漢代人寫字“竹”頭“艸”頭往往不分，“募”、“篡”形極近，據《干祿字書》，唐代一般人還把“篡”寫作“募”。）

《吳子·應變》：

武侯問曰：“左右高山，地甚狹迫，卒遇敵人，擊之不敢，去之不得，為之奈何？”起對曰：“此謂谷戰，雖衆不用。募吾材士，與敵相當，輕足利兵，以為前行……”。

④ 《老子（馬王堆漢墓帛書）》14頁注⑪。

⑤ 《經法（馬王堆漢墓帛書）》66頁。

⑥ 《孫臏兵法（銀雀山漢墓竹簡）》42、45頁。

這一段講在山谷中猝然遇敵時應變的辦法。把“募吾材士”的“募”看作“纂”的誤字，讀為“選”，顯然是很合適的。83110 部隊理論組編的《吳子兵法注釋》把“募吾材士，與敵相當”解釋為“要挑選數量與敵相當的精銳之士”（39 頁）。他們並不知道“募”是“纂”（選）的誤字，但是根據上下文義猜出了這個字的正確含義，正可以印證我們的說法。

《吳子·圖國》：

古之明王必謹君臣之禮……簡募良材，以備不虞。昔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晉文召為前行四萬以獲其志，秦繆置陷陳三萬以服鄰敵。

這一段裏的“簡募”和“募士”，也應該是“簡纂（選）”和“纂（選）士”之誤。《吳子兵法注釋》把這兩處的“募”字解釋為招募，是不正確的。

《群書治要》卷三一引《六韜·龍韜》：

士卒不募而法鬼神

《尉繚子·戰威》有“武士不選則衆不强”之語。《龍韜》的“不募”顯然是“不纂（選）”之誤。

俞樾《諸子平議》認為古書裏有的“募”字和“慕”字，應是與“選”字聲近義通的“纂”字的形誤。《管子·心術下》“慕選者，所以等事也”，《平議》：“慕乃纂字之誤。《詩·猗嗟》篇‘舞則選兮’，毛傳訓選為齊……韓詩作‘舞則纂兮’，蓋選與纂聲近而義通。此云‘纂選者，所以等事也’，正以纂、選之義並為齊也。”《荀子·王制》“案謹募選閱材伎之士”，《平議》：“募乃纂字之訛……纂、選皆具也……閱亦具也……是纂、選、閱三字同義。”《荀子·議兵》“故招近募選，隆執詐，尚功利，是漸之也”，《平議》：“楊注曰：‘近當為延。’是也。招、延二字同義，則募、選二字亦必同義。募乃纂字之誤。纂、選皆具也。”從字形上看，《荀子》的“募”字其實更可能是由“纂”字訛變的。

如果上引俞氏之說可信，在古代，“纂”或其他从“算”聲的字除了假借為“選”以外，還可以假借來表示另一個與“選”字聲義皆近的詞。我們認為與其說這個詞是“纂”，還不如說這個詞是“銓”。至於《韓詩》的“纂”，可以直接看作“選”的異文。“選”、“纂”、“銓”古音都很相近。不過我們又懷疑《荀子·王制》的“募選閱”本作“纂閱”，讀為“選閱”，讀者或注“選”字於“纂”字之旁，後人不察抄入正文，“纂”字又訛變為“募”，遂形成今本之文。三個同義字疊用，在古書中雖有其例，畢竟少見，“纂（選）閱”不是比“纂選閱”更合於語言習慣嗎？上引《議兵》文，“隆執

詐”、“尚功利”都是三字句，“招近募選”有沒有從三字句誤衍而成的可能呢？似乎也不是沒有考慮餘地的。

在秦漢文字資料表現出來的書寫習慣方面，要注意某兩個或某幾個字的寫法特別容易相混的現象，例如前人所指出的“土、士、出”，“十、七”，“吉、告”，“脩、循”等等。這些在秦漢人筆下寫法非常相近的字，也就是古書裏互訛之例最多的字。在前人的校勘學著作中可以找到大量校正這類形近誤字的實例，所以我們在這方面就不準備多談了。下面只舉“私”、“和”相混的例子簡單說明一下。

秦漢文字裏“私”、“和”二字的寫法非常接近。“私”字的右旁往往寫得跟“口”字差不多，^④很容易看成“和”字。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第319行“私內中”的“私”字（102頁），當釋文在《文物》上初次發表時就是釋作“和”字的。事實上漢代人自己就往往把這兩個字弄混。例如馬王堆帛書《十大經·正亂》把“和”字寫成“私”，^⑤武威簡本《儀禮·有司》第57、58號簡都把“私”寫作“和”。由於這些例子的啓發，我們發現了《禮記》的一個錯字。

《禮記·表記》：

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守和”意思不明確，而且跟“正百官”、“慮四方”不相配。這個“和”應該是“私”的誤字。君主私事、百官之事、四方之事，三者由近及遠，所以分別由邇臣、宰、大臣掌管。鄭玄注“和謂調和君事者也”，可見所據本此字已誤（《十講》編按：王念孫《讀書雜誌·管子第三》指出《法禁》篇“莫敢布惠緩行，脩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句的“和親”爲“私親”之誤。同書《荀子第七》指出《正名》篇“其爲天下名，其和樂少矣”句的“和樂”爲“私樂”之誤。此皆“私”訛作“和”之例）。

秦漢時代的書寫習慣，還有一點應該注意，那就是表示重文的方法。在周代金文裏，重文通常用重文號“=”代替，而且不但單字的重複用重文號，就是兩個字以上的詞語以至句子的重複也用重文號。秦漢時代仍然如此（就抄書而言，其實直到唐代都還常常如此）。例如武威簡本《儀禮·甲本服傳》“婦=人=不=貳=斬=也=者何也”（21至22號簡），應讀爲：“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貳斬也者，何也？”知道了古人表示重文的習慣，就可以糾正古書裏與重文有關的一些錯誤。我們在《論衡札記》裏曾指出《卜筮》篇“占之不審吉凶，吉凶變亂，變亂，故太公黜之”，本當作“占

^④ 見《漢印文字徵》7·9下“私”字。

^⑤ 《經法（馬王堆漢墓帛書）》61、63頁。

之不審吉=凶=變=亂=故太公黜之”，⁴⁹應讀爲“占之不審，吉凶變亂。吉凶變亂，故太公黜之”。下面再舉幾個與重文有關的校勘實例。

《素問·刺瘡》：

足陽明之瘡，令人先寒，洒淅洒淅，寒甚久乃熱。

“洒淅洒淅”形容人身上發冷，《素問》與《靈樞》中還有“洒洒”、“淅淅”、“淅然”等同類詞語。按照漢語習慣，“洒淅”重疊時應作“洒洒淅淅”，而不應作“洒淅洒淅”。由於“A=B=”一類重文格式既可讀爲“AABB”，也可讀爲“ABAB”，就產生了上述錯誤（《十講》編按：《詩·召南·羔羊》“委蛇委蛇”《釋文》：“沈讀作委委蛇蛇也。”此即同一“A=B=”，或讀作“ABAB”，或讀作“AABB”之例）。

《韓詩外傳》卷六（據四部叢刊本）：

築城而居之，別田而養之，立學以教之，使人知親尊親尊。

“親尊親尊”本當作“親親尊尊”，這也是誤“AABB”爲“ABAB”的例子。汪繼培《潛夫論箋》指出《潛夫論·慎微》“鄂譽鄂譽”當作“鄂鄂譽譽”，與此同例。

《莊子·庚桑楚》：

此四六者不蕩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

這一段話也見於《呂氏春秋·有度》，文字稍有出入，“靜則明，明則虛”二句，《有度》作“靜則清明，清明則虛”。兩相比勘，可知二書皆有脫誤。未誤之文當作“靜則清=則明=則虛”，讀爲“靜則清，清則明，明則虛”。《庚桑楚》的抄寫者大概由於“清”字、“明”字前都有則字，一時疏忽誤接“靜則”於“明”，或誤接“靜”於“則明”，以致抄脫帶重文號的“清”字和一個“則”字，而成今本之文。《有度》篇文當是先抄脫“明”上“則”字而成“靜則清=明=則虛”，又按照重複雙字的重文讀法（即A=B=ABAB），讀成今本之文。

關於利用秦漢文字資料校讀古書的例子，就舉到這裏爲止。

通過以上這些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到，考古發現的古代文字資料，對於校讀傳世的先秦秦漢古籍，的確有極其重要的意義。這些資料能夠幫助我們解決傳世古書裏一些本來無法解決的，甚至根本就發現不了的問題，能夠幫助我們檢驗前人校讀古書的成果，決定一些聚訟紛紜的問題的是非。反過來說，如果在先秦秦漢古籍的

⁴⁹ 《文史》第五輯 241 頁（《新探》編按：已收入本書）。

整理注釋工作中不重視有關的古代文字資料,就會影響工作的質量,甚至犯一些不應有的錯誤。當然,我們的意思並不是說古代文字資料能解決古書裏的一切問題。已經發現的可以用來校讀古書的古代文字資料,在數量上比起傳世古書來還是少得可憐,在內容上也有很多需要傳世古書幫助解讀或糾正錯誤的地方。但是不管怎麼樣,對這些資料的重要性還是應該有充分的估計。就目前古籍整理注釋工作的實際情況來看,的確還比較普遍地存在着對這些資料重視不夠的傾向。希望這種傾向能很快扭轉過來。

最後還應該申明一點。我們在舉例的時候指摘了王念孫、段玉裁、孫詒讓等大師的個別疏失之處。這並不說明他們不高明。我們看到的很多古代文字資料,是他們根本不知道的。如果段玉裁看到了秦律,就決不會再根據《九章算術》去改《說文》了。並且,在整理研究新的古代文字資料的過程裏,一方面固然會發現一些可以用來修正他們的說法的資料,另一方面也會發現一些能為他們的說法提供證據的資料。尤其是王念孫,他在沒有版本根據的情況下得出的校勘上的結論,往往與地下發現的古本冥合,其卓識實在值得欽佩。由於篇幅的限制,我們在這裏無法具體談這些問題了。

附記:

此文蒙朱德熙先生審閱、修改,謹致謝忱。

1980年5月20日

原載《中國社會科學》1980年5期,又載《古代文史研究新探》、《裘錫圭自選集》、《雪泥鴻爪——浙江大學古籍所建所二十周年紀念文集》(中華書局,2003)、《中國出土古文獻十講》,今據《中國出土古文獻十講》收入。

談談地下材料在先秦秦漢 古籍整理工作中的作用

20 世紀 20 年代，王國維提倡在古史研究中應用“二重證據法”，即以“地下之新材料”檢驗補充“紙上之材料”（見《古史新證》）。其精神對古籍整理工作同樣是適用的。我們在整理那些年代久遠的傳世古籍的時候，應該儘量利用各種地下材料，其中包括考古發現的各種古籍抄本、其他各種古代文字資料以及文字之外的各種有關考古資料。對於先秦秦漢古籍的整理來說，這一點尤其重要。過去已經有不少學者注意於此，而且做出了不少成績。但是就古籍整理工作的現狀來看，似乎還存在着對地下材料不夠重視的傾向。爲了引起對這個問題的注意，作者曾寫過《考古發現的秦漢文字資料對於校讀古籍的重要性》一文（見《中國社會科學》1980 年 5 期，以下簡稱“重要性”）。現在寫這篇短文也是出於同樣的目的。

在傳世先秦秦漢古籍的整理工作中，地下材料所能起的作用可以粗分爲兩方面：一、有助於研究古籍的源流，包括古籍的成書時代和過程、資料來源以及篇章的分合變化等問題。二、有助於古籍的校讀，如校正文字、闡明詞義文義等等。所謂“校讀”，本來也可以包括第一方面的研究工作，我們爲了行文的方便把這個詞的意義縮小了。以下分別舉例說明地下材料在這兩方面的作用。

—

地下材料對於解決聚訟紛紜的先秦古籍的時代問題，有極其重要的作用。

地下發現的甲骨卜辭和銅器銘文等資料，是絲毫未經後人竄改的商周時代文獻。有些傳世古文獻，可以通過在用詞、行文和思想、內容上，跟這些地下古文獻作對比，而大致確定其真實時代。例如通過跟西周春秋銅器銘文作對比，我們可以相信《尚書》中《周書》的大部分（自《大誥》以下各篇），雖然其文字在不斷傳抄刊刻的過程中已經出現了不少訛誤，但是大體上還保持着“原件”的面貌。《商書》用詞

行文的習慣往往與甲骨卜辭不合。如《盤庚》喜歡用“民”字，在卜辭裏却還沒有發現過同樣用法的“民”字。但是《商書》各篇所反映的思想以至某些制度却跟卜辭相合。看來，它們（《湯誓》也許要除外）大概確有商代的底本為根據，然而已經經過了周代人比較大的修改。至於《虞夏書》各篇，就顯然是後人的擬作了。郭沫若曾指出，在西周春秋銅器銘文裏總是以“妣”與“祖”配，“考”與“母”配（《詩經》亦同），“可知考妣連文……當係戰國時人語”。而《堯典》却有“百姓如喪考妣三載”之語，其成書時代便可想而知了（《甲骨文字研究·釋祖妣》）。

非文字的考古資料，對於判斷古籍成書時代同樣很重要。《尚書·禹貢》所記梁州貢品中有鐵。從考古發掘看，鐵要到春秋後期才開始比較普遍地使用。《禹貢》成書時代的上限當不能早於春秋（參看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有的考古工作者把《儀禮》的《士喪禮》、《既夕禮》所記的隨葬器物的組合形式，跟考古發掘中所見的實際情況對比，認為《儀禮》反映的大約是戰國初期的情況（陳公柔《士喪禮、既夕禮中所記載的喪葬制度》，《考古學報》1956年4期）。這對於判斷《儀禮》的成書時代顯然是很有幫助的。

也有一些過去被認為是後人依託的作品，通過跟地下材料的對比，證明是可靠的史料。例如自宋代以來，很多人認為《逸周書》是戰國時代或“戰國秦漢之間”的作品（見《偽書通考》）。現在看來，這部書的內容比較複雜。其中既有大量戰國人的依託之作，也有一些可靠的西周文獻。如《世俘》、《商誓》兩篇當作於周初，價值決不在《尚書》中屬於周初的幾篇之下。《世俘》記武王征伐四方，殺死大量敵人，又用商紂等人的首級祭祀宗廟。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文人學士認為這是後人對武王的誣蔑。《世俘》又記武王用大量犧牲祭神，也被認為是夸飾之辭。其實這些正反映了殷周時代的實際情況（某些數字可能有夸大），不是這個時代的人恐怕連想也想不出來。郭沫若、顧頡剛等人都曾指出過《世俘》的可信。《世俘》有關於武王狩獵的一段記載：

武王狩，禽（擒）虎二十有二、貓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麋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羆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麋十有六、麝五十、麋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據《集訓校釋》本）

我們可以把它跟甲骨卜辭裏關於商王狩獵的記載對比一下：

戊午卜，殼貞：我獸（狩）斂，禽（擒）。之日獸（狩），允禽，獲虎一、鹿卅□、
狂百六十四、麋百五十九……
合 10198 正

二者的文例極為相似。《世俘》關於人祭的記載也與卜辭相近,不是後人所能臆造得出來的(參看拙作《釋“勿”“發”》,《中國語文研究》2期)。

在某些成書時代較晚的作品裏,有時也可以找到跟時代很早的地下材料相合的資料。例如《山海經》的主要部分和《堯典》大概都是在戰國時代成書的,但是甲骨文所記的四方神名和四方風名,却見於《山海經》,並以一種經過改造的形式編入《堯典》(看胡厚宣《釋殷代求年於四方和四方風的祭祀》,《復旦學報(人文科學)》1956年1期)。見於甲骨卜辭的商先公“王亥”,也只有《山海經》保存了這個名稱的原來寫法。由此可知成書時代較晚的作品,有時也能給我們提供來源很古的寶貴資料。但是如果離開了地下資料,就很難在這方面作出正確的判斷了。

有些傳世的先秦古籍,如《晏子》、《尉繚子》、《六韜》等,曾被很多人懷疑為秦漢以後人的作品。在70年代前期,這些書的西漢前期竹簡抄本在臨沂銀雀山漢墓裏發現,因此很多懷疑之說就不攻自破了。例如傳世的《晏子春秋》,宋代的陳振孫就懷疑它不是《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晏子》本書。清人管同甚至懷疑是“六朝人爲之者”。梁啟超認為其依託年代或在漢初(《偽書通考》)。近人還有主張是秦代作品的。1972年在銀雀山漢武帝初年的墓葬裏,發現了《晏子》的部分抄本,文句與今本大同小異。可見陳振孫、管同的懷疑完全不能成立。從抄本字體看,其時代略早於墓葬,當屬西漢前期。我們知道,從一部書的開始出現到廣泛傳抄,通常總要經歷一段不太短的時間。西漢前期既然已經在傳抄《晏子》,可以想見這部書的出現大概不會晚於戰國,把它定為秦或漢初作品,仍嫌太晚。銀雀山漢墓還發現了《尉繚子》和《六韜》(在漢代當包括在《藝文志》所著錄的《太公》內)的部分篇章的西漢前期抄本。這兩部書基本上也應該是戰國時代作品。

《鶡冠子》也是一部時代有爭論的書。有人相信它是戰國作品,有人則認為“是書決為後人偽託”(《偽書通考》)。1973年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西漢前期抄寫的帛書《老子乙本卷前佚書》(其著作時代當在戰國),有很多與《鶡冠子》相同或相似的文句(看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經法》)。如果《鶡冠子》為漢以後人所偽託,這一現象就難以解釋了。看來認為此書是戰國時作品的意見大概是正確的。

銀雀山和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古書抄本,對於研究某些古籍的資料來源、形成過程以及篇章的分合變化,也有重要價值。

例如這兩個墓出土的古佚書裏,有不少與《管子》有密切關係的內容。有的與《管子》某些篇章的思想相合,有的連文字也相同。特別是銀雀山漢墓所出的《王兵》篇,其全部內容錯見於《管子》的《參患》、《七法》、《地圖》、《兵法》等篇,文字基

本相同。經過對比研究,證明《參患》等篇是由《王兵》或與《王兵》相似的作品,加上其他一些作品改編而成的(看《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王兵〉篇釋文》,《文物》1976年12期)。對於研究《管子》的資料來源和成書過程,這些佚書顯然十分重要。在這兩個墓出土的古佚書裏,還發現了不少可能是《淮南子》所從取材的作品。

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老子》甲乙兩本和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竹簡本《晏子》,為研究這兩部書的篇章的分合變化提供了重要資料。帛書《老子》的兩種本子“都是《德經》在前,《道經》在後,次序與通行本相反,而與《韓非子·解老》及嚴遵《道德指歸》相合(《十講》編按:以爲《解老》及《指歸》所據之《老子》亦以《德經》居前,是帛書《老子》出土後學者間很流行的意見,但其實證據不足,此處“而與”以下一句當刪。《指歸》原本當仍以《道經》居前,請看李學勤《嚴遵〈指歸〉考辨》,已收入其《古文獻叢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出版)。通行本分八十一章,帛書乙本不分章,甲本有些段落前有圓點標誌,由此可以看出古今本段落分合的某些異同”。通行本有些章的位置與帛書本不同。凡不同之處,帛書本的順序都比通行本合理(《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出版說明”)。銀雀山簡本《晏子》為未經劉向整理之本,存16章,分見於今本8篇之中。各章都沒有今本的章題。今本《問上》第20、21兩章,《問下》第22、23兩章,簡本都連為一章。

如果對馬王堆帛書和銀雀山竹書作深入的研究,在古籍源流方面一定能得到很多新的收穫。

二

下面舉例說明地下材料在校讀古籍方面的作用。先舉用甲骨、金文等先秦古文字資料校讀《尚書》、《詩經》等古籍的例子。甲骨、金文資料的時代與《詩》、《書》相同或相近,所以常常可以用來校正《詩》、《書》的文字,闡明《詩》、《書》的文義。在這方面,近代、現代的學者已經取得了不少成就,我們只能擇要談一談。

《尚書·大誥》稱文王為“寧王”(亦見《君奭》),稱先人為“前寧人”。舊時於“寧”字無確解。清末的吳大澂和孫詒讓等人指出金文“文”字多从“心”,字形與“寧”相似,上舉這些“寧”字當是“文”字的誤釋(見吳氏《字說》、孫氏《尚書駢枝》。《新探》編按:此處原文所述有不妥處,已略作刪改。關於這一校勘學上的問題,請參看已收入本書的《談談清末學者利用金文校勘〈尚書〉的一個重要發現》)。

西周銅器銘文常稱史官爲“作冊”。《尚書·洛誥》“王命作冊逸祝冊”。逸是人名，作冊是他的官職。舊時不明作冊之義，以“王命作冊”爲句，把“作冊”看作王所命令進行的事。孫詒讓在《古籀拾遺》（下7頁）和《周禮正義》（《春官·內史》）裏才指出作冊是職名。孫氏在這個問題上也是受金文啓發的（參看王國維《書作冊詩尹氏說》，《觀堂別集》卷一）。

王國維在利用銅器銘文校讀《詩》、《書》方面作出了較多的貢獻。例如他據史頌簋的“里君百生(姓)”，指出《尚書·酒誥》“越百姓里居”的“里居”是“里君”之誤（見吳其昌整理的王氏《尚書》講義，又見楊筠如《尚書覈詁》）；據孟鼎的“匍有四方”，指出《尚書·金縢》“敷佑四方”的“佑”當讀爲“有”；據毛公鼎、克鼎銘文中“舍命”一語的用法，指出《詩·邶風·羔裘》“舍命不渝”的“舍命”不當如鄭箋訓爲“處命”，而是“致其君命”（傳達君上命令）的意思；據蔡姑簋的“彌厥生”，指出《大雅·卷阿》“俾爾彌爾性”的“性”當讀爲“生”，“彌生”就是長命的意思（《十講》編按：孫詒讓《古籀拾遺》卷中23頁下—24頁上已指出金文之“彌生”與《詩》之“彌性”同，但未指出“彌性”應讀爲“彌生”）；據不斚簋的“女肇誨于戎工”，指出《大雅·江漢》“肇敏戎公”的“公”當讀爲“工”，“戎工”就是兵事的意思（以上見《與友人論詩書中成語書二》，《觀堂集林》卷二）。他又據不斚簋“女及戎大韋（敦）戣”，指出《大雅·常武》“鋪敦淮漬”和《魯頌·閟宮》“敦商之旅”的“敦”都應該當“迫”、“伐”講（見《不斚敦蓋銘考釋》，收入《觀堂古金文考釋五種》）。《新探》編按：孫詒讓在《古籀餘論》卷三裏已經指出“韋戣”即《詩》之“鋪敦”，“謂迫笮搏伐之也”。《逸周書·世俘》“武王遂征四方，凡憇國九十有九國”，“憇”也應讀爲訓“伐”的“敦”。此例王氏未舉，後來郭沫若在《奴隸制時代》裏指了出來。

王國維還由於在甲骨卜辭裏發現了商先公“季”、“王亥”、“王恆”等名，把《楚辭·天問》中從來不得其解的“該秉季德”、“恆秉季德”等語也講通了（《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觀堂集林》卷九）。

《詩經》裏有“以介眉壽”（《豳風·七月》）、“以介景福”（《小雅·楚茨》）、“以介我稷黍”（《小雅·甫田》）等語。舊時於“介”字不得其解。林義光受到銅器銘文中屢見的“用句眉壽”、“用祈句眉壽”等語的啓發，指出《詩經》裏的這些“介”字應讀爲“句”（丐），當祈求講（《詩經通解》）。《十講》編按：清代金文家如徐同柏、方濬益已知金文之“句”即《詩經》之“介”，但未能指出“介”當讀爲句求之“句”。

《尚書·洛誥》“王賓殺裡咸格”，“王賓”之義舊無確解。郭沫若據甲骨卜辭中常見的“王賓某某（先人名……）”、“王某賓某某……”一類祭祀卜辭，指出《洛誥》

“王賓”之“賓”當讀爲《禮運》“饋鬼神”之“饋”，指成王饋文王、武王（《卜辭通纂》39片考釋）。《洛誥》上文說：“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歲”也是卜辭常見的祭名，如“丙辰卜，歲于祖己牛”。《洛誥》“歲”字也應與卜辭同義，舊注解此字亦誤（參看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毛公鼎考釋）。

于省吾利用銅器銘文校讀《尚書》，也有較多收獲。例如他受到銅器銘文借“俗”、“谷”等字爲“欲”的啓發，讀《康誥》“裕乃身不廢在王命”的“裕”爲“欲”；據匜侯旨鼎“匜侯旨初見事于周”之文，讀《康誥》“……見士于周”之“士”爲“事”（皆見《尚書新證》）。

于先生還據甲骨卜辭讀《大誥》的“今蠢今翼日”爲“今春今翌日”（《歲時起源初考》，《歷史研究》1961年4期），這大概也是正確的。卜辭常用“今翼”爲記時之詞。有一條卜辭說：“自今春至今翼，人方不大出”（《吉林大學所藏甲骨選釋》第3片，見《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63年4期），《大誥》的“今春今翼日”可能與“自今春至今翼”意近。“今翼（翌）”的確切含義尚待研究。

甲骨卜辭還對闡明見於《國語》的“大采”、“少采”二詞的意義起過作用。《國語·魯語》：“是故天子大采朝日……日中考政……少采夕月……日入監九御……”。舊時認爲“大采”、“少采”就天子朝日夕月時的服飾而言，文義難通。甲骨卜辭記一天中不同時段的詞裏有“大采”、“小采”（“小”、“少”古通）。董作賓在《殷曆譜》裏研究商代記時法的時候，以卜辭與《國語》互證。由此大家才明白《國語》裏的“大采”、“少采”跟同段文字裏的“日中”、“日入”一樣，也是說明天子進行活動的時間的（“大采”、“小采”似與朝、暮相當，參看《殷虛卜辭綜述》）。

我們在整理和普及《詩》、《書》等古籍的時候，對學者們用古文字資料進行校讀而取得的成就應該儘量利用。

下面再談談考古發現的秦漢文字資料對校讀古籍的作用。前面已經提到過的《重要性》一文是專門討論這個問題的，讀者可以參閱。這裏只準備稍作補充。

漢墓裏發現的那些尚有傳本的古書的抄本，是校正這些古書今本文字訛誤的重要依據。我們在《重要性》裏已經指出銀雀山簡本《孫子》發表以後，整理今本《孫子》的學者並沒有充分加以利用。銀雀山簡本《尉繚子》也遭到了類似的命運。

《銀雀山簡本〈尉繚子〉釋文（附校注）》已在《文物》1977年2、3兩期發表。1979年中華書局出版的華陸綜的《尉繚子注譯》參考了簡本，但是對今本顯然不如簡本的某些文句，卻沒有用簡本來加以校正。《兵談》篇兩處與“暴甲”有關的文字，是比較典型的例子。下面先把《尉繚子注譯》本、《群書治要》所引本和簡本的

有關文字對照列出,然後再作說明:

(1) 注譯本:富治者,民不發軔,(車)[甲]不出暴(原注:甲原作車,從鄂局本改),而威制天下。

治要本:且富(據簡本,此二字應作“富且”)治之國,兵不發刃,甲不出暴,而威服天下矣。

簡本:夫治且富之國,車不發□,甲不出罽,威□天下。

(2) 注譯本: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陳而勝者,將勝也。

治要本:暴甲而勝,將勝也。戰而勝,臣勝也。

簡本:罽甲而勝,主勝也。陳而勝,主勝也。戰勝,臣□也。

先看第一例。簡本校注據《淮南子·兵略》“故得道之兵車不發軔……”之語,將簡本“車不發□”句缺文補為“軔”,指出今本“民不發軔”之“民”為“車”字之誤。軔是阻止車輪轉動的木頭,“車不發軔”跟“甲不出罽”是對文,今本作“民不發軔”顯然是不合理的。但是《注譯》却不取校注之說,把“發軔”解釋為“動用”,把“民不發軔”譯為“不必動員老百姓”。這在訓詁上是缺乏根據的。

校注又指出:“簡文‘罽’字當讀為‘囊’,‘罽’字古有‘皋’音,或作‘罽’。‘皋’、‘囊’通。《禮記·樂記》‘名之曰建囊’,鄭注:‘兵甲之衣曰囊’。《尉繚子·兵教下》‘國車不出於闔,組甲不出於囊(此字據宋刻武經七書本,《注譯》從別本作“囊”,非是),而威服天下矣’,文義與《兵談》此句全同,可證‘罽’確為‘囊’之借字。《治要》及宋本皆誤‘罽’為‘暴’,宋本又誤‘甲’為‘車’……”(《文物》1977年2期23頁)。《注譯》雖然據鄂局本改“車”為“甲”,却並不認為“暴”是訛字,可能是覺得校注的論據不够充分。其實古書中“罽”字讀“皋”之例很常見。姚本《戰國策·秦策三》“五國罷成罽”章及“范雎至秦”章“舉兵而攻滎陽則成罽之路不通”,都把成皋寫作成罽。《左傳·哀公二十六年》所記越大夫皋如,《春秋繁露》卷九作“大夫罽”。《荀子·大略》:“孔子曰:‘望其壙,皋如也……’。”皋如,《列子·天瑞》、《家語·困誓》皆作“罽如”,《列子釋文》“罽音皋”。《荀子·王霸》:“罽牢天下而制之。”罽牢,《後漢書·馬融傳》“皋牢陵山”李賢注引作“皋牢”。可見《顏氏家訓·書證》所說的“‘皋’分‘澤’片”由來已久(將讀作“皋”的“罽”寫作“皋”以示區別,是比較晚的現象)。“皋”、“囊”同音。《集韻》以“韓”為“囊”字異體。《左傳·莊公十年》“蒙皋比而先犯之”,杜注:“皋比,虎皮”,《正義》:“《樂記》云: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囊。……而其字或作‘建皋’,故服虔引以解此。”“建

囊”或作“建皋”，是二字古通的明證。所以校注將簡文的“罽”讀爲“囊”，是有相當充分的根據的。《禮記·檀弓下》“赴車不載囊輶”注及《禮記·少儀》釋文都說：“囊，甲衣也。”“甲不出囊”就是鎧甲不必從套子裏取出來使用的意思。無論從“甲不出罽”跟“車不發軔”的對文關係來看，或是把《兵教下》的“國車不出於閭，組甲不出於囊”跟“車不發軔，甲不出罽”對照起來看，把“罽”讀爲“囊”釋爲甲衣，都是合適的。“罽”、“暴”二字形近易混。《史記·穰侯列傳》“戰勝暴子”，《戰國策·魏策三》作“戰勝罽子”。《治要》和宋本的“暴”字顯然是“罽”的形近訛字。

從上舉第二例，更可以明顯地看出“暴”是“罽”（囊）的訛字。“囊甲而勝”就是不必取出兵甲打仗就能勝利的意思，所以說這是君主之勝，而不是臣下之勝。“罽甲”訛作“暴甲”，意思正好相反，文義就不可通了。因此宋本就在“暴”上臆加一個“不”字。這個“不”字《治要》所據本還沒有，顯然是後加的。校注還對照各本，指出此段原文當作“罽（囊）甲而勝，主勝也。陳而勝，將（此字或當仍從簡本作“主”）勝也。戰勝，臣勝也”。這也是合理的。今本顯然脫落了“戰勝，臣勝也”一句。但是《注譯》對校注的這些意見都沒有採取。

在《孫子》、《尉繚子》之外，漢墓出土的其他古書抄本，在校正今本文字方面也都有重要價值。限於篇幅就不再舉例了。

在《重要性》裏，我們曾舉過一個用睡虎地秦簡《編年記》校正《史記》脫文的例子。但是對於校正脫文以後對《史記》所記內容能有進一步理解這一點，沒有加以說明。現在在這裏補說一下。

《重要性》已經指出，秦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注，根據《編年記》昭王三十三年“攻蔡、中陽”條，以及《史記·六國年表》和《魏世家》關於此年秦拔魏四城的記載，看出《秦本紀》記此年“客卿胡傷攻魏卷、蔡陽、長社”之文有誤，疑“蔡陽”原當作“蔡、中陽”，是正確的。但是整理小組注認爲蔡即上蔡，却有商榷餘地。上蔡從春秋後期開始一直屬於楚國，秦拔魏四城怎麼會有上蔡呢？並且《秦本紀》所記四城先後次序是有意義的。卷在今原武附近，中陽在鄭州、中牟之間，長社在長葛附近。由卷到中陽，到長社，都是由北向南，夾在卷和中陽之間的蔡怎麼反而會跑到長社之南很遠的地方去呢？這個蔡最可能是祭國故地。“蔡”从“祭”聲，二字古代可通。祭在今鄭州東北，與中陽非常接近，所以《編年記》把攻蔡和中陽當作一件事記下來，而沒有提到卷和長社。秦攻下四邑後，次年就擊芒卯於華陽。華陽在今新鄭附近。四邑南北連成一綫，把大梁與華陽的交通切斷。取四邑正是爲華陽決戰作準備。如果沒有秦簡出土，我們不但無法校正《史記》脫文，而且對當

時的形勢也不可能看得這樣清楚。

即使不牽涉文字的校正,考古發現的秦漢文字資料也能够幫助我們弄清楚古書裏的很多問題。在《重要性》裏已經舉出了這方面的一些例子。這裏再補充二例。

一、五行 《荀子·非十二子》責罪子思、孟軻“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楊倞注:“五行,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近人多不相信楊說。儒家的五行究竟指什麼,成為學術史上的一個懸案。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卷後古佚書》的第一篇專講儒家的五行說,所謂五行是“仁、義、禮、知、聖”。帛書整理小組指出:“《孟子·盡心下》:‘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由帛書可知此即孟軻之‘五行’說。《新書·六術》:‘人有仁義禮智聖之行,行和則樂,與樂則六,此之謂六行’,顯然由此說推衍。”(1980年精裝本《馬王堆漢墓帛書〔壹〕》24—25頁注②。此書是在1975年年中發稿的。上引注文主要內容已見於1975年1月出版的綫裝大字本)這應該是正確的。由此可知楊倞注基本可信,只是他錯以“信”代“聖”了。如果沒有帛書,這個懸案恐怕很難解決。

二、司寇 《新書·階級》:“若夫束縛之,係綹之,輸之司空,編之徒官,司寇、牢正、徒長、小吏罵詈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漢代的職官沒有叫“司寇”的,只有一種刑徒叫司寇。但是司寇如果本身是刑徒,又有什麼資格去罵詈榜笞別的刑徒或罪人呢?睡虎地秦簡出土後,這個問題才得到解決。秦簡《秦律十八種》的《司空律》有如下一條:

毋令居貲贖責(債)將城旦舂。城旦司寇不足以將,令隸臣妾將。居貲贖責(債)當與城旦舂作者,及城旦傳堅、城旦舂當將司者,廿人,城旦司寇一人將。司寇不踐(此字與“足”同義),免城旦勞三歲以上者,以爲城旦司寇。(《睡虎地秦墓竹簡》89頁)

可見秦代是用司寇這種輕刑徒來“將司”,即率領監督城旦舂等重刑徒以及與城旦舂一起勞動的“居貲贖責”者的。賈誼的時代去秦未遠,當時一定還存在與此類似的制度,所以司寇可以跟牢正、徒長、小吏一起罵詈榜笞其他刑徒或罪人。

上引《新書》那段文字也見於《漢書·賈誼傳》,文字略有出入。“輸之司空”句作“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王念孫認爲《漢書》的兩個“司寇”本來都應作“司空”,《新書》的那個“司寇”本來也應作“司空”,當是“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讀書雜誌·漢書第九》)。現在看來,《漢書》的前一個“司寇”確

實應據《新書》改爲“司空”，後一個“司寇”與《新書》相合，是正確的。王氏之說無據。

我們在《重要性》裏曾說，在校讀古籍方面，地下發現的文字資料一方面固然提供了一些可以用來糾正舊說的證據，一方面也提供了一些能證實舊說的證據。下面我們舉幾個後一類的例子。

《商書》有《高宗彤日》篇。舊時都以爲“高宗彤日”是指高宗（即武丁）祭祀祖先，只有宋代金履祥《尚書表注》認爲是指後人祭祀高宗。甲骨卜辭中屢見“丙申卜貞：王賓大丁多（彤）日，亡尤”一類祭祀卜辭，“多日”之前必爲受祭人名，證明金氏的說法是正確的（參看王國維《高宗彤日說》，《觀堂集林》卷一）。

《重要性》和現在這篇文章根據新出資料指出了王念孫在校勘上的個別失誤。其實證明王氏正確的新出資料要比證明王氏錯誤的新出資料多得多。朱德熙先生整理銀雀山簡本《晏子》時，就發現王氏《讀書雜誌》校《晏子》的意見往往與簡本冥合。這裏舉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晏子·內篇諫下十八》：“古者之爲宮室也，足乎以便生，不以爲奢侈也，故節于身謂于民。”《讀書雜誌·晏子春秋第一》：“‘謂’當爲‘調’，形相似而誤也……《鹽鐵論·遵道》曰：‘法令調於民而器械便於用’，文義與此相似……。”簡本此字正作“調”。王氏毫無版本根據，主要由於《鹽鐵論》的啓發就得出了正確的結論。這是何等的卓識。

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的出土，使我們得以糾正《史記》等書在蘇秦的時代以及與他有關的史事上的一系列錯誤。這是戰國史研究上的一大收穫（看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戰國縱橫家書》）。不過在此以前，有的學者已經通過對傳世戰國史料的研究，在這方面得出了一些與新材料基本相合的結論。如唐蘭《蘇秦考》（《文史雜誌》1卷12期）、徐中舒《論〈戰國策〉的編寫及有關蘇秦諸問題》（《歷史研究》1964年1期）等文，就做了這樣的工作。所以《戰國縱橫家書》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證實舊說的新材料。

最後還想強調一下，非文字的考古資料對讀古書也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古書中提到的各種器物的形制和喪葬等制度，如果沒有有關的考古資料，恐怕有很大一部分是永遠也搞不清楚的。就拿戰國以後古書中常見的“卮”這種最普遍的飲器來說吧。如果不是王振鐸先生根據大量出土實物作了精確的考證（《論漢代飲食器中的卮和甗》，《文物》1964年4期），後來又有滿城漢墓的卮燈、馬王堆和雙古堆等漢墓的漆卮陸續出土，證實了他的論斷，我們也許到今天還不知道，古代的卮的外形就類似今天常用的圓筒形搪瓷杯。又如過去認爲是古代葬制中最難懂的制度

之一的“題湊”，如果僅僅依靠書本，恐怕誰也沒法弄清它的真相。但是由於近年來考古工作者發掘了一些有題湊的大型漢墓，這個困難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先秦常用的武器——戟的形制，也曾經長期弄不清楚。在 30 年代初，郭沫若倒是僅僅通過《考工記·冶氏》關於戟制的記載，就對古代戈矛分體型的戟的形制，得出了基本正確的結論。但是也只是由於不久以後在考古發掘中獲得了實證，他的說法才被大家接受。

對於非文字的考古資料，古籍整理工作者也往往重視得不够。例如有的同志在給戰國時代的書裏的“戟”字作注的時候，就不是以考古發掘中所見的戰國戟為根據，而是以舊戲舞臺上還看得到的月牙形刃畫戟為根據的。

總之，爲了提高先秦秦漢古籍整理工作的水平，我們必須對有關的各種地下材料都給予足夠的注意。

原載《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1981 年 6 期，又載《古代文史研究新探》、《中國出土古文獻十講》，今據《中國出土古文獻十講》收入。

讀書札記九則

一、“祭 禽” 解

《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類似的文字也見於《呂氏春秋·季秋紀》和《淮南子·時則》。《月令》鄭玄注把“祭禽于四方”解釋為“以所獲禽祀四方之神”。《呂氏春秋》高誘注則說：“祭始設禽獸者於四方，報其功也，不知其神所在，故博求於四方。”《淮南子》高注同。

今按：從語法上看，把“祭禽”解釋為祭祀禽獸的精靈，似乎更好一些。林惠祥《文化人類學》：“野蠻人每殺動物常對之謝罪，這便是由於視動物為有精靈的緣故。……基伯衛人每要出獵便先舉行藥的跳舞（引者按：似當譯巫術的跳舞），以見好於禽獸的精靈。英屬哥倫比亞的印第安人當魚季到撈魚開始的時候，便先對魚兒行了禮，然後對他們說：‘你們魚兒，你們魚兒，你們都是酋長。你們是，你們都是酋長。’柬埔寨的斯堤因人以為動物也有靈魂，死後能夠游行別處，所以如殺了一個動物，怕他靈魂回來，便對他謝罪，並供奉祭獻。”（289 頁）中國古代於田獵時“祭禽”，其原始意義當亦如此。

《周禮·夏官·大司馬》：“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同書《春官·小宗伯》及《甸祝》也講到田獵後“饁獸于郊”之事：

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

《小宗伯》

師甸，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于祖禰，乃斂禽。

《甸祝》

《周禮》鄭玄注引《月令》“祭禽于四方”來解釋“饁獸于郊”。很可能“饁獸”與“祭禽”同義，就是為了謝罪以食物祭祀禽獸。（《叢稿》編按：在“饁獸”之外，見於古書的“饁”的賓語都指接受食物者，可見把“饁獸”解釋為祭祀禽獸，比解釋為以禽獸

祭神合理。《左傳·僖公三十三年》：“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杜注：“野饋曰饁。”祭禽獸在郊，故稱“饁”。近人或以為《詩·豳風·七月》、《小雅·甫田》和《大雅·大田》的“饁彼南畝”，是說祭祀農神——參看張希峰《“田畯”“后稷”考》，《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4年3期7頁，可作此說旁證。【編按：1997年9月蒙姚小鷗先生來信告知，其已故導師東北師範大學華鍾彥教授，在東北師大教務處1953年10月印出的歷史系中國史教研室《中國歷史文選》中為《豳風·七月》作注時，已結合《小雅》的《甫田》、《大田》指出，《詩》中的“田畯”應解為田神，“饁彼南畝”即是祭田神。姚先生也有《田畯農神考》一文，論及此一問題，發表在齊魯書社1986年出版的《古典文學論叢》第四輯上。姚文並指出宋人王質、近人聞一多、楊公驥皆有田畯為田神之議。】）

《禮記·郊特牲》：“蜡之祭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也許蜡祭饗禽獸本來也有謝罪於禽獸的意思，《郊特牲》的解釋是後起的。

原載《淮陰師專活頁文史叢刊》110號（1981），又載《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文史叢稿》、《裘錫圭學術文化隨筆》，今據《文史叢稿》收入。

二、說 “食”

《國語·鄭語》載史伯的話說：

若前華後河，右洛左濟，主芣騶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是可以少固。

韋昭注：

芣、騶，山名。主，為之神主，孔子曰：“夫顓臾為東蒙主。”食謂居其土食其水。

班固在《漢書·地理志》裏講到鄭國東遷時說：“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會之地，右雒左洧，食溱洧焉。”他對“食溱洧”一語的理解大概是跟韋昭相同的。但是，在史伯的話裏，“食溱洧”跟“主芣騶”是對文。“主芣騶”既然是指鄭人為芣騶的祭主，“食溱洧”就應該解釋為鄭人祭祀溱洧之神，而不應該解釋為鄭人食溱洧之水。《管子·幼官》載齊桓公九會諸侯之令說：

修春夏秋冬之常祭，食天壤山川之故祀。

安井衡注：“食，饗也，謂祭之。”許維通注：“下文‘死士不食’，王引之亦云‘食猶饗也’。《爾雅·釋天》‘春祭曰祭祠’，郭注：‘祠之言食’。凡祭皆祠，不限於春。”（皆見《管子集校》）《鄭語》和《幼官》的“食”字，用法正同。

祭鬼神可以叫做“食”，鬼神饗祭祀也可以叫做“食”。《墨子·天志下》：“何以知[天]兼愛天下之人也？以兼而食之也。何以知其兼而食之也？自古及今，無有遠靈（虛）孤夷之國皆犒豢其牛羊犬彘，絜爲粢盛酒醴，以敬祭祀上帝山川鬼神，以此知兼而食之也。”（同書《天志上》、《法儀》皆有類似之文）這裏的“食”字，以及上引《管子·幼官》許注裏提到的“死士不食”的“食”字，都是指鬼神饗祭祀而言的。

《尚書·洛誥》記周人營洛邑前占卜邑址的情況說：

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

“惟洛食”可能就是洛水之神願意饗周人的祭祀的意思。鄭人想居於溱洧一帶就要“食溱洧”。周人在洛水一帶營邑，當然先要占卜一下，問問洛水是否願意食他們的祭祀。

《墨子·耕柱》篇中有夏后開鑄鼎時的卜辭和繇辭。卜辭說：“鼎成三（三 = 四）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臧（藏），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虛，上鄉（畢沅注：疑同“尚饗”）。 ”這是卜問用鼎祭神，神是否來饗。繇辭的頭一句是“饗矣”。這就是說根據卜兆來看神是接受祭祀的。《洛誥》用“食”字，《墨子》用“饗”字，字面雖然不同，意義則是相同的，可以參照。

原載《淮陰師專活頁文史叢刊》110 號（1981），又載《古代文史研究新探》、《裘錫圭學術文化隨筆》，今據《裘錫圭學術文化隨筆》收入。

三、說“索我於枯魚之肆”

馬王堆一號漢墓遺冊 50 號：

右方索魚七牀

“索魚”指乾魚，詳朱德熙、裘錫圭《馬王堆一號漢墓遺冊考釋補正》（《文史》第九輯。《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上冊 135 頁釋“索魚”爲“縈魚”，非是）。所以稱乾魚

爲索魚，應該是由於它們通常總是穿在繩索上挂起來的緣故。《韓詩外傳》卷一：“枯魚銜索，幾何不蠹。”枯魚就是乾魚（詳下）。

《莊子·外物》篇有莊周貸粟的故事，其中包含一個與乾魚有關的寓言，大意說一條困於車轍的鮒魚要莊子救他，莊子答應說：“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聽了大怒說，我想得到斗升之水以活命，“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釋文》引李注：“（枯魚）猶乾魚也。”讀這段文字的人，幾乎都認爲最末一句的“索”字是求索的意思。如果真是這樣，這一句就應該說成“則索我於枯魚之肆矣”，不應該加上“曾不如”等語。莊周貸粟故事也見於《說苑·善說》，內容大致相同。其中相當於這一句的話是“汝即求我枯魚之肆矣”。看來寫《說苑》這一段文字的人也把《莊子》的“索”理解爲“求”。但是他由於用了“求”字，就不得不把“曾不如早”這幾個字丟掉不管了。這正好說明《莊子》的“索”字不能當“求”講。（《新探》編按：以上關於《說苑》的一段爲原文所無，是編集時增加的。）我們認爲這個“索”字正與索魚之“索”同義，就是穿在繩索上挂起來的意思。鮒魚的那句話可以翻譯爲：“像您那樣說，還不如早一點把我挂在乾魚鋪子裏算了！”古漢語名動相因。《說文·木部》“梳”字段玉裁注：“器曰梳，用之理髮，因亦曰梳，凡字之體用同稱如此。”所以，用繩索把魚穿起來、挂起來，也可以叫做“索”。

原載《淮陰師專活頁文史叢刊》110號（1981），又載《古代文史研究新探》、《裘錫圭自選集》、《裘錫圭學術文化隨筆》，今據《裘錫圭學術文化隨筆》收入。

四、說“宦皇帝”

《賈誼新書·等齊》：

諸侯王所在之宮衛，織履躡夷，以皇帝所在宮法論之。郎中謁者受謁取告，以官皇帝之法予之。事諸侯王或不廉潔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之。曰一用漢法，事諸侯王乃事皇帝也。

“官皇帝”之語古書少見。《漢書·惠帝紀》記惠帝初嗣位加恩天下，“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等齊》的“官皇帝”應該是“宦皇帝”的訛文。

“官”、“宦”形近，“宦”訛作“官”典籍常見。《國語·越語下》：“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明道本“宦”訛作“官”。《禮記·雜記下》“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閩、監、毛等本“宦”皆訛作“官”。《淮南子·脩務》、《論衡·命祿》的“官御”也是“宦御”之誤（看黃暉《論衡校釋》）。

“宦”本是爲人臣僕的意思。郎官、謁者之流本是門廊近侍，有類家臣，故以“宦”稱。《史記·張釋之列傳》：“有兄仲，同居。以訾爲騎郎，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張釋之所說的“宦”，就是指當郎官而言的。《史記·梁孝王世家》：“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這更是郎官、謁者等稱“宦”的明證，張文虎反疑“宦”爲衍文，是不對的。（《隨筆》編按：《鸛冠子·世兵》：“句踐不官，二國不定。”“官”亦“宦”字之誤。《韓非子·喻老》謂“句踐入宦於吳，身執干戈爲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可證。）

原載《文史》第六輯（中華書局，1979），又載《古代文史研究新探》、《裘錫圭學術文化隨筆》，今據《裘錫圭學術文化隨筆》收入。

五、說“遇負杖入保者息”

《禮記·檀弓下》：

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童）汪錡往，皆死焉。

鄭玄注“遇負杖入保者息”句說：“遇，見也。見走辟（避）齊師，將入保，罷（疲）倦，加其杖頸上，兩手掖之休息者。保，縣邑小城。”疲倦休息，怎麼會“加其杖頸上兩手掖之”呢？鄭說難信。此文“負杖”似與“杖負”同意，就是拄杖而負物的意思。當時魯國民窮役重，爲公家負物的服役者力不能勝，拄杖而行，所以公叔禺人見之而有“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之嘆。《左傳·哀公十一年》也記此事，“禺人”作“務人”，無“負杖”之語。傳文記公叔務人之言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我則言之矣，敢不勉乎？”語意較明白，但似乎不如《檀弓》所記近真。

原載《文史》第六輯(中華書局,1979),又載《古代文史研究新探》,今據後者收入。

六、說“河海不擇細流”

《史記·李斯列傳》載李斯的《諫逐客書》說：

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

上文的“擇”字顯然不能用它的本義來解釋。《史記會注考證》引中井積德說：“擇，揀擇而取捨也，故有取捨二義，此擇字屬捨。”此說不妥。古代“擇”、“釋”二字通用，《諫逐客書》的“擇”字應該讀為“釋”，所以有“捨”義。

古書中應該讀為“釋”的“擇”字很多。《韓非子·五蠹》：“布帛尋常，庸人不釋。”《論衡·非韓》引此句，“釋”作“擇”。黃暉《論衡校釋》引《墨子·節葬》“為而不已，操而不擇”，《易林·恆之蒙》“郊耕擇耜，有所疑止”，證明古代可以借“擇”為“釋”。《史記·貨殖列傳》：“（范蠡）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會注考證》指出：“擇人而任時，即與時逐而不責於人也。擇當作釋。《孫子·勢篇》云：‘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韓非子·難勢篇》：‘擇賢而專任勢，足以為治乎’，擇亦當作釋。”（《難勢》“擇”字當作“釋”，清人顧廣圻等已指出。《新探》編按：《史記會注考證》之說，原文失引，是編集時補入的。）《呂氏春秋·大樂》：“先聖擇兩法一，是以知萬物之情。”同書《察今》“故擇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為法”。《漢書·武帝紀》：“朕將巡邊垂，擇兵振旅。”同書《東方朔傳》：“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這些引文裏的“擇”字也都應該讀為“釋”，前人多已指出。

武威出土的《儀禮》漢簡甲本《泰射》篇第51簡及92簡（《武威漢簡》圖版15、17），“釋弓”皆作“擇弓”，第93簡“釋弓矢”作“擇弓矢”（同上圖版17）。漢印也往往以“擇”為“釋”。如人名“釋之”有作“擇之”的（《漢印文字徵》13·1“擇”字下引“王擇之印”），“釋憂”有作“擇憂”的（同上5·16“憂”字下引“番擇憂印”）。（《新探》編按：馬王堆漢墓帛書亦有以“擇”為“釋”之例，如《戰國縱橫家書》第四章“臣請歸擇（釋）事”（11頁），《五十二病方》“雖已，復傳，勿擇（釋）”（108頁）。）

總之，漢以前人時常把“釋”寫作“擇”，《諫逐客書》的“擇”無疑也應該讀作“釋”。

《韓非子·大體》有跟上引《諫逐客書》相類的文字,“釋”也寫作“擇”:

太山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故能成其富。

《韓詩外傳》卷三:“夫太山不讓礫石,江海不辭小流,所以成其大也。”“不辭小流”與《諫逐客書》的“不釋細流”同意。

《韓非子》裏還有一個可能應該讀作“釋”的“擇”字。《韓非子·外儲說右下》:

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恣欲於馬者,擅轡策之制也。……王子於期爲駟駕,轡策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

“擇欲”跟“恣欲”相對。“恣欲於馬”是說用轡策駕馭馬,使馬迫於轡策之威而完全按馭者的意欲行動。“擇欲於馬”也許應該讀爲“釋欲於馬”。“釋”字有“放”、“置”、“推”等義(參看《經籍叢詁》)。釋欲於馬,意思是說不用轡策來強制馬,而用芻水之利使馬聽話,好像把自己的意欲委之於馬一樣。

原載《文史》第七輯(中華書局,1979),又載《古代文史研究新探》、《裘錫圭自選集》、《裘錫圭學術文化隨筆》,今據《裘錫圭學術文化隨筆》收入。

七、“登立爲帝,孰道尚之”解

《楚辭·天問》:

登立爲帝,孰道尚之?

王逸注:“言伏羲始畫八卦,脩行道德,萬民登以爲帝,誰開導而尊尚之也。”

今按:王注實不可信。據近人研究,在戰國以前,“帝”一般只用來稱天神(主要是稱上帝),商代人雖有稱直系先王爲帝的習慣,如稱帝乙、帝辛,但那只是所謂“措之廟而立之主曰帝”,是廟號而非生稱。到戰國時代,隨着傳說中天帝的人王化,地上的統治者也開始作稱帝的嘗試,如齊、秦的互尊爲東、西帝。但是,直到秦始皇才真正把這個企圖實現。《天問》裏的“帝”,從文義看都應該是天帝而非人王。王逸等人把有些“帝”解釋爲天帝,有些“帝”解釋爲人王,是不正確的。屈原在問了“登立爲帝,孰道尚之”以後,緊接着就問“女媧有體,孰制匠之”。女媧造人完全是一個神話,“登立爲帝”這件事肯定也帶有神話色彩,決不會是指萬民擁立

伏羲爲帝。

《莊子·大宗師》說黃帝得道而登天：

夫道……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

《淮南子·地形》有登昆侖上天成神的神話：

昆侖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縣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

《呂氏春秋·古樂》：

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乃登爲帝，惟天之合。

這個傳說的原始形式一定也是說顓頊登天而爲神帝，而不是說他立爲人帝。

《天問》“登立爲帝”的“登”，應該跟《大宗師》和《地形》篇的“登”一樣，是指登高、登天而言的，不能按照後世登位、登基的意思來理解。“孰道尚之”也決不會像王逸所說的那樣是“誰開導而尊尚之”的意思。“道”、“導”古本一字，但在這裏不應該當“開導”講，而應該是指具體的引導，即引路而言的。“尚”、“上”古通（《儀禮·覲禮》“尚左”，鄭注：“古文尚作上。”《荀子·致士》“莫不明通方起以尚盡矣”，楊注：“尚與上同。”），“道（導）尚（上）之”就是引導之使之上天的意思。

古代流傳女媧造人的神話，但是女媧自己也有身體，她的身體又是誰造出來的呢？所以屈原問道：“女媧有體，孰制匠之？”同樣，古代流傳登天爲神的神話，但是最早登天的那個天帝又是誰把他引導上去的呢？所以屈原問道：“登立爲帝，孰道尚之？”如果像王逸那樣解釋，“登立爲帝”和“女媧有體”這兩件事放在一起來問，就顯得不倫不類了。

原載《文史》第十一輯（中華書局，1981），又載《古代文史研究新探》、《裘錫圭學術文化隨筆》，今據《裘錫圭學術文化隨筆》收入。

八、《洛誥》“其作周匹休……”新解

《尚書·洛誥》的第一部分記載了兩段話。第一段是周公遣使將關於選擇東都邑址的占卜結果報告成王之辭。第二段是成王答覆周公之辭。成王之辭全文如

下(標點據舊注):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俾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這段話裏的“其作周匹休”一句,頗為費解。《僞孔傳》把“匹休”看作動賓結構,解釋為“配天之美”,顯然不可信。

近人楊筠如《尚書覈詁》解釋此句說:“匹,詩傳配也。作周匹,謂作周輔也。召誥其自時配皇天。蓋公之作配於周,亦猶王之作配於天也。”(陝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213頁)楊氏把“匹”字解釋得很好。西周時代的單伯鐘說單伯的祖考“遼(?)匹先王”(《三代吉金文存》1·16【《集成》1·28】),牆盤也說牆的祖先“遼(?)匹厥辟”(《文物》1978年3期14頁圖二一,參看29頁【《集成》16·10175】),都用“匹”字來表示輔佐君王的意思。張政烺先生《“奭”字說》曾指出古代認為“國之重臣與王為匹耦”,“君臣遭際自有匹合之義”(《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十三本168、169頁),這是很正確的。但是楊氏對於“匹”字後面的“休”字的意義却沒有作出交代。按照楊氏對“匹”字的解釋來看,這個“休”字完全是多餘的。

我們認為這個“休”字應該屬下為句,看作動詞。“休”字古訓“美”。成王敬重周公,對於周公選擇邑址並遣使告卜之事表示贊美,所以在“公既定宅……”句之首加上一個“休”字。這種句法在西周金文裏是常見的。唐蘭先生在《西周銅器斷代中的“康宮”問題》一文中,曾對這種句子作過全面的考察。他說:

……(效父簋)說:“休王錫效父呂三,用作厥寶尊彝。”金文裏另外有匿父鼎三件,說:“休王錫匿父貝,用作厥寶尊彝。”……休是動詞,《召誥》曰:“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艱”,可證。古人多有此例,如云“魯天子之命”,魯亦動詞也。揚天子或王之魯休而稱“休王”或“魯天子”,其義一也。(《考古學報》1962年1期44頁。“休是動詞”以下一段為唐先生舊作,已見引於《兩周金文辭大系》)

他還指出,召卣“休王自穀使賞畢土方五十里”【《集成》16·10360】、虢簋“虢拜稽首休朕甸君公伯錫厥臣弟虢井五□”【《集成》8·4167】、尹姑鼎“休天君弗望(忘)穆公聖彝明□”【《集成》3·754、755】等語裏的“休”,也都是動詞(見上引文)。《洛誥》“休公既定宅……”句的“休”字,用法跟上引諸語全同。這種句法一般用於下級贊美上級的場合。周公是成王的叔父,又是周王朝當時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

成王使用這樣的句法來表示對周公的特殊尊敬，是合乎情理的。

原載《文史》第十二輯（中華書局，1981），又載《古代文史研究新探》，今據後者收入。

九、《戰國策》“觸讐說趙太后”章中的錯字

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選古文的人大都喜歡選《戰國策·趙策四》裏的“觸讐說趙太后”這一章（這篇文章亦見《史記·趙世家》）。馬王堆三號墓出土的帛書《戰國縱橫家書》裏正好有這一章，可以用來校正《趙策》的幾個錯字。

《趙策》：“左師觸讐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趙世家》作“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舊以下句“入”字屬此句，非是）。清人黃丕烈《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札記》、王念孫《讀書雜誌》都指出《趙策》“觸讐”當從《史記》作“觸龍言”。元人吳師道《補正》指出《趙策》“揖”字當從《史記》作“胥”（王念孫說同）。帛書本此句正作“左師觸龍言願見，大（太）后盛氣而胥之”（文物出版社出版《戰國縱橫家書》74頁）。得此佳證，上引諸氏之說可以視為定論了。帛書本“太后”二字不重，與《戰國策》鮑彪本相合。

《趙策》：“（左師）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耆（嗜）食，和於身也。”帛書本“和於身”作“智於身”。帛書整理小組注：“智，通知，《趙策》與《趙世家》並作和，字形之誤。《方言三》：‘知，愈也。南楚病愈者或謂之知。’這是說有益身體。”這個意見顯然是正確的。

《趙策》：“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為趙，趙主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上引末一句，《史記》作“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戰國策》鮑彪本已據《史記》改“孫”字為“侯”。帛書本此字亦作“侯”，《趙策》“孫”字肯定是誤字。帛書本此句“不善”上有“必”字，則與《趙策》同，《史記》脫去此字。上引“趙主之子孫侯者”句，帛書本無“孫”字。此句與“豈人主之子侯則必不善哉”句前後相應，“孫”字顯然不應有。而且左師見太后是為了說服太后，讓她送愛子長安君到齊國去當人質。“趙主之子侯者”正是緊扣長安君的身份說的。從這一點看，“孫”字也不應該有。《史記》此句也誤衍“孫”字，更顯出帛書本的可貴。

今後我們如果再選注《趙策》這一章，就應該據帛書本校正上述這些錯誤，不能再以訛傳訛了。

原載《文史》第十五輯(中華書局,1982),又載《古代文史研究新探》、《裘錫圭學術文化隨筆》、《中國出土古文獻十講》,今據《中國出土古文獻十講》收入。

斗卮和題湊

隨着我國考古事業的發展，先秦秦漢時代的文物（包括古書抄本）和遺跡，不斷有重要的發現。這對我們研讀先秦秦漢古籍是一個有利條件。有些古書，如《老子》、《孫子》等，現在已經有了兩千多年前的帛書本或竹書本，可以用來糾正傳世刻本的很多錯誤。古書裏使用的某些詞語，過去長期不知道它們的確切含義；提到的某些器物和制度，過去長期弄不清它們的真相。現在有了考古資料，有些問題就迎刃而解了。現舉兩個具體例子，來說明一下考古資料對研讀古籍的重要性。

先講斗卮(zhī)的問題。

《史記·項羽本紀》鴻門宴一段記樊噲闖入後，項羽賜樊噲酒食的情況說：

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啖之。

司馬遷通過飲酒、啖肉來寫樊噲置生死於度外的豪勇氣概。斗卮酒跟生彘肩為對。生彘肩就是生的豬肩，是一般人無法吃的東西，斗卮顯然不會是一般的酒杯。如果不弄清“斗卮”的確切含義，就不能很好地欣賞《史記》的這段描寫。

我們先從卮的形制講起。過去，讀古書的人雖然知道卮是戰國秦漢時代常用的一種飲酒器，却並不明白它的具體形制。60年代前期，自然科學史家王振鐸先生根據有關的文獻和考古資料，對卮的形制問題作了精密的研究，斷定漢墓中常見的一種圓筒形附環狀小把的飲酒器，就是古書中所說的卮（《論漢代飲食器中的卮和甗》，《文物》1964年4期）。1968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滿城中山靖王墓裏發現了一對銅燈，銘文自稱“卮錠”，外形正與王先生所考定的卮相合。卮的形制問題得到了徹底解決。通俗一點說，卮的形狀就跟現在最常用的那種搪瓷口杯差不多。不過古代的卮一般是漆器或陶器，器把沒有搪瓷口杯的把那樣大，通常不作耳形而作環形，器底有時還有三個小矮足。

斗卮一詞最自然的解釋，就是容量為一斗的卮。但是有沒有這樣大的圓筒形

酒杯呢？這就牽涉到古今度量衡大小不同的問題了。考古學者根據大量秦漢時代的量器和有記容量銘文的銅器，早已確定當時的一升大約相當於現在的五分之一升，斗卮的大小就跟現在二升的啤酒杯差不多，所以，這樣的卮並不是不可能有的東西。從上引《項羽本紀》的文義看，把斗卮解釋為容一斗的卮也很合理。這種卮無疑是當時最大的酒杯。拿這種卮給樊噲喝，跟拿生豬肩給樊噲吃一樣，是存心刁難他。

但是，不少注釋《史記》的人，由於缺乏考古知識，不知道古今量值有那樣大的差別，不敢把斗卮的斗解釋為升斗的斗。清人李笠甚至認為“斗”是衍文【編按：關於李笠的時代，參看本書《考古發現的秦漢文字資料對於校讀古籍的重要性》一文中的“《十講》編按”】，他在《史記訂補》裏說：

《漢書·樊噲傳》“與”下無“斗”字。卮受四升，不得云斗卮酒。上云賜之卮酒，下云卮酒安足辭，此非泛言可知，斗蓋衍字。

這種說法是禁不起推敲的。《漢書》抄《史記》常有小的刪改，不能因為《漢書》此處無“斗”字，就說《史記》也沒有“斗”字。而且由“斗卮酒”脫字而誤成“卮酒”的可能性，要比由“卮酒”衍字而誤成“斗卮酒”的可能性大得多。即使認為《史》、《漢》二書此處的文字應該相同，說《史記》衍“斗”字也不如說《漢書》脫“斗”字合理。李氏用上下文都說“卮酒”這一點來證明“斗”是衍文，也毫無道理。項羽命令手下人給樊噲酒喝的時候，當然不會說給他斗卮酒。他命令手下人給樊噲肉吃的時候，不是也只說彘肩而沒有說生彘肩嗎？難道我們能因此說“生”也是衍文嗎？以項羽的身份，怎麼能露骨地表示出以酒食來刁難人的意圖呢？這些事是只能由手下人心領神會地去做。《史記》在講完樊噲飲酒啖肉之事後接着說：“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在這裏，樊噲當然也只能說“卮酒”。如果在“卮”上加“斗”字，反而會削弱樊噲所要表示的一杯酒根本算不了什麼的語氣。總之，李笠只不過是由於胸中橫梗着不可能有容一斗的大卮的成見，在那裏硬做文章罷了。但是有些人却相信了他的說法，例如《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就採用了李說。

還有一些人認為斗是一種大酒杯的名稱，王伯祥《史記選》的注釋說：

斗，酒器之大者。就是《詩·行葦》“酌以大斗”的斗，今俗猶管大酒杯叫“酒斗”。

王氏把《詩經》所說的斗看作飲酒器，是不對的。酌的本來意思是用勺一類東西從

酒尊裏舀酒(“酌”字的“勺”旁兼有表音和表意的作用)。斗就是一種舀酒、舀水用的勺一類的器具。天上的北斗正是因為七顆星連起來形狀像舀水的斗而得名的。斗卮的斗跟《詩經》的斗並無關係。把大酒杯叫做酒斗,是晚起的現象,也不能用來說明《史記》“斗”字的意義。總之,王氏的意見也是毫無根據的。可是信從他的人却很多。

幸好1972年發掘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的時候,發現了斗卮的實物。這座墓裏有一份記載陪葬品的清冊(古稱遣冊),其中一條竹簡上所記的陪葬品是“髹(xiū,用漆漆東西叫髹)畫斗卮二”。1973年出版的《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上集“竹簡”一節,指出斗卮見於《項羽本紀》,就是盛一斗酒的卮,並說:

墓中所出的135號漆卮,經實測,容量為2100毫升,與七升卮(指底部朱書“七升”二字的137號漆卮)容量為1500毫升相較,其容量當在一斗上下,當即此簡所記之斗卮。(144頁)

這是很正確的。後來發現的馬王堆三號漢墓的遣冊也記有斗卮。所以現在已經完全可以肯定,《項羽本紀》的斗卮就是容一斗的卮。有些在馬王堆考古報告之後出版的古文選本,在為《項羽本紀》作注的時候仍然襲用錯誤的舊說,這是不妥當的。

從容吃完一個生豬肩,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站着把容一斗的特大號酒杯裏斟滿的酒一飲而盡,同樣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這正是司馬遷著意寫樊噲之筆。把“斗”字刪去,或對它作錯誤的解釋,都會使文章減色。

其次講題湊的問題。

題湊是古代高級人物墓葬裏建椁室的一種特殊制度。《呂氏春秋·節喪》:

國彌大,家彌富,葬彌厚……題湊之室,棺椁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

東漢高誘注:“室,椁藏也。”椁藏的意思就是藏棺椁的地方。《史記·滑稽列傳》講葬制時,也有“以雕玉為棺,文梓為椁,楨、楓、豫章為題湊”的話。在漢代,題湊之制通常只有天子和諸侯王才能用。即使是地位極高的大臣,也必須經皇帝特賜才能用這種椁制。

題的意思就是端,就是頭。湊的意思就是聚合。這兩個字連在一起究竟是什麼意思呢?題湊究竟是什麼樣的一種椁制呢?上引《呂氏春秋》高誘注說:“題湊,複紮”,意思很難理解。《漢書·霍光傳》記霍光死後,皇帝特賜“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曹魏時的蘇林的注說:“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向內,故曰題湊”,雖然講得比較具體,還是不能使我們明白真相。東漢的鄭玄在給

《禮記·檀弓上》所記的天子梓制作注時提到了題湊。唐代人爲鄭注作疏，認爲題湊就是指在梓室上部，使木材的頭相向湊聚，成爲四阿式屋頂的樣子（四阿式屋頂就是舊式宮殿那種四面有坡的屋頂）。這種說法是臆想出來的，是否可靠很難說。但是後人想不出更好的解釋，也就只好沿用了。

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北京市豐臺區發掘了一座漢代大墓——大葆臺一號墓。這是西漢時代燕王或廣陽王的墓葬，墓中的題湊之室保存得比較好。題湊之制的真相由此才爲世人所知。原來題湊之室的四壁都是用一根根橫斷面爲方形的木材疊累而成的。木材是橫放的，但是方向跟室壁的方向不是平行的而是垂直的。站在室內看四壁，壁面全部是由木材方形的頭部湊成的。這就是題湊得名的原因。至於唐人所說的四阿式的頂，則根本不存在。大葆臺一號墓的題湊之室，大約用一萬五千根長90釐米，高寬各10釐米（少數爲20釐米）的柏木（即黃腸木）疊累而成，耗費木材122立方米（北京市古墓發掘辦公室《大葆臺西漢木梓墓發掘簡報》，《文物》1977年6期）。看到了真正的題湊之室，再回過頭來看蘇林對題湊的注釋，就覺得意思很明白了。

1979年新版《辭海》的“題湊”條說：

古代天子的梓制，亦賜用於大臣。梓室用厚木累積而成，至上爲題湊。題，頭也。湊，聚也。木頭皆內向爲梓蓋，上尖下方，如屋檐四垂。見劉文淇《左傳舊注疏證·成公二年》。

新版《辭海》是在大葆臺漢墓發掘簡報發表兩年後出版的。但是這一條並沒有利用簡報提供的考古資料，基本上仍然沿襲唐代人的錯誤說法。

通過上面所舉的兩個例子，對考古資料在研讀古籍方面的重要性，可以得到一些初步的認識。另一方面還可以看到，目前在語文界存在着利用考古資料和有關研究成果不夠及時的問題。

原載《電大文科園地》1984年7期（題爲《讀古書要注意考古資料》），又載《裘錫圭學術文化隨筆》，今據後者收入。

閱讀古籍要重視考古資料

我們想在這篇短文裏，給喜歡念古書的青年同志們簡單介紹一下考古資料在傳世古籍的整理研究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我們所說的考古資料泛指古代遺留下來的甲骨、金文、簡牘等類文字資料以及各種器物和遺跡，並不一定是通過科學的考古發掘而獲得的資料；傳世古籍主要指傳世的先秦秦漢古籍，因為考古資料對這些著作時代早的古籍的整理研究工作顯得特別重要。

古代學者很早就古籍的整理研究工作中使用考古資料了。例如：西漢時代的有些學者曾用在孔子故宅牆壁裏發現的戰國時代經書抄本，即所謂古文經，來校正流傳的今文經。西晉時代的有些學者在汲冢（今河南汲縣）戰國古冢的竹書發現後不久，就用其中的一種編年史，即所謂《竹書紀年》，來糾正《史記》的錯誤。對非文字的考古資料，從事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古代學者也早就注意到了。例如漢魏之際的經學家王肅，曾據魏太和年間魯郡（今山東曲阜）出土的鑄成牛形的古銅尊，糾正前人認為經書裏提到的犧尊、象尊是由於其花紋或裝飾得名的錯誤說法，指出犧尊就是牛形尊，象尊應為象形尊（見《詩·魯頌·閟宮》正義）。北宋時發現了鑄成象形的古銅尊，王肅的說法完全得到了證實（參看《博古圖》7·10“周象尊”。《新探》編按：犧尊、象尊的問題比較複雜，王說是否可信還有待進一步研究。此文對王說全面加以肯定是不够謹慎的）。

清末以來，由於傳統的金石學的發達以及考古學的興起，古代文物大量發現，其中並包括很多重要的文字資料，如殷墟甲骨文、漢簡和敦煌卷子等等。同時，照相、印刷等技術的進步，為學者們利用各種考古資料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因此，清末以來的學者在利用考古資料整理研究古籍方面，取得了很多超越前人的成就。

建國後，考古事業發展得非常迅速，對整理研究古籍有用的考古資料不斷發現。尤其是70年代以來，先後在一些西漢墓葬和一座秦墓裏發現了大量竹書、帛書。例如1972年在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前期墓裏發現了《吳孫子》、《齊孫子》、

《晏子》、《太公》、《尉繚子》等竹書的殘本,1973年在河北定縣西漢後期的中山王墓裏發現了《論語》、《文子》等竹書的殘本,同年在長沙馬王堆西漢前期的三號墓裏發現了《老子》、《周易》等大批帛書和一些竹書,1975年在湖北雲夢睡虎地十一號秦墓裏發現了《秦律》的部分抄本和《日書》等竹書,1977年在安徽阜陽雙古堆西漢前期的汝陰侯墓裏發現了《詩經》、《倉頡篇》等竹書的殘本,1983至1984年間在江陵張家山西漢前期的247號墓裏發現了《漢律》的部分抄本和《奏讞書》等竹書。這些竹書帛書,有的是長期失傳的重要佚書,有的是尚有傳本的古書的現存最古抄本,價值比過去在敦煌發現的六朝和唐代的古書抄本高得多。因此,考古資料對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就愈來愈突出了。

考古資料在傳世古籍的整理研究工作中的作用,大體上可以分爲兩個方面:一、有助於研究古籍的時代和源流;二、有助於校正、解讀古籍。下面先談前一方面的作用。

地下發現的殷墟甲骨文和商周銅器銘文,是絲毫未經後人竄改的商周時代文獻,可以用作檢驗某些傳世古籍的時代的標準。我們現在所以能够斷定《尚書》裏過去被視爲我國最古文獻的《堯典》、《禹貢》等篇(《虞夏書》)的編定時代不能早於戰國,而過去被懷疑爲戰國時人僞作的記武王滅商之事的《逸周書·世俘》篇,却基本上是可信的實錄,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我們已經通過甲骨、金文等資料獲得了很多關於商周時代的語言、歷史和思想等方面的可靠知識,可以用作判斷這些傳世古文獻時代的依據。例如:西周春秋銅器銘文總是以“妣”與“祖”配,“考”與“母”配(《詩經》亦同),“考”、“妣”相配是戰國以後的事,而《堯典》却有“百姓如喪考妣三載”之語,其時代便可想而知了(看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釋祖妣》,《郭沫若全集·考古編1》19—21頁)。《世俘》所記武王征伐時殺戮、俘獲敵人的數字以及田獵獲獸、祭祀用牲的數字都非常大,而且還有用人爲牲之事。這類內容過去被視爲夸誕不經,甚至被斥爲戰國時人對古代聖王的誣蔑,事實上却跟殷墟甲骨文所反映的這一時代的情況正相符合,“以後人頭腦,就要誇張也誇張不到的”(郭沫若《十批判書》,《全集·歷史編2》23頁。參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附錄之七,《全集·歷史編1》299—301頁)。

自從疑古的學風在宋代興起以來,有不少傳世的先秦子書被懷疑爲後人的僞作。70年代漢墓出土的古書抄本爲好幾種這一類古書恢復了名譽。例如:今本《晏子春秋》(《漢書·藝文志》稱“晏子”)、《六韜》(由《藝文志》的《太公》分出)、《尉繚子》,都有人懷疑它們不是《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原書,而是漢以後的僞作。

但是在銀雀山西漢前期墓裏却發現了這幾種書的部分抄本,內容跟今本基本相同。從一部書的開始出現到廣泛傳抄,通常總要經歷不太短的一段時間。這幾種書的著作時代應該不會晚於戰國。今本《鶡冠子》過去也被懷疑為後人的偽作。馬王堆三號墓所出西漢前期抄寫的帛書《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有很多跟今本《鶡冠子》相同或相似的文句,看來這部書大概確是戰國末期的著作。從定縣中山王墓出土的《文子》殘簡來看,今本《文子》也不會像很多人所說的那樣,是主要根據《淮南子》編成的一部偽書。(《十講》編按:今本《文子》的問題比較複雜,請參看本書所收《中國出土簡帛古籍在文獻學上的重要意義》一文中講《文子》的一節。此處對今本《文子》的看法不準確。)

非文字的考古資料對研究古書時代也是有用的。例如有的考古工作者把《儀禮》的《士喪禮》和《既夕禮》所記的隨葬器物的組合形式,跟考古發掘中所見的實際情況對照,認為《儀禮》所反映的大約是戰國初期的情況(陳公柔《士喪禮、既夕禮中所記載的喪葬制度》,《考古學報》1956年4期)。這對於判斷《儀禮》的時代就很有參考價值。

在研究傳世古籍的源流方面,地下發現的時代較早的抄本是極為重要的資料。例如:1959年在甘肅武威磨咀子六號漢墓裏發現的抄寫於西漢末至王莽時代的《儀禮》木簡、竹簡,證明《儀禮·喪服》的《傳》本來是單行的。通過簡文用字的特點,還可以斷定《喪服傳》原為古文本(看沈文倬《漢簡〈服傳〉考》,《文史》第二十四、二十五輯)。馬王堆漢墓發現的帛書《周易》,六十四卦的次序跟今本完全不同,經文也有出入,易傳部分有內容多於今本的《繫辭》,章節次序跟今本略有不同,多出部分包含今本《說卦》的前三節。這些情況對研究《周易》源流和易傳“十翼”的形成有重要價值。(《隨筆》編按:近年來很多研究馬王堆帛書《周易》的學者,認為原來被看作《繫辭》下篇的那篇帛書,應視為另一種易傳。按照這種看法,帛書《繫辭》——即原來的《繫辭》上篇——的內容就少於今本而沒有多出的部分了。即使如此,它們對研究“十翼”的形成仍有重要價值。)馬王堆帛書《老子》和銀雀山竹書《晏子》,也為研究這兩部書的篇章的分合變化提供了重要資料。

地下發現的有些佚書,對研究傳世古籍的源流也很有用。例如:銀雀山竹書中的《王兵》篇是一篇佚書,但是其全部內容分見於《管子》的《參患》、《七法》、《地圖》、《兵法》等篇,文字基本相同。經過對比研究,可以斷定《參患》等篇是由《王兵》篇加上其他一些作品的內容改編而成的(看《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王兵〉篇釋文》,《文物》1976年12期)。這為研究《管子》的成書過程提供了重要線索。

此外，通過對西漢墓葬出土的大量竹書、帛書的全面觀察，我們對當時的書籍制度有了比較深入的瞭解，並為前人已經提出來的早期古書沒有專用的書名，不署作者之名，多以部分篇卷或單篇別行等特點，找到了很多實證。通過把古書的流傳之本、類書引文和敦煌寫本等跟竹書、帛書本對照，可以看出比起宋以後的刻本來，唐代類書用的本子以及敦煌唐寫本跟竹書、帛書本要接近得多。這說明印刷術的興起一方面減少了古書失傳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却增加了比較劇烈地改變古書面貌的危險性。刊刻的古書由於所據底本不善，或是刊刻者出於牟利的目的草率從事，往往有很多錯誤，一些不是很受重視的古書甚至往往有刪節之處，而刻本的出現又常常導致各種抄本失傳，以致好的本子反而被壞的本子淘汰。

考古資料有助於研究傳世古書的時代和源流的例子還有很多，限於篇幅不能多舉了。下面談談考古資料在校正、解讀傳世古籍方面的作用。

考古發現的古書，有些就是傳世古籍的古抄本，有些雖是佚書，但是跟傳世古籍有某些共同的內容（由於古代的書常常抄來抄去，這種情況是比較常見的）。它們都是可以用來校讀傳世古籍的極好資料。例如：銀雀山竹書中的《孫子》、《晏子》、《尉繚子》、馬王堆帛書中的《老子》，都可以用來糾正各書今本文字上和前人解釋上的一些錯誤。前面提到過的銀雀山竹書中的《王兵》篇，也可以用來校讀《管子》中的有關各篇。這方面已經有不少著作和文章可以參考，我們在這裏就不多說了。下面僅從《孫子》裏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地下發現的古本的可貴。《孫子·計》篇有一句話，今本作：

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

銀雀山竹書本則作：

地者，高下、廣狹、遠近、險易、死生也。

地勢的高下對戰爭來說非常重要，今本脫落“高下”二字是很不應該的。但是如果沒有竹書出土，恐怕誰也發現不了這個問題。

即使是跟傳世古籍沒有上面講過的那種關係的佚書和其他文字資料，在校讀傳世古籍方面也能起重要作用。在傳世古籍裏，有不少詞語和通用字由於罕見而不為後人所理解。這是我們讀不通古書的一個重要原因。這些詞語和通用字，有一些在考古發現的同時代或時代相近的文字資料裏却是常見的、易於理解的，也有一些雖然並不常見但意義是明確的，或者跟傳世古籍對照起來看，意義就明確了。傳世古籍文字上的有些錯誤，也可以通過跟這些文字資料相對照而得到糾正。我

們在《考古發現的秦漢文字資料對於校讀古籍的重要性》(《中國社會科學》1980年5期)和《談談地下材料在先秦秦漢古籍整理工作中的作用》(《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1981年6期)兩文裏,已經舉出了不少這方面的例子,在這裏再稍作補充。先舉兩個利用甲骨、金文校讀《尚書》的例子。

《尚書·費誓》記魯侯跟徐戎作戰前的誓師之辭,有如下一句: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汝。

《偽孔傳》釋末一句為“我則商度汝功賜與汝”。把“商”解釋為“商度汝功”,有增字解經之嫌,而且從情理上說,魯侯在當時也沒有必要去強調進行賞賜必須先“商度汝功”,《偽孔傳》的解釋顯然難以相信。在殷周金文裏,常常用“商”字來表示賞賜之“賞”這個詞。《費誓》的“商賚”無疑應該讀為“賞賚”,就是賞賜的意思。這一點清末研究金文的學者方濬益和劉心源都已經指出來了。如劉氏就說:“商用為賞,古刻通例……不見雅訓,惟《費誓》云‘我商賚汝’,僅存古文。後儒不識通假,乃以商度解之,非也。”(《奇觚室吉金文述》1·27下)這是利用金文釋讀古書中後人不理解的通用字的一個例子。後來,于省吾《尚書新證》、楊筠如《尚書覈詁》也都持與劉氏相同的見解。但是1982年出版的《尚書譯注》却仍然把“商賚”之“商”解釋為“度量”(288頁),新版《辭源》在“商”字第一義項“計量”下也仍然以“我商賚汝”為例句,未免對古文字學者的研究成果太不重視了。

《尚書·君奭》: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偽孔傳》把“予不惠若茲多誥”解釋為“我不順若此多誥而已”,簡直不知所云。殷墟甲骨文裏有一個常用的虛詞“惠”,作用跟“惟”(甲骨文一般作“隹”)相似,古文字學者大都認為這個字應讀為“惠”,當可信(參看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1431—1432頁、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102頁。下文引到此字時逕書作“惠”)。殷墟甲骨文裏的有些占辭(卜問後判斷卜兆所示之意之辭)以“不惟”與“惠”或“惟”與“不惠”對言:

王固曰:戠。惟庚。不惟庚,惠丙。

丙84【《合》5775】

王固曰:吉,戠。惟甲,不惠丁。

同上42【《合》248】

《君奭》也是以“不惠”與“惟”對言的,可見《君奭》的“惠”就是甲骨文裏的虛詞“惠”。這個虛詞後人已不熟悉,所以《偽孔傳》就把它錯釋為“順”了。在甲骨文的

虛詞“惠”被釋出之前，楊筠如《尚書覈詁》已經根據《酒誥》有“予不惟若茲多誥”之語，並以“不惟”與“予惟”對言的現象，指出《君奭》的“惠”與“惟”同義，可謂卓識。但是他認為“惠”“當作惟”，“古惠、惟聲近相假”（253 頁），還是不够妥當的。如果“惠”和“惟”所代表的確是同一個詞，上下句為什麼要用不同的字呢？而且這種以“不惠”與“惟”對言的句子，不但見於《君奭》，也見於甲骨文，顯然不能以誤字等偶然原因來作解釋。（《隨筆》編按：張玉金《甲骨文虛詞詞典》116 頁指出，從《丙》84，即《合》5775 反面的那條占辭的文例來看，《丙》42，即《合》248 反面的那條占辭應讀為：“……惟甲；不，惠丁。”“不”字後省去了“惟甲”。其說可從。那末，殷墟甲骨文中似乎只有以“不惟”與“惠”對貞之例。不過這一點並不妨礙把《君奭》中與“惟”對言的“不惠”之“惠”看作與“惟”義近的虛詞。張書在 1994 年由中華書局出版。）“惠”和“惟”應該是一對音、義皆近的虛詞，二者的區別究竟在哪裏還有待研究（很多古文字學者認為甲骨文“惠”、“惟”用法無別，是不對的）。《詩·大雅·雲漢》有“曷惠其寧”語，吳闓生《詩義會通》認為“曷惠”“猶曷維也”（《邶風·綠衣》有“曷維其已”語）。這個“惠”跟《君奭》的“惠”應該是一個詞。上面提到過的《尚書譯注》把《君奭》的“不惠”讀為“不慧”。1980 年出版的《詩經今注》、1981 年出版的《詩經全譯》、1985 年出版的《詩經譯注》，都把《雲漢》的“惠”解釋為“賜”。這些書的作者對甲骨文的虛詞“惠”恐怕都沒有給予應有的注意。

再舉兩個根據秦漢文字資料校讀《鹽鐵論》的例子。《鹽鐵論·散不足》：

古者庶人鹿(麕?)菲(屝)草屨(屨)，縮絲尚韋而已。及其後則綦下不借（不借是一種麻鞋，見《方言》等書），鞞鞮革舄。

這兩句話裏的“尚韋”和“綦下”都不好懂。

“縮絲”和“尚韋”在語法上是同類的結構。“縮”字在古代有約束之義，“縮絲”似指用絲繩繫鞋。“尚”字在古代可以當加在上面講。馬非百《鹽鐵論簡注》把“尚韋”解釋為“加之以皮”（244 頁），指出了這個詞組的字面意義，但是並沒有把“尚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講清楚。“尚韋”一語也見於《急就篇》和漢簡，不過是用作一種衣物類的東西的名稱的，前人或以為指韋製的裳（《急就篇》顏師古注），或以為指一種履（沈元《急就篇研究》，《歷史研究》1962 年 3 期 77 頁），都不可信。我們在《居延漢簡甲乙編》釋文商榷一文裏，已據漢簡以尚韋跟履、襪並提，而且也以“兩”為其單位詞的現象，並參照《散不足》篇“尚韋”一語的用法，指出作為衣物名稱的“尚韋”應指加在鞋襪上防髒防損的皮罩（《人文雜誌》1983 年 1 期 102 頁）。

《散不足》的“尚韋”則應該是在鞋上加防髒防損的皮罩的意思。

“綦下”的“下”一般認為指鞋底，可信。《散不足》篇下文有“紩裏紩下”語，“裏”指鞋裏，“下”也指鞋底。鞋帶古可稱綦，因此一般把“綦下”的“綦”理解為鞋帶，這却是有問題的。鞋帶怎麼會繫到鞋底下去呢？《後漢書·劉盆子傳》提到一種叫“直綦履”的鞋，李賢注：“綦，履文也。蓋直刺其文以為飾也。”古代的棋紋綺也稱“綦綺”。《釋名·釋采帛》：“綺，敔也。其文敔邪，不順經緯之縱橫也。……有棋文者，方文如棋也。”《廣雅·釋器》有“綦綺”（見“春草……彩也”條），王念孫《廣雅疏證》以為即“棋文”之綺，可信。“綦履”的“綦”大概也是指棋文（紋）而言的。綺的綦文大概一般是斜方形的，“直綦”疑指直而不斜的棋文。睡虎地秦墓所出竹書《封診式》的“穴盜”條，描述盜物之人在地上留下的鞋底印說：“外壤秦綦履迹四所，袤尺二寸，其前稠綦袤四寸，其中央稀者五寸，其踵稠者三寸。”（《睡虎地秦墓竹簡》271 頁。“賊死”條 265 頁也提到“秦綦履”。）由此可見綦履的底外也有綦紋，想來應該是一種用麻或其他東西編成的通體作綦紋的鞋（“秦綦履”的“秦”當與《散不足》篇下文“蒯苴秦堅”之“秦”同義，有人認為可能是一種可以用於編織的草的名稱。《文選》卷一三《風賦》李善注謂“秦，香草也”。不知是否與此為一物）。鞋底編成或刺成綦紋，當比較耐磨。前部和踵部的綦紋比中間稠，也是為了使鞋底耐磨。《散不足》的“綦下”應該就是指一種底部作綦紋的鞋而言的，可能就是“綦履”的別名。大概由於綦下和不借質料相類，所以放在一起來說。跟“鹿菲草芰”比起來，“綦下”當然就要算一種比較講究的鞋了。如果沒有秦簡的資料，“綦下”的意思恐怕很難弄清楚。

《鹽鐵論·復古》提到“扇水都尉彭祖”。漢代並無“扇水”地名，扇水都尉是什麼官從來沒有人知道。30 年代初在甘肅和內蒙的額濟納河（即弱水）兩岸地區發現了大量漢簡。從這批簡文知道西漢時曾在這一地區的北部設居延都尉，南部設肩水都尉，都屬於張掖郡。勞幹認為《鹽鐵論》的扇水都尉“或為肩水都尉之誤”（《居延漢簡考釋序》，《勞幹學術論文集甲編》250 頁），顯然是對的。這是根據考古資料校正古書錯字的一個例子。《鹽鐵論簡注》說：“有人說扇水就是居延漢簡的‘肩水’，是不可信的”（42—43 頁），可是絲毫也沒有提出否定此說的理由，實在太主觀武斷了。

有時候，考古發現的文字資料還能幫助解決古書裏比較重大的問題。例如：《荀子·非十二子》責罪子思、孟軻“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思、孟所謂五行究竟是什麼？這是學術史上的一個重要懸案。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卷後古佚書》的

第一篇，專講儒家的五行說。通過這篇佚書，才弄清楚思、孟所謂五行就是“仁、義、禮、智、聖”，從而為思想史家深入研究思、孟學說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要弄清楚古書裏提到的各種器物的形制和某些制度（如服飾制度、墓葬制度等），往往需要借助於非文字的考古資料。本文開頭曾舉過王肅根據出土古銅器解釋“犧尊”、“象尊”的例子，這類例子是舉不勝舉的。宋代金石學家按照古書裏的器物名稱，為多種古銅器定名。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也就是根據出土實物研究古書所記器物的形制。《漢書·律曆志》所記的嘉量之制，如果沒有王莽嘉量的實物可供參考，就很難完全解釋清楚。古書裏屢次提到的貴人墓葬裏的題湊之制，也只是在 70 年代發現了比較完整地保存着題湊之制的漢代大墓以後，才為大家所真正理解的（參看《大葆臺西漢木椁墓發掘簡報》，《文物》1977 年 6 期。《辭海》新版“題湊”條仍襲誤說）。《鹽鐵論·散不足》說：“唯瑚璉觴豆而後雕文彤漆。”《簡注》把“彤漆”解釋為“紅色的漆”（228 頁）。這是由於不注意考古資料而造成的一個錯誤。出土漢代漆器絕大多數裏面是朱紅色的，外面是黑褐色的。漢代人單說漆，往往指黑褐色的漆。《散不足》的“彤漆”無疑是指涂紅漆和黑褐色漆而言的，決不可能單指涂紅漆（參看朱德熙、裘錫圭《馬王堆一號漢墓遣策考釋補正》，《文史》第十輯 68—70 頁）。限於篇幅，不能多舉例了。

通過上面的簡單介紹，已經可以看出考古資料對傳世古籍的整理研究工作的重要性了。但是在近年來的古籍整理工作和字典、詞典的編纂工作中，考古資料却往往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甚至前人在利用考古資料整理研究傳世古籍方面已經取得的成果，也往往受到忽視。這是很不正常的。希望這種情況能夠很快改變。同時也希望真正有志於研讀古書的青年同志，不要受上面所說的那種不正常的風氣的影響，養成注意考古資料的習慣。

1986 年 4 月 26 日寫完

原載《文史知識》1986 年 8 期（刊出時稍有刪節），又載《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編入時已據原稿補足）、《裘錫圭學術文化隨筆》、《北大學者談讀書》（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中國出土古文獻十講》，今據《中國出土古文獻十講》收入。

談談清末學者利用金文 校勘《尚書》的一個重要發現

在清代後期，隨着金石學和經學的發展，學者們在利用金文資料解讀上古典籍方面取得了一些值得重視的成就，如莊述祖據金文“友”字寫法指出《逸周書·商誓》的“大史比、小史昔”為“大史友、小史友”之訛（見《說文古籀疏證》卷二“又”部“友”字下），孫詒讓據金文中關於“作冊”的資料指出《尚書·洛誥》“王命作冊逸祝冊”“作冊逸誥”等語中的“作冊”是尹逸的職名（見《古籀拾遺》下7頁“周冗敦”條），方濬益、劉心源據金文以“商”為“賞”的現象指出《尚書·費誓》“我商賁汝”的“商”也應讀為“賞”（方說見《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1·20下，劉說見《奇觚室吉金文述》1·27下）等等。本文要專門介紹的，是王懿榮、吳大澂等人關於《尚書》“寧王”“寧考”等文中的“寧”為“文”之誤字的發現。在利用金文校讀典籍方面，這是最為人稱道的一個發現。但是不少人把這一發現完全歸功於吳氏（我自己過去就是這樣看的），這恐怕跟事實有出入。此外，吳氏等人對“文”字致訛過程的解釋也有不盡合理之處。所以我們覺得仍有必要來談談校勘學上這一個盡人皆知的舊發現。

《尚書·大誥》篇有“寧王”“寧武”“寧考”“前寧人”等文：

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

今蠢（春）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敕寧武圖功。

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愆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

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閔愆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

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

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肆予曷敢不越卬敕寧王大命？

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

《君奭》篇也有“寧王”之文：

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舊時多把這些“寧”字理解為安寧之“寧”，如偽孔傳注《大誥》“寧王”說：“安天下之王，謂文王也。”又把“寧武”解釋為“撫安武事”，牽強難通。

就目前所能見到的資料來看，最先根據金文指出上述這種“寧”字是“文”字之誤的學者，是清末金石學家王懿榮。

王氏之友陳介祺（號篋齋）在同治十三年（1874）十月十三日致潘祖蔭的信裏，介紹了王氏的說法，並為王說作了補充。他說：

《尚書》至今日無從得確據以定之。其理之至者，固可以孔孟程朱之說定之。其文之古者，則唯吉金古文可以定之。吉金之文亦唯《尚書》可以通之。福山王廉生農部懿榮書來，謂《大誥》“寧王”“寧武”皆古“文”字作作之訛。余謂“文人”見《詩》（引者按：見《大雅·江漢》），“前文人”見兮中鐘、西宮殷，尤不可移。則《大誥》之為真古文亦定矣。（陳敬第輯《陳篋齋尺牘》第一冊。《叢稿》編按：亦見陳介祺《秦前文字之語》40頁，齊魯書社，1991。）

同年十月晦，陳氏又在致王懿榮的信裏指出“《君奭》之‘寧王’亦皆从‘文’為長”。（同上第四冊。《叢稿》編按：亦見《秦前文字之語》89頁。）

吳大澂是在他的《字說·“文”字說》中提出“寧”為“文”之訛字的說法的。（《叢稿》編按：吳氏在光緒九年六月所撰的《說文古籀補·敘》中就已指出：“而魯恭王所得壁經又皆戰國時詭更變亂之字，至以文考、文王、文人讀為寧考、寧王、寧人。”撰此文時竟沒有注意到，是不應有的疏失。）《“文”字說》篇幅不長，現將全文抄錄於下：

《書·文侯之命》“追孝于前文人”，《詩·江漢》“告于文人”，《毛傳》云：“文人，文德之人也。”濰縣陳壽卿編修介祺所藏兮仲鐘云：“其用追孝于皇考己伯，用侃喜前文人。”《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追敦》云“用追孝于前文人”。知“前文人”三字為周時習見語。乃《大誥》誤“文”為“寧”，曰“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曰“予曷其（引者按：當作“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曰

“天亦惟休于前寧人”，曰“率寧人有指疆土”。“前寧人”實“前文人”之誤。蓋因古文“文”字有从“心”者，或作，或作，或又作。壁中古文《大誥》篇，其“文”字必與“寧”字相似，漢儒遂誤釋為“寧”。其實《大誥》乃武王伐殷，大誥天下之文。“寧王”即“文王”，“寧考”即“文考”，“民獻有十夫”即武王之亂臣十人也。“寧王遺我大寶龜”鄭注：“受命曰寧王。”此不得其解而強為之說也。既以“寧考”為武王，遂以《大誥》為成王之誥。不見古器，不識真古文，安知“寧”字為“文”之誤哉？

《字說》未署刊行年月，卷首署“賜進士出身、會辦北洋事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吳大澂撰”。據《清史稿》本傳，吳氏在光緒十年（1884）遷左副都御史，十二年（1886）擢廣東巡撫。可知《字說》當在光緒十年至十二年間刊行，距同治十三年至少已有十年之久。不過吳氏關於“寧”字的見解有可能在撰《字說》前早就形成了。（《十講》編按：參看上頁關於吳氏在《說文古籀補·敘》中就已提到“寧”字問題的“《叢稿》編按”。吳氏《說文古籀補·敘》已提到“寧”字問題這一點，是我在讀了臺灣學者程元敏的一篇有關文章後才知道的【編按：程元敏《尚書寧王寧武寧考前寧人寧人前文人解之衍成及其史的觀察（上）——併考周文武受命稱王》，《中國文哲研究集刊》創刊號，1991】。）吳氏指出古“文”字或从“心”與“寧”形近因而致誤，與王氏所見同。王氏以《大誥》“寧武”為“文武”之訛，吳氏則撇開“寧武”不管，認為“《大誥》乃武王伐殷大誥天下之文”，這是他不如王氏處（“文考”指亡父非指文王，屈萬里有說）。

吳、王二人是好友。王氏之說為吳氏所聞，或吳氏之說為王氏所聞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但是從他們的學問品行來看，似乎都不會掩友人之說為己有。看來在這個問題上是英雄所見略同。

王、吳之後，在“寧”字問題上持類似見解的，還有孫詒讓和方濬益。

孫詒讓在《尚書駢枝》的《大誥》部分中說：

“寧王”“寧武”即“文王”“文武”之訛。古鐘鼎款識“文”皆作（即“忝”字），與“寧”絕相似，故此經“文王”“文武”皆作“寧”。後文“寧考”“寧人”亦並“文考”“文人”之誤。（6頁上）

又說：

……“前寧人”即《文侯之命》云“前文人”，偽孔說並失其義。（7頁上）

此書敘文也有一段談到“文”訛作“寧”的問題，其文如下：

《書》自經秦火，簡札殽亂。今古文諸大師之所傳，漢博士之所讀，所謂隸古定者，或以私臆更易。展轉傳授，舛牾益孳。漆書古文蓋多假借。如“非”“匪”率爲“斐”，今多作正字，其偶存者則皆誤釋爲“輔”者也。“文”多作“忝”（古文箸“心”於“文”中，今所傳鐘鼎款識咸如是），今絕無“忝”字而有訛作“寧”者，則因釋爲“安”而存其形似也。（1頁下）

後來，孫氏在《名原》的敘文中又談到了這個問題。他說：

蓋秦漢間諸儒傳讀經典，已不能精究古文。如古多假“忝”爲“文”，與“寧”形近（金文“文”多作，與“寧”作絕相似），而《書·大誥》曰“寧考”“寧王”“前寧人”“寧武”，則皆“文”之訛也。

在此段之末，他還加上了“略本吳清卿說”的注語。“清卿”即吳大澂之字。

孫氏《尚書駢枝》成書於光緒十八年（1892，參看朱芳圃《孫詒讓年譜》），《名原》成書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孫氏在《駢枝》中沒有注明“略本吳清卿說”，可能是由於他在著此書時還沒有看到吳大澂的《字說》。所以他可能也是獨立發現“寧”字的問題的。關於“文”“寧”字形的相似，孫氏所說比他家具體。

方濬益在《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卷一“吳生鐘”條下，也指出金文的“前文人”“即《周書·大誥》《君奭》等篇之‘前寧人’”（引者按：《君奭》篇其實只有“寧王”而沒有“前寧人”），並說：

古“文”字作，或作，其繁文則作……漢世《尚書》出於壁藏，學者罕識古篆，誤以爲“寧”。於是“前文人”之“文”均訛爲“寧”，而“文考”爲“寧考”，“文王”爲“寧王”矣。（13頁下）

據方書卷首方燕年識語，方氏之撰作此書，由同治八年（1869）至光緒二十五年（1899），“亘三十一年之久”。他也有可能是獨立發現“寧”字的問題的。

從清末金石學和經學的發展水平來看，發現《尚書》“寧王”“寧武”“前寧人”等文中的“寧”是“文”的誤字，並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幾位學者不約而同地看到這一點，並不奇怪。把這一發現完全歸功於吳大澂，恐怕是不恰當的。

上述各家大都認爲《尚書》“文”字訛作“寧”，是漢儒誤讀古文經書的結果。這一意見是有問題的。據吳大澂、王國維等人研究，所謂古文經實際上是戰國時代東方國家的經書抄本，所謂“古文”是戰國時代東方國家的文字。但是在我們所看到

的古文字資料中，“文”字寫成从“心”，却没有晚於西周時代的例子。所以漢儒所見的古文經書裏決不可能有這樣的“文”字。从“心”的“文”大概是先訛作“𡩇”再變作“寧”的（參看上引孫詒讓《名原》敘言文）。我們認為《尚書》中部分“文”字訛作“𡩇”的時代，不可能晚於春秋。春秋金文如國差簠的“𡩇”字（見《金文編》1985年版514頁），跟从“心”的“文”字很相似。當時人已經不用這樣的“文”字（按照孫詒讓的意見，應該說已經不再假借“忝”字為“文”），很容易把它們誤認為“𡩇”。“𡩇”、“寧”古通，所以後來又被改成了“寧”。《尚書》中沒有錯成“寧”的大量“文”字，大概原來就沒有寫成从“心”，或者起先寫成从“心”，但在較早的時候就改成了不从“心”的“文”。

高本漢在《書經注釋》裏反對“寧王”“寧武”“前寧人”等文中的“寧”是“文”字之訛的說法（見陳舜政譯《高本漢書經注釋》上566—567頁等），這未免審慎過了頭。

補記：

關於吳大澂《字說》的撰作和刊行年代，顧廷龍《吳憲齋先生年譜》附錄一《憲齋先生著述目》中的“《字說》”條有考，現錄之於下：

是書題字說一卷，賜進士出身會辦北洋事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吳大澂撰。前後無序跋，無成書年月。惟考《說文古籀補》凡例，有云：“稱古文以為某字者，皆合觀諸器銘，考其文義，確而可據，疑者闕之。別撰古字說一卷，以證明之。茲不備引。”據此，知《字說》實與《說文古籀補》相表裏，是當與《古籀補》同時成稿者。《古籀補》刊成在光緒十年正月以後，觀陳介祺敘可知。《字說》乃繼之付梓。按會辦北洋事宜為十年四月十四日所奉命。又按《皇華紀程》（引者按：此為吳大澂奉命赴吉林勘界日記），三月初五日書《文字說》一篇，初七日書《夷字說》《尸字說》兩篇，初八日書《拜字說》《鞭字說》《瑚字說》三篇。八月初二日書《龙字說》一篇，初三日書《剗字說》一篇，二十三日作《沐沫字說》《載字說》，二十四日作《緩字說》，書字說三篇。由此知直至十二年八月杪始卒業者也。（260—261頁）

按：吳氏《北征日記》記光緒九年正月初二日“作《韶字說》一篇”（《年譜》102頁），此即《字說》之第四篇。書中其他篇當有撰作於其前者，但已無從確考。《字說》木版用吳氏手寫體。《皇華紀程》所謂“書某字說一篇”，即指書寫供刻版用之底本而

言，與撰作非一事。據《紀程》，《“文”字說》書於光緒十二年三月初五，但其撰作年月則不可考。《紀程》所記光緒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所作《沐沫字說》《載字說》及二十四日所作《緩字說》，為《字說》一書之最後三篇（書中次序，《沐沫字說》在最後）。二十四日所書字說三篇，無疑即此三篇。上引《年譜》“字說”條據此謂全書“至十二年八月杪始卒業”，可信。吳氏於是年十一月初十在天津接到補授廣東巡撫之電（《年譜》151 頁）。從《字說》所署官銜看，版之刻成似當在其前，即在是年九月至十一月之間。至其刷印行世，又當稍遲於此，或已在光緒十三年矣。《年譜》“字說”條謂此書“與《古籀補》同時成稿”，與事實稍有出入（至少《字說》末三篇之撰作，已在《古籀補》刊成兩年之後）。條首所注《字說》版本，第一種為“光緒十年家刻本”，其年份與此條考證不合，顯然有誤。《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卷“吳大澂”條謂《字說》“光緒十年刊成”（548 頁），疑即襲其誤。就目前掌握的情況來看，《字說》刊成年代可暫定為光緒十二年。

原載《古籍整理與研究》第四期（中華書局，1989），又載《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文史叢稿》、《中國出土古文獻十講》，今據《中國出土古文獻十講》收入。

說“揜 函”

——兼釋甲骨文“櫓”字

《墨子·非儒下》引儒者之言曰：

君子勝不逐奔，揜函弗射；強則助之胥車。

孫詒讓《墨子閒詁》解釋“揜函”說：

揜，吳鈔本（引者按：指黃丕烈影鈔明吳寬寫本）作“掩”。《禮記·表記》鄭注云：“揜猶困迫也。”按：“函”疑“亟”之形誤。……《儀禮·聘禮》鄭注云：“賓之意不欲奄卒主人也。”此“揜亟”亦“奄卒”之意，謂敵困急則不忍射之也。……又疑“函”當爲“陷”之誤。《說文·白部》云：“陷，小阱也。”今經典通作“陷”。《漢書·司馬遷傳》“函糞土之中而不辭”，《漢紀》“函”作“陷”。於義亦通。

孫氏以審慎見稱，此注却頗牽強。高亨《墨子新箋》說“孫說迂曲不可從”，^①一點也不過份。

吳毓江《墨子校注》“揜函”條在節引孫注之後，又引了他家之說，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曹（引者按：指曹耀湘《墨子箋》）云：揜函，謂奔者以甲自蔽也，畏射故揜函（“函”有鎧甲一義，詳于省吾《墨子新證》，出處見下文）。牧野謙（指日本牧野謙次郎《墨子國字解》）引諸葛蠡云：揜函，謂揜藏其甲。尹桐陽（《墨子新釋》）、張純一（《墨子集解》）說同。○案：軍敗止有棄甲，似無藏甲之理。疑函當訓含藏，與揜字平列。揜函者，藏匿隱蔽之意。韓子主道篇曰“函掩其跡，匿其端”，此言揜函，猶彼言函掩也。^②

① 《諸子新箋》，山東人民出版社，1962，37 頁。

② 《墨子校注》，中華書局，1993，451 頁注②。

牧野謙等藏甲說之不合理，吳氏已經指出。曹氏之說也不可通。儒者不可能特別指出“以甲自蔽”的奔者不當射，難道棄甲而奔者就應該射嗎？但是吳氏自己的主張也難以成立。藏匿隱蔽的戰敗者通常是搜索的對象，談不到“射”或“弗射”。而且《韓非子·主道》的“函掩”，盧文弨疑“掩”爲注文闌入者，孫詒讓認爲“函”是“亟”的訛字。^③ 吳氏引之爲證，也是不妥當的。

于省吾《墨子新證》解釋“揜函”句說：

上言君子勝不逐奔。此云揜函弗射。言但被甲以自掩護。而弗射也。^④

于氏釋“函”爲“甲”，與曹、牧野謙、尹、張諸家同；但他認爲“揜甲”是戰勝者之事而不是敗奔者之事，則與他們不同。

高亨《墨子新箋》的思路與牧野謙等家相近，但他認爲“揜函”的意思是“棄甲”。他說：

張、于解函爲甲鎧，是也。張訓揜爲藏，非也，因戰陣之間，戰敗者逃走之不暇，必不有藏其甲之事也。于以揜甲爲披甲以自掩護，亦非也。因揜甲乃謂揜其甲，非謂揜其身也。竊疑揜當訓棄。孟子梁惠王上：“棄甲曳兵而走。”墨子之揜函與孟子之棄甲同義。方言六：“揜、揜，滅也。（戴震改滅爲藏，恐誤）荆楚曰揜，吳揚曰揜。”滅者棄絕之意。六書故：“揜暗擲棄也。”此揜有棄義之證。揜函不射謂敵人戰敗而走，嫌甲重爲累，因棄其甲，則戰勝者不射之也。^⑤

高氏說“揜”有“棄”義，顯然不可信。《方言》六“揜、揜、錯、摩，滅也”條的“滅”字，戴震據《廣雅》等書校正爲“藏”，錢繹《方言箋疏》等皆從之。王念孫《廣雅疏證》卷四上“葬、薶……揜、揜、錯、摩……藏也”條引《方言》亦作“藏”。高氏爲立說的方便，斥戴氏爲誤，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而且“棄”“滅”二字之義顯然有別，“滅國”不能說成“棄國”，“棄物”也不能說成“滅物”。“滅者棄絕之意”，是高氏自己對“滅”字的解釋。“揜”字另有拋棄之義，不能證明“揜”字也有拋棄之義。所以即使《方言》的“滅”字不誤，也不能據此得出“揜”有“棄”義的結論。

高氏對于氏之說的批評，理由似乎也不夠充分。古人可以把以袂掩面說成“掩

③ 參見王先慎《韓非子集解》。

④ 《雙劍謄諸子新證》，中華書局，1962，145—146 頁。

⑤ 同注①37—38 頁。

袂”(《藝文類聚》卷二九梁劉孝綽《侍離宴詩》“掩袂望征雲”),以甲揜身似乎不見得一定不能說成“揜甲”。不過在說到戰勝者不射敗奔者的時候,實在沒有點出戰勝者“揜甲”的必要。所以于說也未能取信於人。

總之,迄今為止,似乎還沒有人對《墨子》的“揜函”作出可信的解釋。

我們認為于氏把“揜函”看作戰勝者之事,是正確的。這樣解釋,從句法上看比較順暢,問題在於“函”字不應該訓為鎧甲。

《說文·七上·弓部》訓“函”為“舌”,認為其字上从“弓”,下象舌形。這是據“函”字訛變的字形立說的,不可信。殷墟甲骨文和周代金文的“函”字,都象其中有“矢”的盒、囊類器物。^⑥王國維認為“函”的本義是“盛矢之器”,^⑦近人皆從之。殷墟所出小臣牆骨板所記戰爭俘獲中,有如下數項:

……[馬□]丙、車二丙、百八十三、函五十、矢……^⑧

“函”列“矢”前,顯然指盛矢之器,用的正是本義。稱甲為“函”,是較晚的事。^⑨

上引小臣牆骨板刻辭中列於“函”前之物,其字尚無確釋(為了印刷方便,下文以△代替此字)。由於跟理解函的性質有關,附帶在這裏討論一下。

胡厚宣先生在《甲骨續存》序文中提到小臣牆骨板時說:“△字不識,當為盾牌之屬”。^⑩《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829頁)和《殷墟甲骨刻辭類纂》(638—639頁)逕釋此字為“盾”。釋△為“盾”,在文義上是講得通的。此字的左旁也確實很像盾的側面之形。可是它的右旁作虎形(《類纂》列此字於从“虎”之字中),釋“盾”對此無法作出恰當的解釋。

我們認為△應該是“櫓”的初文。《說文·六上·木部》:

櫓,大盾也。从木,魯聲。櫓,或从鹵。

此字在古書中有時假借“鹵”字為之,^⑪“鹵”、“虜”古通,^⑫《說文·七上·冊部》謂“虜”从“虍”聲,可知“櫓”“虎”二字古音極近。“虍”象虎頭,實即“虎”之

⑥ 字形見《甲骨文編》,中華書局,1965,300—301頁;《金文編》,中華書局,1985,486頁。

⑦ 《不斃敦蓋銘考釋》,《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觀堂古金文考釋》,7—8頁。

⑧ 《甲骨文合集》36481正,參看《甲骨續存》下915。

⑨ 《考工記》“函人”之“函”,不一定指甲,參看上引王國維文。

⑩ 《甲骨續存》,群聯出版社,1955,序6頁。

⑪ 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會典》“櫓與鹵”條,齊魯書社,1989,885頁。下文簡稱“會典”。

⑫ 《會典》頁875“虜與鹵”條,標目中“虜”字誤排為“膚”。

省形。《說文》訓爲“虎文”，不確。△字當从盾之側面形，从“虎”聲，即“櫓”之初文。

《合》20397 也有△字：

□亥卜，王令□伐方

疑此△字當讀爲“虜”。此辭似是卜問征伐方是否能有虜獲的，釋文“方”字後可加逗號。

殷墟甲骨卜辭中屢見寫作等形的一個字，《甲骨文編》隸定爲“執”（225頁）。由於此字的字形和用法都與“執”相似，很多人將它逕釋爲“執”，^⑬但對此字从“虎”的現象沒有作出解釋。夏淥先生釋此字爲“虜”，認爲字形象“从幸（桎梏）夾住虎足”。^⑭他對字形的分析恐有問題，但釋此字爲“虜”則可從。此字右旁下部大概是兼象被執人形和“虎”的下部的，全字可分析爲从“幸”（依《說文》當作“牵”）或“執”，“虎”聲。金文中見於小孟鼎等銘的、一般認爲通“皋”的“執”字，外形雖與此字相似，其實並非一字。△字右旁下部也可能是兼象執盾人形和“虎”的下部的，其構造與此字同一機杼。

王國維認爲：“古者盛矢之器有二種，皆倒載之。射時所用者爲箛，矢括輿筈之半皆露於外，以便於抽矢，諸字象之（引者按：所引古文字爲“葡”字，本是“箛”的象形初文）。藏矢所用者爲函，則全矢皆藏其中，字象之。”（見上引王氏文，出處同）依此說，似乎古人作戰時隨身所帶盛矢之器必爲箛而非函。但小臣牆骨板所記之函是戰爭中的虜獲物，與列於其前的櫓都應是作戰者隨身之物。故知“射時所用”的盛矢器也可以是函，王氏之說過於絕對。函應有蓋一類東西，如將函打開，即可在射時使用。

現在我們可以來解釋《墨子》的“揜函”了。“揜”、“掩”古通，^⑮“掩”字古或訓“覆”訓“蓋”，^⑯“揜”字也有訓“覆蓋”之例（《荀子·富國》“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楊倞注：“揜，覆蓋也。”）。“勝不逐奔，揜函弗射”的意思就是說，戰勝後不追

⑬ 《類纂》1008 頁收此字，即釋爲“執”。

⑭ 《學習古文字瑣記·四五、釋執（虜的異體字）》，中國古文字學第四屆年會論文，1981。

⑮ 《會典》249—250 頁“掩與揜”條，“奄”聲與“弇”聲相通之例屢見，參見同頁有關各條。

⑯ 《經籍纂詁》上聲二十八儉“掩”字條。

逐戰敗奔逃者,而且蓋住矢函不再抽箭射他們。

1994年8月8日寫畢

原載《華學》第一輯(中山大學出版社,1995),又載《裘錫圭學術文化隨筆》(刪去了釋“櫓”字的部分),今據前者收入。

《墨經》“倂”“謂”“廉”“令”四條校釋

按照《墨經》原來的旁行讀法,《經上》篇的“忠”“孝”“信”等條與“任”“勇”二條之間,有“倂”“謂”“廉”“令”四條。現將此四條《經》文以及《經說上》對它們的解說抄錄於下(文字據《墨子閒詁》本),《說》文各條分別附於所解《經》文之後,低一格抄寫,各條《經》文與《說》文之前分標加方括號的“經”字與“說”字,以清眉目:

〔經〕倂,自作也。

〔說〕倂:與人遇人衆愔。

〔經〕謂,作嘽也。

〔說〕謂:爲是爲是之台彼也,弗爲也。

〔經〕廉,作非也。

〔說〕廉:己惟爲之,知其𡗗也。

〔經〕令,不爲所作也。

〔說〕所令非身弗行。

對上引各條,研究《墨經》的學者們已經作了不少校勘和解釋,其說有得有失。今採各家之長,參以己意,對此四條《經》文與相應的《說》文加以校釋。

高亨《墨經校詁》(以下簡稱“校詁”)在校釋了上引四條文字之後說:

右四條倂、謂、廉、令四字,皆言人之品德,故次於忠、孝、信與任、勇之間,舊解多誤。(42頁,科學出版社,1958)

此言甚確,是我們進行校釋的指導思想。以下對此四條文字逐條加以校釋。

一、倂

《校詁》解釋“倂,自作也”說:

說文：“𠂔，飲也。”按𠂔者即今語所謂退縮無勇氣也。居從而居不主，居後而不居先，故許訓為飲。……作疑借為忤、說文：“忤，慚也。”第十六條云：“謂，作慚也。”（引者按：《校詮》為《墨經》各條編了順序號，所以稱此條為第十六條。下文第十七條、第十八條同例。）第十七條云：“廉，作非也。”第十八條云：“令，不為所作也。”諸作字並借為忤。人之退縮由於心之慚愧，慚愧力不如人則退縮畏懼矣。故曰：“𠂔，自作也。”（40 頁）

又解釋此條《說》文說：

“與人遇”三字為句。“人衆”兩字為句。“遁”，一字為句。說文無遁字，以形求義，遁遁也，有遁退之心也，从心、盾聲。（原注：譚戒甫說：“遁假為遁。”）有遁退之心、即有退縮之心。與人相遇，人之數衆力偉，自愧不如，莫敢與爭，因而存遁退之心，即𠂔矣。故曰：“與人遇，人衆，遁。”此舉事例以釋經文也。（40 頁）

按：《校詮》對“𠂔”字條的解釋優於其前各家，但是據《說文》訓“𠂔”為“飲”，仍嫌牽強。又“遁”字當從譚氏讀為“遁”，《校詮》解為“有遁退之心”，未免求之過深。

我在《考古發現的秦漢文字資料對於校讀古籍的重要性》一文中，指出《漢書·司馬遷傳》所載報任安書“而僕又茸以蠶室”句的“茸”字，《文選》作“𠂔”，《漢書》古本也應作“𠂔”。馬王堆帛書和銀雀山漢簡中都有用“𠂔”為“恥”之例，報任安書中的“𠂔”字也應是用作“恥”的（《中國社會科學》1980 年 5 期 24 頁。又見拙著《古代文史研究新探》34 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李解民君讀拙文後，撰《讀〈墨經〉一則》，指出《墨經》“𠂔自作也”的“𠂔”也應讀為“恥”（《文史》第十二輯 96 頁）。其說甚是。不論是作為“言人之品德”的字，還是作為“自作也”這一句所解釋的字，“𠂔”讀為“恥”都要比訓為“飲”合適得多。“與人遇，人衆，遁”，作為可恥之事的一個實例，也是合適的。

附帶說一下，《經上》下文中還有“𠂔，所然也”一條，“𠂔”字之義與此條顯然不同，《校詮》且以為“循”之誤字（73 頁），當與“恥”無關。

二、謂

“謂，作慚也”條的“謂”字，孫詒讓《墨子閒詁》（以下簡稱“閒詁”）讀為“狷”，其言曰：

“謂”當爲“猥”之借字，字又作“狷”。《論語》云：“狷者有所不爲也。”故《經說上》云：“爲是之詒彼也，弗爲也。”

各家多從之，可信。

“作謙”二字最爲難解，各家所說皆牽強，這裏就不徵引了。竊疑此“作”字與“令”字條“不爲所作”的“作”字，都是“非”的形近誤字（詳下文）。“謙”與“謙”通。《莊子·齊物論》：“大仁不仁，大廉不謙。”陸德明《釋文》：“謙，徐音謙。”古書中以“謙”爲“謙”之例尚多，不具引（請參看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會典》256頁“謙與謙”條、《漢語大字典》“謙”字條）。孔子以“狷者”與“進取”的“狂者”對舉（《論語·子路》：“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狷者有所不爲，其跡近似謙退，實非謙退，所以《墨經》說：“狷，非謙也。”但《墨經》中除此條外，找不到“A，非B也”這種格式的句子。所以我對此說尚不敢十分自信，有待繼續研究。

此條《說》文重疊二“爲是”，《閒詁》以爲“下‘爲是’二字蓋誤衍”，各家多從之，可信。

“台彼”之“台”，顧廣圻讀爲“詒”，《閒詁》從之，其言曰：

按顧說是也。《說文·言部》：“詒，相欺詒也。”謂猥者不爲欺人之言。（引者按：欺詒之“詒”一般多作“給”。）

譚戒甫則釋“台”爲“怡悅”，其言曰：

《說文》：“台，說也。”按古言“台說”，今作“怡悅”。（《墨經分類譯注》195頁，中華書局，1981）

譚氏將“爲是之台彼也則不爲”譯作“爲己而怡悅彼的則不爲”（同上）。他訓“是”爲“己”無據，以“是”與“彼”爲對文則是正確的。“是”與“彼”在此都應是指事而不是指人的。讀“台”爲“詒”或“怡”都於文義不合。

于省吾《雙劍謄墨子新證》指出：“晚周金文。以字多作台。王孫鐘。用享台孝。用匱台喜。……邗王壺。台爲祠器。此例不勝舉。”所以他把“台彼”的“台”讀爲“以”，把“爲是爲是之以彼也弗爲也”解釋爲“因彼而爲是爲是弗爲也”（《雙劍謄諸子新證》154頁，中華書局，1962）。于氏不從《閒詁》“爲是”衍文之說，恐非；讀“台”爲“以”則可從。“爲是之以彼”蓋謂做的是這件事而出發點却在另一事，如表面上是救濟窮人實際上却是沽名釣譽，表面上做的是一件跟某人無關的事

實際上却有討好此人的意思。狷者是不屑於做這類事情的,所以說“爲是之以彼也,弗爲也”。

三、廉

“廉,作非也”條的“作”字,曹耀湘《墨子箋》認爲應作“忤”。梁啟超《墨經校釋》說同。《校詮》從曹說,其言曰:

作借爲忤。(原注:曹耀湘改作爲忤。)廉者知恥,所行者非,則內懷慚愧,故曰:“廉,作非也。”(41 頁)

在現有各說中,此說算是比較合理的。

各家對此條《說》文的解釋,以《校詮》爲最優。其言曰:

惟讀爲雖,古字通用。(原注:此採孫詒讓說。)說文無𦣻字。疑𦣻即恥之異文。說文:“恥辱也,从心、耳聲。”𦣻當是从思、耳聲。从思與从心同意。故知𦣻即恥之異文。如𦣻即協之異文。協从心、𦣻聲。𦣻从思、𦣻聲。說文分協𦣻爲二字、非也。恥之作𦣻、猶協之作𦣻矣。廉者所行或非,己雖過而爲之,而心知其恥。故曰:“己惟爲之,知其𦣻也。”然則廉者不在己之無過,而在己之恥過。(41 頁)

以“𦣻”爲“恥”,文從字順,允爲卓識。徐復《說𦣻》一文持論略同(《徐復語言文字學叢稿》9—10 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

上引李解民《讀〈墨經〉一則》也提到“𦣻”字。他說:

“𦣻”和“恥”皆从耳聲。在語音上完全具備通假的條件。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也把从“耳”聲的“𦣻”、“𦣻”等字用作“恥”字。這裏順便提一下,《墨子·經說上》“己惟爲之,知其𦣻也”的“𦣻”,也應是从“耳”聲的字。高亨“疑𦣻即恥之異文”,當可無疑。(《文史》第十二輯 96 頁)

他所提到的用作“恥”的“𦣻”字,見於《戰國縱橫家書》第四章 33—34 行“除羣臣之𦣻”句(《馬王堆漢墓帛書〔叁〕》圖版 12 頁,文物出版社,1983)和第十九章 205 行“報惠王之𦣻”句(同上 19 頁)。形聲字偏旁位置每可互易。《墨經》的“𦣻”應是“𦣻”的形近誤字,也有可能是後人爲了使字形切合字義,有意把“鬼”旁改作“思”旁的。吳毓江《墨子校注》引明嘉靖陸穩校芝城銅板活字本,“𦣻”正作“𦣻”(493

頁,中華書局,1993),可為確證。吳氏《墨子舊本經眼錄》謂陸校銅活字本“雖訛字微多,其古樸處較之《道藏》轉似過之。周香嚴謂其出於內府,日本吉田漢宦謂為宋代遺本,洵非無見之言也。”(同上 1006 頁)上舉“𠂔”字可證其所從出之本,時代確較今所見各本為早。

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中“恥”有“𠂔”、“𠂔”兩種寫法(讀作“恥”的“𠂔”見第十七章 176 行,上引《馬王堆漢墓帛書[叁]》圖版 18 頁),《春秋事語》中“恥”有“恥”(第十二章 75 行,同上圖版 6 頁)、“𠂔”(第三章 17 行,圖版 3 頁;第十三章 84 行、十四章 86 行,圖版 6 頁)兩種寫法。所以《墨經》“恥”字有“𠂔”、“𠂔”兩種寫法,一點也不奇怪。

《校註》指出“𠂔”即“恥”之異文雖然正確,從《閒詁》讀“己惟為之”為“己雖為之”却是有問題的。廉者的特點應該是不為可恥之事。如“廉”只是指對過失感到可恥,與“恥”又有什麼區別呢?竊疑“己惟為之”是“己不為之”之誤。但究竟如何致誤,尚待研究。《經》文的“作非”如確應讀為“忤非”,也應是泛指以“非”為恥的,不能像《校註》那樣解釋為“所行者非,則內懷慚愧”。也許“作非”是“非作”的誤倒之文(“非”“作”二字形本相近,詳下文),當讀為“非作”。“廉非作也”是相對於“恥自作也”而言的,意謂能自作並非廉,知恥而不為非才是廉。

四、令

要校釋“令”字條,必須從《說》文入手。

梁啟超《墨經校釋》將此條《說》文校改為:“令。非身所行。”其言曰:

舊本作“所令非身弗行”。孫校謂“弗”當為“所”,是矣。但以“所令”連讀為句,仍誤。本書之例,凡說皆牒舉經之一字為標題。此文“令”字本為標題,傳寫者誤將下文“所”字移冠其首,又妄改原文“所”字為“弗”耳。(《欽定四庫全集·專集之三十八》11 頁)

《校註》也以“令”為“標牒字”,但認為“‘所令’當為‘令所’,蓋轉寫誤倒”(41 頁)。

梁氏認為“令”字當在句首,乃標題字,可信。以“令”上之“所”為誤衍之字,則不如《校註》“所令”二字誤倒之說合理。梁氏從舊說,以為此條“令”字即取命令之義,所以信從《閒詁》“非身弗行”當作“非身所行”之說,並且不得不把“令”上的“所”字看作衍文。《校註》訓“令”為“善”,讀《經》文“令,不為所作也”之“作”為

“忤”(41 頁),所以將《說》文校改爲“令所非身弗行”,並解釋說:

令乃標牒字。所非身弗行、乃釋經之說辭也。經文所謂不爲所忤者,謂其心之所非、其身不肯行也。故曰:“所非,身弗行。”(41—42 頁)

《校詮》對《說》文的校改可從,但訓“令”爲“善”却有問題。善這個概念的涵蓋面很廣,如“令”字確當訓爲“善”,《說》文似不應以“所非身弗行”來解釋它。

我認爲“令”應該讀爲“矜持”之“矜”。“矜”字本从“令”聲。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矜”字條改今本“矜”篆爲“矜”,改“从矛今聲”爲“从矛令聲”,注曰:

字从令聲。令聲古音在真部,故古段“矜”爲“憐”。《毛詩·鴻鴈·傳》曰:“矜,憐也。”言段借也。

又曰:

各本篆作“矜”,解云“今聲”,今依《漢石經·論語》、淩水校官碑、魏受禪表皆作“矜”正之。《毛詩》與“天”、“臻”、“民”、“旬”、“填”等字韻,讀如鄰,古音也。

馬王堆帛書、銀雀山漢簡等的“矜”字也都从“令”(《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四川辭書出版社,1985——1021 頁“矜”字中欄收三例,皆見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乙本二例皆从“令”,《縱橫家書》一例从“今”。後一例見《馬王堆漢墓帛書[叁]》圖版 16 頁 132 行,細辨其形,右旁實爲“令”而非“今”,因其下部不甚清晰而被《字形表》誤摹爲“今”),可證段說之確。所以“令”沒有問題可以讀爲“矜”。

《論語·衛靈公》:“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何晏《論語集解》引包咸注:“矜,矜莊也。”朱熹《論語集注》:“莊以持己曰矜。”同書《陽貨》:“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大戴禮記·小辨》:“大夫學德別義,矜行以事君。”盧辯注:“矜猶慎也(聚珍版叢書本據永樂大典本改“慎”爲“莊”)。”《漢書·賈誼傳》陳政事疏:“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矜行”、“矜節行”義同。由以上所引可知“矜”有莊敬慎重的意思,而且與“廉”有密切的關係。以“所非身弗行”來解說“矜”,顯然是很合理的。

《校詮》讀此條經文的“作”爲“忤”,義似可通。但如將此條的《經》文“不爲所作”與《說》文“所非身弗行”對照起來看,“作”很像是“非”的訛字。“非”字金文作𠄎(《金文編》760 頁,中華書局,1985),漢代隸書仍基本保持此形(見上引《字形表》834 頁。今本《說文》“非”字篆形作𠄎,爲後人所改,詳馬衡《談刻印》,《凡將齋

金石叢稿》299 頁，中華書局，1977）。“作”字篆文作𠄎，古隸或作𠄎、𠄎等形（《字形表》560 頁），與“非”形近。傳抄《墨經》者有可能由於誤以為本應讀為“矜”的“令”即是命令之“令”，而把“不為所非”的“非”誤認或誤校為“作”。

按照以上所說，“令”字條可以寫定如下：

〔經〕矜，不為所非也。

〔說〕矜：所非，身弗行。

“𠄎”、“狷”、“廉”、“矜”都是“言人之品德”的字，而且彼此意義相關，所以《墨經》作者把它們排列在一起，置於“忠”、“孝”、“信”與“任”、“勇”之間。

《墨經》極為難讀。以上所作校釋必有不當之處，敬祈識者指正。

1994 年 10 月 7 日寫畢

原載《國學研究》第三卷（1995），今據以收入。

《史記·殷本紀》注譯

殷本紀第三

殷契，^①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②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③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親，^④五品不訓，^⑤汝爲司徒而敬敷五教，^⑥五教在寬。”封于商，^⑦賜姓子氏。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於百姓，百姓以平。^⑧

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⑨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⑩振卒，子微立。^⑪微卒，子報丁立。報丁

① “殷契”，商族傳說中的始祖。“契”，音 xiè。殷本是地名（在今河南安陽市一帶），商朝建過都的地方很多，殷是其中比較重要的一處，所以商也稱殷。

② “有娥氏”，上古部落。“娥”，音 sōng。

③ “玄”，黑色。“玄鳥”，指燕子。簡狄吞燕蛋而生子，是商族較原始的傳說。簡狄爲帝嚳次妃的說法是後起的。

④ “百姓”，在上古較早的時候，“百姓”的意義跟後世有別（古注或釋爲百官），較晚的著作有時也襲用古義。此處舜命契之語是襲自《尚書·堯典》的，但是從文義上看，在《殷本紀》裏，司馬還是按照一般的意義來使用“百姓”這個詞的。所以譯文對“百姓”不作翻譯。

⑤ “五品”，指父、母、兄、弟、子，跟“五倫”意近。“訓”，順。

⑥ “司徒”，古代主管民事的長官。“敷”，布，施行。“五教”，指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這幾種道德規範。

⑦ “商”，商族的發祥地，舊說故地在今陝西商縣，近人多認爲在今河南商丘。

⑧ “平”，古有“正”、“定”、“均”、“和”等義，這裏似乎應該當“定”講。

⑨ “圉”，音 yǔ，同“圉”。

⑩ “振”，《史記索隱》引《世本》作“核”，殷墟甲骨卜辭（商代後期王室的占卜檔案）和《山海經·大荒東經》都稱爲“王亥”。“核”以“亥”爲聲旁，古音跟“亥”相近。“振”當是“核”的訛字。（參看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觀堂集林》卷九。）

⑪ “微”，甲骨卜辭稱爲“上甲”，古書或稱“上甲微”。微是名，上甲是號。在商王室世系裏，微以下各人都有以天干爲主體的號。

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⑫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爲成湯。^⑬

成湯，^⑭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⑮從先王居，^⑯作《帝誥》。^⑰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⑱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⑲無有攸赦。”^⑳作《湯征》。

伊尹名阿衡。^㉑阿衡欲奸湯而無由，^㉒乃爲有莘氏媵臣，^㉓負鼎俎，^㉔以滋味說湯，^㉕致于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㉖言素王及九

⑫ 據甲骨卜辭，上甲之後的三世，依次是報乙、報丙、報丁。《史記》把報丁放在報乙之前，是錯誤的。

⑬ 成湯在甲骨卜辭裏有成、唐、大乙等名號（“大”音 tài，同“太”）。“唐”、“湯”音近，在銅器銘文和古書裏，成湯的“湯”也有作“唐”的。《史記》的“天乙”可能是“大乙”之誤，也有可能湯本有天乙、大乙兩號。

⑭ “成湯”這兩個字大概是衍文。

⑮ “亳”，音 bó，故地在今山東曹縣、河南商丘之間，漢代曾在此置薄縣（“亳”、“薄”同音通用）。在今河南偃師西面也有古亳城，相傳曾爲帝嚳和商湯所居。或謂湯本居商丘之亳，後遷居偃師之亳。

⑯ “從先王居”，舊說帝嚳曾居亳，“先王”指帝嚳。

⑰ “誥”，音 gào，一般指有訓誡意味的成篇言辭或文告。《“帝誥”》，《尚書》佚篇，舊說記湯向先王報告遷居於亳之事。此篇名，《書序》作“《帝告》”；一說本作“《帝佺》”（“佺”同“嚳”），由於所告先王爲帝嚳而得名。下文“……作《湯征》”、“……作《女鳩女房》”這類句子裏提到的篇名，都是《尚書》裏的。其中除了《湯誓》、《盤庚》和《高宗彤日》，都是佚篇（有的篇見於今本《古文尚書》，是後人的僞作）。

⑱ “葛”，古國名，故地在今河南寧陵縣北（寧陵就在商丘東面）。

⑲ “殛”，音 jí，誅罰，誅殺。

⑳ “攸”，音 yǒu，虛詞，這裏的“攸”字用法跟“所”相近。

㉑ “阿衡”，或謂是伊尹的官號。伊尹在古書中也稱保衡。“阿”、“保”二字都有“保育”之義（這一義的“阿”音 ē）。也有可能“衡”是伊尹之名，“阿”、“保”是伊尹的官號（參看俞樾《群經平議》）。依此說“阿”應讀 ē。

㉒ “奸”，音 gān，同“干”，不按常禮見人（多指見地位高的人）。

㉓ “有莘氏”，上古部落，故地在今山東曹縣西北。“莘”，音 shēn。湯曾取有莘氏之女爲妃。“媵”，音 yìng，陪嫁。

㉔ “鼎”，古代煮食物盛食物的器皿，多數爲圓腹，有三足兩耳。“俎”，音 zǔ，切割肉類用或祭祀時放牛羊等祭品用的几形器物。這裏以“鼎俎”泛指庖廚割烹的用具。

㉕ “說”，音 shuì，勸說人。

㉖ “反”，同“返”。

主之事。^{②7} 湯舉任以國政。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②8}作《女鳩女房》。^{②9}

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

當是時，夏桀爲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爲亂。^{③0} 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③1}遂伐桀。湯曰：“格女衆庶，^{③2}來，女悉聽朕言。匪台小子敢行舉亂，^{③3}有夏多罪，予維聞女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女有衆，女曰‘我君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政’。^{③4} 女其曰‘有罪，其柰何’？^{③5} 夏王率止衆力，^{③6}率奪夏國。有衆率怠不和，曰‘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及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理女。^{③7} 女毋不信，朕不食言。女不從誓言，予則帑僇女，^{③8}無有攸赦。”以告令師，作《湯誓》。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

②7 “素”，樸素。“素王”，當指戰國時代道家學派理想中的無爲而治的上古帝王。“九主”，九種君主。據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帛書中的伊尹論九主一篇，九主包括法君一、專授之君一、勞君一、半君一、寄主一、破邦之主二、滅社之主二。其中只有法君是理想的君主（《馬王堆漢墓帛書〔壹〕》29至33頁）。馬王堆帛書中的這一篇，當是戰國時代揉合道、法兩家的學派假託伊尹之名而作的。伊尹以滋味說湯，伊尹本爲處士以及伊尹言素王、九主之事等說法，大概都起於戰國時代，不能視爲信史。

②8 “女鳩、女房”，湯的兩個臣下。女是族氏，《書序》作“汝”。

②9 或以《女鳩》、《女房》爲兩篇。由於原書已佚，無可確考。

③0 “昆吾氏”，上古部落，曾居於帝丘（在今河南濮陽西南）、許（在今河南許昌東）等地。

③1 “鉞”，音 yuè，古代的一種兵器，類似板斧，往往用作權力的象徵。

③2 “格”，來。“女”，音 rǔ，同“汝”，你。自此以下至“無有攸赦”，大體用《尚書·湯誓》篇文。

③3 “匪”，非。“台”，音 yí，我。

③4 “穡”，同“穡”，收穫穀物。這一句今本《尚書·湯誓》篇作“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夏”大概是衍文。“后”與“君”同義。“正”與“政”古通用。舊說多以爲“我后”指夏桀，把“割政”解釋作“爲割剝之政”。司馬遷可能也是這樣理解的。但是從上下文看，這樣講不很妥當。近人或以爲“我后”指湯，“割正”或“割政”當讀爲“害征”，“害”訓爲“何”（參看楊筠如《尚書覈詁》）。譯文從此說。下面對《史記》所用《尚書》文字的翻譯，可能還有跟司馬遷的理解不一致的地方，不再一一指出。

③5 “柰”，同“奈”。

③6 “率”，語助詞（參看王引之《經傳釋詞》卷九）。

③7 “理”，音 lí，同“釐”，賜予。

③8 “帑”，音 nú，同“孥”，妻子兒女，兒女。“僇”，音 lù，同“戮”，侮辱，殺死。“帑僇”，罰及妻子兒女。一說“帑”同“奴”，當“罰爲奴隸”講。

桀敗於有娥之虛，^{③⑨}桀葬於鳴條，^{④①}夏師敗績。湯遂伐三矧，^{④②}俘厥寶玉，^{④③}義伯、仲伯作《典寶》。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④④}作《夏社》。伊尹報。^{④⑤}於是諸侯畢服，湯乃踐天子位，平定海內。

湯歸至于泰卷陶，^{④⑥}中鬻作誥。^{④⑦}既紂夏命，^{④⑧}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群后：^{④⑨}‘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④⑩}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④⑪}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④⑫}農殖百穀。^{④⑬}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④⑭}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④⑮}有狀。^{④⑯}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④⑰}女毋我怨。’”以令諸侯。伊尹作《咸有一德》，^{④⑱}咎單作《明居》。^{④⑲}

③⑨ “有娥之虛”，有娥氏居住過的地方，“虛”同“墟”，其地在今何處不詳。或以爲在唐蒲州境內（蒲州在今山西省西南角，其範圍北至今河津，東至今聞喜、運城，治所在今永濟），大概是根據鳴條在安邑的說法推測的（參看下條注文）。

④① “葬”，音 bēn，同“奔”。“鳴條”，故地據舊說在今山西運城安邑鎮北，一說在今河南封丘縣東。

④② “三矧”，國名，也作“三腰”，故地據舊說在今山東定陶。“矧”，音 zōng。

④③ “厥”，音 jué，代詞，用法跟“其”相近。

④④ “社”，土地之神。舊說夏以句（勾）龍爲社神，湯滅夏後想變置社神，由於找不出比句龍更合適的，只好作罷。

④⑤ “伊尹報”，據舊注，《史記》有一個本子作“伊尹報政”，可能指伊尹向湯報告各地的情況。

④⑥ “陶”，大概是衍文。“泰卷”，《書序》作“大垺(jiǒng)”，故地在今何處不詳。舊說或謂在定陶，當是據三矧在定陶的說法推測的。

④⑦ “中鬻”，音 zhòngyǔ，他書多作“仲虺”，湯的重要大臣。“中”同“仲”。“鬻”是“雷”的古寫，古音與“虺”相近。仲虺所作之誥即《尚書》中的《仲虺之誥》，已亡佚。

④⑧ “紂”，音 chù，同“黜”，貶退，廢絕。

④⑨ “后”，君。

④⑩ “迺”，音 nǎi，同代詞“乃”，你的。

④⑪ “瀆”，音 dú，大川。

④⑫ 在比較原始的傳說中，后稷等人是有神性的，他們是上帝從天上派下來爲下民（即地上的人）做好事。“降播”，本來大概指把播種的方法從天上下傳到民間。

④⑬ “農”，勉，努力。“殖”，生長，繁殖。

④⑭ “后”，同“後”，指後嗣。

④⑮ “予”，音 yǔ，同“與”，贊許，援助。

④⑯ “狀”，情狀，事實。

④⑰ “毋之在國”，據舊注，《史記》有一個本子作“毋政在國”。“不道，毋政在國”，大概是不準無道的諸侯統治他的國家的意思。原文疑有誤。或謂“毋之在國”猶言“毋使之在國”。

④⑱ “咸”，皆。據舊說，《咸有一德》講君臣同德。

④⑲ 據舊說，咎單是湯的司空，《明居》是講明安排民衆居處的法則的。安排民居是司空的職責。

湯乃改正朔，^{⑤⑨}易服色，^{⑥⑩}上白，^{⑥⑪}朝會以晝。^{⑥⑫}

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廼立太丁之弟外丙，^{⑥⑬}是爲帝外丙。^{⑥⑭}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⑥⑮}是爲帝中壬。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廼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⑥⑯}是爲帝太甲。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⑥⑰}

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⑥⑱}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⑥⑲}以朝諸侯。

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⑦⑩}於是伊尹廼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廼作《太甲訓》三篇，^{⑦⑪}褒帝太甲，^{⑦⑫}稱太宗。

太宗崩，子沃丁立。帝沃丁之時，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沃丁崩，弟太庚立，是爲帝太庚。帝太庚崩，子帝小甲立。帝小甲崩，弟雍己立，是爲帝雍己。殷道衰，諸侯或不至。

⑤⑨ “朔”，音 shuò，陰曆一個月的第一天。“正朔”，一年的第一天。“正”，音 zhèng。據說夏、商、周三代的正朔都不同，夏以建寅之月（舊曆正月）爲一年之首，商以建丑之月（舊曆十二月）爲一年之首，周以建子之月（舊曆十一月）爲一年之首。

⑥⑩ “服色”，古代各個王朝爲車馬、祭牲等物規定的最受重視的顏色。據說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

⑥⑪ “上”，同“尚”。

⑥⑫ “朝會”，臣屬們一起朝見君主。

⑥⑬ “廼”，同副詞“乃”。

⑥⑭ 我國統治者生稱帝，始於戰國時代（帝嚳、帝舜是傳說中的人物，不在此例）。《史記》認爲商代稱帝，是錯誤的。

⑥⑮ “中壬”，他書或作“仲壬”。“中”，音 zhòng，同“仲”。下文“中丁”之“中”同。

⑥⑯ “適”，音 dí，同“嫡”。

⑥⑰ “肆”，陳。“徂”，音 cú，往，死亡（後一義同“殂”）。《伊訓》、《肆命》、《徂后》三篇皆已亡佚。據舊說，這三篇都是記伊尹訓誡太甲之辭的。《肆命》陳述天命以誡太甲。《徂后》稱述已逝先王（或謂即湯）的法度以誡太甲。

⑥⑱ “桐宮”，桐地之宮，舊說在偃師之亳附近。一說桐與漢代虞縣南的桐亭爲一地，故地在今河南虞城縣南，近於商丘之亳。

⑥⑲ “攝”，代理。“當”，音 dāng，掌管。

⑦⑩ “反”，同“返”。

⑦⑪ 《書序》作“《太甲》”，無“訓”字。

⑦⑫ “褒”，也寫作“褒”，音 bāo，贊揚，夸獎。

帝雍己崩，弟太戊立，是爲帝太戊。帝太戊立伊陟爲相。^{⑦③} 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⑦④}一暮大拱。^{⑦⑤} 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⑦⑥} 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伊陟贊言于巫咸，^{⑦⑦} 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⑦⑧} 作《太戊》。帝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⑦⑨} 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⑧⑩}

中宗崩，子帝中丁立。帝中丁遷于隰。^{⑧⑪} 河亶甲居相。^{⑧⑫} 祖乙遷于邢。^{⑧⑬} 帝中丁崩，弟外壬立，是爲帝外壬。《仲丁》書闕不具。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是爲帝河亶甲。河亶甲時，殷復衰。

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⑧⑭} 帝祖乙立，殷復興。巫賢任職。^{⑧⑮}

祖乙崩，子帝祖辛立。帝祖辛崩，弟沃甲立，是爲帝沃甲。帝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是爲帝祖丁。帝祖丁崩，立弟沃甲之子南庚，是爲帝南庚。帝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陽甲，是爲帝陽甲。帝陽甲之時，殷衰。

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⑧⑯} 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⑧⑰} 於是諸侯莫朝。

⑦③ “伊陟”，伊尹之子。

⑦④ “祥”，吉凶的預兆。“穀”，樹名，即楮(chǔ)，此字从“木”“穀”聲。

⑦⑤ “拱”，兩手圍握，常用來比擬樹幹的粗細。

⑦⑥ “闕”，音 quē，缺失、過錯。“與”，音 yú，同“歟”，句末疑問語氣詞。

⑦⑦ “贊”，告，稱道。“巫咸”，太戊的大臣。

⑦⑧ “艾”，音 yì，同“乂”，治理。

⑦⑨ 舊說原是臣名，《原命》是命原之辭。由於此篇已亡佚，內容無法確考。

⑧⑩ 甲骨卜辭提到已死的商王時，屢稱“中宗祖乙”(祖乙是太戊之孫，見下文)，又有“中宗祖丁、祖甲”之文(祖丁、祖甲亦見下文)，但是稱太戊爲“中宗”之例在卜辭裏尚未發現。此外，古本《竹書紀年》也以祖乙爲中宗。《史記》可能有誤。

⑧⑪ “隰”，音 áo，他書作“囂”或“敖”，故地在今河南滎(xíng)陽縣北。解放後在滎陽東南的鄭州市發現了規模很大的商代古城遺址。有人認爲商代的隰範圍可能比較大，不一定局限在滎陽北面，鄭州商代古城可能就是隰都遺址。但也有人認爲鄭州商城是湯所都的亳的遺址。

⑧⑫ “亶”，音 dǎn。“相”，音 xiàng，故地在今河南內黃縣東南。

⑧⑬ “邢”，舊說讀爲“耿”(《書序》“祖乙圯于耿”)，耿的故地在今山西河津縣東南。近人多不從此說，認爲這個邢就是邢丘，故地在今河南溫縣東。依後說，邢仍當讀 xíng。

⑧⑭ “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據關於祭祀先王的甲骨卜辭來看，祖乙應爲中(仲)丁之子，而不是河亶甲之子。

⑧⑮ 巫賢，或謂是巫咸之子。

⑧⑯ “更”，音 gēng，變更，輪流更替。“諸弟子”，或以爲“弟”與“子”並列，“諸弟、子”指王之諸弟與諸子；或以爲“弟子”當解釋爲弟之子。譯文從前一說。

⑧⑰ “比”，舊音 bì，接連。“九世”，當指中(仲)丁至陽甲九王。

帝陽甲崩，弟盤庚立，是爲帝盤庚。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⑧ 迺五遷無定處。^⑨ 殷民咨胥皆怨，^⑩ 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⑪ 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

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是爲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⑫ 帝小辛崩，弟小乙立，是爲帝小乙。

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帝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⑬ 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⑭ 以夢所見視群臣百吏，皆非也。於是迺使百工營求之野，^⑮ 得說於傅險中。^⑯ 是時說爲胥靡，^⑰ 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

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鳴，武丁懼。^⑱ 祖己曰：^⑲ “王勿憂，先修

⑧ 盤庚遷都，依《史記》之說，應是從黃河以北的邢遷到黃河以南的亳；依古本《竹書紀年》，則是從黃河東南的奄（在今山東曲阜，爲南庚、陽甲所居）遷到黃河以北的殷（在今河南安陽市西北）。今人多從《竹書紀年》之說。

⑨ “五遷”，指商湯到盤庚的五次遷都，具體說法有分歧，如商湯遷亳、盤庚遷殷（依《史記》也是遷亳）是否算在五遷裏，就有不同意見。

⑩ “咨”，嘆息聲，這裏似乎應該當嘆息講。“胥”，音 xū，皆。

⑪ “高后”，時代早的先君，“高”與高祖之“高”同義。

⑫ 《尚書·盤庚》篇所記爲盤庚在遷都前後對貴族和民衆的訓話（但已經過後人改寫），《史記》此處所說似有問題。

⑬ “冢宰”，即太宰，輔佐天子的官。

⑭ “說”，音 yuè。

⑮ “百工”，百工的“工”有工人和官吏兩義，營求傳說的百工，舊說多認爲是百官，但也有人認爲是畫人像的畫工一類人。譯文取後說。

⑯ “傅險”，地名，他書多作“傅巖”，故地在今山西平陸縣東。

⑰ “胥靡”，一種刑徒。刑徒就是被罰服役的罪人。“靡”，音 mǐ。一說胥靡之“靡”同“縻”，則讀爲 mí。

⑱ “雉”，音 zhì，野雞。“鳴”，音 gòu，鳥鳴。《史記》這一段是以《尚書·高宗彤日》篇爲據的。高宗即武丁。據後人研究，《高宗彤日》所記的並不是“武丁祭成湯”，而是武丁之子祖庚祭武丁之事。《史記》說“武丁懼”，實際上應是祖庚懼。“彤”，音 róng。據甲骨卜辭，“彤日”是一種祭名。《高宗彤日》說，在舉行高宗的彤日之祭時有野雞鳴。《史記》說祭祀的明日有野雞鳴，也是錯的。舊說“祭之明日又祭”爲“彤”，《史記》當由此致誤。

⑲ “祖己”，賢臣，近人或以爲即祖庚兄孝己（參看楊筠如《尚書覈詁》）。

政事。”祖己乃訓王曰：“唯天監下，^⑩典厥義，^⑪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中絕其命。民有不若德，^⑫不聽罪，天既附命正厥德，^⑬乃曰其柰何。嗚呼！王嗣敬民，^⑭罔非天繼，^⑮常祀毋禮于弃道。”^⑯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⑰殷道復興。

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⑱遂作《高宗彤日》及《訓》。^⑲

帝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爲帝甲。^⑳ 帝甲淫亂，殷復衰。

帝甲崩，子帝廩辛立。帝廩辛崩，弟庚丁立，^㉑是爲帝庚丁。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殷復去亳，徙河北。^㉒

帝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㉓令人爲行。^㉔ 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爲革囊，盛血，印而射之，^㉕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間，^㉖暴雷，武乙震死。

^⑩ 《高宗彤日》作“惟天監下民”。“下民”是跟“上天”相對而言的，泛指地上的人，意義與跟君上、官吏相對而言的“庶民”不同。這一段裏的“民”都指下民，其中包括統治者。

^⑪ “典”，主。

^⑫ “若”，順。

^⑬ “附”，或謂當讀爲“付”，當付與講，譯文用此說。

^⑭ 《高宗彤日》作“王司敬民”，疑《史記》“嗣”字當讀爲“司”，當主管講。

^⑮ “天繼”，《高宗彤日》作“天胤(yìn)”，“胤”的意思就是後代。

^⑯ 《高宗彤日》作“典祀無豐于昵”，意思是說，在經常的祭祀裏，不應對親近的先人（如父親）特別隆重。可能祖庚在祭祀中有太重視武丁的情況，所以祖己這樣告誡他。《史記》此句跟《高宗彤日》的原文有很大出入，可能有誤，譯文姑且據《史記》勉強譯出。

^⑰ “驩”，音 huān，同“歡”。

^⑱ 《史記》對《高宗彤日》的理解是有問題的。因此這一段說祖己由於“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而尊之爲高宗，也是不可信的。

^⑲ “《訓》”，此篇全名，《書序》作“《高宗之訓》”。

^㉑ 從甲骨卜辭看，商王有時把已死的父王稱爲“帝”，“帝”下可加天干字，但天干字上不能加“祖”、“武”、“大”、“小”等字。在祖甲之子廩辛、康丁時代的卜辭裏，有稱祖甲爲帝甲之例。《國語·周語下》也稱祖甲爲帝甲。所以帝甲這個稱號雖然並不是生稱，但也不是虛構的，跟上帝帝祖庚、帝武丁等稱號不一樣。下文帝乙、帝辛這兩個稱號也不是虛構的，但是帝紂這個稱號就又是虛構的了。

^㉒ “庚丁”，據甲骨卜辭，“庚丁”爲“康丁”之誤。

^㉓ “徙河北”，據古本《竹書紀年》，徙河北的是盤庚，而且自盤庚遷到河北的殷以後，至紂之亡，一直沒有再遷都。《史記》說武乙“去亳，徙河北”，恐不可信。

^㉔ “博”，玩博戲。我國已知的最古博戲是六博，雙方各有六棋，根據投博箸的結果，在博局上行棋，以定勝負。

^㉕ “爲”，音 wèi，給，替。“行”，指行棋。

^㉖ “印”，音 yǐng，同“仰”。

^㉗ “聞”，音 jiān，同“間”。

子帝太丁立。^{①⑦} 帝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立，殷益衰。

帝乙長子曰微子啓，^{①⑧}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①⑨}

帝紂資辨捷疾，^{①⑩}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①⑪}知足以距諫，^{①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①⑬}高天下以聲，以爲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①⑭} 愛妲己，^{①⑮}妲己之言是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①⑯}北里之舞，靡靡之樂。^{①⑰} 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①⑱}而盈鉅橋之粟。^{①⑲} 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②⑰} 益廣沙丘苑臺，^{②⑱}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②⑲} 慢於鬼神。大取樂戲於沙丘，^{③⑰}以酒爲池，縣肉爲林，^{③⑱}使男女僕相逐其間，^{③⑲}爲長夜之飲。

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④⑰}於是紂乃重刑辟，^{④⑱}有炮格之法。^{④⑲} 以西伯昌、九侯、

①⑦ “太丁”，據《晉書·束皙傳》等所引《紀年》，當作“文丁”，卜辭稱“文武丁”。

①⑧ “微”，地名，故地在今山東梁山縣西北，一說在今山西潞城縣東北。啓封於微，故稱微子啓。

①⑨ 紂應是帝辛之名，辛是天干稱號。

①⑩ “資”，資質。“辨”，明察。

①⑪ “格”，打擊，搏鬥。

①⑫ “知”，音 zhì，同“智”。

①⑬ “矜”，音 jīn，自以爲賢能。

①⑭ “嬖”，音 bì，寵愛，親昵。

①⑮ “妲己”，有蘇氏女子，商紂寵妃。蘇爲己姓國，故稱妲己，妲是字，己是姓。“妲”，音 dá。

①⑯ “師涓”，紂的樂師，師是職，涓是名。古代多稱樂師爲師。“涓”，音 juān。或謂“師涓”是“師延”之誤。

①⑰ “靡靡”，柔弱的樣子。

①⑱ “鹿臺”，建築名，故址在今河南淇縣南。紂的別都在沫（也作“沫”，即朝歌，故地在今河南淇縣），鹿臺是沫邑的重要建築。

①⑲ “鉅橋”，商糧倉所在地，故地一說在今河北曲周縣東北，一說在今河南浚縣（舊作“濬縣”）西。

②⑰ “仞”，音 rèn，同“仞”，充滿。

②⑱ “沙丘”，故地在今河北廣宗縣西北。苑，畜養禽獸的園林。

③⑰ “蜚”，音 fēi，同“飛”。

③⑱ “聚”，音 jù，同“聚”。

④⑰ “縣”，音 xuán，同“懸”。

④⑱ “裸”，音 luǒ，同“裸”。一音 huà，義同。

④⑲ “望”，怨恨。“畔”，同“叛”。

④⑲ “辟”，音 bì，法。

④⑲ “炮”，音 páo，燒，烤。“格”，攔東西的架子。“炮格之法”，把人放在下面生着火的銅格上受苦的一種酷刑。

鄂侯爲三公。^⑬ 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憚淫，^⑭紂怒，殺之，而醢九侯。^⑮ 鄂侯爭之彊，^⑯辨之疾，^⑰并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嘆。崇侯虎知之，^⑱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⑲ 西伯之臣閎夭之徒，^⑳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獻洛西之地，^㉑以請除炮格之刑。紂乃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爲西伯。而用費中爲政。^㉒ 費中善諛，^㉓好利，殷人弗親。紂又用惡來。^㉔ 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

西伯歸，乃陰修德行善，諸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西伯滋大，^㉕紂由是稍失權重。^㉖ 王子比干諫，^㉗弗聽。商容賢者，百姓愛之，紂廢之。及西伯伐飢國，^㉘滅之，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㉙恐，奔告紂曰：“天既訖我殷命，假人、元龜，^㉚無敢知吉。

⑬ “西伯”，西方諸侯之長。“西伯昌”，即周文王。“九侯”，有的古書作“鬼侯”，“九”、“鬼”古音相近。古代在今河北磁縣西南有九侯城，也稱鬼侯城。或謂鬼侯即鬼方（商代西北方的一個方國）的君主，鬼侯城是任職於商王朝的鬼侯在王畿內的封邑。九侯之“九”舊或音 qiú。“鄂侯”，有的古書作“邠(yú)侯”，不知何者爲是。鄂的故地在今山西寧鄉縣。邠的故地在今河南沁陽縣西北。“三公”，古代朝廷中地位最高的三個官。

⑭ “憚”，音 xǐ，同“喜”。

⑮ “醢”，音 hǎi，肉醬。

⑯ “彊”，音 qiǎng，同“強”。古代稱極力諫上爲“強(qiǎng)諫”（如下文“比干……迺強諫紂”），“強”字音義與此同。

⑰ “辨”，同“辯”。

⑱ “崇”，國名，依舊說故地在今陝西戶縣（舊作“鄠縣”）東，一說在今河南嵩縣北。

⑲ “羑里”，故地在今河南湯陰縣北。“羑”，音 yǒu。

⑳ “閎”，音 hóng。

㉑ “洛”，即今陝西北部的洛河。

㉒ “費中”，他書多作“費仲”。“中”，音 zhòng，同“仲”。

㉓ “諛”，音 yú，奉承。

㉔ “惡來”，秦先祖蜚（飛）廉之子，父子俱事紂。惡來以有力著稱，武王伐紂時被殺。

㉕ “滋”，加益。

㉖ “稍”，逐漸。

㉗ “王子比干”，據說是紂的叔父。他是商王之子，故稱王子。

㉘ 以下一段據《尚書·西伯戡黎》篇。西伯此次所伐之國，《尚書》作“黎”，《尚書大傳》作“耆”，《史記》作“飢”。“黎”、“耆”、“飢”古音相近，一般認爲指同一個國家。黎國故地在今山西長治西南。

㉙ “咎”，憎惡。

㉚ “假人”，《西伯戡黎》作“格人”。“格”、“假”古音相近，古書時常借“假”爲“格”，《史記》的“假人”似應讀爲“格人”。從文義看，“格人”應是能知天意和吉凶的人。“格”字古有“至”義。《尚書·君奭(shì)》說商代賢臣伊尹等人“格于皇天”“格于上帝”，大概就是說他們能直接跟上帝打交道。“格人”可能就指能“格于皇天”“格于上帝”的人。“元龜”，特大的龜，古人用龜甲占卜，認爲龜越大越靈驗。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維王淫虐用自絕，故天弃我，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⑮不迪率典。^⑯今我民罔不欲喪，曰‘天曷不降威，^⑰大命胡不至’？今王其柰何？”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紂不可諫矣。”西伯既卒，周武王之東伐，至盟津，^⑱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乃復歸。

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⑲乃與大師、少師謀，^⑳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迺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㉑乃詳狂爲奴，^㉒紂又囚之。殷之大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紂亦發兵距之牧野。^㉓甲子日，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周武王遂斬紂頭，縣之[大]白旗。^㉔殺妲己。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㉕表商容之間。^㉖封紂子武庚祿父，^㉗以續殷祀，令修行盤庚之政。殷民大說。^㉘於是周武王爲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爲王。^㉙而封殷後爲諸侯，屬周。

周武王崩，武庚與管叔、蔡叔作亂，^㉚成王命周公誅之，^㉛而立微子於宋，^㉜續殷後焉。

⑮ “虞”，揣度(duó)。

⑯ “迪”，由。“率”，法。

⑰ “曷”，音 hé，何，怎麼。

⑱ “盟津”，即孟津，黃河古津渡名，在今河南孟津縣跟孟縣之間。

⑲ “數”，音 shuò，屢次。

⑳ “大師、少師”，《尚書·微子》作“父師、少師”，解說《尚書》的多數認爲指箕子和比干。《殷本紀》下文說“殷之大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周本紀》說“太師疵(cǐ)、少師彊(qiáng)抱其樂器而奔周”，可知司馬遷認爲微子所與謀的大師、少師就是掌樂的太師疵、少師彊。大師之“大”音 tài，同“太”。

㉑ “箕子”，商貴族，封於箕(在今山西太谷縣東北)，故稱箕子，或謂是紂的父輩。

㉒ “詳”，音 yáng，同“佯”，假裝。

㉓ “牧野”，故地在今河南淇縣西南，屬於紂別都沫的郊野地區。

㉔ “大白”，古代一種純白的旗，也稱“太白”。

㉕ “封”，堆土，在墓上堆土爲墳。

㉖ “間”，音 lú，里巷的大門。

㉗ “武庚祿父”，祿父是名，武庚是號，與武丁、武乙等號同例。

㉘ “說”，音 yuè，同“悅”。

㉙ 夏、商、周三代的王都未曾生稱帝，周貶帝號稱王的說法是不可信的。

㉚ “管叔、蔡叔”，都是周武王之弟。武王滅殷後，命管叔、蔡叔輔助武庚治殷王畿故地(或謂管叔、蔡叔和武庚三分殷王畿而治)。武王死後，管叔、蔡叔聯合武庚反對在中央執政的武王之弟周公。事詳《史記》的《周本紀》、《管蔡世家》等篇。

㉛ “成王”，武王之子，見《周本紀》。

㉜ “宋”，宋都故地在今河南商丘，本是商族的根據地。

太史公曰：余以《頌》次契之事，^{①⑤}自成湯以來，采於《書》、《詩》。契爲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①⑥}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孔子曰，殷路車爲善，^{①⑦}而色尚白。

殷本紀譯文

殷族始祖契的母親叫簡狄，是有娥氏的女子，帝嚳的居次位的妃子。她跟另兩個女子一起到水邊洗澡，看見一個燕子掉下了它的蛋，簡狄把蛋拿來吞吃了，因此懷孕生下了契。契長大後幫助禹治水有功，帝舜任命契當司徒，舜說：“百姓不相親睦，家庭關係不和順，你當司徒，恭謹地施行倫理道德的教育，要以寬厚爲本”，並把他封在商這個地方，賜他這一族姓子。契興起於唐、虞、大禹的時代，給百姓做了很多好事，百姓因此得到了安定。

契死後，兒子昭明繼立。昭明死後，兒子相土繼立。相土死後，兒子昌若繼立。昌若死後，兒子曹圉繼立。曹圉死後，兒子冥繼立。冥死後，兒子振繼立。振死後，兒子微繼立。微死後，兒子報丁繼立。報丁死後，兒子報乙繼立。報乙死後，兒子報丙繼立。報丙死後，兒子主壬繼立。主壬死後，兒子主癸繼立。主癸死後，兒子天乙繼立，這就是成湯。

從契到湯，居地遷了八次。湯方始在亳居住下來，這是帝嚳住過的地方，《尚書》中的《帝誥》篇就是因爲遷居於亳而作的。

湯征伐諸侯。葛伯不奉祭祀，湯首先征伐他。湯說：“我有一句話：人從水能看到自己的形象，觀察人民就能知道治理得好不好。”伊尹說：“真明智啊！能聽別人的話，治國的道理才有人向你說。君臨國家，親民如子，爲善的人就都來任職了。努力啊，努力啊！”湯對衆人說：“你們如果不能遵從我的命令，我就重重地懲罰你們，決不寬赦。”《尚書》中的《湯征》篇就是這時作的。

伊尹名叫阿衡。他想見湯，苦於沒有門路，就去當湯所娶的有莘氏女子的陪嫁奴隸，背着庖廚的用具，通過割烹調味的道理來勸說湯，使他成爲天下的聖王。也

①⑤ “《頌》”，指《詩經》中的《商頌》。《商頌》中的《玄鳥》、《長發》都說到契的事。

①⑥ 其實是“以國爲氏”。上古姓、氏有別，如商、周是氏，子、姬是姓。司馬遷把姓和氏混爲一談，是不正確的。上文“姓子氏”、“以傳險姓之”等說法都有問題。

①⑦ “路車”，上古君主所乘的一種車。“路”也作“輅”。《論語·衛靈公》：“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

有人說，伊尹本是個隱士，湯派人聘請他，請了五次他才肯去，跟湯講無爲而治的素王之道以及九種君主的優劣。湯就用他來治理國家。伊尹曾離開湯到夏國去。他看到了夏的醜惡，又回到了亳。他從亳的北門入城，遇到了湯的臣下女鳩、女房，《尚書》中的《女鳩女房》篇就是記伊尹跟他們所說的話的。

商湯外出，看到野外打獵的人四面張網，禱告說：“從天下四方都到我的網裏來。”湯說：“嘿！那樣就一網打盡了！”就去掉了三面的網，禱告說：“要向左的向左，要向右的向右，不聽命的就到我的網裏來。”諸侯們聽到這件事，都說：“湯的德行好得無以復加了，連禽獸都受到恩惠。”

正當這個時候，夏王桀對人民很暴虐，荒淫無道，諸侯裏的昆吾氏也常幹壞事。湯就發兵率領諸侯去討伐，伊尹跟着湯，湯親自拿着大鉞去打昆吾，接着就去打夏桀。湯說：“你們大家都來聽我講話。並非我這個小子敢起來作亂。夏的罪惡多端，我聽到你們都說夏有罪。我畏懼上帝，不敢不去懲治。現在夏的罪惡多端，是上天要誅滅他。現在你們大家却說‘我們的君王不憐恤我們，廢棄我們的農事去征伐誰呢’？你們還會說‘夏有罪，又拿他怎麼樣呢’？夏王破壞人民的生產力，在整個夏國進行掠奪。民衆都懈怠不聽從他，還詛咒他說‘這個太陽什麼時候才滅亡？我們願跟你同歸於盡’！夏的德行壞到了這個地步，現在我一定得去征伐他。你們要幫助我奉行上天的懲罰，我將重重賞賜你們。你們不要不相信，我是不會說話不算數的。你們如果不服從誓言，我就要嚴懲你們以及你們的妻子兒女，決不寬赦。”當時把這些話當作命令告諭全軍，史官記下來就成了《尚書》中的《湯誓》篇。於是湯說“我非常勇武”，就把武王當作稱號。

桀在有娥之虛被打敗，逃奔到鳴條，夏軍潰敗。湯接着就打三鬯，取得了那裏的寶玉，義伯、仲伯因此作了《典寶》。湯勝了夏，想改置社神而不能，因此作了《夏社》。伊尹向湯報告了各地的情況。這時候諸侯都歸服於湯，湯就即了天子之位，平定了四海之內。

湯在伐三鬯後的歸途裏走到泰卷這個地方的時候，大臣仲虺作了一篇誥，[這就是《尚書》中的《仲虺之誥》。]湯既已推翻了夏朝，回到了亳，作《湯誥》：“在三月裏，王親自到東郊，告諭諸侯們說：‘不要無功於民，努力幹你們的事。[不然，]我就要重重懲罰你們，你們不要怨我。’又說：‘古代禹和皋陶長年在外辛勞受苦，才能有功於人民，人民才能安定下來。他們東治江，北治濟，西治河，南治淮，這四條大川治理好以後，民衆才有地方居住。后稷教民播種，努力繁殖百穀。這三位都有功於民，所以他們的後代才能立國。過去蚩尤跟他的臣下危害百姓，上帝就不保佑

他。這些都是有事實可見的。大家應該努力按照先代聖王的話去做。’又說：‘如果無道，就不讓他統治國家。你們可不要怨我。’”這些話作為命令遍告諸侯。這時還有伊尹作了《咸有一德》，咎單作了《明居》。

湯於是改定建丑之月為正月，把車馬等物的顏色改為以白色為上，群臣朝見天子用白晝的時間。

湯死後，由於太子太丁尚未即位就已死去，就立了太丁的弟弟外丙為君，這就是帝外丙。帝外丙在位三年死去，又立外丙的弟弟仲壬為君，這就是帝仲壬。帝仲壬在位四年死去，伊尹於是立太丁的兒子太甲為君。太甲是成湯的嫡長孫，這就是帝太甲。帝太甲元年，伊尹為了訓誡太甲作了《伊訓》、《肆命》和《徂后》。

帝太甲為君三年，不明事理，又很暴虐，不遵守湯的法度，德行敗壞。因此伊尹把他放逐到桐宮去，自行代理國政，接受諸侯的朝見。

帝太甲在桐宮住了三年，悔過向善，於是伊尹就把他迎了回來，把政權交給他。帝太甲的德行不斷好起來，諸侯都歸服殷朝，百姓由此得到了安寧。伊尹很贊賞，就作了《太甲訓》三篇來表揚太甲，尊稱他為太宗。

太宗死後，兒子沃丁繼立。帝沃丁的時候，伊尹死去。安葬伊尹於亳的事辦完後，咎單就講說伊尹的行事，作了《沃丁》。

沃丁死後，弟弟太庚繼立，這就是帝太庚。帝太庚死後，兒子帝小甲繼立。帝小甲死後，弟弟雍己繼立，這就是帝雍己。這時殷朝衰落，有些諸侯就不來朝了。

帝雍己死後，弟弟太戊繼立，這就是帝太戊。帝太戊任命伊陟當了宰相。在亳都朝廷上忽然有桑樹和穀樹合在一起生出來，一晚上就長得需要用兩手圍握那麼粗。帝太戊很害怕，就去問伊陟。伊陟說：“我聽說怪異的事物敵不過好的德行，難道是您治理國家有什麼缺點嗎？您應該使自己的德行好起來。”太戊聽從了他，怪樹就枯死而消失了。伊陟向巫咸贊美講述了這件事，巫咸治理王家也很有成績，於是作了《咸艾》和《太戊》。帝太戊在宗廟裏稱贊伊陟，並說為了尊重他不把他當臣下對待，伊陟謙讓不敢當，因此作了《原命》。這時殷朝復興，諸侯歸服，所以太戊尊稱為中宗。

中宗死後，兒子帝仲丁繼立。帝仲丁把都城遷到隰，河亶甲遷到相，祖丁又遷到邢。帝仲丁死後，弟弟外壬繼立，這就是帝外壬。《尚書》中的《仲丁》篇已經亡佚不可見。帝外壬死後，弟弟河亶甲繼立，這就是帝河亶甲。河亶甲的時候，殷朝又衰落了。

河亶甲死後，兒子帝祖乙繼立。帝祖乙即位後，殷朝又興盛起來，巫賢受到

任用。

祖乙死後，兒子帝祖辛繼立。帝祖辛死後，弟弟沃甲繼立，這就是帝沃甲。帝沃甲死後，立沃甲的哥哥祖辛的兒子祖丁爲君，這就是帝祖丁。帝祖丁死後，立沃甲的兒子南庚爲君，這就是帝南庚。帝南庚死後，立帝祖丁的兒子陽甲爲君，這就是帝陽甲。帝陽甲的時候，殷朝又衰落了。

從仲丁以來，常常撇開嫡子而由王弟和王子們輪流繼位，有時王弟和王子還互相爭位，接連九世情況都很混亂，於是諸侯就都不來朝見了。

帝陽甲死後，弟弟盤庚繼立，這就是帝盤庚。帝盤庚即位的時候，殷都已經遷到了大河之北。盤庚渡河南向，遷回成湯的故居。〔到盤庚遷都的時候，〕殷朝已經遷了五次都，總是定不下來。殷人都愁嘆怨恨，不願再遷徙。盤庚就告諭諸侯和大臣們說：“過去先王成湯跟你們的先祖一起定天下，他的法則是可以遵循的。捨棄他的法則而不作努力，怎麼能弄得好呢！”於是就渡河南遷，定都於亳，遵行湯的治國方法。這樣做了以後，百姓由此安寧，殷朝國勢重新興盛，諸侯都來朝見，這就是由於盤庚能像成湯那樣行事的緣故。

帝盤庚死後，弟弟小辛繼立，這就是帝小辛。帝小辛即位後，殷朝重又衰落。百姓思念盤庚，就作了《盤庚》三篇。帝小辛死後，弟弟小乙繼立，這就是帝小乙。

帝小乙死後，兒子帝武丁繼立。帝武丁即位後，想復興殷朝，但沒有找到合適的助手。因此三年不說話，政事都由太宰決定，暗中觀察國情。武丁夜裏做夢得到了一個聖人，名叫說。他察看衆多的官吏，沒有一個跟夢中所見的人相合。於是就派很多畫工等類的人在民間到處尋求，終於在傅險這個地方找到了說。當時說作爲刑徒正在傅險服建築方面的勞役。說被送到了武丁那裏，武丁一見就說“找對了”。跟他一交談，果然是個聖人，就任他爲宰相，他把國家治理得非常好。於是就根據傅險這個地名來給他定姓氏，稱他爲傅說。

帝武丁祭祀成湯的第二天，有野鷄飛來站在鼎耳上叫，武丁很害怕。祖己說：“王不要憂愁，先搞好政事要緊。”祖己於是告誡王說：“上天觀察下民，主要看他們的行爲是否合乎道理，天賜給人的壽命有長有短，〔壽命短是由於人的行爲不合道理，〕並不是天要使人夭折，使人的生命中斷。有的人不順道理，又不服罪，等到上天已經按照他的表現給了他相應的命運，才說怎麼辦呢，〔這就已經遲了。〕唉！王應該慎重對待民事，大家都是天的後代，舉行經常的祭祀的時候，禮儀不要不合乎道理。”武丁改善政治，布施恩惠，天下的人都很歡欣，殷朝國勢又重新興盛了起來。

帝武丁死後，兒子帝祖庚繼立。祖己贊美武丁能由於怪異的野鷄而修德行善，

爲他立了廟，尊稱爲高宗，於是作了《高宗彤日》和《高宗之訓》。

帝祖庚死後，弟弟祖甲繼立，這就是帝甲。帝甲荒淫敗德，殷朝又衰落了。

帝甲死後，兒子帝廩辛繼立。帝廩辛死後，弟弟康丁繼立，這就是帝康丁。帝康丁死後，兒子帝武乙繼立，殷都又由亳遷到了大河之北。

帝武乙無道，做了假人，把他叫做天神，跟他玩博戲，命令人代他走博棋，天神輸了，就侮辱他。還用皮革做袋子，盛了血，[高高挂起，]仰面射它，稱爲“射天”。武乙在大河和渭水之間田獵，天忽然打雷，武乙被雷震死。兒子帝文丁繼立。帝文丁死後，兒子帝乙繼立。帝乙即位後，殷朝更加衰弱了。

帝乙的長子叫微子啓，啓的母親地位低下，因此啓不能繼承王位。小兒子是辛，辛的母親是正后，所以辛成爲王位繼承人。辛乙死後，兒子辛繼立，這就是帝辛，天下人稱他爲紂。

帝紂天生明察敏捷，耳朵、眼睛都很靈，勇力過人，能徒手跟猛獸搏鬥；智慧足夠用來駁斥勸諫，口才足夠用來掩飾過錯；以才能向臣下自誇，以名聲來壓倒天下，認爲所有的人都不如自己。他喜歡喝酒，享樂過度，親近婦女；尤其寵愛妲己，就聽妲己的話。他讓樂師涓創作了新的放蕩的曲調，還有北里之舞和輕柔頹廢的音樂。爲了裝滿鹿臺的錢庫和鉅橋的糧倉，大大加重了各種稅收。又大量搜取狗、馬和各種珍奇的東西，塞滿了宮室。還擴大沙丘的大園子，增建亭臺樓閣，取了很多野獸飛鳥放在園子裏。他怠慢鬼神。他在沙丘大搞舞樂雜技等表演，用大池子盛酒，把大量的肉挂起來就像個樹林，讓男男女女光着身子在其中相互追逐，通宵飲酒取樂。

百姓怨恨紂，諸侯也有背叛的，於是紂就加重刑法，還造出了殘酷的炮烙之刑。紂任命周君西伯昌、九侯和鄂侯爲三公。九侯有個漂亮女兒，他把她獻給了紂。九侯的女兒不喜歡淫亂，紂大爲惱怒，就殺死了她，還把九侯剁成肉醬。鄂侯爲這件事跟紂爭辯得很激烈，紂把鄂侯也處死，把他的肉做成肉乾。西伯昌聽到後，私下嘆息，被崇侯虎知道，他就向紂告了密，紂把西伯囚禁在羑里。西伯的臣下閎夭等人，搜求美女、珍奇的東西和好馬獻給紂，紂就赦免了西伯。西伯出獄後獻出洛水西面的一塊土地，請求紂廢除炮烙之刑。紂答應了他，還賜給他弓箭斧鉞，使他有權征伐不聽令者，讓他當西方諸侯的首領。紂任用費仲主持政務。費仲善於拍馬，又很貪財，殷人都不喜歡他。紂又任用惡來。惡來善於說人壞話，諸侯因此越發跟紂疏遠了。

西伯回到自己的國家，暗地修德行善，有許多諸侯背叛紂而投到西伯那裏去。

西伯不斷強大，紂的權威因此逐漸喪失。王子比干勸諫紂，紂不聽。商容是一個賢人，百姓喜歡他，紂却廢而不用。等到西伯伐滅了飢國，紂的臣下祖伊知道後，認識到周是殷的大害，非常恐慌，跑去告訴紂說：“上天已經終止了我們殷朝的國運，知道天意的人不敢再說我們有好命運，大卜龜也不再顯示吉兆，並不是先王不幫助我們後人，是王荒淫暴虐，自絕於天。所以上天拋棄我們，使我們不能安穩生活。大家都不求知道天性，都不按照常法。現在我們的人民沒有不希望我們殷朝滅亡的，他們說‘上天為什麼不降下懲罰，天命為什麼還不到來’？現在王準備怎麼辦呢？”紂說：“我生下來不是有命在天的嗎？”祖伊回去後說：“紂已經無法勸諫了。”西伯死後，周武王東征，到了盟津，諸侯背叛殷朝來跟周人會合的有八百個。諸侯都說：“可以討伐紂了。”武王却說：“你們還沒有知道天命。”於是就回去了。

紂的胡作非爲愈來愈厲害。微子屢次勸諫，紂都不聽，於是微子就跟太師、少師商量，下決心離紂而去。比干說：“當臣子的，就是要丟命也得據理力爭。”就在紂面前極力諫爭。紂發怒說：“我聽說聖人的心有七個竅。”就剖開比干的胸來看他的心。箕子很害怕，假裝發狂去當奴隸，紂把他囚禁了起來。殷朝的太師和少師看到這種情況，就帶着祭祀時用的樂器逃往周國了。於是周武王就率領諸侯去討伐紂王，紂也發兵在別都妹邑郊外的牧野抗禦周軍。甲子那一天，紂軍大敗。紂逃回妹邑，登上鹿臺，穿上他的寶玉衣，投火而死。周武王砍下紂的頭，把它挂在叫做“大白”的旗上；並殺死了妲己。〔另一方面，〕釋放了箕子，給比干的墓加了封土，在商容所居里巷的大門上加了表揚他的標誌；又封紂的兒子武庚祿父爲君，繼續奉祀殷的先人，並要他遵行盤庚的治國方法。殷人十分高興。於是周武王就當了天子。周朝後來取消帝號，降級稱王。殷王的後人封爲諸侯，從屬於周。

周武王死後，武庚跟周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一起作亂，成王任命周公討伐，殺了武庚，把微子立爲宋君，使殷的先人仍有後代繼續奉祀他們。

太史公說：我根據《商頌》來敘述契的事跡。從成湯以下，根據《尚書》和《詩經》。契的姓是子，後代分封，以國名爲姓，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孔子說，殷的路車很好，顏色崇尚白色。

原載《全注全譯史記》（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今據作者手稿收入。

四十年來發現的簡帛古籍對傳世 古籍整理工作的重要性(提要)

50年代後期以來,我國考古工作者在戰國秦漢時代的墓葬裏,陸續發現了不少簡帛古籍。其中,70年代的幾次發現,其重要性可以與歷史上孔壁古文和汲冢竹書的發現相比。80年代以來,仍時有重要發現。本文擬對這四十年裏簡帛古籍的各次發現作簡單的介紹,並粗淺地談談這些古籍對傳世古籍的整理工作的重要意義。

一、各次發現簡介

1957年3至5月,河南長臺關一號楚墓(發掘者定其時代為戰國早期)出土古書殘簡,近年有學者定為《墨子》佚篇。

1959年7月,甘肅武威磨咀子六號漢墓出土《儀禮》木簡八篇、竹簡一篇。

1972年4月,山東臨沂銀雀山一號漢墓(屬武帝早期)出土《孫子》、《孫臏兵法》、《晏子》、《尉繚子》、《太公》(《太公》為《漢書·藝文志》所用書名,今傳《六韜》原為其一部分)以及論政、論兵和陰陽占候等方面的佚書多種,惜竹簡殘損嚴重。

1973年5至12月,河北定縣八角廊四十號漢墓(發掘者定為死於宣帝時的中山懷王劉脩墓)出土了一批已因焚燒而炭化的竹書,內容有《論語》、《文子》、《太公》、*《儒家者言》(前加*號的書名為整理者所擬,下同)等,竹簡殘損情況也很嚴重。

1973年11至12月,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下葬於文帝十二年)出土《老子》(有兩本,卷前或卷後抄有佚書)、《周易》(附有《易繫辭》和不見於今本的佚傳)、*《春秋事語》、*《戰國縱橫家書》以及醫藥、占候等方面的帛書多種。同墓還出了房中術方面的簡書。

1975年12月,湖北雲夢睡虎地十一號秦墓出土秦律、《日書》等竹簡。

1977年7至8月,安徽阜陽雙古堆一號漢墓(發掘者定為死於文帝時的汝陰侯夏侯竈之墓)出土《詩經》、《周易》(可能為著龜家之《易》)、《倉頡篇》、*《萬物》等竹書多種,惜竹簡極為殘碎。

80年代,江陵九店五十六號楚墓(發掘者定其時代為戰國後期前段)出土日書竹簡。

1983至1984年間,江陵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屬呂后時期)出土漢律、《奏讞書》、《脈書》、《引書》、《算數書》、《閭廬》等竹書。

1985年秋,張家山三三六號漢墓(屬西漢早期)出土漢律、《功令》、《盜跖》等竹書。

1986年,甘肅天水放馬灘一號秦墓(屬戰國晚期)出土日書等竹簡。

1987年6月,湖南慈利石板坡三十六號楚墓(發掘者定其時代為戰國中期偏早)出土一批竹簡,似包含數種古書,惜極為殘碎。

1989年,湖北雲夢龍崗六號秦墓出土秦律竹簡。

1993年10月,湖北荊門郭店一號楚墓(發掘者定其時代為戰國中期偏晚)出土《老子》、《緇衣》等竹書。

近兩年在香港古物市場上也出現了大約盜掘自荊門楚墓的竹簡,其中也有古籍,大部分已為上海博物館購回。

二、簡帛古籍對研究古籍形成過程的作用

古代子書往往是某一學派傳習的資料彙編,其中不但有先生的著述、言論,也有門弟子或後學增益的“學案、語錄、筆記、傳狀、注釋”等類內容(參看余嘉錫《古書通例》)。銀雀山漢墓所出《孫子》,提供了這方面的一個很好的例證。

古代數術、方技方面的著作,往往是以較早的同類著作為依據,逐漸修改、增益而成定本的。馬王堆帛書和張家山竹書中的脈書,可以視作《內經·靈樞》中的《經脈》篇的祖本,張家山竹書中的《算數書》跟後來的《九章算術》也有很密切的關係。

銀雀山竹書中的有些篇跟《管子》有密切關係,尤其是《王兵》篇,其內容分別見於《管子》的《七法》、《參患》、《地圖》等篇,而且通過對比可以看出是《管子》襲用、割裂《王兵》篇的。這對瞭解《管子》的成書過程有重要意義。

三、簡帛古籍對研究古籍真偽、時代的作用

今本《六韜》、《尉繚子》、《晏子》都曾被人疑為非先秦之書。西漢早期的銀雀山墓出土了這些書的部分篇章,文字與今本大體相合。一種書從寫成到流傳,總要經過不太短的一段時間,這些書的著作時代當不晚於戰國。今本基本上可以看作先秦古籍。

今本《鶡冠子》被很多人看作後人依託的偽書。馬王堆漢墓出土的《老子》乙本卷前佚書等,有不少跟《鶡冠子》相同或相似的文字,可證其並非偽書。

今本《文子》跟《淮南子》有大量相同的內容,前人多認為今本與《漢書·藝文志》所著錄者非一書,乃是後人抄襲《淮南子》等書而成的偽書。從八角廊漢墓所出《文子》殘簡看,今本雖經後人作過較大的改動,但仍保留了不少漢代本的實質性內容,不能簡單地視為抄襲《淮南子》等書而成的偽書。

戰國楚墓和馬王堆漢初墓都出土了《老子》,宣告了不少《老子》晚出的說法的破產。看來《老子》成書的時代最晚也晚不過戰國早期。

銀雀山漢墓同時出土孫武和孫臏的兵法,宣告了《孫子》為孫臏所作之說的破產。

由於簡帛古籍的出土而進一步明確的關於古書形成過程的一些情況,對我們正確理解有關古籍的真偽和時代問題,也有很大幫助。

四、簡帛古籍對研究古籍傳承等情況的作用

簡帛古籍中的《周易》、《詩經》、《儀禮》,都是我們所已知的各家之外的本子。由此可以窺見經書傳承的複雜性。

有些古書的簡帛本和傳刻本,其篇章分合有出入,《老子》、《晏子》等都有這種情況。

以同一書的簡帛本、唐以前人引文和宋代以來的傳刻本相對照,可以看出傳刻本跟簡帛本在內容上的差別,要比唐以前的傳抄本大得多。這反映了印刷的流行對古書不利的一面。

五、簡帛古籍對校讀傳世古籍的文字的作用

在利用同一書的簡帛本校讀今本方面，學者們已經取得了不少成績，對《老子》、《孫子》、《戰國策》等書的校讀的成績尤為突出。

簡帛古籍中的佚書跟傳世古籍相重的部分以及其他與傳世古籍有關的內容（如相同的詞語等），也都可以用於古籍的校讀。

簡帛古籍的字形特點以及用字和書寫的習慣，也是校讀古籍的根據。

用簡帛古籍校讀傳世古籍，有時能解決很重要的問題，如《荀子》提到的思、孟五行說的確切內容，就是依靠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卷後佚書弄清楚的。即使是某些對文義沒有明顯影響的異文，如否定詞用“弗”或“不”的不同，對研究古漢語語法也是有重要意義的。

在今天，從事先秦秦漢古籍的整理研究，已經離不開簡帛古籍了。

本文是準備提交給1996年在臺北召開的兩岸古籍整理學術研討會的論文的提要（由於時間不夠，全文沒有寫成，後來在會上提出的是《簡帛古籍的用字方法是校讀傳世先秦秦漢古籍的重要根據》）。原載《漢學研究通訊》第15卷第1期（1996），又載《裘錫圭學術文化隨筆》，今據後者收入。

古文獻中讀爲“設”的“執” 及其與“執”互訛之例

武威漢墓出土的簡本《儀禮》往往以“執”爲“設”，如《特牲饋食禮》“設洗于阼階東南”句，簡本《特牲》第七號簡作：

執洗于作階東南

《武威漢簡》編者的校記說：

執，今本作設，疑是執（即藝所從）字。^①

我在《釋殷墟甲骨文裏的“遠”“𡗗”（邇）及有關諸字》一文中已指出：

……漢隸“執”字及“執”旁作“執”者習見，如老子銘“執”（勢）字、丁魴碑“藝”字與北海相景君銘“藝”字所從的“執”旁等（參看《隸辨》）。武威簡“執”字沒有問題就是“執”字。^②

並指出：

古音“執”屬祭部，“設”屬月部。二字之間存在着嚴格的陰入對轉的關係。“執”可讀作“勢”。“勢”、“設”聲母相同。^③

所以“執”可以讀爲“設”。

簡本《儀禮》一方面時常以“執”爲“設”（除《特牲》外，《少牢》、《有司》、《燕禮》、《泰射》等篇中均有其例），一方面也時常用“設”字（《少牢》、《有司》多用“設”），有時甚至一簡之中“執”、“設”並見而用法無別（如《少牢》第一

① 甘肅省博物館等《武威漢簡》，文物出版社，1964。此書中的校記出陳夢家之手。“執”是“執”字古文字寫法的隸定形。

② 拙著《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9頁注⑮。

③ 同上，注⑭。

二號簡)。可見漢代人在寫“設”這個詞的時候,或作“設”,或作“執”,頗為隨便。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簡整理小組不久前發表的《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釋文》中有如下一條:

□天子執(設)明堂□中□,天子□□□^④

此文用簡化字印出,疑“執”字在原釋文中作“執”,由於被誤認為“執”而印成簡化字“執”。

馬王堆帛書中也有讀為“設”的“執”字,詳下文。

上引考釋甲骨文“遠”、“𠬞”等字的拙文,指出殷墟甲骨田獵卜辭中的“執冒”應該讀為“設罟”。^⑤ 古書中屢見“設網”一類話,如《淮南子·繆稱》“譬若設網者”、《禮記·王制》“然後設罟羅”、《大戴禮記·夏小正》“主設罔罟者也”等。可見把卜辭的“執冒”之“執”讀為“設”,是合理的。這說明把“設”這個詞寫作“執”,是由來已久的習慣。

知道古人往往以“執”為“設”,對校讀古書很有用處。

《荀子》書通常以“執”為“勢”,但也有個別“執”字是應該讀為“設”的。後人不察,把後者也讀為“勢”,應加糾正。

《荀子·儒效》:

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執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慙,必為順下矣。

楊倞注解釋“執在本朝而宜”句說:“言儒者得權執(勢)在本朝則事皆合宜也。”這種解釋顯然很勉強,所以王念孫在《讀書雜誌·荀子第二·儒效》“執在本朝”條中,提出了另一種解釋。他說:

執者,位也。言位在本朝也。《禮運》“在執者去”,鄭注曰:“執,執位也。”

下文曰“執在人上”,《仲尼》篇曰“執不在人上,而羞為人下”,《正論》篇曰“執位至尊”,是“執”與“位”同義。楊以“執”為權執,失之。

王氏把“執在本朝”的“執”理解為指“執(勢)位”,文義仍不通順。“執在本朝”與

^④ 《文物》1995年12期32—33頁0211號簡。

^⑤ 同注②,7頁。

下文“退編百姓”爲對文，“執”宜爲動詞，當讀爲“設”。

“設”有“置”、“立”等義，古書中說到置立官職爵位或任人以職等事時，往往用“設”字，如《禮記·文王世子》“設四輔及三公”、《韓非子·難二》“設官職，陳爵祿”、同書《詭使》“設爵位”、《墨子·耕柱》“衛君致祿甚厚，設之於卿”、“致祿甚厚，設我於卿”。《荀子》本書中也數見其例，如《君道》說：

……善顯設人者，人樂之。……不能顯設人者，人不樂也。……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上賢使之爲三公，次賢使之爲諸侯，下賢使之爲士大夫。是所以顯設之也。

《臣道》說：

故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頗（楊倞注：設謂置於列位）。

《儒效》“執在本朝而宜”句，語意與此處所引《臣道》之文相同，可見“執”字確應讀爲“設”。

《荀子》裏還有一個應該讀爲“設”的“執”字。《正名》說：

心平愉則色不及傭而可以養目，聲不及傭而可以養耳……故無萬物之美而可以養樂，無執列之位而可以養名。

“執列”，楊倞注解釋爲“班列”，其實應該讀爲“設列”。

古人於任官授爵之事每言“設”言“列”。言“設”之例已見前引。言“列”之例，如《禮記·曲禮下》“爵祿有列於朝”、同書《表記》“其賞罰用爵列”、《荀子·大略》“列官職，差爵祿，非以尊大夫而已”等，也屢見不鮮。《大戴禮記·千乘》：

公曰：千乘之國，受命於天子……設其四佐，列其五官，處其朝市，爲仁如何？

以“設”與“列”對舉，是“執列”當讀爲“設列”的明證。

馬王堆帛書《周易》所附《繆和》篇，有下引一些跟這裏討論的問題有關的內容：

□君之爲爵立（位）賞慶也，若體（體）執（勢）然，大能奮（？）細；故上能使下，君能令臣；是以動則又（有）功，靜則又（有）名。列執尤尊，賞祿甚厚，能弄

(寵)傳(輔)君而國不損幣(敝)者,蓋无又(有)矣。^⑥

……立爲刑辟,以散其群黨;執爲賞慶爵列,以勸天下群臣黔首男女。^⑦

……執列爵立(位)之尊,明厚賞慶之名,此先君之所以勸其力也。^⑧

以上三段文字中,除第一段有一個應讀爲“勢”的“執”字外,其他“執”字也都應該讀爲“設”。【編按:上引後兩段釋文都有錯誤,參看本書《再談古文獻以“執”表“設”》的注④及“校清樣時追記”。】

上引第二段以“執”與“立”爲對文,第三段以“執列”與“明厚”爲對文,“執”之當讀爲“設”十分明顯。把“執列爵位之尊”跟《荀子》的“執列之位”對照一下,可以進一步看清後者的“執列”確應讀爲“設列”。第一段的“列執”與“執列”同義。“列執尤尊”,意即設列的官爵過於尊貴。此文認爲君上給予臣下官爵賞祿要適度,官爵過尊,賞祿太厚,會造成尾大不掉等不利於國的後果。

古書中的有些“勢”字,其實也是後人將本應讀爲“設”的“執”字誤改而成的。

《淮南子》兩見“勢施”之文:

今有六尺之席,臥而越之,下材弗難;植而踰之,上材弗易。勢施異也。

《說林》(《文子·上德》有相似文字,末句全同)

輪圓輿方,轅從衡橫,勢施便也。

《泰族》

“勢施”很費解。《淮南子》中又有“設施”之語:

易則用車,險則用騎,涉水多弓,隘則用弩,晝則多旌,夜則多火,晦冥多鼓,此善爲設施者也。

《兵略》

且夫精神滑淖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雲蒸風行,在所設施。《脩務》

把前引《說林》和《泰族》的“勢施”讀爲“設施”,文義就很通順了。“勢施”無疑本作“執施”(“勢”字後起,漢以前只用“執”字),後人把本應讀爲“設”的“執”字誤讀爲“勢”,給它加上了“力”旁。由於“勢”、“設”音近,也可以把這種“勢”字看作

⑥ 陳松長《馬王堆帛書〈繆和〉、〈昭力〉釋文》,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六輯 368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原釋文釋“列”爲“死”,釋“尊”(帛書原作“尊”)爲“奠”,今據作者七十年代參加馬王堆帛書和銀雀山竹書整理工作時據《繆和》篇照片所作的自用釋文更正。原釋文“大”與“使下”之間用缺文號,也據作者釋文補出。標點等也有改動。下面所引的兩段釋文也都有改動,不再說明。

⑦ 同上,369 頁。

⑧ 同上,371 頁。

“設”的通假字。

《韓非子》和《逸周書》中都有可能應該讀爲“設”的“勢”字。

《韓非子·有度》：

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

郎中爲近侍之臣，《韓非子》中屢見此稱。此處舊注單釋“郎”字爲“近侍之官”，非是。俞樾《諸子平議》卷二十一認爲“勢在郎中”之“勢”“當作‘勢’”。我懷疑這個“勢”字也應該讀爲“設”。“設在郎中”的文例與前引《荀子》“設在本朝”、《墨子》“設之於卿”相近，意謂被任爲郎中而在君主身邊。

同書《南面》：

人臣爲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議是事者，妬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聽群臣；群臣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如是者謂之壅於言。

王先慎《韓非子集解》引王先謙曰：“二勢者，主拒諫，臣緘默，兩者必然之勢。”其說牽強難信。疑此“勢”字也應讀爲“設”，“二設者”即指上文所說的既“設事”又“設言”的“人臣”。

《逸周書·小開武》：

明勢天道，九紀咸當（“九紀”指“一、辰以紀日，二、宿以紀月，三、日以紀德，四、月以紀刑，五、春以紀生，六、夏以紀長，七、秋以紀殺，八、冬以紀藏，九、歲以紀終”，見此篇下文）。

同書《周祝》：

凡勢道者，不可以不大。

這兩處的“勢”字用法相似，但很不好理解。《小開武》的“勢”，陳逢衡認爲當作“執”。^⑨《周祝》的“勢”，丁宗洛校改爲“執”；唐大沛說：“‘勢’疑原本是‘執’字，‘勢道’疑當作‘執道’，‘執’與‘執’相似，故誤。”^⑩後面將會講到，古文獻中“執”“執”互訛之例屢見。上引各家將“明勢天道”和“勢道”的“勢”校改作“執”，是值得考慮的意見。不過我認爲這兩個“勢”很可能也應該讀爲“設”。《韓詩外傳》卷

⑨ 黃懷信等《逸周書彙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89頁。

⑩ 同上，1130頁。

五第十六章說：

天設其高，而日月成明。地設其厚，而山陵成名。上設其道，而百事得序。可見“設道”的說法是確實存在的。“明設天道，九紀咸當”與“上設其道，而百事得序”，語意也很相近。

古書中偶爾也有把不應讀為“設”的“執”字誤改為“設”的例子。

《史記·五帝本紀》：

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蓺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羆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

“蓺五種”一句，《大戴禮記》和《孔子家語》所收的《五帝德》都作“設五量”。

銀雀山漢墓所出竹書中，有《孫子》佚篇《黃帝伐赤帝》殘簡。簡文中在關於黃帝戰勝“南方赤帝”、“東方□帝”和“北方黑帝”的各段文字之後，都有“□年休民，孰(熟)穀，赦罪”之語。^①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注：

《史記·五帝本紀》謂黃帝“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蓺五種(《五帝德》作“設五量”，疑為誤文)……”。“蓺五種”與“熟穀”義近。^②

種植之“種”，《說文》作“種”，其聲旁“重”，尤其是“童”，字形跟“量”相近。“蓺”是表示“執”字本義的後起字。“蓺五種”，古本《五帝德》當有作“執五種”者。“種”字因脫落或省略“禾”旁而被誤認為“量”，“執”又被誤讀為“設”，遂成今本之文。

《墨子·脩身》：

故君子力事日彊，願欲日逾，設壯日盛。

“設壯日盛”很費解。也許這個“設”字也是由“執”誤改而成的，本應讀為“勢”，“壯”則應讀為“狀”，有待進一步研究。

“執”與“執”字形相近，容易互訛。《儀禮·有司》“佐食設俎于豆東”句的“設”，簡本《有司》第七三號簡錯成“執”，應為“執”的形近誤字；而“祝執俎以出”句的“執”，第七九號簡又錯成了“執”(參看《武威漢簡》有關校記)，即其例。

①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釋文注釋部分《孫子兵法》，文物出版社，1985，32頁。

② 同上，33頁注〔四〕。

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中的《稱》篇有如下一條文字：

[·]□□不執偃兵，不執用兵。兵者不得已而行。^⑬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起初把這一條的兩個“執”字讀爲“藝”，訓爲“常”；^⑭後來又改讀爲“藝”，謂古書通作“藝”。^⑮我曾懷疑這兩個“執”當讀爲“設”，^⑯因爲古書的“設”字有類似用法，如《韓非子·外儲說右下·說一》“田成恆設慈愛，明寬厚”、《戰國策·齊策四》“設爲不宦”、“設爲不嫁”等。現在我覺得還是把它們看作“執”的誤字比較妥當。“不執偃兵，不執用兵”，意即不是一成不變地主張偃兵或用兵。

在傳世古書中也可以看到“執”“執”相訛的現象。如《荀子·修身》“體倨固而心執詐”的“執詐”，就是見於同書《議兵》篇的“執(勢)詐”的“訛文”。^⑰

讀爲“設”的“執”字訛作“執”字之例，也見於古書。

《大戴禮記·文王官人》“執之以物而遽(速)決”句，《逸周書·官人》作“設之以物而數決”。王念孫認爲《文王官人》的“執”本當作“設”。^⑱從文義看，王說是正確的。這個“執”字顯然是讀爲“設”的“執”的形近誤字。

《禮記·內則》：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鄭玄注：將衽謂更臥處)，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

“執牀與坐”之文顯然有問題。牀之爲物頗大，非少者所能執持，而且也不宜經常搬動。孫希旦《禮記集解》說：“少者執牀，則牀之制蓋不大鉅矣。”^⑲這是由於看到了問題而強作解釋。古人席地而坐，少者所“執”的“坐”也不知是甚麼東西。這個“執”字無疑也是“執”的誤字，當讀爲“設”。“設牀”、“設坐”都見於古書，如《禮

⑬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壹]》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圖版147行，釋文81頁，文物出版社，1980。【編按：周波指出，陳鼓應在《黃帝四經今注今譯》(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中已有“不執偃兵”、“不執用兵”的兩個“執”字當釋爲“執”，“‘不執偃兵’即不一味地反對用兵”的意見。】

⑭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經法》，文物出版社，1976，96頁注⑮。

⑮ 同注⑬，84頁注[一三]。

⑯ 拙著《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572頁注⑬。

⑰ 王念孫《讀書雜誌·荀子第一·修身》“執詐”條引王引之說。

⑱ 王引之《經義述聞·卷十三·大戴禮記下》“執之以物”條。

⑲ 《禮記集解》中冊，中華書局，1989，733頁。

記·喪大記》“設牀，檀第，有枕”、《吳子·勵士》“於是武侯設坐廟廷，爲三行，饗士大夫”。

《賈誼新書·容經》：

古者聖王，居有法則，動有文章；位執戒輔，鳴玉以行。^{②①}

“位執戒輔”和“鳴玉以行”分別跟“居有法則”和“動有文章”相應，但“位執戒輔”句的意義不好理解。疑此句“執”字也是“執”的誤字，當讀爲“設”。

同書《保傳》說：

《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順，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道天下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輔。輔者，輔天子之意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彊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②②}

疑《容經》的“位設戒輔”，即指朝廷之位，於王之前後左右設置道、輔、拂、承之事。可能由於道、輔、拂、承的主要任務是戒過輔善，所以《容經》省稱爲“戒輔”。《禮記·文王世子》“設四輔及三公”、《說苑·君道》“王者設四佐以自輔”，“設”字用法與此相近。“立”、“位”古通，“位設戒輔”的“位”也有可能本作“立”，就當站立講，與《明堂之位》的“成王中立”相應。

《墨子·大取》：

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執也。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盜人，害也。

孫詒讓《墨子閒詁》釋“人之所執”句說：“言爲人所持執，不能自免。”其說牽強難信。疑此“執”字也是“執”的誤字，當讀爲“設”。“其所取者，人之所設也”，意謂其所取之害，是別人爲之設定而不得不取的。《大取》篇中還數見“陳執”之文，也有可能是“陳執(設)”之誤。由於上下文的意義不很明白，有待進一步研究。

最後，舉一個可能是“執”字因訛作“執”而被誤改爲“設”的例子。《淮南子·

②① 《賈誼新書·揚子法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47 頁上欄。

②② 同上，40 頁。此段亦見《大戴禮記·保傳》，文字稍有出入。

兵略》：

是故爲麋鹿者則可以罝罟設也，爲魚鼈者則可以網罟取也，爲鴻鵠者則可以矰繳加也，唯無形者無可柰也。

上引文中第二句的動詞“取”和第三句的動詞“加”，從語意上說，是分別以“爲魚鼈者”和“爲鴻鵠者”爲受事者的。然而第一句的動詞“設”，從其詞義看，却只能以作爲“以”的賓語的“罝罟”爲受事者，而不能以“爲麋鹿者”爲受事者，所以這一句的文義實際上是不通的。看來其動詞可能本作“執”，是由於訛作“執”而被誤改爲“設”的。動詞“執”可以把麋鹿等走獸作爲受事者。古書中有“執駒”（《周禮·夏官·校人》、《大戴禮記·夏小正》）、“執鼠”（《莊子·逍遙遊》、《淮南子·泰族》）等語，殷墟甲骨卜辭中有“執兕”（《合》10436、10437）、“執麋”（同上10373）等語，可證。【編按：郭永秉《以簡帛古籍用字方法校讀古書札記》第一則指出，疑此“設”字爲“執”字之誤不確，他引了《管子·四時》“令禁罝設禽獸”一例，並指出《商君書·外內》篇“是謂設鼠而餌以狸也，不亦幾乎”句蔣禮鴻注已舉出《淮南子·說林》“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杭”及《兵略》“爲麋鹿者則可以罝罟設也”二例，認爲“設一物以有所招致，謂之設，猶誘也”，此說有理（見郭永秉《古文字與古文獻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6月，302—303頁）。他的意見是正確的。】

後記：

今年四月，我在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的一次座談會上，談到了《淮南子》的“勢施”當讀爲“設施”等問題。會後，蒙劉殿爵教授告知，《賈誼新書》中也有“勢”當讀爲“設”的例子。《新書·禮容語下》有如下一段文字：

夫《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謚。”……基者，經也，勢也。……及成王承嗣……夙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布文陳紀，經制度，設犧牲，使四海之內懿然葆德，各遵其道……

劉先生指出，《爾雅·釋言》說：“基，經也。基，設也。”可證《新書》此段中“基者，經也，勢也”句中的“勢”也應讀爲“設”，下文中的“經制度，設犧牲”正與此句照應（參看劉殿爵、陳方正主編《賈誼新書逐字索引》72頁，香港商務印書館，1994）。其言至確。對劉先生的指教，作者十分感謝。郝懿行《爾雅義疏》引《禮容語》“基者，

勢也”句,謂“形勢與造設義亦近”。這是由於不知“勢”當讀爲“設”而強爲之說。

1996年5月5日記

原載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東方文化》1998年36卷1、2號合刊(此刊實際出版年份爲2002年),今據以收入。

“地君之御”與“制地君”

《戰國策·趙策一·張孟談既固趙宗章》說：

張孟談既固趙宗，廣封疆，發五百，乃稱簡之塗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有之曰：‘五百之所以致天下者，約兩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為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捐功名去權勢以離衆。”

這段文字裏的“前國地君之御”很不好理解。鮑彪注釋“稱簡之塗”說：“稱者，舉其說也。此土，國地君之御。”注釋“前國地君之御”說：“國地，猶武安之類，御則之塗。”其意似以為“五百之所以致天下者”云云，是曾為國地君的御者的、一位名叫簡之塗的士所說的。國地君的稱號和簡之塗這樣的人名，都顯得很怪異。而且“國地君之御”如果確是指一個人的話，原文就不應該在“曰”字之前加“有之”二字。可見鮑說難以成立。

金正煒《戰國策補釋》解釋“簡之塗”說：

“簡”謂簡子，襄子父也。“塗”當為“迹”。“迹”誤為“途”，因復傳寫作“塗”。

解釋“前國地君之御”說：

前國地君，鮑氏謂猶武安之類，殆非也。“前”當為“簡”。隸書從“竹”之字並作“𦰩”。“簡”與“前”字形相近，因以致誤。“地”當作“主”。古書“主”作“𡈼”，“地”作“𡈼”，故“主”訛為“地”。“國”字當在“君”字之下，誤淆於上也。《釋名·釋言語》：“御，語也，尊者將有所欲，先語之也。”“語”“御”一聲之轉，字亦得通。《魯語》“主亦有以語肥也”，《禮記·坊記》疏引作“御”，可證。簡主君國之御，謂簡子君臨趙國之遺訓，此蓋孟談稱述簡子之言以告襄子。

金氏之說爲近年出版的一些《戰國策》注本所襲用。但他解釋“前國地君之御”，大膽改字挪字，並無確據，實際上也是難以使人信服的。何建章《戰國策注釋》在引錄了金說，並爲他補充了古書中“御”“語”相通的例證之後，仍說：“此句難通，或疑有脫誤；金說可通，姑從之。”（中冊 614 頁注⑤，中華書局，1990）可見注家採用金說，是由於找不到更好的說法。

我認爲“地君之御”應是古書名，這從《管子》可以得到印證。《管子·問》的最後一段說：

制地君曰：理國之道，地德爲首。君臣之禮，父子之親，覆育萬人，官府之藏，彊兵保國，城郭之險，外應四極，具取之地。

舊以“制地”爲一小句，文義不順。郭沫若在《管子集校》中說：

當以“制地君”連文，蓋古書名也。此與《莊子·內篇》“《養生主》”命名之例相同。《輕重甲篇》有“《道若秘》曰”亦是古書名，猶《莊子·內篇》之“《德充符》”也。“《制地君》曰”所云，與《水地篇》之旨有相近處。（《郭沫若全集·歷史編 6》71—72 頁，人民出版社，1984）

郭氏認爲“制地君”與“養生主”命名之例相同，似將“制地君”理解爲“制地之君”，恐不確；謂《制地君》“與《水地篇》之旨有相近處”，亦未見其然。但他把“制地君”看作古書名，則顯然勝於舊說，可以信從。

上引《趙策》“前國地君之御”所說的那段話中，“五百”一般認爲應讀爲“五伯”；“約兩”之義頗有異說，皆牽強難信；但那段話的主旨是說君應制臣而勿爲臣所制，則是十分明白的。

上引《制地君》說“理國之道，地德爲首。君臣之禮，父子之親……具取之地”。《管子》尹注於“君臣之禮”句下說：“地有高下，君臣之禮也。”此注實本《左傳》。《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子大叔（鄭大夫游吉）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

杜注在“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句下說：“君臣有尊卑，法地有高下。”此即尹注所

本。《制地君》把“父子之親”也跟“地德”聯繫起來，與《左傳》不同。但在將君臣關係與地之有高下相比擬這一點上，二者是一致的。“前國地君之御”說君應制臣，其精神也與此一致。

“御”與“制”義本相近。《荀子·榮辱》：“於是又節用御欲，收斂蓄藏以繼之也。”楊倞注：“御，制也。”所以我認為“地君之御”與“制地君”，應是同一古書的異稱，其內容是從君臣上下的關係合乎地義、地德的角度來講治國之道的。趙簡子從游吉那裏所聽到的關於禮的說教裏，包含了這種說法。據《左傳》所記，他在聽完了游吉的那段說教之後，還說了“請終身守此言”的話，表示要認真奉行。由此看來，《戰國策》注家把上引《趙策》“稱簡之塗”的“簡”理解為指趙簡子，很可能是正確的。《趙策》加在“地君之御”之前的“前國”，可能就當以前的國家講，加這兩個字是為表示《地君之御》是從較早的時候傳下來的書。

《道藏》正乙部物字號《正一法文經章官品》說：

制地君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宜泉室（陶弘景《登真隱訣》引《千二百官儀》作“泉宜宮”），主收天下高卑（《官儀》作“高功卑功”）太歲行年本命上土公之鬼。

此處所謂“制地君”是道教官名，似與《管子》之“制地君”無關。

原載《歷史文獻研究》北京新八輯（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今據以收入。

簡帛古籍的用字方法是校讀 傳世先秦秦漢古籍的重要根據

我們所說的用字方法，指人們記錄語言時用哪一個字來表示哪一個詞的習慣。用字習慣從古到今有不少變化。有很多跟後代不同的古代用字方法，是後人所知道的，通常在字典裏就有記載。例如古書裏往往把“早晚”的“早”這個詞寫作“蚤”，“蚤”字的這種用法在一般的字典裏就找得到。這類古代用字方法，不會給閱讀古書的人造成多大困難。但是如果某種已經被後人遺忘的古代用字方法，在某種或某些古書中（通常只是在古書的某一或某些篇章甚至語句中）還保存着，就會給讀這些古書的人造成很難克服的困難。

50年代以來，我國考古工作者陸續發現了很多簡帛古籍。其中的用字方法，有一些跟保存在傳世先秦秦漢古籍中的已被遺忘的古代用字方法正相符合，可以幫助我們讀通這些古書中的有關文字。我們在發表於1980年的《考古發現的秦漢文字資料對於校讀古籍的重要性》一文中，已經舉出了這方面的三個例子：一、根據馬王堆帛書和銀雀山竹書用“𠂔”為“恥”的現象，指出司馬遷《報任安書》“而僕又𠂔（此據《文選》，今本《漢書·司馬遷傳》已改作“茸”）以蠶室”句中的“𠂔”也應讀為“恥”。二、根據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用“𠂔”為“熱”的現象，指出《黃帝內經·素問》等書中屢見的“𠂔”也應讀為“熱”。三、根據銀雀山竹書用“纂”為“選”的現象，指出《吳子·應變》“募吾材士”、同書《圖國》“簡募良材”、“齊桓募士五萬”以及《群書治要》所引《六韜·龍韜》“士卒不募而法鬼神”等句中的“募”，都是“纂”的誤字，也應讀為“選”。

上舉各例中，“纂”和“選”是通用字；“𠂔”和“恥”，“𠂔”和“熱”，原來有可能是異體字。不過這種異體字彼此差別較大，而且後人已不知其為異體字，所以不必跟通用字嚴格區分。

在這篇短文中，我們要對“𠂔”字的例子稍作補充，還要舉出一個新的例子，即關於讀為“設”的“執”字的例子，希望能使簡帛古籍用字方法在傳世先秦秦漢古籍

校讀方面的重要作用為大家所充分認識。

先談“𠂔”字。

《墨子·經上》有“𠂔，自作也”一條，《經說上》與之相應的文字為“𠂔：與人遇人衆𠂔”。譚戒甫讀《說》文的“𠂔”為“遁”，高亨讀《經》文的“作”為“忤”，並認為《說》文“‘與人遇’三字為句。‘人衆’兩字為句。‘𠂔’，一字為句”（高亨《墨經校註》40頁，科學出版社，1958）。這些意見都是可取的。但是各家對“𠂔”字的解釋却都牽強難信。上引拙文發表時，友人李解民君正在讀《墨經》。他受到拙文談“𠂔”一節的啓發，寫了《讀〈墨經〉一則》，指出上引《墨經》的“𠂔”字也應該讀為“恥”（《文史》第十二輯96頁，中華書局，1981）。以“自作”釋“恥”，十分合理。與人相遇，因對方人多而逃遁，作為可恥之事的實例，也很合適。李說顯然是正確的。（《經上》還有“𠂔，所然也”一條。此“𠂔”字不能讀為“恥”，其義不明。高亨認為此字是“循”字之誤，見《墨經校註》73頁。）

附帶談一下也是見於《經說上》的、另一種跟馬王堆帛書相合的“恥”字。

馬王堆帛書中的“恥”並非只有“𠂔”一種寫法。例如：《春秋事語》中既有用作“恥”的“𠂔”（《馬王堆漢墓帛書〔叁〕》圖版3頁17行，6頁84、86行，文物出版社，1983），也有从“心”的“恥”（同上圖版6頁75行）。《戰國縱橫家書》中的“恥”有“𦣻”（同上圖版12頁33—34行“除羣臣之𦣻”、圖版19頁205行“報惠王之𦣻”）、“𦣻”（圖版18頁176行“足以刷先王之𦣻”）兩種寫法。

《經說上》有“廉，己惟為之，知其𦣻也”一條。高亨“疑𦣻即恥之異文”（《墨經校註》41頁），其說可從（《十講》編按：徐復1948年作《說𦣻》，亦以此字為“恥”之異體。此文增補稿收入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徐復語言文字學叢稿》）。明嘉靖陸穩校芝城銅活字本《墨子》“𦣻”作“𦣻”（據吳毓江《墨子校注》493頁轉引，中華書局，1993）。形聲字偏旁左右互易是常見的現象，“𦣻”跟馬王堆帛書的“𦣻”無疑是一個字。他本作“𦣻”，當因“鬼”“思”形近而誤。

校《墨》各家對陸氏銅活字本頗為重視。吳毓江《墨子舊本經眼錄》說陸氏銅活字本“雖訛字微多，其古樸處較之《道藏》轉似過之。周香嚴謂其出於內府，日本吉田漢宦謂為宋代遺本，洵非無見之言也”（上引《墨子校注》1006頁）。上舉“𦣻”字為陸本的可貴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證。但是如果沒有馬王堆帛書的印證，恐怕多數人會把這個字看作一個無足輕重的訛字。

下面，我們根據簡帛古籍用“執”為“設”的現象，來校讀傳世古籍中一些有關

的文字。我們已經寫了一篇題為《古文獻中讀為“設”的“執”及其與“執”互訛之例》的文章，比較詳細地討論了有關問題。這篇文章大概不久就能發表（《十講》編按：已發表於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東方文化》1998年36卷1、2號合刊，此刊實際出版年份為2002），在這裏只準備把一些要點簡單講一下。

50年代末武威漢墓出土的簡本《儀禮》，在表示“設置”的“設”這個詞的時候，既用“設”字，也用“執”字（簡文左旁作“圭”，漢隸往往如此。“執”與“設”古音相近，詳見上舉待發表的拙文）；有時甚至一簡之中“執”“設”並用，如《少牢》12號簡（出處詳見上舉拙文）。馬王堆帛書也有用“執”為“設”之例，下文將會提到。知道了古人往往用“執”為“設”，可以解決古書中文字訓詁方面的一系列問題。

《荀子》書通常以“執”為“勢”，但是也有少數“執”字是應該讀為“設”的。後人不察，一律讀為“勢”，應加糾正。

《荀子·儒效》：

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執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必為順下矣。

楊倞注釋“執”為“權執（勢）”，王念孫《讀書雜誌》釋“執”為“執（勢）位”，皆不可通。“執在本朝”與“退編百姓”為對文，“執”當是動詞，應讀為“設”。古書中說到任官授爵之事時，往往用“設”字。《荀子》中即有其例，如《臣道》說“故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頗”。《儒效》說人主用儒者“則設在本朝而宜”，意正與之相合。

同書《正名》：

故無萬物之美而可以養樂，無執列之位而可以養名。

楊倞注把“執列”理解為“班列”，其實這裏的“執”字也應讀為“設”。古書於任官授爵之事既說“設”也說“列”，《荀子·大略》就有“列官職，差爵祿”之語。《大戴禮記·千乘》說千乘之國“設其四佐，列其五官”，以“設”“列”對言，是“執列”當讀為“設列”的明證。

馬王堆帛書《周易》所附《繆和》有“列執尤尊，賞祿甚厚”、“執為賞慶爵列”、“執列爵位之尊”等文句，“執”字用法跟上引《荀子》文相合，也都應該讀為“設”（詳見上舉拙文）。

古書中有的應該讀為“設”的“執”字，已經被誤改成了“勢”。《淮南子》兩見

“勢施”之文：

今有六尺之席，臥而越之，下材弗難；植而踰之，上材弗易。勢施異也。

《說林》（《文子·上德》有相似文字，末句全同）

輪圓輿方，輶從衡橫，勢施便也。

《泰族》

“勢施”很難講通。《淮南子》的《兵略》和《脩務》都有“設施”之語。上引兩處“勢施”無疑本作“執施”，也應讀為“設施”，後人誤讀“執”為“勢”，給它加上了“力”旁。

“執”與“執”形近，簡本《儀禮》和傳世古書中都有二字互訛之例（詳見上舉拙文）。古書中有的“執”字，就是本應讀為“設”的“執”字的形近誤字。《禮記·內則》：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鄭玄注：將衽謂更臥處），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

牀之為物頗大，似非少者所能執持。古人席地而坐，不用椅凳，“坐”如何“執”，也不好理解。這裏的“執”無疑是“執”的誤字，本應讀為“設”。“設牀”、“設坐”都見於古書，如《禮記·喪大記》“設牀，禮第，有枕”，《吳子·勵士》“設坐廟廷”。

《大戴禮記·文王官人》“執之以物而速（速）決”句，《逸周書·官人》作“設之以物而數決”。《經義述聞》卷十三《大戴禮記下》“執之以物”條引王念孫說，謂“執”本當作“設”，甚確。但是王氏沒有講出“設”字所以會錯成“執”的原因。這個“執”字無疑也是“執”的形近誤字。

最後，舉一個“執”字因訛作“執”而被改為“設”的例子。《淮南子·兵略》：

是故為麋鹿者則可以置罟設也，為魚鼈者則可以網罟取也，為鴻鵠者則可以矰繳加也，唯無形者無可柰也。

置罟可設而“為麋鹿者”不可設。這個“設”本應作“執”，當因訛作“執”而被誤改為“設”。【編按：參看本卷所收《古文獻中讀為“設”的“執”及其與“執”互訛之例》459頁“編按”。】

從以上所舉的例證可以清楚地看到，簡帛古籍的用字方法，在傳世先秦秦漢古籍的校讀方面，是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的。它們能幫助我們解決古書中很多本來難以解決，甚至難以覺察的文字訓詁方面的問題。而且一種用字方法的啟發，有時能

幫助我們解決一系列問題。所以在校讀傳世先秦秦漢古籍的工作中，對簡帛古籍的用字方法必須給予充分的重視。

原載《兩岸古籍整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又載《裘錫圭學術文化隨筆》、《中國出土古文獻十講》，今據《中國出土文獻十講》收入。

“東 夏” 解

《左傳》中三見“東夏”一語。

襄公二十二年有鄭子產答“晉人徵朝”者的一大段話，子產在歷數時君鄭簡公累次朝晉之事時說：

湟梁之明年（杜預注：湟梁，在十六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

杜預在“靖東夏”後加注說：“謂二十年澶淵盟。”《左傳·襄公二十年》經文說：“夏六月庚申，公（指魯襄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傳文說：“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杜注：“齊與晉平。”

昭公元年有晉祁午勸趙文子在虢之會上對楚要強硬的一大段話，祁午在稱贊趙文子執政以來在外事上的成績時說：

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

杜預在“服齊狄，寧東夏”後加注說：“襄二十八年齊侯、白狄朝晉。”《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杜注：“陳侯、蔡侯、胡子、沈子，楚屬也。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故朝晉。”所謂“宋之盟”，指魯襄公二十七年晉、楚等國在宋都舉行的弭兵之會上的盟約。晉方參加弭兵之會的主要人物，也是趙文子。

昭公十五年有周景王反駁晉籍談關於晉侯未受王室分器的說法的一大段話，景王在講到晉文公曾受襄王錫命時說：

其後，襄之二路、鍼鉞、鉅鬲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

孔穎達《左傳正義》解釋“撫征東夏”句說：“服者撫之，叛者征之。晉於諸夏，國差近西，故令主東夏。”

杜預未對“東夏”一語的意義作具體解釋。從昭公十五年《正義》看，孔穎達等人當是把“東夏”理解為東方的華夏之國的。後人大都沿襲此說。如楊伯峻《春秋左傳注》解釋昭公元年的“寧東夏”說：“東夏，華夏東方之國，實指齊”（中華書局1990年版1201頁），解釋昭公十五年的“撫征東夏”說：“晉服齊、魯、鄭、宋諸國，皆在晉東，故云東夏”（同上1372頁）。這種說法其實是可疑的。

《左傳·昭公十五年》所提到的襄王對晉文公的錫命，在《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有記載。此年傳文記襄王在踐土之會上冊命文公之事說：

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冊）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路）之服、戎輅（路）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鉅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

“侯伯”即諸侯之長。“綏”有“安定”義。“四國”與“四方”義近。“糾逖王慝”，杜注解釋為“有惡於王者，糾而遠之”。《左傳·昭公十年》的“撫征東夏”，與此處的“以綏四國，糾逖王慝”相當。“東夏”的含義應與“四國”相近，似不應專指東方的華夏之國。

《國語》中也一見“東夏”之語。《楚語下》記有蔡聲子勸楚令尹子木召回亡奔晉國的椒舉（即伍舉）之事。聲子向子木舉出了楚的逃亡貴族為晉國所用而為害楚國的不少例子，其中一例是：

……或譖析公臣於王，王弗是，析公奔晉。晉人用之，寔讒敗楚，使不規東夏，則析公之為也。

韋昭注：“‘規’猶‘有’也。東夏，蔡、沈也。”他大概也把“東夏”理解為東方的華夏之國。

《國語》所記聲子勸子木之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也有記載。二者的實質性內容大體相同，而行文頗有不同。傳文述析公害楚之事說：

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寔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

末句中與《國語》“使不規東夏”之語相當的，是“楚失華夏”（《國語》韋注引傳文，作“楚失諸華”）。而且傳文中具體提到的楚所失華夏之國，除韋注所說的沈、蔡外，還有位居中原中心地區的鄭國。即使站在晉國的立場說話，把鄭包括在東方之國裏也嫌勉強。在蔡國人與楚國人的對話中，更不可能出現這種說法。可見《國語》的“東夏”也不宜理解為東方的華夏之國。

《呂氏春秋》也一見“東夏”之語。《慎大覽·察今》：

東夏之命，古今之法，言異而典殊。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殊俗之民有似於此。

高誘注：“東夏，東方也。命，令也。”看來高氏跟《左》、《國》的注家一樣，也把“東”看成“夏”的定語。然而按照這樣的理解，上引《呂氏春秋》的那段文字顯然講不通。孫鏘鳴《〈呂氏春秋〉高注補正》說：“‘東夏’與‘古今’對文，猶言夷、夏也。東方曰夷，故夷亦可言東。命，名也，亦言也。”（據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937頁轉引，學林出版社，1984）孫氏以“東”與“夏”為並列對舉之詞，訓“命”為“名”，皆可信。但說“東夏”“猶言夷、夏”，則不確，後面將會談到這個問題。

《呂氏春秋》把“東”和“夏”放在對立的位置，說東和夏這兩個地區對事物的命名不同。《左》、《國》則把“東”、“夏”二字合在一起，以指稱當時的一些國家。二者的“東”、“夏”的用法有所不同。不過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左》、《國》的“東夏”不應理解為東方的華夏之國。所以《呂氏春秋》以“東”與“夏”對舉這一點，對於理解《左》、《國》“東夏”一語的含義，顯然是極有幫助的。

春秋時代，金文中還有“夏東”之語。1975年山東莒南縣大店鎮二號春秋墓出土的莒叔之仲子平編鐘（以下簡稱莒平鐘）的銘文說：

唯正月初吉庚午，莒叔之仲子平自作鑄其游鐘，玄鏐鎬鏞，乃為之音，□□
雍雍，聞于夏東。……

集成 1·172—180

此銘以“聞于夏東”來形容鐘聲的遠揚。

李家浩先生在《齊國文字中的“遂”》一文中，引用了莒平鐘銘文。李文根據我們在上文引用過的孫鏘鳴對《呂氏春秋》“東夏”的解釋，認為古書中的“東夏”“是一個並列結構詞組，指東方和中原華夏”，鐘銘的“夏東”“即文獻中的‘東夏’；大概是為了跟‘鐘’、‘雍’二字押韻，有意將詞序顛倒的”（《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92 年 3 期 36 頁）。對“東夏”“指東方和中原華夏”的說法，我們在後面將會加以討論。上引李文的其他意見，都是十分正確的。

春秋時代鐘銘形容鐘聲遠揚時，還有說“聞于四方”的。徐王子旃鐘銘說：

……中(終)翰且揚，元鳴孔皇，其音警警(疑此字當讀為悠遠之“悠”，“悠悠”猶言“悠揚”)，聞于四方。…… 集成 1·182

(此鐘的主人之名舊誤釋為从“同”之字，今從李家浩先生改釋)

者減鐘銘說：

……其登于上下，聞于四旁(方)。…… 集成 1·197、198 等

(1·197·2 的“聞”上尚有一字，疑是“述”字，讀為“遂”)

莒平鐘銘的“聞于夏東”，其義當與“聞于四方”相近。前面說過，《左傳·昭公十五年》“撫征東夏”的“東夏”，其義應與《左傳·僖公二十八年》“以綏四國”的“四國”相近。彼此的情況很相似。這說明莒平鐘銘的“夏東”的確跟《左》、《國》的“東夏”同義。它們所用的“東”、“夏”二字既然可以互倒，在語法上當然跟《呂氏春秋》的“東夏”一樣，也是並列的關係，而不是主從的關係。

現在我們可以來討論“東夏”的確切含義了。

上引孫鏘鳴之說，認為“東夏”猶言“夷夏”。此說不能信從。譚戒甫《校呂遺誼》反駁說：“……夷言東，他書未見。《禮記》所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謂之四夷。夷本通名，分稱之在東者亦曰夷也。戰國言‘夷夏’皆屬通名。”(據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937 頁轉引)童書業《夷蠻戎狄與東南西北》明確指出，固定地以“夷”、“蠻”、“戎”、“狄”分別與東、南、西、北四個方位相配，是戰國以後才有的事(童書業《中國古代地理考證論集》43—52 頁，中華書局，1962)。“東夏”一語在春秋時即已使用，“東”當然不可能指“夷”。

譚戒甫雖然反對“東夏”猶言“夷夏”的說法，却又主張《呂氏春秋》“東夏”之“東”是“夷”的誤字。陳奇猷從之(《呂氏春秋校釋》937 頁)。此說缺乏根據，而且對《左》、《國》的“東夏”和莒平鐘的“夏東”無法作出解釋，顯然也是不可信的。

前引李文認為“東夏”“指東方和中原華夏”。此說比較合理。但是前面已經說過，“東夏”之義應與“四國”、“四方”相近，似不能僅指東方和中原華夏而不管西方。而且東方也有很多華夏之國如齊、魯等，“夏”這一名稱為什麼要為“中原華夏”所專有呢？

我們認為“東夏”一語中的“夏”，跟常見的與夷蠻戎狄相對的“夏”(如秦公鐘、簋銘文中的“蠻夏”之“夏”)，其意義是有所不同的。後者是從種族、文化的角度說的，與一般所謂“華夏”同義。前者是從政治地理的角度說的，其義實與“西”相近。

在《尚書·周書》中，以“西土”為根本的周人屢以“夏”自稱。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君奭》說“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顧命》則說“惟周文、武誕受羣若，克恤西土”，“有夏”就是“西土”。《康誥》說“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酒誥》則說“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區夏”和“西土”也幾乎是一回事。（以上參閱童書業《蠻夏解》，載《禹貢》二卷八期）《左傳·定公四年》說晉祖唐叔“封於夏虛”，晉國的位置也是偏西的。古人名、字之義相應。春秋時陳公子少西字子夏（《左傳·宣公十一年》：“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杜注：“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鄭公孫夏字子西（《左傳·襄公十年》“子西聞盜”杜注：“子西，公孫夏，子駟子。”）以上參閱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詁》，見《經義述聞》卷二十三）。可見在西周、春秋時代人的心目中，“夏”與“西”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所以作為政治地理上的名稱，“夏”可以與“東”相對。

在春秋時代，“東夏”或“夏東”當可用來泛指東西方各諸侯國。不過楚在南方，既不好歸入夏，也不好歸入東，而且中原國家長期把它視為蠻夷；在一般情況下，大概是不包括在“東夏”所指範圍之內的。至於“東”和“夏”之間，可能並不存在很明確的界綫。周初把洛邑歸入東國（《尚書·康誥》“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周室東遷後，當然不會再有這種觀念。估計秦、晉、周、鄭各國當屬於“夏”，齊、魯以東各國當屬於“東”。但是介於它們之間的那些國家，何者屬“夏”，何者屬“東”，恐怕未必都會有明確的說法。

按照我們的理解，《呂氏春秋》以“夏”與“東”對舉的現象，《國語·楚語》的“東夏”相當於《左傳·襄公二十六年》的“華夏”的現象，《左傳·昭公十五年》的“東夏”和莒平鐘的“夏東”的用法與“四國”、“四方”相近的現象，都可以圓滿地得到解釋。

關於莒平鐘的“聞于夏東”，還需要稍作說明。春秋時代鐘銘形容鐘聲之語，有時語帶雙關。古人形容人的聲譽遠揚，往往說“聞於四國”。《詩·大雅·崧高》說：“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春秋時楚國的王孫誥鐘銘的自贊之辭中，也有“聞于四國”之語（《淅川下寺春秋楚墓》140—174頁，文物出版社，1991）。前面引過的徐王子旃鐘和者減鐘銘文，說鐘聲“聞于四方”，當暗含鐘的主人的聲譽聞於四方之意。莒平鐘銘的“聞于夏東”，也應暗含莒平的聲譽遠聞於各諸侯國之意。莒是東方國家。莒平決不會以夷自居，這也可以證明“東夏”之“東”並不指夷。

《左傳·襄公二十二年》的“靖東夏”，指襄公二十年的澶淵之盟而言。這是東西兩大國齊和晉講和後舉行的一次會盟，參加的有晉、齊、魯、宋、衛、鄭、曹、莒等等許多國家。《左傳·昭公元年》的“寧東夏”，應是指晉能與楚一起舉行弭兵之會，使夾在晉、楚之間飽受戰亂之苦的很多國家得以安寧而言的。把“東夏”理解為泛指東西方各諸侯國之語，對這兩例也是完全合適的。前引《春秋左傳注》認為昭公元年的“東夏”“實指齊”。但此年傳文以“服齊、狄”“寧東夏”並提，“東夏”顯然主要指那些飽受晉、楚爭霸之苦的較小國家，決不會是“實指齊”的。

最後，有必要提一下偽古文《尚書》中的“東夏”。偽古文《微子之命》說：“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偽孔傳》解釋此句說：“用是封立汝於上公之位，正此東方華夏之國。宋在京師東。”周王決不會讓封於宋的微子去“尹”東西方各諸侯國，所以《偽孔傳》的解釋應該是合乎經文之意的。這就是說，《微子之命》中“東夏”的用法，與見於《左》、《國》的“東夏”的原義不合，而與漢以後注家對此語的理解相合。偽古文的偽跡，在這裏也暴露了出來。

原載《慶祝王元化教授八十歲論文集》（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今據以收入。



讀書札記四則

一、“耆其股肱”之“耆”當訓“强”

《國語·晉語九》“下邑之役董安于多”章，記董安于之言曰：

及臣之壯也，耆其股肱，以從司馬，苛慝不產。

韋昭注：“耆，致也。司馬掌兵。”《詩·周頌·武》“耆定爾功”《毛傳》：“耆，致也。”韋注蓋據之。然“致其股肱”於義難通。

“耆”字古有“强”義。《廣雅·釋詁一》：“駉、勁、堅、剛、耆……强也。”《逸周書·謚法》篇末所附訓詁有“耆，彊也”條。《左傳·昭公二十三年》：“不懦不耆”，杜預注：“耆，强也”。睡虎地秦墓所出《司空律》“有罪以貲贖及有責（債）於公”條有如下規定：

居貲、贖責（債）欲代者，耆弱相當，許之。^①

我在《〈睡虎地秦墓竹簡〉注釋商榷》中已指出：“律文‘耆弱相當’，意即强弱相當。”^②

上引《晉語》“耆其股肱”之“耆”亦當訓“强”，其用法與《老子·第三章》“弱其志，强其骨”之“强”相類。“耆其股肱”之意為使其股肱强健，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鍛煉腿臂。

二、《王兵》與《管子》互校一例

銀雀山漢墓出土竹書中的《王兵》篇，其內容與《管子》的《參患》《七法》《地

①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釋文、注釋”部分 51 頁，文物出版社，1990。

② 拙著《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537 頁。

圖》等篇相重，彼此可以互校。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文物出版社，1985。以下簡稱“銀簡”），已經在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我們要在這裏討論的，是《銀簡》已經說到的但尚未細校的一個例子。

《王兵》說：

……取天下精材，論百工利器；收天下豪桀（傑），有天下俊雄，春秋穀（角）試，以闌（練）精材。^③

與此文相似的內容，也見於《管子·七法·爲兵之數》：

故聚天下之精財，^④論百工之銳器，春秋角試，以練精銳爲右，^⑤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⑥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駿雄。

又見於《管子·幼官》：

求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器成角試否臧。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

上舉三處文字顯然同出一源。《銀簡》中的《王兵》注釋已經對它們進行了一些比較，指出《爲兵之數》“文句先後次序與簡文^⑦有異，‘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臧’句爲簡文所無。‘角試’，簡文作‘穀試’，‘角’、‘穀’二字音近相通”，又指出《幼官》“求天下之精材”句，“精材”字與簡文相合。^⑧以《爲兵之數》“聚天下之精材”與《王兵》“取天下精材”對照，前者的“財”當作“材”可以論定，後者的“取”很可能應從前者讀爲“聚”。

上引《王兵》注釋說《王兵》與《爲兵之數》文句次序有異，是指《王兵》的“春秋角試，以練精材”在“收天下豪傑，有天下俊雄”之後，而《爲兵之數》的“春秋角試，以練精銳爲右”則在“聚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之後。按《爲兵之數》的句序，“春秋角試”句是就器械而言的。按《王兵》的句序，此句則是就士卒而言的。我認爲在這一點上，後者應該是正確的。

“角”有比較之意，如“角力”、“角勝”等。器械有一定規格，加以課試即可知其

③ 《銀簡》“釋文、注釋”部分 136 頁。標點有改動。

④ “財”當作“材”，參看《管子集校》，《郭沫若全集·歷史編 5》，人民出版社，1984，168 頁。

⑤ 尹注：“右，上也。”

⑥ 戴望《管子校正》：“宋紹興本‘藏’作‘臧’。”

⑦ 引者案：指《王兵》文。

⑧ 《銀簡》“釋文、注釋”部分 138 頁注〔二八〕。

是否合格，似無必要強調器與器的相互比較。將課試器械的時間限定在春秋兩季，似也不大合理。“以練精銳爲右”更不像說器械的話。而古書在說到士卒時，“練”、“銳”二字則是常用的。《孫子·計》提出“兵衆孰強，士卒孰練”的問題。《六韜·犬韜》有《練士》篇，其中提到“勇銳之士”。又《虎韜·略地》有“其練卒、材士必出”語。《吳子·圖國》舉出了五種可用之卒，說“此五者軍之練銳也”。《荀子·議兵》提到“秦之銳士”。《墨子·雜守》兩次說到“銳卒”。^⑨《禮記·月令》所述“孟秋之月”所行之事，有“選士厲兵，簡練桀（傑）俊”。“傑俊”就是“豪傑”“駿（俊）雄”。這尤其可以證明“春秋角試，以練精銳爲右”，本應在“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俊雄”之後。

在秋季簡練士卒，漢代依然如此。據應劭《漢官儀》，每年八月，太守、都尉等要會試士卒，課殿最，從居延漢簡看，士吏、候長、隧長每年秋天也都要試射。^⑩

《王兵》中與《爲兵之數》“以練精銳爲右”相當之語爲“以練精材”。“材”既可指器材，也可指人材。上引《幼官》文中，與“豪傑”相對之詞不是“俊雄”，而是“稱材”。王念孫認爲“稱材”是“精材”之誤。章炳麟認爲“稱”可訓“好”，“稱材”與“精材”字異義同，不煩改字。郭沫若進一步指出：

此“材”字乃士卒之謂，與上文“求天下之精材”有別。《呂氏春秋·簡選篇》“老弱罷民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高《注》云“練材，拳勇有力之材”。故此“稱材”猶言好手也。^⑪

所以《王兵》的“以練精材”，在文義上是講得通的。但是《王兵》上文說“取（聚？）天下之精材”，以“精材”指製造器械的上等材料；沒有隔多少字就說“以練精材”，又以“精材”指精練的士卒，恐怕不合爲文之法。所以我認爲“以練精材”應從《爲兵之數》作“以練精銳”，抄書者大概由於上文的影響，而誤將“精銳”寫成了“精材”。“以練精銳”就是選拔精銳之士的意思。《爲兵之數》“以練精銳”後的“爲右”二字，從文義看顯得多餘，疑是衍文。

《王兵》中與《爲兵之數》“論百工之銳器”相當之句爲“論百工之利器”。此當以作“利器”爲是。《論語·衛靈公》：“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老子·第

⑨ “厲吾銳卒”、“選厲銳卒”。

⑩ 參看陳直《居延漢簡綜論·十五·秋射制度》，同作者《居延漢簡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57—58頁。

⑪ 上引《管子集校》，232—233頁。

三十六章》：“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百工之利器”指工人用來製造器械的好工具，^⑫《爲兵之數》和《幼官》下文中的“器”則指製成的器械，二者不可混爲一談。《爲兵之數》的“銳器”似出自有意的竄改。可能在“春秋角試，以練精銳”句錯位之後，有人將前文中與“精材”相對的“利器”改爲“銳器”，使之與此句之“精銳”相照應。

上引《王兵》注釋已指出，《爲兵之數》“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句爲《王兵》所無。《幼官》與此相當之句爲“器成角試否臧”。上引《王兵》注釋引《幼官》時，在此句後加括注說：“疑本作‘器成角試，不試不臧’。”^⑬這是很有道理的。抄書者可能誤將此文前後兩個“試”字混同，以“器成角試”直接“不臧”，以致漏去“不試”二字。讀者遂以爲本應讀爲“藏”的“臧”即訓“善”之“臧”，而將“不”改爲“臧否”之“否”。不過前已指出，“春秋角試”本就士卒而非就器械而言。所以此文“角試”之“角”應爲誤字。從《爲兵之數》中相應之語看，似應爲“課”之誤字。《幼官》文中，“利器”也已訛爲“銳器”，可知其所從出者必爲與上引《爲兵之數》相似之文字，“論百工之銳器”後原來也應有“春秋角試”句。此句在今本《幼官》中雖已脫去，但“課試”之訛爲“角試”，仍應是受此句影響的。銀雀山竹書中的《庫法》篇有“器成必試乃臧（藏）”語。^⑭《幼官》的“器成角試否臧”，似乎也有可能是“器成不試不臧（藏）”之誤。但“課”、“角”聲母極近，“課”誤爲“角”的可能性要比“不”誤爲“角”的可能性大得多，故不取此說。從《庫法》和《幼官》之文看《爲兵之數》的“成器”大概是“器成”的誤倒。“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臧”也有可能出自對“器成課試，不試不藏”句的竄改。

“春秋角試”句承收攬豪傑俊雄而言，“器成課試”句承聚材論器而言。前後文句本是對稱的。《王兵》顯然是脫落了“器成課試”一句。

據以上所說，我們所討論的這段文字比較原始的面貌似可復原如下：^⑮

……聚天下精材，論百功利器，器成課試，不試不藏；收天下豪傑，有天下俊雄，春秋角試，以練精銳。

文句的結構極爲整齊勻稱。“百功”和三處“天下”之後，原來也可能已有“之”字。

^⑫ 《老子》“國之利器”當指治國之具、治國之道。

^⑬ 《銀簡》“釋文、注釋”部分 138 頁。引者案：“臧”讀爲“藏”。

^⑭ 《銀簡》“釋文、注釋”部分 134 頁。

^⑮ 字形用後世常用字。

三、“秉時養人”之“秉”爲“並”之音近訛字

《管子·勢》：

故不犯天時，不亂民功，秉時養人，先德後刑，順於天。

俞樾解釋“秉時”說：

《周書·謚法篇》曰“秉，順也”，“秉時養人”者，順時養人也。尹《注》曰“持四時之政，以順養其人”，訓秉爲持，未得其義。

郭沫若則認爲：“‘秉’訓爲持，不誤。‘時’謂曆朔也。”^{①⑥}

今案，《勢》篇所言爲陰陽刑德之說，“時”無疑指四時而言，郭說自不可從。俞說所據爲僻訓，在古書中並無可信用例，亦難成立。

馬王堆漢墓所出《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中之《十六^{①⑦}經·觀》，有與上引《勢》篇文相似之語句，兩者顯然同出一源，今引錄於下：

是爲故人主者，時控三樂，毋亂民功，毋逆天時^{①⑧}……夫並時以養民功，先德後刑，順於天。^{①⑨}

與《勢》篇“秉時養人”相當之語爲“並時以養民功”。

“並時”指統治者的行事與四時的變化相並，即與時相應、順時而行之意。《觀》篇上文說“春夏爲德，秋冬爲刑，先德後刑以養生，^{②⑩}”可爲“並時”句的說明。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觀》篇注釋說“帛書‘並時’，猶言順時”，^{②⑪}是很正確的。

“並”和“秉”上古音都屬於陽部。“並”爲並母字，“秉”爲幫母字，都是雙唇塞音，只有清濁之別。《勢》篇“秉時”之“秉”應即“並”之音近訛字。俞樾所據訓詁不足憑，但他將“秉時”理解爲“順時”還是可取的。

①⑥ 《管子集校》，郭沫若全集·歷史編7，人民出版社，1984，69頁。

①⑦ 此字或當釋“大”。

①⑧ “時控三樂”以下與《國語·越語下》范蠡語大致相同，二“毋”字《越語》皆作“不”，上引《勢》篇“不犯天時，不亂民功”亦用“不”字。

①⑨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馬王堆漢墓帛書〔壹〕》“釋文”部分62頁，文物出版社，1980。“夫並時”以下爲《越語》所無。

②⑩ 出處同上注。

②⑪ 上注所引書64頁注〔三二〕。

四、《韓非子》“行事”當與秦漢人所言“行事”同義

《韓非子·難一》在反駁管仲必先有尊位方能治國的說法時，先說“今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又說：

當世之行事都丞之下徵令者，不辟（避）尊貴，不就卑賤。

陳奇猷《韓非子新校注》爲此句加了兩個注。注五：

舊注：都丞，宦官之卑者也。○奇猷案：行事都丞，謂執行公事之都丞，“都丞”爲官名，“行事”非官名，參閱《說林》上篇注。^② 下文舊注云“二官”，蓋誤以“行事”亦爲官名。^③

注六：

舊注：二官雖卑，奉命徵令，亦不以尊即避，卑即就也。○奇猷案：徵、懲通。《荀子·政論篇》“凡刑人之本，禁暴惡惡，且徵其末也”，楊注“徵，讀爲懲”，是其證。徵令，懲罰之令也。此文謂小官如都丞奉法而下懲令，則尊貴亦所不避。或讀徵爲徵斂之徵，與“不辟尊貴”語不洽。辟，假爲避。^④

今案，陳說多不可信，詳下文。

此文“行事”固非官名，亦非“都丞”之定語。“當世之行事”後應加逗號或冒號。“行事”爲漢代人常用語，今但從《漢書》中引二例。《陳湯傳》記劉向因甘延壽、陳湯立功絕域，以小過而遲遲未受封賞事上疏，疏中舉舊事爲況，其言曰：

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厖（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

② 陳氏於《說林上》“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爲於僕與行事”句注中引俞樾曰：“‘事’字衍文。下文曰‘公佩僕璽而爲行事’，是僕與行爲官名。言佩僕之璽而爲行之事也。”見陳書462頁。

③ 《韓非子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868頁。

④ 同上注。

《翟方進傳》：

……慶^⑤與廷尉范延壽語，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贖論……方進於是舉劾慶曰：……慶有罪，未伏誅，無恐懼心，豫自設不坐之比……

上引第一例，顏師古注以“而爲之諱行事”爲句，認爲“行事謂滅項之事”。劉敞批評說：

“諱行事”非辭也。“諱”以上爲句。“行事”者，言已行之事，舊例成法也。漢世人作文，言“行事”“成事”者，意皆同。

王念孫《讀書雜誌·漢書第十二》“行事”條申劉說，舉證甚多。^⑥此說已成定論。

“行事”上述用法，漢代之前即已存在。睡虎地秦墓竹簡中的《法律答問》^⑦，屢言“廷行事”。例如：

告人盜百一十，問盜百，告者可（何）論？當貲二甲。盜百，即端盜駕（加）十錢，問告者可（何）論？當貲一盾。貲一盾應律，雖然，廷行事以不審論，貲二甲。^⑧

甲告乙盜直（值）□□，問乙盜卅，甲誣駕（加）乙五十，其卅不審，問甲當論不當？廷行事貲二甲。^⑨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的注，釋“廷行事”爲“法廷成例”，^⑩是很正確的。

《法律答問》的寫作時代無疑跟《韓非子》很接近。上引《難一》的“行事”沒有問題也應該當成例講。

陳氏校注將“都丞之下徵令者”句的“徵令”讀爲“懲令”，也不可信。這需要從都丞的性質說起。我認爲都丞的性質，當與漢代的郡國都吏、司隸校尉的都官從事和各州分管州所領各郡國有關事務的從事這一類官吏相似。

《漢書·文帝紀》記文帝元年定養老令：

^⑤ 司隸校尉陳慶。

^⑥ 但王氏誤劉敞爲劉敞。劉敞於“行事”亦有類似說法，且指出《論衡》亦言“行事”，見上引《翟方進傳》“自道行事以贖論”句下注，王氏文中亦已引及。三劉《漢書刊誤》久佚，但宋代刻《漢書》，有於有關文句下引錄其說者，後代刻本承之。

^⑦ 此名爲整理者所擬加。

^⑧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釋文、注釋”部分 102 頁。

^⑨ 同上 103 頁。

^⑩ 同上 102 頁。

有司請令縣、道：年八十已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賜帛人二匹，絮三斤；賜物及當稟鬻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不滿九十，嗇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

顏注引如淳曰：“律說，都吏今督郵是也。”居延漢簡屢言都吏。^①似西漢多稱都吏，東漢多稱督郵。

郡國督郵分部督察縣邑長吏等人。“其長吏或於期會為督郵所糾，或白太守察之，甚且可收案其罪。其太守所舉案者亦飭督郵奉宣焉。”^②督郵的身分是史，品秩甚卑，但職掌察舉，權頗重。其不避尊貴之事屢見史書，今舉一例於下。《後漢書·列傳第二十一·蘇章傳》附《蘇不韋傳》：

父謙，初為郡督郵。時魏郡李嵩為美陽令，與中常侍具瑗交通，貪暴為民患。前後監司畏其勢援，莫敢糾問。及謙至部，案得其臧（藏）論輸左校。

《後漢書·百官志四》：

司隸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孝武帝初置，持節，掌察舉百官以下及京師近郡犯法者，元帝去節，成帝省，建武中復置，並領一州。從事史十二人。本注曰：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犯法者，……其餘部郡國從事，每郡國各一人，主督促文書，察舉非法。皆州自辟除，故通為百石云。

司隸之外的十二州，當然沒有察舉朝廷百官的都官從事，至於分管州所領各郡國有關事務的從事，則是各州都有的。^③他們也都有察舉所分轄的郡國的官吏之權。

上舉那些從事，其品秩、職務都與郡國督郵相似，只不過所察舉的官員範圍、等級有所不同。他們都是位卑而權重，其中，都官從事之權尤重。上引《百官志四》劉昭注引《博物記》曰：“中興以來，都官從事多出之河內，掊擊貴戚。”《通典·卷三十二·職官十四》“司隸校尉”條，謂“其都官從事史至為雄劇，主察百官之犯法者”，並錄有如下一個事例：

胡騰字子升，辟荊州部南陽從事。遇桓帝南巡至南陽，千騎萬乘，呼召求

① 參看勞幹《居延漢簡考證》“都吏”條，《勞幹學術論文集·甲編》，藝文印書館，1976，294—296頁。

② 同上注295頁。

③ 參看《後漢書·百官志五》。

索不可堪。騰奏曰：“天子無外，乘輿所在即為京師。請荊州刺史比司隸，臣比都官從事，南陽守比河南尹，宛令比雒陽令。”許之。於是大將軍亡馬，西曹掾召騰。騰乃作都官從事鵠頭^{③④}召掾。掾乃覺，膝行辭謝。由是不敢輒有呼召。^{③⑤}

胡騰作為荊州管南陽郡事務的從事，要受大將軍西曹掾呼召，而作為都官從事，則可以呼召後者，嚇得他膝行辭謝。

《難一》的都丞，從上下文看，顯然是品秩卑下的一種官吏，但他却能“下徵令”“不避尊貴”，情況與漢代的督郵、都官從事等相類。而且其名稱也與督郵的初名“都吏”相類。^{③⑥}所以我認為他們應該是性質相似的官吏，即有權察舉地位比他們高的官員的一種小官。《韓非子》舊注只因“都丞”句下文說“故行之而法者，雖巷伯^{③⑦}信乎卿相；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誅乎民萌”，就說“都丞，宦官之卑者也”。這是不可信的。“都丞”顯然不像宦官的職名。

《漢書·元帝紀》建昭五年詔：“今不良之吏，覆案小罪，徵召證案，興不急之事，以妨百姓。”“徵令”之“徵”應與“徵召”之“徵”同義。都丞所下的徵令，應是徵召其察舉對象中的有問題者或與所察問題有關者的命令。上文所引胡騰故事中所說的、胡騰召大將軍西曹掾的鵠頭文書，就可以看作一種徵令。當然，都丞下徵令，也可以下達上級之命，就跟督郵奉宣太守之命一樣。

原載《人文與社會學報》第一期（臺灣義守大學，2002），今據以收入。

^{③④} 指用鵠頭書體寫的文書。

^{③⑤} 胡騰後在竇武被害時救出竇武之孫，故《後漢書·竇武傳》之末亦附記騰此事，但較簡單。

^{③⑥} 都官從事的“都官”，與郡國官吏相對，指其察舉對象，故其名稱與“都吏”、“都丞”無可比性。

^{③⑦} 指宦官。

再談古文獻以“執”表“設”

我在1985年發表的《釋殷墟甲骨文裏的“遠”“𡗗”(邇)及有關諸字》一文中，指出“執”、“設”二字上古音相近，^①武威漢墓所出《儀禮》簡往往以“執”表“設”，所以殷墟卜辭中的“執冒(罍)”應該讀為“設罍”。^②

後來，我又發表《古文獻中讀為“設”的“執”及其與“執”互訛之例》一文（以下簡稱“前文”），指出傳世的漢以前古籍和出土簡帛文獻中，有不少當讀為“設”的“執”字；而且在古籍中有些這樣的“執”字已被誤讀為“勢”或訛作形近的“執”字。^③所舉之例有下列語句中的“執”字：

人主用之則執在本朝而宜	《荀子·儒效》
無執列之位而可以養名	同上《正名》
列執尤尊，賞祿甚厚	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佚傳《繆和》
執為賞慶爵列以勸其下	同上 ^④
執列爵位之尊，明厚賞慶之名	同上

還有下列語句中的“勢”字：

明勢天道，九紀咸當	《逸周書·小開武》
凡勢道者，不可以不大	同上《周祝》
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	《韓非子·有度》
二勢者用，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	同上《南面》

① “執”即“藝”字初文，漢以前又多以“執”表“勢”。“勢”、“設”同為書母字。“執”、“勢”上古音屬祭部，“設”屬月部。祭、月二部陰入對轉。王力先生且將祭部併入月部。

② 裘錫圭《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7頁。參看注③所引文39頁。

③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東方文化》1998年36卷1、2號合刊，39—45頁。此刊實際出版年份為2002年。

④ “前文”引此句，誤“其”為“天”，又誤將下句文字斷入此句，今據張政烺《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校讀》（中華書局，2008）172頁釋文校正。

基者，經也，勢也

《新書·禮容語下》（此例蒙劉殿爵教授指示）

勢施異也

《淮南子·說林》（亦見《文子·上德》）

勢施便也

《淮南子·泰族》

還有下列語句中的“執”字：

執之以物而遽（速）決

《大戴禮記·文王官人》

（此句《逸周書·官人》作“設之以物而數決”，王念孫已指出《文王官人》的“執”當作“設”）

少者執牀與坐

《禮記·內則》

其所取者，人之所執也

《墨子·大取》

位執戒輔

《新書·容經》

這些字本來都應該是或者極可能是表示“設”這個詞的，“前文”有詳細論證，可參閱。

我在撰寫“前文”時沒有注意到周代青銅器銘文中也有表“設”的“執”字。西周昭王時的中方鼎的銘文有“執王卽”，中甗和靜方鼎的銘文有“執卽”，都指為昭王南征作準備之事。^⑤ 李學勤先生在收入其《新出青銅器研究》的《盤龍城與商朝的南土》一文中，已在所引中甗和中方鼎銘文的“執”字後括注“設”字。^⑥ “卽”字有釋“居”、釋“位”二說。不管是“設居”還是“設位”，都文從字順。

“執”字又見於上引中方鼎銘末“執于寶彝”句。^⑦ 與中方鼎同出的、器主為同一人的中觶，銘末說“中執王休，用作父乙寶尊彝”，^⑧ “執”字用法與之相同。陳劍先生懷疑這種“執”字也應該讀為“設”，用法與《禮記·祭統》所引衛孔悝鼎銘末尾“施于烝彝鼎”之“施”相似，指將銘文所言之事“陳設出來”。^⑨ 他的意見也應該是正確的。

⑤ 參看李學勤《靜方鼎與周昭王曆日》，同作者《夏商周年代學札記》，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22—24頁。

⑥ 李學勤《新出青銅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15頁。李先生在注⑤所引文和《靜方鼎補釋》中引靜方鼎銘時，也在“執”字後括注“設”字，見注⑤所引書22、76頁。

⑦ 《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02751、02752，中華書局，2007，第二冊1419頁、1420頁。中方鼎屬於北宋重和元年安陸孝感縣所出的所謂“安州六器”之列。當時共出三方鼎，二鼎同銘，我們所說的“中方鼎”指同銘二鼎。

⑧ 注⑦所引書06514，第五冊3863頁。

⑨ 陳劍《金文“彖”字考釋》，同作者《甲骨金文考釋論集》，綫裝書局，2007，250—252頁。

保利藝術博物館 2002 年入藏的西周中期的斃公盨，其銘文開頭講天帝命禹治水的一段文字中有一句話，李學勤先生釋讀為“差彖(地)執(設)征”，^⑩我則釋讀為“葬(疇)方執(設)征(正)”，^⑪意見雖有很大分歧，讀“執”為“設”則是一致的。

春秋晚期的浙川和尚嶺 2 號楚墓出有一件青銅“鎮墓獸座”，上有銘文，發掘報告釋讀為：^⑫

曾中(仲)仰(薦)丑□(引者按：此字不識，原隸定不甚準確，姑以□代之)
之且(祖)執

此銘發表後，學者對“且執”有一些解釋，^⑬似皆不可從。我懷疑此銘“執”字也應讀為“設”。原書所印拓本“執”上一字頗為模糊，如所釋無誤，疑當讀為古代出行前所舉行的祖祭之“祖”。據《儀禮·士喪禮》，在靈柩從殯宮移至祖廟後，出廟赴壙前，就跟活人出行前一樣，也要行祖禮，同時陳設將要隨葬的明器等物。“且(祖)執(設)”疑可理解為行祖禮時之所陳設。所謂“鎮墓獸”是辟邪之物，在赴壙過程中和入壙之後，可以起保護亡靈的作用。當然，我的解釋也只是一種推測，記此待考。

在武威《儀禮》簡之外，出土簡文中還屢見表“設”之“執”，學者們陸續有所指出。下面先舉楚墓竹簡的例子。

江陵九店 56 號楚墓所出竹簡，大部分是“日書”一類東西，其中的簡 31 說“外陽日”“執罔(網)導(得)，大吉”，李家浩先生指出“執”當讀“設”。^⑭

郭店楚墓竹書方面，整理者讀《尊德義》簡 30“或繇(由)憲(中)出，或執之外”之“執”為“設”，^⑮李零先生讀《性自命出》簡 12—13“勿(物)之執者之胃(謂)執(勢)”^⑯的前一個“執”為“設”，^⑰郭永秉先生讀《六德》的“大材執者大官，少(小)

⑩ 李學勤《論斃公盨及其重要意義》，《中國歷史文物》2002 年 6 期，5、8、11 頁。

⑪ 裘錫圭《斃公盨銘文考釋》，注⑩所引書，15—17 頁。

⑫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川和尚嶺與徐家嶺楚墓》，大象出版社，2004，109 頁。

⑬ 參看高崇文《楚“鎮墓獸”為“祖重”解》，《文物》2008 年 9 期。

⑭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九店楚簡》，中華書局，2000，48 頁、90—91 頁注〔一一一〕。

⑮ 荆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8，174 頁、175 頁注〔一六〕。

⑯ 注⑮所引書，179 頁。整理者把前一個“執”也讀為“勢”。

⑰ 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增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106 頁、107 頁〔說明〕“7 章”。

材執者少(小)官”¹⁸爲“大材設諸大官,小材設諸小官”,¹⁹我讀《老子》丙組簡4的“執大象”爲“設大象”。²⁰

在上博楚竹書方面,林志鵬先生讀《彭祖》簡1“臣可(何)執可(何)行”²¹之“執”爲“設”,²²陳劍先生讀《用曰》簡18“執立帀(師)長”²³之“執”爲“設”。²⁴

秦簡中有假借从“執”聲的“熱”爲“設”的例子。李家浩先生在考釋前面引過的九店楚簡“外陽日”占辭時指出,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楚徐成、外陽之日占辭”中,與九店簡“執罔(網)導(得)”相當的文字是“熱罔(網)邇(獵),獲”,²⁵“‘執’、‘熱’二字可以通用”,皆當讀爲“設”。²⁶

張家山247號西漢墓(呂后時下葬)所出竹書《蓋(闔)廬》,有“建執四輔”句,²⁷整理者已指出“執”當讀爲“設”。²⁸

銀雀山1號西漢墓(武帝早期下葬)所出竹書中,有一篇佚兵書,第一簡以“孫子曰”開頭,簡背題有篇名“執備”。²⁹整理小組(我是其中一員)將此篇歸入《孫臏兵法》,讀“執備”爲“勢備”。³⁰現在看來,“執備”實當讀爲“設備”。此篇說禽獸以齒角爪距相鬥,人無“天兵”(天生的武器),必須“自爲備”,所以“黃帝作劍,以陳(陣)象之;羿作弓弩,以執(勢)象之;禹作舟車,以變象之;湯、武作長兵,以權象之”,下文即對其四“象”之說加以解釋。³¹當初我們將“執備”讀爲“勢備”,當與此

¹⁸ 同注¹⁵所引書,187頁。

¹⁹ 郭永秉《戰國竹書簡義(三則)》,復旦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科《語言研究集刊》第五輯,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287—290頁。《郭店楚墓竹簡》整理者誤讀二“執”字爲“藝”。又,簡文“大材”句之上的“子弟”二字,整理者屬下爲句,郭文從陳偉先生說屬上爲句。

²⁰ 裘錫圭《郭店〈老子〉簡初探》,同作者《中國出土古文獻十講》,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215—216頁。此“執”字在帛書本和今本《老子》中皆已訛作“執”。

²¹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304頁。整理者讀“執”爲“藝”。

²² 林志鵬《戰國楚竹書〈彭祖〉考論——兼論〈漢志〉“小說家”之成立(一)》,簡帛網,2007年8月18日。

²³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304頁。

²⁴ 陳劍《上博(六)釋文》,未刊。

²⁵ 《日書》乙種簡20壹+簡19壹第二段。《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0)120頁圖版拼接有誤,李家浩先生加以改正,見注¹⁴所引書188頁及同頁注〔四〕。

²⁶ 注¹⁴所引書,90—91頁注〔一一一〕。

²⁷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文物出版社,2001,101頁簡5。

²⁸ 注²⁷所引書,275頁注〔六〕。

²⁹ 《銀雀山漢墓竹簡[壹]》,文物出版社,1985,圖版35頁349背、349正。

³⁰ 注²⁹所引書,釋文注釋62頁。

³¹ 注²⁹所引書,釋文注釋62—63頁。

篇中談到“勢”有關。但是“勢”只是四“象”之一，“勢備”與此篇文義並不相合。從文義看，“執備”當讀為“設備”，指人類自設兵器舟車等物以為備。《左傳》已言“設備”，僖公二十二年《傳》：“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六韜·龍韜·農器》：“守禦之備，可無設乎？”“設備”之義由此可以看得很清楚。

銀雀山漢簡未發表圖版之簡中，也有表“設”的“執”字，例如：

……不執國□，詆訖乃起，凶訖乃至。不執……(1028)^⑫

……上下之間(問)於是執坊(防)，下請(情)不達於上，上……(1304)^⑬

……諫賊，乃執邑市(師?)於野……(1513)^⑭

從文義看，上引各簡“執”字也當讀“設”。

銀雀山漢簡《六韜》中，有一篇與今本《武韜·三疑》相合。今本“設之以事，玩之以利”，簡文作“摯以事，咱以利餌”(簡702—703)，^⑮整理小組注指出武威《儀禮》漢簡以“執”為“設”，謂“‘執’、‘摯’古音相近，疑簡文‘摯’亦當讀為‘設’”。^⑯今按，也有可能此字在古本中本作“執”，先錯成“執”，又變作“摯”。^⑰

⑫ 所注數字為銀雀山漢簡整理前山東省博物館所編的順序號。此條簡文是我在1970年代參加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閱讀未經整理的竹簡照片時，因感到此簡所用“執”字可能應讀為“設”而抄錄下來的。下引兩條簡文情況同此。吳九龍《銀雀山漢簡釋文》(文物出版社，1985)70頁有此簡釋文，“執”釋為“勢”(下引1304、1513號釋文同)，前一“執”字後一字釋為“眯”，“詆”後一字釋為“誦”，“凶”後一字釋為“謳”。

⑬ 注⑫所引書85頁有此簡釋文，“坊”釋為“城”。

⑭ 注⑫所引書95頁有此簡釋文，未釋“市於”二字。

⑮ 注⑫所引書，圖版69頁。

⑯ 注⑫所引書，釋文注釋118頁注〔七〕。

⑰ 蔡偉先生閱此文第一次打印稿後，認為此“摯”字應為“摯”之誤。現將他所寫的意見摘錄於下：

……“摯”从“執”得聲，故可以借為“設”。《廣雅疏證》卷一下“摯，解也。”王念孫謂即《方言》之“瘳”字。音充世切，與摯同音。《馬王堆漢墓帛書〔叁〕·戰國縱橫家書》“割摯馬免而西走”，“摯”亦當作“摯”。《趙策》作“割摯馬免〔免〕而西走”。“摯”、“摯”古音相近，猶《方言》之“瘳”，《廣雅》作“摯”。“摯”、“摯”當讀為“摯”。《廣雅》卷三上“摯，束也。”……《大戴記·文王官人》：“摯之〔謀〕，以觀其知；示之難，以觀其勇。”《逸周書·官人》作“設之以謀，以觀其智；示之以難，以觀其勇”，假“摯”為“設”。

我以為“摯”由“執(設)”之形近訛字“執”變來，不如以其為“摯”之形近訛字妥當。感謝蔡先生的指示。又按：“摯”字从“手”“執”聲，陳設多需用手，頗疑古代除了訓“解”、訓“引”的“摯”字(訓“引”者亦見《廣雅·釋詁》卷一下，與《說文·手部》“瘳”字同音義，亦即“摯”字，詳《廣雅疏證》。《說文》以“瘳”字為“从手，瘳省聲”)，還有作為“執”字“設”義的分化字的“摯”，銀雀山《六韜》的“摯”、《大戴禮記·文王官人》的“摯”皆其訛字，殆因形、音皆近而誤。

我在發表“前文”以後，又從傳世古籍和馬王堆帛書中，找到了一些“執”（包括已變作“勢”和“藝”的）當讀爲“設”以及“執（設）”錯成“執”的例子，現在逐例敘述於下。

楊（俗作“揚”）雄《法言·問神》：

或曰：“君子病沒世而無名，盍勢諸名卿，可幾也。”

《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引此文，“勢”作“執”。此字亦應讀爲“設”，《法言》作“勢”爲後人所改。“設諸名卿”蓋仿《墨子·耕柱》“設之於卿”。前人對此句解釋皆誤，唯清代學者蘇輿引《荀子·正名》“無執列之位而可以養名”說《漢書》之“盍執諸名卿可幾”，謂此句“言何不取富貴班列（蘇氏從《荀子》楊注“執列，班列也”之說）名卿之位，則名可庶幾也”，^③雖然未得“執”字確解，但對句義的把握大體正確，只不過原文是說讓在上者將君子“設諸名卿”，並不是說君子自取名卿之位。我在將“前文”抽印本分送給友人時，曾將此條內容撮要寫入抽印本作為補白，所以郭永秉先生在解釋郭店簡《六德》“大材執（設）者（諸）大官，少（小）材執（設）者（諸）少（小）官”句時，能夠引用拙說。^④“執（設）諸名卿”與“執（設）者（諸）大官”、“執（設）者（諸）少（小）官”，文例全同。

《禮記·禮運》說，“大道既隱”之後，必須講禮義，“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爲殃”。鄭玄注：“執，執位也。去，罪退之也。”鄭注以爲此“執”字與“位”義近，是對的；讀“執”爲“勢”（《釋文》：“執，音世，本亦作‘勢’。”），則不正確。“在勢”之語難通，此“執”字亦應讀爲“設”。我在“前文”中已經指出，“古書中說到置立官職爵位或任人以職等事時，往往用‘設’字”。^⑤“在設”與“在任”、“在位”義近，而且“設”與“去”的意義正好相對。從“前文”解釋過的《荀子·正名》的“執（設）列之位”一語，可知“在執（設）者”即指在朝廷所設之位者。（校打印稿時按：在古書中，似找不出其他以“設”字直接指“位”的例子，此說終覺可疑。但古書中似也找不出“勢”字用法真正與“位”相同的例子，故暫存此說，以待後考。）

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中的《經法·國次》篇有下引一段文字：^⑥

③ 據王先謙《漢書補注》轉引，藝文印書館《二十五史》影印本，1363頁。

④ 注①所引書，289頁。

⑤ 注③所引書，40頁。

⑥ 《馬王堆漢墓帛書〔壹〕》，文物出版社，1980，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圖版12行下一13行下，釋文45頁。

毋陽竊，毋陰竊，毋土敝，毋故執，毋黨別。陽竊者天奪[其光，陰竊]者土地芒(荒)，土敝者天加之以兵，人執者流之四方，黨別[者]□內相功(攻)。

原整理者的注解釋上引這段話說：^⑫

自“毋陽竊”以下一段，與《十六(引者按：此字似宜釋為“大”)經·觀》及《國語·越語下》內容有關。《觀》：“夫是故使民毋人執，舉事毋陽察，力地毋陰蔽。陰蔽者土荒，陽察者奪光，人執者縱兵。”(八六至八七行)《越語下》：“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此與帛書本篇上文“天反勝人，因與俱行”意近)。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毋)陰蔽，先無(毋)陽察，用人無蓺，往從其所。”古代竊、察二字音近相通，本篇之“陽竊”即彼二篇之“陽察”。本篇之“陰竊”相當於彼二篇之“陰蔽”(《越語》作“蔽”)。……

上引之注正確可從，但整理者在另一條注中讀“故執”、“人執”之“執”為“槩”，解為“磨擦不安”，^⑬則不可信。此“執”字亦應讀為“設”。《越語下》作“蓺”(即“藝”之古字)，本來表“設”的“執”被改成表示“執”字本義(即“種藝”義)的後起字，情況與古書中有些表“設”的“執”被改成表示“執”字引伸或假借義的“勢”字，^⑭有類似之處。《國語·越語下》“用人無蓺，往從其所”韋昭注解釋說：

蓺，射的也。無蓺，無常所也。行軍用人之道，因敵為制，不豫設也，故曰“往從其所”。

韋注訓“蓺”為射箭靶子雖然錯誤，申講時將“無蓺”理解為“不豫設”却很有道理，正可證明此“蓺”字實應作“執”，讀為“設”。“無蓺”與“毋陽察”、“毋陰蔽”的結構類似，“無”也應讀為“毋”。

《莊子·山木》：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斂以為鍾(鐘)，為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懸)。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

郭象注：“怕(泊)然抱一耳，非敢假設以益事也。”“無敢設”也就是《越語》的“無

⑫ 注⑪所引書，釋文 46 頁注〔三一〕。

⑬ 注⑪所引書，釋文 45 頁注〔三〇〕。

⑭ 注③所引書，41—42 頁。上文所說《法言·問神》“勢諸名卿”亦是其例。

(毋)蓺(執)”、帛書的“毋人執”、“毋故執”。“人爲”與“智故”皆爲道家所否定，二者很難截然分開，^{④⑤}“人執(設)”與“故執(設)”是一回事。所以前引《國次》文先說“故執”，後來改說“人執”。古人認爲鏡能照物，是由於其“無設”(參看下文講《新書·道術》“無執不臧”的那段文字)，“使民毋人設”、“用人無設”的道理與之相通。

賈誼《新書·道術》：

鏡義(或作“儀”)而居，無執不臧(藏)，美惡畢至，各得其當。

此文“執”字無疑是表“設”的“執”的形近誤字。《文子·上德》：“鼓不藏聲，故能有聲。鏡不設形，故能有形。”^{④⑥}《淮南子·原道》：“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弗能逃也。”皆其確證。

《道術》篇上文說：

道者，所道接物也。其本者謂之虛，其末者謂之術。虛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諸也。

劉殿爵先生據《淮南子·詮言》“聖人無思慮，無設儲”語，校此文“設諸”爲“設儲”；並指出“‘無設儲’即下文‘不臧’之意”。^{④⑦}這也說明“無執不臧”的“執”本應作“執(設)”。“無設儲”與“無執(設)不臧(藏)”，意義全同。

《道術》篇“設”、“執(設)”並出，毫不奇怪。我在“前文”中已經指出，武威《儀禮》簡中，“設”、“執(設)”二字不但可以出現在同篇之中，甚至偶爾還會出現在同簡之中。^{④⑧}“前文”指出帛書《繆和》有“執(設)”字，其實此篇亦有“設”字。^{④⑨}估計這些書較原始的本子是全用“執”字表“設”的，傳抄者或改爲“設”，或不改(當既有知其義而不改者，也有因不知其義而不能改者)，遂致二字錯出。情況與《素問》中“炅(熱)”、“熱”二字錯出相類。^{⑤⑩}

④⑤ 參看拙文《由郭店簡〈性自命出〉“室性者故也”說到〈孟子〉的“天下之言性也”章》，注②⑩所引書，265—267頁。

④⑥ 此文亦見《淮南子·詮言》，但“藏”字(原當作“臧”)已訛作“滅”，下有“於”字；“設”字已訛作“沒”，其下亦有“於”字。請看王念孫《讀書雜誌·淮南內篇第十四》“不滅、不沒”條。

④⑦ 劉殿爵編《賈誼新書逐字索引》，香港商務印書館，1996，56頁校注3。

④⑧ 注③所引書，39頁。

④⑨ 見注④所引書30頁43行上(釋文見171頁)、32頁53行上(釋文見173頁)。

⑤⑩ 關於“炅”字，參看拙文《考古發現的秦漢文字資料對於校讀古籍的重要性》，注②⑩所引書，130頁。

《新書》中“設”字屢見，但從“無執不臧”之“執”和“前文”所舉《禮容語下》“基者，經也，勢也”之“勢”皆當作“執(設)”來看，原始的本子也應是全用“執(設)”字的，後來大部分被改爲“設”，但有的却錯成了“勢”或“執”。

《莊子·人間世》有一段假託葉公子高與孔子的問答。子高說他的食飲很簡單，其言曰：

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

成玄英疏：“臧，善也。清，涼也。……執用粗糲，不暇精膳。所饌既其儉薄，爨人不欲思涼，燃火不多，無熱可避之也。”“執粗”、“執用粗糲”的說法，似不合語言習慣。

《經典釋文》對上引《人間世》文的“執”字有注：“執，衆家本亦然，簡文(引者按，指梁簡文帝)作‘熱’。”李家浩先生考釋九店楚簡的“執網”和睡虎地秦簡的“熱網”時，指出“執”、“熱”二字可通用，認爲《人間世》“執粗”之“執”既有異文作“熱”，當是“執”的形近訛字。^⑤其說可從。

古代於飲食可言“設”，如《禮記·哀公問》“備其鼎俎，設其豕腊”、《戰國策·秦策一·“蘇秦始將連橫”章》“清宮除道，張樂設飲”。在稍晚一些的古書中，“設食”、“設饌”一類話是屢見的。上引《人間世》“執粗”之“執”，無疑是“執”的訛字，應該讀爲“設”。成疏釋“執粗”爲“執用粗糲”，是就已訛之文加以敷衍；但其“所饌既其儉薄”一語(郭象注：“對火而不思涼，明其所饌儉薄也”，爲此語所本)，用來解釋“執(設)粗而不臧”倒是頗爲合適的，因爲“饌”的本義就是設食。

最近，蔡偉先生告訴我，《鹽鐵論》中也有一個“執(設)”訛作“執”的例子，附述於下。

《鹽鐵論·本議》：

先帝哀邊人之久患，苦爲虜所係獲也，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榷，置均輸，蕃貨長財，以佐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使備塞乘城之士饑寒於邊，將何以贍之？

此文“執備”無疑是“執(設)備”之誤。“設備之用”即指上文提到的“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之”的“用度”。《淮南子·人間》：“故秦之設備也(指備胡、備越而言)，烏鵲之智也。”“設備”用法與此同。

我相信在古文獻中一定還有不少表“設”的“執”字及其訛變爲从“執”聲之字

^⑤ 注⑭所引書，90—91頁注〔一一一〕。

或“執”字的例子，有待大家去辨識。

最後，簡單談一下“執(設)”、“設”二字使用的歷史情況。

現有的先秦文字資料，似乎只用“執”而不用“設”來表示“設置”之“設”這個詞。這似乎至少應該是商和西周時代用字的普遍情況。《說文·三上·言部》：“設，施陳也。”“執”是“藝”的初文，其本義是種植樹木、穀物。施陳物品與種植樹木、穀物這兩件事，似有相類之處，“設”也許就是由“執”派生的一個詞。也就是說，“設”可能就是“執”的引伸義。當然，以“執”表“設”只是由於音近假借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設”字本身其實也不一定就是“設置”之“設”這個詞的本字。

確實可信的表示設置之義的“設”字，似始見於秦始皇泰山刻石的“建設長利”句。^② 張家山 247 號漢墓出土竹簡中，傳抄的古書《蓋廬》有“執(設)”字，已見上文；同墓所出的應為呂后時代抄寫的《二年律令》267 號簡“郵各具席，設井、磨”句則用“設”字。^③ 時代上限為漢武帝晚期的居延漢簡和敦煌漢簡，就已發表的材料來看，似只用“設”字而不用“執(設)”字（所見“執”字多用作“勢”）。大概除了傳抄古書之外，在西漢時代已經以用“設”為主了。不過，前面已經指出，西漢早期賈誼所作的《新書》，原來應該是用“執(設)”字的；宣帝時桓寬所編寫的《鹽鐵論》的傳本中，也還有“執(設)”錯成“執”的例子；甚至生活在西漢晚期至王莽時代的楊雄，在撰寫《法言》時也用了“執(設)”（今本已訛作“勢”）；可見在整個西漢時代，除了傳抄古書，文人著書時也還是比較喜歡用“執(設)”的。

從馬王堆帛書、銀雀山竹書等西漢早期傳抄的古書和出自王莽時代漢墓的、大約抄寫於西漢晚期的武威《儀禮》簡來看，西漢人傳抄古書往往保存“執(設)”字，而改用“設”字的情況也很常見。前面已經講過，帛書《繆和》篇和武威《儀禮》簡都是二者並用的。

到東漢時代，“執(設)”字的使用可能很快就趨於絕跡了。《漢書》引《法言》保存“執(設)”字，也許是個別的特例。

由於資料不足，我們還不知道統一前的秦文字是否已經全用“設”字，還是像楚簡那樣仍以“執”表“設”，或是已經出現了“執(設)”、“設”並用的局面。睡虎地《日書》的“楚除”部分應該抄自楚國《日書》，以“執”表“設”不一定代表秦文字的

② 傳世的所謂泰山刻石宋拓本實不可信，但“建設長利”句已見於宋代劉跂《泰山秦篆譜》，因而是確實可信的，參看容庚《秦始皇刻石考》，曾憲通編《容庚文集》，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190 等頁。

③ 注②所引書，29、169 頁。

正常用字情況。對於戰國時代楚國之外的東方國家的有關用字情況,由於有關出土文字資料的缺乏,也不能算很清楚。希望新資料的發表和發現,早日使這些問題得到解決。

附記:

本文寫作過程中,承陳劍、郭永秉、周波三位同仁幫助檢索資料;文章寫成後,又蒙永秉代為打印,並提出很好的修改意見,十分感謝。

2008年11月23日

追記:

永秉打印完此文後,沒過幾天,就從古書裏新“辨識”出了一對由“執(設)”訛變而成的“執”字,遂請永秉將他為此而寫的一則讀書筆記打印在本文後面。希望有更多的人來參加我們的“辨識”隊伍。

附：讀書札記一則

郭永秉

閻振益、鍾夏《新書校注》“鏡義而居”句注:“《韓非子·飾邪》‘鏡執清而無事,美惡從而比焉’,或即誼所本。”(中華書局,2000年7月,306頁)《韓非子·飾邪》原以鏡、衡並言:“鏡執清而無事,美惡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焉”,太田方《韓非子翼毳》注:“《治要》引《申子》:‘鏡設精而無爲,而美惡自備;衡設平而無爲,而輕重自得。’”(轉引自陳奇猷《韓非子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0月,360頁)可證《飾邪》的這兩個“執”字皆“執(設)”的訛字。陳奇猷指出《申子》的“精”當據《韓非子》讀爲“清”,可從。鏡之“清”與衡之“正”(或“平”)相對;“清”者,清明也,鏡、水都具有“清”的特性,所以都能客觀地反映“美惡”。“設清”與《新書·道術》“無設不藏”的意思相近。《說苑·談叢》也有與上引《申子》和《韓非子》文類似的話:“鏡以精明,美惡自服(備);衡平無私,輕重自得。”其“精”字亦應讀爲“清”。【編按:永秉後來已將此則札記的內容收入他的《以簡帛古籍用字方法校讀古書札記》一文中,文載《簡帛語言文字研究》第五輯(巴蜀書社,2010年6月。後收入其《古文字與古文獻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6月)】

校清樣時追記：

1. 本文所引的“前文”所指出的馬王堆《周易》佚傳《繆和》篇“執”當讀爲“設”各例中，“執爲賞慶爵列以勸其下”一例的“執”字，張政烺先生在《〈繆和〉校注》稿中已指出其“假爲設”，見注④所引書 181 頁。

“執列爵位之尊，明厚賞慶之名”一例，據陳劍先生最近重新整理馬王堆《周易》佚傳照片的成果，句首尚可拼上五字，全句當爲：“夫先君作爲執列爵位之尊，明厚賞慶之名，此先君之所以勸其力也。”則此句實以“執列爵位之尊”爲“作爲”的賓語。《繆和》篇尚有“夫賢君之爲列執爵位也，與實俱”一句（注④所引書圖版 33 頁 61 行下—32 頁 62 行上），以“列執爵位”爲“爲”的賓語，文例與此相類，“前文”失引。“前文”認爲“執列爵位之尊”與“明厚賞慶之名”相對，“執列”爲謂語動詞（“前文”41 頁），是錯誤的；但上引兩句中“執列”和“列執”的“執”，仍應讀爲“設”。《大戴禮記·千乘》有“設其四佐，列其五官”之語。“設列”、“列設”即指君主所“設”所“列”的官位，亦即《荀子·正名》所說的“執（設）列之位”。“設列爵位”、“列設爵位”，猶言“官爵”或“官爵之位”。

2. 近出周初銅器𠩺簋的銘文結尾說：“用茲簋褻公休，用作祖乙尊彝。”（張光裕《𠩺簋銘文與西周史事新證》，《文物》2008 年 2 期，55 頁）“褻”字从“執”聲，在此銘中的用法也與本文所引中𠩺等銘的“執”字相同。沈培先生在𠩺簋公開發表前，就指出此“褻”字也應讀爲“設”，其說正確可從。

3. 本文講馬王堆帛書的“故執”、“人執”時，曾指出《十六經·觀》說“使民毋人執（設）”，與《國語·越語》“用人無蓺（設）”同意。《群書治要》卷 37 所錄《慎子·民雜》說：“是故不設一方以求於人，故所求者無不足也。”意亦相近。

4. 《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載之罽東觀刻石文，有“昭設備器”語，亦用“設”字，惜此石早毀，無從核實。

2010 年 4 月 25 日

原載《先秦兩漢古籍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今據以收入。本文的“校清樣時追記”原已寄給論文集的編者，可能由於疏忽沒有印出。

再談古書中與重文有關的誤文

前人早就指出，古書中的誤文往往與重文的脫漏和誤讀等事有關。于省吾先生在上世紀 40 年代末發表於《燕京學報》37 期的《重文例》，是這方面帶有總結性的一篇文章。

我在發表於 1980 年的《考古發現的秦漢文字資料對於校讀古籍的重要性》一文中，也談到這方面的問題。文中說：

秦漢時代的書寫習慣，還有一點應該注意，那就是表示重文的方法。在周代金文裏，重文通常用重文號“=”代替，而且不但單字的重複用重文號，就是兩個以上的詞語以至句子的重複也用重文號。秦漢時代仍然如此（就抄書而言，其實直到唐代都還常常如此）。……知道了古人表示重文的習慣，就可以糾正古書裏與重文有關的一些錯誤。^①

文中接着舉出了幾個我們所發現的例子。

從此文的發表到現在，消逝的時間已近三十年。由於古書讀得不多，而且讀得不夠仔細，只發現了兩三個新的例子，現在提出來向大家請教。

上舉拙文引述了我在《論衡札記》裏所說的一個例子。《論衡·卜筮》篇“占之不審吉凶，吉凶變亂，變亂，故太公黜之”，本當作“占之不審吉=凶=變=亂=故太公黜之”，應讀為：“占之不審，吉凶變亂。吉凶變亂，故太公黜之。”^②由於本應讀為“ABCD, ABCD”的“A=B=C=D=”，被誤讀為“……AB, ABCD, CD”，就形成了今本的誤文。後來，我在《禮記》裏發現了一處由於同類原因而形成的誤文。

《禮記·孔子閒居》：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

① 此文發表於《中國社會科學》1980 年 5 期，已收入拙著《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引文見 38—39 頁。

② 同上注，39 頁。

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③

講“天”的一句沒有問題。講“地”的一句，已說“地載神氣”，接着又說“神氣風霆”，而“神氣”是“神妙之氣”（孔穎達《正義》說），^④或“五行之精氣”（孫希旦說），^⑤總之與“風霆”並非一事，“神氣風霆”不能解釋為“神氣即風霆”，當作對“神氣”的說明，這四個字放在這裏實在有些莫名其妙。所以宋代的呂大臨說“此衍‘神氣風霆’四字”，認為是誤衍之文。^⑥清人朱彬《禮記訓纂》、^⑦孫希旦《禮記集解》，^⑧都引了呂大臨的話。他們雖然沒有明確表示同意，但顯然也都感到這四個字有問題。

我們讀一下孔穎達《禮記正義》對上引講“地”的那句話的解釋，就可以明白，今本的這句話也是誤讀重文的產物。《正義》之文如下（文字、標點皆依所據《十三經注疏整理本》，但標點可商榷之處用括號注明）：

“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者，（“，”宜改為“：”）“神氣”謂神妙之氣。風霆（依例，此二字亦應加引號），霆，雷也。神氣風霆流形（此六字亦應加引號，詳下文），謂地以神氣、風雷之等，流布其形。“庶物露生”，庶，衆也。（“。”宜改為“，”）言衆物感此“神氣風霆”之形，露見而生，（此“，”宜改為“。”）人君法則此地之生物，事事奉之以爲教也，故云“無非教也”。^⑨

此段《正義》中的“神氣風霆流形”，顯然跟其前的“神氣”、“風霆”和其後的“庶物露生”一樣，是對需要解釋的經文原文的引錄，標點時應該跟“庶物露生”等一樣，也加引號。由此可知在今本所從出的古本中，經文講“地”的一句和上引《正義》開頭處後加“者”字的整句引文，本來都是使用重文號的，原文當作：

地載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③ 《十三經注疏整理本 15·禮記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1631 頁。

④ 同上注。

⑤ 〔清〕孫希旦《禮記集解》，中華書局，1989，下冊 1278 頁。

⑥ 〔宋〕衛湜《禮記集說》一百二十卷（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1983，119 冊，583 頁。

⑦ 〔清〕朱彬《禮記訓纂》，中華書局，1996，下冊 755 頁。

⑧ 同注⑤。

⑨ 同注③。

按文義本應讀爲：

地載神氣風霆，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正義》以“神氣風霆流形”爲一小句，讀法是對的。由於前一小句是“地載神氣風霆”，《正義》在解釋“神氣風霆流形”之前，先解釋了“神氣”和“風霆”。可是後來的傳鈔者或刊刻者，把“地載神=氣=風=霆=流形”錯讀成“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文義就不通順了。

陸德明《經典釋文·禮記音義之三·孔子閒居第二十九》對講“地”一句有如下注釋：

神氣風霆：音廷，絕句。風霆流形：絕句。^⑩

所引經文却與今本相合。這可以有三種解釋。一、陸氏已經跟後人一樣，誤讀了有關重文。二、陸氏所據之本或其所從出之古本，本作“地載神氣風=霆=流形……”，應讀爲“地載神氣風霆，風霆流形……”。陸氏引經文時省去“地載”二字，或者本有此二字，後人刪去，使此句變得與傳本“地載神氣”後小句相同。三、陸氏所據之本與《正義》所據之本，其有關文字本無不同。陸氏對重文的讀法，與《正義》亦無不同。其所引經文本作“地載神氣風霆”、“神氣風霆流形”。後人爲與傳本取得一致，刪去前句“地載”二字、後句“神氣”二字。

如果上述第二種解釋屬實的話，究竟是《釋文》所據本“神氣”二字脫落了重文號，還是《正義》所據本“神氣”二字衍增了重文號，就需進一步研究了。

我在《考古發現的秦漢文字資料對於校讀古籍的重要性》那篇文章裏還曾指出，以《莊子·庚桑楚》中的有關文句相比勘，可知《呂氏春秋·有度》的“靜則清明，清明則虛”，本當作“靜則清=則明=則虛”，應讀爲“靜則清，清則明，明則虛”，由於在傳鈔過程中脫落了“清=”、“明=”之間的“則”字，錯成“靜則清=明=則虛”，再按照雙字詞語的重文格式（即A=B=ABAB）來讀，就形成今本的文字了。^⑪現在我要舉一個錯誤途徑正好與此相反的例子，即《越絕書》中由於在帶重文號的雙字詞語的兩個字之間衍增一字而形成的一處誤文。

《越絕書·越絕外傳枕中第十六》假范蠡之口講宇宙生成的過程說：

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陽生天地。天地立，然後有寒暑、燥濕、日月、星

⑩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中華書局，1983，206頁。

⑪ 同注⑩，39—40頁。

辰、四時，而萬物備。^⑫

宇宙間有陰氣和陽氣，陰陽相合而化生萬物，這是古人的共識。但是“氣生陰，陰生陽”之說，却不見於任何其他古書，十分可疑。我認為此文本當作：

道生氣=生陰=陽=生天地。……

應讀為：

道生氣，氣生陰陽，陰陽生天地。……

在傳抄過程中，受上下文影響，“陰=”“陽=”二字之間誤衍“生”字，就形成今本的文字了。

東漢王符《潛夫論·本訓》描述宇宙生成的過程說：

上古之世，太素之時，元氣窈冥，未有形兆……若斯久之，翻然自化，清濁分別，變成陰陽。陰陽有體，實生兩儀，天地壹鬱，萬物化淳，和氣生人，以統理之。^⑬

同篇還說：

是故道德之用，莫大於氣。道者，氣之根也。氣者，道之使也。必有其根，其氣乃生；必有其使，變化乃成。^⑭

王符所說的宇宙生成過程可以簡單表示如下：

道→氣(元氣)→陰陽→天地→萬物

上引《越絕書》所說，與此完全相合。這可以說明，我把“氣生陰，陰生陽，陽生天地”校改為“氣生陰陽，陰陽生天地”，是很合理的。

在古人的思想中，包括陰氣、陽氣在內的各種氣，本來都是天地的產物。老子提出了具有宇宙本原性質的“道”的觀念。稍後又出現了“元氣”(起初只稱“氣”)的觀念，天地被認為是元氣的產物，不過陰陽通常仍被看成是有了天地以後才產生的。漢代《易緯》的作者似有把陰陽跟元氣直接聯繫起來的意向。到了東漢，就出

⑫ 李步嘉《越絕書校釋》，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297頁。

⑬ 彭鐸校正《潛夫論箋》，中華書局，1979，365頁。

⑭ 同上注，367頁。

現了明確的陰陽先於天地的思想。^⑮《越絕書》一般認為是東漢人的作品。其宇宙生成論雖託諸范蠡之口，但所謂“陰陽生天地”實際上是東漢人的說法。

最後舉賈誼《新書·道德說》中脫落重文的一個例子。先依照一般的標點方法，將有關文字引錄如下：

諸生者，皆生於德之所生；而能象人德者，獨玉也。^⑯

“皆生於德之所生”的意思不大好理解。

《道德說》還說：

六理、六美，德之所以生陰陽、天地、人與萬物也。固為所生者法也。^⑰

……

物所道始謂之道，所以生謂之德。……德生物又養物，則物安利矣。……^⑱

可見其作者認為宇宙間的一切皆生於德。那麼，他為什麼又說“諸生者，皆生於德之所生”呢？

劉師培《賈子新書斟補》認為此句“生於”二字為衍文，《新書》注家多加採用。^⑲我認為與其把“生於”看作衍文，還不如說“德”字脫落了重文號。

如補出“德”字重文，有關文字應讀為：

諸生者，皆生於德。德之所生而能象人德者，獨玉也。

似頗文從字順。古書在流傳過程中脫落重文，是很常見的，前人校讀古書時已舉出過很多例子。說此文“德”字脫落重文，似乎要比說“德”前“生於”二字為衍文

⑮ 參看王曉毅《“天地”“陰陽”易位與漢代氣化宇宙論的發展》，《孔子研究》2003年4期，83—90頁。

⑯ 閻振益、鍾夏《新書校注》，中華書局，2000，324頁。

⑰ 同上注，325頁。

⑱ 同上注，327頁。

⑲ 方向東《賈誼集匯校集解》（河海大學出版社，2000）339頁注③、王洲明、徐超《賈誼集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331頁“校勘記”①、注⑯所引書328—329頁注〔二〕。後者的撰者之一鍾夏，還在注中提出了自己的意見，認為“生於德之所生”，“謂生於德之所以生，即道”。此說顯不可通。《道德說》通篇皆從德生萬物立論，為何此處要說“諸生”皆生於道？而且說諸生皆德之所生，是為“而能象人德者獨玉也”作鋪墊的，說他們皆生於道，文氣就不緊湊了。鍾氏在講了自己的意見之後，又說：“劉說衍‘生於’二字，於文亦通，下文云‘德者，變及物理之所出也’，‘德生物又養物’，則止言德生諸生，而不涉道之化也。”大概他已感到自己的新說不見得比劉說合理。

合理。

以上論述中的錯誤和不妥之處，請大家不吝指教。

2009年6月8日寫畢

原載《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的詮釋——紀念譚樸森先生逝世兩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今據以收入。

